

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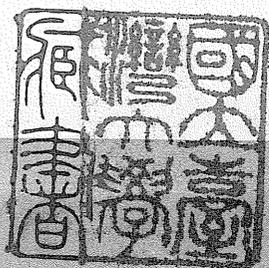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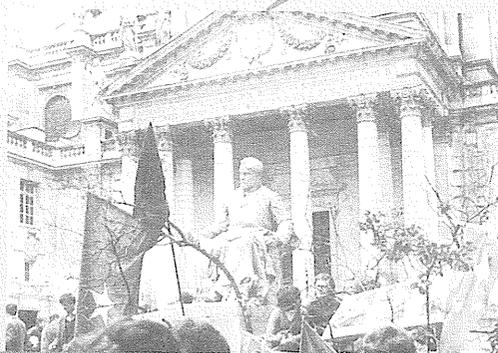


2791623

B29568596

1968年5月， 无奈的遗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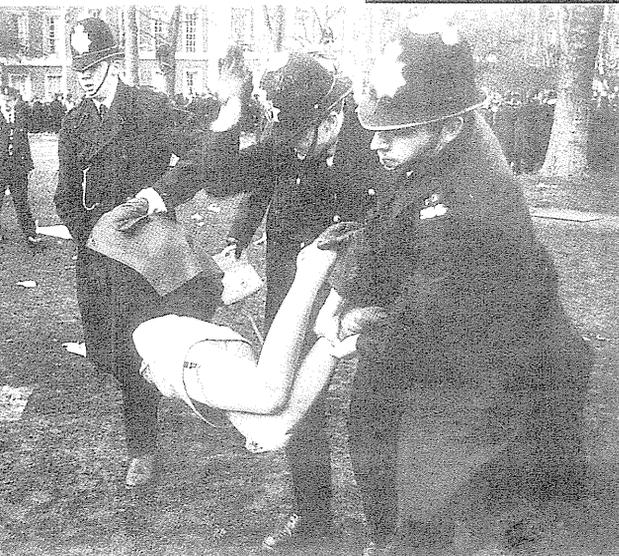
〔法〕让-皮埃尔·勒·戈夫 著
胡尧步 韦东高 璐 译
胡尧步 校



中国书年出版社

2791623

美国伯克利大学的和平示威： “美国滚出越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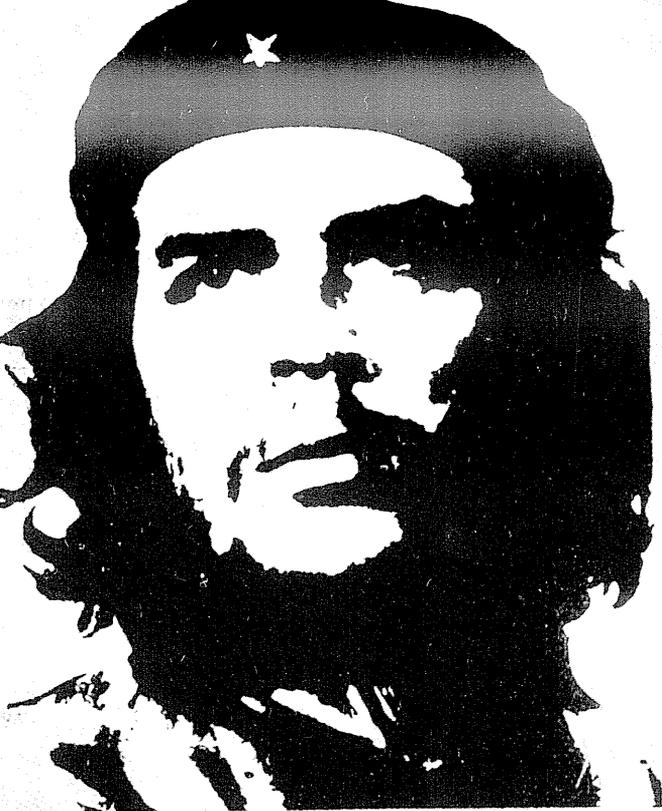


自1967年起，在全世界范围内支持越南人民统一的斗争和反对美国出兵越南的运动不断高涨，并以和平进军、示威运动和非暴力抵抗的方式表现出来。

< 英国的“越南团结运动”在美国使馆外游行示威，与警察发生冲突。

和平主义者喊出了“要做爱，不要作战”的口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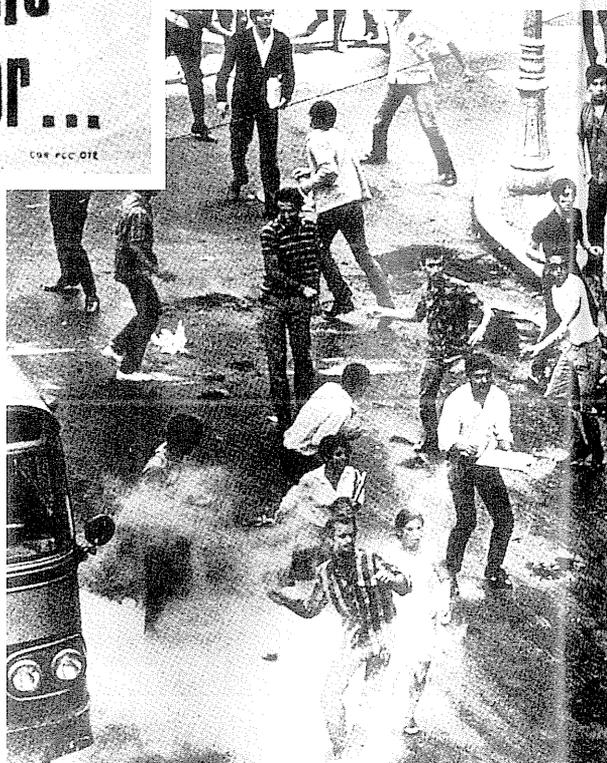




< 反压迫、争独立、反独裁成为20世纪60年代的主旋律。传奇英雄切·格瓦拉成为世界青年的政治偶像，左图为1968年1月古巴哈瓦那发行的招贴画。1968年，巴西青年学生和工人开始与1964年上台的军事独裁政权展开斗争（下图）。

**nuestros brazos se alzan
para rendirte homenaje
con el trabajo creador...**

CON FCC OTE





5月3日，左派大学
生在索邦大学集会。

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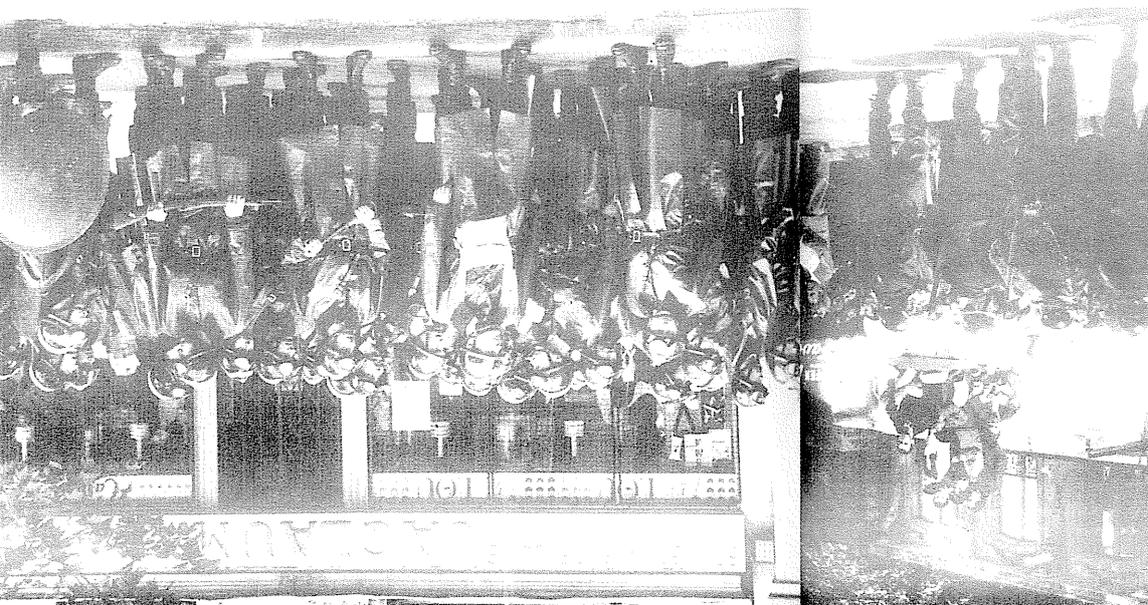
1968年5月3日，星期五，下午4点左右，警察粗暴地开进索邦大学，并以有三把椅子的腿被砸为借口抓走了学生运动的所有政治和工会负责人。警察的镇压点燃了五月运动的导火索。

学生与警察对峙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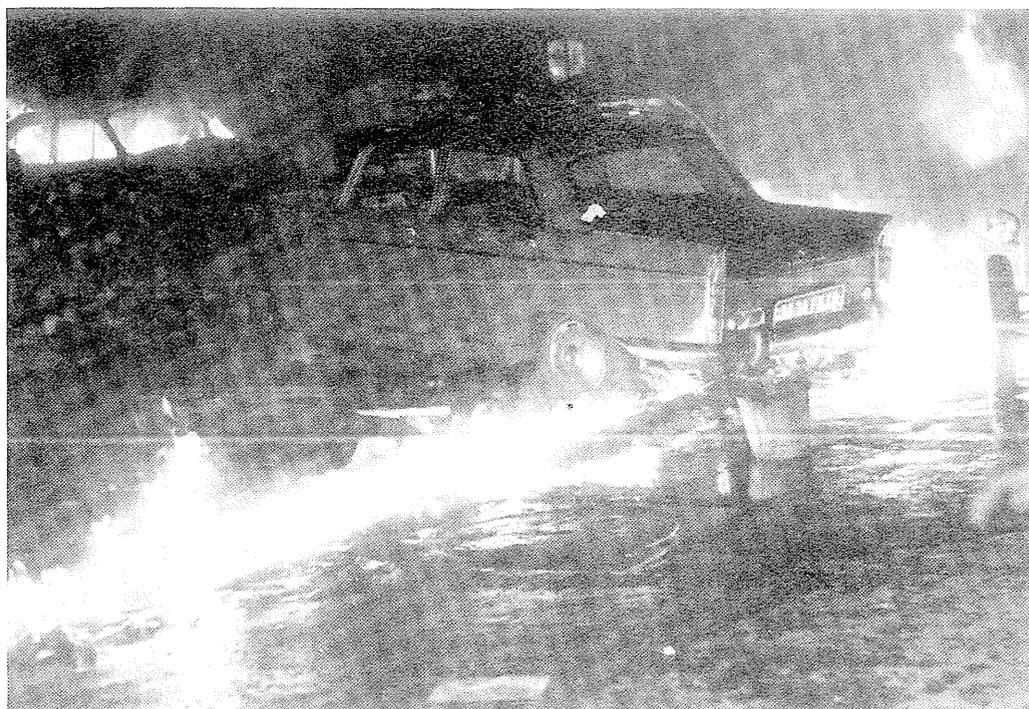
身着黑衣的警察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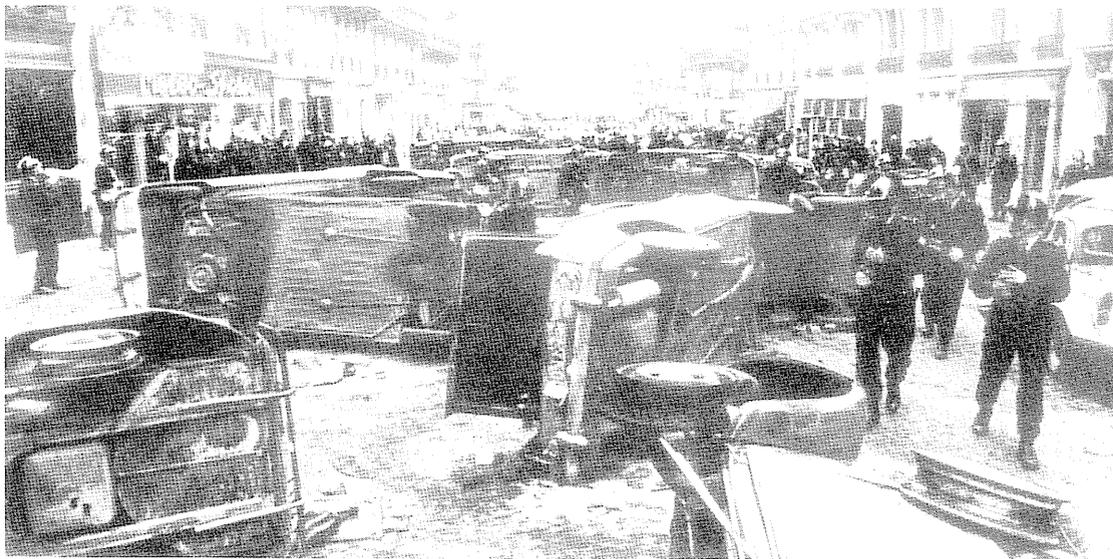


5月10日，星期五，这天夜里出现了第一批街垒。修筑街垒在示威者中创造了一种兴奋、友爱和节日般的气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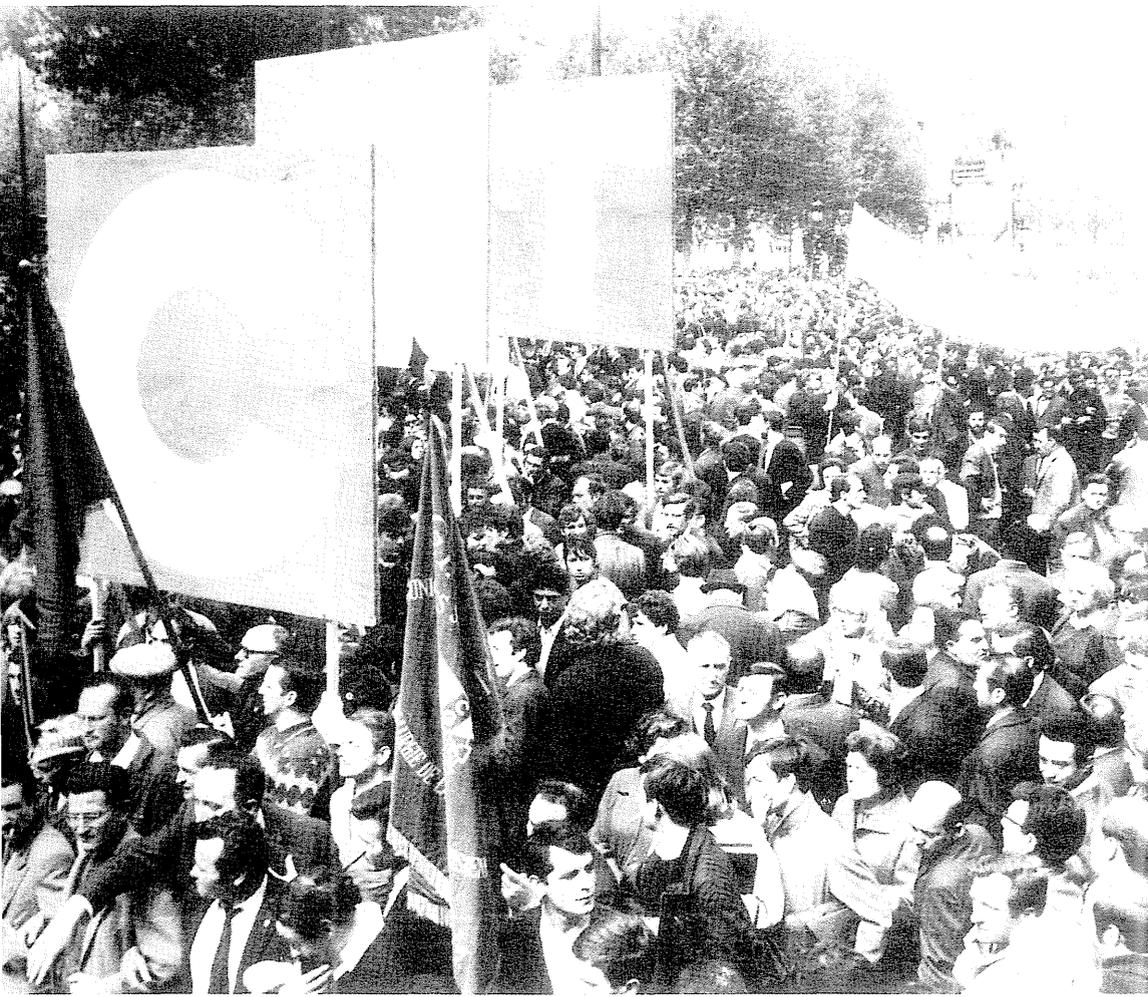
凌晨2点35分，警察开始攻向街垒。



11日，巴黎和法国看到了烧焦的汽车和拉丁区街垒的残迹。







街垒之夜过后，形势转变成全国性的危机。13日，法国全国总工会（CGT）和法兰西劳动者民主同盟在戴高乐上台10周年之际举行了一次全国性的罢工和游行，以抗议政府的残酷镇压。

目 录

译者的话	1
序 言	弗朗索瓦·热兹 1

引 言

五月运动的悖论	5
---------------	---

第一部 五月运动始末

一、现代化与厌倦情绪	15
会走向“美国式”的社会吗?	16
国泰民安	17
是“人的死亡”吗?	19
前景清晰乎?	21
二、是宠儿造反还是“疯狂的生活追求”?	23
空前的代沟	24
死胡同	27
疯人派	29
三、大学出了问题	32
大学的改革	32
“农泰尔疯了”	34
今非昔比的大学生斗争	36
一股新生力量	38
立即行动	39

挑衅与决裂	41
存在	43
四、“神奇的意外”	46
星星之火	47
面对聋哑政权	48
难忘的一夜	49
难以挽回的错误	50
太晚了	52
五、言论的解放	54
解放和节日般的气氛	54
一种不规范的语言	56
生存的疑问	59
抒情式的幻想	61
两个关键词：奴化和自治	62
要什么样的政权？	65
时钟停摆了	66
误会	67
六、是一次象征性暴力吗？	69
自发性	70
第一个街垒之夜	71
狂妄与嬉笑	72
从反击到诱惑	73
临界	75
大学生和“流氓无产者”	77
六月的死者	79
是否要提防报复？	81
内战没有发生	82
七、什么样的镇压？	86
见证的力量	87
手榴弹和警棍	87
博戎中心	88

辱骂、威胁和侮辱	89
关于镇压的辩论	90
警方未能幸免于危机	93
警察总署署长莫里斯·格里莫	95
军队	98
无可挽回的局面没有发生	101
历史不能重演	102
八、是革命的一代吗?	105
反对先锋队	105
如何理解五月运动	109
朦胧的极左三极	111
先锋队的第二青春	113
革命终于有了可能	114

第二部 极左势力的膨胀与爆裂

九、极左百态	121
难以捉摸的托洛茨基主义	121
再生的共产主义同盟	123
马列主义乎? 毛泽东主义乎?	126
无政府的毛主义	128
绝对自由的毛主义	131
十、在大学里	133
改革不可能吗?	133
象牙塔里的革命	134
漩涡	136
中学生造反	139
十一、会走向内战吗?	142
雷蒙·马塞兰与反“颠覆”	142
关于起义的高谈阔论	144
共产主义同盟的合理暴力	146

弗兰和索肖：毛主义的神话	147
《人民事业报》眼里的法国革命	150
五月的幽灵	152
一个脱离青年的政权	154
警察做出反应	157
“扩大抵抗”	159
十二、法西斯主义阴魂不散	162
是法西斯主义还是“强权国家”	163
“新法西斯主义”来了	164
“他们要杀人”	167
从警察国家到警察民族	168
法西斯主义和性解放	169
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	170
法西斯主义与权力	171
清算	173
十三、工人阶级变了	177
从“赌马到革命”？	178
幸福的当选者和其他人	179
会成为工人吗？	182
会晤	185
从“工人根据地”到“社交大家庭”	186
加斯东或工人的蜕变	188
历史的欺骗	189
十四、战争结束了	192
打擦边球	193
误入歧途的抵抗运动	195
是新型知识分子吗？	195
拼死的革命	198
没有付诸行动	201
英雄累了	203
共产主义同盟的转折	205

十五、利普和拉尔扎克之路	208
法国斗争的典范	209
“梦想成真”了吗?	210
五月运动的其他教训	212
过节和解放的感觉	213
“保卫拉尔扎克”	215
持不同政见者大会合	216
反核运动	218
马尔维尔市	220
十六、《解放报》的诞生和透明度的空想	223
追根溯源	224
“人民的报纸为人民”	225
交会点和矛盾冲突	226
乌托邦的末日?	229

第三部 反文化的产生

十七、另一种活法	233
“一切都停顿了”	233
反对“自杀性的文明”	235
令人欢迎的集体?	236
美国制造?	239
“摆脱前程”	240
“自由安排身躯”	242
反文化的不稳定效果	243
政治生态学的发展	244
十八、威海姆·莱茨,先驱者	248
革命的性政策	249
法西斯主义和性抑制	252
面对“群众对自由的无能为力”	253
在性问题上开明的先驱	256

“赶走老古董”	258
十九、女权运动的泛滥与极左派的爆裂	260
“我们女人是历史的奴隶”	261
对男子战斗精神的批评	262
性欲与主观意识	263
出格的运动	265
“组织,这就是死亡”	266
与前卫分子决裂	269
感情政治	270
男人是主要的敌人吗?	272
罗歌的不幸	274
从解放型妇女到面对现实	275
“这个恶魔也在我们中间”	276
二十、妇女解放运动——威力无穷的幻影	278
自由安排自己	279
颠倒的性歧视	281
有关区别的问题	283
“能掌握自己的身体吗?”	285
女人的身体,新的绝对事物?	286
难以获取的爱情	288
“死亡的母亲”	291
“完美的罪行”	292
运动成员的痛苦和合理要求	294
二十一、反精神病学和对疯癫的颂扬:“超越善与恶”	296
米歇尔·福柯与“大监禁”	298
反俄狄浦斯或对潜意识的推崇	299
反实用人文主义	302
不再害怕妄想与欲念	303
超现实主义与反文化:一副双面镜	305
反精神病学——是一场解放斗争吗?	307
他们说要破坏	309

从与极限调情到虚无主义大流行	310
二十二、学校：新的思想大师	312
不平等的学校	313
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	314
资本主义学校	315
学校里的阶级斗争	317
伊万·伊利什的无学校社会	318
错误的论据	320
“知识网”与“教育结构”	320
夏丘儿童的绿色天堂	323
美妙的国度	325
夏丘的家长们自由吗？	328
二十三、政治生态主义：一个可作为替代方案的乌托邦	331
亮相大选	331
世界末日就在明天	333
“伟大的组织”	334
会走向“电气化的法西斯”吗？	336
救世的幻想	337
罪恶感和新伦理主义	339
地球——大家的母亲	341
什么是生态学	342
“现实主义的乌托邦”？	344

第四部 转 向

二十四、理想的破灭	349
“索尔仁尼琴效应”	350
永别了，中国	351
一个孤芳自赏的伤口	353
新的浪漫主义？	354
承担自己的责任	356

从一种盲目到另一种盲目	358
二十五、“新哲学家”还是左派救赎的新外衣	360
一切都裹足不前	362
上帝的新使者	363
政权和国家,恶的新形象	364
新的媒体英雄	366
与马克思主义决裂	367
二十六、阿图塞的马克思主义:被误会的历史	371
以马克思和科学的名义	372
文化及精神的孤立	374
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阿图塞和拉康	376
无休止的自我批评	378
失败和自我毁灭	380
二十七、反极权主义的意义和局限	382
五月运动:革命的新形象?	383
马克思主义:“无法超越的范畴”的终结	386
反集权主义批判的更新	388
“花岗岩思想”	390
纯系盲目吗?	391
重新被发现的民主	392
二十八、承诺的危机	395
反专制主义左派产生了吗?	396
自治管理:最后找到的现实抉择	397
救护政策	400
政策的结束?	402

结 论

关于遗产的论述	407
重新组合	408

目 录

事件和双重效应	410
2002 年版后记:1968 年五月运动不属于任何人	413
从简化的模式中走出来	414
从纪念到回到批评	415
事件	417
极左派的两副面孔	419
继承的姿态	421

译者的话

本书描述的是1968年5月在法国发生的事，人称“五月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法国的文化革命。诚如法国某报刊所表述：“五月运动首先是一场彻底否定发达社会生活方式、价值观和体制的文化革命。”是月，以巴黎大学为中心的学生运动席卷全国。拉丁区筑起几十处街垒，警察与学生冲突不时发生，造成流血事件；1000多万工人以占领工厂为特征的罢工浪潮与学生运动相呼应，使整个法国陷于瘫痪。这场运动于是演变成一场猛烈冲击戴高乐政权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在法国，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生的最重大事件。

运动像一场打砸抢。几十年来人们不断对它提出质疑。各种思想流派在运动中充分表演。年轻的造反者本意是“为了革新共有的世界，勾画一个充满解放的清晰的前景”。描述运动的书籍已出版数百种，《1968年5月，无奈的遗产》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本书详述了起因、过程，并对各种思潮派别进行了评述。

我们全文译出本书，使读者能全面了解情况。真理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得到证实的。对运动的结局，众多学者认为是“走进了死胡同，造成破坏性后果”。

作者让-皮埃尔·勒·戈夫是位社会学家、哲学家和作家。其作品《企业的神话》为法国畅销书，此外，还有《管理的幻灭》、《后专制时代的民主》等。

本书由胡尧步、韦东和高璐三人合译。胡尧步翻译了序言，第三部的十七、十八、十九、二十，第四部的二十八，结论，2002年版后记；韦东翻译了引

序 言

弗朗索瓦·热兹^①

1998年,对年已20岁的人而言,往往是忧心忡忡的。这是理所当然的。从他们呱呱坠地起,就不知道什么是“危机社会”。社会继续存在,但其前景永远无法确定。他们的父母在30年前所经历的是一个与现在的形势相反的社会:60年代末,法国百业兴旺,就业充分,青年前途灿烂;然而,在1968年,很大一部分20岁的青年却起来反对这个丰衣足食的社会空虚与失落。

今天,这个反常的反叛的意义和随之而来的年代的激进誓言似已消失。对那些从那个年代生活过的人来说,这些只不过是青年时代的美好回忆,虽曾经历,但如今已是放弃的信念的回忆,但是,在这个令人难以置信,但却是真实的时刻,人们试图不惜一切对自己的信念忠贞不渝。而他们的孩子和其间的几代人,对此意见并不一致:有些人对那个年代无比憧憬,既好奇又激奋,并喜欢加以证实,就像对切·格瓦拉的画像那样顶礼膜拜;另外一些人无疑占了多数,看到的只是“退伍兵”的历史,认为对此唠叨个没完于当今的严酷现实一无用处。

不管对那些怀旧的人还是无动于衷的人,让·皮埃尔·勒·戈夫的这本书会带来一种新的视野。因为意见虽有分歧,我和作者都相信,在1968年和以后几年的历史中有很多教训可以汲取。首先,我要谈的是,因为5月的激情,它在今天再次具有意义;其次,从70年代后半期开始,极左运动走向衰落,它的失败在

^① 探求出版社编辑部主任。

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当时已失去魅力的流行时尚,这种认识是从80年代初开始的。在1983年以肯定个人主义作为最高价值,同时赞同左翼的经济自由化,直至“企业的神话”^①成为了当时的时尚。

如果人们不接受这种时尚和时尚所认可的不公正,那就无法继续揭示“单一思想破坏”实用的意识形态性的原因。要了解其深刻原因,我个人认为要在下列人们很少提出异议的问题中找答案:为什么在被称作“出生率激增年代”,也就是在1945年到1952年出生的大多数人会在1968年5月开始的革命冒险中投入如此多的热情?而在70年代末,这些68分子(Soixantehuitards)中的大多数又为何如此突然地默默舍弃他们的诺言呢?

在整个80年代,由于这些问题一直被隐藏,那种吃喝玩乐的乐天思想的胜利就不足为怪了,这是那些改邪归正的68年老兵常常在广告、新闻媒体和政治上表现出来的情绪。一旦这种思想观念衰竭,90年代的那种厚颜无耻的现实主义取而代之,这种隐藏的情况就长期存在下去了。

1968年五月事件已过去30年。时间终于打破了这些忌讳。让-皮埃尔·勒·戈夫在这本书里试图向这种困难的挑战开火。在“管理观念”的社会学著作中,谈及了这个问题。他在仔细分析现代管理技术的公用事业部门^②“企业宪章”^③和引进方式的内容后,发现在这里面可以找到1968年五月运动的某些口号,它们程度不同,有些是十分清楚的词句,有些是要求个人自治和不要中介的民主。对于这种奇特的状况,他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同时也对1968年极左派走进死胡同加以阐述、分析。他自己也是其中的成员。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解释80年代在管理条文中突然大量出现的1968年的某些思想,让-皮埃尔·勒·戈夫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实际上,描写1968年五月事件和“革命”年代的书已有数百种。但是,除了仅记录1968年五月^④几个星期的“当代史”书以外,还有一些基本上是涉及部分证据或分析的书;描写该时

① 请阅 Jean-Pierre LE GOFF, *Le Mythe de l'entreprise. Critique de l'idéologie managériale*, La Découverte, Paris, 1995.

② *Ibid.*

③ Jean-Pierre LE GOFF, *Les Illusions du management. Pour le retour du bon sens*, La Découverte, Paris, 1996.

④ 最确切和无疑的是 Alain SCHNAPP 和 Pierre VIDAL-NAQUET 的《大学生公社日记》(Journal de la Commune étudiante)。《文件》(Textes et documents), 1967年11月至1968年6月, Seuil, Paris, 1968, 1988年新版。

期全部历史的是帕特里克·罗特曼和埃尔韦·阿蒙的书——《这一代人》^①。这部书着重记述了那些后来成名的成员的个人经历，其中排在首位的是那些无产阶级左派的领导人。

让-皮埃尔·勒·戈夫与上述做法相反，首先感兴趣的是极左派在那个时代的思想历史，但也没有因此忘记有这种思想的人们。这个工作使他具有对五月事件原始的总体观念，重视了参加该运动成员的观点，同时也是权力机关的观点。本书的特别之处在于第一次对五月事件后的年代进行了深入研究。为此，他分析了数量很可观的材料，特别是《人民事业报》、《信徒》、《红色或争吵起来了》等极左派报刊，引用了发表在杂志或书本上的切实和主题清晰的许多原始材料。

让-皮埃尔·勒·戈夫将火热的年代事件的精确历史回顾与标示有关人物主要事实的记录、分析紧密结合，提供了一个总的观念。这一观念会使那些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惊讶，也会使那些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感到新鲜。因为，即使我们当时是千千万万人中具有同样期望和幻想的少数人，在某个派别或某个阵线中干事，也很难有本书的整体观念和批判眼光。

有人重视革命战士的思想和证据，但本书的目标并不是评判它，而是首先寻求这个潮流的力量和逻辑，是它造就了最富激情的一代人。此外，我曾说过，正是这一点，即总体的分析，在今天是紧迫的需要。我谈的这种激情，很多参加过1968年运动的人是有过经历的。这种激情难以言喻，只有诗歌和小说才能表达。

一旦革命的激情消失，尽管某些人对此还试图保持忠诚，但是仍要与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的政治运动的荒唐口号决裂。忠诚与决裂的矛盾是难以存活的，有时会导致个人的悲剧。而让-皮埃尔·勒·戈夫的书中提到，有些人成功地解决了这一矛盾，今天已找到新的战斗方式和“民主的激情”。

但是，很多参加1968年五月运动的成员最终选择抛弃激情，同时他们并没有刻意舍弃个人或集体的记忆。这双重的回避有时会导致参与另一种“打得落花流水”的原则，也就是“极端的”自由主义或现代管理原则，在那里只有独立于个体、历史和记忆之外的个人间的力量对比关系。

但是，在本书中，我预测了让-皮埃尔·勒·戈夫的一个主要论点，他根据我的意思做了卓绝的阐明，而我是让读者自己去发现。我要指出的是，在回忆每

^① Hervé HAMON, Patrick ROTMAN, *Génération*, tome 1, *Les Années de rêve*, Seuil, Paris, 1987; tome 2, *Les Années de poudre*, Seuil, Paris, 1988.

个人人生中“不可言状”的事实时，我相信这本书所阐述的正是不可言状的那些事实。这并不是谴责，也不是一代人的坟墓，其错误可能在于把激情看得太认真了，不管个人的经历如何，对其个人的行为，也不止于做一种评判。

让-皮埃尔·勒·戈夫想做的，至少就我所看过的文章看来，正是要帮助“后68分子”的战斗。五月运动令人眩晕，维护真实面貌很困难，甚至可能办不到，同样，无论从最好方面或最坏方面考虑，本书要帮助了解这些年来所体现的世纪末的特点。

在80年代和90年代，标志着共同生活的破坏的事物都是出现于此时，无疑，这是异乎寻常，至少是无视传统观念的。但是，让-皮埃尔·勒·戈夫对这些年代的描绘所采纳的证据，在我看来是很有力的。至于我，我认为这么严酷的现状，这个“从思想极端走到没有前途观念，缺乏计划，特别是没有期望”的世界（就像利奥内尔·若斯潘在1991年所说的那样），只要在1968年后那些人还活着，他们的孩子还在，还没有把那年代送进坟墓，这种世界就无法超越。而且五月“无奈的遗产”也不可能被承受。

正是这种信念促使我出版这本书并支持作者的努力。对于这一点，我得做一些解释，为自己编辑出版的书作序并不是寻常的事。自1981年投入这个行业来，这是第一次。我之所以重视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个人的承诺。1983年，探求出版社取代马斯佩罗出版社，在1968年5月以后，人们将在本书中看到马斯佩罗出版社传播革命思想的作用。自1959年起，弗朗索瓦·马斯佩罗创建的出版公司进行了英勇的斗争，首先是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然后是尽快让人们听到第三世界中为解放而斗争的人们的声音；同时让人们认识全世界的伟大诗人和作家的作品，以及这个时期最具有创新思想的社会学研究成果。

15年来，在这种传统的影响下，我试图用它来指导探求出版社的工作。在出版本书的同时，我也意识到对五月运动后的思想批评方法与很多当时在弗朗索瓦·马斯佩罗出版社出版的书籍的思想并不冲突。但是我相信，这种通过反思进行的评价是必需的，这样就可以忠实于他们的承诺。总之，我希望让-皮埃尔·勒·戈夫的这本书能够超越它可能挑起的争论，有利于调和那些与蛊惑人的时尚不协调的人们，探求超越它的艰难道路。

引 言

五月运动的悖论

1968年的五月运动迄今已经30年了。这30年的间隔与五月运动和1936年^①之间的间隔只有2年之差。从1936年到1968年5月，欧洲发生了战争，欧洲进入一个崭新时代的社会变革。“光荣的30年”^②的终结和大规模失业的发展所造成的社会裂痕是比五月运动离我们更近的事，但从社会和文化角度来看，这场运动仍然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参照点。它所提出的许多课题仍然具有惊人的现实意义。

然而，这场运动与它之前的伟大历史事件——1936年和抵抗运动^③——的性质却完全不同。它没有引发官方的纪念活动，参加运动的大学生“英雄们”也没有受到“为国效力”的褒奖。这场运动看上去像一场“打砸抢”，而且人们无休止地质疑它的意义。撇开有关运动的背景和持不同政见一代人的心理状态不谈，这一代人今天无法再回避这样一个问题：为了革新共有的世界，勾画一个充满解放希望的清晰前景，他们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呢？

鉴于五月运动较之先前的伟大历史事件所具有的特殊性，这个问题显得格外尖锐。先前那些伟大事件，由于其发生在具有法国大革命和工人运动理想的历史背景中，因而其意义显而易见。五月运动的独特之处在于，其行动者们只是象征性地提到这种理念，但同时却开辟了一条切实破坏集体行动原则和准绳的道路。这标志着一次重要的历史转折。因为此前的历史都是参照共同的文

① 1936年，指法国人民阵线政府的成立。——译者

② 光荣的30年，指二次大战后法国经济快速发展的30年。——译者

③ 抵抗运动，指二次大战期间法国人民反抗德国人侵的斗争。——译者

化而展开,并且沿着以法国大革命为始发、由其后一个世纪的工人运动所接力的路线行进的。

30年来,这场运动时时强烈地出现在人们的脑海中。每当社会冲突发展到一定规模时,人们立刻就会联想:不会来一次新的五月运动吧?社会无时不在窥视先兆性的蛛丝马迹。专家们试图以界定“社会运动”的标准尺度来衡量现实的冲突。另一些人则总是振臂高呼开展斗争,梦想着如何像极左派旗开得胜的黄金年代那样来一次总罢工。五月运动的幽灵继续在社会想像力中游荡着,整整一代知识分子和以前的活动分子还有点不舍得为它送葬。

只是到了80年代末,在1988年纪念日之际,这场运动才得到平反。那就是承认这场运动在移风易俗和文化革新方面起了突出的正面作用。如果把五月运动放在左翼向着自由化转变和80年代“真空纪”(吉勒·利波夫斯基语)^①的大背景中来看,它便成了法国迈进现代化和后文化现代化的始作俑者。这样,那些抗争的年月又被纳入社会和文化现代化的年代。这种现代化的潮流以不可逆转的态势向前发展,到了80年代似乎随着密特朗主义的胜利而告完成了。

这与五月运动甫定时极左派的说法相去甚远。他们认为五月运动的真理必须在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中得到实现。难道抛弃了不合时宜的革命、恢复了“时髦”的自由文化之后,五月运动的意义和影响便茫然无存了吗?

从1968年5月到80年代,人们从那些以写实方式出现的著作中获得错误信息,把事态的发展用简单化的语言加以描述。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但必须让事实自己来说话并使事实变得不容置疑。结论是明确的,而且对这场运动做出明白无误的解读:五月运动除了为法国现代化做出贡献,还告诉我们什么?以下这些问题不容忽视:为什么对“旧世界”的全盘否定反而导致新的因循守旧?为什么这次运动提出的那么多课题会与文化现代主义和自由主义合流?

五月运动已经远离我们。然而它给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以人们始料不及的形式渗透到现实生活之中。在我们生活的现今社会里,个人自治、透明度和“公民权”等概念已经广为人知并已成为掌权机构的口头禅。这些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词汇,它赋予提出这些概念的人以某种民主的担保。至于这些词汇对于那些想要建立的社会关系和实践有什么意义,那就不必考虑了。这种自治的诉求体现在每一个机构之中并关系到每个人。家长、儿童、企业和机关的职工、

^① Gilles LIPOVETSKY, *L'Ère du vide. Essai sur l'individualisme contemporain*, Gallimard, Paris, 1983.

失业者、退休人员……统统需要自治，并要具备应对不测的能力。自治、自我约束、自我评估、“个性化”的个人计划等等，这些事情都有许多专家给大家提供帮助。从来没有一个社会像今天这样把自治提到作为信条的高度。但与此同时，人们又抱怨道德标准和权威准则的崩溃。如果不对五月运动后的年代进行寻根究底的研究，如何能理解这种异常现象？今天，对妇女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家庭和学校中的儿童教育，教学、劳动的地位，生态和环境等等问题进行过无数次辩论。这些辩论从表面上看观点新颖，但却带着那些年代的烙印。而许多由电视主持人举办的公众论坛轻巧地和着稀泥，有时实际上只是那个年代乱哄哄的群众大会的再现。

什么时候有过今天这样的言论多样化和自由？什么时候有像今天这样邀请个人来表达自己的感受、自己的“经历”或者就诸多问题直陈己见的渠道？诚然，这并不会产生多大效果，重要的是让人说话。资讯的发展是否有助于加强透明度？在各个领域保持差异的权利不也是一项成果吗？所有的这些现实问题都奇妙地在五月运动及其后的几年里提出的课题中得到共鸣。

希望不要张冠李戴、混淆情势。五月运动的青年是怀着革命理想和造反精神（哪怕只是虚幻的）来邀持不同政见之功的。这与当今青年同这段历史所保持的联系不可同日而语。如果鼓动不服从和违抗，会与权威当局的禁令和规定相抵触、从而受到处罚并承担风险，那么这种遗产对于生活在抗争年代之后形成的真空中的新一代继承者还有什么意义？在变得宽容的社会里，号召反叛权威和制度、鼓动造反又意味着什么？

我们之所以这么说，并不是怀念旧秩序。我们并无意诋毁五月运动在当时所表达的自由精神。今天，已很难再现当时笼罩在大学里的那种沉重的厌烦情绪和官僚作风以及社会上的不公正和虚伪。追根究底，五月运动是在生活激情的推动下快乐地扰乱因循守旧氛围，同僵化的政权和体制捣乱。

1968年后，极左派自己也变成民主社会自我完善的推动力。社会从极左派身上也吸取了教训，诸如妇女的解放，对道德伦理、家长式统治和极端不公正的抨击等等。我们也不会忘记，有些极左组织使本来可能很野蛮的造反变得合乎理性。他们激起了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关切，尽管其出发点是那些最有争议的意识形态和信条。不管怎样，在敢闯和个人经历的角度看，许多68分子所走的路程远比另外一些人的选择更有价值。在同一时代，在法国正经历一场深深撼动它的运动时，那些人却决定不顾一切地在职场上拼搏。

然而，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对五月运动走进死胡同和它所造成的破坏性后果提出疑问。惯用的“疯狂的青年一代”的提法取代了分

析和反思。这种提法甚至会被用于回避对思想的研究,把思想放在比他们的激情次要的地位。但是如果我们要理解这段历史的话,这些思想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历史毕竟不能降格为其演绎者的主观意志和个人历程。

把个人自治绝对化,否定一切限制,提倡无节制的言论自由和拒绝任何妥协,对权力和法西斯主义的幻觉,对教育和教学的全盘否定,政治生态学所带来的变迁:这些在抗争年代所提出的课题都将在本书中涉及并加以评说。我们力争忠实于我们将大量引用的那些著作,当然也不敢妄言没有挂一漏万之处。我们认为重新诠释这些著作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在人们扭曲的记忆中有淡化这些著作的颠覆性和有悖常理的倾向。

在反思方面,许多五月运动的参与者出奇地缺乏勇气。他们似乎担心对这些思想的批判会为极右势力作嫁衣裳。我们则相反,认为要有效地与落后的意识形态作斗争,就必须搞清楚这些思想。我们必须思考的是:公共生活的准则和革新社会的理想是怎样从五月运动的革新及其所带来的希望开始,又一步一步地走向土崩瓦解的。如果我们想理解昔日发生的事情,进而澄清过去与现在之间存在的隔断和衔接因素,就必须关注这一奇特的现象。

这正是本书试图要做的工作。本书跟踪“大学生公社”^①所提出的课题在10年中(即从五月运动到70年代末)的进展情况。本书的各个章节就是这一进程的里程碑:1968年五月运动一极左势力的发展和内讧一反文化的诞生一逆转。

回过头来谈运动,我们首先强调指出其得以发生的社会和文化条件以及连那些主要行动者也始料不及的“神奇意外”性。接着就会谈到“解放言论”、暴力和镇压。其后一个时期的特点就是大学生公社内极左两极的矛盾和紧张。这两极在运动后分裂为毛派和托派的新列宁主义,以及以“法兰西解放运动”为代表的绝对自由派和“欲望”派。

这场内部斗争导致新列宁主义派的危机和政治极左派由内到外的爆裂。后者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它所提出的课题也烟消云散了,而是以诸如生态主义之类的和平方式重起炉灶。70年代后半期“新哲学家”调和主义的出现标志着失衡的开始和从极左派沿袭下来的批判方式的泛滥。到了世纪末,极左派提出的许多课题开始变得平淡无奇,成了一种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新文化渗透到左翼之中并有可能成为主流文化。我们认为这就是五月乌托邦的冒险行为和奇特命运的必由之路。

① 大学生公社是埃加·莫兰的提法,见:in Edgar MORIN, Claude LEFORT, Jean-Marc COUDRAY, *Mai 1968: la Brèche. Premières réflexions sur les événements*, Fayard, Paris, 1968.

我们不敢妄言本书描绘的历史画卷是完美无缺和一锤定音的。因为五月运动并不局限于巴黎的大学生公社,其后的极左派斗争也是如此。我们没有论及工人阶级^①和其他社会阶层在外省开展运动的情况,也未论及当时很有实力的总工会和其他工会所扮演的角色。法国民主工联和所谓的“第二左翼”曾试图把五月运动产生的许多思想变成行动的目标并通过与舆论相配合使之延续下去。总的来说,这种企图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还有待进一步分析。

我们主要是从政治和文化的双重层面上去解读大学生公社内的激进青年和后来的极左运动。在这个范围内,我们优先探讨我们认为最具创造性的那些派别。这些派别之所以被称为先锋,并不意味着人们接受他们中间许多人信奉的列宁主义,而是从文化先锋这个意义上讲的。他们对社会内部酝酿着的深刻变化有独到的见解。

在重温他们的著作时,我们不想无视他们常常怀有的那种冲动和“疯狂性”。对思想的分析和对事实的解读将同步进行。我们也重读了曾经给他们以启迪的大师们(如路易·阿尔蒂塞尔^②、米歇尔·福柯^③、菲力克斯·加塔里、吉勒·德勒兹,等等)的不同版本的著作,但并不敢妄言考虑了他们的全部著作,也不会把他们的作品与其极左信条混为一谈。

在这一时期,整个中生代形成了某种世界观和价值标准,不管后来如何演变,这代人都深深地打上这种世界观的烙印。这种新文化也将自觉或不自觉代代相传。但这种新文化并不是那个打上女权主义和生态主义印记的、美妙动听而又纯洁的遗产版本的复原,如同人们一边在给孩子们讲述美丽的故事,一边要求他们要自治、要有公民感和责任心一样。

事实上,人们将会从本书中看到,整个有关人和文化的观念有时会在最美好愿望的名义下被搞得一团糟,使人对自治的思想本身产生怀疑,使区别合理与不合理、私人与公众、常态与病态的标准被搅得混乱不堪……虽然文化的左倾占了上风,但它换来的却是社会的非政治化、极端个人主义和新因循守旧的膨胀。那些抗争的年月不仅为革命神话敲响了丧钟,而且破坏了政治伦理和理性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抗争年月是一份“无奈的遗产”,人们必须从他们的视野之外去寻找革新政治和文化的可行性。

① 引自:Jean-Daniel REYNAUD, Sami DASSA, Josette DASSA, Pierre MACLOUF, *Mai-juin 1968 et le système de relations professionnelles*, étude faite à la demande du Commissariat général au Plan, CNAM-Laboratoire de sociologie du travail et des relations professionnelles, 1970.

② 路易·阿尔蒂塞尔(1918—1990),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译者

③ 米歇尔·福柯(1926—1984),法国哲学家,著有《语词与事物》。——译者

第一部

五月运动始末

一、现代化与厌倦情绪

60年代中期,法国的繁荣达到空前水平,似乎避免了所有严重的社会危机。货币坚挺,经济年增长率在5%上下浮动。国家结束了殖民战争,从此过上和平的日子。在20来年的时间里,法国走进了新时代,尽管没有真正意识到。

变化是巨大的。第三共和^①时代突出的“旧农业社会与工业化之间的妥协”^②被打破了,国家的整体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温馨法国”的形象,它的村庄和钟楼,仍然是学校中传授的最重要的文化概念,人民对此也恋恋不舍。但这种形象已被战后以来开展的现代化运动搞得面目全非了。

这一现代进程并非毫无困难和一帆风顺^③。社会阶级和不平等现象并未消失;生活水平的差距仍然严重。但又有谁能否认经济和社会取得的进步呢?上个世纪存在的绝对贫困化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生产和消费的发展以及由“福利国家”建立的财富再分配体系使工人的待遇得到全面改善。用社会学家亨利·芒德拉^④的话来说,法国完成了“二次革命”,其标志是19世纪传承下来的法国社会结构被打乱了。法国扭转了积重难返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滞后的局面。农村人口的外流已接近完成,城市作为中心日益发展。由于生育的增多和寿命的延长,人口不断增加。生活方式和阶级结构起了变化。对农村和家庭模式的眷

① 第三共和国,从1870年到1940年。——译者

② Stanley HOFFMANN, *Sur la France*, Seuil, Paris, 1976, p. 42.

③ 农业现代化主要表现在农民数量的大幅度减少:1954年,农业经营者和农业工人占劳动人口的26.7%,1968年只剩14.9%。同一时期,小业主、商人和手工业者的人数也从12%减到9.6%。

④ Henri MENDRAS, *La Seconde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965-1984*, Gallimard, Paris, 1986.

恋,折衷平衡的价值观,传统显贵的举足轻重地位,统统都受到冲击。

在60年代,虽然不平等现象和诸多不合时宜的行为依然存在,但人民是满怀希望的。那时的经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呈现出不可阻挡的势头。

然而,这一进步付出了使某些不安定因素开始蔓延的代价。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以族姓为依归的初级共同体让位给了不分姓氏的大城市。生产和消费增长的目标是达到了,但它带来了思想和政治信仰的危机。围绕社会运转失灵和增长成果再分配问题的政治辩论不了了之。表面上的普遍满足和运转如常掩盖了任何东西也无法弥补的情感真空。

会走向“美国式”的社会吗?

60年代现象的特征是所谓中间阶层(介于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出现。传统的中产阶层(农业主、手工业主和商人)在萎缩,而其他阶层在发展。第三产业迅速发展,使大多数劳动妇女得以就业。在职业队伍中增加了中高级管理者、技术员和自由职业者,他们像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①。

尽管工人的数量仍比其他工薪阶层增长得慢(从1962年的660万增加到1968年的730万),但依然是社会职业中人数最多的。从战后开始的重新整合已经启动。诚然,不熟练或不太熟练的工人仍占多数,因为泰罗制^②有利于“专门工”阶层的发展,他们实际上就是来自农村和国外的非熟练工人,大部分是青年、妇女和移民劳工。但与此同时,熟练工人和工头的比例在增加,那些被称为“白领工人”的阶层也同様;技术员、施工工程师、工业设计师等日益增多。

社会阶级并未消失,法国也还不是一个富足的国家。但在总体上,生活水平的差距和区别在缩小。1962年10个劳动人口中有7个以上是工薪者,而且妇女的就业率也在增长。家庭消费结构起了变化:家庭日用品、保健、娱乐等方面的消费比重不断增加。进步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洗衣机和电冰箱、小轿车和电视机成了这种变化的象征。

社会学家们通过大量的文章和著作搜寻社会生活各领域变化的蛛丝马迹:有劳动和企业方面的,也有休假的娱乐、轿车、广告、电影等方面的。他们在理

① 1968年此类人数占积极人口的29.6%(《经济 and 统计》1977年7—8月第91期)。

② 泰罗制:由美国工程师泰罗(1856—1915)创立的资本主义劳动组织和生产管理制度。——译者

性的外表后面发现了现代生活的神秘之处^①。在其为美国社会学家戴维·里斯曼 1964 年在法国出版的《孤独的人群》^②一书所作的序言中，埃加·莫兰写道：“若干年来，我们不仅试图从描写美国的文学作品中寻觅奇特之处和未来主义的东西，而且也在探索我们自己的面目……我们从此要自问：我们的社会将会在多大程度上像美国社会呢？虽然我们确信一定会有相当程度的相似。”

“进步是势不可挡的”，但是这种疯狂的赛跑付出了代价：人际关系中的人情味减少了，人的个性消失，千人一面，就像雅克·塔蒂导演的电影《我的叔叔》（1958）和《游戏时间》（1967）里所描写的那样。虽然 19 世纪的“资产阶级社会”还有一定影响，但传统的权威方式、沿袭下来的风俗与民情已经开始磨损。群众中滋生出一种新的因循守旧。乔治·珀雷克在他的小说《物件》中表现了一对年轻夫妇，在他们眼里，仿佛占有消费品就是活着的全部理由。他们并非不幸，但似乎生活在自身之外，使自己反过来被那些物件占有了。

国泰民安

法国终于过上了和平的日子，而且许多国家却并非如此：以一阿冲突、拉美游击战、越南战争、美国黑人少数民族的斗争等等，都表明暴力远未消除，暴力的场景频频出现在电视镜头上。苏联和东欧国家早已抛弃的革命理想又在古巴、越南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中死灰复燃。而在 1963 年便与苏联决裂的毛泽东中国于 1966 年发动了一场“文化大革命”。但这一切同法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要面对的问题又有什么关联呢？

在欧洲内部，法国在国际问题上所持的立场使之与其伙伴格格不入。法国于 1964 年承认了共产党中国；它谴责世界经济中的美元霸权地位；1966 年退出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一体化机构。同年 9 月，戴高乐将军在金边演说中抨击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军事干预。这些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表态，拒绝“集团政策”，以及它对阿拉伯国家的政策，使法国在第三世界（阿拉伯、印支、拉美）国家赢得普遍的好感。年轻人恰好可以从这些地方找回他们的革命希望。

“冷战”时代已告终结，非斯大林化也已启动（尽管还很脆弱）。苏联和美国

^① Roland BARTHES, *Mythologies*, Seuil, Paris, 1957. Edgar MORIN, *Le Cinéma et l'homme imaginaire*, Minuit, Paris, 1956; *Les Stars*, Seuil, Paris, 1957.

^② David RIESMAN, *La Foule solitaire*, Arthaud, Paris, 1964.

尽管社会制度不同,但都同样关心生产的发展。雷蒙·阿隆^①提出的“工业社会”概念不是使现代社会比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概念更容易被人理解吗^②?

在国内,虽然阶级斗争并未消失,但冲突的症结已经改变了性质。工人们头戴鸭舌帽、挥动拳头、占领工厂、高唱国际歌上街游行的形象仍然浮现在人们的脑海中。1936年的“人民阵线”和西班牙战争只不过是四分之一世纪前的事。在西班牙,佛朗哥还在台上,但反法西斯的斗争还能像30年代那样充满活力吗?在欧洲,法西斯主义越来越不合历史潮流。消费和中产阶级的发展,到西班牙去度假,这些都消磨着反法西斯的热情。

工会和左翼政党还在提社会的替代模式,但斗争的首要任务却是从经济增长成果中争得更大更公平的份额。围绕工资、工时和带薪假期的冲突并未结束,但工人阶级已经起了变化,其诉求开始得到满足。雷蒙·阿隆写道:“到了20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间时,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经验已经证明,由工会或压力集团所代表的各社会阶层之间半和平的对立方式将逐步取代各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③

在左翼,由于熟练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比重增大,引发了一场关于“新工人阶级”^④的辩论:是否应该重新审视对工人阶级的分析,把管理人员、工程师和技术员,甚至职员和低级公务员都列入工人阶级范畴?社会学家的分析把这个问题纳入意识形态和政治范畴中去了。阿兰·图雷纳就社会、技术和文化的演变对工人意识的影响提出看法,认为工人意识已不再是传统的工人运动模式。他呼吁活动分子和社会学家要看到变化,要摒弃“过时的神话”^⑤。而米歇尔·克罗齐耶则写道:“无产阶级时代结束了,我国社会历史的一个阶段——无产阶级宗教阶段要一去不复返了。”^⑥塞尔日·马莱则认为工人阶级已不再是社会的边缘,“其生活水平和对舒适的追求使其走出了工业化初期蜗居的铁皮屋”^⑦。这些社会学家以各自的方式强调指出:争取权益的斗争将发生变化,将

① 雷蒙·阿隆(1905—1983),法国社会学家,著作有《历史哲学引论》。——译者

② Raymond ARON, *Dix-huit leçons sur la société industrielle*, Gallimard, Paris, 1962.

③ Serge MALLET, *La Nouvelle Classe ouvrière*, Seuil, Paris, 1963; Pierre BELLEVILLE, *Une Nouvelle Classe ouvrière*, Julliard, Paris, 1967.

④ Serge MALLET, *La Nouvelle Classe ouvrière*, Seuil, Paris, 1963; Pierre BELLEVILLE, *Une Nouvelle Classe ouvrière*, Julliard, Paris, 1967.

⑤ Alain TOURAINE, 《Situation du mouvement ouvrier》, *Arguments* 4, *Révolution/classe/parti*, Union générale d'édition, Paris, 1978, p. 247.

⑥ Michel CROZIER, 《L'ère du prolétariat s'achève》, *Arguments*, *ibid.*, p. 281.

⑦ Serge MALLET, 《Une classe ouvrière en devenir》, *ibid.* p. 256.

要更多地考虑有关劳动者的地位、对企业管理和权力的监督等问题。

至于法国共产党，它依然坚持自己是革命的政党，但现在也主张“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它开始改弦更张，考虑开辟一条“能通向社会主义的先进民主道路”^①。在知识界，马克思主义仍然是第一信条，他们仿佛总绕不开法共与总工会。但也有目前仍为少数的知识分子开始以批判的眼光质疑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1958年，已脱离共产党的埃加·莫兰在《自我检讨》^②一书中，对“昔日信心的源泉，今朝形同陌路和敌人的一种信念”提出疑问。他把斯大林式共产主义内部的信仰机制、心路历程和宗派行径暴露无遗。他创办了《论据》杂志，联合其他知识分子呼吁“知识解冻”，摒弃占统治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的陈词滥调和条条框框，进行一场考虑到现代世界复杂性的“理论重建”。该杂志发行量很小，于1962年停止出版。

在革命知识分子方面，1949年由科尔内留斯·卡斯托里亚迪创办的托派杂志《社会主义或野蛮》，有鉴于现代世界的演变，提出了关于革命的独到见解。该杂志于1967年中断发行，原因显而易见：“1959年以来，我们就已经看到……而其后的发展又证实了我们的判断：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名副其实的政治活动是注定要销声匿迹的。”^③工人阶级的变化和社会深刻的非政治化使革命方案难行其道。

是“人的死亡”吗？

在文学和哲学领域，关于人的总体观念受到冲击。没有个性的世界取代了人的主观意志和历史，每个人似乎都被稀里糊涂地卷入其中。他们还能找回自身固有的意义吗？还会有自己的语言和行为吗？还能在事件的进程和各种事务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吗？

在文学中，世界性事件中的激情战斗，安德烈·马尔罗^④作品中主人公的死

^① *Pour une démocratie avancée, pour une France socialiste!* Manifeste du comité central de Champigny, 5-6 décembre 1968.

^② Edgar MORIN, *Autocritique*, Seuil, Paris, 1958 puis 1970, 1975.

^③ Cornélius CASTORIADIS, « La suspension de la publication de *Socialisme ou Barbarie* », *L'Expérience du mouvement ouvrier* 2, *Prolétariat et organisation*, Union générale d'édition, Paris, 1973, p. 418.

^④ 安德烈·马尔罗(1901—1976)，法国作家，政治家，曾任戴高乐政府文化部长等职，作品有《人类的命运》、《希望》。——译者

亡悲剧,战后初期阿尔贝·加缪^①或保罗·萨特^②作品中所表现的道德与义务的两难抉择,都还有一定影响。到那时为止,构筑全部文学的主题是造反和义务,而现在,已经出现了新的景况。

欧仁·约内斯科和萨米埃尔·贝凯的戏剧表现了人的另类思想和命运。剧中人物似乎生活在一个没有意识、缺乏沟通的不确定世界里。在贝凯的作品中,人物在空空荡荡的地面上彷徨,不知自己是何人,在不息流逝的时光中消沉下去,说话没有用,休息不可能。他们的痛苦正是这个富足但缺乏生活激情的社会的写照:“这个平平常常、微不足道的低级悲剧……没有冲突,没有高潮,只有被时间、语言、社会和事件所吞噬的人。”^③

19世纪的传统小说赋予人物心理和故事情节以中心的地位,现在这也受到冲击了。“新小说”要摆脱任何对心理、道义和意识形态的关切。它局限于对事物和生灵的外在刻画而不想赋予它们什么意义。阿兰·罗贝-格里耶写道:“世界毫无意义,也不荒唐。这就是世界……只要不去理会那些关于万物有灵或善待世间万物的形容词,事物就明明白白地摆在我们面前。”

人们更多地用对世界漠不关心的眼光去扫描事物和人物,而不是去体验它们。世界变得奇奇怪怪,人被熔化到那些令人费解的低级动作和运动中:“生活的真谛、心理的冲突、‘真空’的语言、‘人的深沉’、意识的内在深度、对世界自然主义的生动描写,所有这些构筑浪漫小说的因素都已消失殆尽。”^④

在哲学和人文科学领域,战后以存在主义占上风为标志的时代已经结束。直至战后,哲学都是与文学和艺术相联系的,而现在已转为与科学相联系。结构主义不仅是作为一种严谨而有效的方法出现,而且成为挑战人类某种思想的一个思潮。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对原始社会的婚姻规则和家庭体系进行了研究^⑤,认为那些规范人际关系的法则是真正的基础设施,不自觉地隐蔽存在于各种社会制度下。而且人的精神本身也是受这些法则制约的。那些法则构成人类自然组合的秩序。斯特劳斯还说:“符号从来不提供内心的感觉,符号的意义就在于确定方位。那么,什么才是感觉呢?我认为那就是:当你有意识地品

① 阿尔贝·加缪(1913—1960),法国作家,作品有《局外人》、《鼠疫》。——译者

② 保罗·萨特(1905—1980),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作家,著有《有在和虚无》、《恶心》。——译者

③ Jean-Marie DOMENACH, *Le Retour du tragique*, Seuil, Paris, 1967, p. 271.

④ Jacques HOWLETTE, «Distance et personne dans quelques romans d'aujourd'hui», *Esprit*, juillet-août 1958.

⑤ Claude LÉVI-STRAUSS, *Les Structures élémentaires de la parenté*, PUF, Paris, 1949.

尝各种原料的配伍时,你发现了一种味道,但每个人都无法从中发现相似的味道。”^①从这种说法中可以看出,统辖各种关系的制度是第一重要的。

米歇尔·福柯也是在这个时期发现了一种“认识论”。他发现各种不同的认识都有其自然存在的历史结构。^②任何论述都只有在提示这一结构的情况下才会引起重视。他认为认识就是论述。这如同考古,通过考古般的研究找回认识赖以存在的“有序空间”。

人再也不能妄言自己是认识的主宰和发现者。人被看成“我们的认识画出的面孔之一”,并以这样的面目重新置身于18世纪末出现的认识论中。根据这种观点,人文科学的发展标志着一种决裂:它宣告了“人的死亡”——当然只是象征性的死亡——因为它把人看成认识的面孔。

心理分析家雅克·拉康和哲学家路易·阿尔蒂塞尔分别通过对弗洛伊德和马克思著作的重新诠释试图与意识形态的解读划清界限。拉康认为,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情欲和性欲后,潜意识也具备“语言的结构”。通过主体,“这玩意儿会说话”。“这玩意儿”的含义与人们想像的完全不是一码事。

对经济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也属于这样一门科学:它透过生产关系揭示了施动者和对象间的特殊结构,就像是一部“没有作者”的剧本。阿尔蒂塞尔试图从马克思著作中区分出科学的部分和意识形态的部分。这同样也属于“理论上反人文主义”的范畴。

结构主义的命题引发了诸多争论:在这些“结构”(它们存在于社会制度和人的精神底层)中,留给有思想、能行动的人的位置是什么?留给进步和创新的历史位置是什么?难道人只是某种逻辑中的一个不懂规则的小卒子吗?抑或只是认识的一个面孔?如果是这样,人怎么还敢妄言创造自己的历史呢?

结构主义似乎无视人的一切经验、行动和实践。它在理论上虽然勉强占了上风,但却牺牲了不愿与世同流合污的思想。

前景清晰乎?

法国的前途似乎已经勾勒清楚,其特点是战后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谁也无法想像经济的扩展何时结束。昔日人们看到的那些伟大历史事件似乎没有再发生的土壤。恰在1968年5月之前,戴高乐自己吐露:“如今再没有什么棘

① Claude LÉVI-STRAUSS,《Réponse à quelques questions》, *Esprit*, novembre 1963.

② Michel FOUCAULT, *Les Mots et les Choses*, Gallimard, Paris, 1966.

手的事要对付了,也再没有英雄业绩可创造了,我反倒觉得没劲。”^①记者维昂松-蓬特1968年3月在《世界报》头版写道:“当法国感到厌倦时……法国现时公共生活的特点是厌倦。”^②这个后来成为名言的关于厌倦的提法并未能使人忘记该文在末尾呼吁建设新的平衡:“因在六边形^③中的小小的法国,既无真正的不幸,也无真正的繁荣,与世界相安无事,对世界大事也没有多大的影响力。因此,热情、想像力与福利和经济扩展一样是必不可少的。”

1967年5月,根据对28万名15—24岁的男女青年的调查,发表了《青年白皮书》。它展现了1968年5月之前法国青年的感人形象:“法国青年希望早结婚,但注意在有能力体面地抚养孩子之前不要生儿育女。因而其头号目标是事业的成功。在此之前,他们在微薄的收入上节省。男青年攒钱买车,女青年攒嫁妆。他们对当今所有问题都感兴趣,但不要求过早投身政治:72%的年轻人认为选举年龄不应降到21岁以下。他们不相信近期会发生战争。认为前途取决于工业的效率、国内的安定和人民的团结。”^④这样一幅画像反映了占主流地位的中间派的现状,但没有捕捉到尚居少数的、与此相矛盾的一部分人的动向。这些动向实际上已经启动了破坏这种因循守旧现象的工作。

① Le 28 avril 1968 devant le commandant Flohic, cité par Jean LACOUTURE, *De Gaulle, tome 3. Le souverain 1959-1970*, Seuil, Paris, 1986, p. 665.

② Pierre VIANSSON-PONTÉ, « Quand la France s'ennuie », *Le Monde*, 15 mars 1968.

③ 六边形指法国(其地图呈六边形形状)。——译者

④ Cité dans Philippe LABRO et l'équipe d'Édition spéciale, *Ce n'est qu'un début*, Éditions et Publications premières, Paris, 1968, p. 4.

二、是宠儿造反还是“疯狂的生活追求”？

出生于1944年到1950年间的一代人未曾经历饥饿、贫困、战争、不幸和一无所有。他们生活在安定、繁荣的社会，“一个好过的社会”，长辈们这么说，似乎是要提醒这代人他们曾经的付出和对他们的亏欠。过去历史上的问题要比20世纪下半叶的问题严峻得多。在人民阵线、战争和抵抗运动以及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年代，人们要冒着生命的危险为争取自由和尊严的生活而战斗。此后还有什么事业可与之相提并论呢？

青少年时代是怀疑一切约定俗成模式的人生阶段。阿尔及利亚战争后的青少年亲历了许多理想与现实相脱节的时期：发财和消费压倒了义务和昔日的英勇战斗。经历过贫穷和苦难的父母对衣食无忧的生活感到心满意足。60年代中期的青少年却对现实怀有抵触情绪：昔日理想化的形象对他们已经失灵了。于是，回忆过去最终变成大声的呵责：难道年轻一代不应该对长辈心怀感激并顺着长辈开辟的道路行走吗？

读书年限的延长和升入大学延长了从离开家庭到稳定就业这个时段内的不稳定期。这个过渡期的延长改变了青少年，使他们获得一种新的生活：青年——至少是相当可观的一部分——开始要求实现自己的价值和有他们自己的行为方式。他们不愿消极等待劳动市场，越来越难以接受人们向他们提供的生活方式。

在大学里，“闹事者”开展斗争的风格起了变化：不再是传统的要求增加经费和设备，而是使用挑衅和嘲弄的手段对付学校当局，甚至像农泰尔大学那样，有时发展到封锁学校。这些“疯人派”在1968年5月前还是少数。他们要求

“无拘无束地生活、毫无禁忌地享受”，与成为博物馆文化的过去和幻想破灭的现在一刀两断。他们呼吁要从刻板烦人的课程中脱身，摆脱空虚和日复一日的老一套生活。社会上，生产—消费的循环消磨着人们的全部生活激情。虽然“疯人派”的愿望仅仅是要“换个活法”，但要从这个用语的全部含义上去理解，才能看到它在那个时代所包含的颠覆性：拒绝把生活的满足推迟到将来或挪到别处，要在此时此地立马过上幸福日子。

空前的代沟

一代时间里发生的变化是巨大的，而且不仅仅在法国是这样。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写道：“没有哪一代人经历和吸收过如此迅速的变化；没有哪一代人看到过能源、交通工具、人的定义、宇宙的可探范围、对已知和有限世界的把握、生存和死亡的基本需求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①人们之间的亲切感不复存在了。长辈们的过去和经验在现代世界里已经不具备指导性的参考价值、不再能照亮青年人的前程了，经验的链条断裂了。

在谈起自己的青年时代时，60年代的家长们总是搞错时代：“不久前长辈们还可以说：‘你们知道我也年轻过，但你们呢？你们却从来没有老过。’今天年轻人会这么回答：‘在我是青年的这个世界上，你们从来没有年轻过，也永远不会年轻。’”^②如果说以前不同代人之间的矛盾也一直存在的话，那么在60年代这种矛盾则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

有一个特别的变化很能说明了这个“代沟”。在以前，维系一个集体内部联系的牢固性要靠同舟共济、患难与共。为了维护共同的理想和信仰，会去学习祖先的英雄主义，牺牲个人。但在富足的社会里，这种直面死亡的气概在哪里？人们准备为之献身的理想是什么？当然，人们对战争和战争所造成的贫困和恐惧仍然记忆犹新。众多书籍都记载着纳粹的野蛮和被占领区的暗无天日。1955年，阿兰·雷奈的影片《夜与雾》重新点燃了激情。然而，他对青年一代讲的一番话却令人一头雾水：他既回顾了过去的牺牲，又号召尽情享受新的财富而不要瞻前顾后。对历史事件的回顾在因循守旧和心满意足的目光下显得不足轻重。虽然在回忆中也有昔日的牺牲和战争的画面，但这些只不过起到赞美

^① Margaret MEAD, *Le Fossé des générations. Les nouvelles relations entre les générations dans les années soixante-dix*, Denoël/Gonthier, Paris, 1971 et 1979, p. 91.

^② *Ibid.*, p. 78.

现实的陪衬作用。对于年轻人来说,认同这些东西是不可能的。

在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1962年)后的几年里,戴高乐主义的法国一直纪念在战场上、在游击丛林中和在盖世太保酷刑下牺牲的英雄。那时,无人没有听到安德烈·马尔罗于五月运动前4年,即1964年12月在先贤祠纪念让·穆兰时的颤抖的声音:“进来吧,让·穆兰,随着为你送行的长长的队伍!和那些与你一样在地窖中默默死去的人们一起;和那些只因为说了话而惨遭杀害的人们一起;和那些在集中营里伤痕累累、被剃光头的人们一起;和在《夜与雾》里那可怕队伍中踉踉跄跄、最终倒在枪托下的最后一个人一起;和未能走出牢笼的8000名法国妇女一起;和因给予一位同胞庇护而死在拉文斯布吕克的最后一名妇女一起。进来吧,和在黑暗中出生又消失在黑暗的秩序中的弟兄们一起。”^①

当一个国家有17年的时间都把目光转向曲线增长、事业成功、周末度假和赌马的情况下,怎么还可能认可这张受苦受难的“法国面孔”呢?反差是巨大的,甚至是不可思议的。把自由与死亡、牺牲紧密相连的理想已经可怕地破灭了。“17岁的人是不会认真的”^②,尤其是生活在福利和富足社会里的人。

遗产变得难以接受,要向什么样的形象看齐呢?抵抗运动中那些忍受酷刑的英雄是无法为新一代人接受的;但那些饱食终日、无忧无虑的“中产阶级”也同样被人不齿。为祖国英勇献身的召唤对新一代人还有什么意义?这毕竟是另一时代的事了。生产和消费的发展、富足而不是进取的景象是不会激起热情的。

追求理想、渴望冒险的青年不免会有这样的疑问:官方史书记载的英勇奋斗的人民和如今不断发财致富、热衷赌马的人民是属于同一民族吗?青年会如何看待这段历史?他们只能认为是长辈们放弃或削弱了他们曾经为之奋斗的理想。戴高乐不也说过“法国人是懒虫”吗?

1958年上台执政的戴高乐派已远离了自由法兰西时代的英雄史诗。戴高乐将军1942年曾说过:“那些惊叹在我们当中没有发现迂腐的政客、打盹的科学院院士、奸诈的商人和被军衔压垮的将军的人,使人想起欧洲小朝廷里的那些弱智者。这些人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因为未能看到杜尔哥、内克和洛梅尼·德·

^① André MALRAUX,《Transfert des cendres de Jean Moulin au Panthéon. Discours prononcé à Paris le 19 décembre 1964》,《La Politique et la Culture》,Gallimard,Paris,1996,p.304.

^② Arthur RIMBAUD,《Romar》,《Œuvres poétiques》,Garnier-Flammarion,Paris,1964,p.50.

布里耶纳^①进入公安委员会而垂头丧气。有什么办法呢？革命中的法国总是宁愿同奥什元帅^②一起打胜仗而不愿与苏比斯元帅^③一起打败仗。为了颁布并确立《人权宣言》，革命中的法国总是宁愿听丹东^④的话，而不愿在嗡嗡的陈词滥调声中沉睡。”^⑤那么，60年代末的情况又怎样呢？重提抵抗运动成为对社会灵魂的一种补充，因为这个社会所关心的完全是相反的事。这样做也可以冲淡历史上一些不太光彩的插曲并使暴发户和新贵们的可疑行径罩上荣耀的光环。共和国的官方文化也总是标榜对传统感到自豪，但却竭力掩盖历史中的丑恶部分：对巴黎公社和殖民地人民的屠杀，1914—1918年的大屠杀，反犹太主义和充当投敌者，阿尔及利亚战争中的屠杀和酷刑^⑥。实际上社会已不愿再给自己提出太多麻烦的问题。整个社会被生产和消费的持续发展所吞没。由一个身居国家最高位的年迈将军把纪念抵抗运动制度化并没完没了地进行，这在青年人眼里无异于宣传对军队的迷信，是令人厌烦的纪念亡灵的官样文章。伟大、悲壮、惊险和史诗般的战斗历史散发出的芳香早已闻不到了。戴高乐的法国对抵抗运动进行死板的顶礼膜拜可权且作为法国理想的一服补药。蓬皮杜总理曾经以很厚道的姿态向法国人提出一个理想：“让我们富起来吧！”晚期的戴高乐主义开始向路易·菲力普王朝看齐了。法国在各个领域（劳动、生活、文化……）都发生快速变化的同时，却仍沿袭19世纪的伦理道德和家长式统治。政权查禁一切有伤风化的东西，培植道义秩序。有几个意味深长的花絮：狂热的天主教徒戴高乐夫人不能忍受与离婚的人同桌同餐；电视台解雇了一名曾露出一个膝盖的女播音员……法国保留着外省资产阶级的风度，同时又在彻底实现现代化。像雷欧·费雷、雅克·布雷尔或乔治·布拉森斯这些歌唱家，他们谴责“塑料文明”，也谴责对乡下保守派和“资产阶级”说三道四。戴高乐1965年接受米歇尔·德鲁瓦电视采访时所说的话极好地说明了法国“某种想法”的

① 杜尔哥(1727—1781)，法国经济学家，曾任路易十六的财政总监。内克(1732—1804)，银行家，曾于1771年和1788年两度任大臣，主张改革。布里耶纳(1927—1794)，法国红衣主教，路易十六的财政大臣。——译者

② 奥什元帅(1768—1797)，法国大革命时期著名将领。——译者

③ 苏比斯元帅(1715—1787)，被认为无能的将军。——译者

④ 丹东(1759—1794)，著名政治家、演说家，主张暴力革命，后被处决。——译者

⑤ Discours prononcé par le é par le général De Gaulle devant le *National Defense Public Interest Committee* à Londres, le 1^{er} avril 1942, in Charles DE GAULLE, *Mémoires de guerre, L'appel 1940-1942*, Plon, Paris, 1954, p. 533.

⑥ Benjamin STORA, *La Gangrène et l'Oubli. La mémoire de la guerre d'Algérie*, La Découverte, Paris, 1991.

转变。戴高乐在讲话中试图对秩序的“某种想法”与现代化之间进行调和。但调和和工作变得很困难：“对法国而言，家里出现了一些问题。女主人，即家庭主妇希望有个吸尘器，想要个电冰箱，要买部洗衣机，如果可能的话，还要一部小轿车。这，就是运动。但同时，她不愿意丈夫到处寻欢作乐，不愿意男孩子把脚搁在桌面上，不愿意女孩子彻夜不回家。这，就是秩序。家庭主妇希望进步，但不希望混乱。那么，法国也是如此，要进步，不要混乱。”^①

这样一个谈话怎么能被青年人接受？他们要的正是类似家庭主妇不要的这个“混乱”。

死胡同

在无奈的和无惊喜的未来的夹缝中，现在之门开向了空虚和厌倦。如果说厌倦指示的是“社会的阴晴”^②，那么空虚似乎越来越空，青年的生存疑问也因此使其备受折磨。生活中已找不到可寄托情感的理想。激情无处发泄，便疯狂地反抗令人窒息和绝望的现在。

早在1963年，社会学家埃加·莫兰就充当了先锋的角色，因为他指出一个新的社会现象，即青少年构成一个年龄阶级。在所谓青年万能的背后，他发现了其他特征：“特别强烈的老化忧虑”和要“从严厉的一本正经、从人与社会的冲突、从人与人之间发生的悲剧那里抢回时间的愿望”^③。这些年轻人不正是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一个关乎全社会的问题吗？那就是“在舒适中的灵魂不适，在富有中的情感贫乏，在理性化名义之下的根本不合理”^④。

青年可以找回罗曼蒂克的音符而不会陷入伤感和忧郁。存在和生活的感觉要寻找一个支撑点，但不会因此就接受任何埋没个性的事业。“生活的不足”并不是厌倦和懈怠，而在于精力过剩又缺少往昔那种集体的理想，从而形成情感的真空^⑤。

激情演变成疯狂的生活，并在摇滚、起哄和斗殴中得到发泄。埃加·莫兰

① Charles DE GAULLE interviewé par Michel Droit à la télévision le 15 décembre 1965, in *Le Petit Livre rouge du général*, Éditions de la Pensée moderne, Paris, 1968, p. 103.

② Véronique NAHOUM-GRAPPE, *L'Emui ordinaire*, Austral, Paris, 1995, p. 53.

③ Edgar MORIN, *Le Monde*, 7-8 juillet 1963.

④ *Ibid.*

⑤ 从这个意义上讲，60年代的厌倦不同于80年代“真空纪”中社会激情的衰退。

从耶耶(yé-yé)现象中看出一种“冲动、恐慌的发酵剂”和一种“爆炸性的力量”^①。1963年6月达尼埃尔·菲利普基在民族广场举行的摇滚音乐会吸引了15万年轻人。不同代人之间的碰撞开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不，一群人数量众多、营养充足、不懂历史、大腹便便、讲求实话、不问政治、没有悲剧的20岁以下的法国人起来啦。”^②

爱的冲动也能满足排解厌倦、强化生活的需求，因为要满足爱的冲动，就要冲破那个时代的礼仪、忌讳和禁令^③。青年大学生逃避英格玛尔·伯格曼影片中虚玄而别扭的发问。他们从让-吕克·戈达尔的影片《精疲力尽》(1960)和《疯子皮埃罗》中发现了自由和嬉戏的调门，使他们的精神从严肃古板中解放了出来。然而，奔向海边晒太阳，有了像玛丽亚娜(阿娜·卡列娜饰)和德·费迪南(贝尔蒙多饰)那样的爱情就能够弥补平淡无奇的社会生活的不足了吗？

爱的冲动像昙花一现，顷刻即逝。幸福是短暂的。令人厌倦和无聊的社会生活真空才是图画背景。在紧张和激情消失之后，厌倦永久存在：“我能做什么？我不知道怎么办！”^④《疯子皮埃罗》的悲剧性结局把逃避无聊社会生活的爱情冲动唯美，因此完全进入死胡同。戈达尔的电影把爱情理想化了。然而，美妙的音乐和画面能够长期代替紧张的生活和极具叛逆性的这一代人所渴望的东西吗？该片被以“政治和思想上的无政府主义”为由，禁止18岁以下的人观看，但却成了整整一代人的偶像片。

在这种气候下，乌托邦和梦想成为一种解脱的办法就不难理解了。生活的激情可以在追求虚无缥缈的境界中得到宣泄。厌倦情绪就像一个形容消瘦、饥肠辘辘的人在呼唤生活、呼唤陶醉，呼唤世界重新振作起来。

境遇主义者^⑤也许是最纯表达青年人对生活的反抗的。《青年一代实用生活知识汇编》一书写道：“从青少年时代到退休年龄，以24小时为一周期，裂痕如同被砸破的玻璃门窗，一道接一道地出现：固定节奏的裂痕，‘时间就是金钱’的裂痕，屈从于头头的裂痕，厌倦的裂痕，疲劳的裂痕。从生龙活虎的青年到被折磨成目光呆滞的老头儿，生命在强迫劳动的打击下处处爆裂。从未有过一种文明如此蔑视生命，从未有过一代人陷入如此厌倦的情绪中而又如此强烈地追

① Edgar MORIN,《On ne connaît pas la chanson》, *Communications*, n°6, 1965.

② François NOURISSIER,《Née en 1944, le temps des “Zidoles”》, *Nouvelles littéraires*, 22 juin 1963.

③ Véronique NAHOUM-GRAPPE, *L'Ennui ordinaire*, *op. cit.*, p. 201.

④ 阿娜·卡列娜在《疯子皮埃罗》中的一句台词。

⑤ 境遇主义, 60年代出现在法国学生中间以反对社会现存结构为目的的运动。——译者

求疯狂的生活。”^①

疯人派

那些不久被称为“疯人派”的人构成一个奇特的混合体，其中有属于或不属于小集团的政治化了的大学生，也有未参加任何组织的、不能忍受沉闷、烦人的“无聊大学”的学生。疯人派不关心自己的职业前途。他们批判大学和社会，但又不愿离开学生集体，他们在那里感到很自在。他们只是少数，但以他们的方式进行宣传鼓动，并愿意以身作则。他们拒绝“被动的生活”，不愿活在弥漫着烦恼的疯癫世界里。在疯人派中，境遇主义者只是一小撮，但却是一些自视很高、随意抨击他人的人。不过他们的想法也的确表达了一种难以名状的叛逆精神，而且很快便成为众多大学生的灵感源泉。

刚刚被发现的“境遇主义国际”创立于1957年，是由一些试图在文艺和建筑领域冲击传统美学观点的艺术团体倡导成立的。它们是：文学人国际、争取想像的包豪斯(Bauhaus)、运动和伦敦的心理地理委员会。境遇主义国际要从艺术批评过渡到对生活进行批评，用打造生活取代“被动生活”，用游戏代替怀疑，并“创造令人称心如意的局面”。^②

境遇主义国际是少数精英们的封闭性组织，只接纳极少数内行人。它办有一份杂志，即由居伊·德勃尔领导的《境遇主义国际》。其思想的激进也表现在内部关系上，在那里可以随随便便开除人和骂人。组织的人数(考虑到有被开除的和新入会的)不会同时超过30名。在五月运动初期只有4名境遇主义者在巴黎^③。

境遇主义国际于1966年11月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引起学生们的议论。同情境遇主义思想的一些学生趁全国学联调整办公室的机会，抢占了当时处于持不同政见运动风口浪尖上的全国学联的用品和楼房，用来印刷境遇主义成员米斯塔发·卡加蒂的小册子《从经济、政治、心理、性，特别是知识的层面，论大学

^① Raoul VANEIGEM, *Traité de savoir-vivre à l'usage des jeunes générations*, Gallimard, Paris, 1967, p. 51.

^② Réponses données à un questionnaire publiées dans *Internationale situationniste*, août 1964, cité dans Éliane BRAU, *Le Situationnisme ou la nouvelle Internationale*, Nouvelles Éditions Debrasse, Paris, 1968, p. 12.

^③ Jean-François MARTOS, *Histoire de L'Internationale situationniste*, Éditions Gérard Lebovici, Paris, 1989, p. 245.

生的贫困兼论解决办法》^①，翌年又有两部著作使境遇主义名声大振：居伊·德博尔的《戏剧社会》^②和拉乌尔·瓦内吉姆的《青年一代实用生活知识汇编》^③。

这些煽风点火的文章与全国学联和新列宁主义派的古板语言毫无共通之处。这些文章强调指出大学生在日常生活各个领域的贫困和世界青年开展斗争的重要性：“令人吃惊的并非青年的叛逆，而是大人们如此听天由命。”^④他们呼吁“毫无拘束地生活、毫无节制地享受”，以此与掩盖日常烦恼的“商业戏剧社会”相对抗。改变生活、改造世界迫在眉睫：“为自己的现代化沾沾自喜的主流社会现在应该遇上它的对手了，那就是它自己造成的现代化的反面。”^⑤

居伊·德博尔在《戏剧社会》一书中提出一系列经过了精心推敲的论点，充斥着类似费尔巴哈、黑格尔和马克思式的提法。从这各家学说的大杂烩中可以看到一个主导思想：“凡直接经历过的，都已在演出中远去。”^⑥商品的胜利同时也是表演的胜利。戏剧渗透到所有层面，对生存条件进行着专制式的管理。在这全面奴化的背景下，前景自然不可能清晰明了：“从逆真理的物质基础中解放出来，这就是我们时代自我解放的真谛。”^⑦

拉乌尔·瓦内吉姆的《青年一代实用生活知识汇编》则完全是另一种风格。虽然在构思上也有一些混乱之处，但却强有力地表达了“疯狂地生活”的愿望，在造反派青年中得到响应。在这个被商品和戏剧统治的社会中，创造精神和梦想失去了自己的空间：“劳动为了活命，活命就要消费，活命为了消费。恶性循环就这样完成了。”^⑧人感到窒息，如同在地窖里活着并死去，失去了走出去的念头。他们不再饿死，但却烦死。在平安的社会里，生活与活命和慢性死亡混为一谈。“不再有格尔尼卡^⑨，不再有奥斯维辛，不再有广岛，不再有塞提夫^⑩。好

① *De la misère en milieu étudiant, considérée sous ses aspects économiques, politiques, psychologiques, sexuels et notamment intellectuels et de quelques moyens pour y remédier*, AFGES, Strasbourg, 1966.

② Guy DEBORD, *La Société du spectacle*, Buchet-Chastel, Paris, 1967 (nouvelle édition: Gallimard, Paris, 1965).

③ Raoul VANEIGEM, *Traité de savoir-vivre à l'usage des jeunes générations, op. cit.*

④ *De la misère en milieu étudiant, op. cit.*, p. 16.

⑤ 《Adresse aux révolutionnaires》, *Internationale situationniste*, n°10, cité dans *De la misère en milieu étudiant, op. cit.*, p. 27.

⑥ Guy DEBORD, *La Société du spectacle, op. cit.*, p. 9.

⑦ *Ibid.*, p. 176.

⑧ Raoul VANEIGEM, *Traité de savoir-vivre à l'usage des jeunes générations, op. cit.*, p. 69.

⑨ 格尔尼卡，西班牙小镇，1937年被法西斯空军夷为平地，无辜平民被任意屠杀。——译者

⑩ 塞提夫，阿尔及利亚北部城市，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居民遭屠杀。——译者

极啦！然而，无奈的生活呢？令人窒息的平庸呢？激情的欠缺呢？还有那种老是觉得自己不是自己的感觉呢？”^①

对人文主义的批判也同样彻底：人文主义高瞻远瞩地把压迫内在化，它是“诚实人的虐待狂”^②，它举办一种公众慈善事业，使每个人对自己的残疾安于天命，对别人的残疾作壁上观。

知识分子，包括那些自封的批评家同样对改造世界和改变生活显得无能为力。他们的作品连篇累牍地复制着戏剧性的商品社会。他们压制一切行动和创新的潜能，如同罗萨诺夫新写的那样：“人被压在衣橱底下……哪怕只压一个人也是可怕的。他要呼吸，又不能呼吸。衣橱压了所有人，而每个人都受着一份别人体会不到的痛苦。于是所有人力争举起衣橱，但每个人的信心不同，也不是同样用力。多么奇怪的呻吟文明啊！

“思想家们发出疑问：‘有人被压在衣橱下？他们怎么躺到底下去的呢？’可他们就是躺在底下了。如果某个人客观地指出这个生物是挪不开的，那么他用的每个词、说的每句话都会增加衣橱的重量……此时基督精神就来了。它应约而来，像一只可爱的小狗那样抚慰他的痛苦，并到处散发那些被压在底下的人面带笑容的照片。‘书橱的道理总是最好的道理’，这就是每日出版的供人摆在书橱里的成千上万册书籍的暗示。然而，大家都想呼吸，可谁也无法呼吸，于是许多人便说：‘我们晚些时候再呼吸吧’，于是大多数人不死，因为他们已经死了。

“要么现在死，要么永远不死。”^③

① *La Société du spectacle*, p. 30.

② *Ibid.*, p. 109.

③ *Ibid.*, p. 45.

三、大学出了问题

大学是最能反映法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变化和社会上无聊气氛的地方，青年人对这种气氛格外敏感。

在60年代，中学会考和上大学成为越来越多社会阶层向往的目标。战后法国青年人口迅速增加：10年内大学生人数增加1倍多，从1958年的20万增加到1968年的50万。

青少年期的延长推迟了择业的时间，也延长了特别能助长梦想和发挥想像力的生活经历。上大学会得到社会的赞扬，可以过不大规矩但可被容忍的生活。那时大学生的生活仍带有放荡不羁和漫不经心的一面。这种经历广为扩散，并强化了他们成为社会和文化发展先锋的感觉。

60年代下半期上大学的年轻人既没有他们长辈的那种经历，也没有他们那样的政治教养。大学生固有的好斗性并未能像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那样使他们振奋起来。这代青年对政治漠不关心，没有朝着负责任的方向实现自己的价值。这就是1968年5月之前还在睡梦中的大学生的实际状态。虽然也有少数革命派，但他们不能代表全体大学生。

大学的改革

对大学存在的问题，许多文章和研讨会都强调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1964年，《精神》杂志出了一期大学问题特刊——《办大学》。它精确地描绘了一幅困难重重的大学图景并提出一些可供选择的改革方案。哲学家保罗·里克

尔在特刊上写道：“如果国家不采取适当办法解决大学的发展问题，那将会招来酿成全国性灾难的学校大爆炸。”^①

1966年11月在冈城举办的研讨会和1967年3月在亚眠举行的另一个研讨会都不仅强调扩大招生和增加拨款的必要性，而且强调革新大学结构、动作方式和教学方法的紧迫性。但大学仍然固守第三共和时代确立的模式：以培养民族精英为己任；在科研和教学方面，要传授人文主义文化和科学知识。那里古典的“人文科学”享有崇高声望，在第三共和国的领导精英中就有许多人是拉丁文和希腊文硕士。

改革这种模式的企图被僵化的、不接受任何改变的大学运转方式所粉碎。大学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世界。但这个世界却被社会的变迁和大批战后一代学生的到来所撼动。从大学生的出身、前期教育、兴趣点和行为方式来看，他们构成一个越来越混杂的群体。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也变得形同陌路。有一位教师说：“授课的时候，我试着观察一下人头，不幸的是，你猜我看到了什么？有1500个人在一个阶梯教室里……一些人进来，一些人出去，一些人在约会，一些人在看报纸。”^②

这个大众化的场面恰巧又碰上就业出路的危机，尤其是学生人数最多的文学院。然而，国家计划总署的报告却强调各个部门普遍缺技术人才和高级管理人才，而大学要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有相当大的困难。

在大学和企业之间建立一种过渡的想法也遭到强烈抵制。先前精英分子所受的那种人文主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新需求之间存在突出的矛盾，尤其是在文学院里。1963年，发给6500名文学硕士生一份传单，建议他们专攻实用人类学并到企业去实习，就业方向是管理岗位。结果只有52人响应，43名候选人被录取^③。

大学教学的另一特点是“文化的正统性”和师生关系的明显僵化。教师在威严的课堂上唱独角戏仍然是教学的主流方式。

年复一年，不管情愿不情愿，大学继续向社会输送相当数量的毕业生，但没有给主要当事人多少发言权。农泰尔学院一位教师写道：“法国大学已经变成一个我行我素的体系，既不考虑体系中相关的人、大学生和用户，也不从心理、

① Paul RICŒUR,《Faire l'université》, *Esprit*, mai-juin 1964.

② Cité par Philippe LABRO et l'équipe d'Édition spéciale, *Ce n'est qu'un début*, op. cit., p. 245-246.

③ Alain SCHNAPP, Pierre VIDAL-NAQUET, *Journal de la commune étudiante. Textes et documents*, novembre 1967-juin 1968, Seuil, Paris, 1968, nouvelle édition, 1988, p. 31.

社会、人口和文化背景等方面去探讨他们为何进入这个体系,是什么决定他们的需求,是什么造成他们的困难,等等。这样,1968年的法国大学变成一种类似结构主义激进派所主张的东西:自己满意就行,作用和目的没有任何意义。”^①

墨守成规和因循守旧既关系到教师也关系到学生:“作为制度的产物,学生和教师都有自己的逻辑:学生对如何出成绩、如何传授知识没有任何贡献;老师从不(或很少)问学生需要什么,而当他试着征求意见时,往往会遭遇学生的消极反应和诧异表情。抱着无所谓的心态来求学的大学生正等着老师为他们指出需要什么并亲自满足他们的需求呢。而这些需求又是老师为了满足学生的需求而人为造出来的。”^②那些符合主流标准的大学生一声不吭地复制着样板;这些最优秀的“继承人”还没有造反;总会在考试中胜出的优胜者“在他们的远景规划中罗列一大堆优点,如同悼词中的赞美词”^③。

农泰尔的大学生是在五月运动爆发前不久就开始抨击主流教学方式的首批学生之一。这种传授方式要求被动地“接受知识”,从而损害了理解力和批判精神,使大学变成“知识的自动发送机”和“毕业文凭制造厂”——“我们是来学院里寻求精神解放之路的,可学院给我们提供了什么?原始的家长式教育只有利于饲养‘填鸭’(勒普兰斯·兰盖教授语),却使我们得了知识不育症……这种教学始而使人厌倦,继而令人反感。因为这种教学机械、僵化、死板、平淡无奇、令人觉得乏味。不感到乏味并保持消极思想的学生就只能成为记录教师乏味枯燥话语的抄写员。这些誊本弥足珍贵,因为他们要按教师的要求把它一个标点不差地搬到试卷上去。”^④

“农泰尔疯了”

农泰尔学院再好不过地反映了大学的混乱、骚动和不安定。农泰尔学院是为了减轻索邦大学^⑤学生过多的压力而于1964年创立的。该学院摆脱了传统的大学形象。学院领导人和教师的改革思想遇到阻力,他们感到很难办。正如学院教授、社会学家阿兰·图雷纳所说的,学院的“自由思想可以削弱旧体制,

① EPISTÉMON, *Ces idées qui ébranlèrent la France*. Nanterre, novembre 1967-juin 1968, Fayard, Paris, 1968, p. 28 et 29.

② Pierre BOURDIEU et Jean-Claude PASSERON, *Les Héritiers*, Minuit, Paris, 1964, p. 64.

③ *Ibid.*, p. 65.

④ Cité par Alain SCHNAPP, VIDAL-NAQUET, *Journal de la Commune étudiante*, op. cit., p. 125.

⑤ 索邦大学:巴黎大学的前身为索邦神学院,索邦大学即巴黎大学。——译者

但不足以改变它”^①。

农泰尔学院有铁路相通(Folie-Nanterre 站),集合了数量可观的大学生。在不大的区域内有各系的教学大楼、行政楼和宿舍楼。这些楼房设计现代化,耸立在一个空旷地带的中心,四周是外国移民劳工的铁皮屋区。相对于拉丁区^②而言,学院的地理位置比较偏僻,教学楼和宿舍楼集中在一处,周边环境又比较特殊。这些使这所大学成为学生的聚集点,是极有利于开展斗争的场所。

学院希望实行人性化的管理,并在许多方面进行了改革。院长皮埃尔·格拉潘是个自由派和改革者。教师们希望同学生建立个人关系并开展对话,这与那些超负荷的学院里师生之间形同陌路的情况成了鲜明对照。1964—1965 年底,学院成立了几个学生和教师混合委员会,讨论教学的组织安排。但在 3 年时间内,他们很快就面临大批学生涌入的问题,1967—1968 学年开学时,学生人数超过了 11000 人。

人文科学教师的形象不同于古典学者:“我们没有受过 15 年的学院磨炼,”阿兰·图雷纳说,“我们与学院的关系很疏远,因为我们的主要活动和心思在别处。”确切地说,他们并非革命派,但他们也以各自的方式表达批判现代社会的观点。

农泰尔学院的社会学教学一开始便带有亨利·勒菲弗的个人特色。他原是斯特拉斯堡的教师,深受境遇主义的影响。这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认为,“新资本主义”将对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进行合理性的利用。不再有任何东西能够摆脱消费的逻辑,这种消费对“所有著作、风格、艺术和文化带来毁灭性的破坏”^③。“有领导地消费的官僚主义社会”^④操纵着物质和消费者,把一切都变成商品。伴随着物质的消费,出现了符号的世界和想像力的表演:“今天最巧妙的广告词包含着一种世界观。”^⑤当人们还以为自己是自由人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受到外在东西的制约,甚至被它们塑造(压力、条条框框、职务、模式、意识形态等等)”^⑥。

过去还算是自主空间的日常生活,现在需要按照这种逻辑来营造和规划。

① 《Alain Touraine parle》,in Philippe LABRO et l'équipe d'Édition spéciale. *Ce n'est qu'un début*, op. cit., p. 39.

② 拉丁区:巴黎塞纳河左岸街区,多高校。——译者

③ Henri LEFEBVRE, *La Vie quotidienne dans le monde moderne*, Gallimard, Paris, 1968, p. 157.

④ *Ibid.*, p. 117.

⑤ *Ibid.*, p. 203.

⑥ *Ibid.*, p. 128.

于是,日常生活成了至关重要的斗争症结,否定社会就是从日常生活开始的。因此,社会的革命性变革不仅涉及政治、经济和法律领域,而且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革命必须改革日常生活,使个人得以找回自己的人格和创造力。亨利·勒菲弗认为,这个革命将是文化性的和不间断的,它涉及所有领域:性生活、城市建设、节日等等。即将开始的革命不是禁欲主义的,而是要“改变生活”。这种独树一帜的见解在最具叛逆性的大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

在农泰尔,社会学和心理学助教们引进了与主流教学模式一刀两断的教学方法:“与学生一起自由讨论,发挥团组的活力……”^①在哲学方面,保罗·里克尔和米歇尔·迪弗雷纳的授课与在别处占主导地位的结构主义潮流背道而驰。所有这些农泰尔特有的因素使之成为特殊的场所。

今非昔比的大学生斗争

1967年,大学里的政治形势和工会情况与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已大不相同。两个主要的组织——共产主义大学生联盟(UEC,以下简称共大学联——译者)和法国大学生全国联合会(UNEF,以下简称全国学联——译者)——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危机。1966年成立了由阿兰·克里维纳领导的托派倾向的“共产主义革命青年联盟”(JCR,以下简称革共青联——译者)。而毛派大学生于同年底创立了“马列主义共产青年联盟”(UJCML,以下简称马列共青联——译者)。

全国学联在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有过光荣的岁月,而后其成员人数明显下滑。1960年,它自称有10万成员,即占全国学生人数的一半;1967年人数下降到3万;1968年只有大学生人数的十分之一^②。

全国学联成了不同派别在政治上争吵不休的封闭式战场,各派都在争夺全国和地方总分会的领导权。到五月运动前夕,其处境已呈灾难性:两年多来,它在绝望的财政形势中、在政治上几乎完全孤立的情况下、在内部无可救药的四分五裂中苦苦挣扎^③。领导人接二连三地辞职。同样分裂成几派的统一社会党^④的学生继续留在学联内坚持斗争。他们要对付托派学生,勉强保住了领导

① EPISTÈMON, *ces idées qui ont ébranlé la France*, op. cit., p. 24 et suivantes.

② Alain MONCHABLON, «L'UNEF avant mai, en attendant le miracle...», *Mai 68, les mouvements étudiants en France et dans le monde*, BDIC, Nanterre, 1988, p. 87.

③ *Ibid.*

④ 统一社会党创建于1960年,该党在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权。1968年,在新一届代表大会举行前夕,统一社会党党员雅克·索瓦若出任临时领导。

最正统的托派组织革命大学生联合会(FER,以下简称革大联——译者)采取鼯鼠策略夺取了全国学联领导权并按工运中心主义的模式予以重建。由夏尔·贝格领导的革大联创建于1968年4月,从属于国际共产主义组织(OICI)^①。它抨击所有竞争对手,颇有斯巴达克风范。它举行的示威游行组织性极强。这些使它具有帮会性质。1968年初,它给自己规定的目标是:6月份在互助宫大厅召开有3500名青年参加的大会,抗议克里斯蒂安·富歇部长的国民教育改革计划和政府的第五计划。

革共青联^②则以另一种面目出现。它对托洛茨基的信奉带有格瓦拉主义色彩并与“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合会”(SDS, Sozialistischer Deutscher Studentenbund)有联系。这个由鲁迪·杜茨克领导的组织与社会民主党断绝了关系,于1968年2月17—18日在柏林组织了“声援越南革命国际日”,聚集了2万名示威者。革共青联的成员参加了这次示威并直接学到德意志运动的煽动和动员手法。在革共青联内也会看到威廉·莱茨^③的文章。他认为争取社会主义的战斗与反道德秩序和资产阶级专制家庭和性解放是分不开的(见第18章)。这些都在传统左派组织主张的范围内。革共青联试图在反资本主义的旗帜下领导青年斗争并通过“中学生行动委员会”在中学里站住脚跟。

马列共青联的毛主义者在大学里的人数并不多。该组织的主要领导人(最著名的是罗贝尔·兰哈尔)来自位于乌尔姆大街的高等师范学校。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蒂塞尔在那里教授哲学。这些活动分子要直接同工人阶级相结合并到工厂里安营扎寨,试图建立一个“阶级斗争总工会”。

据统计,1968年5月前夕的革命派别人数大约在5000和16000人之间浮动^④。在农泰尔,各类小组织共拥有130—140个骨干分子,即占注册大学生的

① 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即托派运动的所谓“朗贝尔派”,由皮埃尔·朗贝尔创立于50年代初。

② “共产主义革命青年联盟”(革共青联),由被共产主义大学生联盟开除的国际主义共产党(1944年成立的托派组织)的成员和同情者于1966年建立的托派组织。

③ 威海姆·莱茨(1897—1957),奥地利医生和精神分析家,曾是德国共产党党员,他试图把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

④ Philippe LABRO et l'équipe d'Édition spéciale, *op. cit.*, p. 15.

百分之一多一些^①。对他们的争吵和宣传感兴趣的大学生只是极少数。

在年轻的革命派看来,这个时期特别有利于开展“反帝动员”。1967年夏在玻利维亚对雷吉斯·德勃雷进行了审判。雷吉斯·德勃雷是参加切·格瓦拉的游击队后被捕的,格本人也随后于10月份被捕并遭杀害^②。在中东,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组织起来展开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无情斗争。在越南,抵抗“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如火如荼。1968年1月,越南民族解放阵线^③在南方发动了大规模的春季攻势。1968年2月28日,革共青联组织了一次不同于传统游行的示威活动:越南民族解放阵线的旗帜在索邦大学上空升起,游行队伍走遍整个拉丁区并与极右派学生发生冲突。毛主义者则捣毁一个极右派于1968年4月举办的支持南越的展览会。

然而,这些反越战的示威活动仍未能起到充分动员学生群众的作用,也未能达到1960—1962年反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动员规模,因为阿战是与法国直接相关的。“反法西斯动员”也不再有那么大的影响,而与极右派斗殴主要是活动分子的事,广大新生对此并不感兴趣。

刻板的战斗语言似乎也越来越脱离学生的日常生活:“学生‘群众’每天都在观察各个不同极左派别如何兜售它们的货色。但这些政治组织——它们的活动分子在校园里形成一个孤立的世界——却是农泰尔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所有人都感受到他们的孤立无助和对开创超越‘革命小圈子’的政治潮流无能为力。”^④

一股新生力量

大批新入学的学生没有长辈们那样的斗争经历,也很难与任何工会和政治组织打成一片。年轻的大学生来自中学毕业班,他们在那里接受的是儿童式的管理和“人性化”的教学,现在却猛然陷进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年轻人处在大

① Jean-Pierre DUTEUIL,《Les groupes politiques d'extrême gauche à Nanterre》,in Geneviève DREYFUS-ARMAND et Laurent GERVEREAU(sous la dir. de),*Mai 68, les mouvements étudiants en France et dans le monde*,BDIC,Nanterre,1998,p. 110.

② Cf. Ernesto Che GUEVARA,*Journal de Bolivie*,François Maspero,Paris,1968(nouvel édition: La Découverte,Paris,1996).

③ Front national de libération,organisation de lutte dirigée par les communistes vietnamiens.

④ Daniel COHN-BENDIT,*Le Gauchisme, remède à maladie sénile du communisme*,Seuil,Paris,1968,p. 31.

学生群体的中心,而大学无个性的教学要求他们有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和很强的主动性。

从共大联或统一社会党(它是全国学联的主力)和极左小团体出来的政治化了的一代大学生与广大新生之间有着很深的鸿沟。前者已是搞斗争的“识途老马”,而后者却毫无经验,而且也不大在乎。实际上在大学里是两代人共处着。5—6岁的年龄差异已意味着生活经验和文化的巨大落差^①。

事实上情况已经开始起变化。鲍里斯·维昂^②的小说,尤内斯库^③的戏剧等等与萨特的《自由之路》和马尔罗的《人类的命运》同样被看重。博布·迪兰的流行音乐与科莱特·马尼或莱奥·费雷的异端歌曲在左岸^④平分秋色。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文化影响着整整一代活动分子,而来自另一些阶层的青年人却发现,在大学这个奇特的世界里,这两种文化的融合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实际上还是五月运动把二者结合了起来,使老道的革命活动分子恢复了青春。

丹尼尔·科恩-本迪特却是一个例外:他没有阿尔及利亚战争那一代人的经历,也不是在新列宁主义的路子上受教育。他恰恰反映了在青年中滋生的那些新憧憬,并且超脱了传统的小派别,赋予这些憧憬以批判的内涵。

立即行动

疯人派从与大学生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着手采取行动。他们的政治观点是一盘奇特怪异的大杂烩:一方面走过场似地提一提资本主义、工人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另一方面对教学、大学生的知识、心理和性的“贫困”展开批判。

1967年3月在农泰尔发生了几起事件:一群大学生占领大学生宿舍区里的女生楼,以抗议禁止男生进入女生楼群的内部规定。他们在校园里要求政治自由,在大学城要求性自由。革命行动和性行为从此相安无事。

1968年1月,在大学综合楼的游泳池落成仪式上,后来成为五月运动头面人物的科恩-本迪特质问青年与体育部长弗朗索瓦·米索夫:“我看了您的青年白皮书,书里没有谈性的问题。”部长回答说:“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问题,只要跳

^① Daniel BERTAUX et Danielle LINHART avec Béatrice LE WITA,《Mai 68 et la formation des générations politiques en France》,《Le Mouvement social》,n°143,avril-juin 1988.

^② 鲍里斯·维昂(1920—1959),法国作家,作品有《岁月的泡沫》。——译者

^③ 尤内斯库(1912—1994),罗马尼亚裔法国剧作家,作品有《秃头歌女》。——译者

^④ 左岸指位于塞纳河左岸的高校集中的拉丁区。——译者

进游泳池就能得到发泄。”这样一个回答马上被疯人派称作“法西斯”的回答。

从意识形态角度批判教学内容是一个新课题。人们要求“批判的大学”对教学内容展开批判,要把政治引进学校。在人文科学部门,尤其是在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争论在迅速发展。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除了在学生人数极少的教学和研究部门外,很难在企业和行政机关中找到职业。疯人派拒绝接受的正是这种前景。

农泰尔4名大学生于1968年3月撰写并散发一篇题为《为什么要社会学家》的文章,阐述了该学科的演变和它在社会上应起的作用。文章指责社会学越来越为“资产阶级的社会需求(金钱、利润、维护秩序)服务”^①,使社会学失去批判的功能,心甘情愿地为企业和国家领导效劳,成为发达的资本主义体系的组成部分,“按资产阶级的要求使商品生产组织化、合理化,以满足‘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经济需求’”。

培养管理干部被斥为替资本主义社会培养“看门狗”、“未来的警察或打领带的神甫”。文章的作者们声称拒绝被培养成剥削阶级的干部。此外还有一项更带根本性的拒绝:拒绝接受不是自己选择的命运,拒绝适应他们认为毫无意义的社会。

这种观点与各小派别辩论的内容毫不相干。他们辩论的问题是关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不同理解,关于增加经费和设备对保证学生学习的必要性。但实际上重要的并不是概念问题,而是有关具体目标的问题。科恩-本迪特在1968年5月声称:“实践,也就是说行动,是避免大学生分裂成许多小派别的唯一可行办法……如果我能够发动一次行动并得到响应,我就能带动很多人。这些人虽然已被政治化,但以前却置身于政治之外,因为他们对小派别的争论感到厌烦。在这些辩论中,各种严谨或不严谨的分析没完没了地互相攻讦,而各种观点都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行动,如果它能超越闭门的争论的话,那它本身就是一种动员的手段并将产生行动。”^②

疯人派也与传统的宣传风格划清界限。他们运用讽刺和痛骂来抨击经历过的事情,如:把大学比作“毕业文凭制造厂”。在索邦大学,由文学院全国学联分子发起于1968年4月成立的“大学行动运动(MAU)”发表了一份伪造的索

① Daniel COHN-BENDIT, Jean-Pierre DUTEUIL, Bertrand GÉRARD, Bernard GRANOTIER,《Pourquoi des sociologues?》, *Esprit*, mai 1968.

② Daniel COHN-BENDIT, *Le Nouvel Observateur*, 8 au 14 mai 1968.

邦大学教师声明,宣布他们拒绝看考卷,称:“全部考生均被录取^①。”学校行政当局不得不予以辟谣并说了些调侃的话。

科恩-本迪特以讥笑来对抗政府那些违背学生意愿的荒唐做法。他虽然很革命,但对暴力并无偏爱。阿兰·图雷纳声称:“我所喜欢的,像科恩-本迪特这样的人身上让我感动的东西,就是他对雅典式民主、对诺言的那种近乎迷信但又极具政治性的信仰。我想他是个讨厌暴力的人,他所希望的是打破沉闷和令人窒息的气氛,重绘民主生活的图画。”^②科恩-本迪特是个善于煽动和令人生畏的演说家,能言善辩,对答如流,很快便成为初露端倪的学生造反的领军人物。

挑衅与决裂

疯人派不仅玩幽默和讽刺,也寻衅闹事,试图造成一种不可收拾的局面。他们辱骂杰出的教授,甚至向他们扔西红柿和其他投掷物,斯特拉斯堡的境遇主义追随者就曾经干过这样的事。

在农泰尔,教师们(特别是如果他们属于左翼)也未能幸免:

“啊! 好啊,好啊,好啊!

莫兰·勒弗菲弗被泼屎尿啦!

啊,好啊,好啊,好啊!

图雷纳要付出代价啦!

如果不付出代价,

就对他拳脚相加。

如果不付出代价,

就打他的嘴巴。”^③

虽然他们也说只针对机关不针对人,但还是骂格拉潘院长是(德国纳粹的)“党卫队”(SS)。院长曾经坐过盖世太保的监狱,被流放过,又曾投身于反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斗争。他是人道主义者和左翼人士,关心同大学生开展对话。但他还是被当成“纳粹分子”、“警察”或“走狗”。“当这位可怜的人为了表示善意而(向造反派)提供阶梯教室时,他们竟还说他是‘改良主义’,令他不得离开教

^① Cité par Jacques-Arnaud PENENT, *Un Printemps rouge et noir*, Robert Laffont, Paris, 1968. p. 43.

^② 《Alain Touraine parle》, in Philippe LABRO et l'équipe d'Édition spéciale, *Ce n'est qu'un début*, op. cit., p. 41-42.

^③ *La Grappignole*, cité par Jean-Raymond TOURNOUX, *Le Mois de mai du général*, Plon, Paris, 1969, p. 35.

室并要他‘完全解放’农泰尔，即不让教师离开阶梯教室……他的善意化为泡影，只好辞去院长职务。”^①

疯人派散发煽风点火的传单，打断课程，占领教室。他们“捧腹大笑”。为了在神圣的学校里制造丑闻，他们不择手段：

“老傻瓜，你谴责帝国主义了吗？”

“先生们，首先，我不允许你们对我以‘你’相称……我不允许……其次，我看不出这与我的课程有什么关联。”

“我就是没关联。可你用死板的语言来烦我们，我们感到恶心，而帝国主义……”^②

课程的中断势必导致一场辩论：“显然，我们不能指出课应当怎么上，我们只能打断课程，多次插话进行批判，用我们的发言制止老师继续沿着他制订的路线走下去，迫使他讨论我们提出的论点。”^③

但他们有些理屈词穷，很快骂声四起。至少可以说他们把大学“政治化”的目标是模糊不清的。形势的发展很快令人难以忍受并导致封锁学校的连锁反应。说实在的，这才是他们的真正目的。不能不看到的是，疯人派并不是在闹着玩。虽然说大多数学生群众并不追随他们，但也不排斥他们，甚至还受他们诱惑。

面对日益严重的骚动，学校负责人和教师——他们并不像持异议者所丑化的那样——感到很失望。他们努力想去理解学生们的动机。学院院长在1968年5月间曾说过：“在与农泰尔大学生的一次讨论中，我惊讶地发现他们的不安和焦虑。他们怀疑自己的毕业证书是否真的有用。他们有全盘否定社会的倾向，因为他们感觉到可能很难融入社会。他们受到建设一个假想共和国的诱惑。”^④

疯人派并不接受这些负责人力图开展的对话，而且视他们为无耻的反动派。他们的善意和建议视为家长式统治的标志，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正在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代理人的行径。在农泰尔建立起来的教师—学生委员会很快被斥为企图实行意识形态的调和。这些学生不愿玩对话和“自由接受纪律”的把戏。农泰尔学院院长还说道：“让我大失所望的是，学生们并不想享用在学术

① Jacques-Arnaud PENENT, *Un Printemps rouge et noir*, op. cit., p. 56.

② *Ibid.*, p. 35.

③ Daniel COHN-BENDIT, *Le Nouvel Observateur*, n°182, 8 au 14 mai 1968.

④ Le doyen Pierre GRAPPIN, «Nous sommes tous des mandarins!», *ibid.*

范围内给予他们的自由。就连那些强烈要求这种自由的学生,当我们满足他们时,他们又不想要了。反过来,他自己则要强人所难。在那里,暴力发生了,虽然只是数量有限的团体所为,但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如果考虑到今天法国大学生的人数比战前1939年的中学生还多,这个现象便值得注意。”^①

这些战后的人文主义者看到了社会取得的巨大进步。他们所提倡的世俗或基督的伦理不是一句空话。他们告吹赞成对话和改革,但在这个特殊时期,他们很难理解和接受大学生们拒绝他们原本希望有的民主游戏规则。

农泰尔学院院长在五月运动后4个月辞职。他重申,学院一向是一个对话的场所,“教课的和学习的人都应该尊重这句话的含义。”^②但农泰尔和别处的疯人派并不买账,他们另有所图。他们想搞垮的是大学的体制。游戏规则、昔日自由大学特有的宽容和对话,以及与此共存的家长式权威统统受到冲击。

存 在

那些失去理智的话语,煽风点火的措词,谩骂和粗暴的语言以及那些威胁都是以完全不负责任的态度说出来的,更确切地说,多数情况下是在狂喜发泄的情景下说的。虽然疯人派的造反中带有虚无主义的成分,但他们主要还是要粉碎陈规旧俗和社会禁忌。社会太乖了,“干脆跟它开个玩笑”。而受害者的感受就大不相同了。他们中间很大一部分人对这些辱骂恨之入骨:这些疯人派不是与纳粹时代的冲锋队如出一辙吗?那些青年冲锋队不也是蔑视文化、在大学里搞恐怖并焚烧书本吗?许多被当做靶子的教师不是看到他们曾经反对的虚无主义和盲目暴力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复活了吗?

看来对话已经破裂了,似乎双方的引经据典和遣词造句都难以说清问题的症结所在。的确疯人派对学校的丑化、嘲弄和侮辱与两次大战之间超现实主义者的挑衅何其相似乃尔!

1968年3月诞生于农泰尔的“3月22日运动”(以下简称“3·22运动”——译者)决定搞一次“样板行动”,以造成一种能推动形势发展的局面^③。但要形势朝什么方向发展呢?他们实际所追求的并不是建立一个道德完善的社会,而是

① *Ibid.*

② Déclaration de Pierre Grappin, lors de sa démission, citée par Jean-Raymond TOURNOUX, *Le Mois de mai du général*, *op. cit.*, p. 37.

③ MOUVEMENT DU 22 MARS, *Ce n'est qu'un début, continuons le combat*, François Maspero, Paris, 1968, p. 69.

一次又一次地开创新局面。每次都要“揭露意识形态”，要彻底戳穿权力关系的真相和当局与社会实行的镇压。“样板行动如同又被禁锢的言论一样一下子冒了出来”^①，首先是对禁令的违抗。站出来说话、打断课程、占领教室……这些都突破了迄今为止工会和政治组织的抗议行动所坚守的底线。

农泰尔和别处的疯人派提出的“行动口号”^②切断了时间的线性流程，打乱了社会关系的角色的安排。他们开创了这样的形势：随时都有禁令被违反，处处都在用行动要求个人和集体的自治。原以为已经约定俗成的人际关系一下子被彻底改变了。这就是这些“样板行动”的主要意义所在。他们打算通过这些行动在此时此地刻不容缓地“解放言论”，“重振日常生活”。

这种存在观不管披上何种革命意识形态的外衣，也不管标榜什么目标，其本身就是终极目的：“我那时特别有存在感。我对第一次集会记忆犹新。那时我站在门边，一位高个子小伙子满脸喜气地对我说：‘你瞧，我们存在着。’这是真的。我们有权做些事情了。我们不再害怕权威了。”^③

所谓样板，“并不是大喊大叫或搞占领那一套的示威游行，而是在某一时刻能否跨过一道门槛。人群里有警察、天主教徒、各式人等，有时就走不动了……当人们心照不宣地认出有一道门栓，一道不合法的门栓并把它炸掉那一刻起，这就成了样板行动了”。^④

不论他们确定的具体目标是什么，首要的是显示了集体行动的力量。

当学校的惩罚开始不起作用，愤怒的院长只得叫来警察时，就意味着一道门槛在不断升级中被越过了。在农泰尔，出现了一种新形势：“一句话、一份传单、一个动作都会招来镇压。警察在众目睽睽之下干着卑鄙的蠢事。只要有在学院执行反政治宣传等任务的便衣警察的照片被贴出来，警察就会公开在校园里进行干预，然后在一刻钟内就会被像疯了似的学生用乱石打出校门。这是发生在1968年1月27日的事……”^⑤

到了2月份，在课堂上出的乱子越来越多了。3月22日，因为参加针对在巴黎的《美国快报》办事处的反帝行动，一些活动分子遭拘留。尔后百余名学生决定强占农泰尔行政大楼。负责人把课程暂停。而一复课，事态愈演愈烈；社

① Alain GEISMAR, Serge JULY, Erlyn MORANE, *Vers la guerre civile*, Éditions et Publications premières, Paris, 1979, p. 158.

② *Ibid.*, p. 177.

③ Jean, in Bruno GIORGINI, *Que sont mes amis devenus?*, Savelli, Paris, p. 111.

④ Mouvement du 22 mars, *Ce n'est qu'un début, continuons le combat*, op. cit., p. 59-60.

⑤ Daniel COHN-BENDIT, *Le Grand Bazar*, Belfond, Paris, 1975, p. 28.

社会学系的学生决定抵制考试；极左派活动分子和极右派分子发生了殴斗；学校大集会、讲演会、讨论会……越来越多；教室里、草坪上都在展开讨论。“3·22运动”的大会来了1000多名学生。

4月25日，马列共青联的毛派学生和一些疯人派将来校作报告的法共中央委员皮埃尔·朱坎赶出校门。面对骚乱的发展，包括科恩-本迪特在内的8名大学生被理事会的纪律委员会传唤。5月2日，“3·22运动”组织了“农泰尔反帝日”。此时有传言说极右团体可能发动攻击。疯人派得到马列共青联毛主义者的增援，准备对抗，要把学院变成“自卫战场”。

考虑到教学不可能再正常进行，经国民教育部和巴黎大学校长的首肯，院长决定从1968年5月3日星期五起中止课程和日常工作。为抗议关闭学院和对8名学生的审查，全国学联和极左组织于同日在索邦大学召开群众大会。在5月3日星期五这个日子里，历史加快了脚步。

四、“神奇的意外”

五月运动的发生是历史上的一个“神奇的意外”。运动打破了人们原以为千篇一律的时间流程。社会被大学生发起的运动所震撼,包括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在内,没有一个人预料到它会突如其来地发生。

5月2日星期四,蓬皮杜总理飞往伊朗和阿富汗进行正式访问。3日星期五,几百名极左派大学生在索邦大学的大院里举行集会。有传言说极右组织“新秩序”即将发起攻击,活动分子们准备应战。但是他们等来的不是法西斯分子,而是大出意料地看到身着黑色制服的警察进入索邦大院。警察是应巴黎大学校长罗什的请求出面干预的。校长担心发生同极右派的冲突。

在场的300名活动分子,包括科恩-本迪特、阿兰·克里维纳和让·索瓦若被带上卡车去接受身份调查。他们分别于晚间和夜里获释。高等教育全国工会负责人阿兰·热斯马尔事后说:“校长惊慌失措。在形势得到控制时,他要求准予关闭学校。而警察相当粗暴地开进大学并以有三把椅子的腿被砸为借口抓走了学生运动的所有政治和工会负责人。那是5月3日星期五下午4点左右。半个小时后,拉丁区所有的大学生都愤起对抗警察了。”^①

警察在校内进行的干预已令人无法接受,而装满被抓学生的卡车在拉丁区呼啸而过更刺激着学生的神经。学生们集结在警车周围,高呼“释放我们的同学!”队伍很快形成,发生了第一次冲突。政府的愚蠢和镇压跨越了一道门槛,必然激起反抗。造反行动爆发了,其疯狂性的暴力的表现形式令所有人张皇失措。

① Alain GEISMAR, *La Révolte étudiante, les animateurs parlent*, Seuil, Paris, 1968, p. 42.

星星之火

最初广大学生群众并不怎么理睬极左组织和5月3日星期五在索邦大学院子里的集会，而现在他们成千上万地自发走上街头了。

一名自称“不隶属于任何小团体”、“不是城市游击专家”的学生作证说：“15点的时候，我加入沿圣-日耳曼大街而上的一个游行纵队。队伍要求释放被关押的同学、重新开放大学、校长辞职。我在圣-雅克街和圣-日耳曼街的拐角处碰上手榴弹雨。队伍第一次被冲散后又很快重新集结，而这次我身不由己地卷入殴斗。人们永远可以责备我们说，拳头从来解决不了问题。大学生们肯定不是最后同意这种说法的人。然而，如果人们愿意想一想，治安机构的挑衅只不过是使已经满满的一瓶水溢出一滴来的话，舆论可能就会对这些‘宠儿’和‘优越的孩子’宽容一些。”^①

这一天，警方抓了574个学生，其中300名是在索邦大院里抓的，他们于当晚或夜间被释放。有27人因暴力行动和“蓄意持有武器”而被拘留。当场作案的证据很难认定，只有13人被指控有罪。根据警方的证词，他们受到重判：4人被判两个月监禁，8人获缓刑，只有1人无罪释放。

对学生的这几起判决很快引起反应。运动一致确定了3个目标：立即释放被监禁的学生；重新开放索邦大学；警力全部撤出拉丁区。

5月6日星期一，面对示威的规模和示威者的决心，大学纪律委员会无法召开会议，“受惊的评判员接二连三地失踪，只有2人坚持到底，但也明白自己不可能作出任何决定。校纪律委员会从此再没开过会。”^②

在大学生内部和外界，警方的介入产生了具有象征意义的巨大反响。几世纪以来，大学都是一个自由的场所，政权机构都必须尊重它，并承认学生和教师在从事文化和“精神科学”方面的独立性。可这次正是作为法国和世界文化象征的索邦大学遭到队伍密集、手持警棍的警察入侵。让·达尼埃尔在《新观察家》周刊上写道：“真是匪夷所思，毫无道理。索邦大学的名字本身在世界上就有象征意义和魅力，而事情恰恰就出在它身上，这真是令人困惑的愚蠢行为。”^③

① J.-G. L.，《Témoignage de l'étudiant de base》，*Esprit*，juin-juillet 1968.

② Pierre GRAPPIN，doyen de la faculté de Nanterre，《La faculté de Nanterre de 1964 à 1968. Entretien avec Pierre Grappin》，*Mai* 68. *Les mouvements étudiants en France et dans le monde*，*op. cit.*，p. 104.

③ Jean DANIEL，《Une décision incendiaire》，*Le Nouvel Observateur*，n°182，du 8 au 14 mai 1968.

往日《新观察家》和其他人在极左行为的评价上存在的分歧一下子烟消云散了：“在几秒钟内，这一事件掩盖了其他一切，而成为一服凝合剂。”

面对聋哑政权

政权似乎又聋又哑。它低估了造反行动，而且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不甚明了。它墨守成规，对自身的合法性和权威充满信心。政府支支吾吾，既想平息事态又不愿在“街头压力”下做出让步，而且试图分化学生运动。

政府企图通过对5月3日被捕学生的审判以儆效尤，把愿意学习的“好学生”与那些极左的捣乱分子区别开来。但事与愿违，政府的声明和法律的制裁反而增强了学生们的决心和运动的团结。

国民教育部长阿兰·佩雷菲特对罗什校长表示同情并祝贺他请来警察干预，“不然的话，索邦将被占领一两个月。”^①他同时声明愿意开始对话，并暗示要对教学进行“必要的改革”。但他一再声明警方介入大学是为了保护广大群众免受一小撮鼓动分子之害。他认为在离考试不到几天的日子里是不会有入听从疯人派的。然而每一天、每一小时都有事情证明他错了。成千上万学生上街反驳他说：“我们都是小集团。”

自警方介入索邦以后，学生阵营实现了空前团结。一大部分教师，而且不是微不足道的教师开始同情学生，并试图用安抚的办法充当调停的角色。法国诺贝尔奖的得主们^②向总统发了电报，要求他主动做出宽恕学生的决定。

5月8日，星期三，诺贝尔物理奖得主阿尔弗雷德·卡斯特勒在《世界报》发表一篇文章：《但愿理智占上风》。科学系派出代表团同雅克·莫诺一起前往国民议会。代表团要求各政党议会党团和国民教育部长提出赦免被监禁学生的法案并公诸于众。代表团随后又前往内政部，受到富歇部长办公室主任的接见。主任竭力安抚他们。

同日，阿兰·佩雷菲特在国民议会重申希望对话，表示他希望，如果秩序允许的话，索邦“可能”于次日重新开放。罗什校长召开大学理事会会议，会上全体一致主张复课。索邦重开的消息传遍拉丁区，似乎有可能实现妥协。

^① *Paris-Press*, 8 mai 1968, in *Les Citations de la révolution de mai*, recueillies par Alain AYACHE, Jean-Jacques Pauvert, Paris, 1968, p. 25.

^② Jacques Monod, François Jacob, André Lwoff, prix Nobel de physiologie et de médecine, Alfred Kastler, prix Nobel de physique, François Mauriac, prix Nobel de Littérature.

5月9日星期四，国民教育部的一份公报指出：“极端派别的活动迫使教育部不能满足大学理事会表达的愿望。”的确，热斯马尔和索瓦若关于大学生将要占领索邦的讲话使教育部感到不安。教育部声称，即使农泰尔学院可以重开，索邦也不行。

这个声明被视为背信弃义，更坚定了示威者的决心。许多站在大学生一边的教授和教师也愤怒了。阿尔弗雷德·卡斯特勒教授写道：“当听到索邦依然封闭，并被更加密集的警察队伍包围时，我无比震惊。罗什校长星期三中午对教授们的承诺，当晚教育部长在议会许下的并由我向学生传达的诺言都没有兑现。大学生们被所有的人（部长、校长、教授们）玩弄、欺骗和背叛了。”^①

政府在悄悄地进行谈判，并再次企图分化学生运动。事实上，谈判在极其混乱的情况下进行。各部之间存在一定的不和谐音。代总理路易·约克斯和国民教育部长各派自己的亲信去参加谈判。政府似乎并无明确的行动路线，在非同寻常的形势面前闪烁其词。它已无力掌控时刻都在变化的事态了。

难忘的一夜

5月10日星期五，这天夜里出现了第一批街垒。社会学家阿兰·图雷纳就在拉丁区游行的学生身边。他描述了科恩-本迪特起到的节制作用：“在这极具戏剧性的时刻，面对那些要发起进攻的人们，他认为最地道的政治行动是什么？那就是坐在地上，发挥团体的活力展开讨论，在谩骂和沉默的人群中相互交谈。于是有人对他说：‘如果共和治安部队发起攻击……总该备些伸手可及的小东西吧，不能太远了。行，弄几块铺路石吧，别放得太远。’最后，那些老想发动进攻的攻击性最强的团体与‘公社’之间达成妥协：修筑街垒。街垒是个封闭的世界，就像是在自己家里，人们可以在边上同他们讲话。”^②

修筑街垒在示威者中创造了一种兴奋、友爱和节日般的气氛。支持示威者的该街区市民也加入他们的行列。社会不同阶层和不同角色之间的隔阂一下子消除了。大家都在互相交谈、互相鼓励。街区的一名女居民谈了她亲眼目睹的情景：“5月10—11日夜里，我们都在街头过夜。什么样的邻居都有：商人、教

^① Alfred KASTLER, «Comment les étudiants ont été trahis», *Le Nouvel Observateur*, n°188, 19 au 25 juin 1968.

^② 《Alain Touraine parle》, in Philippe LABRO et l'équipe d'Édition spéciale, *Ce n'est qu'un début*, op. cit., p. 42.

授、洗衣工。我们很好奇,有点飘飘然。那气氛比平时好多了。大家都带些器材帮助学生筑街垒。地下室的东西都搬空了,就把柳条箱、花瓶等等都拿来。”^①

示威者都感觉自己正创造历史。时钟似乎停摆了,时间向着一切可能性开放,诉说着历史上的其他伟大时刻:“在我家门前,在圣-米歇尔大街和矿业学校的高地上,第一座街垒上升起了三色旗。因为这个,人们说:‘这就是1848年。’”^②一名便衣稽查员发出警告,但谁也没听见,因为大家都在唱。唱的不是《国际歌》,而是《马赛曲》,颇有雨果小说的味道。从后来事态发展的情况来看,这显得有些奇怪。”^③这正是共产党大学生和那些单纯而刻板的小团体难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总是按马列主义的经典来考虑“负责任”的行动和战略。

要“冷静地”讲述那时笼罩在拉丁区的欢乐和兴奋气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科恩-本迪特写道:“我们都感到高兴,因为我们看到了自己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和团结的感觉造就了街垒里的节日气氛。在这集体宣泄的时刻,在一切都似乎成了可能的时刻,示威者之间特别是男孩和女孩之间建立起崭新而单纯的关系是再自然不过了。一切都变得简单、好办了。街垒不再只是自卫的手段,而成了某种自由的象征。正因为如此,这个5月10—11日之夜将成为所有‘在场者’的难忘之夜。”^④

难以挽回的错误

在拉丁区,示威者和警察对峙着,街垒越来越多,紧张空气不断上升。22时,校长告知,他愿意接见大学生代表,以便讨论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平静地复课。当局至少是跟不上形势了:当成千上万大学生在索邦四周筑起街垒的时候,他们还在谈“复课”。

阿兰·热斯马尔与副校长沙兰在卢森堡电台进行了一次直播对话。形势极其紧张,而且时刻都在恶化。他们的调门强硬但措词仍然彬彬有礼:“热斯马尔先生,我个人已准备到您现在所在的地方去和您谈话。”

“可以。可问题是,有一点谁也不能含糊其辞:我们在示威活动初期从贝尔福狮子雕像上向与会者宣布,你们准备满足我们的后两点要求,但关于赦免问

① Ibid., p. 93.

② 1848年,法国第二共和国成立。——译者

③ 同①, p. 93.

④ Daniel COHN-BENDIT, *Le Grand Bazar*, Belfond, Paris, 1975, p. 67.

题没有表态(这时示威者的反应是齐声高呼:‘释放我们的同学!’)。”

“是的。”

“那么,如果在这上面没有什么新情况,你就不必麻烦了,校长先生。”

“热斯马尔先生,您应该懂得我个人不能就此做出决定和承诺。我可以做的是与部长取得联系,他可以代表政府做出决定。”^①

部长没有做出这个决定,对话也没了下文。雅克·莫诺和雅各布^②也给佩雷菲特部长打电话,但毫无结果。在奥德翁区,街垒也筑起来了,双方都在准备较量。

0点15分,3名学生和3位教授得到罗什校长的接见。阿兰·佩雷菲特部长惊讶地获悉科恩-本迪特也在其中,凌晨2点许,科恩-本迪特走出校长办公室并声明:“我们没有进行谈判。我们告诉校长:‘在街头发生的事是全体青年在表达反对某种社会的态度。’我们还对他说,为了避免发生流血,所有警力都必须撤出拉丁区,而且,只要我们的三点要求未得到满足,我们知道示威者会一直呆在他们的街垒后面。”^③

2点35分,共和保安队发出例行的警告,发射红色信号弹,开始攻向街垒。暴力代替了节日,冲突极其残酷。巴黎的全国众多听众都在收听卢森堡电台和欧洲一台的实况直播,听着记者用气喘吁吁的激动声调描述冲突和镇压的情景。

雅克·莫诺在欧洲一台频道上向警察署长发出呼吁,希望他命令警察让滞留在位于皮埃尔-居里大街的雷蒙-普恩加来公园里的伤员撤离。

情绪激动的卡斯特勒打电话给内政部长:“部长先生,以上苍的名义,请您命令警察部队停止屠杀。否则您将永远失去青年。”

“亲爱的教授,请您冷静些。事情快结束了。我们的警察是人道的。只是在清扫街道,没有别的。”

“部长先生,我遗憾地告诉您,从今以后我们对学生无能为力了。”^④

示威者方面的受伤人数以百计,医院很快便爆满。罗什校长呼吁停止“残

^① 《Les journées de Mai 68. Les voix et les “moments” historiques》, *Spécial sonore. L'illustré sonore de notre temps*, 33 t, n°24, 2^e trimestre 1968.

^② 雅克·莫诺和雅各布,诺贝尔生物和医学奖得主。——译者

^③ *Le Monde*, 11 mai 1968, in *Les Citations de la révolution de mai*, recueillies par Alain AYACHE, op. cit., p. 34.

^④ Alfred KASTLER, «Comment les étudiants ont été trahis», *Le Nouvel Observateur*, n°188, 19 au 25 juin 1968.

忍的冲突”。巴黎主教马尔蒂喊道：“务必迅速找到妥善解决办法，这是关系我们大家的事。”^①大约在清晨5点30分，科恩-本迪特通过电台号召示威者解散。

无可挽回的错误犯下了。天快破晓时，阿尔弗莱德·卡斯特勒写下这段话：“这一夜过后，问题不再是校长是否应该辞职，部长是否应该滚蛋了。制度的问题提出来了。现在这个制度是10年前通过武力建立起来的。它还带着这种烙印，它抛弃了自己的青年。”^②

太晚了

翌日，巴黎和法国看到了烧焦的汽车和拉丁区街垒的残迹。面对警察的镇压和似乎“抛弃了青年”的政权，全国都对学生表示了广泛的支持。运动的首领们声称对当局“令人难以置信的愚蠢”感到震惊。当局却丝毫不理解发生的事情，也不想做出任何让步。

政府方面总是支吾敷衍，企图分化学生。部长们展示的形象是既无章法又高傲死硬，仿佛蜷缩在“捍卫国家权威”的硬壳里。透过部长们而真正受到质疑的是傲慢而狂妄的政权形式。

在这些日子里，戴高乐将军一直跟运动保持着距离。但许多人正是从这种保持距离的态度中看到又一个蔑视的信号，看到在青年与制度、社会与国家之间形成的鸿沟：“一个77岁的孤单老人刚刚对青年说了‘不’。悲剧不在于他不理解青年。是的，以他的年龄怎么能理解呢？悲剧在于，正是他在孤立中决定着一切。”^③

蓬皮杜总理从阿富汗回国后，玩弄安抚手段，宣布了一些本来可以早些采取的措施。他于5月13日发表电视讲话，表情沉重地说：“我一直怀着莫大的忧伤关注大学不安局面的发展。”他号召大学生代表们为实现迅速全面的平息而进行合作，宣布重开索邦，赦免被判刑的大学生。并且他说明“做出这些决定是出于对大学生的‘深切同情和对他们良知的信心’”。5月5日，被判刑的学生获释了。

太晚了。5月10—11日这一夜形势转变成全国性的危机。运动后来的发展已与它的初衷没有多大相干了，而且任何人都无法掌握局面了。

① Cité par Jean-Raymond TOURNOUX, *Le Mois de mai du général*, op. cit., p. 63.

② Alfred KASTLER, «Comment les étudiants ont été trahis», *Le Nouvel Observateur*, loc. cit.

③ Cité par Jean-Raymond TOURNOUX, *Le Mois de mai du général*, op. cit., p. 77.

学生动员的势头并未减弱。各工会组织号召举行 24 小时总罢工以抗议镇压行动。工会组织在左翼政党号召下于 5 月 13 日同大学生一道上街游行。在警方介入索邦 10 天、戴高乐上台执政 10 年之际,从 15 时到 17 时,几十万人(据组织者称有近 100 万人,警察署长说有 30 万)从共和国广场游行到当费-罗施罗大街。没有发生冲突,无数面红旗和几千条横幅在队伍中飘扬。在外省的主要城市也有几万人游行示威。

在巴黎,示威游行接近尾声时总工会下了解散令并将示威群众引导到阿拉果大道。这时几个年轻人不听指挥,展开激烈的辩论:要不要继续向爱丽舍宫(总统府)前进?科恩-本迪特同示威者一起冲向前去,穿过工会维护秩序的防线,向马尔斯坦园广场的草坪走去。在那儿,一拨接一拨的讨论会一直闹到深夜 1 点钟。

在拉丁区,人群冲击索邦。“在炎热的夜晚,几千人来到索邦。他们中很多人都是平生第一次进入这个文化殿堂。在院子里,他们一堆一堆地坐在石板上平静地讨论着,爵士乐队有节奏地为鼓掌声伴奏。高高耸立在底座上的雨果和巴士德的庄严塑像的胸前插着红旗。在大楼里,举行着酷似阿尔贝尔·冈斯^①电影镜头里的那种大会。”^②运动进入了新阶段。

① 阿尔贝尔·冈斯(1889—1981),法国著名电影导演,作品有《拿破仑》。——译者

② Bertrand GIROD de L'AIN,《Un climat de révolution culturelle dans les facultés》, *Le Monde*, 15 mai 1968.

五、言论的解放

法国社会似乎突然觉醒并开始说话了。在全法国——不仅仅在巴黎——的街头和劳动场所，五月运动打破了日复一日的单调生活，在几周时间内，人们自由交谈，为所欲为，过得充实而快乐。几周的日子像是在休整、在陶冶性情并进行批判、质疑。社会仿佛自己停住了脚步，言论的自由表达的流传使集体生活重新变得意趣盎然。人们纷纷发言，冲破意识形态的束缚。在当今生活的种种压力面前，人们表现出他们最需要的是生活的情感自由。

经历过这些时刻的人不会忘记这种言论的解放，不会不感受到日常生活变了样。于是，“换个活法”不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一个无处不在的现实。多种形式的发言都对社会的各个方面提出异议：等级制度、差异、不平等、社会分工、文化等等，无一能够逃脱批判。这种批判呼唤新的社会生活，但并不怎么操心如何制订具体的改革方案并使之变成法律。

解放和节日般的气氛

警力撤出拉丁区和索邦的重新开放标志着一个新阶段——占领地盘和言论解放的阶段开始了。从5月12日起，纳税中心即被占领。13日轮到索邦大学，14日美术学校，15日奥德翁剧院和巴黎许多中学。类似的占领学院和中学的运动也在外省展开。

在各大学内部，每天都召开大会，成立各种委员会。人们的发言也不局限于大学的问题，而且对社会进行全面批判。言论自由没有界限了：“人们无所不

议论,无处不在议论,无时不在议论。这种毫无约束的宣泄有令人感动甚至令人心跳的一面。阶梯教室爆满。学生们那种陶醉、天真、狂热、乖巧、善意……还有那些墙上令人大皱眉头的乱涂鸦。”^①在奥德翁剧院,严格“不准设禁”,在一片乱哄哄的氛围中什么话都可以说。从5月15日到6月15日,发言和吵闹一浪接一浪。

与此同时,从5月14日开始,罢工和占领企业的浪潮开始席卷外省。首先被殃及的是南特附近的南方飞机制造厂,克雷翁和弗兰的雷诺汽车厂;接着是比扬古厂和雷诺集团所有的工厂,而后扩散到全国。

统辖全国公共广播和电视的“法国广播电视局(ORTF)”的记者、制片人和技术人员于5月17日开始罢工,并于19日占领了办公楼。在广电局联合工会的带领下,罢工人数达12000人。各种大会聚集了几千名参加者,有时不得不在巴黎地区的演播厅举行。“成熟的人民不需要白框^②,广电局要独立自治”,罢工者要求制订新章程,要求参与人事管理和成立一个负责监管新闻独立的“贤人委员会”。

在“基层”搞的上百次倡议行动让政府机关晕头转向。5月21日,一些作家占领了文学人总部——马萨旅馆;戛纳电影节受到电影工作者的异议;一群管理人员闯进法国雇主协会办公楼;医生和建筑师包围他们的行业总部;足球运动员占领了法国足联办公地;神甫们出来公开批评他们的等级制度……人们甚至看到一些看门人也举着标语在蒙马特高地游行,标语上写着:“我们也有话要说。”^③运动波及越来越广泛的人民阶层,包括迄今为止被认为很守本分的一部分人,例如综合工艺学校的学生,他们也出来要求以无记名投票方式成立一个对等委员会。总罢工扩大到所有部门。到5月24日,全国都陷入瘫痪状态。

同日,戴高乐将军发表了第一次讲话,但丝毫未能扭转形势。将军在事后惊呼:“这是一股激流,我无力掌控它。激流不可能握在人的手中。我无能为力了。”^④

对于刚刚20岁的人来说,这是令人欣喜若狂的事。对于那些40来岁的前活动分子和反旧秩序的人来说,五月运动是他们的第二青春。参加运动的人感觉自己被卷进一股暖流,沉浸在友爱和兴奋的气氛中。这种解放的节日般的气

① Jacques-Arnaud PENENT, *Un Printemps rouge et noir*, op. cit., p. 103.

② 当时电视屏幕上打白框表示该节目只允许成年人收看。

③ Philippe ANDRO, André DAUVERGNE, Jean-Marie LAGOUTTE, *Le Mai de la révolution*, Julliard, Paris, 1968. p. 126.

④ Cité par Jean-Raymond TOURNOUX, *Le Mois de mai du général*, op. cit., p. 149.

氛在巴黎街头蔓延,极具感染力,连许多原本抱怀疑态度和忧心忡忡的人也被征服了。戴高乐的前秘书克洛德·莫里亚克在忠于国家元首还是加入巴黎群众队伍之间左右为难了很久,最终还是未能挺住,参加了巴士底狱广场的示威活动。“在5月,令人惊叹的是那种气氛、那种空气。没有亲历的人是无法理解的,他将永远为未能有此经历而感遗憾。”^①

一种不规范的语言

针对一个只在社会进步和福利问题上回答大家的要求、自认为客观中立的讲演,五月运动以其言论和行动予以回击:“让大家都只凭自己的热情行事吧,不要有负罪感,以便重新获得做人的感觉。”^②

挑衅、幽默和狂妄把一个技术官僚单调的讲演驳得体无完肤。墙上贴了一幅字,以尖刻和超现实主义的幽默与挑衅性的语言抨击技术官僚的讲话:“嘿!这就叫客观性吗?”“我们放心了:2+2不等于4”,“不要神仙,也不要尺子(尺子与主人谐音——译者)”,“随便什么都可以成为制度”……那个主旨讲话的现成句子全被用上并加以歪曲:“建设几千个停车场,以便孩子们都能在排水沟里玩”,“我们不要换雇主,要换被雇佣的生活”,“现实一些吧,去要要不到的东西”……针对千篇一律的官僚主义讲话,出现了一种不讲任何规则和逻辑的主观任意的语言:“不爱2%,也不爱4%”,“一边儿去吧,你这个东西”……在一个每日的生活都被工作吞没的社会里,五月运动再次表明,游戏、欲望的满足和节庆是必不可少的:“看看你的工作吧,无聊和折磨也在里头呢”,“我要玩儿”,“给自己一点爱和爱的时间吧”,“跳个倒霉舞吧”,“让节日的感觉回来吧”……嬉笑和幽默也不甘落后:“我有些事要说,但不知道是什么事”,“Jem éKrir en fonétik”^③,也有针对活动分子口头禅的:“我是马克思主义者,赫鲁晓夫派”,“打倒纲领,朝生暮死万岁——马克思主义悲观青年”……还有写在墙上的像是叛逆者向一本正经的人使眼色:“喂,巴斯蒂耶,你在逗着玩吧?”^④

五月运动的特点是要粉碎一切社会和文化的壁垒和限制。大学生公社的

① Claude MAURIAC, *Magazine littéraire*, n°112, mai 1976.

② 《Nous sommes en marche. Manifeste du comité d'action Censier》, *Quelle université, quelle société?*, Seuil, Paris, 1968, p. 172.

③ J'aime écrire en phonétique 的谐音,意为:我喜欢用音标来写。——译者

④ *Les Murs ont la parole*, Tchou éditeur, Paris, 1968.

一些文章抨击“法国社会支离破碎，成为人与人之间互相封闭、没有沟通的群体”^①，或“按照思想智力不同分成相互隔绝、老死不相往来的圈圈：资产阶级、戴高乐派、劳动者、青年人、革命派……”^②他们号召主动展开辩论：“请与你们的邻居交谈”，“要到处讨论，和大家讨论”，“同学们，请把这份传单复印并散发出去”。

增加接触和横向交流以及传播信息的工作必须自由地进行，不要任何预设的框框，不要让企图控制这项工作的专家参与，正如那篇致劳动者的文章明确表达的那样：“法籍和外籍的劳动者们，你们大家，你们每个人都要让人听取你们的意见。

“不要让高音喇叭替你们说话。

“如果高音喇叭背后的那些人提出动议，那么，外籍和法籍的劳动者们也要在同等条件下提出你们的动议……

“如果他们限制你们与外界接触，不让你们了解基层劳动者的民主发展情况，他们就不再代表你们，而是要控制你们……

“如果高音喇叭替你们做决定并宣布‘你们’做了什么决定，那就是不想代表你们，而且想控制你们。”^③

国立电台和电视台象征着对传媒的管治和控制，它们也受到来自外部的挑战。由罢工者发起成立的“言论自由委员会”向人民发表了讲话。在巴黎，接着在外省 20 来个城市搞起了“广电局公众广场”，记者和罢工人员在联欢会和集会上回答公众的提问。有一条标语宣称要“用文化革命反对机器人社会”；另一幅招贴画画着被打上×的戴高乐身影，上面写着：“该轮到我们说话了。”

在巴黎街头，人人都在自发地扎堆讨论：“啊，街垒！大家都在那儿呆过，或者自称去过。一个有着计算机般头脑的人经过计算得出结论：除非将卢萨克大街延伸到海边，否则每套房子前都会有一座街垒。”^④

五月运动“对许多法国人来说，是在各种不同的精神世界之间开辟了通道，

① 《Extrait du rapport *Université critique* de la faculté de droit et des sciences économiques de Paris, commission Université et société, juin 1968》，*Quelle université? Quelle société?*, *op. cit.*, p. 42.

② 《Libre opinion》，*Journal de la faculté de médecine de Paris*, n°15, 6 juin 1968, *ibid.*, p. 76.

③ COMITÉ D'ACTION TRAVAILLEURS-ÉTUDIANTS, Centre Censier, *Quelle université? Quelle société?*, *op. cit.*, p. 70-71.

④ Jacques-Arnaud PENENT, *Un Printemps rouge et noir*, *op. cit.*, p. 87.

尽管这种通道还很稀少”。^① 一些社会出身不相同的人昨天还处于自我封闭的状态，蜷缩在自己的人格和社会角色里，现在打破了壁垒，开始在友爱和兴奋的氛围中互相交谈，使日常生活充满乐趣：“人们到共和广场去，站在十字路口和别人交谈，一堆一堆地讨论着生活，讨论着一切。”^②

在几个星期里，来自“下层”的荒诞不羁的言论取代了国家首脑机关和官僚机构的言论。在阶梯教室、咖啡馆、街头巷尾，处处都是如潮的言论。正如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指出的，1968年5月是“积极言论的联欢节”，“各种形式的言论和平共处，这本身就是一件大事：首领们的言论和无名小卒的言论，墙上的言论和口头的言论，大学生的言论和工人的言论，自撰的言论和引用的言论，政治、诗歌、教育、宗教的言论，无声的言论和喧哗的言论。运动和言论紧密相连”。^③

被长期压抑的诉求猛然间在公共场所有力的表达，大家互相交谈，仿佛成了崭新的公有财产。度过这些时刻就像是过节，打破了劳动—私生活的循环。能够互相交谈，能够把各自的想法和愿望一起摆出来，这成了集体的幸福。

许多基督教徒把这种现象看成圣灵的显现。南特主教维亚尔声称：“1968年圣诞节，圣灵进入人类历史，要让大地旧貌变新颜。”^④这一声明在教座上宣读并引起一阵骚动。作家兼哲学家莫里斯·克拉弗尔在《战斗报》上报道五月运动，认为五月运动是他期待已久的精神升华：“它（精神）打破了隔阂与不信任并无拘无束地扩散开。”^⑤

在辩论中，主观意识得到充分发挥并且产生了令人惊叹的效果，特别是在奥德翁剧院。巴黎倾城而出前往观看或加入这个大规模的宣泄论坛：“当然有年轻人、大学生、资产阶级分子、赶时髦的人、老工人、工会分子、商贩、戴高乐分子、极右派活动分子（人们预料‘西方’组织会闹事）、外国游客。此外，还有伪装的人，至少有15名便衣警察。一些人谈论自己的生活，另一些人提出一些恼人

① 《Extrait du rapport *Université critique* de la faculté de droit et des sciences économiques de Paris, commission Université et société, juin 1968), *Quelle université? Quelle société?*, op. cit., p. 43.

② Pauline, citée dans Nicolas DAUM, Mai 68. *Des révolutionnaires dans un village parisien*, Londeys, Paris, 1988, p. 76.

③ Pierre NORA, « L' événement monstre », *Communication*, n° 18, cité par Patrick COMBES, *La Littérature et le mouvement de Mai 68*, seghers, Paris, 1984, p. 104.

④ Mgr VIAL et les prêtres de Nantes et de Saint-Nazaire, le 1^{er} juin 1968. cité par Jean-Raymond. TOURNOUX, *Le Mois de mai du général*. op. cit., p. 207.

⑤ Maurice CLAVEL, *Qui est aliéné?*, Flammarion, Paris, 1970, cité par Patrick COMBES, *La Littérature et le mouvement de Mai 68*, Seghers, Paris, 1984, p. 38.

的问题,再有一些趁机阐述他们不三不四的理论,他们为能说出这些理论等待了30年了。”^①

在那里可以听到许多对社会的批评,但也有几个戴高乐分子在嘘声中高呼:“戴高乐万岁!”他们声称反对这场运动,反对占领奥德翁剧院。人们甚至可以看到作家米歇尔·德·圣皮埃尔来这里宣布他反对戴高乐主义,因为戴高乐主义出卖了“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在一片嘘声、口哨声和骚动中,作家被保安人员带了出去。还可以听到一名警察(在掌声中)做的长篇自我批评;一篇鼓吹重开妓院的辩词和一篇不伦不类的基督教辩护词,说“只有基督才能拯救我们”;还有相当数量的疯子般的抨击……自由言论也吸引了社会边缘人和偏执狂。“自由的奥德翁”颇像一个“精神氧气制造厂”^②。

公众闻到了气味:“那些在乱哄哄中说的话没头没脑,充满矛盾;那些原则声明和惊人之举,那些忏悔和对人民的召唤,只有对端痰孟的男女们有意义和价值。公众来这里如同上剧场一样,不管是观众还是演员都不想打断那些胡吹神侃。他们从中得到快乐,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所以才那么忍耐、宽容。我甚至发现,像在马戏团一样,越是说得没头没脑、越荒唐越玄乎其玄的时候,这种快乐就越大。在这里,胡言乱语是最勇敢的表现。每当演员最语无伦次、最不讲道理、最难把握自己和台词的时候,掌声就会爆发,仿佛他们从中看到他的状态和台词的真实性。”^③

雷蒙·阿隆在《费加罗报》上指出了五月运动的心理剧性质:“大学生和工人将又一次对这些日子的罢工、节庆、游行、无休止的讨论和暴动留下美好的回忆,仿佛日常生活的烦恼、技术或官僚主义所造成的窒息感需要时不时地突然宣泄一下;似乎法国人只有在革命(或假革命)的心理剧中才能使孤独感得到解脱。”^④五月运动能否使这类宣泄在将来有所减少呢?

生存的疑问

五月运动是无节制的言论和革命词汇的奇特混合,革命词汇在这里似乎重新焕发了青春。埃加·莫兰当时写道:“在这里,人们要以马克思正统的名义打

① Patrick RAVIGNANT, *La Prise de l'Odéon*, stock, Paris, 1968, p. 70.

② *Ibid.*, p. 87.

③ Pierre MARCABRU, cité par Philippe LABRO et l'équipe d'Édition spéciale, *Ce n'est qu'un début*, op. cit., p. 153.

④ Raymond ARON, «Après la tempête. De Nanterre à l'Élysée», *Le Figaro*, 5 juin 1968.

心自问：当革命的‘知识界’以为在搞马列的无产阶级革命时，是否实际上干的是一种类似‘1798年社会青年’那样的事，而不是别的什么。那次事件使青年作为一股政治力量闯入社会，给社会革命带来某种新东西。而要作为政治力量进入社会，只有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力量的帮助下才能成功，因为马克思主义正是主张和指导革命行动的，它为尚在探索方式和名义的运动提供意识形态的依据。”^①

无论从行动者的角度还是从运动的诉求来看，五月运动与以往的历史事件均无太多相似之处。这次运动是由条件优越的一部分社会成员和尚未在经济上自立的大学生发动起来的。就是说，这代青年一开始就显示了自己的社会角色，对似乎公认的价值和制度提出挑衅。任何事物都逃脱不了他们的批判：制度、执政当局、社会关系，等等。

由于生产和消费的持续发展，使上辈人能够得到较好的福利。但发展所要求的生活方式却使青年人接受不了。他们的父母为使他们得到今天的幸福曾经艰苦地劳动。某些人认为五月运动不过是一种“口头痛快”，是被延长了的青春期的黄粱美梦，或者只是青年知识分子脱离实际的幻想。他们设想的真正的生活就是不断斗争，以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物质条件。大学生是些处境优越的青年，他们没有日常劳作的压力和家庭责任，对他们的言论无需认真对待。这就是政府、总工会和法共不断向老百姓传递的信息。

大学生则以他们的方式提出一个令曾经饱受贫穷和剥削的人难以理解的问题：既然不再有饥饿之苦，大家都有工作，有能保障较好生活的中等收入，为什么还要这样无休止地地疯狂赛跑、去追求那“无止境的更多”呢？赛跑是紧张和令人焦虑的，仿佛只要一停下来，哪怕是短暂的停歇，就会露出生活的空洞，因为全部的生活就是挣钱和表现自己；仿佛只要一提出疑问就会打乱日常生活，因为日常生活就是为生计不断操心。

人们也会重提资本主义是万恶之源。但这种疑问不是社会和政治性的，而是生存性的：“要记住，在没有办公室、没有车间、没有试验室的年代，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是谁？在当今这个神仙没有立锥之地、意识形态摇摇欲坠的时代，世界的意义何在？命运逼迫我们从事的职业有什么意思？当知识青年以他们这个年龄特有的热情展开辩论时，这些问题挂在每个人的嘴上。而问题一

^① Edgar MORIN, 《La Commune étudiante》, Mai 68: la Brèche. Premières réflexions sur les événements, Fayard, Paris, 1968, p. 26-27.

且提出,便要求所有的人都作出回答。”^①

从今往后每个人都有了发言权,可以自认为在辩论中与别人平起平坐,他的意见会被人听到,“设禁是不允许的”。这种个人和集体的活力在运动过程中拍摄的影片里表现得淋漓尽致。最好的例证之一大概就是克里斯·马克在奥德翁剧院一次集会上拍下的一个咖啡馆跑堂的发言:他面向大家讲话,却对自己提出疑问,并对为了生存而失去生活的状况表示不满。

抒情式的幻想

五月运动具有强烈的抒情色彩:“从今以后,我们有节日可过,有创造奇迹的时间,有自由讲话的权利……人从新石器时代过渡到雅典式的民主,奴隶少了,但多了成千上万的广场!驱走了黑夜,战胜了权力,生活将会改变,终于可以活得自由、平等、博爱、幸福了……”^②

警力撤出拉丁区,学生占领并自由支配大学的地盘,国家的全面瘫痪、言论的自由和自己主持的大会,这一切使大学生公社相信,国家政权一朝倾覆了。“的确,我们像在梦境中一样看到合法政权消失。”^③

言论具有一种魔力:“我记得贴在档案街邮局墙上的一幅标语:‘打倒旧世界!’我瞅着它,觉得既然这么写了,旧世界就真的会没了。真有‘言论自由就是圣经’的感觉!”^④6月份,广电局罢工者发起“杰里科行动”^⑤,颇有狂欢节的模样:记者、观众、大中学生、公共机构职员被邀请轮流在电台大楼外默默地围成一圈,以等待第7日“围墙的倒塌”。但围墙没有倒塌。

许多文章被要求传抄和散发,似乎只要这样做了,他们就能改变人的精神面貌,改变世界。

“再看一遍这篇呼吁吧,再看,再看。

让自己成为作者吧。

把它加以修改并抄下来吧。

发它几百万份吧。

把它贴出来吧。

① Sylvain ZEGEL, *Les Idées de mai*, Gallimard, Paris, 1968, p. 243-244.

② Jacques-Armand PENENT, *Un Printemps rouge et noir*, *op. cit.*, p. 101.

③ *Ibid.*, p. 112.

④ Alexandre, cité par Nicolas DAUM, *Des révolutionnaires dans un village parisien*, *op. cit.*, p. 111.

⑤ 杰里科,约旦河西岸城市,《圣经》述及约书亚率领犹太人攻下该城。——译者

当我们大家都成为作者时，旧世界就土崩瓦解了，它将让位于各国劳动者联盟！”^①

米歇尔·德·塞尔托写道，“在5月里，人们的发言就像1789年攻克巴士底狱一样”，而且一开始发言就是幻想的开始。人们以为可以不再需要媒介和政府了。自由表达意见，直接互相交流如同自给自足，这才是惟一真实的，除此之外一切都是谎言、奴役和镇压。只要有人向他们提出劝告，就会被怀疑是背叛，是要把言论自由的权利收归己有：“如果把自己的发言权交出去，那就不是生活了，也就不是生存而是放弃创造的诱惑了。”^②然而，如果没有一定的机构和作品充当媒介，活生生的创造性言论又怎么能长期保存？怎么能够构成一个社会的长久基础呢？

两个关键词：奴化和自治

在最精心炮制的文章中，桑西耶行动委员会的宣言《我们在前进》很好地表达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在形成中的中产阶级中有很多信徒。对奴化的批判取代了对剥削的批判。这个发达的社会使人失去人性，把他变成机器人和循规蹈矩者。这种批判不仅针对当时占上风的泰罗制和群众的循规蹈矩，而且针对整个社会机制。个人被卷进这些机制，就像掉进了陷阱，从而脱离或抛弃了人类。职务和社会地位被视为“人造的”社会图像和拷贝，个人只能奴颜婢膝地接受自己的身份。

“经济、技术的绝对需要”被视为掩饰技术官僚主义并使之合法化的意识形态。这种技术官僚主义把自己的标准强加于全社会，但人们根本不承认其功能性和合理性。社会、制度、政权、技术权威和官僚主义轮番受到指控，但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对“奴化”的批判。对人实行全面约束只能使人人都变成瞎子。对此，《宣言》并不缺乏批判的底气：

“他们把我们变成瞎子，
他们用各种原则涂抹他们的丑行并搅乱一切，
他们把我们的嘴塞得满满的，使我们不能讲话，
他们把我们变成供他们任意操纵的机器，

^① 《Nous sommes en marche》，Manifeste du comité d'action Censier, *Quelle université? Quelle, société ?*, op. cit., p. 149-150.

^② Michel de CERTEAU, *La Prise de parole*, Desclée de Brouwer, Paris, 1968, p. 52.

他们的世界让我们在神奇的混乱中走向灭亡，
他们发明了超人的‘进步’，对人民的指责装聋作哑，
他们发明一种赛跑，使人人为了逃命而挣扎、撕咬，弄得精疲力竭。
他们把我们分成不同类别，
他们把我们分化，
他们把疲惫不堪的我们扔进水流。
我们被奴化，
但我们有希望，
我们觉悟到应该做什么，
一点一点地，我们把网举起，
我们知道怎样把网眼拆除。”^①

然而，抒情归抒情，抵制归抵制，在这个越来越复杂的社会里又怎能逃脱得了“奴化”呢？这个社会的各种组织和技术与个人的意志和“体验”显得那样格格不入。雷蒙·阿隆曾经指出人们观念上的模棱两可：“千千万万的人把意志和社会生活截然分开。如果这就叫奴化的话，那么奴化不正是为取得文明成果而应付出的代价吗？”^②

诚然，五月运动的活动分子们不同意这种观点。某些文章描绘的前景是这样的：要不断进行工作以便摧毁社会协调机制，要发挥想像力和创造精神：“新社会不是先想像出来，然后再创造，而是要在积极争取非奴化的进程中一边创造，一边想像。”^③更有甚者，一提到奴化便干脆排斥任何社会准则：“论点 49：所谓正常观念，实际上就是使消费社会的大部分模式都成为进行奴化的工具；论点 50：凡遵守社会规则的人都被视为正常人。正常人并不存在，只有被正常化的人。”^④

面对这种“奴化”，“自治不能靠恩赐和祈求，要靠争取”；“如果一个人不想通过奋斗取得一样东西，那么你给他东西就没有任何意义”；“不要来解放我，我负责自己解放自己。”

^① 《Nous sommes en marche》，Manifeste du comité d'action Censier, *Quelle université? Quelle société?*, op. cit. , p. 198.

^② Raymond ARON, *Les Désillusions du progrès. Essai sur la dialectique de la modernité*, op. cit. , p. 175.

^③ 《Nous sommes en marche》，Manifeste du comité d'action Censier, *Quelle université? Quelle société?*, op. cit. , p. 153.

^④ *Ibid.* , p. 195.

要实现自治,就要将旧关系斩草除根,铲除一切依赖关系。因此,要求个人做出不懈的努力:“要自治不能光靠说,而必须去争取。要从根本上去努力,把自己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掌握在自己手里,永远不要把权力让出去。”^①政权的任何立场通通被视同于统治和奴化:“自治就是否定一切纵向结构。对于那些多少有点儿病态、自觉或不自觉地想继续实施统治的权力迷,自治就是一种强制。这些人在奴化别人的同时也就奴化了自己。”^②

在对僵化的等级制度的批判中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大家都是独立自主的,并对社会上的一切负责任。这个社会据说可以自己变得透明。一切依赖和权威关系均被视为压迫或奴化的关系。

在家庭与孩子的关系上尤其如此。孩子必须尽早达到“脑子自治”。“你要有勇气相信孩子,让他们保持自己的本色,也就是说让他们成为新文化时尚的创造者,具有自己选择的表达方式;只要有可能,就应该这样做,如能总是如此,当然更好。这样就能使孩子实现‘脑子自治’了。”^③在中学生行动委员会的文章中也谈到这样的自治要求:为与文化的不平等作斗争,老师们“不应当只满足于传授他们掌握的文化知识,而应当唤醒每个学生的个性并教他们怎样培养自己”^④。从根本上讲,必须针对家庭做工作,“要消除旧文化造成的不平等,惟一的办法是冲破现在的家庭框架。这样,家庭就会只有亲情的功能,孩子就可以免受其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影晌”。^⑤

自治的要求与主观意识的形成是并行不悖的。这种主观意识与思想准则、社会强制力和权威是相对立的。把个人的发展作为首要的目标,必然会适得其反:“这次革命的首要目的是使社会为个人服务,而不是个人服务于社会。未来文明的一切框架,不论是社会的还是经济的,都必须按惟一的标准来构建,那就是个人的发展。”^⑥极而言之,正如墙上涂写的一句话所说:“任何人只要不是我,那就是镇压我的人。”^⑦

怀疑一切会使人堕落成低下的人,甚至是病态的人。持异见者就露出过这

① *Ibid.*, p. 176.

② *Ibid.*

③ *Ibid.*, p. 178.

④ CAL de Louis-Le-Grand, Paris, 2-5 juin 1968. *ibid.* p. 38.

⑤ *Ibid.*, p. 39.

⑥ Patrick RAVIGNANT, *La Prise de l'Odéon*, *op. cit.*, p. 235.

⑦ Cité par EPISTÉMON, *Ces idées qui ont ébranlé la France*. Nanterre, novembre 1968-juin 1968, *op. cit.*, p. 104.

样的面目,把怀疑一切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并企图以此掩盖思想的贫困;只有反对人人视为正面的一切才能证明自己的存在;思想交流和人际关系中充满了怀疑和消极因素,有可能一举毁掉一切公认为合理的东西。由于无力提出任何正面的主张,便只好怀疑一切,其演说也就只能是空洞无物的了。他与世界和他人的关系沦为经常性的对抗。这种对抗掩盖了他的不幸和他与自己过不去的事实。

这类持异见者在随后的几年里有了很多可与之匹敌的人。五月运动期间在被占领的大学和奥德翁剧院里随处可见。“3·22运动”的一个大学生亨利总是由他的女友、一个干瘪的男性化女人陪伴着。亨利的外貌颇似缪塞^①:一样的头发,一样的胡子。但他和女友有一个共同点:老是一副不以为然和讥讽的表情。他们二人可以说是持异见者的化身,把持异见搞到荒唐的地步:为了持异见的快乐而持异见,为了持异见的艺术而持异见;他们对一切都持异见,乃至对说话、思想、生活、革命理念等等,都要有异见。只要你一开口说话,立刻就能看到他们皱起眉头,鄙夷不屑地抿着嘴巴,举起手来说:“不!我不同意!这是错的!……”^②

要什么样的政权?

对政治机构的批判也是不留余地的。“议会伎俩”、不信守对选民的承诺、政治明星秀……都轮番受到抨击。全民公投的缺陷和局限性也被明确无误地点出来:“光走向票箱并投进一张理论上决定大家几年前途的纸是不够的。这种做法有以下缺陷:

——由于其极其低微的全国代表性,使每个人都觉得对社会生活起不了多大作用,这就造成非政治化现象(近几年广泛存在);

——其断断续续的性质(在法国是每4年1次)与国家政治生活不相称,因为政治生活是地道的动态现象。”^③

针对政治被权力机构和专家垄断的现象,大学生公社呼吁由大家重新分配角色:“成为负责人并考虑政治问题是属于众人的事,而不是少数内行人的特

① 缪塞(1810—1857),法国浪漫主义诗人、作家。——译者

② Patrick RAVIGNANT, *La Prise de l'Odéon*, op. cit., p. 235.

③ COMITÉ D'ACTION RÉVOLUTIONNAIRE OUVRIERS-ÉTUDIANTS, Sorbonne, 7 juin 1968, *Quelle université? Quelle société?*, op. cit., p. 53-54.

权。”从这些文章来看，国家的职能可以归纳为实施统治并维护统治阶级的特权。立法和司法制度也是如此。政权被说成是压迫，因此必须加以废除，代之以直接和经常的民主；反对任何形式的代表制和制度化：“不能有一成不变的法制，法制只能来自经常的、活生生的和有创造性的不同意见。”^①组织和政权的问题被定性为笼络、操纵、压迫……“只有在组织机构里才有俗人、俗权、狭隘的和专横的人。”^②这场运动从一开始便带有自我毁灭的潜在因素。

五月运动再现了保罗·里克尔笔下的乌托邦病态倾向：“一种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疯狂逻辑代替了行动逻辑。行动的逻辑懂得想要的和可实现的不是一码事。行动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矛盾。”^③“同学们向前跑吧，旧世界就在你的后头”，可是，要到哪儿去呢？

时钟停摆了

大学生公社的行动者们亲历的1968年5月好比是超越线性时间进程的紧张现在时，它与过去彻底决裂，开启了一个新纪元。但说实在的，当时谁也无法勾勒出这个新纪元的轮廓。时间似乎停止了几个星期。破除特权、等级关系和社会隔阂的新社会在那些几乎是常设的代表大会、委员会和小组中得到体现。幸福和乌托邦不再被推延到或远或近的未来，而是通过聚会、辩论和共同的行动天天经历着。

现时的紧张生活开启了一个无拘无束的时代，它被抬高到不容置疑的绝对境界：“活在现在时！”“要现时的生活，不要任何别的！”一切都应有别于从前，仿佛大学生公社的人要让时间停住，将它固定在紧张的最高点，惟恐它恢复正常的进程：“已经有了10天的幸福啦”，“但愿能有更长时间”。五月运动似乎浓缩了无限的时间。“我要发布永久幸福令”，“死亡必然是一种反革命行为”，“要无拘无束地生活，尽情地享受”。^④

大学生公社抱有这样的幻想：一开始就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那些最激进的文章号召彻底抛弃文化遗产，根本不在乎取其精华为现在所用。同旧世界决裂涉及盘根错节生活的方方面面：“文化的推陈出新是人类空前伟大的事业，

① *Ibid.*, p. 55.

② *Les Murs ont la parole, op. cit.*

③ Paul RICOEÛR.《L'idéologie et l'utopie; deux expressions de l'imaginaire social》, *Du texte à l'action. Essais d'herméneutique, II*, seuil, Paris, 1986, p. 390.

④ *Les Murs ont la parole, op. cit.*

因为它意味着重新创造一个社会、一个世界和一个新人。”^①他们立志彻底改变社会,使各种不同的生存计划失去自己的特性,不再有什么困难的抉择。“人要么完全彻底解放,要么得不到解放。”政治被赋予普罗米修斯式的反抗精神,要“改变生活”,要“无所不谈”。政治、文化、劳动、娱乐……统统都与革命词藻混合在一起,因为革命是统揽一切的。

一开始就卷入运动的农泰尔学院一位教师点出五月运动乌托邦的情绪化色彩:“‘要么创新,要么死亡’——春天里出现在拉丁区几处墙上的这句话集中反映了大学生的悲剧。创造一个能协调法律和自由、劳动和幸福的社会,一个平等博爱、无等级制度、无僵化体制、既无监狱也无精神病人的社会,一个富有而又具诱惑力的社会,一个容忍经常性的异见、容忍其决定和责任经常受质疑的社会:这样的设想既是一种乌托邦,也是生命活力的惊人表现。在他们过分的追求中,这种活力成了自身死亡的载体。”^②

误会

大学生公社很快就钻进了死胡同。他们号召其他人民阶层首先是工人出来声援。在他们看来,工人在反抗这个社会的斗争中是最有战斗力、最坚定的阶级。但是大误会出现了,疯人派的乌托邦与主要工会和政治力量之间的分野是显而易见的。

5月13日的统一大示威和总罢工保持了五月运动与以往斗争之间的连续性。大学生原本只是运动的导火线。运动只有在工人阶级斗争的指引下才具有现实意义。大学生公社这个新生事物的作用只能是相对的,它必须有利于强大的总工会希望达到的经济、社会诉求的实现。

雇主协会和各工会在蓬皮杜总理主持下于5月25—27日在格勒奈尔街总理府举行了谈判,达成一项议定书,满足了许多诉求:保证工资总体提高最低35%,工资增加10%左右,减少社会保障医疗费力的自理部分,在第5计划结束之前减少劳动时间1小时,罢工期间付给50%工资。但这些量的要求与这场震撼全国的运动还有一定距离。

^① 《Nous sommes en marche》, Manifeste du comité d'action Censier, *Quelle université? Quelle société?*, op. cit., p. 167.

^② EPISTÉMON, *Ces idées qui ont ébranlé la France. Nanterre novembre 1968-juin 1968*, op. cit., p. 104.

当总工会全国书记乔治·塞吉到雷诺丁介绍这个议定书时，罢工工人拒绝接受。基层工人不愿就此罢休，要继续罢工。许多68分子从中看到工人阶级可能造反的迹象：难道工人们不能越过其代表机构而直接参加到他们中来吗？

总工会和法共想尽一切办法不让工人与学生直接会面。在大学生公社和它们之间横着一条巨大的鸿沟。当然，法共也会表示同情学生们反镇压、争取“正当权益”的斗争，但他们丝毫不想被极左分子牵着鼻子走。法共总书记乔治·马歇谈到科恩-本迪特时用的是“德国无政府主义者”这样的措词；他指责极左分子是“挑衅者”、“大资产阶级的儿子”或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反共分子”……这些措词激怒了大学生。他们认为这些言论与政府反对小集团和“社会渣滓”的言论如出一辙。裂痕是很深的，法共和总工会的态度将不会被很快遗忘。

大学生活动分子认为，工人阶级完全被自己称代表他们的工会和政治机器所操纵。只要扫除障碍，他们就会提出与大学生一样的要求。民主工联的工会成员及其附属的青年男女工人组织可以在大学生公社中找到自我。但事实上，对许多工人来说，青年大中学生的造反是难以理解的。这个鸿沟并非简单地由“斯大林式官僚主义”造成的，而应追溯到文化上的差异。此外也还有代沟问题，这同样是决定性的因素。

民主工联一名活动分子谈到大多数人对“中学生行动委员会”里的年轻人的看法：“人们认为，15—18岁的孩子们主要的任务是上学，尽可能多地积累知识，没必要走上街头和搞政治。”^①一名女大学生和一名总工会的代表5月份在兰公司门口的一次对话充分表现了二者之间的互不理解：“革命嘛，是很美好的，但群众没有准备好，要现实些……”

“相反！让我们把愿望当成现实吧！”^②

大学生公社的主要行动者们都有经历了一个历史性时刻的感觉。然而，他们无力独自与政权及其警察机器对抗，也不能妄言建立一个新社会。如果说运动之初学生们博得广泛同情，那么在五六月间街垒之夜爆发的暴力则改变了这种局面。

^① Robert, cité dans COMITÉ D'ACTION LYCÉENS, *Les lycéens gardent la parole*, Seuil, Paris, 1968, p. 180-181.

^② Anne GUÉRIN, « Révolution ou réparation », *Les Temps modernes*, n°266-267, août-septembre 1968.

六、是一次象征性暴力吗？

暴动的夜晚，街石被撬起，车子被烧毁，街垒筑起来……这些景象将久久停留在每个人的脑海里，挥之不去。身着黑色制服的共和保安队，黑夜里手榴弹的爆炸声，纵火引起的熊熊烈焰，示威者投掷石块的局面，挨了警棍而受伤的学生……这些景象被千百次地记录下来，变成招贴画、明信片和广告宣传画，然后又复制成分镜头胶片，在人们的脑海中一幕幕掠过，起到催眠的作用。这些图像只记录了最引人瞩目的场景，而未能表现五月风暴所反映的深层次矛盾和运动过程中暴力的变化情况^①。

运动一下子转向反击警察的挑衅和镇压，示威后的暴力成了自卫反击战。但那种节日游戏般的气氛又使得暴力行动有所节制并显得不那么严肃。

然而，这种暴力又是实实在在的。大学生的造反行动是以与警察对抗的形式爆发的，这使大家都感到意外，包括那些经验丰富的活动分子。示威者没有秩序井然地散去，而是用暴力对抗警察。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后，大家都认为不会再有这类暴力了。

5月到6月的事态发展很能说明问题。从5月10日筑起街垒的第一夜到6月11日最后一次街头冲突，节日气氛般的反击演变成汹涌澎湃的暴力行动，局势的发展连大学生公社也难以控制。但是，走向内战的界限并没有被跨越。

^① 关于这一点，巴黎警察总署署长莫里斯·克里莫的著作《5月，做你高兴的事》一书很有参考价值。

自发性

大学生的示威活动朝气蓬勃，与工会和政党组织的所谓“闲逛式”的传统游行形成鲜明对照。这些示威活动都是自发性的。队伍在巴黎城内快速移动，大学生组织并未事先规定路线，地点也是临时选择，使得警察很难跟踪。

5月3日星期五，拉丁区的冲突持续了5个钟头。第一个治安部队的人员受了重伤，是一名队长，他坐在一辆警察救援车上偶然穿过圣-米歇尔大街，被一块铺路石击中脑门。示威活动和与警察的冲突在随后的一周内逐步升级，于5月10—11日第一个街垒之夜达到高潮。

5月6日星期一，科恩-本迪特及其同学在大学理事会上接受审问。示威者与警察的冲突一大早就变本加厉并一直持续到晚上。6000多名示威者用铺路石对付警察。示威者把工棚上的木头、树枝和被推翻的汽车堆在路中以阻挡警察进攻。

警察在多处都无法控制局面了，正如干预小队的一名警官所说：“示威者的攻击性使示威具有小暴动的性质……尽管大量使用催泪弹并发动几次进攻，但由于示威人数众多，情绪极度激昂，还是无法使他们后退。队伍前头有一个年轻姑娘在煽动示威群众向治安部队发起进攻。他们果真在一片‘党卫军杀人犯’的呐喊声中攻了几次。很难遏制住他们，双方对抗得十分激烈。几名共和保安队的人员脸上受了重伤，不得不撤了出去。我们两个支队的若干名摩托宪兵受了伤。我本人也被石块击中右膝。”^①警方拘留了422人。

5月7日星期二，在当费罗施罗爆发了新一拨示威，人数在2万以上。他们绕过警戒线从国民议会大厦前通过，成功到达塞纳河右岸，进入香榭丽舍大街。到达星星广场时，他们在凯旋门下无名士兵墓前高唱国际歌，然后又回到拉丁区。全国学联和革共青联下了解散令，但他们的负责人已经控制不了局面。一小批人对警察进行骚扰，把小汽车横七竖八地推在马路中央，放起火来。冲突从22点持续到凌晨2点半。全国学联维持秩序的人员惊慌失措地告诉警方，他们控制不住局面了^②。

翌日又有游行。各组织号召大家安安静静地解散，但众多示威者不理解：什么都没得到，为什么要解散？疯人派不想就此罢休。全国学联副主席雅克·

^① Maurice GRIMAUD, *En mai, fais ce qu'il te plaît*, op. cit., p. 118.

^② Ibid., p. 130.

索瓦若因发布解散令而受到攻击，高教工会全国局成员阿兰·热斯马尔也作了自我批评。

第一个街垒之夜

5月10日星期五傍晚，近2万名示威者沿圣-米歇尔大街而上。此时示威的组织者还丝毫没有料到事态会如何发展。

示威之初，学生领袖和各革命派别的意见不统一。他们中的大多数按照革命逻辑主张到平民区去举行集会。当游行队伍到达圣-米歇尔大街高处时，组织者不知如何是好了：“很明显，这些人希望至此为止，根本不考虑去平民区的问题。”^①但也不愿意像昨天那样什么都没得到就解散了，因为他们的同学还在监狱里，警察还“占领”着拉丁区。索瓦若和科恩-本迪特提出的口号是：“不惜一切代价保住拉丁区！”

学生领袖完全理解示威群众的决心，他们中间许多人都准备同警察较量。但他们从来没想过要提出这样的口号：“大家都上街斗争吧！”^②恰恰相反，他们力争避免对抗。

正当政府与学生代表在杂乱无章的状态下进行谈判的时候，示威群众开始自发地撬起铺路石，互相传递着石块，在先贤祠区筑起多个街垒。筑街垒是很容易学的：“只要干半小时就知道怎么撬铺路石。找到一块拱顶石，只要从中间把石头撬起，全部石块就都起来了。学会这玩意儿不需要上5年游击学校。”^③街垒筑得乱七八糟，没有什么军事价值。街垒的数量不少于60个，大部分有数米之高。

紧张气氛不断上升，学生负责人担心会发生他们所说的“屠杀”。直到最后时刻，他们都试图与当局谈判。但当警察向街垒发起进攻时，一切都晚了。科恩-本迪特后来说道：“搞暴力并不是运动负责人决定的，而是大学生自发地选择了抵抗……我们没有任何责任。不管怎么说，人们并没有给我们选择的权

^① 《Un militant du 22 mars raconte》，Philippe LABRO et l'équipe d'Édition spéciale, *Ce n'est qu'un début, op. cit.*, p. 64.

^② Daniel COHN-BENDIT, 《Notre Commune du 10 mai》，*Le Nouvel Observateur*, n°183, 15 au 21 mai 1968.

^③ 《Un militant du 22 mars raconte》，Philippe LABRO et l'équipe d'Édition spéciale, *Ce n'est qu'un début, op. cit.*, p. 66.

力。”^①

警察在向街垒进攻时遭到激烈抵抗。学生们用铺路石、小石块、螺栓、施工器材、燃烧瓶等对付手榴弹。部分示威者爬上屋顶向治安部队投掷物件。沿河的居民也被警察的粗暴所激怒，对学生表示支持和鼓励。他们从阳台上向下泼水以冲散催泪瓦斯，并向警察扔各种投掷物。冲突从2点持续到5点30分。

指挥干预部队的几名警察分署署长在他们的报告中这样描述暴力冲突情况：“毁掉第一个街垒后，由于示威者聚集在鲁瓦耶-科拉尔街的另一座街垒后面，我们很难向前推进。他们从侧面攻击我们的人员。在很长的街面上都泼了汽油。当治安部队到达靠近他们的地点时，汽油便熊熊燃烧。有人从窗口扔下重物……示威者烧掉两辆汽车并时不时地向火堆里推新的汽车，以阻止我们到达该街。仅这一处就有半打汽车被烧。被调到现场的消防队员也遭遇了街垒，无法到达火源跟前。”^②

不管这第一个街垒之夜有着多么浪漫的气氛，它仍不失为5月3日警力介入索邦大学以来暴力升级的第一步。冲突十分猛烈，但在街垒前后的人都不想打死对方。街垒具有象征意义，也饱含幽默和讽刺。

狂妄与嬉笑

在五月运动的口号中，只要提到暴力，总要加上嬉笑的成分，从而使其严肃性大打折扣。这么做似乎正是为了遏制暴力，不让它走向极端。奥德翁剧院墙上一幅标语写道：“拥抱你的所爱，但不要放下枪杆子。”^③可68分子并没有枪。在毛泽东的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下面，不知何人急忙加上一句：“政权里面出枪杆吗？”^④

奇怪的是对铺路石的赞美总与美和享受挂上钩：“最美的雕塑是铺路的砂岩石。最具批判力的石块就是打在警察脸上的石块。”^⑤“铺路石的下面就是沙滩”，“我爱你!!! 啊! 那就抱着铺路石说吧!!”“我在铺路石中尽情地享受”。有一幅招贴画画着一个穿黑衣的示威者扔出一块石头，嘴里喊道：“美就在街

① Daniel COHN-BENDIT,《Notre Commune du 10 mai》,op. cit.

② Cité par Maurice GRIMAUD,《En mai, fais ce qu'il le plaît》, p. 157-168.

③ *Les Murs ont la parole*, Tchou, Paris, 1968.

④ *Les 500 affiches de Mai 68*, Balland, Paris, 1978.

⑤ *Les Murs ont la parole*, op. cit.

头。”^①

贴在医学院的一幅标语写道：“狂妄是革命的新式武器”^②，而可笑的武器是不会杀人的。许多有关警察的标语也都分享这种五月精神：“当我听到‘文化’一词，我就搬出我的 CRS(共和保安队)，在你的发动机下面放上一个 CRS 吧”，“要把扔催泪弹的人放到铺路石下面去”，还有：“穿便衣搞侦察的 CRS，出门时要当心台阶哟。”

《疯人报》第 1 期用小字条的形式发表了一些口号，诸如：“杀了他们”或“如果看见一个受伤的 CRS，就结果了他吧！”“将你的愿望当做现实吧！”“不准禁止”，或者“让卑躬曲膝的去死吧”，“爸爸臭不可闻”。他们建议到处张贴这些小字条，特别要贴到警察的背上，并加上一句：“如果你没有糨糊，就用钉子钉上！”^③

内政部长雷蒙·马塞兰少不了也借用一下这类句子：“如果你看到一个保安队员(CRS)躺在地上，就结果了他吧！”他的这句话被反唇相讥：“马塞兰先生，您错了！不是一个躺在地上的保安队员，而是一个受伤的保安队员，正如《疯人报》第 1 期复印本上所表现的那样。总不应该把仁慈上帝的孩子当做野鸭子吧。一个躺在地上的保安队员不一定是受了伤，比如说，他还能给自己系鞋带。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应该结果了他！”^④马塞兰和他的机构怎么欣赏得了这等幽默呢？

从反击到诱惑

冲突一开始，政府便将发生暴力的责任推到那些小集团身上，同时把愿意读书的好学生与那些“为了捣乱而捣乱”的学生区别开来。大学生组织则说是警察在挑衅，一再说“哪儿没有警察，哪儿就没有乱子”，但这些话等于白说，因为在如何对待警察问题上远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在大学生公社内部有许多受暴力诱惑的示威者很想干一仗。

秩序服务队的负责人提出一副准备战斗的军人架势：“在烟雾缭绕的小房间里，‘会议’在进行，门外戒备森严，墙上挂着巨幅巴黎地图。全国学联的一名

① *Les 500 affiches de Mai 68, op. cit.*

② *Les Murs ont la parole, op. cit.*

③ *L'Enragé, n°1.*

④ *L'Enragé, 25 novembre 1968.*

代表用图钉标识示威的行走路线。”^①关于行走路线和应采取什么策略进行着激烈的讨论。全国学联和革共青联的活动分子是秩序服务队的主力，相对于那些蓄意追求冲突的人来说，他们起着调和的作用。

1967年德国社会主义(SDS)青年在柏林的示威对托派分子很有吸引力，因为他们准备得很认真，维持秩序服务队组织得很好。革共青联试图统领暴力行动：“我们不能向冒险主义让步，也就是说不能采取如下行动：占领总统府、总理府或一个部；袭击警察署、军械库、军营等等。如果那样做，将迫使政府使用武力。”^②这种想法与“疯狂”到极点的那些人发生碰撞，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3·22运动”的活动分子、加入运动行列的毛主义者。此外还有：未参加组织的人、失业者和社会边缘人。他们对要求谨慎的指令不以为然。

在运动初期，示威者认为自从警方介入索邦大学和拉丁区后，采用暴力的主动权在政府手里。但当10天后发生第二拨冲突时，情况便大不相同了。在政府宣布禁止科恩-本迪特在法国居留后，冲突于5月22日重起，并在5月24日的街垒之夜达到高潮。第二阶级的冲突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在暴力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学生运动在老百姓中博得同情的情况也因此大受影响。

在3天里，十分艰苦的战斗天天持续到凌晨。全国学联的秩序服务队很快失去了主动权，局势失控了。服务队试图保护调来救火而遭示威者攻击的消防队员。5月23日星期四；官方统计共有188人受伤；警方拘捕了210名示威者，其中44名是大学生^③。政府禁止广播电台作实况直播。

5月23日晚间，高教工会、全国学联和“3·22运动”将正在展开并持续一整夜的街战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翌日，暴力行动变本加厉，在全国学联和高教工会号召去里昂大车站集会后达到高潮。

在准备5月24日示威的过程中，各组织之间的分歧加剧了。“3·22运动”的成员的奥德翁革命行动委员会的代表们建议组织“突击队”，以便冲破守卫塞纳河桥的共和保安队防线；并组织修筑街垒的专业化小队，小队要摩托化，备有撬路面和拔路牌的必要工具，而且要能迅速从一个区转移到另一个区……^④这类建议未能得到全国学联负责人的热烈响应。但这并不妨碍“3·22运动”和其他革命组织依靠自己的力量采取这些措施。示威者的目标是冲击市政府，因为

① Patrick RAVIGNANT, *La Prise de l'Odéon*, op. cit., p. 160.

② Henri WEBER, *Vingt ans après, que reste-t-il de 68?*, Seuil, Paris, 1988, p. 37.

③ Le Préfet Maurice GRIMAUD, *Paris-Presse*, le 23 mai 1968.

④ Patrick RAVIGNANT, *La Prise de l'Odéon*, op. cit., p. 161-162.

第二天就是巴黎公社纪念日。由于警方事先得知并有所防备,示威者只好去攻股票交易所,以作为替代目标。

就在这一天,戴高乐发表了电视讲话。他号召在“参与制”^①的框架内对大学和经济进行必要的改革,宣布将对此举行全民公决,并指出,如果被否决,他将辞职。这篇讲话似乎并不合乎时宜,故而反应冷淡。

几支队伍从巴黎四面八方和郊区出发去里昂火车站的集合点会合。示威集结了3万多人,大多数只来自平民区和郊区的青年。他们站在疯人派一边来与警察对抗。

第一拨冲突很快就在巴士底广场周边展开:“那是在里昂火车站,戴高乐讲话之后。这些人将头戴钢盔、武装齐全的家伙放在第一线,安排得十分出色。”^②全国学联的秩序服务队很快便失去控制力,革共青联的秩序服务队则在保卫该区的军械库,“以防无政府主义者下手”。^③

在拉丁区,树木被砍倒,新的街垒又筑了起来。《费加罗报》这样描写这一夜:“在街垒上和修建街垒的人中,各色人等都有:当然有年轻人(不论是否是大学生),但也有直接从第16区或诺义市赶来的年轻姑娘、表情严肃的公证员或医生或成年人。大家都快乐地撬着铺路石,排成行传递着,在欢天喜地和无所顾忌的气氛中把树木拔起。”^④

但此刻的气氛已不同于5月10日的第一个街垒之夜。这一次他们组成一些小组,准备投入较量。农泰尔学院的一名教师说:“这天夜里,我在圣-米歇尔大街上看到一些‘技术员’驾车过来,用钢锯快速锯倒路灯柱,用斧头砍倒树木后马上离去。我看到一些40来岁的人向青年小组分配战斗任务。这说明大学生和工人以外的一些分子介入了。”^⑤

临 界

一些小组对治安部队进行骚扰,向他们投掷石块、螺钉、燃烧瓶、野营用的小煤气瓶和各式各样的物件。斗殴扩展到拉丁区以外的地区;股票交易所被纵

① 参与制,戴高乐提出的劳资合作主张,工人可以分享企业利润、参与企业管理。——译者

② 《Un militant du 22 mars raconte》, Philippe LABROET l'équipe d'Édition spéciale, *Ce n'est qu'un début*, op. cit., p. 68.

③ Henri WEBER, *Vingt ans après. Que reste-t-il de 68?*, op. cit., p. 37.

④ *Le Figaro*, 25-26 mai 1968.

⑤ EPISTÉMON, *Ces idées qui ont ébranlé la France*, op. cit., p. 74.

火；第5、6、7区的警察分署受到袭击。

交易所着火后，学生负责人要求学生退回拉丁区。这是想拿下几个部的那些人所不情愿的。“3·22运动”的一个活动分子讲述道：“那时好像是很偶然的，统一社会党的秩序服务队对旺·多姆广场进行搜索清理，以防有人进攻司法部。在财政部门前，有警察躲在那里，不像是发动攻势的样子，但也有共和保安队和统一社会党秩序服务队的人在那儿。也就是说全国学联剥夺了我们进入部机关的权利！”^①

夜间，发现一个26岁的男青年菲利普·马泰里翁死在学校街的街垒脚下，死因不明。其父声明说：“我儿子是不同意动乱的。我郑重并全力反对别人利用他的死亡。”^②大学生组织没有对他的死亡加以利用。冲突持续到拂晓。800名示威者，其中半数是大学生的，被警方抓捕并被带到甄别中心。

作家克洛德·鲁瓦在《新观察家》周刊上描述了他在5月24日夜的所见所感：“圣-日耳曼大街的街垒燃起熊熊烈火。巨大的瓦斯云在圣-米歇尔大道散开。在大道的高处，一团滚动的手榴弹和催泪弹像火球一样落下来，大火升上天空。共和保安队在向前推进。他们从护理人员手中抢下一名伤员，将他扔在地上殴打。一名摄影师拍下了这个场面。两名保安队队员摘下他的白色头盔，对他拳打脚踢。他倒下了。保安队走开了，我什么也看不清了。我哭着、笑着。红灯透过火焰变成绿灯。‘这是造反吧？——不！先生，这是一场革命’。”^③

5月24日夜，内政部部长克里斯蒂安·富歇号召巴黎人“唾弃这个从巴黎阴暗角落钻出来的盗贼团伙。这个团伙是躲在大学生背后的真正疯狂者”。他还说：“大学生们必须摆脱晕头转向的状态。”^④次日，乔治·蓬皮杜宣布法国正“面临发动内战的图谋”。5月24日夜是个转折点：看到路面被撬起、树木被砍倒（拉丁区有130棵树被砍）、汽车被烧毁的场面，相当一部分市民被激怒了。

其他两个城市也爆发了十分激烈的冲突：波尔多也有街垒之夜；在里昂，一个警察分署署长死在拉斐特大桥上。示威者从工地抢来一辆卡车，把它推向治安部队，轧死了这位分署署长。巴黎和里昂两个人的死亡让人们惶惶不安。

里昂居民的反应是一种更普遍的担忧：“在细雨绵绵的清晨，看到暴动的景象和同时发生的抢掠，里昂人惊呆了……”“如果他们高兴，可以游行或占领工

① 《Un militant du 22 mars raconte》，Philippe LABRO et l'équipe d'Édition spéciale, *Ca n'est qu'un début*, op. cit., p. 69.

② Maurice GRIMAUD, *En mai, fais ce qu'il te plaît*, op. cit., p. 254.

③ Claude ROY, 《La nuit du 24 mai》, *Le Nouvel Observateur*, édition spéciale, n°185, 30 mai.

④ *Paris-Presse*, 26-27 mai 1968.

厂；但如果他们要砸烂一切，那么，请住手，不要再恶作剧了！战斗的嘈杂声、拔掉树木的传言、栅栏起火、铁棒敲砸拉斐特大桥栏杆发出的断断续续的响声，这一切让普通里昂人觉得世界崩溃了。整个城市陷入惶恐不安之中。”^①

经过这一夜的暴动，主要的大学生组织试图通过谴责挑衅行为制止暴力升级。5月27日，在全国学联组织的沙莱里体育场集会上，有3万多人参加^②。索瓦若号召停止暴力行动，指出政府企图分化运动与百姓，他力主采取新的行动方式。

报纸和其他媒体开始变调了。到目前为止对学生运动表示同情的声浪减弱了。但那些极端的疯人派却毫不理会，他们还想战斗到底。

大学生和“流氓无产者”

政府揭露说，示威者中有“社会闲杂”分子。大学生公社反驳道：“工人、职员、教师、大学生、农民，我们统统属于政府斥责的盗贼团伙。”^③但在冲突中和占领学院的人当中，的确有失业青年和社会边缘人。

当时被称为“黑褂子”的郊区青年也加入大学生示威队伍。在第一个街垒之夜就能看到他们。那些守护勒高夫街街垒的人就是来自圣-德尼的“长毛小狗”，他们严肃认真地准备干一场，并决心能坚持多久就坚持多久。科恩-本迪特曾多次去看望他们，试图让他们冷静下来。这帮“黑褂子”是最顽强的街垒守护者。

到了5月24日，这帮人的人数更多了：“那一夜，我们把一支200人的队伍带到贝尔维尔……有些年轻的家伙说：‘了不得啦！’的确很了不得。人们看到一些家伙从自己家里出来加入游行队伍……一些家伙手持垃圾桶盖、铁镐把、扫帚等各式各样的东西穿行全巴黎。这真是一支斯巴达克式的军队啊！”^④

在被占领的学院里也有这些“黑褂子”和社会边缘人。在这些地方，社会契约已不起作用，“不准禁止”任何事情，处处是骚动和无休止的辩论。他们觉得找到了热情的大家庭，日子过得很自在。这些社会闲杂人员充当了“革命斗士”

① D. D., 《La révolution à Lyon》, *Esprit*, juin-juillet 1968.

② Pierre Mendès France est Présent à ce rassemblement mais ne prend pas la parole.

③ D. 125, Alain SCHNAPP, Pierre VIDAL-NAQUET, *Journal de la Commune étudiante. Textes et documents. Novembre 1967-juin 1968*, *op. cit.*, p. 289.

④ 《Un militant du 22 mars raconte》, Philippe LABRO et l'équipe d'Édition spéciale, *Ce n'est qu'un début*, *op. cit.*, p. 69.

的角色，负责被占领区域的“安全”，围捕混进来的警察，追捕“法西斯分子”……

直到最后，由于过火行动和流言的传播，人们觉得一场野蛮的镇压即将开始。各种传言纷至沓来，有人说“西方”组织的法西斯突击队即将发起攻击；有人说正在发放和储备武器。同时，一些冒险家、前外籍军团和秘密军队组织、各色有谎言癖的人都表示愿意提供帮助。

在索邦，那些人被冠以“加丹加分子”^①的绰号。来自平民区和郊区的失业青年伙同几个好战的退伍军人组成所谓“快速干预”的“突击队”。他们头戴摩托盔、身着花格衣、手持自行车链条和各色器具，主动摆姿势让记者照相……5月23日冲突后，“加丹加分子”贴出他们追打警察的战绩表：“5人挨了石块，4人挨了棍子，1人被拳打脚踢。”^②

在奥德翁剧院，所谓安全服务队都是由来自贝尔维尔和让纳维利埃的年轻“黑褂子”和冒险分子组成。这些肤色黝黑的人还有增加的趋势。他们对大多数学生知识分子很有吸引力。据一名占领委员会的负责人说，有一个外号“死亡天使”的无政府主义者保罗，长着“一副卡尔梅克^③斗士或上世纪蒙古恐怖主义诗人的面孔”，还有一个叫罗基的“19岁小黑褂子”，一个只有在集市上才能看到的体重超过160公斤的陌生人……负责管理这支队伍的是“两个匈牙利移民、一个外籍军团士兵吕西恩和一个参加过六日战争^④的犹太族士兵。”^⑤

这帮人大部分时间是在奥德翁剧院屋顶上观察四周情况（他们的总指挥部就设在剧院里）、制造燃烧瓶、在各个厅里或走廊上辨认并赶走“告密者”和“法西斯分子”……而被这些威猛的斗士、“奥德翁的英雄”吸引来的女性投到了他们的怀抱里。^⑥为了做得更完美，这些“雇佣军”抢劫了剧院的服装和零零碎碎的东西。在示威过程中，这个“突击队”组成一支五颜六色、稀奇古怪的队伍：装备有牛仔裤、黑褂子、特洛伊头盔和文艺复兴时代的盾牌^⑦。

学生运动起初像对待弟兄一样欢迎这些闲杂人员。他们年轻，出身平民，

① 加丹加分子指参加扎伊尔北部地区加丹加分裂分子部队的雇佣军（1960年比属刚果独立后的内战期间）。

② D. 200, Alain SCHNAPP, Pierre VIDAL-NAQUET, *Journal de la Commune étudiante. Textes et documents. Novembre 1967-juin 1968*, op. cit., p. 460.

③ 卡尔梅克，蒙古人的一支，主要居住在俄国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境内。——译者

④ 六日战争，即1967年6月5日发生的第3次中东战争。——译者

⑤ Patrick RAVIGNANT, *La Prise de l'Odéon*, op. cit., p. 181-182.

⑥ *Ibid.*, p. 18.

⑦ *Ibid.*, p. 184.

自称失业。他们不就是这个社会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同时也是叛逆的象征吗？“资本主义是惟一的罪魁祸首。在资本主义孤岛上只有同志……富歇说到‘盗贼团伙’，而‘盗贼团伙’是不存在的。”^①

然而不得不看到，事情并非这么简单。他们和占领委员会发生了矛盾。在奥德翁剧院里，这个“安全服务队”保证了最后 15 天的安全，而几百个失业者、嬉皮士和摇滚青年在走廊和办公室里安营，肆无忌惮地吸食和注射各种毒品。^②新闻界开始突出报道在各学院中的这些帮派。6 月 14 日，占领索邦大学的学生终于甩掉这些“加丹加分子”。

六月的死者

6 月 10 日和 11 日夜里爆发了最后的也是最严重的一拨暴力行动，因为在距巴黎 30 多公里的弗兰地区雷诺工厂附近死了一个名叫吉尔·托坦的中学生。在雷诺厂被警察占领后，毛主义者、“3·22 运动”的活动分子和行动委员会号召学生前往弗兰。全国学联和革共青联认为他们这样做是不负责任的，因此不参加这次行动，并认为最后几个街垒之夜把运动引进了死胡同。

在弗兰及周围地区集结了大批警察，道路上树起路障。几百名大学生被捕并被送到甄别中心。但仍有千余名学生到达工厂周边并与警察发生冲突。郊区上空一架直升飞机在盘旋。警察在四周田野里和邻近的小城镇对大学生展开追捕。冲突持续了两天。

6 月 10 日在默兰附近的田野里，一小队年轻毛主义者看见十多个机动宪兵向他们走来，便跳入塞纳河逃跑。其中一个 17 岁的中学生吉尔·托坦被河水冲走。他的死很快被归咎于警方。他成了 5—6 月的英雄和烈士。

同日在索肖市，两名工人与撤出标致汽车厂的警察发生正面冲突时被打死。一名工人谈到他目击的情况：“我们翻过工厂的低矮围墙……此时共和保安队开始清场。我看见一个戴军衔的掏出手枪。我们继续向前走着。他跑步向大约百米外的其他士兵靠拢。这时，他们举起短枪。我们气疯了，跳上一辆没人的指挥车，找到两支短枪并给砸了。然后我们在油箱点了一把火就立即离

^① Jacques-Arnaud PENENT, *Un printemps rouge et noir*, op. cit., p. 145.

^② Patrick RAVIGNANT, *La Prise de l'Odéon*, op. cit., p. 200 et suivantes.

开了。”^①警察开了火，一名24岁的工人皮埃尔·贝洛被打死，另有两名中弹受伤。冲突持续了整整一天。晚间，一股手榴弹气浪把亨利·布朗什从墙上冲下来摔死了。有两人受了重伤：塞尔·阿迪，36岁，膝盖下部被打折；若埃尔·鲁瓦耶，18岁，法共活动分子，一只脚断了。^②

在巴黎，尽管示威已遭禁止，但吉尔·托坦之死还是点燃了新一拨暴力烈火。一个月前第一个街垒之夜的节日气氛已不复存在，示威者下定决心要跟警察直接较量。人们再一次砍倒树木、筑起街垒、攻击警察署。一些机动小组不断骚扰治安部队。

6月10—11日夜，一场极其激烈的冲突持续到早晨7时。几百名示威者用燃烧瓶攻击第5区警察分署并从屋顶上向治安部队投掷家具。在圣-雅克街，他们死守一座高大的街垒。直到拂晓警方才将其控制。

6月11日，警方逮捕了1200人；其中800人是在火车站附近被捉的，当时正是由全国学联发起的抗议当局驱逐参加示威的外国人的游行队伍从那里出发的时候；400名中学生在蒙治广场上被抓，那里是中学生行动委员会组织的集会地点^③。这一夜治安部队有72人受伤，73个街垒被拆除，25辆汽车被毁，25棵树被砍倒，5个警察分署受到袭击，其中3个被洗劫一空；消防队出动300多次^④。

负责拆除曼恩大道街垒的警察分署署长在其报告中写道：“在街垒前面拉着一根粗大的钢缆，两头绑在两棵树的树干上。推土机一碰钢缆就引起爆炸，伤了1名宪兵小队长。街垒即刻着火，200名守街垒的人逃之夭夭。原来这座街垒里埋了雷的。”^⑤

冲突就这样达到了饱和点。疯人派走到了极限，越过这个界限就将是更大的流血冲突。这个最后的街垒之夜标志着冲突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他们到底想通过这些暴力行动达到什么目的呢？

运动脱离了人民。这在5月24日已十分明显，而现在更加严重了。《世界报》社长于贝·伯夫-梅里写道：“怎样才能使造反的学生信服？他们虽然得到慷慨的声援，但也会因盲目而自毁。……不管正确与否，有哪届政府会容忍巴黎

^① Cité par Claude ANGELI, «Les CRS ont fait campagne», *Le Nouvel Observateur*, n°188, 19 au 25 juin 1968.

^② *Ibid.*

^③ MAURICE GRIMAUD, *En mai, fais ce qu'il te plaît*, op. cit., p. 307.

^④ *Ibid.*, p. 308.

^⑤ *Ibid.*, p. 309.

的街道布满街垒？”^①

是否要提防报复？

政府当局以暴力行动和存在“失控因素”为由，企图使人相信存在内战的危险，并以此收揽那些疏远政府的社会阶层的人心，它在打恐惧和反共牌。戴高乐将军在5月30日的讲话中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并举行立法选举。他谴责“那些搞恐吓、毒害和暴政的集团，它们是由从远处伸来的手和一个专制的政党所组织的，虽然这个党在这方面已经有了竞争对手”，他号召组织“国民行动”，说“法国实际上已受到独裁的威胁”^②。

法国抵抗运动和解放时进行清算的历史幽灵又一次出现了。农村里流传着十分荒唐的谣言。在6月23日和30日举行的两轮立法选举之间，“一些老人把枪搁在枕头下，省会的‘有钱人’在考虑不在家里睡觉”。^③许多右翼人士担心法国陷入无政府主义者或共产党人手中，决心组织起来进行战斗，如有必要的话，拿起武器。

一些“国民行动”团体和“保卫共和委员会”建立起来了。这些组织纠集了准备战斗的戴派分子，他们猛烈抨击持异见的大学生：“这些‘大学生’攻击调来灭火的消防队员，用棍棒打他们，造成多人受伤；一些‘影子大学生’出现在大学城只是为了搞威胁、谩骂，当着学生的面殴打老师；一些‘头发蓬乱的大学生’依赖社会养活，但却把奖学金浪费在购买色情唱片和手册上；一些‘大学生’抢劫了法学院，袭击校长办公室，大肆掠夺。而这一切都要纳税人埋单。”^④

保卫共和委员会接过存在国际阴谋和革命迫在眉睫的观点：“一个颠覆阴谋正在威胁着法国……形势是严峻的！少数人企图发号施令……不！已经不再是一场民间闹剧了……他们的目的是搞暴力和流血革命！不能再让他们为所欲为了。这些少数派是崇拜暴力的危险分子，但他们只是少数。是让他们闭嘴的时候了！”^⑤

对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恐惧消除了阿尔及利亚战争所造成的分歧和

① Hubert BEUVE-MÉRY, *Le Monde*, 12 juin 1968.

② Cité par Jean-Raymond TOURNOUX, *Le Mois de mai du général*, *op. cit.*, p. 282.

③ Sud-Ouest, 17 juillet 1968, cité par Jean-Raymond TOURNOUX, *Le Mois de mai du général*, *op. cit.*, p. 210.

④ Tract CDR, cité par Jean-Raymond TOURNOUX, *Le Mois de mai du général*, *op. cit.*, p. 272.

⑤ *Ibid.*, p. 273-274.

创伤。各退伍军人协会把他们的系统都动员起来；戴派分子在加强联络，把志愿者集中起来，创建“警场委员会”。他们与主张“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的辞职军官以及前秘密军队组织^①的“失足士兵”也有半正式的接触。

6月份，当罢工和占领运动降温时，一些国民行动服务小组（由好战的戴派分子组成的半地下组织）开始对活动分子和罢工纠察队进行挑衅。在竞选活动中，挑衅行为越来越多^②。6月24日在克利希-勒瓦鲁阿火车站，两名铁路工人中弹受伤。6月29日在阿拉斯附近有人向在贴标语的人开枪，共产主义青年的一名18岁的名叫马克·朗万的活动分子被打死。

在大学生公社内部，保卫共和委员会的成立招来一连串谴责“法西斯主义”的标语和口号。他们号召对“恐怖主义”和镇压进行反击。自卫的口号比任何时候都更理直气壮了：“揭穿那些流言蜚语吧！打进警察内部去！保卫我们已经占领的地方！准备好你们的退路吧！”^③“要组织起来回应诡诈，以拳头对拳头。政权的暴力是少数人的恐怖主义暴力。劳动者和大学学生的暴力不是恐怖主义，而是自卫；罢工的劳动者占领劳动场所直到他们的要求得到满足，这就是多数派力量的体现。”^④

前途依然堪忧：“求助于武装团体的暴力，让他们与共和保安队的警察一道使已经处于守势的左翼无法做出反应，这不是很有诱惑力吗？”^⑤

内战没有发生

起义和内战终究没有发生。除了像戈尔德曼^⑥那样，将死和革命混为一谈、梦想“给人民以血的洗礼”的那些人外，有谁会对此有所抱怨？“只要搞一次严肃认真的暴力行动，向治安部队开火，就可以为被强奸的女大学生报仇，特别是就可以保卫索邦大学。要决心把索邦变成永不投降的桥头堡，就要用武装的暴力捍卫它的自由。政府一定会用军事行动回击这一出其不意的暴力，局势将因此而恶化。这样，就可以创造与工人沟通的机会，在和平中打开一个缺口。在

① *Ibid.*, p. 226.

② *Le Monde*, 21 juin 1968.

③ 《Apprendre l'autodéfense》, *Action*, 5 juin 1968.

④ 《Le théâtre des opérations》, *ibid.*

⑤ *Action*, n°20, lundi 1^{er} juillet 1968.

⑥ Ex. militant de l'UEC, une des figures du milieu étudiant révolutionnaire, qui cherche en Mai 68 à rejoindre la guérilla d'Amérique latine (cf. *infra*, chapitre 14).

暴力和暴动的外表下，和平依然支配着政治生活^①。”当戈尔德曼把这些武装行动的建议告诉“3·22运动”的一个活动分子时，他被看做疯子和有撒谎癖的人^②。

与富歇部长所说的相反，在第一个街垒之夜之后，革命派并不希望“五月运动的冒险以流血告终”。当局与全国学联负责人之间的接触从未间断。后者甚至拥有警察总署署长的热线电话号码，而且与他达成了避免最坏情况发生的默契^③。他们几次试图避免冲突，甚至当他们无法控制局面时，还向维持秩序的负责人发出信号^④。多数大学生和运动的同情者对那些街垒之夜多少有些惊恐。

警方最终控制了现场，未受拘捕的疯人派得以回到家中。在这几周里，有过休战的周末和汽油恢复供应的日子，市民们拥向农村。5月30日加油站供油，使大批巴黎人得以外出过圣灵降临节周末。路上有些塞车，车祸造成70人死亡，600人受伤。这又使得疯人派有话可说：“一个不革命的周末比不断革命的一个月流的血多得多。”^⑤许多5月的革命者，不管他们嘴上怎么说，对被他们拒绝的社会的魅力也不能无动于衷。7月的阳光把他们中的许多人吸引到另一番天地去了。

总的来说，“5月和6月暴动的日子比讲话与和平游行的日子少得多了。发生冲突的日子共有9天。”^⑥在几周里，暴力的日日夜夜和大学里、街道上在快乐的节日气氛中各种言论大泛滥的日子一个接一个，这是多么奇特的几周啊！

青年造反运动不是法国特有的现象。那个时候在多个国家也发生类似的情况。然而，尽管它们之间有着共同的特征，但法国的情况依然较为特殊。

譬如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特别是在“自由世界的前沿城市”柏林，有一种积极反共的情结，对持异见大学生的敌对情绪很强烈，认为他们是为“红色”分子作伴或受其操纵。1967年6月2日，在大学生举行反对伊朗国王访德的游行时，一名警察打死一名名叫贝索·奥涅索的大学生。但这一事件并未引起公愤。施普林格报业集团的报纸渲染仇视示威的气氛。1967年8月，发生行人和出租车司机辱骂并攻击示威者的事件。

在1968年2月由“德国社会主义青年”组织的有15000人参加的柏林“反

① Pierre GOLDMAN, *Souvenirs obscurs d'un Juif polonais né en France*, Seuil, Paris, 1975, p. 70-71.

② *Ibid.*

③ Maurice GRIMAUD, *En mai, fais ce qu'il te plaît*, *op. cit.*, p. 101-102.

④ *Ibid.*, p. 131.

⑤ *Les Murs ont la parole*, *op. cit.*

⑥ *Ibid.*, p. 258.

帝大示威”后，众多柏林市民要求采取强有力的措施。3天过后，工会和政党在柏林组织一次反示威，动员了数万人参加。施普林格的报纸《图片报》写道：“人们没有权利让警察和他们的水枪独自承担这种大事。”^①1968年4月11日，建筑油漆工约瑟夫·巴什曼在街上用手枪向大学生领袖鲁迪·杜茨克射击，企图暗杀他。

在法国，5月30日戴高乐派在香榭丽舍大街上的示威人数超过了5月13日，据警察总署署长莫里斯·格里莫^②说共动员了30万至40万人。这次示威是所有认为五月运动就是颠覆的人们所采取的一项报复行动。这些人希望尽快结束“无政府和混乱”状态，认为大学生公社和使全国瘫痪的总罢工都是这种状态的象征。口号本身即能说明问题：“热斯马乐令人厌烦”，“法国要工作”，“把索邦打扫干净”，“共产主义行不通”。

那时也有沙文主义和排外的口号，如：“法国属于法国人民”，主要不是针对外国劳工，而是针对那些“煽动者”和“职业革命家”，因为正是他们在全国制造动乱，而且可能是“国际阴谋”的一部分。科恩-本迪特受到直接攻击：“‘科恩-本迪特回柏林去’和‘红棕色的人回北京去’的喊声所得到的响应比其他喊声多得多。”而“‘解放我们的工厂’这个口号得到穿着得体的先生们和身着应季连衣裙的女士们的同声喝彩。”^③

在戴派游行中虽然也有些攻击性的口号，但不是主流，在许多并非戴派分子的观察家和记者眼里，这个队伍“总体上是平静、温和的”。^④队伍的前几排由部长们和退伍军人组成，但这并不能完全反映示威者的成分：“在后面，是密集的人群，成分更为复杂，有各种年龄和各不同阶层的人，他们高唱《马赛曲》，宛如前往参加星光下的大型游艺会。这首莫里斯·多列士^⑤曾一直梦想把它与《国际歌》相结合的《马赛曲》，自上月以来已不再是法国人民团结的象征^⑥。”

安德烈·马尔罗6月20日在展览宫向戴高乐派活动分子发表了讲话，指出五月运动的独特之处：“这些罢工很有特点。首先，显而易见的是其规模之

① Cité par Claus MENZEL,《Postface》aux *Écrits politiques* de Rudi DUTSCHKE, Christian Bourgois, Paris, 1968, p. 125.

② Maurice GRIMAUD, *En mai, fais ce qu'il te plaît*, op. cit., p. 295.

③ Jacques DEROGY,《Manifestations. Les trois drapeaux》, *L'Express*, supplément exceptionnel,《L'affrontem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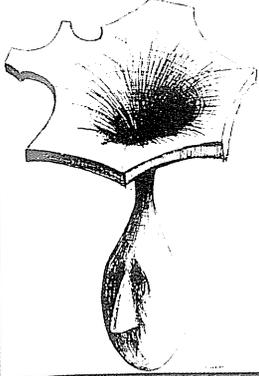
④ *Ibid.*

⑤ 莫里斯·多列士(1960—1964),1930年起任法共总书记。——译者

⑥ 同③。

ACTION

ET MAINTENANT ?



AVANT GARDE

REVUE DE LA JEUNESSE COMMUNISTE REVOLUTIONNAIRE



LA JEUNESSE DE LA RÉVOLTE
A LA RÉVOLUTION

1968 - N° 12 - 100 pages - 100 francs

F.O. REBDO



PARIS - FRANCE - N° 12 - 1968

LIAGE

UNION DES MANUFACTURIERS 8 RUE DE BESSE, PARIS 6^e MEO. 50-1011



Tribune

SPECIAL MAI 68



Michel Hottard

Le libertaire

Le 1^{er} MAI appartient à la lutte révolutionnaire



Voix Ouvrière

"ENRAGÉS" ?
"FILS A PAPA" ?
OU PREMIERE FAILLE
DANS UN REGIME
QU'IL FAUT
CHANGER ?

LES NEGOCIATEURS
VIETNAMIENS
A PARIS

DÉFENSEURS
DE
L'INDEPENDANCE
VIETNAMIENNE
PAS DU
SOCIALISME !



OBSERVATEUR



LA FRANCE
FACE
AUX
JEUNES

L'INSURGÉ

Journal de l'Organisation Révolutionnaire Associée

La vraie lutte : L'ÉTAT A TUE
COMMENT ET POURQUOI
CETTE RÉVOLUTION ?

言论的解放。五月运动期间的报刊。

révoltes

REVUE DE LA CONSCIENCE DU TRAVAILleur, DU COMMERCEANT, DU FONCTIONNAIRE, DE L'ÉTUDIANT

Le gouvernement matraque les étudiants

L'UNITE DES TRAVAILLEURS ET DES ETUDIANTS FAIT CEDER DE GAULLE



ORGANISONS L'UNITE DES TRAVAILLEURS ET DES ETUDIANTS POUR LA VICTOIRE TOTALE

L'AUTOGESTION L'ETAT

ET LA REVOLUTION

ACTION

REPRESSION: FAI

FAI

Mercredi 20 Juin 1968

Pourquoi nous nous battons :

Merci à l'Union des étudiants de la Sorbonne pour leur accueil

la Vie Ouvrière

L'ORGANISME DE LA C.G.T.

LE PRIX 0 20 F

HALTE A LA REPRESSION !

Vive l'unité des travailleurs et des étudiants !

LA C.G.T. AU FIL DES EVENEMENTS

- Une vive émotion parmi les travailleurs
- Organiser en commun le repas populaire

Appel du Mouvement du 22 Mars

Constituons des Comités d'Action Révolutionnaire !

organisons-nous sur nos lieux de travail en Comités d'Action Révolutionnaire (CAR)

- Appeler les principes de l'Action Révolutionnaire

COMITE DES CAR

LA NOUVELLE AVANT GARDE

MAI 1968 : UNE REPETITION GENERALE

la cause du peuple

Journal de front populaire

front populaire

n° 1

Cahiers de mai

NANTES,

toute une ville découvre le pouvoir populaire (ouvriers, paysans, étudiants).

15 juin 68

1r. Documents études débats la poursuite du mouvement

Proletaires de tous les pays, peuples opprimés unissez vous!



le drapeau rouge n°1

**JOURNAL MARXISTE LENINISTE
POUR LA CREATION D'UN NOUVEAU PARTI COMMUNISTE**

EN FRANCE 2 MONDES S'AFFRONTENT

En mai 1968 depuis dix ans la dictature gaulliste soutient les patrons fascistes et réprime les mouvements de révolte des ouvriers.

En mai 1968 dix millions de travailleurs se lèvent, occupent les usines et saisissent les exploitateurs à la gorge. Les réactionnaires sont isolés, le pouvoir des capitalistes est isolé par le mouvement de masse révolutionnaire des travailleurs et des étudiants. La dictature gaulliste à l'agonie cherche une issue pour échapper aux coups que lui porte le peuple.

Cette issue de secours les traîtres du P.C.F. la lui donnent. A l'appel de De Gaulle Waldeck-Rochet répond avec précipitation: Vive les élections! A bas la Grève! Aussitôt le P.C.F. et ses compères de la direction confédérale de la C.G.T. lancent leurs cohortes de politiciens à l'attaque du mouvement prévisé de masse pour le diviser et le briser secteur par secteur.

Les masses révolutionnaires sont trahies; les ouvriers révolutionnaires comprennent.

Ils comprennent que le P.C.F. réorime leurs luttes et soutient les manœuvres de la bourgeoisie.

Ils comprennent que le P.C.F. les trahi depuis des années en prêchant les absurdités de la voie parlementaire, de l'ordre républicain et du passage pacifique.

Ils comprennent que le P.C.F. fait partie intégrante du vieux monde bourgeois et qu'il en est un des ultimes bastions.

Le vieux monde agonisant c'est l'impérialisme américain qui exploite cruellement les peuples qu'il prétend dominer éternellement. C'est le groupe dirigeant de l'U.R.S.S. qui restaure la productivité, les cadences, le profit... le capitalisme et qui trahit les luttes des peuples du monde comme le P.C.F. trahit les luttes du peuple français. Le vieux monde agonisant cessent tous les réactionnaires et leurs valets.

Face au vieux monde se dresse un monde nouveau éclatant de joie et de bonheur: celui de la Chine rouge où 700 millions de chinois, le quart de l'humanité, préparent la Grande Révolution Quinquennale prolétarienne à la victoire; c'est celui du peuple vietnamien qui gagne la liberté dans le tonnerre de la guerre populaire; c'est celui de tous les peuples du monde.

La lutte entre les deux mondes engage l'avenir de l'humanité pour des dizaines et des centaines d'années. Elle est acharnée, elle connaîtra des flux et des reflux, mais en fin de compte le nouveau l'emportera inéluctablement sur l'ancien, le peuple sur ses ennemis, le prolétariat sur la bourgeoisie car le monde nouveau est éclairé par la pensée de Mao Tsé-toung.

La pensée de Mao Tsé-toung est le bilan scientifique de l'expérience historique du mouvement communiste international, le bilan des trahisons des révisionnistes mais aussi le bilan des luttes révolutionnaires victorieuses de centaines de millions d'homm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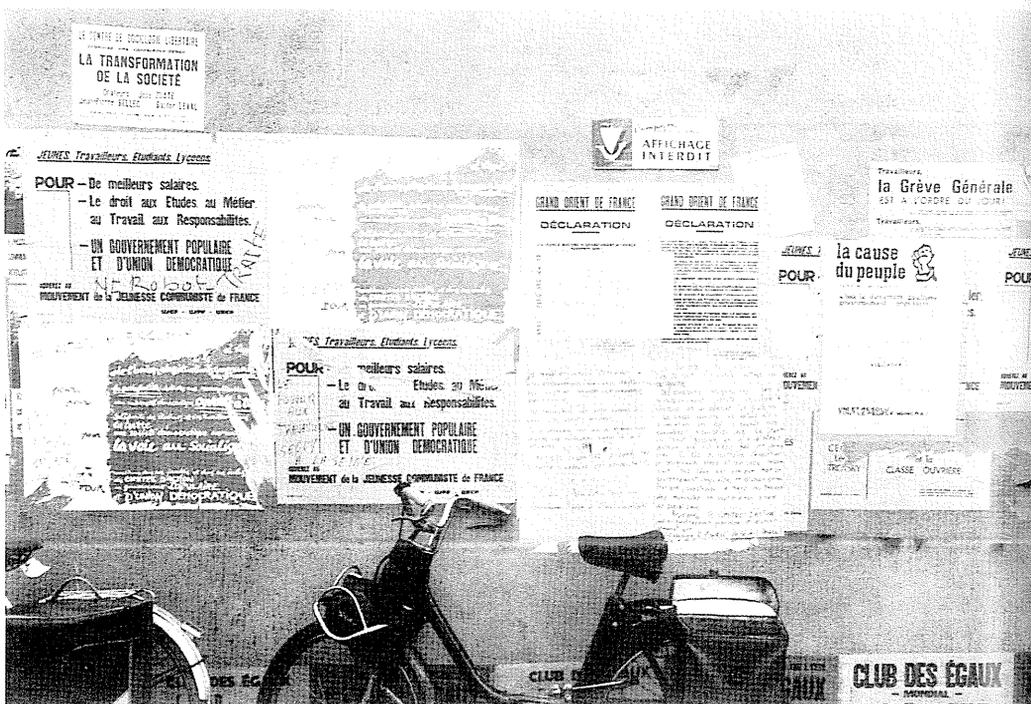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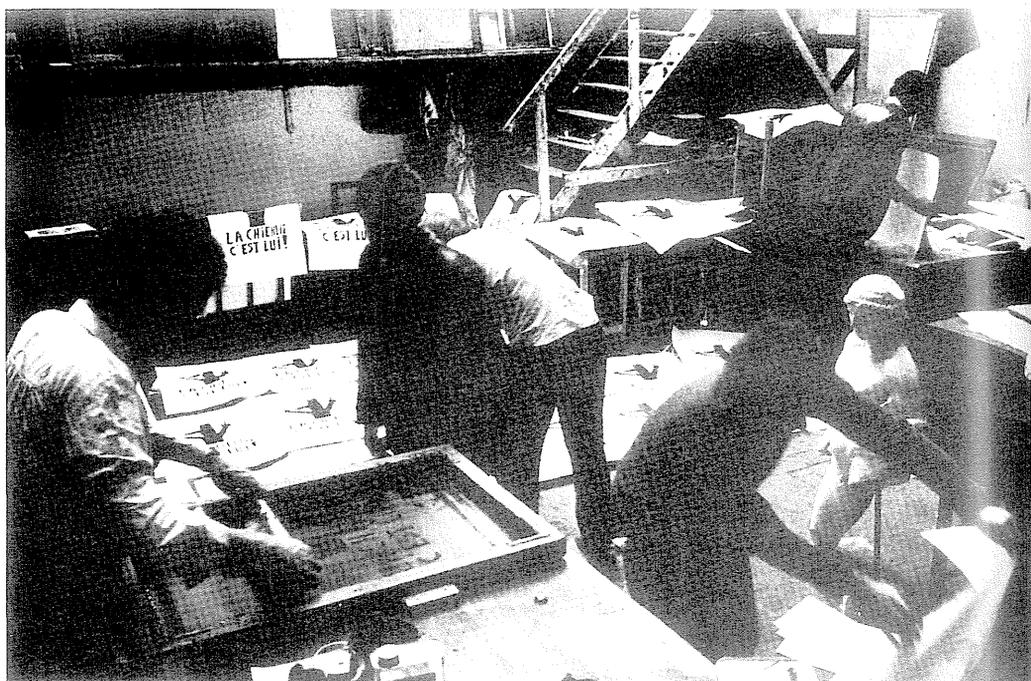
La pensée de Mao Tsé-toung est l'idéologie correcte à laquelle aspirent les masses révolutionnaires françaises.

Elle est la bombe atomique idéologique qui permet de balayer les révisionnistes, leur idéologie de trahison et leur parti faill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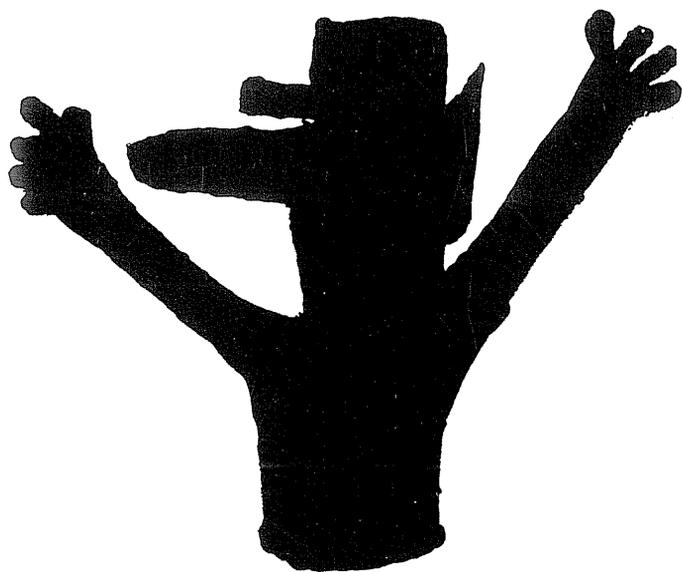
Elle est l'arme que les ouvriers révolutionnaires prennent en main pour édifier un parti qui serve le peuple, qui soit lié aux larges masses populaires, un authentique parti communiste qui ne dégénère pas, un Parti qui mènera le peuple à la victoire sur ses ennemis.

**AUX YEUX DU PEUPLE LE PCF A FAIT
FAILLITE. IL FAUT UN PARTI DE TYPE
NOUVEAU ARME DE LA PENSEE DE
MAO TSE TOUNG**

G. J. L. 2
70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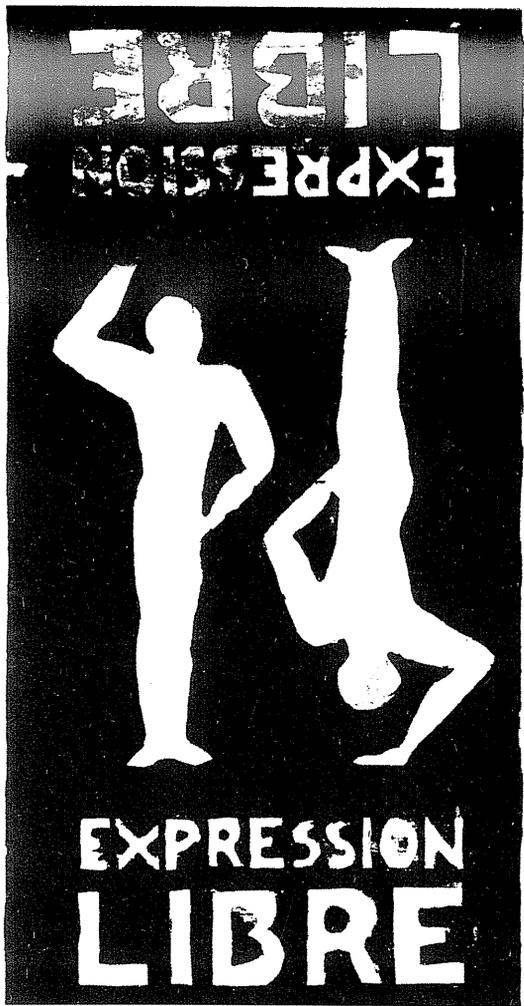


美术学院成为重要的斗争阵地。巴黎大街小巷铺天盖地的宣传画、招贴画就是美院学生的杰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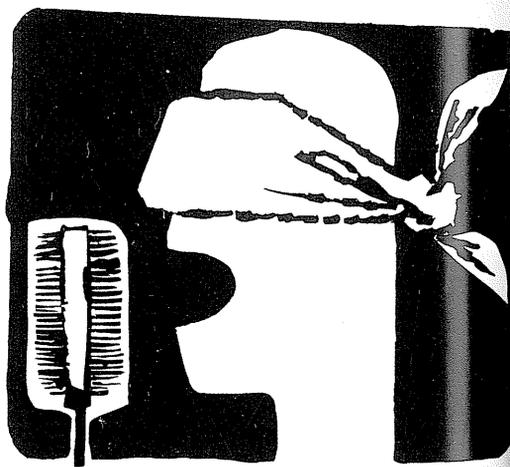


“他才是臭狗屎！”学生们对戴高乐的反击。戴高乐总统听了助手的一面之词，认为学生煽动了广泛的叛乱，于是轻蔑地说：“这群臭狗屎！”占领美术学院的学生们立即用漫画予以回击，巴黎的大街小巷贴满了画着戴高乐侧面轮廓的海报。

LACHIENLIT
C'EST LUI!



**INFORMATION
LIBRE**



**INFORMATION
LIBRE**

在五月运动中，“不准设禁”
使言论自由没有了界限。

反对警察镇压的斗争是发动大学生和争取舆论同情的一个关键因素。标语、传单、漫画都表现镇压的野蛮性。有一幅招贴画画着一个身穿黑衣的保安队队员挥舞警棍。在他的盾牌上写着白色的SS（德国党卫军）。这张画成为一个象征。





5月24日，戴高乐发表电视讲话。他号召在“参与制”的框架内对大学和经济进行必要的改革。



5月30日，支持戴高乐者在香榭丽舍大街举行游行示威，希望结束无政府和混乱的状态。戴高乐政府重新控制局势。

大,但他们却不带仇恨情绪。如果你见识过几次革命,你就不会搞错。罢工者极少带武器,示威中没有发生冲突。这些罢工有导致内战的可能,但不会制造内战。总罢工看上去比其所主张的经济诉求要深刻得多。这场充满悬念的悲剧总排练表明,在罢工者和观望者的内心已意识到一个世界末日的来临。”^①

在人们的脑海中还保留着历史上起义的记忆,但也有起义引起大屠杀的记忆。在革命及其英雄们的记忆中,街垒是从1830年到1944年法国解放为止的那些日子里的事。疯人派在新形势下重新唤醒了这种记忆,但他们是否准备为此付出代价呢?疯人派拼命斗争,打着擦边球,但不越界。1968年5月和6月,法国是在按历史上起义的样子演出一场起义抑或是为了防止起义的发生?

^① André MALRAUX,《Discour prononcé au Parc des expositions à Paris le 20 juin 1968》,《La Politique et la Culture》,Gallimard,Paris,1996,p.347-348.

七、什么样的镇压？

反对警察镇压的斗争是发动大学生和争取舆论同情的一个关键因素。有一个新现象：在街头的镇压都被周边广播电台记者在“直播”中做了绘声绘色的描述。报纸上发表读者目睹的暴力情况，许多照片证明警察的粗暴。5月10—11日的第一个街垒之夜后，《战斗报》登出的标题是：“愚昧行为的后果：塞纳河上的布达佩斯。”《新观察家》周刊首页刊登一个血流满面的青年的照片，成为青年被野蛮殴打的代表性形象。

在5月10—11日夜之后，人们在传单中谈到“对大学生的肆意屠杀”^①，“在巴黎的新沙罗纳”^②。人们干脆说警察采取的手段像“内战时的镇压”^③，还有的说示威者“在警察署里被放了血”；有一个大学生“被警察用窗玻璃割了喉”……

讽刺性报纸《疯人报》的漫画画了一些共和保安队手持屠刀，身穿屠夫围裙，提着一个奄奄一息的大学生，或者正在切割一具躺在地上的身躯，还有些用警棍打裂一个头盖骨，鲜血淋漓……

在谴责对大学生的愚蠢而野蛮的镇压时，人们是不讲分寸的。警察总署署长、部长和戴高乐总统被称为“杀人犯”。标语、传单、漫画都突出表现镇压的野蛮性。有一幅招贴画画着一个身穿黑衣的保安队队员挥舞警棍，在他的盾牌上写着白色的SS（德国党卫军）。这张画成为一个象征。

① D. 77, Alain SCHNAPP, Pierre VIDAL-NAQUET, *Journal de la Commune étudiante. Textes et documents. Novembre 1967 - juin 1968*, op. cit., p. 229.

② 沙罗纳，指1962年2月8日在沙罗纳反对“秘密军队组织”的游街中，警方开枪打死8人事件。

③ 《CRS=SS, Nouveau Charonne à Paris》，D. 79, ibid., p. 230.

虽然五月运动的嬉笑怒骂打破了思想僵化的局面,但也创造了一连串套话。示威者把所有警察都描绘成残忍的野蛮人,说他们永远保留着阿尔及利亚战争时养成的习惯。在1968年5月和6月,警察的野蛮行径,他们那种种族暴力的习性,蔑视他人、狂妄自大、随意打人和某些警察犯下残忍的种族主义行径是确有其事的。然而,“CRS(共和保安队)=SS(纳粹党卫军)”口号,身着黑制服冲锋陷阵和挥舞警棍的形象,以及人们对警察镇压的愤慨,这一切却把原本复杂的现实简单化了。

见证的力量

在巴黎,警方大规模的粗暴行径发生在对抗的两个阶段:首先是5月3日至5月10—11日夜,其次是5月24日至6月10—11日的几个街垒之夜。从第一周开始,一些不同的派别(大学生、记者、社会人士……)便汇集了一些关于暴行的见证并立即公诸于众^①。这些见证的广泛传播引起强烈愤慨,将成为五月运动的纪念集,使警察在国家的形象永久固定在人们的脑海里。

手榴弹和警棍

运动一开始,警方大规模使用催泪手榴弹和警棍对付示威群众和闲人,激起公愤。

在5月和6月,巴黎街头爆炸了几千颗催泪手榴弹。治安部队的策略是首先把街垒“灌满”,然后再发起进攻。为了回击从阳台和屋顶扔下来的投掷物,某些警察不加区分地向所有窗口投催泪弹。在某些被集中发射催泪弹的街道,造成多起窒息事件,而当手榴弹扔进封闭的地方时后果更为严重(如5月8日在蒙帕纳斯,警察向咖啡馆投了催泪弹)^②。用枪对着人发射的情况也不罕见。在5月下半月和6月份,警方使用了进攻性手榴弹。

关于警察野蛮凶狠打人的情况,有令人痛心的目击证词:“一个机动保安警察扑向一对胆战心惊地贴着杜蓬商店橱窗挪动的青年工人……尖声吼着:‘杀

^① 全国学联的高教总工会在2个月内收集了600份材料,“见证与司法援助委员会”提交了60多份指控:故意伤害、见死不救、毁坏器材、偷窃、杀人企图等等。

^② Sur ce point, voir le dossier de Philippe LABRO et L'équipe d'Édition spéciale, *Ce n'est qu'un début*, op. cit., p. 107-108.

了他们!’他挥舞枪杆,像樵夫挥动斧头一样,野蛮地猛击女人的胸部,她扑倒在地,像身受重伤的野兽一样不停地呻吟。她的同伴(可能是她丈夫)俯身去救她,这个保安用同样的方法把他打倒在地,他倒下时未能叫喊一声。”^①在冲突现场以外的地方,最受注意的是青年、外国人和有色人种,他们遭到特别残酷的毒打。

警察冲击建筑物大厅和过道追捕示威者和闲人:“一名被3个保安队员追赶的大学生躲进一座楼。他回到过厅时把头钻进门房的玻璃门,对我喊道:‘发发慈悲救救我吧!’连喊了几次。我奔过去想打开门,但没能打开,因为3个保安队员一边用警棍打他,一边把他往外拽。我用两手护着他的脖子,以免被深度割伤。他们从我手中把他抢走,在我的门上留下一片鲜血和一片肉。我指给媒体和其他调查者看了。”^②

“一些警察砸碎楼房的窗户,向里扔手榴弹,以迫使躲在里面的示威者出来,然后在内院殴打他们:有十来个青年,其中有一个姑娘,被警棍逼着面贴墙壁而立。接下来真正的屠杀开始了。‘治安部队’的代表用警棍不停地殴打这些青年,长达10来分钟。女孩子的衣服被粗暴地扒掉:红色的连衣裙、乳罩和半截衬裙,只剩下半截衬裙遮掩腹部。治安部队的一个代表吼道:‘贱货,我要把你光溜溜地拖到巴黎街头去游行。’窗户朝院子的住户和我都亲眼目睹了这些骇人听闻的暴力场面。但我们不敢做出任何表示,否则就会遭到与那些可怜人一样的对待。”^③在楼房里,有些人是在手枪的胁迫下被带走的:“谁敢动一下,我就把他像狗一样打倒。”^④

博戎中心

博戎中心(位于库塞尔街的一所旧医院)是长时间关押示威者的地方,因而很快闻名,成为警察野蛮行径的象征。几百名被捕者挤在狭小的房间里或铁丝网后面的空地上。示威者一进入中心便被拳打脚踢,正如一名被捕的大学生所证实的那样:“我们一下卡车,就面对一排警察,他们用警棍和拳脚到处乱打,只要打着人就行。接着就是搜身——把你的双臂反扣,把你的头往墙壁或地面上

① UNEF/SNE Sup, *Le Livre noir des journées de Mai*, op. cit., p. 44-45.

② *Ibid.*, p. 67-68.

③ *idid.*, p. 75.

④ *idid.*, p. 69.

撞。有些警察试图加以制止，于是他们互相打了起来，互相卡住对方的脖子。搜身完了，我们被四五个警察带进一间破旧的小教堂，他们用警棍变本加厉地打我们……出了这个厅堂，我们被带向一道门，从那里可以听到叫喊声。在门背后是一个通向牢房的小院子。院子里站着五六个穿制服的警察。第一个碰到我们的警察一拳直击我的肝区，我弯下腰喊叫着，又被拳打脚踢棍击。最后一名警察开始拽我的左臂，我求他住手，因为10天前我的肩膀脱臼了。对我的回答是在我肩膀上猛击一拳并扯掉我的裤子。然后，我们被囚禁在一间4×3米的牢房里。有些人更惨：拳头打在他们的生殖器上、脸上等等部位。牢房里很快就达到60余人，大多数都是站着，伤者没有得到治疗。”^①

一位年轻姑娘在《新观察家》上的作证引起了恐慌：“共和保安队的卡车不时卸下一批男女，他们挨过警棍，中过瓦斯毒，头部有重伤，有的胳膊折断，等等。中国人、越南人和黑人受到格外残暴的对待。然后我们被一个接一个地带进几个厅里。一个保安队员喊着我的名字说：‘布克莱特过来，我给你剃头。’我挨了几棍子。一个戴军衔的过来干预，但在我之前的一个姑娘头发已被剪得乱七八糟……又来了一些年轻姑娘，其中有个16岁的中学生。她告诉我们她是在圣-米歇尔大街被抓的。她被带上警车，在那里4个人轮奸了她。她对我说她让他们为所欲为，要不然的话就要挨警棍和被剃光头。她的衣服被撕破，全身肿胀……另一批年轻姑娘来了，她们身体肿胀，被关在警车里长达4小时，保安队向车里投催泪手榴弹把她们窒息。在牢房里，一名孕妇受到殴打。25小时过后，我们的神经崩溃了，我也是其中之一。放我们的时候，到了门口还用警棍打我们，在铁丝网围着的营地里还有许多25小时前就到这里的人，不知道他们何时能出去。”^②

辱骂、威胁和侮辱

警察除殴打和施暴外，还使用排外的语言（滚回你们国家去）、种族主义的辱骂（犹太鬼、黑鬼）、下流的性语言和形形色色的侮辱（把人头发剃光、强迫示威者双手抱头）……在运动初期，被扣押的未成年人无法通知家里。死亡和酷刑的威胁造成恐怖和惊慌气氛，特别是对被拘留的年轻人：“你们看到这些绳子

^① Témoinage 436, UNEF/SNE Sup, *Ils accusent. op. cit.*, p. 151.

^② 《Un témoignage》, *Le Nouvel Observateur*, Édition spéciale, n°185, 30 mai 1968.

了吗？好，要把你们一个不剩地抓起来！”^①；“如果他们动一动，就开枪，这是命令”^②；“要把你们扔进塞纳河，而你们不会是第一拨”，“要把你们关进酷刑室”^③；“如果得到批准，我要让你们的脑袋装着子弹过来”^④……

一名在5月24—25日夜里被逮捕的年轻中学生的父亲来到其他家长中间寻找他在博戎中心的儿子。他儿子已经在那儿度过了18小时：“在这些年轻人身上，令人吃惊的是他们脸上那种刚刚做过噩梦的痕迹。在那个地方，人们在几个小时内用尽一切手段‘粉碎’他们做人的尊严……总之，这种恐惧的气氛使人不得不感到这些人的命运完全取决于看守们是否还心存善念了。”^⑤

面对这些证词，当局关于“治安部门很冷静”的声明实在是无法形容的虚伪。

关于镇压的辩论

上述见证在人们心灵上引起的震撼和愤慨如此强烈，以至于大学生公社有丝毫不犹豫地火上浇油。未曾经历战争和阿尔及利亚战争中的镇压行为的青年学生们惊愕地发现，警察原来如此粗暴。“反镇压”斗争不仅成为进行动员的关键词，而且引发了与当局代表的公开辩论。

运动初期，大学生公社内部就有各种传言：一些大学生被打死、被绑架、被警察严刑拷打……大学生组织揭露警方使用了小威力手榴弹、硫磺弹、氯气弹，并指出：“警察泼洒酸性液体烧人胸部和脸部！”^⑥有一张传单说警方使用的瓦斯造成窒息和死亡，^⑦并补充说：“现在很清楚，我们是警方用来做试验的豚鼠。他们已经有在沙罗纳和阿尔及利亚使用酷刑的记录了。”“3·22运动”也不甘落后：“警察用尽一切手段：燃烧弹、致命瓦斯（被国际公约禁止和医疗机构不存在的瓦斯C. B和C. S）、氯气手榴弹、钢化塑料弹。”他们要求“杀人犯格里莫”和

① Témoignage 481, UNEF/SNE Sup, *Ils accusent, op. cit.*, p. 143.

② Témoignage 481, *ibid.*, p. 144.

③ Témoignage 506, *ibid.*, p. 142.

④ Témoignage 578, *ibid.*, p. 152.

⑤ Témoignage 502, *ibid.*, p. 179.

⑥ UNEF, D. 53, in Alain SCHNAPP, Pierre VIDAL-NAQUET, *Journal de la Commune étudiante. Textes et documents. Novembre 1967 -juin 1968, op. cit.*, p. 199.

⑦ D. 74, 《Gaz de guerre!》, *ibid.*, p. 226.

“杀人犯富歇”辞职^①。

医学教授弗朗西斯·卡因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揭露警方使用了一种美军在越战用过的作战瓦斯。这种瓦斯“伤害人的肝脏和肾脏中枢，在试验室里高浓度的使用会使动物死亡”^②。这些材料立即被报纸和电台传播出去并被转载在大学里大量散发的传单中。

警察总署发表公报否认上述说法。总署长请来一位专家——市立试验室主任，并说明这些瓦斯与作战瓦斯毫不相干。他发表了一份详细的说明书，详尽介绍在拉丁区所用催泪弹的成分。市立试验室方面也声明“对动物和志愿者所做的试验表明警方星期五夜在巴黎使用的催泪瓦斯没有毒性，在通风条件下这种瓦斯不可能形成危险的聚集”^③。

当局否认在5月10—11日夜里有人死亡。针对有关大学生失踪的传言，警察总署署长下令进行调查并正式辟谣。他要求提供失踪者的确切名单。这份名单于6月5日由“索邦调查委员会”交给总署长。通过警方调查，“失踪者”在24小时内全部找到。

如果说警方在索邦和拉丁区的出现可以被看成挑衅，那么街头殴斗中主动使用暴力的却不完全是警察。警察面对的是一批擅长辱骂的年轻人，其中许多人显然很想干一仗。

在5月23—24日的第二个街垒之夜，警察遭遇非常坚定的示威者。他们在多处袭击警察，粗暴、过火的行为因此变本加厉。警署受到攻击，治安部队受到袭击，在治安部队内部流传着这样的传言：“一名摩托警察在一个废墟上摔倒，大腿骨折了。由于不能动弹，受到示威者袭击，并被示威者用他自己的枪在脑袋上打了一枪而毙命了。”^④这样，警察的报复心和恼怒愈加强烈了。

把警察比作“纳粹党卫军”、“法西斯”、“杀人犯”之类的口号使警察怒不可遏。他们中许多人是打过仗的。在发动进攻前和在进攻过程中，他们受到各式各样投掷物的袭击，使他们火上浇油。莫里斯·格里莫几年后写道：“发起进攻时，铺路石便劈头盖脸地砸过来，还有可能致重伤、致盲甚至致死的燃烧瓶和各种投掷物……不难想像在这种情况下警察们的情绪有多么紧张，他们必须忍气吞声，强压自己的怒火。因此人们更不难理解，当机会来到时，这些人便进入神

① D. 90, Mouvement du 22 mars, 《Contre l'État Policier, continuons la lutte》, *ibid.*, p. 242 et 243.

② Communiqué de l'AFP du 12 mai, *ibid.*

③ *Le Monde*, 15 mai 1968.

④ UNEF/SNE Sup, *Ils accusent*, *op. cit.*, p. 174.

秘的暴力天地。他们没有权力制造死亡,只好用殴打来代替了。”^①

但他们出手未免太狠了,这是不容辩解的:他们很野蛮,真正是在发泄,蓄意惩罚和糟践违法者,他们认为捍卫法律是自己的天职。在这点上基层警察往往表现得比他们的上司还狠。他们有些上司常扭过头去装没看见。

警察总署署长称博戎“毕竟不是奥斯维辛”^②。这么说是没有用的。他无法消除那些在铁丝网里面度过许多小时的人所描述的情景:“我们被圈在一个类似露天集中营的地方。从这一时刻开始,我发现电影《夜与雾》中所表现的集中营世界再现了。我们在这个场子里待了近8小时。我的未婚妻在到达一小时后被带向一座周围布满警察的建筑物。天下着雨,寒气袭人,我们饥肠辘辘,被堆在一块站着,无法坐下。又来了几辆车,一些受伤的人从车里出来,受到警棍的迎接。”^③一名吃过警察苦头的人声称:“看到政权使用一批卑鄙的人作为秩序的守护者,并且让他们保持这种卑鄙状态,真是令人寒心。起来造他们的反是理所当然的。”^④

1968年5—6月的暴力镇压和示威者的暴力行动并非一个谜团。在巴黎就有2000人受伤,其中200人受重伤。^⑤伤势种类有:骨折、眼睛和脸部烧伤、头盖骨骨折,巴黎有的人手被扯断,在索肖有人四肢折断……而且的确有人死亡。人们找到5个被打死的人:在巴黎一座街垒下找到一名年轻死者;在里昂一名警察分署署长死于5月23—24日夜;在索肖死了两名工人;6月10日在弗兰死了一个中学生。除索肖外,警方并未向示威群众开枪。除了这些与同警方冲突有关的死亡外,还有一人在竞选活动中死于阿拉斯附近,那是一个贴标语的共产主义青年成员,被拥护多数派的一个小组开枪打死。

在巴黎至少有两次险些发生悲剧。在5月13日的统一大示威中,一辆送一名受伤儿童去医院的警方救护车在丹非-罗施罗穿过示威人群。示威的秩序服务队为其打开一条通道,但其他示威者却进行阻拦。一名警察感到自己有危险,便朝天开了一枪以恐吓袭击者,他的同伴则通过电台求救。由于有秩序服务队负责保护警车,事态没有进一步恶化^⑥。

5月24—25日夜里,在第5区警署遭攻击时,停在入口处的警车全部起火。

① Maurice GRIMAUD, *En mai, fais ce qu'il te plaît*, op. cit., p. 168-169.

② *Ibid.*, p. 170.

③ Témoignage 480, UNEF/SNE Sup, *Ils accusent*, op. cit., p. 165-166.

④ *Ibid.*, p. 138.

⑤ Raymond MARCELLIN, *La Guerre politique*, Plon, Paris, 1985, p. 51.

⑥ Maurice GRIMAUD, *En fais ce qu'il te plaît*, op. cit., p. 185.

火势险些蔓延到警署大楼、烧死躲在里面的警察。当时曾有考虑，如果他们有生命危险，就命令他们携武器出来。一队警察及时赶到，驱散了示威者并清理了现场。^①

警方未能幸免于危机

收集到的关于镇压的目击证词给人的印象是：警察是铁板一块，那些极端的暴行是全体警察犯下的。但这种印象并不能概括事件中警察的反应。在那几周里，警察对反警宣传和舆论压力并非无动于衷。

曾发生过巴黎警察下班时被行人拦截的情况：“在科肖医院门口，一名年轻警察被一批大学生和医生围住。‘瞧你们都干了些什么……你怎么会去当警察呢？’……一名医生指着他的鼻子说：‘我受够了。人们不断给我送来被你们打伤的人。我的职业并不是给你们擦屁股啊！’那个警察面色惨白，无言以对。”^②

还有更令人难堪的情形：警察的家属也可能受到攻击和侮辱。在居民区和学校中，做警察的“妻子”或“儿子、女儿”都不是好受的事。指责和侮辱不断指向他们，孩子们还有可能被别的学生孤立起来。

五月运动也使家庭发生分裂。警察的孩子有的是中学生，有的是大学生。《新观察家》记者克洛德·鲁瓦在5月24日街垒之夜凌晨4时战斗结束时遇见“一名警察队长在奥德翁十字路口同陌生人交谈。他说：‘我有两个儿子在索邦大学。’”^③还有更令人痛心的情况：“一位宪兵司令站在他手下的前头，面对着示威者。他默默地流着眼泪。示威者中有他的儿子，他把拳头伸向父亲，嚷着：‘混蛋！’”^④

共和保安队成为镇压的象征，但参加镇压的并不仅仅是他们。他们丝毫不希望人们把他们混同于党卫军，也不希望把过火行为的责任完全推卸给他们。共和保安队的军官们通过其工会表示反对乱用“CRS”这个缩略符号，“他们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通过讲述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手下未曾干过的敲诈故事使他们名声扫地。”^⑤

人们甚至可以从卢森堡电台频道上听到 CRS 工会总书记发表的声明：“本

① *Ibid.*, p. 245.

② Philippe LABRO et l'équipe d'Édition spéciale, *Ce n'est qu'un début*, op. cit., p. 103.

③ Claude Ror, «La nuit du 24 mai», *Le Nouvel Observateur*, édition spéciale, n°185, 30 mai 1968.

④ Philippe LABRO et l'équipe d'Édition spéciale, *Ce n'est qu'un début*, op. cit., p. 103.

⑤ *Ibid.*, p. 106-107.

人十分激动……公共权力机构有可能让我的同志们使用危险的产品对付示威群众。他们毕竟只是示威者，而非可杀之人。”^①对此，还有待进一步澄清。

在有关5月24日镇压事件的目击证词发表后，警察工会联合会发表一份新闻公报：“对于所发表的那些有关治安部门人员对示威者和被捕的人犯下强奸、虐待和各种摧残行为的证词，本工会联合会的董事们说明：如果这些恶行得到证实，他们将不会袒护肇事者并会把他们移送司法机关处置。”^②

令警察尤其感到不舒畅的是，在运动初期政府命令他们进行镇压，现在却又推卸责任。从第一个街垒之夜开始，就已有明显的紧张迹象。警察不理解为什么等那么长时间才进行干预。当街垒一个个在拉丁区竖起的时候，进攻更加困难了。

蓬皮杜发表的“对大学生表示深切同情”并满足他们要求的谈话，在警察工会5月13日发表的一项公报中被认为是“对学生正当权益的认可和对由政府下令的警察行动的完全否定”^③。该公报推卸了警方5月3日介入索邦的责任，指出那次干预是应校长的紧急要求并在政府的命令下进行的。

这种慌乱的局面由于警察行业的诉求长期得不到满足而变得更加严重了。在各警察分署内部，开始散发传单和请愿书，声称警察不能接受扮演“小丑的角色”。在第五共和国历史上，警察罢工的念头第一次浮出水面。

“如果警察动摇了，国家就垮了”^④，因此政府要竭尽全力避免出现这种局面。政府总理在5月14日致国民议会的公报中对治安部队的冷静表示了赞赏。戴高乐则重操其军人腔调声称：“对警察该做什么就做，要给他们烧酒喝！”警察工会与政府的谈判和接触日益频繁。工会方面集中反映了他们的队伍在诉求问题上的不满。政府倒也不吝啬：满足警察的全部有关职业的要求。

在警察内部也存在一些颇有吸引力的小组织。5月18日，面对可能出现的挑衅，警察工会联合会向全体会员和同情者发出呼吁，要求他们“遵守工会纪律，不要响应任何挑衅性或不受控制的口号”^⑤。

5月24日，工会联合会要求公共权力机构“不要总是让警察与为自己权益而斗争的劳动者对立，否则他们将会把执行某些任务看做是严重的良心问

① *Ibid.*, p. 107.

② *Ibid.*, p. 117.

③ *Ibid.*, p. 100-101.

④ Maurice GRIMAUD, *En mai, fais ce qu'il te plaît*, op. cit., p. 189.

⑤ Cité dans *«Les gens d'en face», Miroir de l'histoire*, n°T 276, 1973.

题”^①。联合会还重申他们“忠于共和国的民主制度”：“警察不会为不尊重他们的制度效力，不管它是怎样的制度。”^②

面对警察粗暴行为的升级和主张强硬手段者发表的谈话，巴黎警察工会的代表于5月27日会见了莫里斯·格里莫，向他表达他们的忧虑。格里莫表示支持他们对付来自警察总署和政府内部主张极端手段者的批评。^③

警察远远不是68分子所描绘的那种漫画式形象。革共青联领袖阿兰·克里维纳在6月被捕时看到了这一点：“奇怪的是，那些身着制服、在两个月中被比作党卫军的警察竟对大学生鼓动者表现出一定的尊重。他们乐于讨论，愿意理解。克里维纳发现警察根本不是铁板一块。他的谈话对手曾痛苦地注视着这场运动，有时甚至受到震撼，对他们自己所扮演的僵硬秩序守护者的角色感到耻辱。……研究盖世太保的历史学家德拉吕分署署长主持了第一轮审讯。他和颜悦色，殷勤关切。他毫不掩饰地告诉对方，他更愿意在另一种情景中交谈。克里维纳不回答任何具体问题，两人很快就把话题转向政治问题：大学生、革命组织、共产党、戴高乐、改革、革命。革共青联的领袖真正感到惊讶：虽然他做的事如此之少，警方竟对他如此重视。”^④

警察总署署长莫里斯·格里莫

有一个人运动全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他就是负责维持首都秩序的警察总署署长莫里斯·格里莫。在政权内部，他的策略并非人人同意。面对强硬派，他在夹缝中跋涉。从运动开始到结束，他尽其所能避免发生流血悲剧。共和国多亏了他。

这位总署署长除职务外，与留下可悲记录的前任莫里斯·巴蓬毫无共同之处。格里莫是位文人和坚定的人道主义者。记者菲力普·亚力山大写道：“在人们的想像中，他主持着一个平静的部门；他利用冬天的夜晚在办公室里重温

① *Paris-Jour*, 24 mai 1968.

② *Ibid.*

③ Maurice GRIMAUD, *En mai, fais ce qu'il te plaît*, op. cit., p. 272.

④ Hervé HAMON, Patrick ROTMAN, *Génération*, t. 1, Les Années de rêve, Seuil, Paris, 1987, p. 577-578.

波德莱尔^①或阿波利奈尔^②的著作。”^③人们多次看见他在拉丁区与示威者讨论。

5月6日星期一，当首次冲突的消息传出时，他不带卫兵独自到现场同学生对话：“我在你们之前也是大学生。我自己也挨过警棍。你们有一天也可能成为警察总署署长。如果看到示威者阻拦消防队救火，你们会有什么看法？”^④还有一次他站在人群中与一位教授热烈地讨论大学生提出的问题。他写道：“人们是否能从我的声音、我的态度中感觉到我内心是同意不只一个这些批评的，但我难道能背叛我偶然担负的使命吗？”^⑤他坚持与全国学联和高教工会的负责人保持联系。5月7日星期二，人们看到他走在示威队伍前面同负责人直接谈判游行队伍应走的路线。在运动中，他经常独自一人走在首都街头，以便了解形势。

在巴黎所采取的所有行动都由总署署长及其班子集中统一领导和跟踪。在那几星期中，他们未能阻止警察出现许多严重的“污点”。但他们希望尽力使镇压不会造成血流成河的后果。进攻街垒时用的策略是：通过大量投掷催泪弹和队伍分组推进，以避免发生肉搏战。这样“既可以使对手有深刻印象，又可使警察感到他们自己是牢不可破的”。格里莫指出：“不要让他们在恐慌和刺激面前退缩。”^⑥但这种策略未能每次都达到预期的效果……

部队的总指挥部从属于市警察参谋部。在现场，机动宪兵和共和保安队的军官由负责干预的警察分署署长指挥。格里莫认为，由熟悉巴黎并能根据示威的反应随时调整策略，这种指挥方式是避免冲突以流血告终的因素之一。^⑦但人们对发生悲剧的恐惧感还是很大的——“手榴弹巨大而撕裂的爆炸声会不会被火器突突的连发声所掩盖？”^⑧

面对公布的关于警察暴行的目击证词，律师团与总署长进行过接触。虽然收集到的证词中有几个可能夸大了事实，但其数量和具体程度都足以证明其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

在与警察总署各级领导取得一致意见后，格里莫很快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① 波德莱尔(1821—1867)，法国诗人，作品有《恶之花》等。——译者

② 阿波利奈尔(1880—1918)，法国诗人，作品有《醇酒集》等。——译者

③ Philippe ALEXANDRE, *l'Élysée en péril*, 2/30 mai 1968, Fayard, Paris, 1968, p. 28.

④ Maurice GRIMAUD, *En mai, fais ce qu'il te plaît*, op. cit., p. 101.

⑤ *Ibid.*

⑥ *Ibid.*, p. 154.

⑦ *Ibid.*, p. 98-99.

⑧ *Ibid.*, p. 321.

总署向各分署派驻司法警察小组,以使得审问工作符合规则并避免滥加拘留。他还加派了由医生和急救护士组成的医疗小组,以便为伤者做检查:“至少这是官方的理由。我们脑子里还有一个想法:这些医生及其助手的存在可以打消一切毒打的念头。”^①他把主要的看守中心——博戎中心交由机关总稽查处负责,要求拘留的全过程都有一名分署长在场以便监督检查的方式。还设了一个信息电话台以便于有孩子在示威之夜未回家的担惊受怕的家长询问情况。

5月29日第二个街垒之夜,当警察的粗暴和越轨行动愈演愈烈后,他亲自致函所有警察。他写道:“在同你们中的许多人谈话之后,我知道你们绝大多数人都谴责某些做法。我也知道你们和我一样,一些谁也无法接受的事实发生了。”在回顾了警察受到殴打和一些“野蛮的侵害”后,他强调指出:“打击一个倒地的示威者就是打击自己、打击警察这一职业的形象。更严重的是殴打已经被捕并带到警署审问的示威者。我知道我说的这些话会被某些人进行不良的解读,但我也知道这些话是正确的,而且在你们思想深处也承认这是对的。”他以这样的话结束他的信:“我知道作为有良知的人,你们会完全支持我在做的工作,而这,除了在民族面前维护警察的荣誉外没有别的目的。”^②这封信没有得到所有人的好评,在政权内部有些人考虑让一个“铁腕署长”取代他。

几年后,警察总工会负责人热拉尔·莫纳特致函格里莫:“您致工作人员的那封令人赞叹的信将永远是一位首长所能给下属的最富人情味的一封。您要知道,在我的许多同事一步步地受到不确定性、怨恨和仇视困扰的时刻,您的信照亮了他们的心。”^③

事实上,格里莫必须面对要求尽快恢复秩序的种种请愿。每一次他都尽力避免火上浇油。5月18日,戴高乐一从罗马尼亚访问回来,便要求尽快让学生撤出奥德翁和索邦,并要求重新控制广电局。经总署长多次请求,总统只好给他几天宽限,以便其考虑清理奥德翁和索邦的最佳时机。格里莫先生实际上拖了一个月^④。

政府部长们要求格里莫派警察清理邮电中心、火车站和燃油库,他拒绝了,认为在总罢工如火如荼之际这样做不合适。

在5月24—25日的第二个街垒之夜的次日,乔治·蓬皮杜提到“明显的发

① *Ibid.*, p. 171.

② *Ibid.*, p. 342.

③ Cité par Maurice GRIMAUD, *Ibid.*, p. 276.

④ *Ibid.*

动内战的企图”并警告说“任何集会都将会用最强有力的手段立即予以驱散”^①。24日之夜过后3天,当局还是容忍了前往夏尔莱蒂体育场的游行队伍。警察总署署长之所以同意这次游行,是因为他知道全国学联在高教工会、民主工联的支持下丝毫不打算搞对抗,并已做出认真安排以避免发生对抗。蓬皮杜批准了,戴高乐最终也勉强同意了。这是政权最后一次容忍游行。

6月10日以后,在公共道路上的示威被禁止,警方在集会地点拦截了1000多人。在戴高乐派香榭丽舍大街示威取得成功之后,当拉丁区的暴力行动达到白热化、学生运动脱离了人民群众之时,内阁会议于6月12日采取了更强有力的镇压措施。

与68分子的断言相反,“警察攻克”被占领的索邦大学和奥德翁剧院的事并未发生。6月14日最后一批占领者撤出奥德翁时没有发生冲突,遵照总署长的承诺,警方未逮捕任何人——“我们看到第一批被驱赶的人走了出来,脸上带着睡梦初醒的迷迷糊糊的表情。都是些年轻人,可怜兮兮的样子。没有大学生,而是一些无业游民、摇滚青年、流浪汉和一些晕头转向的年轻女子。其中一个妇女哭哭啼啼地走出来,胸前紧紧抱着一个小提包。由于我禁止带走武器,所以我们的‘加丹加分子’就混在这支可怜的溃逃队伍中。我并没有把他们单独叫出来。再说,怎么能在一批可怜的家伙中间认出另一批可怜的家伙呢?让他们到别处再被吊起来吧。人们将不会说我搞了一次报复行动。”^②

撤离索邦时的情形也一样:“那是经典的守城军出城投降的样子。被围困者坚持警察的驱逐只是做做样子,他们要有尊严地从两列头戴钢盔但不持武器的警察队列中间穿过。这样就完事了。听到撤离消息时,拉丁区发生了几起殴斗事件,但不是太过分。两小时后恢复了平静。”^③

军队

在5月和6月的事件中,另一个问题不可避免地被提了出来:军队是否介入镇压示威和粉碎罢工?在学生公社和舆论界,关于军队即将介入的流言在扩散。每过一个冲突之夜,这种担心便更甚一层。5月24—25日夜的街垒战后,人们看到总理提及“明显的发动内战企图”。要走到什么地步呢?不是看到5

① Cité par Hervé HAMON, Patrick ROTMAN, *Génération*, t. 1. *Les Années de rêve*, op. cit., p. 500.

② Maurice GRIMAUD, *En mai, fais ce qu'il te plaît*, op. cit., p. 313.

③ *Ibid.*, p. 317.

月 27 日装甲部队已经在巴黎四周演习了吗？

在政权内部，的确提出了军队是否要介入的问题，但未达成一致意见。有些人主张采取强硬手段，在头几个街垒之夜后展开了一场辩论。有些人认为，军队介入不仅仅是最后的手段，而是应该立即实行。

但情况又一次显示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动用武装力量的决定权在政府手里。动用的武装力量由巴黎军区司令指挥，同时要征得警察总署署长的同意。在这种情况下，文职人员与军事负责人之间的合作将很微妙，因而包含很大的风险：军事单位拥有自己的独立指挥部和自己的手段，即武器。

国防部长梅斯梅尔——极左派曾经揭他当过外籍军团^①军官的老底——主张慎重，反对使用军队对付示威群众。如果不得已一定要用军队，那么首先应考虑采取什么具体办法粉碎总罢工。有些人主张用残酷手段保卫某些公共场所以减轻警方压力，或者考虑威慑示威者。这两种办法均未被采纳，因为失控的风险太大。从 5 月 13 日开始，军队便被限制离开军营，以避免同社会接触过多。

但在 5 月 23—24 日夜的暴乱后，军队介入的问题又一次被提了出来。乔治·蓬皮杜拒绝了：“我不会下令开枪的。”^②调宪兵装甲部队来震慑示威群众的可能性也被提到了，出于风险的考虑，军队和警察负责人都不赞成。军方曾一度考虑在总统府驻扎一支伞兵部队，但最后只将部队安置在巴黎军区所在地一个残废军人院里。几千名军人被派出去做些非军事辅助性工作，如清理垃圾、搞公共运输。有一支宪兵装甲部队借道大郊区的公路前往萨托里军营，这是军队进行的惟一一次“和平示威”。^③

军队直接干预的企图仍然存在，尤其是那些退伍军人，如第二装甲师或“莱茵与多瑙河”军团的退伍军人。他们通过各个联合会号召志愿者准备战斗，必要时拿起武器。退伍军人把他们的联络网全部调动起来，制定了计划。但在政治负责人的眼里，他们所提出的建议颇有民间游艺的性质^④。

戴高乐将军的女婿、巴黎军区司令德·布瓦西厄将军向国家元首建议，如果元首下令，他将在军区内组织一个志愿兵团去夺回索邦大学，但不一定开枪。他的建议被拒绝了。

① 外籍军团，过去法国用于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和本国革命的雇佣军队。——译者

② Philippe ALEXANDRE, *L'Élysée en Péril*, 2/30 mai 1968, *op. cit.*, p. 91.

③ Maurice GRIMAUD, 《L'État face à la crise 》, *Mai 68, les mouvements étudiants en France et dans le monde*, *op. cit.*, p. 72.

④ Philippe ALEXANDRE, *L'Élysée en péril*, 2/30 mai 1968, *op. cit.*, p. 279.

但在5月份,确实有一天,军队介入的问题以一个完全不同的理由再次被提上日程。那是5月29日,即总罢工大游行的那一天。政府并非认真考虑调动军队来对付学生运动,而是为了对付法共和总工会的活动分子,因为盛传有人企图发动暴力和武装的政变。共产党武装政变的“威胁”被看得比学生暴力行动严重得多。政府准备应对各种可能性。

那一天,总工会组织了十多万人的示威,要求成立“人民政府”。外省也举行了类似游行。总工会和法共要显示它们的力量,施加压力,以便实现与左翼联盟的团结,避免其与孟戴斯弗朗斯合作搞“第三条道路”式的方案。法共声明他们准备参加可能组建的政府,但丝毫无意以暴力夺权。

驻扎在巴黎四周的干预部队处于戒备状态。军区司令和警察总长都认为只有到最后时刻才可动用军队,他们不主张进行只能使局势恶化的干预。

19点总工会的示威队伍解散时,格里莫得到军区司令的通知,说他得到命令把警戒时间缩到1小时(即从下令到抵达机场的时间)。做出这一新决定并未征求格里莫的意见,他写道:“我不能不从这件事中看出对我的某种不信任,因为负责巴黎治安的是我,大家都了解我在动用武装部队问题上的立场。”^①同日,人们得知戴高乐将军失踪了。国家最高层弥漫着忧虑和恐慌。

共和国总统到巴登-巴登^②造访马絮将军的消息引起莫大担忧,连政府内部也不例外^③。虽然戴高乐本人在考虑各种可能性,但两人的谈话并未涉及准备军事干预问题:“这个问题没有提及。”^④国家元首后来自己说他“很想引退”^⑤。

马絮将军按他的一贯风格,也准备对付一切可能发生的事:“巴黎军区司令要准备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战斗,要采取一切手段将其消灭。要他让比雅尔当他的副手。不会发生热核战争的。至于驻德部队,我看是可靠的。如果发生冲突,他们的效率将取决于如何使用他们。部队的年轻新兵没有任何动静。两个团现已处于警戒状态。”^⑥如果仅仅取决于他,问题会以最快的速度解决。但马絮一个人不能代表法国全军,决定权不在他手里。“法国驻德部队是维持治安

① Maurice GRIMAUD, *En mai, fais ce qu'il te plaît*, op. cit., p. 284.

② 巴登-巴登,法国驻德部队司令所在地。——译者

③ 总参谋长、空军将军米歇尔·富凯站在梅斯梅尔一边,他曾打电话给马絮:“当心,将军,别干蠢事!”他担心驻德部队对巴黎采取行动。

④ Général Jacques MASSU, *Baden 68. Souvenirs d'une fidélité gaulliste*, op. cit., p. 103-104.

⑤ Entretien avec Michel Droit à la télévision, le 7 juin 1968.

⑥ Général Jacques MASSU, *Baden 68. Souvenirs d'une fidélité gaulliste*, op. cit., p. 108.

的后备力量。”^①马絮鼓励戴高乐回巴黎并重新掌控局势。

自阿尔及利亚战争以来,军队便无意参与政府和卷入镇压行动。它总是处于戒备状态,以防武装政变。尽管已经做了一些部署,但富凯将军说:“从来没有人要求我让部队出面干预,(虽然)各部办公室里有惊恐万状的人曾提出这种想法。”^②虽然在五月运动中主张采取强硬手段的不乏其人,但政府并没有听他们的。

无可挽回的局面没有发生

与被卷入运动烈火的青年所相信的相反,当局为避免悲剧的发生竭尽了全力。在国家最高层,大家都同样担心发生流血,为避免发生不可挽回的行动而操心。

大学生造反是件新鲜事。让现有政权伤脑筋的是示威者的年龄和社会地位。在5月10—11日夜晩,负责人在派警察清除街垒之前犹豫了很久。路易·约克斯的一名助手说:“困扰我们的问题是示威者很年轻。我们对放手让警察去对付那些不到15岁的孩子们感到十分恐慌。正因如此,我们让谈判拖了很长时间。我们都默默地希望当凌晨1点钟声响时,最年轻的那些示威者能回家去睡觉。不要忘了他们在街上已经待了整整8小时。我们自言自语道:‘愿上帝让他们感到饿了或困了。’”^③

五月运动使家庭和不同代人之间产生了分歧,尤其是在右翼。政治人物也未能幸免。示威者中有许多是部长和高级官员的孩子。5月24—25日夜,“每位部长都在自问,此时他的儿子或女儿是否正在街头面对共和保安队”^④。有人甚至说在警察分署和博戎,警察把他们认得名字的要人的孩子单独放在一边,以免出现“纰漏”^⑤。

后来的内政部长、很快成为戴派黑马的雷蒙·马塞兰对青年表现出一种家长式的理解,希望将他们从颠覆活动中拯救出来:“20岁,这是最慷慨忘我、也是最轻率的年龄,人格最易受损害,同时也绝不妥协。这个青少年期没有定性、迷迷糊糊、忧心忡忡,一些觊觎权力的人要笼络他们、蛊惑他们、牺牲他们……但

① *Ibid.*, p. 128.

② Cité par Jean LACOUTURE, *De Gaulle. 3. Le Souverain 1959-1970*, Seuil, Paris, 1986, p. 692.

③ Philippe ALEXANDRE, *L'Élysée en péril*, 2/30 mai 1968, *op. cit.*, p. 63.

④ Claude ROY, «La nuit du 24 mai», *loc. cit.*

⑤ *Ibid.*

他们必须懂得,与他们的口号相反,权力在票箱里而不在大街上。”^①这样的言语免不了被中学生和大学生看成难以接受的、过时的家长作风的表现。

政府里有不少人是师范毕业生或助教,蓬皮杜总理就曾是师范生,是《法国诗选》一书的作者。戴高乐将军以其演说和回忆录也跻身作家行列。对他们而言,大学生不是敌人,也不是像其他对手一样的对手。在那个时代,他们仍然被视为未来的民族精英并在老百姓中享有一定的好名声。内政部长克里斯蒂安·富歇虽然主张强硬,但也希望能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历史悲剧重演:“我惟一关心的是避免流血事件的升级。我记得1934年2月6日:我那时是大学生。现在我又看到了死人、伤员和震撼巴黎的恐慌。当一次暴动(如5月6日星期一那次)持续15小时的时候,人们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结局。当然,我可以立即制止,但那样的话,枪声将响彻整个欧洲。”^②过后不久,阿兰·佩雷菲特对派警察进入中学的可能性表示担忧:“万一发生流血,那将十分恐怖。”^③

在整个运动过程中,蓬皮杜起了关键作用:他果断地寻求安抚方式并尽一切努力避免冲突升级。第一个街垒之夜过后,人们看到他“对大学生表示深切同情”。在5月14日对国民议会的讲话中,他竭力表示理解造反的理由。直到最后他都一直把“大学生”同“暴动分子”区别开来。他重开索邦大学的决策和他的灵活政策未能在政权内部得到一致同意。然而,尽管在策略运用上存在分歧,但主要负责人都认为,把学生公社镇压在血泊中是不可想像的:“戴高乐会向大学生开火?做这种想像简直是疯了!”^④

在同一时期,有些国家采取另外的方式镇压学生运动,而在法国,虽然进行严厉镇压并有不少越轨行为,但事实上并未像美国、墨西哥或日本警察那样向示威群众开枪。不能不看到这里也有“法国的例外”——与大学生公社贴出的标语相反,戴高乐并不等于西班牙的佛朗哥、葡萄牙的萨拉查或希腊的帕塔科斯。法国不是独裁国家,其领导人也根本不希望它变成独裁国家。

历史不能重演

在历史上,巴黎也有过暴动的起义,那时警察和军队都开了枪。1848年,在

① Raymond MARCELLIN, *L'Ordre public et les groupes révolutionnaires*, Plon, Paris, 1968, p. 73 et 76.

② Philippe ALEXANDRE, *l'Élysée en péril, 2/30 mai 1968*, *op. cit.*, p. 28.

③ Cité par Maurice GRIMAUD, *En mai, fais ce qu'il te plaît*, *op. cit.*, p. 220.

④ Louis JOXE, cité par Jean-Raymond TOURNOUX, *Le Mois de mai du général*, *op. cit.*, p. 65.

首都街头布防的部队开了枪，打死 35 人；接着就发生了革命。1871 年巴黎公社受到残酷镇压：加斯东·德·加利费将军的凡尔赛军入城后，草率地枪杀了所有被捕的人；战斗过后进行了最大规模的屠杀。那逃脱出来的人被流放去做苦役。

历史上有一个时期，人们用军刀和步枪来解决社会冲突。罢工和工人示威长期被认为是起义行动。1891 年 5 月 1 日，在戒严的北部城市富尔米，军队向示威人群开枪，打死 10 人。在南部，1906 年 6 月 19 日，士兵向造反的葡萄种植者开火，死 5 人，伤 20 人。1908 年 6 月在德拉韦尔，两名罢工者被打死，10 人受重伤；在维尔纳夫-圣-乔治市，军队开枪打死 4 人。

在本世纪，共和国也曾镇压过极右势力：1934 年 2 月 6 日，警方开枪向示威者反击，造成 14 人死亡，645 人受伤。在较近的历史上，1962 年 3 月 26 日在阿尔及尔的伊斯里街，负责维持治安、对付秘密军队组织分子的部队向示威者开枪，打死 49 人，伤 121 人。

还有 1961 年 10 月 17 日夜对来巴黎和平示威的阿尔及利亚劳工的野蛮镇压：警察殴打示威者并把他们投进塞纳河；人们看到有 200 多人死亡，塞纳河上漂着具具死尸。……还有 1962 年 2 月 8 日在沙罗纳举行的反秘密军队组织的示威中有 8 人死亡。那时的警察总署署长是莫里斯·巴蓬。

1968 年 5—6 月却未能发生任何类似事件。虽然镇压过程中发生过许多过火行为，但事实上冲突并未导致大量流血。那时经常有人提出这样的说法：“比物古一座由工人修筑的街垒可能受到机关枪扫射，一座大学生的街垒被用瓦斯和警棍端掉。”^①在索肖两个工人的死亡更证实了这种说法。法共和总工会也在反极左的斗争中提到此事，而且戴高乐政权也的确准备派军队对付可能的共产党威胁。但这些都是无稽之谈，因为长期以来工人早就不再搞街垒了，法共也不再相信起义了。

一些活动分子把他们未能实现的革命希望寄托在大学生造反上，但大学生公社根本无意向资产阶级做殊死的斗争，对夺取政权也不感兴趣。在一种前所未有的又难以捉摸的形势下，历史的幽灵再次出现了：冷战的反共幽灵和革命的幽灵。

60 年代末的历史形势是不同寻常的。昔日的血腥暴动，二次大战的恐怖，阿尔及利亚战争时的镇压、残忍和屠杀都还停留在人们的脑海里，但国家毕竟进入了新时代。它结束了殖民战争；阶级斗争虽然尚未消失，但已不再是所谓

^① Claude Roy,《La nuit du 24 mai》,loc. cit.

“你死我活”的殊死斗争^①。法国实现了相对平和的社会关系，当权的精英和绝大多数百姓一样，丝毫不想开倒车。

在1968年5月和6月，虽然示威者的暴力行动和当局的镇压都确有其事，但彼此都无意杀害和粉碎对方。这反映了民主社会新纪元的开始。在民主社会里，群众采取一定形式的暴力表达方式必须有不得超越的界限。警察总署署长莫里斯·格里莫很善于抓住这种矛盾：“在5月激情的气氛中，街头的冲突如同一场务必通过暴力来举行的仪式。由于这种暴力制约并代替了杀人的愿望，所以变得更为激烈。我不相信这种不同寻常的现象是可掌控的。我坚信，暴力是我们双方都拒绝杀人而付出的代价。”^②

① Raymond ARON, *Les Désillusions du progrès*, op. cit., p. 37.

② Maurice GRIMAUD, *En mai, fais ce qu'il te plaît*, op. cit., p. 169.

八、是革命的一代吗？

五月运动使大批的革命派别浮出水面。警方对这段历史有一个说法，后来又被雷蒙·马塞兰和法共加以发挥。这种说法使人相信这些革命派别在运动中起了中心作用。对极左派的这种看法实际上过高地估计了它在运动中的影响，并掩盖了它内部不可避免地发展着的对立。

在五六月份，几十万人拥进各种大型集会和各行动委员会，但这些参加都无法在有关革命活动分子的分析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公众舆论眼里，学生运动就是以三巨头联盟——科恩-本迪特、雅克·索瓦若和阿尔·热斯马尔——为代表的。他们从运动一开始就手挽手地出现在示威队伍中。这些“学生运动领袖”自己也是被事态的发展拖着走的，扮演了他们始料不及的角色。

五月运动中提出的一些诉求其实并不符合所谓新列宁主义派别（因为他们颇像按列宁的理论建立起来的政党雏形）所制订的蓝图。更有甚者，那些诉求否定了传统的斗争方式。但随着大学生公社的落潮和失败，这种斗争方式重又占了上风。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正是为了使极左派别得以恢复元气。不过它还是受到打击，这种打击将继续悄悄地呈现出效果。

反对先锋队

直接针对革命派别的镇压行动是在6月12日开始的：取缔“3·22运动”、托派和毛派组织，驱逐德国社会主义青年电台驻巴黎的人员和参加运动的外国人。

雷蒙·马塞兰于5月底被任命为内政部长,取代克里斯蒂安·富歇。他大肆宣扬“国际阴谋”论,声称有地下“乐队指挥”在操纵。在其他许多国家也同时发生学生造反,示威规模之大和次数之多以及与治安部队发生的冲突似乎使马塞兰的论断显得真实可信。秘密机构和警方将努力搜集一切可能的阴谋迹象。但他们到底发现了什么确切的证据呢?

各小派别毫不掩饰他们的信仰和榜样。马列共青联的负责人和成员多次去过中国,中共正式承认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PCMLF)。该党公开炫耀中共的承认并经常派代表团访华。古巴模式也有其信徒。一些首领和活动分子曾访问古巴并宣传哈瓦那的革命理论和第三世界主义。在大学生中根基很深的革共青联参加了第四国际的会议并与鲁迪·杜茨克的德国社会主义青年保持联系。德国社会主义青年的小部分核心成员和一些持异见的美国人就生活在巴黎。在革命大学生中,本国和外国的活动分子互相掺杂在一起。

国外向革命组织提供援助不是凭空捏造的。这种援助有时是直接或间接给予其组织和对其宣传工作的经费援助:转让资金、提供减价出版物等等。但这种援助“更多是为了维持它们的生存,而不是帮助其发展”,所提供的款项“主要用于填补这些运动的周期性财政亏空”^①。所有这些事实都被内政部长马塞兰加以夸大和歪曲,因为他把反对“国际颠覆”作为自己的战马。他的“国际阴谋”强迫症表明戴高乐政权对所发生的事情一窍不通。

五月运动暴露了强烈表达的新诉求与现存政治体制之间的巨大落差。运动之所以排斥国家机构和政党(或者更确切地说的不感兴趣),首先是依据“大学信息归纳中心”^②的一份调查报告:“最近的事件反映了我国体制的政治真空。现存的议会结构的传统并不能使个人意见得到真正的表达……现有政党内部的等级制度、纪律和官僚主义,领导人与执行者之间关系问题,都是学生运动所反对的。过度的集中使人无法表达自己的意见,这也是他们不满的地方。至于传统的意识形态,即使它还存在,那也是过时和僵化的了。这一切导致的结果是:现存的政党中没有一个能代表要求改变单调的法国政治生活的潮流。”^③

大学生公社的行动者们似乎是在同一种思想的指导下走到一起的:任何政治和工会组织都无权将五月运动据为己有;“我们的运动没有一个带头的领袖,

① Maurice GRIMAUD, *En mai, fais ce qu'il te plaît*, op. cit., p. 107.

② Créé par L'UNEF et le SNE Sup.

③ CENTRE DE REGROUPEMENT DES INFORMATIONS UNIVERSITAIRES, 《La contestation étudiante et les élections》, Paris, 17 juin 1968, reproduit dans *Quelle université? Quelle société?*, op. cit., p. 56-57.

这正与运动的性质相吻合”。“索邦学生——工人行动委员会”的一份材料声称，“问题不在于知道谁是我们大家的头儿，而是大家如何自己组成一个统一的头”^①。

当时被总工会和法共斥为“空洞方案”的工人自治思想正取得始料不及的成功。“3·22运动”的活动分子、境遇主义者和众多的托派分子赋予它革命的意义，要根据工人委员会的模式组建与资产阶级国家相对立的政权。统一社会党的大学生也倾向于这一方针，但并不因此而反对选举的前景。统一社会党提出的口号是：“大学生权力——工人权力——农民权力”，而其“大学属于大学生”、“工厂属于工人”的口号则经常被别人接过去。实际上他们对工人自治的意义和影响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工人自治的思想集中反映了对现行体制和等级制度的否定，体现了对直接民主的向往。

境遇主义者和“3·22运动”充分代表了这一新的革命情结，而新列宁主义派别和传统的无政府主义都不具备这种情绪。前两个派别的作用不能从其人数的多少、而应从其所代表的思想去衡量。他们的思想呼应了一部分青年学生过激的叛逆性。

境遇主义者对新列宁主义进行毫不容情的批判：“死灰复燃的布尔什维克分子在各个极左小集团中表演着战斗的滑稽剧，他们只是历史的残渣余孽，注定是没有前途的。”^②在他们眼里，这些小集团是大学生中的官僚主义和政治秀的一部分。“工人委员会绝对权力”的前景要求尽快把它们清除出去，境遇主义者要“对列宁主义的组织理论作殊死的斗争”。^③

“境遇主义国际”拥有数百名同情者。许多疯人派接受其思想，但不参加其组织。他们反对全国学联和新列宁主义组织，而后者则认为他们是些不负责任的人。他们出现在并介入被占领的索邦大学，从那里发生“立即占领全国所有工厂并组织工人委员会”^④的号召，散发了几十万份他们发表的文章。

“3·22运动”是一个广泛而灵活的组织，懂得超脱于小集团的争吵之外，把政治化和非政治化的大学生聚集在一个具体的行动目标下。其首领科恩-本迪特不仅攻击列宁主义，也攻击领导、等级、专业化等概念。布尔什维克党是旧世界的一部分，“我们表示异议的，不是组织起来的必要性，而是革命领导是否必

① COMITÉ D'ACTION ÉTUDIANTS-OUVRIERS,《Nous continuons le combat》, in Alain SCHNAPP, Pierre VIDAL-NAQUET, *Journal de la Commune étudiante*, op. cit., p. 588.

② Mustapha KHAYATI, *De la misère en milieu étudiant*, op. cit., p. 26.

③ *Ibid.*, p. 28-29.

④ Cité par Jean-François MARTOS, *Histoire de l'Internationale situationniste*, op. cit., p. 231.

要,政党组织是否必要……活动分子不是、不会是、也不应该是领导。”^①政治觉悟不是由自称先锋队的任何团体从外部带来的,而是通过历练和在斗争中得到的。

组织只有在服务于斗争、便于斗争并在社会各个领域都开展斗争的条件下才有意义。“谁也不能代表谁”^②,组织和运动之间、“内部”和“外部”之间的界线应当打破,这是结束宗派主义的条件。任何革命组织都应不断自我否定,才能避免僵化和官僚化。科恩-本迪特还说:“我们要求并继续为争取被取缔的极左组织合法化而斗争,这不为别的,而是为了让革命组织自己加速自己的解体和崩溃。”^③

他们在批判传统组织形式的同时,提倡一种反对忠诚思想和牺牲精神的斗争风格:“要在实践中消除犹太-基督教义的诱惑,诸如忘我、牺牲之类。要懂得革命不过是一场游戏,在这游戏中大家都需要玩儿。”^④革命就是要在“此时此地”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你要找到同女朋友的新型关系,用另一种方式去爱,要拒绝成家。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跟别人在一起。你是为了自己而在‘此时此地’闹革命。”^⑤

然而,在随后的几年里,想以各自的方式把享乐主义和游戏与革命相结合的两大组织都销声匿迹了。“3·22运动”被解散并不再重建,其享有崇高威望的领袖科恩-本迪特被禁止在法国居留,回德国生活和战斗去了。

拥有众多崇拜者的“境遇主义国际”,由于辞职、开除和各式各样的互相辱骂而酿成内部危机。著名杂文《论大学生的贫困》的作者穆斯塔法·凯亚蒂加入“巴勒斯坦解放人民民主阵线(FPDLF)”后,于1969年9月辞职。同样很著名的《青年一代实用生活知识汇编》的作者拉乌尔·瓦内泽,号召把境遇主义的批判矛头指向工人群体,因未能得逞,于1970年11月辞职。他认为过去10年境遇主义的活动是失败的。《戏剧社会》的作者、理论家居伊·德博尔认为“境遇主义国际”有加入“革命戏剧”的倾向,因此没有必要存在^⑥。

这两大派别的解散并不意味着它们所代表的带有极端自由主义内涵的新

① Daniel COHN-BENDIT, *Le gauchisme, remède à la maladie sénile du communisme*, op. cit., p. 262 et 264.

② *Ibid.*, p. 268.

③ *Ibid.*, p. 267-268.

④ *Idid.*, p. 267.

⑤ *Ibid.*, p. 270.

⑥ Cf. Jean-François MARTOS, *Histoire de l'Internationale situationniste*, op. cit. p. 265 à 274.

课题消失了。恰恰相反,这些课题将会更在更广的范围内重现并扩散。从中受益的并非业已分裂且处于可数地位的传统无政府主义组织。五月运动过后,无政府主义运动内部爆发了矛盾,分裂成许多小派别。极端自由主义思想也渗透到大学、中学生中间,这股潮流在五月运动后的几年时间里以文化的形式广为扩散。

如何理解五月运动

就在五月运动进行的过程中,新列宁主义各不同派别间的争吵和竞争从未间断过。每个派别都按自己设想的框架去看待运动、开展宣传并发展成员。新列宁主义分子对运动中出现的新现象完全视而不见。“中学生行动委员会”的托派中学生积极分子罗曼·古皮声称:“那是我们多次政治会议产生的必然结果。几个月来,我们都在学习十月革命,学习卢森堡、列宁、托洛茨基、阶级斗争、总罢工……整个过程在我们看来都很正常。我们将继续努力工作。还有比从理论过渡到实践更了不起的事吗?……我从未去过被占领的奥德翁剧院。我也不去注意那些招贴画和涂鸦。这不仅是革命的热身阶段,而且我们在这个时期内要加强自己的组织。因此我们才对其他派别展开大规模的斗争,以夺取运动的领导权,控制‘中学生行动委员会’。”^①

在新列宁主义派别中,克里维纳领导的托派组织革共青联在大学生公社中起着重要作用。从运动开始直到结束,它都积极参加并拥有一支维持秩序服务队,与全国学联的服务队一起管理大部分示威活动。它的活动分子正在各“大学占领委员会”中表现积极活跃,在各大集会和各种行动委员会中周旋。……革共青联是面向造反青年的一个组织,其干部在公众场合发表讲话和进行政治分析都很轻松自如,组织能力也很强,这些都给年轻的政治新手留下深刻印象。尽管他们那种好为人师的态度也引起一些不满,但在大学生群体中拥有一批稳定的听众。

植根于大学生群体中的另一个托派组织是“革命大学生联合会”(FER,以下简称革大联——译者)。它附属于共产国际组织(OCI)。革大联也出现在运动初期,并拥有一支军事化管理的秩序服务队。该组织做了大量宣传工作和在大学生群体中维护行动利益的工作。但它的宗派主义作风和不断指责其他组织的做法给自己招来了实实在在的敌意。

革大联指责“3·22运动”是“小资产阶级”运动,企图破坏学生与劳动者相

^① Romain GOUPIE, dans son film Mourir à trente ans.

结合的方针,革大联声称惟有它才是这一方向的真正代表并会将它搞好。在第一个街垒之夜,革大联加入示威队伍后号召示威者离开街垒,指责站在示威者一边的“3·22运动”和革共青联领导人不负责任:“这些小资产阶级不从学生的利益出发,不提与劳动者结合的问题,不提单一阵线问题,而去煽动学生撬起铺路石,用它们自己的话来说叫做‘不挑衅地撬’。”^①

和共大联一样,革大联的活动分子离开拉丁区时也号召学生与劳动者相结合,并提出一个奇怪的口号:“50万工人进拉丁区。”其领导人夏尔·贝尔竟毫无顾忌地声称其组织在发动运动中起了关键性作用:“如果你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索邦大学5月3日的斗争完全不是自发的。几年来,革命大学生就一直不倦地指出富歇计划和国家第五计划意味着什么。几个月又几个月以来,我们在全国学联内开展斗争,以便组织一次大学生和劳动者反对戴高乐及其共和保安队的大游行……这些因素在成千上万的学生心中开花结果了。”^②他的“50万劳动者进拉丁区”的口号足以迫使斯大林主义的领导们同意5月13日的示威。革大联毫无调侃之意地声称是它对“大学生群众运动实行了政治领导”。^③

至于马列共青联的毛派学生,他们开初收到不参加拉丁区示威的命令。该组织领导人恰如其分地提出“社会民主党阴谋”的论断,认为托派分子和全国学联都参与其中。这一阴谋就是剥夺工人阶级的先锋作用,使它接受小资产阶级学生运动的摆布。当与警方的冲突不断加剧时,马列共青联发出一项呼吁:“离开我们无所作为的资产阶级社区,到工厂和平民区去与工人阶级相结合。”^④

5月13日示威时,马列共青联大量散发宣传材料,反对“反人民的、制造失业大军和贫困的戴高乐政权”,主张成立“人民阵线政府”。在揭露“社会民主党阴谋”中还出现了新因素:据说法共和总工会也陷入这个阴谋,其目的是“把工人阶级变成由大资本中的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小资产阶级联盟的补充力量。”^⑤这一观点在该组织内部掀起一阵激烈的波澜。一些毛主义者抑制不住一时的冲

① *L'Étudiant révolutionnaire*, n°7, juin 1968, cité dans *L'Insurrection étudiante 2-13 mai 1968. Ensemble critique et documentaire*, Union générale d'édition, Paris, 1968, p. 475.

② Charles BERG, membre du Comité national de la FER, dans *Combat* du 17 mai 1968, cité dans *L'Insurrection étudiante 2-13 mai 1968. Ensemble critique et documentaire*, *ibid.*, p. 476.

③ *Ibid.*, p. 478.

④ 《Et maintenant aux usines!》, cité par Patrick KESSEL, *Le mouvement maoïste en France*, 2, Union générale d'édition, Paris, 1978, p. 43.

⑤ *Servir le peuple*, 13 mai 1968, cité dans *L'Insurrection étudiante*, 2-13 mai 1968. *Ensemble critique et documentaire*, *op. cit.*, p. 488.

动,从第一周起就加入拉丁区的示威队伍,并很快后来居上,参加了占领大学的活动,同“3·22运动”的同志们一道参加5月24日的第二个街垒之夜以及6月份在弗兰的冲突。就是在那里,他们的一名活动分子吉尔·托坦被水淹死了。

还有其他一些组织,如“工人之声”(托派,后改名“工人斗争”)和法马列共(毛派)也支持学生的斗争,但它们在大学中的影响微乎其微。

所有的新列宁主义组织——不论是托派还是毛派,也不论是否直截了当地支持学生运动——都在做一篇相同的文章,即不断地号召与工人阶级的斗争相结合;每个组织都自封为工人阶级的最正确的代表。这样他们就能使学生们总是觉得自己还做得不够,对这次造反的意义还认识不足。

朦胧的极左三极

五月运动过后的极左派也远非清一色的。它像是一些有组织的派别、各种不同的潮流的心态混合而成的一个朦胧体。虽然大家都自称革命,但它们各自赋予这一词汇的内涵和意义却各不相同。它们在面对镇压时所表现的团结丝毫未能减少它们之间存在的分歧,也未能消除在运动过后愈演愈烈的矛盾和论战。这一朦胧的极左派似乎是围绕着三大极而组合的:绝对自由文化极、新列宁主义极和工人自治极。

绝对自由文化极认为五月运动首先是一场彻底否定发达社会生活方式、价值观和体制的“文化革命”。其活动分子以幽默和冷嘲热讽的形式把反伦理主义的斗争置于中心地位,认为自由地表达主观意志和愿望是推翻社会秩序和一切体制的主要武器。他们偏爱的课题是:性解放、否定传统教育方式、肯定在各个领域特立独行和叛逆的行为。他们的愿望是“改变生活”,而不要等待革命的“伟大夜晚”的到来。要把5月“文化革命”进行到底,从个人的愿望出发去试验新的行为与生活方式。这一极没有严谨的组织结构,它声称要过另类的生活,其主张主要是通过几份杂志来表达,如:《剖腹周刊》、《现在时》、《一切!》等等。它分裂成许多小组和支脉,按不同的专题组合,如妇女解放小组、同性恋小组、反精神分析小组、学校或环境小组,等等。

新列宁主义极是极左组织(托派和毛派)的一极。它认为只有通过阶级斗争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较量才有意义。它规划的前景是用革命手段夺取国家政权,建立由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领导的新社会。这一极的活动分子不断号召开展阶级斗争,指责工会和传统左翼政党的态度。组成这一极的各个组织都想以自己的方式领导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斗争,要适当按照十月革命的

模式组成必要的先锋队，以领导革命进程。

新列宁主义一极本身也是支离破碎的。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等等的信仰，对形势与任务的不同分析和判断，都导致不停的争吵和不断的分裂。重组和分裂在五月运动后更进一步发展。

从1968年秋天开始，这一极内出现了一股新潮流，即所谓“自发的毛主义”，其组织名叫“无产阶级左派”，《人民事业报》是它的机关报。这一派明确否定列宁的先锋队理论，试图把产生于五月运动的反专制斗争、毛泽东主义和阶级斗争拼凑成一个奇特的大拼盘。自发毛主义者鼓吹群众的自发性，不加区别地一概肯定一切形式的强硬做法和暴力斗争，并搞了一些所谓“样板行动”，十分引人瞩目，而且引发了镇压的加剧。

最后是工人自治极，其主要代表是统一社会党。它朦朦胧胧地试图将改革和革命一并进行。其社会改造计划是将开展人民斗争（要求劳动者在斗争中掌握自己的命运）与同其他左翼政党结成选举联盟相结合。自1964年成立以来，这一方针在党内造成矛盾，而在五月运动中更加激化了。毛派和托派的极左理论在统一社会党内得到发展，从而加强了在大学生中影响力较大的那些革命派的力量。这些派别援引托洛茨基主义、工人委员会主义和毛主义，不久，便在该党内部形成独立动作的派别。

调和改革与革命的事业很快便告吹了，导致统一社会党内部分成两派：一派在米歇尔·罗卡尔的带领下于1974年并入社会党；另一派加入新列宁主义一极，同时保留自己的特性。

除上述三大极外，还有一些人数极少的派别。它们反对列宁主义的组织观，主张产生于20年代德国的工人委员会主义，希望在工人阶级内部产生的，独立于政党、工会和新列宁主义极左派的自治潮流做出贡献。它们主要透过《五月手册》^①杂志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时进行大量的调查，提供诸多与工人阶级斗争相关的信息。

在许多人看来，五月运动是对传统斗争方式否定，而运动结束后，新列宁主义组织却从中取得好处，开始了它的第二青春。这些组织受到的重视和争取到的听众大大超过它们原先的雄心。大批非政治化的的大中学生涌进它们的行列。这些学生梦想着在不远的将来就有“伟大夜晚”的到来。

然而，五月运动刚一结束，“果实就生虫了”，“极端自由文化”派在政治化的派别、新列宁主义派和统一社会党中扩大着自己的势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

^① Le n°1 des *Cahiers de mai* Paraît le 15 juin 1968, à l'initiative d'un groupe de militants de Nantes.

种影响越来越难以遏制。许多政治组织的内部矛盾斗争都可以用这个原始矛盾加以解释。

先锋队的第二青春

对于广大中学生来说，五月运动是一次“大的洗礼”。他们被卷进欢乐与友情的漩涡，这使他们兴高采烈，感觉自己成了每天都在创造历史的演员。这种感受久久挥之不去。

警察的越轨行为引起愤慨和怒火，特别是在那些未曾经历战争和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时的镇压行动的青年当中。警察的镇压对于那些直接受害者并未产生预期的效果：“结果是，在警署和博戎度过的 24 小时并未‘使我们得到教训’，而只能制造和加深不理解甚至仇恨。警察工会在其公报中对此有所抱怨。”^①很明显，镇压和 6 月选举中右翼的胜利说明学生运动不可能单独改变社会。正因如此，那些怀着大学生公社乌托邦梦想走上政治之路的年轻大中学生怎么可能不受革命派别的吸引呢？

这些派别于 6 月份被政府取缔。这反过来证明了它们在运动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虽然取缔措施使它们暂时受到打击，但却促使同情它们的潮流得到发展。在大学生中，它们通过反镇压的声援行动取得广泛同情。它们被取缔了，但在知识青年中的影响都大大加强了。

革命的理想从此吸引着千千万万的大学生。各极左派别都自封为把革命理想坚持到底的组织。在最激进的青年中，那些在 1968 年 5 月大辩论和共同斗争中尝到甜头的青年希望自己的诉求能在这些派别身上得到政治答案。从此一切都有别于从前了，那些在五月运动前就已政治化了的兄长们会在那儿培养和管理他们。

年轻的“68 分子”不像极左派骨干那样有经验和受过政治训练。后者有现成的理论、纲领组织和行动的方案。那时在学生群体中，读书还是很多的。各个派别都有自己的“新闻桌子”，人们可以从那里获得革命经典著作、纲领和极左组织五花八门的小册子和文章。许多被五月运动激起热情的青年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东西。事实上，正如无数目击证词所显示的那样，加入这个或那个组织，并不是在各个不同“革命纲领”中做理性选择的基础上做出的决定。最常见的情况是，这种选择是建立在感情基础上的，或者是出于对在大学和中学邂

^① 《Témoignage 424 d'un élève professeur》，UNEF/SNE Sup, *Ils accusent*, op. cit., p. 170.

逅的活动分子的友情甚至爱情的考虑。

极左派别将青年吸引到其诱人的计划中,从而使青年的造反顺理成章;总罢工又使得对运动做出经典的阶级斗争的解读有了依据。至于大学生公社与工人阶级之间为什么有隔阂,最简单的解释就是领导工人运动的组织是官僚主义或修正主义。总之,相对于行动而言,理论上的引经据典和多少有点儿诡辩的政治分析都显得无足轻重了。

极左派还为青年造反指明一条出路,那就是把生存与政治笼统地结合起来。革命的目标就是这一代人对五月运动的理解,也很快成为一条救世的诺言:一旦社会的热度下降,便从头再来一次。

对于那些被运动搞得眼花缭乱的大中学生群众来说,五月运动还会再来一次是显而易见的事。过一年又会自发地起来,现在就要为此做好准备。看来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革命进程的发展,新的创举将在社会各条战线展开。各“中学生行动委员会”宣布要修筑“新的街垒”,并声称:“请愿和严正抗议的时代已经过去^①。面对只想维持现状的垂死的社会秩序,我们要不停歇地以议会外群众行动对付之。”^②

行动委员会认为,大学生的斗争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指明了和平与议会的合法斗争并非惟一的斗争方式”^③。这些新颖的斗争方式应扩大到整个社会:“我们要成为不断进行宣传鼓动的委员会,要使新的行动方式深入人心,从自发的暴力,过渡到有准备有组织的暴力。”^④

这种积极的战斗精神给人一种常备不懈的感觉并成为运动期间所经历的紧张生活的替代品,它以想像的形式使已经回落的群众运动得以延续。

革命终于有了可能

革命分子们相信,一个不可逆转的进程开始了。科恩-本迪特在运动过后说:“我们的敌人因我们自己的弱点而强大……作为资产阶级民主局限性的俘虏,警察也好,军队也好,司法也好,都不足以阻挡革命的进程。”^⑤

《五月手册》认为,重要的问题是“汇集所有已表达出来的思想,总结已经经

① COMITÉS D'ACTION LYCÉENS, *Les Lycéens gardent la parole*, *op. cit.*, p. 13.

② *Barricades*, journal des CAL, n°7, juin 1968.

③ 《Les comités d'action》, *Partisans*, mai-juin 1968, n°42.

④ *Ibid.*

⑤ Daniel COHN-BENDIT, *Le Gauchisme, remède à la maladie sénile du communisme*, *op. cit.*, p. 161.

历过的具体革命经验”，并声称：“在法国，甚至在欧洲，一个非凡的时代即将开始。今天我们第一次知道，在高度工业化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马克思所期望的那种条件下的革命，终于在酝酿了。这场革命将使世界社会主义的面貌大为改观。”^①

那些最疯狂的人则认为，要一丝不苟地准备即将到来的内战。在1969年出版的《走向内战》^②一书中，阿兰·热斯马尔、塞尔日·朱利和埃林·莫拉纳以他们的方式总结了五月运动的经验教训。朱利和莫拉纳^③来自“3·22运动”，热斯马尔于5月27日离开高教总工会负责人的岗位，加入他们的行列。五月运动被他们直言不讳地说成是暴力和仇恨的象征。他们写道：5月3日“第一块铺路石投向警察，阶级仇恨由此而生”。^④要将这种仇恨化为反对敌人的武器——“镇压使我们懂得了对阶级敌人仇恨的巨大价值，也就是仇恨的行动价值。资产阶级专政到处播种恐怖，革命者要使这些种子长出对阶级敌人的仇恨。这种仇恨是革命战士不腐败、不屈服的保证。它保证革命战士对资产阶级体制作不屈不挠的斗争并战胜资产阶级军队。让我们明确而公开地说：仇恨是革命觉悟的最明确体现。这不是单纯的、野蛮的仇恨，而是一种强烈的不可遏制的愿望：取得革命胜利，建设一个无压迫的社会，埋葬人剥削人的社会。”^⑤

5月24日之夜，人们原可跨进一步，将罢工变成起义式的罢工，但情况并非如此：“在5月24日发生阶段性转变时，为了资产阶级利益，运动拒绝采取必要的违禁行动，放弃了主动权。”^⑥

作者们看到，在这方面走得最远的是那些青年帮和流氓无产者。在他们看来，“加丹加分子”被逐出索邦大学等于是“接受资产阶级的道义作为社会准则”^⑦。他们承认这帮流氓无产者可能较难适应社会主义社会并有可能被法西斯派别收编。但他们认为，重要的是这帮人在街头战斗中表现得最有战斗力并使与警察的冲突有了新特点，从而其暴力便具有政治意义。它“搅乱”了由全国学联秩序服务队和托派分子管理的暴力行动，更是在拉丁区搞起了“野蛮暴

① 《Ce qu'on cherche à nous faire oublier》，*Les Cahiers de Mai*，n°1，15 juin 1968.

② Alain GEISMAR, Sereg JULY, Eryln MORANE, *Vers la guerre civile, op. cit.*, p. 156.

③ Pseudonyme de Herta Alvarez et Évelyne July.

④ *Ibid.*, p. 256.

⑤ *Ibid.*, p. 151-152.

⑥ *Ibid.*, p. 348.

⑦ *Ibid.*, p. 324.

力”，“让学生中的一部分左派学会了战斗”^①。如此一来，这种暴力便使运动具有了政治性。

资产阶级受到革命运动的威胁，意识到大难临头的危险，除进行较量外，似乎别无出路。如果法国资产阶级的视线在于内战，革命者就必须作此准备。所以从现在起就应组织暴力，把暴力的目标定为发展“导致资产阶级政权崩溃”的进程^②。为此，必须夺取可用于表达革命意志、进行面对面较量的中心场所——街道。一切都要在街头展开：“资产阶级原形毕露的时刻也就是修正主义原形毕露的时刻，同样也是革命运动展示自己的时刻。除了街道，再没有别的场所可以进行这场较量。街道是阶级斗争的封闭战场，各种矛盾将在那里一决胜负，除了流血，没有别的出路。”^③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资产阶级有理由感到害怕”^④。作者写道：“我们无意冒充预言家，但法国1970年或1972年的前景就是革命。”^⑤

不过这些想法在极左派内部远非人人赞同。革共青联的托派分子已意识到从6月开始的落潮现象。他们认为革命是科学的事业而不是自发性的。5月运动是按1905年俄国革命及其后1917年十月革命模式而进行的一次“总排练”。五月运动标志着政治停滞期的终结，开启了紧锣密鼓的阶级斗争时代，对革命力量的发展极为有利：“我们说，不同政见将不断扩大、深化，其形式千变万化，给旧世界以迎头痛击，将它打得落花流水。”^⑥

如果五月运动是根据列宁主义的革命模式而进行的一次“总排练”，那就必须为实现最高目标做准备，要拥有取得成功的手段。为此，必须开展宣传并建立必不可少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要为未来的斗争做好准备，把活动分子组织、集合起来，向他们讲清楚已进行的斗争的意义和局限性，以免松懈斗志，并且为发动明白的斗争积蓄力量。”^⑦五月运动创造了有利于组织发展的条件，托洛茨基主义似乎终于有了群众基础。阿兰·克里维纳1968年9月出狱时说：“必须加强先锋队、教育先锋队，使之摆脱组织上的机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习

① *Ibid.*, p. 327.

② *Ibid.*, p. 331.

③ *Ibid.*, p. 137.

④ *Ibid.*, p. 48.

⑤ *Ibid.*, p. 16.

⑥ Henri WEBER, *Vingt ans après, que reste-t-il de 68?*, *op. cit.*, p. 39.

⑦ *Organe de la JCR*, n°5, 3 juin 1968.

气。”^①极左派内部此后的分野将是：一部分人梦想早日重搞五月运动，另一部分认为首要任务是建设先锋队。

尽管存在分歧，但大家都同意一点：法国的五月运动证明，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实现革命的转变是可能的。这就是一个突破。在此前，在工业化国家实现革命理想还只是一个朦胧不确定的前景，只有首先在第三世界国家才有可能落实革命理想。极左派斗争的主线是支持古巴革命和越南、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等等。五月运动之后，这种国际主义的动员有增无减，但斗争同样是在法国和所有工业化国家展开。这样，联系的桥梁便搭上了：第三世界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斗争会合了；二者会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这种局面正是极左派别求之不得的。毛主义者接过“伟大舵手”的一句话，说明很好：“在全世界各地，革命是主流。”现在有5月之前和5月之后的分别，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缺口已经打开，现在的问题是扩大这一缺口，使之通向社会的转变。

我们将会看到，从1969年到1973年这些年里，各极左组织的力量不断上升，令人惊奇的是它们竟成了五月运动的主要代表。尽管如此，绝对自由主义文化潮流并未消失，它自觉或不自觉地为影响大多数青年的熔炉，而且朦朦胧胧地与新列宁主义理论相安无事。大批年轻人（他们在1968年5月时在16—20岁之间）的到来给各个组织带来一种新感觉。这种感觉与要求牺牲的战斗精神带来的压力格格不入。互相不理解而形成的疙瘩已经是事实了，但还要等若干年才暴露出来，其表现形式就是战斗精神的深刻危机。

^① Interview d'Alain KRIVINE, *Rouge*, n°1, 18 septembre 1968.

第二部

极左势力的膨胀与爆裂

九、极左百态

五月运动过后，各极左派别的第二次生命开始了。但这并未能消除它们之间的不和，反而使之加剧。虽然新列宁主义各派都标榜革命和共产主义，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引用却各不相同。诚然，列宁、托洛茨基、罗莎·卢森堡、毛泽东和斯大林都是共产主义的领导人，但似乎很难将他们都归到同一面旗帜下。各派对革命进程和眼前任务的看法各不相同，从而引发诸多争论。伴随着它们的新生而来的是对身份认知的不同，各派都认为自己认同的是惟一“革命”的。各派间的竞争如火如荼，其内部的不和与分裂日甚一日。

那些最正统、最具宗派性的组织认为，五月运动产生的新思想只是次要的，不足以改变它们预想的蓝图。它们的目标始终如一：按照最传统的列宁主义模式吸收活动分子、发展组织。至于那些投身于大学生公社的派别，尽管坚持自己的教条，但也不可避免地打上运动的烙印。在托派和毛派内部又有新的组织诞生，它们勉强地使新的诉求和旧的设想结合在一起。这样，新列宁主义各派之间除了传统的不和又加上新的分歧，其范围遍及托派和毛派。

在五月运动刚刚结束后的几年里，有两个极左组织走到舞台的前沿：阿兰·克里维纳的“共产主义同盟”（托派）和以阿瓦·热斯马尔为发言人的“无产阶级左派”（毛派）。这两个组织在大学生群体中展开激烈的竞争，而统一社会党的活动分子则竭力维持自己的团结。

难以捉摸的托洛茨基主义

由托洛茨基（被斯大林驱逐出苏联的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创立的

“第四国际”自1938年成立以来经历了多次分裂。导致成员不和的原因很多：要不要执行打进共产党内部的策略？对苏联的演变应如何分析、采取什么立场？对民族解放运动应采取什么立场？等等。战后各不同组织和派别进行了重新整合，从而产生了“党”、“联盟”、“委员会”等等。对这些做出族谱式的归类是内行和专家们的事。

在法国，五月运动中产生了对立的两大潮流：一是过时的和宗派主义的，其特点是教条地援引托洛茨基的著作；另一派对青年的新诉求比较开放。这两大潮流的对立在随后的几年中还在不断延续。

聚集在《工人斗争报》周围的活动分子是托派中最正统的一部分。该报是在1968年6月“国际主义共产联盟”（其报纸是《工人之声》）被取缔之后创立的。这一派的特点是主张极端的工运中心主义，有一个封闭的，近乎地下的组织，颇有帮会性质。其主要活动是在工人中间进行，耐心地做着在企业 and 工会中扎根的工作。加入这一派的大中学生要有所表现，要接受该组织教条的培训，并要为工人同志们服务。

《工人斗争报》提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雇主与劳动者的对立可以解释一切。据此，其活动分子认为，在越南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都是由民族资产阶级或斯大林主义政党领导的，他们不支持这些政党。切·格瓦拉则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该组织没有参加当时大中学生的反专制斗争，只满足于散发其报纸，并试图招收新成员。

这一派是从1974年开始被人认识的，因为它支持自己的候选人阿莱特·拉吉里耶女士参加总统竞选，并得593370张选票（2.33%）。她对左翼政党持强硬态度，一再对“男劳动者”和“女劳动者”发出号召，加上其个人化的演说风格，她逐渐在媒体眼中成为极左派的杰出代表。

托派的正统代表还有“国际主义共产组织”（OCI）。它也在6月与其在大学的分支革大联同时被取缔。1969年，该组织的活动分子创建了“托洛茨基主义组织”（OT）和“争取社会主义青年联合会”（AJS，以下简称社青联——译者）。应该说他们的领导对组织被解散并不服气，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完全有别于任何其他派别，坚持认为自己的组织是负责任的。出于维护尊严的考虑，国际主义共产组织向国家行政法院提出上诉，成为提出诉讼的惟一组织。它要求将其案子与其他组织区别对待，撤消对它的取缔措施。行政法院于1970年判其胜诉，撤消了对其做出的判决。

该组织在工会内将极端教条的立场与行会的诉求结合起来，并力图在工会里占据几个领导岗位。它援引托洛茨基理论和他1938年提出的“过渡纲领”，

又加上关于“生产力”状态的晦涩难懂的观点，认为生产力已停滞不前，留给人类的选择只有社会主义或野蛮。在总工会内、但更多是在教育工会和工人力量工会内，都有国际主义共产组织和托洛茨基主义组织的活动分子，而民主工联则被认为是一个“分裂的组织”。他们的策略是创立工会会员委员会，用投票方式通过请愿和动议。这些请愿和动议通过后再由组织进行汇总，因此每次都能反映劳动者的真正利益，并将领导“逼到墙脚”。

L'OCI/OT 希望被左翼政党视为惟一严肃的有组织的伙伴。1971年在巴黎公社社员墙纪念巴黎公社的活动中，该组织的队伍加入社会党的队伍。在1973年的议会选举中，L'OCI 号召第一轮就投左翼政党的票，但被视为“大资本”代表的左翼激进党除外。

在大学生群体中，社青联同左翼政党和暴力冲突都保持一定距离。它不愿意与所谓“小资产阶级左派”同流合污，并把“共产主义同盟”也列入其中。“无产阶级左派”的毛主义者则不被视为工人运动的一分子。面对其他极左组织对他们的嘲讽（认为他们是帮会），社青联有时采取谩骂，甚至肉体侵害的手段。

五月运动刚一结束，他们便为夺取奄奄一息的全国学联领导权展开一场激烈的角逐。他们成立了“工会统一派”，与创建“法国全国学联复兴派”的共大联学生相对抗。除此项工会活动外，他们还开展签名活动、举行各种会议和集会，以发展活动分子，落实“工人统一战线”的口号，要求青年在战线内与工人阶级站在一起。

社青联每实现一个目标——在工会争取到任职、得到签名、它组织的示威活动的参加人数较多——就会被宣布为“工人阶级的胜利”。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展开动员的基础上，社青联于1970年在布尔歌成功地举办了近8000名青年参加的集会，成为当时惟一能与法共的“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相抗衡的组织。

社青联与五月运动保持距离并反对其绝对自由化的思想。但它也从狭隘的行会利益出发，在学生自发运动的残余力量中吸收了一批大学生。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后来成为“工人力量总工会”的活动家，或成为社会党党员。

再生的共产主义同盟

在托洛茨基主义的宗派组织中，阿瓦·克里维纳的“共产主义同盟”很快成为最具活力的一个，并得到迅速发展。同盟创建于1969年，由被取缔的革共青联和国际主义共产党（革共青联就是从该党出来的）合并而成。这两个组织的活动分子于1968年创办了《红色报》并加入第四国际。

对许多曾在革共青联战斗过并参加了大学生公社的人来说，加入第四国际并非理所当然的事。1971年发生了分裂，导致“革命！”组织的建立。该组织指责共产主义同盟在同左翼政党的关系中过分畏首畏尾，因此便向毛派靠拢。

共产主义同盟的托派分子认为，要依靠从争取局部权益过渡到夺取政权斗争的“过渡纲领”去“提高群众的觉悟和战斗性”；要扩大局部运动的规模，发展基层的主动行动，在企业中实行“工人监督”，以形成一个在上、一个在下的二元政权。到那时，革命形势便成熟了。

未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实行“直接民主”。这种民主的组织形式是通过自由选举产生从地方到中央的工人委员会。任何政党和组织都无权将其观点强加于工人委员会。组成先锋队的托派分子还要“不断提高无产阶级政治觉悟”。在这之前，要通过发展斗争以实现革命进程。先锋队的作用正是走在这一进程的风口浪尖上，使冲突深入人心并不断扩大，打开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

共产主义同盟不断批评左翼政党，并号召其活动分子与左翼政党对话，以便说服他们相信同盟提出的建议是切实可行的。在各工会内部，要反对总工会和法共的所谓“阶级合作”路线。托派要把“直接民主”和“革命者在总工会中开展斗争并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①强加于人。这个任务是艰巨的。民主工联留下的空间更大些，革命分子在该工会中的人数众多。

1972年发表的宣言——《共产主义同盟的期望》^②展示了这样一个极左组织的形象：既把自己定位在反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纲领中，又愿意向现代化开放。因此，该组织注意考虑技术的发展及其对生产产生的效果。它认为，随着自动化的发展，“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进行中。它强调技术员、工程师和研究人员的的重要作用：“人类活动的中心正转向生产的科学和技术准备阶段。”^③

这种分析与统一社会党的“新工人阶级”分析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托派赋予这一分析以颠覆和革命的意义。这“第三次工业革命”给“世界与生活的彻底转变”带来潜在的可能性，而且与蒸汽机和电的发明所不同的是，它越来越显出与资本主义的格格不入。

共产主义同盟把列宁的话加以发挥，断言“社会主义就是工人委员会加自动化”。^④ 根据托洛茨基关于有必要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不断革命”的理论，工人

① *Rouge*, n°879, novembre 1970.

② *Ce que veut la Ligue communiste*, François Maspero, Paris, 1972.

③ *Ibid.*, p. 20.

④ *Ibid.*, p. 32.

委员会制度应扩大到全球。这样，民族的国家将要消失，代之以广泛的全世界自治体系。技术的进步可使这一目标变得切实可行：“无产者没有祖国，他们的目标不是创立一个祖国，而是要使工人委员会的网络覆盖全球。交通、电讯手段的发展、功率日益增大的计算机的应用，从现在起就使这一前景不再有科学乌托邦的性质了。”^①15年后，这个受新技术诱惑的乌托邦抛弃了共产主义后又在另一种形式下发展起来。

向“劳动者政府”过渡的纲领，除有关工资、工人对劳动强度的监督、卫生与安全、剥夺雇主和资产阶级的所有权等项要求外，还给予学校、医疗、住房和交通等问题以重要位置。同盟的宣言就这样把青年反对“伦理纲常”和性压迫的新型斗争、妇女解放斗争和地方主义运动融为一体。

关于教育和学校问题，70年代初在这方面所提出的要求只代表教育界的少数人。随着岁月的流逝，它最终确立了自己的地位。除了“学校为劳动者服务”这一项外，共产主义同盟的建议似乎摆脱了乌托邦性质：“学校要适应孩子，而不是反之。同样，应鼓励从最小的年纪开始就在学校内外成立年轻人自治小组，自己选择文化和娱乐活动。把游戏和学习武断地截然分开的做法将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培训和生产之间的隔离一样走向灭亡。今后的教学将不再脱离社会，而是与社会相结合，将成为生产者和劳动者组织关心的问题，而不再只是专家们的事。因此教学大纲和教材等概念将失去意义。学校不仅仅是孩子们的世界，它也将向成年人开放，使他们既得到经常性教育，也得到娱乐。”^②

共产主义同盟在五月运动后得到迅速发展，几年里成员人数便达5000名^③。它在大中学生中大力开展鼓动工作。其主要作品都由弗朗索瓦·马斯佩罗出版社出版并发行。出版社的创始人也成为同盟的一员（其书店“阅读的乐土”位于拉丁区中心，各种出版物齐全，成为极左分子的圣地）。同盟的活动分子主要分布在教师工会中（他们参加全国教育工会联合会中的“翻身的学校”派）和卫生部门。

在共产主义同盟内部，既有教条主义的信仰，也重视根据列宁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原则对成员进行训练，还有深深打上学生运动烙印的生活和战斗风格。加入同盟的大学生不需要像在毛派组织里那样做出自我牺牲和忠于工运

① *Ibid.*, p. 50-51.

② *Ibid.*, p. 116-117.

③ En 1971, *Le Nouvel Observateur* crédite la Ligue communiste de 3 800 adhérents; et le rapport au septième congrès de la Ligue communiste avance le chiffre de 5 000 (cf. Roland BIARD, *Dictionnaire de l'extrême gauche de 1945 à nos jours*, Belfond, Paris, 1978, p. 207.

的承诺,也不要求他们离开大学生群体、背弃自己的文化背景而去工人中生活或到工厂去扎根。同盟的活动分子出现在各式各样的委员会中,并很快被人识别出来。因为他们的风格是老爱给人上课,没完没了地宣讲他们的观点和建议。至于其演说是否引起兴趣,他们并不太关心。

共产主义同盟在历次示威和他们自己组织的行动(包括暴力行动)中表现出很强的组织能力,这是他们在大学生群体中面对毛主义者(他们认为毛派是不负责任的)而掌握的一张王牌。这些因素使得共产主义同盟在当时的乱局中成为一个令人放心的极左组织。

马列主义乎? 毛泽东主义乎?

五月运动在毛派内部也留下痕迹,其影响导致毛派重新组合和内部分歧的不断发展,几年后最终导致所有毛派组织的解散。

五月运动使马列共青联遭受致命打击。该组织的领导在运动中所持的立场引起强烈反应。1968年9月,毛派学生在他们的领地乌尔姆街举行会议,在一片混乱中进行了清算。前领导机构及其主要领导人罗伯特·里纳特受到猛烈攻击。活动分子的造反和“头头们的争斗”构成一部心理剧:在一片叫喊声和谩骂声中,每个人都把组织失败的责任推给另一个人。

马列共青联的分裂主要围绕两个极端展开:多数派提出组织政党的必要性并与法马列共进行接触;有40来人团结在前领导人贝尼·莱维(又名维克托)周围,反对这一方针,认为这一方针是在搞“清算”。他们聚集在《人民事业报》周围,后来与前“3·22运动”成员一起创立“无产阶级左派”。

毛主义者有一个优势:他们打出的招牌是对众多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很有吸引力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确是一场否定现政权并反对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法国持不同政见的大学生对毛泽东从1966年起利用发动群众作为工具的“黑暗面”一无所知,觉得自己与中国的“红卫兵”很相似:他们也跟红卫兵一样攻击大学和“官老爷”政权,要进行一场创造新世界的“文化革命”。在众多抱着理想主义的年轻人眼里,这场革命是“在实践中超越斯大林主义”,避免苏联发生的情况重演的惟一办法。

大多数毛派大学生认为,五月运动证明了“没有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便一事无成”的“马列主义”观点是正确的。马列共青联的一部分毛主义者加入了法马列共。该党处于地下,但拥有一份合法报纸——《红色人道报》。

毛派大学生与法马列共之间的会晤进行得并不顺利。该党得到中国共产

党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承认,比较高看自己和自己的历史使命。他们对新成员可能带来小资产阶级或非无产阶级思想比较警惕。的确,毛派青年的思想感情与 50 年代法共培养出来并仍忠于斯大林的人组成的党不一定能合得来。这些人是国际共运出现分裂后离开法共的。那时法共绝大多数党员赞成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和他的“和平共处”、发达国家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方针。而马列主义者则赞成中共和阿共的论断:赫鲁晓夫的方针是“修正主义”的。

面对法国共产党,法马列共自称是惟一真正的共产党。但其领导人所制订的蓝图却不一定能激起毛派青年的热情,他们认为五月运动才是新兴力量的代表。法马列共自封为“法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先锋队,代表法国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①它号召法共党员“擦亮眼睛”,认清其领导人的叛徒面目。它认为法共领导人是“修正主义叛徒”。

五月运动后,该组织认为现政权开始进行“蛊惑人心”的工作。它提出建立“统一战线”和“在无产阶级专政基础上的人民民主”^②的口号,要求通过“长期的工作”建立这个“统一战线”,团结“一切被剥削者反对垄断资本的压迫”^③。统一战线当然要由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来领导。至于学生运动,“无产阶级领导”也为它勾画了前景:“在统一战线里,学生运动应接受重新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④

在对工人阶级的工作方面,马列共接过了 30 年代初总工会提出的一些口号,即:恢复“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传统;“在基层和行动中”增强团结,反对“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领导”,以便“大家一起并同时”进行一场类似本世纪初无政府主义工会总罢工那样的斗争。此外,无产阶级先锋队负责管理和教育无产阶级先进分子,要他们看到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法国有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余下的事就是加入这个党。

1968 年 5 月以后的几年里,由于新成员的贡献而重新振作起来的马列共又经历一连串的退党和不和。从法共出来的领导核心内部爆发矛盾,导致 1970 年的第一次分裂。与此同时,前马列共青联的许多活动分子加入了“自发毛主

① 《Statuts du Parti communiste marxiste-léniniste de France》, *Cahier rouge*, n° 1, mai 1968.

② 《En avant, pour une démocratie populaire fondée sur la dictature du prolétariat!》, supplément à *L'Humanité rouge*, n° 49.

③ *Ibid.*

④ 《Que le mouvement étudiant se place dans le Front uni sous la direction politique de la classe ouvrière réorganisée》, supplément à *L'Humanité rouge*, n° 44.

义”行列，并建立了地方小组。

1971年里昂地区前马列共青联成员又搞了一次分裂，创办了《红色阵线报》，那是自发毛主义与严格的正统主义相结合的一个奇特混合体。该派于1974年成立了革命共产党(PCR)，这是一个工运中心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组织，在70年代后期徒劳地试图把革命与新的社会运动相结合。

所有这些组织都自封为马列主义的真正代表，争相取得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承认，并深信广大群众迟早会承认它们的“正确路线”。在各个组织之间，论战如火如荼地展开。

无政府的毛主义

聚集在《人民事业报》周围的一小撮毛主义者认为，五月运动后的形势并不是要求加强自封的先锋队，而应有别的目标。

五月运动后，许多活动分子开始重读列宁的著作《怎么办？》。该文强调必须按照最严格的原则建立统一的布尔什维克组织。毛主义者则相反，他们批评“僵化的列宁主义”，号召抛弃理论教条而“从实际出发”。他们因此而被称为“自发毛主义分子”^①。这些前马列共青联的活动分子与前“3·22运动”的成员和同情者(如塞尔日·朱利和阿尔·热斯马尔)一起，于1968年大学开学时成立了“无产阶级左派”。

无产阶级左派成员自封为毛泽东主义者，认为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代表马列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他们从毛泽东的学说中，更确切地说从《小红书》(毛泽东语录的浓缩本)中寻找造反和斗争的一切依据。他们认为当前并非革命低潮，而是日益艰巨的斗争在不断发展。这种斗争将导致革命，毛主义者必须鼓励和扩大这种斗争。建党的问题将会应运而生：它只能与斗争的发展相联系并要得到人民群众的承认。

无产阶级左派的毛主义者承认青年的造反有反专制的一面，他们对此表示赞扬并要将其引导向暴力行动。他们还声称自己是无产阶级中最有战斗力的一支。关于对五月运动的评价，他们认为学生们从大学开始的斗争使“专制主义及其集中表现——警察国家、镇压机器”^②的真面目暴露无遗。学生运动虽然

① 自发性一词出自列宁著作《怎么办？》。——译者

② 《De la révolte antiautoritaire à la révolution prolétarienne》，*Cahiers de la Gauche prolétarienne*，n° 1，avril 1969.

不是无产阶级的运动,但它在实践中掌握了无产阶级的斗争方法,从而实际上起到先锋队的作用。

五月运动中青年反专制的斗争成为反对资产阶级专制制度斗争的典范。资产阶级专制制度不仅通过公开镇压的形式,而且也通过在中小学校和大学散播其意识形态来实施专制统治。大学生为反对资产阶级的知识和大学,就要开展“意识形态的斗争”,就要拒绝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看门狗”,这样,就能把“知识与老板专政之间的联系”充分暴露出去,从而破坏资本主义专制制度的基础,因为这一制度既依靠暴力镇压也依靠欺骗(意识形态镇压)^①。于是,传统的阶级斗争方式便受到冲击;反对专制制度各种表现形式的斗争成为反资本主义斗争的决定性因素和各种斗争的焦点。

无产阶级左派最初投身于大中学生的斗争,号召动员起来反对一切形式的专制。他们在大中学校里吸收大批年轻人,鼓励他们“投身到世界中去”,即到工厂去扎根,到郊区和棚户区去工作。用毛主义的话来说,这就是“从反专制的造反行动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

于是,毛主义者便到工厂扎根,以便在最短的时间内创造革命条件。在他们看来,五月运动的教训是简单明了的:弗兰和索肖事件指明了道路,要把造反思想系统化,要“以牙还牙”。一本解释毛派在工人中工作的小册子声称:“我们要的就是再搞五月运动:5月打破了社会的平静;5月过后我们要组织社会战争。对期盼这场解放战争的人民,我们要给他们信心。”^②

无产阶级左派依靠当时广为接受的造反行动来对付资本主义的剥削暴力,特别是涉及从事最危险工作的劳动者健康问题上。但它认为,这种觉醒必然要呼唤另一种暴力,即无产阶级革命暴力。它以抒情般的风格、用极端的民粹主义和工运中心主义来表达这种思想,正如阿兰·热斯马尔在1970年的诉讼中所说的那样:“看看那些患矽肺病、每走一步都感到窒息的矿工吧,看看那些流水作业线上的工人走出工厂时那副疲惫不堪的样子吧,看看那些脸和手被染料和硫酸腐蚀、肺部受损的纺织厂和化工厂女工吧,看看那些因倒垃圾而患肺结核死去的黑人吧!他们将会把子弹卸在你们的肚子里,因为他们不要求怜悯,他们要为改变现状而战斗,帮助他们战斗的是朋友,让他们继续受奴役的是敌人;因而他们造反,说:‘生命是宝贵的,奴隶们活够啦!’”^③

① *Ibid.*

② 《Coup pour coup》, supplément à *La Cause du peuple*, n° 20.

③ *Ibid.*

毛派并非经典词义上的先锋队，他们要“如鱼得水”般地到人民中去，人民，法国昨日和今朝所有受压迫的人民都要通过他们表达自己的心声。据他们说，受剥削最重、受压迫最深、受屈辱最多的无产阶级，最穷苦的穷人，苦难最深重的人们都通过其领导人的声音表达自己的意见，毛派将为他们报仇雪恨；在法国，只有两个极端是实在的：穷人和富人，“人民的法国”和“金钱的法国”……

与这种民粹主义相匹配的还有一篇好战的讲演：无产阶级左派希望自己成为“新型的游击战士”^①，宣布要开展“阶级斗争”，要粉碎“社会和平”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分子”散播的合法主义与和平主义意识形态。它在工厂里开展反对小头目的斗争，破坏生产，跟警察、总工会和法共成员等进行较量。所有这些“象征性的暴力行动”将“让造反的意识战胜屈从的意识”^②。与工会的任何和解似乎不可能了。工会被称为“投降派”和“投敌者”。“工会主义从此与工会警察融为一体了”^③，因此必须把它撵出工厂，要毫不犹豫地进行斗争，破坏生产节奏，制服小工头，强行实施自己的法律……正是在此类越来越激烈的斗争中，工人们将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并为此行动起来。

与共产主义同盟不同，无产阶级左派的战斗风格带有明显的牺牲精神。青年大中学生要与他们过去的的生活划清界线，要像“人民群众”一样生活，要生活在“人民群众”中，使自己“无产阶级化”；按照毛主义关于好共产党员的标准，他们要做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事实上他们提倡的是一种狂热的积极性，不给私生活留下多少空间。

知识分子要在“工人积极分子”的领导下进行自我改造。这些“积极分子”就是造反的青年工人或经组织领导作保的社会边缘分子。在组织领导内部要开展反对“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其疯狂和猛烈的程度近乎否定一切，类似受虐狂。组织内部的“两条道路斗争”和“整风运动”简直就是微型审判会，是中国“红卫兵”所热衷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翻版。

毛派把自己的工作指向专门工。这是工人阶级中受剥削最深的阶层，他们是：外籍工人、青年、妇女等等。这些阶层反对泰罗制和工厂的劳动条件，是法共和工会势力的“薄弱环节”。毛派要给他们发言权，而工会组织却抛弃他们，只关心熟练工人。从联合青年知识分子和工人进行反专制的斗争过渡到无产

① *Les minutes du procès d'Alain Geismar*, Éditions Hallier, Paris, 1970, p. 53.

② 《Nous sommes les nouveaux partisans》，chanson écrite et interprétée par la chanteuse Dominique Grange.

③ *Cahiers de la Gauche prolétarienne*, n° 2, mai 1970.

阶级革命的道路已经明确了。70年代初期专门工斗争的发展似乎为这一思想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在毛主义的华丽词藻背后,无产阶级左派试图重现工人运动史上的伟大时刻,那就是:开展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工会主义式的暴力斗争。它神话般地把青年的造反放回历史中去,从而掩盖了造反的新颖独到之处。一些剥削和压迫的真实丑闻被揭发出来后,他们利用这些丑闻对20世纪后半叶工人阶级的处境做了错误的描绘,目的是为了维持现代武装暴力的神话。

无产阶级左派宣称:“1968年5月开始的‘新的抵抗运动’不是一句从天而降的口号,它产生于地球,发自群众的内心”^①,尽管如此,根本的问题还是出在大学生、知识分子和年轻造反派的脑子里。这些英雄时代的孤儿在清算自己和历史。

绝对自由的毛主义

“自发毛主义”的最新版本是以罗兰·卡斯特罗主持的“革命万岁!”派为代表的。这个少数人的组织植根于农泰尔大学和美术学校,是1969—1971年间昙花一现的一个组织。但它在极左派内部传播五月运动的绝对自由思想方面还是起过主要作用的。

该派拒绝承认自封的先锋队,认为他们是“真正的残渣余孽”,是要竭力“把活动分子限死在过时的社会成分划分上,使积极分子陷入内心痛苦,使不成熟的基层活动分子产生罪恶感,用各种手段镇压潜在的反对派”。面对五月运动的新诉求,这些(自称先锋队的)组织处于危险的境地。

“革命万岁!”派认为,五月运动首先是一场意识形态运动,它表达了对新生活、新型社会关系、人民创造力的恢复、人民团结意志的加强等等的渴望^②。这些期盼使所有传统的政治表演,包括极左派的表演,都受到冲击。

该派从意大利极左派(如 Lotta Continua)的实践中得到启发,希望能为组织“工人自治”做出贡献;要以“劳动者明确表达的愿望”为依据采取行动,使他们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各种工会都被视为“钻进工人阶级心脏的敌人”,是“雇主用来打进工厂生活和钻进工人头脑的特洛伊木马”^③。虽然工人阶级仍然是

① 《Coup pour coup》, *op. cit.*

② 《Gauchisme légal et gauchisme révolutionnaire》, *Vive la révolution!*, n° 5, 25 avril 1970.

③ *Ibid.*

革命的主要力量,但不能将企业中发生的事情与关系全国、特别是关系到青年的造反行动割裂开来。

这些活动分子认为,一种新的精神状态和一个“野蛮的法国”已经诞生,而“革命的极左思想”则是一服催化剂。要大力开展斗争,以争取平均主义、反对一切形式的等级制度;争取直接民主、反对代议制;争取“为生活做最少的工作,而不是为工作而生活”、反对唯生产力论;要“从人的经历和主观意志出发”,反对预订的纲领;要“把所有造反派联合起来”。

“革命万岁!”要与无产阶级左派的民粹主义、宗派主义及其“对小资产阶级的罪恶蔑视”划清界线。它反对“合法左派”的主张,不怕暴力较量,宣称“暴力是争取群众民主的另一种斗争手段”^①。暴力将会得到理解,不会导致孤立。

该组织抛弃了生硬的语言,接过五月运动的口号:“改变生活”,并声称“过节就是革命”。对于其活动分子,不存在“工厂第一,社会生活第二”的问题。“同志”之间保持着说说笑笑、“打打闹闹”的“伙伴”关系。他们以中国共产党的英雄历史为榜样,勾画出能满足尚未受过政治陶冶的青年期待的前景:“我们所走的路不是别的,而是为找回五月运动形成的现实而进行的长征……希望的曙光是有的,那是一种不可磨灭的玩意儿,是令人永志不忘的东西。”^②

该派自诩的这个“不可磨灭的玩意儿”很快便与它关于新型阶级斗争和战斗组织的理论发生了矛盾。1970年9月,他们创办了《一切!》杂志,向被极左派视为次要的斗争(妇女和同性恋者的解放斗争、反传统精神病学^③、社团问题等等)开放,成为“反文化”的载体之一。

绝对自由的毛主义把先前由境遇主义和“3·22运动”所代表的批判潮流延续了下来。1971年它也销声匿迹了。但对战斗精神的否定和它所提出的课题还将继续在极左派内外大行其道。

① 《Sur la question syndicale》, *Vive la révolution!*, n° 5, 25 avril 1970.

② *Ibid.*

③ 《La France sauvage veut la liberté》, *Vive la révolution!*, n° 7, juillet 1970.

十、在大学里

在许多大学(首先是文学院和人文学院)和中学里,五月运动过后仍经常发生骚乱。在运动中没有被政治化的那些叛逆精神极强的青年不甘心大学生公社的失败,仍在窥探再来一次运动的可能性并希望这次能成功。如果运动未能如期而至,许多疯人派希望搞样板行动的模式把它挑动起来,这样就能打破僵局,挑衅—镇压的循环就会导致五月运动再次兴起。

在五月运动过后不久取得一定成功的恰恰就是鼓动造反、回应这种期盼的那些组织。在许多地方,疯人派成功地阻挠大学机构的正常运转。在与社会隔绝的那些大学里,警方不能随意介入,活动分子过着封闭式的生活,悠闲地做着革命的美梦。在议会里,多数派议员要求对“无政府主义极左分子”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

极左派的坚强核心把积极投身战斗变成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并把自己关闭在革命的幻觉中。它组成一个脱离广大学生群众的小群众,那些愿意继续读书的大学生中有许多人则以同情和好奇的目光看他们。即使治安力量的介入和警察的镇压还有可能促使群众动员起来,但学生运动已不会再有五月运动那样的规模和团结了。

改革不可能吗?

新任教育部长埃德加·富尔提出的“高等教育方针法”于1968年9月获得议会通过。这部法案试图满足大学生在运动中表达的某些诉求。新政府希望

以此消除学生的异议并孤立极左分子。

该法案考虑了大学生提出的有关大学运转和教学的若干批评和要求。它取消正式教授的权力,并根据“参与制”的原则深入改革大学的运作和管理。大学将由“教学和研究单位”组成,由选举产生的、有大学所有工作人员的代表参加的理事会进行管理。

在教学大纲和教学方法方面,给予大学的自治权将有助于创新。毕业证书和学年制将被各系科相应的可累积的学分制所代管。但全国性的毕业文凭仍将保留,财务方面也不给予自治权。这样一部得到戴高乐支持的法案却遭到许多教授的批评,他们不能接受自己的权力被分割。在多数派内,戴派中的保守派认为该法案哗众取宠,过分倾向于五月运动的思想。有些人几乎认为这是在大学里建立“苏维埃”。保卫共和(联盟)的各委员会则与富尔完全对立。

为推行其改革计划,富尔在樊森纳(Vincennes)^①办了一所试验性的大学,向未通过中学会考的学生和工薪者开放。该校要在教学方法上进行革新:取消传统的考试,实行多科综合教学,强调小组学习,邀请来自外界的“客座教授”。但樊森纳成了1968年后持不同政见的中心,因为那里聚集了众多有批判精神的教师和极左分子。在樊森纳大学的教师中出了几个著名的知识分子:雅克·拉康^②、米歇尔·福柯^③、吉勒·德勒兹、弗朗索瓦·沙特莱,等等。

但1968年后,众人的目光却又转向农泰尔文学院,它成为大学生持异议的象征。极左派别又大批集中到该校,媒体则到那里窥探预示“新五月运动”到来的蛛丝马迹。

象牙塔里的革命

大学开学时,运动中建立的各行动委员会仍然存在,但未坚持多久。这些委员会成为小派别之间关门争夺的场所,各派别都在那里招兵买马。很多寄希望于这些委员会的政治新人纷纷离去。在中学里,中学生行动委员会也同样分裂成许多对立的小派别。

全国学联在运动中获得第二次生命,但这种多云转晴的现象只是表面的。五月运动后各派别、各组织之间的纷争再起,造成全国学联的组织危机,使之很

① 樊森纳(Vincennes),巴黎东郊小城。——译者

② 雅克·拉康(1901—1981),医生,精神分析家。——译者

③ 米歇尔·福柯(1926—1984),哲学家,著有《语词与事物》。——译者

难再恢复元气。勉强取得学联领导权的统一社会党自身也分裂成几派：当大学生群体对政治问题日益敏感之时，要不要继续开展工会斗争？毛主义者对只关心“橡皮和铅笔”的权益要求不感兴趣。共产主义同盟最终也退了出去。争取学联的领导权威成为斗争的焦点。而且在共大联（全国学联复兴派）和社青联（该派成立了工会统一派）的托派分子之间为计算候选人和选票要着各种花招进行“明争暗斗”。

共产同盟的活动分子希望扩大并统一学生的斗争，不断重申与工人相结合和建设先锋队的必要性。除了传统的口号（反对选举，反对增加注册费和食堂餐券费等外，还提出了“红色大学”的口号。托派要把大学变成培养革命者的场所。在这个前提下，“活动分子应当利用大学里的一切场地、书籍、教员、活动分子）来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经济、历史和政治的），并向所有非大学生活动分子开放”^①。

托派认为学生运动“不是先锋队，但偶尔可以起先锋队的作用”^②。几个月后，即1969年11月，他们不得不承认，这个学生运动并未能表现出作为先锋队应具备的“顽强、坚韧、坚定”的品格。大学生群体“缺乏稳定性，容易挥发”——“它既无回忆也无历史，热衷于即兴行动、做见证人和引人瞩目的表演。而先锋队的行为则相反，不需张扬。它通过组织和培养活动分子来编写学生运动的政治回忆录”^③。换言之，共产同盟与其他列宁主义组织一样，并没能主宰什么，只能起来攻击自发毛主义者的所谓“青春躁动”。

自发毛主义者攻击一切代表权威的东西，不论其是间接还是直接的。这种做法在那些运动中还不是疯人派但后来变疯的青年学生中颇有影响。无产阶级左派毫无顾忌地断言：“学术权威就是阶级敌人。如果某些教授成为这种学术权威的化身，就活该他们倒霉：1793年的断头台^④已经见过其他权威了。”^⑤问题似乎很简单也很紧迫：“不管是对是错，许多大学生已经对那些神侃闲扯感到腻歪；不管是对是错，那些大集会已空无一人，行动委员会也形同虚设；不管是对是错，那些革命化的大学生‘左’的身份已大受质疑。”^⑥现在的问题不在于说，

① *Rouge*, n° 3, 16 octobre 1968.

② *Rouge*, n° 11, 22 janvier 1969.

③ 《Spécial rentrée universitaire》，supplément à *Rouge* n° 37, novembre 1969.

④ 指1793—1794年革命派罗伯斯庇尔实行的恐怖政策。——译者

⑤ 《De la révolte antiautoritaire à la révolution prolétarienne》，*Cahiers de la Gauche prolétarienne*, n° 1, avril 1969.

⑥ 《Spécial rentrée universitaire》，supplément à *Rouge* n° 37, *loc. cit.*

而在于做。那些知识丰富的毛派学生对“书本迷信”的批判是和疯狂的反智力至上主义并驾齐驱的。

大学里权威的脆弱性证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危机广泛存在。要加重这个危机,打破对资产阶级知识的神秘感,从而使被这种知识掩盖的压迫真相大白于天下。打击这种权威也就是否定资本主义专制制度:“造官老爷的反、造知识权威的反,就是给国家权威和资产阶级权威以迎头痛击。”^①然而,这场旷日持久的斗争可曾有过什么目的?在各大学里,各种派别在墙壁上、走廊里、会场的门上宣扬一切可能发生的冲突:法国和欧洲工人、农民的罢工;世界上声援各国革命派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越南、老挝、柬埔寨和巴勒斯坦占主要地位,但也有拉美各国、佛朗哥和西班牙、伊朗、乍得,等等。每个政治组织都有自己的报刊台和标语口号墙,还有自己的麦克风和音响设备,轮番播放着各种演说、倡议书和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歌曲。

活动分子叫卖着他们的报纸,并就列宁、毛泽东、托洛茨基的功绩和缺点争论不休,同时也不忘对西班牙战争和俄国革命时的无政府主义作一番评论。有时“理论性的争吵”被更尖锐的相互攻击所代替:社青联的托派分子攻击毛派,毛派予以反击;托派也攻击他们的兄弟仇人——共产主义同盟。

只要出现一丁点儿镇压迹象,只要期待已久的极右组织东山再起,学生们就会立即动员起来。活动分子时刻严阵以待,以对付未能扼杀于襁褓之中、随时可能死灰复燃的“褐色瘟疫”(即法西斯——译者)。他们辨认极右派积极分子,制订名单,驱逐“肌肉发达的传达员”、“便衣警察”和“法西斯分子”。这些小战役都在校园和学院走廊上进行,而广大学生群众则与这类骚动保持距离。

漩 涡

埃德加·富尔的改革法案甫获通过,尚未解散的行动委员会便声明要抵制大学里的等额选举。他们企图罢考,并要在课堂上开展“意识形态斗争”。

教学与研究单位或大学理事会刚刚成立,其会议就受到持异见派别的扰乱,他们嘲笑、辱骂甚至投掷器物……在农泰尔学院等地,会议室随时都会有人闯入,使辩论很难严肃地进行:“理事会在辩论,耳朵却要伸向外面去听嘈杂声,主席察觉到人们的注意力分散了。突然,人们听到爬楼梯的声音和一二百名闯入者的叫喊声。声音迅速增大,门突然被打开,一帮人在一片呐喊声中汹涌而

^① *Ibid.*

人。他们分头围住理事会成员围坐的椭圆形桌子，直到每个人都紧挨着委员们为止。即便是习惯于这种场面的人对这情景也会留下深刻印象。我没有看到哪个人对咆哮着闯进的人群不感到惶恐。”^①

左派教师也未能幸免，连那些曾对学生运动表示同情又不哗众取宠的教员也一样。1970年1月，农泰尔文学院院长保罗·里克尔就在学院走廊上受到一帮学生的羞辱：“有一个家伙看见放在过道上收集废纸、烟头、废纸杯的垃圾桶，便抄起桶盖，做着要把它扣在里克尔头上的动作。”^②

极左分子把这一行动当成反权威斗争以及大学改革失败的象征。各大报纸都突出报道了这一事件，强调局势每况愈下。

那个时候教书可不是一件轻松的差使，特别是在文学和人文科学系科里。课程随时都有可能被活动分子和“非组织人员”以各种借口打断——宣读“宣言”或宣布开会，通过反镇压或反“资产阶级知识”的动议。无产阶级左派宣布了一条对待教师态度的简单准则：“他对大学生反权威运动的态度如何？他可以走在运动的前头，也可以后退，也可以用权威的力量去批评运动。不管怎样，每个教师都必须作出选择。”^③于是，常常有些据介绍是“工人同志”或平民阶层（或多或少失去社会地位）的代表闯进课堂倾诉他们受剥削的苦难并表示完全支持“大学生的正义斗争”。

极左分子认为，教师的政治属性、他们过去和现在的表态是对他们进行划线的依据。在农泰尔，在法律系任教的前部长让·富瓦耶因曾与乍得签订军事援助条约而被剥夺了发言权；他的课要在警察保护下进行。

也是在农泰尔，后来接替里克尔院长职务的陪审法官勒内·雷蒙有过胆战心惊的经历：“突然间，一支由60多名男女青年组成的队伍闯了进来，转眼间站满了教室，把我挤得背顶窗户……我曾经组织过选举，也曾为重组机构做过事，因此成为他们要打倒的人，他们勒令我辞职。整整一小时，我被一群人威胁、挖苦、羞辱，我在人群中看到几张令人不安的、不可理喻的面孔……我清楚地记得一个女孩子咬牙切齿，不断嚷嚷：‘我嘛，我要割下他的舌头。’如果这时有一个人突发奇想地提出把我扔到窗外去，我相信不会有一人反对，大家都会为这

① René RÉMOND, *La Règle et le Consentement*, Fayard, Paris, 1979, p. 253.

② *Ibid.*, p. 110.

③ 《De la révolte antiautoritaire à la révolution prolétarienne》, *Cahiers de la Gauche prolétarienne*, n° 1, avril 1969.

个好玩的主意鼓掌。”^①这种事总算没有发生。乱哄哄地闹了一通后，雷蒙终于在教师们的保护下逃脱了。

自发毛主义者也攻击法共教师。1970年在康城，他们企图阻挠法共政治局委员吉·佩斯讲课。在讲《资本论》时，他们让一个被开除的毛派“同学”出来作证，并要求吉·佩斯对他表示支持。站出来反对这类行动的教师不管其政治倾向如何，都被他们用灭火枪赶了出去。疯人派发出一片欢呼声。

除了这些捣乱外，还有和法西斯分子发生的零星冲突。毛派和法共学生之间也有冲突。托派试图介入，但未得逞。在樊森纳学院1969年6月选举中，大批共青联活动分子与自发毛主义分子之间打了一场小战役，后者对这次“社会法西斯政变”表示抗议。1970年2月在农泰尔，无产阶级左派活动分子和共青联的学生（他们得到法共和工会工作者的支持）之间殴斗造成多人受伤，其中一名总工会工作人员受重伤。在里昂文学院，共青联活动分子在一次会议中受到马列派学生的猛烈袭击。1970年5月在艾克斯-普罗旺斯市，“共青联的社会法西斯分子”被“马列主义者用椅子教训了一顿”^②……面对事故、扰课和斗殴的不断增加，学院负责人不得不请警方介入校园。于是，挑衅—镇压的循环便产生了效果。

农泰尔文学院院长保罗·里克尔认为，挑衅行为不断增加给学院带来“不安全感”，便决心于1970年2月将校园置于警察保护之下。学院理事会允许警察在除建筑物外的大学区内进行干预。很快便发生了暴力冲突，巴黎市及大区的疯人派都赶来支援。躲在各大楼平台上的几百名学生把各种投掷物砸向治安部队，后者则用催泪弹还击。警察对在楼外示威的人发起进攻，他们便躲进楼内，因为警察不得进入。一部装甲推土机端掉了街垒，警方多人受伤。警察进行报复，向学生食堂投催泪弹，棍击在场的学生，捣毁大学停车场上的小汽车。几百名学生站在远处观看这场冲突。里克尔提出辞职。在自发毛主义者看来，“农泰尔战役”是一个样板和一次胜利。

极左派活动分子及其同情者构成一个伺机而动的群体。如果无机会，有些人就想制造一个机会。在“被占领”的学院里，纷纷举行名目繁多的大集会、小会和报告会……办起“野蛮幼儿园”、“人民节日”，请来摇滚和自由爵士乐队……学院应“向人民开放”，所以也可以看到一群闲散人员、叫卖小东西和各色食品的商贩；但也有为警察通风报信的小商贩。极左学生为此展开重要辩

① René REMOND, *La Règle et le Consentement*, op. cit., p. 263.

② 《Une correction méritée aux provocateurs de l'UEC》, *L'Humanité rouge*, n° 61, 21 mai 1970.

论：应不应该让他们这样？如果把他们赶走，那不是等于参加镇压这些同样也是社会受害者的人吗？

各不同大学城里都发生过与进入校园的警察冲突的事件。1971年康城，大学生用燃烧瓶袭警，夺下一辆指挥车并放了火，企图把着火的车推到治安部队行列中去。次日，整个校园被完全包围了。在附近的街道上，警车上的高音喇叭呼吁老百姓不要在街上久留，居民要关上百叶窗。警方的布阵是威慑性的：疯人派们在宣布保安队是“纸老虎”后便取消了预定的示威，不再走出校园。

也是在卡昂城，1971年来法学院举行报告会的雅克·苏斯戴尔^①被一批极左分子劫持，并在校园里被“审判”，罪名是“法国的阿尔及利亚”拥护者。审判结束后即被放走。

1971年3月28日在格勒诺布勒大学校园里，一帮极右分子在南越学生的陪同下冲击一个支持越南人民斗争的会议。激烈的冲突造成两人重伤。6月，极右派的一些活动分子在一次大会上受到审问，警方把校园包围起来。警方在农泰尔、格勒诺布勒、图鲁兹、普瓦蒂埃、卡昂城等大学的干预每次都导致斗殴和对警察镇压的反抗，使示威人数不断增加，也使日见式微的罢工在一段时间内又活跃了起来。

中学生造反

在同一时期，一种更具青春活力的混乱局面在许多中学里发展。共产主义同盟在那里同样面临自发毛主义的竞争，因为那里是特别容易接受绝对自由思想的地方。托派在中学开展“反收编”和反“伦理纲常”的意识形态斗争。他们要求“在学校里政治活动自由”，“对课程有批评权”；他们开展反对“（牧师、军队的）征兵人员”，反对“通过体育竞赛进行收编”的斗争^②……

共产主义同盟的青年活动分子通过开展“有教育意义”的活动使自己有别于自发的毛主义。这些行动也包含明显的反权威内容，巴黎布丰中学1968年11月事件就是例证：“300名学生聚集在院子中央，把印有学校守则的笔记本一页一页撕掉、烧毁。为反对具有镇压和专制性质的纪律、制度而斗争的中学生决定制订自己的守则。就国际问题展开辩论、在学校内召开会议现在成了制度。如果中学能对外、特别是向劳动者教育中心开放，它将成为名副其实的社

① 雅克·苏斯戴尔，1912年生，1955—1959年任法驻阿尔及利亚总督。——译者

② *Rouge*, n° 35, 29 octobre 1969.

区红色基地。”^①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极右派进攻，托派参加了“自卫”的技术准备：“中学里修筑街垒的计划，几道防线的组织和各种投掷物的准备。”^②

毛主义者则直言不讳地声称：“经验证明，今天中学班上的‘恶作剧’风气正是反对资产阶级权威斗争的精神支柱。”^③毛派在路易-勒-格朗中学里发展成员，那里的反权威活动如火如荼，毛派要“把起哄变成暴动”。他们为反对内部规章制度、教学内容和一切类似分数和考试的东西而斗争。1969年4月，行动委员会举行抗议纪律委员会传唤10名学生的大会，警方应校长要求进校干预。同年5月，一个极右派突击队向正在罢课的中学生发起攻击，致使一名学生的一只手被手榴弹炸掉。

在巴黎的贝格松中学，无政府主义分子大骂特骂先锋队和学校当局，揭露“人道主义左派的老师警察帮”，烧毁记分册^④。活动分子们总是赋予这些行动以突出的政治意义，并为此而无所不用其极。毛派中学生把马拉梅中学重新命名为“吉勒·托坦中学”（1968年死于弗兰的青年活动分子）。

《人民事业报》给中学画了一幅阴森森的图画：“学校是一座监狱，资产阶级在那里训练自己和劳动者的孩子，使他们对社会等级制度俯首帖耳。好学生、学监、教师、行政机构一应俱全。学校复制一个微型社会，人们在那里学习如何运用知识攫取权力。看守这个集中营或世界的是警察和国家政权。在那里调节资产阶级日常生活秩序的是行政机构、学术权威和学监。用来分化学生的有中学生行动委员会全国联合会、修正主义的附庸共产党中学生组织、课代表和好学生。”^⑤

除了极左派的这些零星行动外，中学生运动和大学生一样，只有在抗议镇压时才具有群众性。1971年的“吉奥事件”就是这种情况。吉勒·吉奥是巴黎沙塔尔中学高等教学班的学生，在克利希广场一次“红色救援”示威中被警察逮捕。次日以现场作案罪受到审判并根据一名治安警察的证词被判6个月监禁，执行了3个月。罢课立即在沙塔尔中学发展起来，群情激昂的场景迅速蔓延到

① *Rouge*, n° 5, novembre 1968.

② *Ibid.*

③ 《De la révolte antiautoritaire à la révolution prolétarienne》, *Cahiers de la Gauche prolétarienne*, n° 1, avril 1969.

④ Hervé HAMON, Patrick ROTMAN, *Génération*, t 2., *Les Années poudre*, Seuil, Paris, 1988.

⑤ 《Louis-le-Grand. Du chahut à l'émeute: une nouvelle étape de la longue marche des lycéens》, *La Cause du peuple*, n° 7, 17 janvier 1969.

其他学校。2月17日,约1万名中学生在巴黎示威游行^①。

五月运动过去3年了,造反青年还在期待运动卷土重来。秋季开学后,春天又回来了。每个学期的开始和每个春天不都预示着五月运动的再起吗?

^① 吉勒·吉奥后来被释放。对此,《十字架报》写道:如果他当时与极左派有所联系,即使没有出手打警察,也会坐牢。

十一、会走向内战吗？

大学生公社的一篇文章称：“疲惫不堪的法国人刚刚松了一口气，总算可以考虑休假、忘掉5月的那些日子了，然而，报复却已经开始了。”^①

戴高乐6月的讲话号召保卫共和国，反对颠覆活动和专制的共产党人。在香榭丽舍大街的游行，保卫共和的各委员会的成立和公民服务机构的恢复……所有这些因素在左派眼里都证明现政权正滑向“法国式的萨拉查主义”^②。内政部长雷蒙·马塞兰于1968年9月声称：“我们以对人和法律的尊重来反对暴力”^③，但没有什么东西比这话更靠不住了。对极左派采取镇压政策使人担心政权将强化其专制性质，对国家的控制将更严格。五月运动揭发出的那些警察行径变本加厉，青年与政权之间的鸿沟进一步加深。在与一场革命擦肩而过后，法国是否会倒向独裁？

雷蒙·马塞兰与反“颠覆”

革命极左派的确相信法国将走向独裁。由于切实遭受镇压的打击并很难在工人阶级中立足，极左派只好把自己封闭在与内政部长进行病态的正式对抗中，因为内政部长是“警察国家”或“法西斯”的象征。他们总是把政府的政策放在完全扭曲形象的三角棱镜下观察、解读。法国被越来越多的人描写成完全依

① UNEF/SNE Sup, *Ils accusent, op. cit.*, p. 216.

② 萨拉查(1889—1970)，葡萄牙独裁统治者，1932—1968年任总理。——译者

③ *Le Monde*, 24 septembre 1968.

靠警察镇压、随时可能倒向法西斯主义的国家。

实际上，政权是在利用极左分子，利用他们的暴力行动和过火行为作为稻草人。把镇压的矛头指向他们，就是为了表明它依然是游戏的庄家，同时认为根本性的赌注是正在进行的改革。在戴高乐的支持下，由埃德加·富尔主持的大学改革的确表现出学院的运作有真正的创新。1969年戴高乐辞职后，新总统蓬皮杜选择沙邦·戴尔马任总理。沙邦·戴尔马鼓吹建设“新社会”。对此左翼改革派是不会反对的。

马塞兰推行的镇压政策对自由并不构成真正的威胁。在五月运动中备受谴责的警察行径继续变本加厉，青年与政权之间的鸿沟进一步加深。在新内政部长看来，事情似乎很简单：“麻烦出在1968年5月没有进行更有力的打击，特别是没有更迅速地加以打击。五月运动本来可以在两天内解决。要立即恢复秩序、监禁被捕者、抓住头头。”^①马塞兰要用自己的方式掌控局势并弥补过去未能及时进行的工作。他的策略是“打击头头，给颠覆运动自身造成不安全感”。^②于是他展开了一系列重要工作：在调查的基础上编制秘密档案、跟踪、窃听电话、暗访校园和宿舍、打入学生和革命派内部……

“颠覆行动”从此受到严密监视。为此，政府毫不吝啬手段：一般情报工作首先针对革命组织；领土警戒局也被调动起来；在内政部和每个大区 and 专区内设立各警署联络办公室；警察和宪兵在地方上进行合作。这些联络小组定期总结调查情况和搜集到的情报。

内政部长设计的反“颠覆”斗争至少存在缺乏区别对待的问题。情报和秘密材料工作已超出针对革命组织的范围，不仅涉及革命同情者及其社会关系，而且牵涉参加过或同情五月运动的教师、记者和大学生。

公共权力机构认为，一有任何示威苗头就要立即予以镇压，以免到了街头时措手不及。1968年10月3日，在巴黎举行的声援墨西哥大学生的示威中，警方逮捕了400人。1969年5月1日，总工会取消了示威游行。保安部队阻止任何集会，在各极左组织号召举行示威的贝尔维尔区进行大规模搜捕，在街头和地铁出口处有700多人被拘捕。

1969年11月，为阻止一次反对越南战争的示威，100多名极左派活动分子被预防性拘留，同时，警方在现场布下强大警力并在巴黎逮捕了数百人。皮埃

^① Raymond MARCELIN, Interview à *Paris-Match*, 4 mai 1971, cité par René BACKMAN et Claude ANGELI, *Les Polices de la nouvelle société*, François Maspero, Paris, 1971. p. 17.

^② Raymond MARCELLIN *La Guerre politique*, Plon, Paris, 1985, p. 57.

尔·维昂松-蓬泰^①在《世界报》上写道：“5月的幽灵险些使政权犯下错误并给新社会一张奇特的面孔——但历史会重演吗？”

关于起义的高谈阔论

在极左派组织心目中，“5月的幽灵”还是活灵活现地存在着。各派都强调要开展议会外的暴力斗争来推翻资产阶级。五月运动以其街垒和街头较量燃起在法国有可能举行起义的念头。暴力对众多活动分子仍有诱惑力，他们保持着新一轮运动即将到来的信念。

自发毛主义者是这一派中最极端的一支。他们在最疯狂的一部分青年中鼓动攻击性、煽动暴力。他们把自己的战争幻觉投射到法国的现实中，否定一切违背他们想法的事物。他们要以自己过分的方式去实践五月运动的一个口号：“我把我的愿望当做现实，因为我相信自己愿望的现实性。”对其他组织很不利的是，他们竟成为五月运动过后新闻报道的“头条”，从而吸引了大批大学生、知识分子和记者。在1968—1972年间，他们采取了引人瞩目的暴力行动，引起媒体的关注。

所有革命组织都大谈特谈暴力的政治意义，论战搞得热火朝天。一部分组织强调组织起来和积蓄力量的必要性，而另一部分则论述即刻发动“样板”行动的紧迫性。

对于起义的夸夸其谈，正统的马列主义者无疑是最擅长的。法马列共摒弃“通过选举有可能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幻想^②，认为这种幻想是法共“修正主义”的基础。资产阶级使用并将永远使用武装镇压来对付人民，一旦造反力量壮大，它便有可能走向法西斯。只有用革命的暴力才能夺取资产阶级的权力。《红色人道报》的一本小册子指出：“从现在开始，无产阶级先锋队就必须准备通过暴力夺取政权并把一切活动引向这个惟一的方向。”^③文章接着说明，在法国这样的国家，要走向武装斗争，必须“经过长期非武装的合法斗争，积蓄力量，最终在城市发动速战速决的起义。”^④

① 皮埃尔-维昂松-蓬泰，《世界报》社长。——译者

② 《Statuts du Parti communiste marxiste-léniniste de France》，*Cahier rouge*，n° 1，mai 1968.

③ 《En avant pour une démocratie populaire fondée sur la dictature du prolétariat!》，supplément à *L'Humanité rouge*，n° 49.

④ *Ibid.*

《红色阵线》组织则认为这种提法过于含糊,因此它加了具体说明:“无产阶级……必须首先在城市发动武装起义并确保对主要生命线的控制……无产阶级的武装起义必将转变为长期或短期的国内革命战争。在无产阶级必须从资产阶级强加的法西斯政权的桎梏下夺取政权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在发动武装起义(作为对统治阶级公开恐怖主义的反击)之前,党必须考虑无产阶级的武装干预。”^①这些提法使总情报机构忧心忡忡。

在统一社会党内,那些自称马列主义的人不甘示弱。他们指责该党没有明确反对“和平道路的神话”。统一社会党在五月运动中的口号——“工人政权、大学生政权、农民政权”以及领导层提出的“超越合法、但却是和平的手段”,在他们看来都是模棱两可的,是“意识形态的魔鬼”。这种对“国家和通过群众暴力起义摧毁国家的问题缺乏明确的看法”^②是与党内存在的“基督革命主义”相关联的。统一社会党内的马列主义分子认为,必须明确提出“长期或短期武装革命暴力的不可避免性”,而且“要为这个前景而从意识形态上准备群众”^③。

共产主义同盟的托派分子则强调将导致夺取政权的斗争进程。在斗争中设立罢工委员会必须与组织“自卫纠察队”同步进行,后者要成为“无产阶级军队的基本细胞”。工厂委员会和“工人民兵”的普及将使无产阶级在革命党的推动下拥有“暴力的集权组织”。劳动群众自己组织并武装起来(在他们先锋队的推动下),建设自己的与资产阶级法权无关的合法性:“这个国家将是造反起家的,它诞生于总罢工和长期的内战。不是任何选举产生的,不是任何法律许可的,没有事先制订任何宪法,它并非消极地继承被迫退出的资产阶级政府。”^④

自发毛主义者认为这样的前景只不过是五月运动“算账派”的侈谈:“他们虽然也谈武装起义和用工人纠察队作为起义的第一支队伍,但他们忘掉的不是枪杆子吗?”^⑤

看来道路已经指明:内战不可避免,必须为此做准备。选择似乎很简单:“要选票还是要枪杆子?”^⑥在五月运动中,示威者常常是赤手空拳面对镇压,然后拿起铺路石,投掷螺栓……那么,“面对剥削者射向人民的子弹,人民就要拿

① *L'Humanité nouvelle*, n° spécial, 1^{er} mai 1972.

② Alain BADIOU, H. JANCOVICI, D. MENETREY, Emmanuel TERRAY, *Contribution au problème de la construction d'un parti marxiste-léniniste de type nouveau*, François Maspero, Paris, 1970, p. 12.

③ *Ibid.*, p. 15.

④ *Ce que veut la Ligue communiste*, op. cit., p. 34.

⑤ *Cahiers de la Gauche prolétarienne*, n° 1, avril 1969.

⑥ *La Cause du peuple*, n° 6, 19 avril 1969.

起枪杆子，因为铺路石在机动卫队面前是无足轻重的。这种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不以我们的意志和善心为转移。五月运动是国内阶级战争的第一步。”^①

自发毛主义不打算久等“伟大夜晚”的到来：他们认为现在就应该开始，最后的起义只是眼前开始的暴力进程的结局。毛派反对“合法的极左派”，因为他们主张和平地积蓄力量，把群众革命暴力推迟到遥遥无期。毛派不愿等待：虽然现在还不能拿起枪杆，但可以采取暴力行动。无产阶级左派希望进行一场“不拿武器的游击战，同时准备手持武器的游击战”。^②他们反对“投降主义”，要以所谓游击战士的模范行动激发人们的造反精神：“大多数人民将会通过自己的经验懂得，必须结束现行的社会秩序，而且只要以人民的红军对恐怖主义的白军和共和保安队的暴戾军队，就能做到这一点。这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这个真理必胜。”^③

他们的“革命万岁！”派同志也不轻视暴力，而且更倾向于开展城市游击战的战略模式。但他们不忘提醒无产阶级左派：“暴力行动必须要使人懂得革命暴力的必要性，否则就值得怀疑。”^④

共产主义同盟的合理暴力

共产主义同盟在这一时期有着耐人寻味的影响力，这主要是由于它对诉诸暴力的问题上有较为深思熟虑的观点：自发毛主义不太注意给左翼政党留下严肃和负责的形象；托派则不同，它很注意不要脱离“工人的政党”，包括在暴力行动中也是如此。

共产主义同盟的秩序服务队很有组织性并表现出很高的效率：“当时我们就确信，会相当快地或者说在可预见的未来走向直接较量。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要有斗士，而且需要在暴力发生时有能力策划政治行动的人才。这是很必要的，我们注意到了，最后拥有一支类似小型私人军队的干预力量。”^⑤

共产主义同盟准备承担一切风险，决心与以暴力作为惟一准绳的自发毛主义派划清界线。他们认为“行动必须经过精心准备以便得到群众的理解”；“非

① *Ibid.*

② 《Texte d'octobre 1969》，*Cahiers de la Gauche prolétarienne*，n° 2，mail 1970.

③ *Vive la révolution!*，n° 1，15 novembre 1969.

④ *Vive la Révolution?*，n° 1，15 novembre 1969.

⑤ Henri WEBER，dans le film *Mourir à trente ans* de Romain Goupil.

法的暴力革命行动只有在与总的政治形势和群众觉悟相适应的情况下才有意义,只有充分考虑到群众的特殊情况才能使革命行动不至于反过来对准搞革命的人。”^①当同盟与其他组织共同举行示威时,它不愿意让“挑衅者”牵着鼻子走。

同盟搞了很多国际主义和反法西斯的行动。1969年11月袭击南越驻巴黎领事馆就是一例:“50名活动分子走出地铁,不知道要被带到哪里。他们让警察措手不及。他们手持染料弹、旗子和标语,攻击南越领事馆,把民族解放阵线的旗帜插在敌人的领土上。”^②阿根廷、英国和巴西等国大使馆也受到类似攻击:扔红色染料弹、展开标语横幅,等等。伊比利亚航空公司的窗户被砸碎,为的是抗议西班牙处决反佛朗哥的战士。美国大使也遭到攻击,他们把越南国旗插上马德莱娜教堂。最大胆的行动之一是一小撮人把红色染料泼在正在巴黎访问的南越代表阮文奇将军身上:“这次行动经过了好几夜的侦察。他从车子里出来,我们就把染料泼在他身上。他的贴身保镖没注意。警方到处寻找我们,而我们是来无影去无踪的。”^③

同盟的秩序服务队也同样表现出对付警察的能力。1971年3月9日在巴黎发生的情况就是一例。那天极右组织“新秩序”在警察保护下正在体育馆举行大会。同年在巴黎举行的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国际游行和集会也同样显示了同盟秩序服务队的组织能力。罗曼·古皮解释说:“所有这些行动都帮助我们慢慢训练出一支高效率的秩序服务队。服务队分成小队和小组,接近于军事化的运作。”^④

弗兰和索肖:毛主义的神话

在自发毛主义者方面,他们并不在乎别人提出的警告。形形色色的先锋队一再对他们说,重要的是“对被剥削群众做持久、耐心、系统的工作”^⑤;说他们是“急躁的小资产阶级”;劝他们阅读列宁的名著《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正统马列主义者不断提醒他们,重要的任务是“把工人阶级从修正主义的影响中拉出来”并将他们组织起来,使之恢复信心。共产主义同盟的活动分子

① Michel LENOIR, 《La violence hors de l'histoire》, *Rouge*, n° 149, 18 mars 1972.

② Romain GOUPIL dans le film *Mourir à trente ans*.

③ *Ibid.*

④ *Ibid.*

⑤ FABIEN, 《Travail prolongé, action de masse et violence révolutionnaire》, *L'Humanité rouge*, n° 54, jeudi 2 avril 1970.

则谴责那些不负责任的暴力行动，认为那是在“逃避革命组织建设的根本任务”^①。

这些都不起作用，也不会有什么作用。任何理性哪怕是以革命面目出现的理性都不可能制止这种疯狂性和行动的欲望。正是这种欲望把留下五月运动烙印的青年鼓动起来，他们一心想着要干一场，他们为无产阶级左派提供了大批成员。

1968年在弗兰和索肖发生的事件很快成为无产阶级左派活动分子津津乐道的象征性历史事件：来到弗兰与警察进行较量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完成了一次“意识形态的决裂”，使他们超越自己的阶级出身，变成真正的革命战士。通过暴力，小资产阶级使自己变成激进派，从而也就实现了无产阶级化，加入了工会企图加以遏制的工人阶级斗争。

尽管在弗兰的较量首先是大学生的事，但它依然标志着无产阶级斗争的新纪元。自发毛主义者认为，从此来过弗兰和没来过的人之间有了一条分界线。

要使自己相信革命迫在眉睫也需要到索肖去。在那里，1968年6月工人们奋力战斗，警察开了枪，造成数人死亡……革命的工人阶级随时拿起武器的梦想似乎变成了现实。为增加可信度，毛主义者匆忙补充说，在索肖的“战士”队伍里有一些是在1945年未放下武器的前自由射手和游击队员（抵抗运动时法共领导的武装组织）。

重要的是要相信这一点并保持这种幻想。无产阶级左派领导人在事隔三年后说：“工人们承认，毕竟还是有8—11名共和保安队员被打死。内政部长没有承认。但所有同志在与索肖的小伙子们讨论中完全证实了这个数字。”^②所有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但经毛派审核过的工人的话不容置疑。

“革命万岁！”派认为，在索肖发生的是一次“震天动地的工人起义”：“工人们不仅组织了对6月11日清晨共和保安队进攻的抵抗，而且于6月11—12日在索肖和蒙贝里雅尔从自卫转入反攻。在这次反攻中，打死11名保安队员；两名工人——亨利·布朗谢和皮埃尔·贝洛在战斗中英勇牺牲。这次反击的结局是共和保安队手持猎枪和步枪的1500名工人面前逃之夭夭。”^③

虽然工人们夺取的惟一武器只是在指挥车上找到的手榴弹发射器，而且立即就被捣毁，但无产阶级左派的毛主义者认为，索肖的斗争是对想像中的起义

① *Supplément à Rouge*, n° 37, novembre 1969.

② Pierre VICTOR, in Michèle MANCEAUX, *Les Maos en France*, Gallimard, Paris, 1972, p. 195.

③ *Vive la révolution!*, juillet-août 1969.

的响应,他们从中看到巴黎街头战斗的再起,并且受到毛泽东军事著作的启示。当在索肖听到“下一次要用步枪迎接保安队啦”^①的时候,他们推断这是“最先进的工人经验”。不在乎事情是否真实,他们关心的是向自己证明五月运动并非革命的梦想,毛的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法国这样的国家是完全可信的。在弗兰和索肖事件后,实现这个口号就必须实行学生与工人相结合,同资产阶级作决定性的正面斗争。

未服过兵役的毛派大学生开始认真阅读毛主席的有关著作。毛主义者比托派更注重写作、分析、总结、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他们发展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军事词汇并企图把中国30年代抗日的英勇战斗搬到60年代的法国来。

在法国,要实行农村包围城市、创立解放区和“革命根据地”看来不是轻而易举的事。那不等于又回到“旺图山^②区创建游击基地”吗?至于学院和大学的校园,不管活动分子怎么想,也不能完全代替“解放区”吧。同时也看不出将来的红军怎么能在法国农村操练部队,哪里可以做它的练兵场。这个问题不要紧,重要的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③

事实上,无产阶级左派要用他们丰富的知识设计出虚拟的军事蓝图。在他们笔下,工厂变成“根据地”,是“游击战的后方”,但不能与“游击区”混为一谈。“游击区”应该是“城市工厂”(如标致汽车厂周边的索肖)或者是“工厂区”(如雷诺弗兰厂四周的芒特-埃克维利-莱莫罗)^④。

阿让特伊的贫民区,塞纳河上伊夫里的移民劳工之家,比扬古雷诺厂附近的地铁站(无产阶级左派分子曾在那里大打出手)成为重大“战役”的战场。缺少经验的读者甚至会把这些地区与一些遥远神奇的地方相媲美:“要开展类似阿让特伊和伊夫里那样的斗争,这些战役起到纳萨尔巴里那样的作用(纳萨尔巴里是印度的一个地区,据《北京周报》透露,那里于1968年爆发了农民战争):‘在纳萨尔巴里农民进行英勇斗争后,一种新思想诞生了,那就是要为夺取政权而斗争。’”^⑤

在比扬古雷诺厂周围展开了“地铁战”。毛派的作战计划是“包围雷诺,特

① Michèle MANCEAUX, *Les Maos en France*, op. cit., p. 196.

② 旺图山在法国沃克吕兹省北部,海拔1912米。——译者

③ Citation de Mao-Tsé-Toung, en exergue aux *Cahiers de la Gauche prolétarienne*.

④ 《Pour la résistance》, *Cahiers de la Gauche prolétarienne*. n° 2, mai 1970.

⑤ *Ibid.*

别是塞甘岛”，为此必须绕过一些咖啡馆和下默东及布雷涅的“移民家园”。但“前沿阵地”还不很明确。无论如何，“要进行大规模的部队移动，建设牢固的工人和人民大后方，彻底粉碎敌人的包围。”^①梦想着英勇战斗的毛派青年是一群一本正经而又古怪的战略家。

“革命万岁！”派试图通过发挥其火药味较少的观点使辩论明朗化：“城市游击战将主要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斗争。支持这种斗争的暴力行动与中国、越南的持久战，甚至与法国的抵抗运动都不可同日而语。”^②

《人民事业报》眼里的法国革命

毛主义者通过《人民事业报》把法国描写成处于革命前夜的形势。在法国最偏僻的角落发生的微不足道的斗争也被写成具有起义性质。不承认并歪曲现实，普遍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影响，在毛派身上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1970年9月，在雪铁龙厂里，螺钉像雨点一样砸向工头们；法西斯独立工会的代表被扔进油桶里洗了个澡。在雷诺厂，2000名工人怠工支持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塞纳-马恩地区的农民为阻止驱逐一名佃农而与警察发生殴斗；蒙特勒伊的商人为阻止驱逐一名咖啡店员而扣押了警察。”^③

毛主义者相信他们的暴力行动必将导致革命的发展：“所有被扣押的老板，所有被铺路石砸伤的警察，所有挨揍的小头目都会对你们说：‘糟透啦，到处都是暴力。’当老板被扣押、警察挨揍、富人被抢的时候，我们和穷人，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会同声说：‘好极啦。’”^④各阶层人民“一浪接一浪”地站起来，而“政权将不得不宣布几十万工人、农民、大学生、手工业者和商人为‘非法’”。1968年5月开始的“新抵抗运动”将日益壮大，向着胜利前进。

《人民事业报》把一切形式的暴力都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为对付警察，一切暴力都是可取的。一些火气十足的文章报道了各条战线上的许多行动：从周六晚上舞会中的斗殴到移民劳工之家被占领，还有“小头目挨揍”、“反对修正主义的战斗”、工厂里的“破坏活动”，所有这些少数人的行为都被做了突出报道。

暴力成了革命划线的绝对标准。在《人民事业报》上，鼓吹新型战争的文章

① *Ibid.*

② *Vive la révolution!*, n° 6, 5 juin 1970.

③ *Le combat des détenus politiques*, François Maspero, Paris, 1970, p. 2.

④ 《Ça ira! Ça ira!》, *La Cause du peuple*, n° 22, vendredi 15 mai 1970.

连篇累牍：“老板们，要打仗啦！”^①“青年红色旅，发起攻势吧！”^②“要以两眼还一眼，以整张嘴还一颗牙！”“老板们、各工会，检查一下你们的操作吧，爆炸近在眼前啦！”^③……文风有时很雕琢：“打击压迫者要打击他们的骄奢淫逸，打击他们金灿灿的黄金，还要剥他们这些猪的皮。”^④

毛主义者不怕“打架”，甚至有找架打的倾向。

1969年6月，一些年轻中学生在无产阶级左派战略家的带领下纪念吉勒·托坦之死，又搞起了一年前在弗兰的战斗：他们冲击工厂，用铁棍和镐把与管理对抗。他们刷写标语，插上红旗……在场的工人远远地观看着这场冲突。《人民事业报》则高呼胜利。

事实上这些“游击行动”远未能让被剥削群众“恢复信心”，也未能带动群众。其他极左组织对此不抱幻想，而且对这些破坏他们工作的暴力行动越来越反感。这一点在其他极左报纸上的许多辩论文章中可以得到证明。在马赛，1969年科代工厂的罢工中无产阶级左派的活动分子与总工会的活动分子发生激烈冲突，一人进了医院。工厂的工人们都置身事外。《红色人道报》写道：“在这场光荣的战斗中，人们向工人们表明工会头目的权威是可以扫除的，造反是有理的。”经过这场战斗，工人们完全理解了他们的教诲，以至于第二天行动委员会的大学生受到拳打脚踢，而且该厂没有一个工人愿意参加这场战斗^⑤。

这些批评丝毫未能阻止无产阶级左派加强他们的行动。1969年9月，他们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旗帜插到巴黎罗特希尔德银行大楼上。在阿让特伊市场，他们跟共产党活动分子发生了激烈碰撞，被称为“无产阶级反修第一战”。11月，马赛警署受到燃烧瓶袭击。

1970年中，“新游击队”的行动变本加厉：在敦刻尔克，几名工人在工伤事故中死亡后，一部起重机遭破坏；在无产阶级左派的一些活动分子被捕后，南特-拉-若利的警署遭袭；在16名矿工死于富吉耶的瓦斯爆炸后，埃南-利埃塔尔的煤矿办公楼被扔燃烧瓶；科贝伊大磨坊的行政楼起火，等等。在最后这次行动过后，《人民事业报》宣称：“游击队的前途是光明的。”^⑥

在企业里，野蛮罢工加上扣押人员让毛主义者兴高采烈。他们火上加油地

① *La Cause du peuple*, n° 11, août 1969.

② *La Cause du peuple*, n° 13, 31 octobre 1969.

③ *La Cause du peuple*, n° 14, 10 décembre 1969.

④ *La Cause du peuple*, n° 30, 4 novembre 1970.

⑤ 《*La Cause du peuple ou la cause sans peuple?*》，*L'Humanité, rouge*, n° 54, 2 avril 1970.

⑥ *La Cause du peuple*, n° 18.

说：“肮脏的老板阶级，我们要在肖莱、夏多布里安、卡昂城扣押你们！老板，明年要把你吊在工厂大门上！我们有理！”^①

“革命万岁！”的毛主义者调门不那么好战，但也不嫌弃“样板行动”。1970年1月，他们在一些关注街头行动的知名人士支持下，占领了雇主协会的会址。这次占领的目的是抗议4名移民劳工在奥贝继里耶之家窒息而死，并引起对移民劳工生活条件的关注。他们展开揭露资本家不负责任的横幅。

3月份在巴黎郊区的默兰市搞了一次更激烈的行动：活动分子砸了小企业联合会的办公室，象征性地占领了市政府，以抗议可能与小企业联合会有牵连的一起贩卖移民人口交易。《革命万岁！》报上说明：“这次袭击之前做了类似军事行动的准备。10分钟就完事了。”^②在该报同一期上，对“农泰尔战役”作了详尽描述，并配有警察在投掷物下仓皇逃跑的照片。

无产阶级左派的某些行动与“广大群众”的利益关系更直接。1970年2月，毛派发起争取地铁免费运动：“运牲口的车厢够多啦！让我们去占头等位子吧！”他们把偷来的车票免费发给大家，并高呼“生命是宝贵的，被奴役的生活过够啦！”他们与公交职工对抗，在一些车站上跟警察冲突。地铁战一直打到比扬古站。

1970年5月8日，他们冲击并抢劫了巴黎马德莱娜广场上的福雄高级糕点店，留下一份传单，上面把鹅肝酱和冰镇栗子的价格与一个专门工的月工资作了比较。他们把这些高档食品发给农泰尔一居民点的移民劳工，使他们大喜过望。这是一次重要的象征性行动，立即引起媒体的反应。

五月的幽灵

镇压降临到活动分子们的头上了：他们在家中被传唤；在市场或工厂门口贴标语发传单卖报纸的都被逮捕……五月运动过去两年后，内政部长采取的镇压措施似乎不够了，政权要进一步强化镇压政策。

虽然大中学生群众仍然是无休止的异议中心，但政权也要面对一系列涉及其他社会阶层的示威和暴力冲突：在青年工人大显身手的一些冲突中，老板和管理人员被关押；农民和造反的小商贩在示威中与警察发生冲突……报纸每天

^① Cité par Virginie LINHART, *Volontaires pour l'usine. Vies d'établis, 1967-1977*, Seuil, Paris, 1994, p. 71.

^② *Vive la révolution!*, n° 3-4, mars 1970.

都在报道这类震撼法国的“骚乱”。

1970年4月，政府提出的《反打砸法》虽然在政界和舆论界有很多保留，但仍获得通过。该法规定任何参与未经批准的示威为非法，并追究号召示威的组织者责任：如示威活动中发生损坏现象，组织者应负责赔偿。这样一来，示威的自由成了问题，大门向一切挑衅行为打开了。

无产阶级左派报纸《人民事业报》的前后两任社长米歇尔·勒·布里斯和勒·当泰克都遭追捕并于1970年5月27日受审。毛派声称这一天将是“抵抗日”。据报道，当日发生了几起冲突。马塞兰取缔了无产阶级左派。勒·当泰克被判1年徒刑，勒·布里斯被判8个月。治安部队在拉丁区不分青红皂白地进行打击。《战斗报》报道：“不管是示威者、散步者，还是无产阶级左派活动分子，统统都要挨警棍。事情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于护理人员几乎要做到随叫随到。当警察追打一个孤立无援的人时，人们不禁要问：这与维持治安有何关系？”^①

无产阶级左派为这个日子而进行的动员以失败告终。毛派拟包围圣-拉扎尔火车站，但被警方抢先占领了。拉丁区再度成为暴力摩擦的场所，并发生了几起与五月运动时相比微不足道的破坏。新闻媒体强调指出，老百姓和毛主义者之间已经产生了裂痕。毛派试图使自己恢复信心，说媒体是一如既往地又一次在撒谎。然而后果是明摆着的，连“革命万岁！”的同志们也不得不看到：“毛主义者想让大家受骗上当。他们许下太多无法兑现的诺言，夸口要解救勒·当泰克，要大家都走上街头。资产阶级的主要力量仍然在于我们有弱点，在这方面夸口是无益的，他们真是太张扬了。”^②

共产同盟的托派分子讲得更深刻：“27日，几百名毛派活动分子力图使五月运动的回忆复活，但他们只是完成了一出令人伤心的滑稽模仿秀。著名的‘样板行动—镇压—声援’的循环曾在五月运动中使当局吓破了胆，但现在已经不灵了……毛派关于群众普遍造反的提法不过是句空话而已。”^③他们又教导说：“在宣布游击时代到来之前，必须先把群众争取到社会主义上来。”^④

无产阶级左派在1970年夏季开展的“不让富人休假”运动使该派的行动具

① *Combat*, 29 mai 1970.

② *Supplément au n° 6 de Vive la révolution!*.

③ H. W., 《La “résistance populaire” après l’interdiction de la “Gauche prolétarienne”》, *Rouge*, n° 66, 1^{er} juin 1970.

④ *Ibid.*

有闹剧倾向。在几个被他们命名为“阔佬猪棚”的豪华饭店里，“游击战士”在地毯上泼粪便，往游泳池里倒沥青，用机动犁翻高尔夫球场的土，扎汽车轮胎并焚烧豪华车。在南方，他们把复仇的口号刷在几艘游艇上。为表示慷慨大方，他们宣布“这里是人民的假期”。8辆红色大轿车插着标语牌，高呼“游击队”的口号，将一些劳动者的孩子送到海滨。

阿兰·热斯马尔也受到指控。在一次声援《人民事业报》两社长的联合大会上，他发表了一个号召抵抗的演说，被指控犯有“直接挑衅并造成后果、用暴力反对公共权力代理人”罪。警方经寻找最终在他藏匿的套间里逮捕了他。1970年10月审判时，现场布置的警力令人吃惊：5000名警察把西岱岛^①围得水泄不通，警方调动了直升机、消防车、扫路机和摩托化大队……律师亨利·勒克莱克说：“在这些粗暴行为的背后，在这些有机玻璃面罩后面，人们感觉到的是正在上升的可怕的法西斯面孔。不必担心，明天巴黎将会秩序井然，但这却是不久前在华沙、今天在雅典和布拉格的那种秩序。”^②

《人民事业报》继续欢呼它的英雄们在军事上取得的胜利：“50名游击战士头戴钢盔、手持棍棒和燃烧瓶直冲警察队伍和干预大队车辆的心脏地带；4人受重伤，1人的猪脸被燃烧瓶击中，像松脂一样燃烧起来。这次行动指明了道路。”^③11月20日，热斯马尔被国家安全法庭判18个月徒刑。

逮捕毛主义者和对“重建被取缔组织”的指控日益频繁。国家安全法庭的判决很严厉，刑期都在1—3年之间，其中有些还被并处剥夺公民权和家庭权。

一个脱离青年的政权

政权的强硬态度不仅仅针对无产阶级左派。1970—1971年间，年轻、留长发并在布置有警察的拉丁区散步并非好事：“不应该忘记那些街道，那些对拉丁区的搜索和用汽车堵住你的摩托车、检查你有无毒品的警察。警察随时出现在你面前。我只要一坐下，就有头戴军帽的人强迫我站起来。”^④

群众游行时，警察经常挑衅：“踢一脚、绊一下腿、骂一句就足以挑起事端。

① 西岱岛，巴黎市中心塞纳河上的小岛，巴黎警察总署和法院所在地。——译者

② *Minutes du procès d'Alain Geismar*, Hallier, Paris, 1970, p. 179.

③ *La Cause du peuple*, n° 30, 4 novembre 1970.

④ 《Par-delà le bien et le mal》，entretien de Michel FOUCAULT avec des lycéens, recueilli par M. -A. BURNIER et P. GRAVE, *Actuel*, n° 14, novembre 1971.

谁要反抗或稍有反抗的表示，他就是极左分子；谁要一声不吭，那也是可疑分子。‘喂，你怎么这么冷静？’特种部队的一名警察星期一用嘲弄的口吻问一个无动于衷的行人。”^①检查身份要在甄别中心待着，并在随便什么借口下遭辱骂和殴打。在甄别中心关押几小时后，警察便将从大郊区各点来的示威者驱赶出去。

1971年2月17日，即中学生吉勒·吉奥被捕的那天，“革命万岁！”组织的成员、20岁的理查德·德赛在同警方冲突中被手榴弹击中脸部，经手术急救后，他断了鼻梁并失去一只眼。他血流满面的照片被广为传播，照片下写着：“他们要杀人啦！”

公众舆论群情激昂。莫里斯·克拉维尔在《战斗报》中质问莫里斯·克里莫：“警方平时的攻击并不温和，但尚可勉强认为游戏规则就是如此。但这次却完全是另一码事，比用警棍清理现场要坏得多，比扑向倒地的示威者要坏得多，而这正是克里莫自己在五月运动中致警察的信中所痛斥的做法。”^②在城区布置大批警察、诸多政治性的诉讼、“反打砸法”的通过……这一切不仅使革命分子深感担忧，而且也让工会和政界的左翼和许多重要人士、知识分子忧心忡忡。

内政部长受到强烈批评。镇压的事实和警察的过火行为未能悄然无声地过去。极左派的报纸，还有众多记者都做了报道。一些包括活动分子、知识分子和记者的委员会为维护受指控者和调查警察的暴行而动员起来。政权必须重视这类战斗动员和对侵犯民主自由十分敏感的公众舆论。

从1968年到1971年，新闻界揭露了一系列直接牵连警察的事件。在五月运动中备受谴责的警察暴行远未消失。他们拥有真正的免责权，内政部长要求的坚定性使他们受到鼓舞。这些行径又一次被当众揭发，引起公愤。

1971年5月29日，《新观察家》周刊记者若贝尔因向一名受伤的示威者提供救助而遭到警察毒打：“当我说我是记者时，他们回答说：‘我们讨厌你们干的蠢事。记者都是混蛋。我们要你的命，混蛋。’我受到种种辱骂：‘下流坯、垃圾……’等等。然后他们又口出脏话：‘我们讨厌那些跑来让我们拉票的黑鬼和混蛋。’当我说我也是教员时，他们却说：‘那就更有理由搞死你了。人们骂我们是纳粹党卫军，但党卫军至少还是男人。他们有那玩意儿，而你却没有。’令人吃惊的是，他们一直骂个不停，最后把我的裤子扒下，拧我的睾丸。”^③

① Jean PLANCHAIS, *Le Monde*, 24 octobre 1970.

② Maurice CLAVEL, *Combat*, 18 février 1971.

③ Alain JAUBERT, *Le Nouvel Observateur*, 7 juin 1971.

若贝尔控告了警方,巴黎记者开始罢工,成立了“反调查”小组。作家兼记者莫里斯·克拉韦尔写道:“我从未喊过 CRS=SS,但我担心我要开始这样喊了!”^①

莫里斯·克里莫则强调警察遭受的侵害,他那些富有人情味的讲话最终令人厌烦,而且起了掩盖越轨行为的作用,这种行为自1968年5月以来从未停止过。《精神》杂志社社长多梅纳克的反应充分表达了知识分子和广大舆论部门的愤慨:“我们听够了有关警察荣誉的讲话和关于警察所受苦难的充满温情的报告。这些话都是在回避问题。巴蓬总署署长要直截了当得多,他对他的手下说:‘干吧,你们有人罩着。’而那是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时代说的话。在当前形势下,话应该说得婉转些。克里莫总署署长就曾在其致属下的信中这样做了。但人们需要的是态度,而不是一些掩人耳目的处罚和悄悄话。”^②

还有另外一些令人不安的越轨行为,那是与多数派和现政权多少有直接联系的一些组织犯下的。1968年6月,在动员示威时引来了一批社会闲散人员甚至流氓充当戴派党及其外围组织的“打手”。1970年,经调查证明,当年5月格勒诺布尔法院爆炸案的肇事者是前秘密军队组织的成员和保卫共和联盟的成员^③。在贝桑松发生的其他一些谋害案的肇事者也与多数派有关联。

雇主的民兵也出来干预,驱赶工人纠察队,袭击活动分子。1972年7月在伊西莱穆利诺,雪铁龙汽车公司的内部工会成员袭击了一场支持南斯拉夫劳工占领工会之家的舞会。他们被暴力击退,但劫走两名少女,其中1人遭强奸。

在选举过程中,张贴标语者之间的斗殴不断增加,有时以悲剧结束,多数派及其外围都牵连在内。1972年2月在皮托市的市政选举中,1名突击队员向社会党的贴标语者密集射击,打死1人(萨拉·卡塞)、打伤7人。1972年4月在伊尔松,另一名活动分子被击毙。

言论和出版自由同样受到严重侵犯。《警察黑色档案》^④一书的作者德尼·拉格鲁阿律师受到起诉。曾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受到新闻检查打击的出版社弗朗索瓦·马斯佩罗是当局的头号打击目标。从1969年到1971年,他被轻罪法庭审判15次,并因出版《三角大陆》的法文版而被处以18万法郎罚款。该杂志曾于1969年以“外国来源”为由被禁出(那是由“声援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

① *Combat*, 31 mai 1971.

② Jean-Marie DOMENACH, *Le Monde*, 18 février 1971.

③ *Le Monde*, 16 et 18 mai 1970.

④ Denis LANGLOIS, *Les Dossiers noirs de la police française*, Seuil, Paris, 1971.

人民组织”在古巴出版的一本杂志)。1971年,《中学生小红书》^①也以同样理由被禁。此外还有那些揭露与法国政府保持密切关系的外国政权的著作:1971年蒙果·卡米托的《刚果(金)的大谜团》^②遭禁,其出版商也被指控犯有“侮辱外国元首”罪;1972年7月蒙果·贝蒂的《伸向喀麦隆的黑手》^③也被禁止。仅1972年一年内,弗朗索瓦·马斯佩罗就以“企图出售被禁作品”的罪名被9次诉讼^④。

电影的生产也同样受到新闻检查:1969—1970年间有43部电影被禁止发行,理由有风化方面的,也有因片中有“颠覆性言论”的。电影审查委员会对一些影片提出不利的意见,如路易·马莱导演的《修女》、《克利希的平静日子》、《心中的风》等,理由是“精神毒害”或“无理性的色情描写”^⑤。

对这类行径的抗议甚多。这类行径使现政权与社会的发展变化越来越脱节,它根本不理解这种变化。

警察做出反应

镇压政策的发展在警方内部也引起不安。警署职工工会联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法国人的生活被忧虑大学生与警察之间的冲突所左右,难道这是正常的吗?……国家使自己被每天的敌人——大学生、工人、公务员、商人所包围。它似乎只能在国家力量的武力表演中才得以安生。国家武力大规模地调动,进行分区控制,检查划定区域,并时不时地在镜头上露脸,以向坐在电视机前的良民证明警方关注着一切。”^⑥

警察对自己总是受指责并被视为杀人犯、党卫军感到愤懑,许多人对于言论自由受侵犯、对所犯下的粗暴行为以及对警察内部存在异己组织深感不安。异己组织的存在早已为人所知,“它们没有保持国家机构所应保持的政治中

① Bo Dan ANDERSEN, Soren HANSEN, Jesper JENSEN, *Le Petit Livre rouge des écoliers et lycéens*, traduction et adaptation française; Lonni et Étienne BOLO, CEDIPS, Lausanne, 1970.

② Cléophas KAMITATU, *La Grande Mystification du Congo-Kinshasa*. François Maspero, Paris, 1971.

③ Mongo BÉTI, *Main basse sur le Cameroun*, François Maspero, Paris, 1972.

④ Catalogue 1973 des Éditions François Maspero, p. 158.

⑤ Roger DOSSE et Jean DUFLOT, « Quarante-trois films interdits en deux ans », *Politique-Hebdo*, 10 décembre 1970.

⑥ *Le Monde*, 1^{er} avril 1969.

立”。^①

1971年3月4日,公共机构自治联合会负责人组织一次与巴黎市民的对话,以显示警察的“社会角色”。几天后,也是这个工会对利用警察保护极右组织的一次集会提出抗议。那次集会是极右组织“新秩序”于1971年3月9日在巴黎举行的:“他们让一些人把自己装备起来,头戴钢盔手持铁棒或镐把在大街上晃悠……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在当晚的冲突中‘新秩序’的秩序服务队混在警察中间殴打进行‘反示威’的群众。”^②警署职工总工会在其1971年4月的报告中指出,警察“并不是为某一部分公民(哪怕是多数),而是为全体公民服务的”。^③

1971年4月,克里莫署长被免职。同年9月,警察工会的负责人因批评了公共权力机构的某些立场而受到处分:主席被赶下台,其他4位负责人被内政部宣布退休。但这类措施并未能消除警方内部的批评。一名治安警察说:“我们所要求的,是恢复我们真正的使命:我们是服务于国家和公民的公共机构。然而,由于时势使然,我们被迫成为为政府效力的镇压力量。希望政府负起责任来。我们不是属于它的警察。”^④

五月运动过后,关于自由和法制国家的辩论烽烟再起。取缔极左组织引起对“危害国家安全”的概念和对国家安全法院的组成、职能及特别司法权的质疑。对为了驱逐外国人而援引无可替代的“绝对紧急”概念又该作何感想呢?人们也看到,“反打砸法”引起许多争论,包括多数派内部。工会和左翼政党指责该法引入集体犯罪概念,而这是违反法国人权的,而且他们认为这是对全体公民的威胁^⑤。

然而,尽管受到这些措施和警察出纰漏的影响,法治国家仍然是对付一切专制诱惑的有效堡垒。正因如此,当1968年6月马塞兰建议逮捕革命组织负责人时,这个决定还是以缺乏法律依据为由被否决了。1970年,当议会表决组织社团要经警署审批的法案,从而直接否定结社自由时,情况也是如此。该法案由参议长阿兰·波埃提交宪法委员会时被宣布违宪。

在政权方面,宪法“护栏”起了作用。对极左骚乱进行镇压并未把国家推向

① Roger DAURELLE, 《Pour une police républicaine》, *Preuves*, n° 9, cité dans *Le Monde*, 4 janvier 1972.

② Gérard MONATE, *Le Monde*, 11 mars 1971.

③ Cité par Michel LÉVINE, *Affaires non classées*, Fayard, Paris, 1973, p. 307.

④ 《Un gardien de la paix parle》, *La Vie catholique*, 23 juin 1971.

⑤ *Le Monde*, 8 mai 1970.

1968年后许多人都认为可能的专制制度。甚至从马塞兰(他是镇压的象征、极左分子眼中的黑马)的言论中也可以看到一个不乏智慧的观点:“千万不能干无可挽回的事。把螺丝拧紧后要立即松开,以免使我们的体制变形。所有极左的青年最终都要蜕变成温和的议员或记者。”^①共和国曾见过其他人有过这样的经历。

“扩大抵抗”

不难想像,革命活动分子,尤其是无产阶级左派活动分子,眼前是不会接受马塞兰上述观点的。其组织于1971年被取缔、成员遭受镇压的打击后,无产阶级左派领导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立场。它同进步知识分子建立了联系,要求让·保罗·萨特出任其各种出版物的社长。他们今后要“扩大抵抗”。一方面要发展“民主阵线”——争取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一起反抗“镇压”和“新法西斯主义”,在每条战线上建立“自治组织”;另一方面,建立“隐蔽部门”,把“公开游击战”和“隐蔽游击战”结合起来。这两类行动将分别由“民兵”和负责暴力行动的地下游击组织来进行,即所谓“新的人民抵抗运动”。暴力和军事行动的诱惑力是不容置疑的。

“新人民抵抗运动”成立伊始便声名远播。1970年12月,它把议员米歇尔·德格拉伊绑架了几个小时。在试图用药将他灌昏并装进箱子后,释放了他。该议员曾是1963年国民议会通过建立国家安全法院法案的报告人,也是负责维莱特大型屠宰场合股公司的董事长(该屠宰场从未投入使用)。这次“逮捕”和“审判”将足以使广大群众看清法律的不公正和维莱特的丑闻。德格拉伊以为那是极右派干的事。他声称:“在这次谋害行动中还有某些温和的表现。我挨了打是因为我愚蠢地挣扎。绑架者的目的显然是作弄我。他们想给我打针使我昏睡,他们相信记者们一定能在箱子里找到沉睡的我。”^②

“新人民抵抗运动”制订了多个绑架董事长兼总经理的计划并在一项公报中威胁说:“如果布萨克先生想过最后几天安静的日子,就请他停止解雇纺织厂的工人。”还有“工人民兵”也开始行动了。1971年1月在比扬古雷诺厂,一个“第五层反警察工人小组”用自行车链条袭击一名工头:“大嘴罗伯特付出代价

^① Raymond MARCELLIN, *La Guerre politique, op. cit.*, p. 63.

^② Cité par Claude ANGELI, *《Volontaires Pour La Violence》*, *Politique-Hebdo*, n° 10, 10 décembre 1970.

啦。”

在洛林地区,还有一个神秘的“反钢铁厂灰尘民兵小组”,把糖放进一部推土机的油箱里,说:“让老板为他给我们吸的灰尘付出代价。”^①1971年9月在蒂永维尔城发生一起袭击“富人火车”事件,被《人民事业报》描写成一次公交行动^②。活动分子们封锁了“泛欧特快”列车,用油漆在车厢上刷写呼吁反对该地区关闭工厂的标语,署名“拉芬什工人民兵”。

1971年学校开学完全是在一片反劳动节奏、反种族主义和种族暴力的气氛中进行。毛派的行动不完全具有佐罗和罗宾汉^③的风格。暴力也不像毛派领导人的著作所写的那样易于控制。

7月23日,一批活动分子向约旦大使馆投掷燃烧瓶,抗议侯赛因国王镇压巴勒斯坦人。其中一名活动分子克里斯蒂昂·里斯被警察追上,一名惊慌失措的警察拔枪向混杂的人群射击,使里斯身受重伤。9月29日,一个名叫“多国工人民兵”的组织抓住一名正在指挥交通的警察,用一件儿童玩具换下他的值勤武器。这类行动显然只是象征性的。

1972年2月25日,在比扬古雷诺厂,毛主义者散发传单,号召举行反种族主义示威。他们推开看守,冲击企业,打碎值班岗亭的玻璃。一名工厂保安拔出手枪指着手持镐把的皮埃尔·奥维尔耐:“他走近皮埃尔并威胁他。皮埃尔仍然无动于衷,嚷道:‘来吧,开枪吧!’他真的开了枪。”^④皮埃尔前额中弹倒地,被送到医院便没再醒来。

他的死讯引起莫大震动并令人深感不安:五月运动以来这还是第一次在直接对抗中死了人。很多人担心发生更坏的情况,认为毛主义者会进行同样血腥的反击,从而造成不可收拾的暴力—镇压的恶性循环。

3月4日,皮埃尔被安葬在拉雪兹神甫公墓,约20万人为他送葬。参加者惊奇地发现如此众多的人在一片红旗海洋中走到一起,许多人手中都持一朵红玫瑰。送葬队伍中时而革命歌声四起,时而一片寂静,人们激动不已。队伍中有社会党的代表团,而法共和总工会没有派团参加。在皮埃尔死后,乔治·马歇曾谴责当局搞了“新一轮大规模的挑衅”。队伍中的毛主义者则高呼“马歇撒

① 《Dans l'empire de Wendel, les débuts de la milice ouvrière》, *La Cause du peuple-J'accuse*, n° 9, 23 juillet 1971.

② 《Thionville, le train des riches bloqué》, *La Cause du peuple*, n° 9, 23 septembre 1971.

③ 罗宾汉,英格兰中世纪传奇英雄,热心救助穷人。——译者

④ Témoignage d'un militant de la GP à Billancourt, cité par Virginie LINHART, *Volontaires pour l'usine*, op. cit., p. 79.

谎，马歇是杀人犯的同谋！”

在皮埃尔身亡的当天，前无产阶级左派领导人竭力劝阻一心只想尽快报仇的活动分子。当晚在沙罗纳，该派号召举行示威，与警察发生极其激烈的冲突，但总算没有进一步升级。在拉雪兹神甫公墓入口处，阿兰·热斯马尔向人群喊话：“我们发誓一定要铲除隐藏在工厂的法西斯分子。皮埃尔，我们看着你的脸呼喊：取缔老板的法西斯民兵！”令众人大感意外的是，无产阶级左派包括它在游行队伍中的人，均未呼喊报仇。

3月8日，即皮埃尔安葬后的第四天，新人民抵抗运动的一批人绑架并关押了比扬古雷诺厂保安部副主任、63岁的罗伯特·诺格雷特。突击队在一份公报中要求释放所有被监禁的左派分子，重新雇佣皮埃尔死后被解雇的活动分子，并说明考虑到诺格雷特的健康需要，他能够吃到无盐食品。在寄给广播电台并被播出的一盘录音带中，诺格雷特告诉其家人他很好，不必担心。此事令全国震惊，群起责难。每个人嘴边都挂着这样的问题：突击队会杀了被绑的人吗？

诺格雷特两天后被无条件释放。新人民抵抗运动的一位领导人在接受《人民事业报》采访时说：“不存在我们要处决俘虏的问题。实际上不是一个组织就能迈出这一步的，只有人民舆论做出决定时才能迈出这一步。”^①

我们还会回过头来谈这一事件（见第14章）。皮埃尔·奥维尔耐的悲剧性死亡为毛主义者卷入的螺旋形暴力打上一个急停休止符，也标志着极左“光芒四射”时代的结束。但当时很少活动分子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中的大多数反而认为这是法西斯主义新发展的迹象。

^① *La Cause du Peuple-J'accuse*, n°21, 25 mars 1972.

十二、法西斯主义阴魂不散

在朦朦胧胧的革命派内部,有一个词汇很能概括当时的观念,即法西斯主义从镇压滑向法西斯的确是轻而易举的。而持不同政见者最终使这两个词意变成了拒绝一切权力、一切形式的权威,乃至一切有组织的社会生活的借口。尽管他们旁征博引,但如果想从中找到对法国社会认真的理论分析,那就大错特错了。法西斯主义已经成为一个失去任何具体政治意义的包罗万象的概念。从逻辑上讲,这种现象不是理性的,而是一种疯狂性,即疯狂地反对实行镇压的政权,反对拒绝接受革命前景的社会。

由于许多被披露的镇压事实还显得不够有说服力,这些事实就被解读成即将发生最坏情况的先兆。一切反对这种解读的意见都会立即被斥为“掩盖罪行的意识形态和谎言”,是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本性使然。

法西斯主义被说成是迫在眉睫的事,它注定来自“上头”,来自国家本身,更确切地说是来自内政部。同时,它依靠的是人们头脑中的反动思想。法国广大群众继续被政权及其宣传手段所愚弄和操纵。活动分子们为反对政府采取的措施进行着顽强的斗争,因为这些措施都预示着可能发生最坏的情况和难以根除的思想法西斯化。我们是否将要无休止地进行反对不断出现的法西斯主义的斗争?

1968年后的极左派已掏空了法西斯主义的一切政治念头,使之成为一锅大杂烩。“法西斯”这个形容词可以很方便地用来给对手贴标签,使自己在辩论中处于优势地位。要不停地清除人们头脑中的法西斯主义。解放思想,特别是解放他人的思想,是一场无止境的战斗。在70年代初,法西斯主义这个词汇成为

法国社会的流行词和讲理与不讲理的分界线。法国直至 90 年代仍受其影响。这种观念非但未能打击极右势力上升的真正危险,反而危险地造成混乱。

是法西斯主义还是“强权国家”

1968 年 6 月在大学生公社内部,许多文章都明确地把戴高乐主义等同于法西斯主义。有关这个题材的招贴画也为数不少:标题为“法西斯主义——戴高乐主义的最后面孔”的招贴画把戴高乐的脸画成一副未完全盖住贝当和希特勒脸的面具。在另一些地方,将军以身着黑衬衫、行法西斯礼的面具出现。招贴画“戴高乐的变迁”把洛林十字架^①改成卐形^②。6 月份选举期间,《疯人报》第 5 期用整版篇幅发表 30 年代号召投希特勒票的招贴画。头版头条是一幅希特勒画像下面写着纳粹的口号:“一个人民,一个帝国,一个领袖!”(Ein Volk, ein Reich, ein Führer!)

除了这些古怪的行动外,学生运动对如何给五月运动后的形势定性仍犹豫不决,而镇压行动却在不断发展。所有极左组织都认为资产阶级准备采取一切手段推迟其垮台,但它的垮台是注定不会太迟到来的。法西斯主义被认为是资本的最忠实盟友,是其切身利益受威胁时可以打出的“最后一张牌”。然而,除了在这些原则问题上意见一致外,在如何估计五月运动后的形势问题上分歧就凸显出来了。

科恩-本迪特不想太早惊呼法西斯:“在谈到法西斯主义时,人们要么不知所云,要么至少应该指出:有建立在群众运动基础上的独裁统治,有对工人阶级的疯狂剥削,也有对生产实行与战争政策相适应的重组。”^③人们不能不注意到这几条标准都没有达到。无论如何,未来是可能对血腥镇压开放的。1968 年 7 月的《行动报》上写道:“不要惊呼法西斯,那样会使我们不好好地准备应会随之而来的事情,即真正的镇压(政治谋杀、草率调查)……戴高乐派正准备必要时拿起武器呢。”^④

随着雷蒙·马塞兰不断强化镇压政策,1968 年 6 月开始的关于法西斯主义

① 洛林十字架是“自由法兰西”的标志。——译者

② *Les 500 affiches de Mai 68, op. cit., p. 115.*

③ Daniel COHN-BENDLT, *Le Gauchisme, remède à la maladie sénile du communisme, op. cit., p. 158.*

④ 《Pas de vacances pour les barbouzes》, *Action*, n°20, lundi 1^{er} juillet 1968.

的辩论在五月运动后的头几年里继续发展。

对活动分子整黑材料、进行搜查和逮捕、在拉丁区部署警力、1971年警方为“新秩序”大会提供保护、取缔无产阶级左派、通过“反打砸法”、警察的粗暴和讹诈等等，所有这些事实却可以解读为法西斯主义在不可抗拒地上升。“是法西斯主义、法西斯化还是‘强权国家’？”这个问题在极左群众中引起了争论。

托派分子不断谴责镇压，对公民行动服务队的复活表示不安。该机构聚集了戴派活动分子、前秘密军队组织成员、“新秩序”成员、警察、法国劳工联盟的工会分子，等等。这支“资产阶级民兵”是“法西斯分子投入战斗的新形式，比打着卐字旗号和信奉党卫军意识形态的小纳粹还要危险许多”^①。

根据托洛茨基在30年代提出的法西斯主义的特征，共产主义同盟推断现在还不能说是法西斯或法西斯化。戴高乐主义政权自1958年以来具有“强权国家”的特征。但共产主义同盟于1973年被内政部长取缔后，组织内部展开了公开辩论：“强权国家作为古典议会制度的继承者，会走向法西斯主义吗？法国是否正经历着法西斯化的进程？”^②“警察国家”的提法看来已不足以说明70年代初镇压行动的发展了。

马列派则更愿意援引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季米特洛夫(1882—1949)给法西斯主义下的定义：“当权的法西斯主义是金融资本最反动、最沙文主义、最帝国主义的分子实行的公开的恐怖独裁。”^③他们就用这个定义作为衡量法国形势的尺度。如果有人指出法国现政权还没有到这种程度，马列派就会说它正积极准备走到这一步。

《红色人道报》的马列派指出，法西斯化就是“建立新的政治和国家形式，使之在时机成熟时能彻底清除民主形式，过渡到公开的恐怖独裁”^④。政府的任何改革和政策措施、最微不足道的镇压行动，都会立即被解读为一种信号。

“新法西斯主义”来了

被马塞兰定为打击目标的《人民事业报》的毛派对“新法西斯主义”的命题

① Femand L'OELLETON, 《SAC, la bourgeoisie》, Rouge, n°140, 15 janvier 1972.

② *Le gollisme, et après? État fort er fascisation*, François Maspero, Paris, 1974.

③ Georges DIMITROV, *Œuvres choisies*, Éditions sociales, Paris, 1952, p. 39.

④ 《En avant pour une démocratie populaire fondée sur la dictature du prolétariat》, supplément à *L'Humanité rouge*, n°49.

作了发挥。《现代》杂志 1972 年用 1 期号外专门论述这个命题。^① 前无产阶级左派活动分子安德烈·格卢克斯曼是这个新观点的理论家。

与老法西斯主义不同的是,新法西斯主义不是来自基层。它不准备搞政变,也不需要搞政变,因为它就在国家机器内部,“就是在这里面它最得心应手,马塞兰是不会去攻打他自己的办公室的”^②。直接涉嫌的是警察:“‘新秩序’的前途在警察内部,正如它的过去和现在都在警察内部一样。警察中的法西斯派别暗暗地干着‘新秩序’明着说出的勾当。他们之间只有分寸的不同、制服的不同,但当示威者与警察短兵相接时,示威者知道自己是在与法西斯较量。昔日国家因为拥有自主打击力量(法西斯的冲锋队)而确保了后方,今天国家机器又与其警察一起站在法西斯化的前哨阵地,而其非军事系统(公民行动服务队、种族主义联合会等)试图为它扫清后方。这不是很容易想像的事吗?”^③

在当代帝国主义土崩瓦解的条件下,法西斯恐怖主义同时在帝国主义的军队侵略中(如在越南)和大都市的工厂里施展才能。法国已经有这种法西斯的存在,只不过它尚未能统治全社会就已统治着某些部门。

安德烈·格卢克斯曼就是这样把殖民战争与“工厂法西斯”相提并论。在他笔下,工厂是资本主义推行战争的“丛林”;资本主义“将百姓迁移、又重新集中(如移民,集中到布列增尼、洛林等地区)”;用解雇和失业使恐怖笼罩在群众头上。关闭和征用工厂是(恐怖)升级的手段。在工厂里甚至存在“傀儡政权,(资本主义)与之签订虚幻的和平协议”^④。

在资本主义大都市内外实施的都是同一类法西斯计划:“在雇主的战略中,人们不难发现被‘法国的阿尔及利亚’那帮行刑者视为至宝的三部曲:‘保护’(把百姓集中起来,设立禁区等);‘雇佣’(在敌对的老百姓中寻找合作分子);‘监视’(增加警察,设立秘档等等)。从帝国主义战争中舶来的法西斯主义与都市工厂里土生土长的法西斯别无二致。”^⑤工会被视为“叛徒”。格卢克斯曼告诉我们,工会只有“在殖民地由殖民当局选出的议员来代表时”^⑥才有代表权。在此情况下,人们不难理解它们对土著居民不会有什么善举。

工厂里按等级制度、不平等和“头头”主导的原则运转的,因此也就有了法

① 《Nouveau fascisme, nouvelle démocratie》, *Les Temps modernes*, n°310 bis, 1972.

② André GLUCKSMANN,《Fascismes:l'ancien et le nouveau》, *ibid.*

③ *Ibid.*

④ *Ibid.*

⑤ *Ibid.*

⑥ *Ibid.*

西斯的萌芽,法西斯只能在工厂里求得发展。^①工厂以剩余价值的形式获得利润的同时,也生产并再生产着潜在的法西斯主义。^②这些都是格卢克斯曼所猛烈抨击的现象。他写道:“有法西斯工厂,每个工厂都有法西斯。”他以雪铁龙汽车厂和西姆卡表厂为例,说那里小头目中的法西斯分子和工会之家对活动分子的镇压是有目共睹的。在规模化生产的大企业里,泰罗制占统治地位。从这些现象到法西斯还有一大步要跨越,但格卢克斯曼轻松地跨过了这一步。用“老板的专制”这个概念来描写众多大企业中的恐怖气氛和劳动条件已经不够了。至于刚刚开始建立的丰富工作内容的制度,《现代》杂志的另一篇文章把它称作“新法西斯主义要在工厂扎根时戴上的技术和人道面具”。^③

但在这样的视角下,便没有理由——甚至不再会有理由——回头来把19世纪的作坊和制造厂定性为“法西斯”了,因为那里的一切都由老板独断。如果企业生产剩余价值的同时也生产着法西斯主义,那就无法摆脱法西斯了。格卢克斯曼写道:“法西斯主义在工厂的持久存在表明对资本主义社会整体来个‘最终解决’的可能性也持久存在。”^④

说真的,法西斯主义不限于工厂,监狱里也存在:“那里的纳粹施刑者雨后春笋般地增加”;警察署里同样也有:那里“存在毒打,有时还有暗杀”。^⑤

这种来自上面的新法西斯是对普遍展开的各种斗争升级的一种回应。它并不反对旧式民主,而是反对新型的直接民主,也就是毛派所要倡导的人民民主。国家机器各机构现在都被置于一个内战参谋部的领导之下,一切都为了一个目标——走向公开的战争:“面对矛头指向他的人民抵抗运动,这些地方上的法西斯与上层沆瀣一气,互相声援,以便组成管治资产阶级社会的机器,建立杰克逊命名的‘第四帝国’。”按照辩证法则,各种斗争的发展将导致法西斯主义的发展,反之亦然。这种互动使前景变得明朗:要么法西斯主义取胜,要么革命胜利。谁要是不相信这本长达70页的说明书,他即使不被视为新法西斯的“客观”盟友,也会被列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俘虏的名单中。

① *Ibid.*

② Jean-Pierre BAROU,《Renault-Billancourt: quatre ans de contrôle ouvrier》, *Les Temps modernes*, n°310 bis, 1972.

③ André GLUCKSMANN,《Fascismes: l'ancien et le nouveau》, *ibid.*

④ *Ibid.*

⑤ *Ibid.*

“他们要杀人”

极左派认为，政权在系统地制造恐怖和仇恨，推行反青年和反移民政策。只要有商人向年轻人开枪或种族主义分子向移民开枪，当局即使不被指责直接武装了这些杀人犯，也会立即被宣布对此负责。

由于脸部被手榴弹击中而失去一只眼的理查德·德赛血淋淋的脸（见第11章）就是明证：“他们要杀人！”这张照片被复印了几千份。1971年3月，活动分子戴着血淋淋的面具，举着这张照片去会见想与老百姓对话的警察。他们认为只要表示愤慨并起来造反，揭露（警察）过去和现在犯下的罪行就够了。本着这种逻辑，极左分子不惜利用死人来证明他们所揭露的事实无可辩驳。

因此，尽管在许多情况下并无证据，移民劳工的死都会一概被说成是种族主义的暗杀。毛主义者更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在巴黎、阿雅克肖、谢勒、布洛涅，他们都在搞暗杀。在里昂、图鲁兹，种族主义分子在搞围捕，一年来发现有几十名阿拉伯人死去；德杰利被一名种族主义分子打死；阿依特·阿贝尔马莱克·伊德里斯被吊死在工地；阿布拉杜·扎穆尔失踪3星期后被发现溺死于圣马丁运河。”他们补充说：“这几十人当然不一定是死于种族主义者的屠刀下，但多数是确定无疑的。这无可辩驳地证明：阿拉伯劳工怒火中烧是理所当然的。”^①

皮埃尔·奥维尔内之死被认为是雷诺厂领导与总工会勾结推行“恐怖”政策的必然结果：“领导的举动是地道的法西斯，它杀了人……但领导的路径得到总工会领导的社会法西斯的配合。”^②

奥维尔内之死被载入暗杀和血腥镇压的长篇史册，揭示了资产阶级民主的本质。一切都被等量齐观、相提并论：1848年的巴黎公社、殖民地大屠杀、1962年的沙罗纳、1968年的弗兰和索肖，还有生病和“工伤事故”，统统都成了“暗杀”。“资产阶级的罪行”不计其数，只要一丁点儿伤亡，不管是人为的还是事故性的，也不管是违法还是与政治事件有关联，也都被相提并论，归结到同一原因。重要的是“要指出在学校里教给学生的民主神话与当权派不断破坏法制的

^① 《On assassine à Paris, antifascistes, il faut prendre la rue!》，*La Cause du Peuple-J'accuse*, n° 18, 17 février 1972.

^② Philippe OLIVER,《Après la bataille de Renault, Assassins et complices》，*Les Temps modernes*, n°310 bis, 1972.

现实之间有着天壤之别”。^① 民主的真相就是资产阶级专政。

“肚子还能生育，从中生出恶魔”，民主是法西斯主义的候见室，民主的前途是血腥镇压和内战。当人们指出，法国与其他国家不同，法国警察并没有开枪时，活动分子便会反驳说：“警察的确还没有向示威者开枪，但镇压的逻辑是不可逆转的，因为镇压是斗争的反面。将有越来越多的社会阶层投入运动。”^②

从警察国家到警察民族

五月运动后的法国社会气象可以用“镇压”一词来表示：“这样一个制度为了苟延残喘正试图把它所建立的警察国家过渡到警察民族：给全体人民建立秘档，在工人集中的郊区（马塞兰小岛）安插‘保安警察’，在中学恢复品德奖，开展反青年、反毒品、反色情、反乱驾车、反极左分子的宣传运动，等等；政府（蓬皮杜、马塞兰）直接或间接通过广播频道号召公众揭发检举并允诺给予奖励。”^③

在进行镇压的同时，政权竭力营造安全气候。在一个城市发生违法或越轨行动后，警方采取的任何措施都会立即被解读为政治性的行动。法共领导的城市要求政府增加警力也受到谴责，说这是法共与政府勾结的明证。政府要在老百姓中制造恐惧效应，以便于其统治：“政府企图使人相信安全就是幸福，而他们的幸福要靠政权，要反对一切不正常的人：吸毒者、社会边缘人、疯子、青年，等等。”^④

关于年轻人和毒品的新闻宣传是一种政治镇压的手段，是给活动分子立秘档的“借口”，是“对老百姓进行宣传向青年人灌输种族主义意识、对外国人实施种族主义的手段。”^⑤

人们给镇压描绘了一幅触目惊心的完整图画，几乎涵盖了全部社会生活：“为了进行镇压，资产阶级拥有一套非同寻常的手段：警察、暗探、共和保安队、机动卫队、特种兵旅、法官通常都是法西斯分子的老板及其走狗，此外还有：烦琐的行政事务、愚民的娱乐、医院和精神病院、我们所谓的代表（他们竭力让我们保持沉默）、报纸、烦人并谎话连篇的广播电台和电视。我这可能还是挂一漏

① Patrick FRESNEL,《La police, la justice, le pouvoir》, *Rouge*, n°92, 14 décembre 1970.

② 《Désarmez les flics!》, *Tout!*, n°5, 10 décembre 1970.

③ *Ce que veut la Ligue communiste, op. cit.*, p. 143.

④ François,《Sur le racisme anti-jeune》, *Les Temps modernes*, n°310 bis, 1972.

⑤ Éric, *ibid.*

万的。总之，镇压是家常便饭，它像沙滩上的一只海蜇，覆盖着我们的全部生活。”^①谁也无法逃脱镇压和每天的骚扰，全体公民都是潜在的镇压和出卖的对象。

法西斯主义不仅表现在显而易见的镇压行动上，而且还有更隐蔽的和日常的表现形式。它扩散到社会的各个环节，其思想渗透进每个人的头脑中。政权通过视听技术——广播、电视、大发行量的报纸等施展“特殊催眠术”。^②它操纵舆论，以证明“这样或那样的措施”是正确的；它在总工会的帮助下对左派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

哪里有法西斯，就要把它从哪里赶出去，也就是要把它“从上层建筑和所谓民主社会的各个领域”^③赶出去。这些专制领域正在法国社会不断地扩展。归根到底，“千百万人过着与在法西斯制度下别无二致的生活，他们完全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④。至于1968年以来所实行的改革，实际上是一个“使人民变成奴隶的计划”^⑤。群众完全被新闻手段所操纵：“他们并非把人投入地理概念上的集中营，而是意识形态的集中营。就是这么回事儿。”^⑥反毒品宣传本身也是一种使人民对其自由受限制习以为常的手段：“从意识形态上使老百姓习惯于被蚕食，是真正的法西斯的意识形态准备。他们明里用毒品说事，实际上是别有用心。”^⑦

法国仿佛是一个由任人宰割的“蠢蛋”、排外主义者和种族主义组成的国家。在关于法西斯主义的词藻后面，凸显出一种对百姓阶层的居高临下的蔑视，但他们却总是以百姓阶层的代言人自居。

法西斯主义和性解放

对于主张性解放的活动分子来说，镇压、压制和法西斯主义是紧密相连的，

① 《N'hésitons plus!》，*Spartacus*, supplément à *Tout!*, n°4, 16 novembre 1970.

② Philippe GAVI, in Philippe GAVI, Jean-Paul SARTRE, Pierre VICTOR, *On a raison de se révolter*, Gallimard, Paris, 1974, p. 241.

③ Philippe GAVI, *On a raison de se révolter*, op. cit., p. 242.

④ *Ibid.*

⑤ André GLUCKSMANN, 《Fascismes: l'ancien et le nouveau》, op. cit.

⑥ Laurent, 《Sur le racisme anti-jeune》, *Les Temps modernes*, n°310 bis, 1972.

⑦ Monique ANTIONE-TIMSIT et Josyane MOUTET, 《La loi et la répression ou la résistible ascension de la démocratie》, *Les Temps modernes*, n°310 bis, 1972.

而且关系到每一个人。对于妇女解放运动和同性恋革命行动阵线(以下简称同性恋阵线——译者)来说,法西斯主义自然是与阳刚之气和攻击性联系在一起的。而革命女权主义者则认为,法西斯主义就是决定其他压迫的父权压迫:“法西斯主义代表着20世纪‘群众’的社会矛盾中父系制度的自然发展。在这个视角下,维吉尼亚·沃尔夫^①在二次大战前夕写的一篇题目为《3枚金印》的文章中说得很有道理:争取妇女解放的斗争就是一场反法西斯的战斗。”^②

法西斯不仅仅是两次大战之间的一种政治制度,同时也代表“现代国家真正的和正常的本质”^③。所有工业化高度发展的国家都注定倾向于法西斯主义。革命的女权主义者完全否定父权制度,对“国家的本质”和与之相连的法西斯主义展开“致命的批判”。另一些女权主义者不一定接受这种观点,而只单纯地认为在所有男人身上都有潜在的法西斯主义。

同性恋阵线则攻击“法西斯的男子气”并为之下了这样的定义:“利用男人的性特征把独裁误加于社会。”并补充说:“从这个意义上讲,法西斯只能是男子的,男子气只能是法西斯的。”^④因此,同性恋阵线要对“法西斯的正常性行为”发起攻击^⑤。说到底,正常意识本身不就等于法西斯吗?“正常的思想意识不是什么新鲜东西。30年代的法西斯分子一直就为反对不正常的事物而斗争。”^⑥

性的解放破坏了社会准则,从而也就动摇了法西斯主义的基础。真是乱透了。

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

在1968年后极左派的语境中,法西斯已不再是30年代那种穿皮靴、打旗帜的模样,而是危害性更大、分布更广、面目全非的东西了。法西斯主义包括所有的镇压行为,不论是政治性的还是刑事性质的,而且还包括所有的制度压迫。在这个社会里,一切丑闻都被算在法西斯的账上:“日常的法西斯就是广播电台,它骗你相信马塞兰的客观性;日常的法西斯就是总工会,它在比扬古谴责萨

① 维吉尼亚·沃尔夫(1882—1941),英国女小说家。——译者

② Susan SONTAG,《Réflexions sur la lutte des femmes》, *Les Temps modernes*, n°317, décembre 1972.

③ *Ibid.*

④ FHAR, *Rapport contre la normalité*, Champ libre, Paris, 1971, p. 14.

⑤ *Ibid.*, p. 11.

⑥ François,《Sur le racisme anti-jeune》, *op. cit.*

特,说他赞成美国支持以色列的行动,还说热斯马尔反对带薪假期;日常的法西斯就是为借用一辆轻便摩托而坐牢;就是因数九寒天燃火取暖而烧伤移民的孩子;就是剥夺活动分子的公民权和家庭权,这些活动分子们更懂得为什么 350 万移民也不享有这些权利;就是为了 1 公斤柑子而判 32 个月的预防性拘留。”^①还有工厂里的小头目,移民劳工的生活条件,更有“对奥克西坦语区^②的压迫”,反毒品运动,等等。

“恶兽”无处不存在,像魔鬼一样在社会各个角落不断长大,造成恐怖,引起憎恶。法西斯就在眼前,不停地生根发芽。要提高警惕,不断斗争。极左分子宛如那个要打败不断长出新头的龙的英雄。

这种对法西斯惶惶不可终日的警惕是没有止境的。要捕捉它和它在自己头脑中的微乎其微的蛛丝马迹,要敢于追根究底、扪心自问,“因为法西斯主义并不仅仅是为了应景而穿上黑色恐怖外衣的一堆劣质货,它是几世纪以来人们塞进我们头脑中的肮脏思想。”^③这么说来,还能摆脱得了法西斯吗?

对于那些对理论(哪怕是马克思主义或精神分析的理论)无动于衷的年轻人来说,法西斯主义就是一切带权威性的东西。有些极左分子甚至怀疑他们自己的斗争精神中也隐含有法西斯主义的成分。因此他们将会抛弃这种精神而加入更开放、更热情的大家庭,或者在经历过几年的闯荡后重新坐到精神分析家的沙发上去。

法西斯主义与权力

极左派关于时代的夸张表述可以从持批判态度的知识分子身上汲取养分,因为他们将法西斯主义与权力相提并论,这与传统的政治观点毫无共通之处。

《反俄狄浦斯》(见第 21 章)一书的作者吉勒·德勒兹和费利克斯·加塔里宣称“法西斯主义在全面发展”^④。不要再老拿工人阶级和斗争中的人民来掩饰自己,而“要听听帝国的呼喊:群众并没有上当,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期盼法西斯”。^⑤虽然“希特勒使法西斯分子抱成团,但他不是惟一的法西斯”。换言之,

① 《S'il y avait une justice ça se saurait》, *Tout!*, n° 3, 39 octobre 1970.

② 奥克西坦语区,指法国南部操奥克西坦语诸方言的地区。——译者

③ 《Vers le palais du vrai sport》, *Tout!*, n° 10, 12 mars 1971.

④ Gilles DELEUZE,《Les intellectuels et le pouvoir》,entretien Michel Foucault-Gilles Deleuze, *L'Arc*, n° 49, 2^e trimestre 1972.

⑤ *Ibid.*

就是要博得法西斯主义是建立在一种“有诱惑力的妄想狂”潜意识基础上的^①，它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政治定义。每一个极右分子、改良主义者或革命派都可能具备这种潜意识，它切实地影响着社会等级制度和一切组织中的各级权力。既然法西斯主义是建立在这种潜在欲念的基础上，那它便在社会上处于随时萌芽的状态。

更有甚者，这种“权力法西斯”充斥所有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呼唤理智的演说。最明目张胆的法西斯不正是开口不离“目的、权利、秩序和理智”^②吗？透过各种关于社会组织的讲演（革命者也不例外），人们看到的实际上是狂热和疯狂。因此，首先要不再“充当别人和自己的警察”，^③要把欲念从镇压和操纵它的压制力中解放出来。

米歇尔·福柯则对马克思主义和新列宁主义谈的权力观提出疑问：权力不限于凌驾在社会之上的政治和国家层面，它有其经济基础。它不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上层建筑和“工具”。福柯认为，权力是一种更隐蔽的触角四射的东西：它不动声色地渗透到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它不仅进行直接的镇压，也不仅与意识形态挂钩，它的功能是“监视人、纠正人，也就是惩罚他们或教育他们”^④。它制订一个模式和一些标准，凡不遵守的，一律开除。

受到否定的不仅有法庭、疯人院和监狱这些关押人的机构，一切与知识和法规有关的机构、团体和教育部门——医院、劳保医疗、中小学校、大学，等等——也包括在内。知识里也有权力，因为知识与体制是密切相关的，知识对控制和排斥行为起着调节作用。它通过遍布全社会并近在眼前的机构网发挥它的作用。福柯于1971年告诉我们：“通过这一整套机构，使压迫大显神通，而其根源是政治压迫。”^⑤

权力在人的肉体和精神上都打下烙印，它对肉体和精神的控制和约束，使人最隐蔽的心灵也都变得“正常”，对性行为的监视和惩罚就是最明显的例证。为此而设计的权力是无孔不入的：社会、文化、肉体 and 灵魂；它是“多形态、多功

① Gilles DELEUZE, Félix GUATTARI, *L'Anti-Édipe*, Minuit, Paris, 1972, p. 329.

② *Ibid.*, p. 440.

③ *Ibid.*, p. 415.

④ Michel FOUCAULT, « Table ronde », *Esprit*, n° spécial: *Pourquoi le travail social?*, avril-mai 1972.

⑤ « Préface », *Enquête dans vingt prisons*, Champ libre, Paris, 1971, p. 3-5.

能”^①的，散播在整个社会中，无法确认其具体方位。现代社会似乎已实现了英国哲学家边沁的梦想。他于18世纪想像按敞视原则建立一种“劳动之家”，可对劳动进行全面监视而不被发现。

最后，正如福柯所说，“必须清楚地知道，等级、控制、监视、禁止、强制等权力要施展到什么程度，通过什么环节和机构（通常是最小的机构）来实施。只要有权力的地方，就会有权力的威力。确切地说，谁也不拥有权力，但它总是朝着一定的方向施展其能，一些人为一方，另一些人为另一方。谁也不知道谁有权力，但却知道谁没有权力。”^②

在权力不仅从政治意义上讲遍及全社会，而且其形态也不局限于某一种。正因如此，怀疑一切的大门便向极左派敞开：不是吗？每一小条报道、每一个小小的演说、每一点点知识都可能与不可名状的权力扯上关系。

让·博德里亚说得好：“在福柯眼里，权力虽然被碾成粉末，但仍然是一个结构性的概念，一个有极的概念，其族谱是完整的，其存在是无法解释的，尽管有受谴责的可能，但它是不可逾越的……它是构成世界不定方程式的最后的项。”^③

清 算

极左派借以揭露权力的推理方法并不是理论性的，而是对自己的民族和文明进行清算的实际行动，也就是不断地提醒这个无视并排斥他们的社会：它是建立在罪恶和阴暗的基础上的。他们对这种文明和这个社会的描述与对西方价值、法国社会的进步的赞颂针锋相对。

这种清算行动的悲惨主义^④版本主要出自《人民事业报》。一名毛主义者在国家安全法庭上的发言充分反映了这个黑色版本的特点，它与当时主流的说法完全针锋相对：“检察官先生，您昨天说你们之所以要审判我们，是因为我们构成对文明的威胁。自1945年以来，你们的文明就是对人民反法西斯的背叛；就是在印支、阿尔及利亚和乍得的殖民战争；你们的文明就是棚户区、贫民窟和集

① Michel FOUCAULT,《la vérité et les formes juridiques》, conférences à l'Université pontificale catholique de Rio de Janeiro, mai 1973, *Dits et écrits 1954-1988*, Gallimard, Paris, 1994, p. 618.

② Michel FOUCAULT,《Les intellectuels et le pouvoir》, entretien Michel Foucault-Gilles Deleuze, *loc. cit.*

③ Jean BAUDRILLARD, *Oublier Foucault*, Galilée, Paris, 1977, p. 53 et 55.

④ 悲惨主义，指电影、文学中描写最悲惨的社会生活现象的倾向。——译者

体宿舍城；就是一小撮剥削者对人民的压迫。你们的文明就是我父亲25年来没有休过一天假；我生病的母亲50岁时还要为养活最后3个孩子而去给人带婴儿；我的兄弟们14岁或15岁就要开始劳动。你们的文明就是审判我们的特别法庭。”^①

一些极左分子很擅长一种做法：把政府，更确切地说就是时任内政部长马塞兰的讲话与希特勒和贝当的讲话相提并论；把一切都与压迫、剥削及丑恶的种族主义挂上钩。他们可以在同一篇文章中从马塞兰的讲话跳到希特勒的讲话，仿佛这些话和各种揭露出来的事实都是浑然一体，都能归结到同一现象。凡他们报道出来的事实都能激起公愤和造反，都能证明上述类比和评论的正确性。谁要是贸然反对这样的类比，谁就会被指责不承认压迫的现实。他们就是这样使人失去鉴别能力，从而操纵对不公正和不合理行为的反抗。

无产阶级左派的毛主义者是这样顶撞法官的：“我反对你们依据纳粹分子强加的法律对在地铁中涂写标语的人进行审判并在大街上无故抓人。工人的集中营何时能结束？”^②虽然他们也承认马塞兰的信徒与希特勒的信徒有所不同，但这不是主要的：“希特勒的信徒制造恐怖是不加掩饰的；马塞兰的信徒不管怎样，其行为有一定限度：他不能在任何情况下进行公开打击，他要讲点儿方式方法。”^③

他们把不同性质的事物混为一谈的做法有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警察的“过失”的确引起不安的愤怒，但这并不等于说可以进行令人费解的比拟。1970年，一名宪兵怀疑一个开小卡车来乡下屋子搬东西的屠夫是入室抢劫，开枪把他打死。《一切！》报是这样评论的：“战争时期有些盖世太保的官员在街上溜达，以寻找犹太模样的人。他们有一张标准画像，谁像谁就倒霉。有些传统是难以消失的。”^④

托派分子同样毫无顾忌地作比拟。接替马尔罗任文化部长的莫里斯·德吕翁未能幸免，“戈培尔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他。《红色报》提出这样的问题：“德吕翁与戈培尔有何不同？”回答是：“不同之处在于他过早地向作家和艺术家开枪，他对这些人怀恨在心……不，德吕翁不是戈培尔，他只是戈培尔的影子，只

① Déclaration de Serge MINOC, 1^{er} octobre 1970, in *Le Combat des détenus politiques*, op. cit., p. 25.

② Déclaration de Jean-Michel DAROE, 12 septembre 1970, in *Le Combat des détenus politiques*, ibid., p. 19-20.

③ 《L'ordre nouveau de M. Marcellin》, *La Cause du peuple*, n°37, 18 mars 1971.

④ 《Désarmez les flics!》, *Tout!*, n°5, 10 décembre 1970.

是胚芽。”^①1973年6月，在马塞兰取缔共产主义同盟并搜查其会址后，《红色报》把两张照片放在一起作比较：一张是警察搜查过的会址，另一张是纳粹施火刑的照片，文字说明是：“同一个方法”^②。

被监禁的毛主义者把维希^③的特别法与政府的镇压措施作了比较。清理警察队伍和司法队伍的工作没有真正进行。阿兰·热斯马尔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资产阶级的法制与无耻的维希时代十分匹配，那时所有的法官（一人除外）都令人作呕地效忠于法西斯元帅——双手沾满鲜血的傀儡。那些纳粹直接或间接的代理人、那些‘民族革命’的拥护者现在还有多少仍然在职？那些恶贯满盈的资产阶级孝子贤孙还有多少人今天被召来‘审判’革命战士？”^④

法国的殖民战争也并未烟消云散。《红色报》提出这样的疑问：“在社区里设立隔离带，这不是要来一场新的‘阿尔及尔战役’吗？马塞兰欣喜若狂，但他并没有发明什么，马絮早就走在他前面了；阿尔及利亚的隔离岛和制度化、合法化的酷刑对他并不陌生。”^⑤

在《红色人道报》的马列主义者眼里，“反打砸法”被视为一部“法西斯法律”，它将对法国人民执行与往昔殖民军在越南、阿尔及利亚和其他人民一样的镇压政策。^⑥当梅斯梅尔于1973年成为蓬皮杜的政府总理时，他们不忘提醒他曾在外籍军团服役的历史，他也被说成“法西斯和杀人犯”：“前殖民斗士、‘打越共的人’、阿尔及尔和其他地方的法西斯同谋、使资产阶级军队‘正常化’的人、法帝国主义最后殖民地的头号看门狗。”^⑦

法国的历史仿佛都被归纳进它最阴暗的几页。任何承认民主与共和成果的言论都立刻被指责为企图掩盖过去严重的错误和罪行。70年代的极左分子要对历史和文化进行清算。然而，不管他们愿意与否，他们自己也是从这个历史和文化中出来的，而且还带着它们的烙印。这种对我们传统的自我诽谤非但无助于反对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反而在80年代助长了最落后的意识形态卷土重来。

① Michel LEQUENNE, 《L'ombre de Goebbels》, *Rouge*, n°204, 11 mai 1973.

② *Rouge*, n°211, 27 juin 1973.

③ 维希，贝当傀儡政府（1940—1944）所在地。——译者

④ Extrait d'une lettre d'Alain GEISMAR à sa femme, in *Le Combat des détenus politiques*, op. cit., p. 31.

⑤ *Rouge*, n°139, 8 janvier 1971.

⑥ *L'Humanité rouge*, n°64, 11 juin 1970.

⑦ 《Toulouse: le colonel Messmer reçu en fanfare》, *Révolution!*, n°15, samedi 7 octobre 1972.

极左派对“法西斯主义”和“强权国家”的所有分析都源于一个共同的前提：国家是阶级专政的工具。极左分子因此完全否定了国家确保集体生活的功能。共和思想恰恰就是使国家凌驾于个别群体之上，使国家有义务阻止任何集团对公民事务进行控制。但国家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权也包含着风险，因此公民对负责实施合法暴力者可能发生的偏差保持警惕是完全必要的。正是这样的国家观念和保持警惕的义务长期激励着法国的“德雷福斯派”知识分子^①。人们不难看出，这种思虑与五月运动后的革命派毫无共通之处，因为他们是受马克思和列宁关于“国家衰亡”的必然性理论和主张以“社会自治政府”取代国家的威廉·莫希的影响的（见第18章）。根据他们的逻辑，作为统治工具的国家将适时消亡，人民将行使自己的权力，不要代表，也不要中介。他们中许多人认为，人民的化身就是工人阶级。

^① 德雷福斯(1859—1935)，犹太裔法国上尉，1894年被判间谍罪，法国全国因此案分成两个对立的营垒。1906年他被平反昭雪。——译者

十三、工人阶级变了

“工人们将从大学生脆弱的手中接过斗争的旗帜”：极左派活动分子认为这一口号将变成现实。五月运动失败的原因看上去很简单：法共与总工会竭尽全力阻挠运动，阻止它进行到底。它们要对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化”负责，它们在工人身上压上沉重的翅膀，使他们不能充分表达反抗的意志。只要毁掉这对沉重的翅膀，一切都有可能实现。

因此要争夺工人阶级，将它从改良主义思想中拔出来；要同把工人阶级当做自有财产的法共和总工会相对抗。争夺“工人堡垒”、开展反斯大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并非轻而易举的事。但活动分子们表现出非凡的决心和积极性。尽管如此，他们会长期相信法共和总工会就是革命的主要障碍吗？那些到过现场的人不能不看到，众多工人都珍惜这个受诋毁的社会给他们带来的好处。

关于学生与工人相结合的问题，从对其所寄托的革命期望观点来看，应该认为是失败的。只有为数有限的一些工人接受极左派的革命思想，工人的主体都置身事外。但他们所进行的试验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失败。因为对于那些加入工人“阵线”，而且不愿对自己这一时期的生活简单地画上句号的活动分子来说，收获是不容忽视的。他们走出了自己出身的阶层，学会用与书本不同的方式了解工人的处境，不再相信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他们接触过“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也遇见过比那些封闭在狭小的世界和专业计划中的老师强得多的人。他们与工人结下了地久天长的友谊。还有一点看似明显实际并不简单的收获：他们懂得了从上层人的角度与从下层人的角度看问题，结果是不尽相同

的。当然，这一切都不足以证明简单化和哗众取宠是有道理的，但也不失为一种教育的经验，问题在于要能从幻想到幻想破灭、从理想主义到否定一切的循环中解脱出来。

极左派对工人阶级的工作还产生一些意外的效果，从社会和历史演进的角度来看都是很有意义的。一系列课题和口号已广为流传：均衡加薪、谴责泰罗制的劳动条件、强度和管理，揭露工伤事故和职业病，等等。这些课题都得到了响应，工会组织特别是民主工联对此也不是无动于衷。

从“赌马到革命”？

在“光荣的30年”末期，工人的问题十分突出。中小企业的劳动条件和报酬都已不合时宜。泰罗制的发展在生产轿车的企业中格外突出。地狱般的劳动节奏、体力和精力的消耗、工伤事故、职业病等等现象都切实存在并构成了这个发达社会的负面图景。粗工、专门工、小企业职工、外来劳工、农业工人……这些类别的人深受剥削。还有大量贫困的家庭，他们居住的棚户区最为扎眼。在整个社会中，等级关系带有明显的19世纪专制制度和家长制的特点。

与这些现实相对的是现代化的一面。在生产轿车的大工业中，一方面是泰罗制取得胜利，另一方面是尖端部门自动化和专业化的发展。特别是，家庭预算中的健康和休闲开支明显增长。在消费方面，原先家徒四壁的家庭都在迎头赶上，“在汽车—冰箱—电视机三部曲中，从1967年起工人就已超过平均购买力”^①。怎么能否认这样的进步呢？怎么能否认工人阶级已与社会融为一体了呢？为什么这种融合要被视为“资产阶级化”或“异化”呢？

极左活动分子不愿意给自己提出这些问题，他们所揭露的剥削和压迫现象的确是存在的，然而他们一心只想着自己，试图使自己相信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并未发生变化，或者虽有变化，但无产阶级革命仍有可能。尽管他们做出伟大的原则声明：工人阶级失去的只有铁锁链，但对工人稍有近距离接触的人都不得不看到事实并非如此。

1970年发表了菲力普·加维的调查报告《工人》^②。这位68分子走遍了全国，同几百人进行了谈话。他的著作与主流的工运中心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

^① Serge BERSTEIN, Jean-Pierre RIOUX, *La France de l'expansion, tome 2. L'apogée Pompidou 1969-1974, op. cit.*, p. 106.

^② Philippe GAVI, *Les Puvriers*, Mercure de France, Paris, 1970.

他没有用马列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博学宏论去拔高工人的话。他提的问题既涉及五月运动、政治、雇主，也涉及金钱、性行为 and 现代社会的的生活方式。加维并没有把他收集到前后矛盾或不连贯的言论加以删略。他毫不犹豫地提出从革命的观点来看令人难堪的问题：“为什么成为戴派分子？问革命派会同意自己的女儿与阿尔及利亚人结婚吗？问罢工纠察队：如果他继承了一座工厂，他会怎么做？”^①

他提了一连串有关性行为的问题，成为观察工人阶级的新视角。工人对这些问题不太习惯：“性行为的观念有无变化？”“你接受婚前性行为吗？”“如果配偶双方都有工作，他们会有经常的性关系吗？”“你会预见什么时候做爱吗？”“你会努力让你妻子有快感吗？”“有同性恋行为吗？”“吸过毒吗？”^②在 68 分子看来，工人阶级在这些方面还真算不上先锋。

对于大学生不断挥舞的“工人权力”，受访者并未表现出热情：“虽然法国工人（包括外籍劳工）的阶级归属感十分强烈，但他们并没有设想工人政权，也不希望有。他们似乎不抱幻想，心存疑窦，自知无能为力。听任大脑袋们去构想一个更好的社会，使工人的预算能有所改善。”^③尽管五月运动后出现了许多新课题和斗争方式，但工人们还是提防着极左分子。在他们看来，这些极左分子——可能统一社会党例外——就像是一个外籍军团。

造成这种局面的责任被归咎于法共和工人运动领导人，因为正是他们“失去了无产阶级具有的大部分品质：慷慨、自发性、理想主义、集体主义、暴力和活力”^④。工人们的胸无大志表明“一个被分化的团体已经异化”，随波逐流。然而，在五月运动刚刚结束的时候，希望仍然存在：“从赌马到革命，道路是漫长的，但第一批里程碑已经立下了。”^⑤

幸福的当选者和其他人

聚集在《5月手册》杂志周围的活动分子进行了一项新颖的、与传统的极左观点截然不同的尝试：“建立活动分子与工人之间的直接联系。他们认为，不能像许多人仍在竭力进行的那样把主观臆想的建议强加给工人阶级，而应回应许

① *Ibid.*, p. 7.

② *Ibid.*, p. 298-299.

③ *Ibid.*, p. 11.

④ *Ibid.*

⑤ *Ibid.*, p. 15.

多企业中的核心组织和小组提出的明确请求。”^①本着这种精神,《5月手册》的主持者们把同企业内或在发生冲突的地方的工人一起进行“工人调查”作为中心任务。调查的目标是让工人说话并把工人积极分子团结过来。调查产生的文章要经过讨论并由调查小组进行审查。他们想以此来“缩小企业外的活动分子与工人活动分子之间的距离”,“揭示斗争中产生的新思想”^②并在企业中加以推广。

《5月手册》拟由此展开关于斗争和组织新形式的辩论。长远目标是推动工人阶级自治运动的产生;短期目标是建立“工人阶级的革命组织,尽管最初只是少数,但可以把仍游离在先锋队日常斗争之外的零散分子团结过来”。^③但这些方针未能证明其可行性。因此在《5月手册》派内部引起很多争论。

为使关于斗争和组织形式的辩论得以开展,还需要斗争中的劳动者也同意参加。但情况并非如此,工会分子和革命活动分子都赞赏《5月手册》进行的调查及其所提供的斗争信息,但他们对这引起信息的解读却完全与实现无产阶级自治的愿望背道而驰。对于那些并不想详细了解企业内部情况和工人斗争细节的“后68极左分子”,该杂志提供的信息最终只能令人厌烦。至于活动分子们一厢情愿的“工人自治”,那更是难上加难的事。

新列宁主义者则在工人阶级中开展“持久的工作”,以少见的韧劲发展“先进分子”。在工人中,他们首先看中有过斗争历史的工会负责人或前负责人,对他们做耐心的说服工作,争取他们摆脱“改良主义”、“斯大林主义”或“修正主义”思想。这些工人中许多人以往与法共产生对立情绪,正好可以在极左分子身上找到一部分共同的想法。工人中也有“饶舌者”和对他们的选择极度敏感的人。他们只要认出这样的工人便绕开他。

在极左派各政治组织内部,总有“正式工人”作为幌子,也有“不好惹的工人”。老是这些人被人从一个集会带到另一个集会向人展示。他们接受长时间的采访,当需要在政治会议上同“错误思想”作斗争时,领导就会让他们出来说话。在这批人中,不管你是托派、马列分子抑或毛派,你都可以从中找到法共的反对派、斯大林分子、不同意其领导方针的“工会同志”、造反的专门工或斗争中的移民劳工。

这些工人中某些人入了局,并不加掩饰地对派给自己的角色感到快乐。有

① 《Le rôle politique de l'enquête》, *Les Cahiers de Mai*, n°22, juillet 1970.

② *Ibid.*

③ *Ibid.*

个年事已高的工人在里面充当智叟的角色；有会“用内脏说话”的人为工运中心主义添枝加叶；还有的一言不发，不知他的沉默底下是什么样的阶级立场。这些人都成为领导们的招牌，用以证明自己组织的无产阶级性。他们在这种交易中并不吃亏：在组织中地位迅速上升，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社会地位和知名度大大提升，这是他们无望通过其他方法获得的。他们被安排在学校里露脸，在颇受“工人同志们”吸引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吸收一些人加入组织。有些人甚至经常出入于巴黎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圈子，为面临镇压的组织争取支持和补助。

但除了人们炫耀的这些“无产阶级”形象外，还有普普通通的“工人同志”，就是经常在市区的酒吧或工厂里遇见的那些人。这些人的形象不像画廊里那些令人神清气爽的画像。因为，即使工人们不拒绝免费的传单和报纸，也并不因此而热情洋溢和有反叛精神。

当然，他们中间许多人对工厂里发生一些打破日常沉闷气氛和工会老一套做法的事情也并非不高兴：极左组织敢于直言不讳地大声说出那些有选择精神的工人想说的话，他们随时准备听这些话。虽然工人们认为极左派有添油加醋的倾向，但对揭露劳动条件、剥削和压迫的话还是赞成的。在罢工中建立起来的各种委员会中，或者在一些局部问题上，他们和极左派都肩并肩地站在一起。这种情况特别发生在颇具战斗精神的青年工人身上。他们没有工会传统，不讨厌斗殴，而且随时准备出手帮助毛主义者对付总工会的代表和打手。对他们最有吸引力的是开秘密会议、准备一起“出手”与头头们或“修正主义分子”打斗争……但除此之外呢？

广大工人对这些怀着世上最美好的愿望来与他们接触的知识分子是心存疑感的：他们原本可以在社会上取得成功，却为何要放弃学业呢？革命大学生煞费苦心地向他们解释自己不愿做资产阶级的干部、领导者和“看门狗”，他们却难以置信：这些革命知识分子会在他们中间待多久？他们总觉得这些年轻人在向他们散播了革命希望后总有一天要从工厂消失。

尽管工人们觉得他们挺可爱、充满活力和善意，但很少人参加革命分子号召的行动和加入他们的组织。总工会和法共竭力阻挠他们这样做，而极左分子给自己招来“打砸分子”的名声，引来警察的镇压。面对这些变数和诽谤，要有十分坚定的决心才能坚持到底。这些活动分子一旦被发现，就会遭到镇压，很快被开除，要重新爬起来是很不容易的。然而，每当总工会的领导开除一些活动分子时，极左派报纸便声称这种镇压会促使工人看清斯大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本质。

事实上,不停地号召革命会显得不可信,甚至会产生适得其反的后果。工人们享受到发达社会的成果和好处,能够达到一定的福利和消费水平,因此无意投身于可能导致革命暴力、内战和起义的事业。敦刻尔克的乌吉诺厂的一名工人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对工人来说就是拿一支长枪把所有资产阶级、老板、小头目统统打倒,他们就这样完蛋了。可这样,我们会被看成冒险分子和搞军事政变的帮会。”^①

实际情况是,说工人是未来社会的先锋队,或者许诺将由他们来领导一切,工人们根据自己每天的亲身经历觉得那是难以置信的。

会成为工人吗?

众多年轻的毛主义者离开家庭和学业,抛弃为他们的前途设计的方案,到工厂里扎根。他们要全身心地投入,当发现剥削和压迫现象后,他们更坚定了决心。一名被捕的毛主义者、前工程学校学生对审判员说:“您还是去跟一说话就喘不上气的矽肺病矿工讨论讨论吧!他要求给他打开窗户,因为他缺少空气;他要求关上窗户,因为他冷。他活着就是受不完的罪……他还会告诉您他是怎样心惊胆战地劳动,害怕发生事故,因为工程师催他多出产量,他的安全就无法保障……他无法忘了这些,也无法过一点点私生活。您可以关我10次,但我还会继续揭露这些罪行,在人民的阵营中战斗到这一切都结束的一天。”^②即使这些话带有知识分子舍身取义、不问事情根由的味道,但在伦理上却是符合实际的。

前马列共青联的一位领导人罗伯特·兰哈特在五月运动后受雇于巴黎雪铁龙厂当一名专门工。他的著作《钳台》对了解泰罗制下工人的非人劳动做了突出的贡献,与西蒙娜·韦伊^③在两次大战之间写的书^④相呼应。但他也指出,要深入了解工人并非易事:“他有双手,为什么我没有?为什么他的胳膊和手指能干活而我不能?为什么他懂得怎么干而我不懂?”^⑤

^① 《Témoignage d'un ouvrier d'Usinor》, *L'Humanité n. uvelle*, n° 23, décembre 1972-janvier 1973.

^② Jean-Claude MARTI, 《Procès du lundi 5 octobre 1970》, *Les Prisonniers politiques parlent*, François Maspero, Paris, 1970, p. 27.

^③ 西蒙娜·韦伊(1909—1943),法国女哲学家。——译者

^④ Simone WEIL, *La Condition ouvrière*, Gallimard, Paris, 1951.

^⑤ Robert LINHART, *L'Établi*, *op. cit.*, p. 22.

《钳台》提示了专门工的处境,有“千种方式每时每刻不断重复地告诉你,你什么都不是”^①——辱骂和流水作业线上的消耗、小工头不停的监视、对工人集体蓄意的分化瓦解、惟领导之命是从的劳动医疗制度等等。罢工是反屈辱、争尊严的一种斗争。兰哈特写道:“实质上所有的罢工都可以归结到这一点,都是为了表明他们没能把我们压垮,我们还是自由的人。”^②

但工人的世界如果只是一个服劳役的场所,如果没有任何补偿,那如何理解它能被接受呢?雇主的暴政和工人不得不以罢工表达自由的诉求,这有可能掩盖了其他的现实。毕竟在劳动中和劳动之外还有人际关系、经济和社会补偿,尽管还很不够,但不管怎样,还是有助于保持在社会中的尊严的。不能把社会生活缩小到只有被剥削者或造反派的问题。

无产阶级左派急于招募毫无经验、脱离人民群众的年轻中学生到工厂去,这更加深了误会。相对于已经成为老战士的马列共青联的兄长们,这些年轻人对梦想与现实的反差感受更深。维吉娜·兰哈特的著作《去工厂的志愿者》^③以丰富的故事和精彩的描写对理解扎根运动做出了主要贡献。在联系群众的方式上,并非每个人都有同样的经验和才能。对于根本不了解工人群体的年轻大中学生来说,他们曾经相信其领袖们对革命发表的长篇大论,但现在都感到极不好受和失望:“我痛苦地感到我要举起座座高山,但我没能做到。”^④

工人们并不准备参加释放无产阶级激情和暴力的破坏行动:“他看着《人民事业报》,说:‘有意思,你说得对’,你还会听到他反复对你说:‘这么干很好’,但你能对他说:‘你也来一起干怎么样?’”^⑤至于政治性的讨论就更难进行了:“没有什么比跟工厂里遇见的工人讨论政治更难的事了。他们喝酒,讨论赛马和费尔达厂的工资……你可以试着趁机向他们低声耳语:‘占领工厂有理!’”^⑥

在不停地寻找有斗争精神的工人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很滑稽的事情。两个在工厂扎根的素不相识的毛派女青年走到一起,双方都以为自己发现了寻找已久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她走过来,微笑着坐在我桌旁,要了一小杯牛奶咖啡,突然对我说:‘扎根工厂,你知道怎么回事吗?我以前是大学生,是毛派,你

① *Ibid.*, p. 29.

② *Ibid.*, p. 90.

③ Virginie LINHART, *Volontaires pour l'usine. Vies d'établis, 1967-1977*, *op. cit.*

④ Jenny CHOMENNE, magistrat, citée par Virginie LINHART, *Volontaires pour l'usine*, *ibid.*, p. 111.

⑤ Christian JAMBET, professeur de philosophie, *ibid.*, p. 172.

⑥ *Ibid.*, p. 171.

知道什么是毛主义者吗?’我这个积极分子是属于另一个组织的……她看到我的窘相,我想她一定认为我一无所知,便耐心地说,毛派,就是拒绝继续当‘资本的看门狗’的青年,就是要帮助工人阶级,背叛法共等等。几分钟后我们俩都笑了起来,颇为尴尬。我们也都很失望,三天来没有能够接触到我们想像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①

有些扎根者的运气更不佳:他们所在的地区和工厂没有“先进分子”集中的好名声。在他们等待戴鸭舌帽、骑自行车的“无产者”的地方,遇到的却是对最“资产阶级化”、最腐朽的音乐乐此不疲的青年。一名在蓝色海岸一家工厂扎根的大学生惊奇地发现青年工人穿着入时,到戛纳去跳舞,到博彩场去赌博:“我不知道能不能说这是工人阶级;那是些被原子化了的人,没有文化,没有信仰,分散在建于充满金钱、娱乐和度假林地区的小工厂里。这种地区无产者的条件比其他地区更容易使无产阶级贬值。他们出来的时候从来不说在那里工作。”^②

对经常参加大中学生集会的年轻学生来说,争取工人阶级是没有希望的:“我总是没法从品茵茴香酒过渡到《人民事业报》!这好比跟一个女人说了几个月的废话,就是没勇气对她说:‘我想跟你说的不是这些’……我曾是好的毛派,这好比向我们遇见的人宣称我们是‘看到耶和华的人’一样好玩。”^③在这种情况下,不难理解他们产生了难以抗拒的放弃一切、回家过日子的愿望。

在这些工厂扎根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些人出身于统治阶级)和出身平民的青年工人之间的文化碰撞是客观存在的,大中学生很难做到“如鱼得水”,特别是谈到工厂和斗争以外的事情时尤其如此,何况他们也要分享娱乐。在这方面绝对需要克制,但有些习惯是难以克服的:“应该写一个活动分子走进工人家庭的情形:他的穿着像工人一样,但你会感觉到那不是他的世界……在桌上吃饭时,你有无产者切面包的姿势;知识分子则是小心翼翼,他彬彬有礼的动作令众人吃惊;他站起来收拾桌子,但在工人家庭收拾桌子是妇女的事儿。”^④

这些扎根者的言谈举止常常显得滑稽可笑和别别扭扭。他们的悲惨主义观点与平民阶层对快乐、平静生活的追求格格不入。他们号召多采取行动打击小头目、破坏劳动节奏、关押管理人员和老板等等,这些至少让工人们起了疑心:他们知道,这些年轻人即使被解雇,也总有办法找到出路。他们在工厂劳动

① Claudie et Jacques BROUELLE, *Le Bonheur des pierres*, Seuil, Paris, 1978, p. 173-174.

② Yves DEVILLERS, imprimeur, cité par Virginie LINHART, *Volontaires pour l'usine*, op. cit., p. 165.

③ Christian JAMBET, *ibid.*, p. 172.

④ Guy PAILLOT, *ibid.*, p. 230.

只不过是过渡，他们伟大的原则声明改变不了这个现实。即使人们因为其理想主义而对他们表示友善，但他们终究只是“化了装的知识分子”，^①迟早是要离去的。

会 晤

其他方面的经历目前看来还比较成功。某些毛主义者与工人建立联系的能力较强，其秘诀不在于他们宣扬的主义或者“群众路线”。这个秘诀更直观、简单：除了他们的社会出身不同外，这些青年工人在活动分子身上找到与他们一样的对生存的叛逆性，哪怕他们要承担的后果和冒的风险并不相同。有些扎根者为了更好地消除差异，甚至倾向于在暴力行动和要承担的风险问题上添油加醋。

青年工人更关心的是他们的态度而不是革命词藻。毛主义者号召尽快行动起来，表现出他们是言行一致的。在与毛主义者接触中，这些工人感到他们也有和自己一样的紧迫感：“再也无法忍受压在我们头上的沉重石头，无法忍受把工人永久打进地狱了。我们急需氧气和放松。毛主义者懂得开辟一些使我们可以呼吸的空间。我们喜欢毛派，是因为他们说的话和雷厉风行地干的事。”^②

“今天搞工团主义就意味着永远不会有光明的明天”^③，这句话并不意味着要相信正式的毛主义所说的“前途是光明的”。它可以解读为号召立即改变生活，不再等待。青年工人与学生间建立的联系其实并不符合活动分子原先的设想。“我喜欢他们是因为他们是朋友，他们要改变生活。”^④

这种吸引力不是单向起作用的。在不拒绝讨论的工人眼里，这些年轻知识分子看得起他们，而且能说会道，博览群书。他们应该教训教训那些瞧不起工人的经理和干部。与他们打交道让工人们发现了未知的世界。他们使用的词汇、谈论的问题、集体的讨论、阅读……所有这些都很有新鲜感。活动分子可以使他们产生阅读的兴趣，使他们能够讨论过去不敢或不知如何提出的问题。过去认为很孤立无援的造反现在有人一起干了：“我们彻夜交谈，只有到了极度疲惫和

① Gérard, *ibid.*, p. 217.

② Guy PAILLOT, *ibid.*, p. 234-235.

③ 《Coup pour coup》, *op. cit.*

④ Guy PAILLOT, cité par Virginie LINHART, *Volontaires pour l'usine*, *op. cit.*, p. 229.

困倦时才停下来。什么事都摊在桌面上来谈,这不是沙龙式的讨论。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能够表达自己的想法并被别人听取。我不再像过去一样孤独了。我不停地学习。”^①

此外,思想的传递也不是一条单行线。虽然革命的意识经常不得不拐弯抹角地提出来,但有关工作和一般生活的想法大家都是一致的:“毛主义者让我们信服,不是因为他们到工厂里来了,而是因为他们和蔼可亲,成了我们的朋友。”^②

在这种新文化的地下传递过程中,女活动分子起了关键性作用。他们让青年工人着迷,不仅因为他们觉得她们富有魅力,而且因为她们代表着新式女性,与他们过去认识的谦卑、顺从的女性截然不同。这种吸引力难免导致误会,有时甚至酿成悲剧(妇女解放运动曾显示了这一点),但工人阶级已经开始否定自己以往的行为方式:“面对一个让我敬畏的女人对我来说真是新鲜。过去的情况是自言自语:‘啊,这个妞很不错’,然后就有些麻烦事;现在成了这种状态:你遇见一些妞,她们会对你说:‘我乐意让你们盯着瞧,但不要把我当成一个物件。’”^③

青年知识分子和叛逆青年工人之间的会晤把他们中间的某些人带到一个崭新的境界。奇特的是这种境界与无产阶级左派的毛主义者所标榜的无产阶级文化并不吻合。

从“工人根据地”到“社交大家庭”

从“革命万岁!”派出来的毛主义者在弗兰雷诺厂及其周边厂扎根,他们的做法既不同于那些自封的先锋队,也有别于无产阶级极左派的工运中心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

活动分子如此重视“深入群众”、听取群众意见、动员群众表达意见,以至于对自己都产生了怀疑。弗兰的“工人根据地”被树立为联系工人阶级的典范,但很快在工厂的工作问题上出了问题。

这个“工人根据地”自称是一个有战斗力的工人组织,完全实行革命的民主,反对法共和总工会的做法。它的会议带有集合的色彩,到场的工人都可以

^① *Ibid.*, p. 235.

^② Gérard, *ibid.*, p. 214.

^③ Claude LUCAS, *ibid.*, p. 236.

和活动分子一样自由发言,讲述他们的问题和他们进行的斗争。活动分子们很快便不再单独开会,而且大会上提出的问题也不再局限于工厂的工作,而是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

驻厂或不驻厂的活动分子、移民劳工、妇女、周边地区的青年……组成一个集体,自称要成为“所有愿意斗争的人的平等组织。”^①“工人根据地”公开提出一项共产主义计划,其特点是建立一个由委员会和自由加盟的公社组成的社会,一个“没有首领、没有等级”的社会,一个“博爱和欢乐的社会”^②。虽然他们也搞过一些辩论和节日气氛,但很快便不得不改弦更张了。

1971年5月弗兰市的斗争使活动分子(他们与罢工中表现积极的工人有联系)产生了幻想。但这些工人很快就被工厂调走,使他们重新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许多人感到厌倦,终于开始为自己考虑了。就是在斗志松懈的形势下,活动分子开始同一批满怀妇女解放思想的女孩子过起了共同的生活。在失败的气氛中,这些女性对传统斗争精神进行抨击,击中了要害。她们提出的建议很有诱惑力:“她们向我们提供了更广阔的集体生活空间,在那里亲昵行为可以与政治行动同时发展。生活、爱情、工作和政治的统一体似乎突然光顾我们了。”^③

在“阿尔让维尔之家”生活着拖儿带女的男女活动分子,本国和外国工人,当地的小青年也加入工人队伍。这是介于“德廉美修道院”^④和马克西姆·勒富雷捷歌中的旧金山“蓝色之家”之间的一个大家庭。这些人在市区挨门挨户地做工作,在凌晨5时的寒风中在工厂门前发传单……这一切使工人们不再把年轻活动分子们看做“滑稽可笑的人”。

事实上,这个热闹的大家庭像一瓶鸡尾酒,每个人按自己五花八门的兴趣忙于各自的事情。那些最忠于“工人根据地”的工人感到困惑,对这些闲散青年沉迷于此很看不惯:“他们哄骗了工人之后就要哄骗当地的流氓无产者和犯罪盲流。我就是从这个地区来的,我知道这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⑤经常出入这个大家庭的一帮帮青年很快成为累赘。他们痞子气十足,经常滋事斗殴,使活动分子们忍无可忍。这样一来,关于工人自治和自治组织的战略性和策略性的

① 《Base ouvrière, Renault-Flins 1971》, *Les Temps modernes*, n° 310-302, août-septembre 1971.

② *Ibid.*

③ Tiennot GRUMBACH, 《En cherchant l'unité de la politique et de la vie》, *Les Temps modernes*, n°307, février 1972.

④ 德廉美修道院,法国中世纪作家拉伯雷笔下没有任何清规戒律的修道院。——译者

⑤ Michel CHEMIN, 《Dix ans ventre à terre》, *Autrement*, n° 12, février 1978.

讨论便不了了之。由于把精力都投入大家庭的生活，一切政治性的讨论变得越来越困难：“我们与国家关系的问题在我们的争吵和亲昵中消失了。”^①他们的矛盾导致很多秋后算账，使人最终忘掉那些节日般的时刻和一起用过的大餐。

从试图在工人阶级中扎根到乌托邦式的大家庭这个过程遇到了一道坎儿，留下的只有苦涩的失望。一名工人活动分子数年后对此做了令人泄气的总结：“梦想中的乌托邦天堂实际上是个地狱，而创造新型人际关系的愿望只能导致仇恨。傅立叶的尸体在蒙马特高地的公墓中翻动，但傅立叶能复活吗？”^②

加斯东或工人的蜕变

让-马利·康吉克是一名24岁的青年工人，有镟工的专业技能证书并在流水作业线上干过。“在厂里干了7年，又搞了两年革命运动后”，他意识到自己在工厂只能再干“短短的41年”了。他决定扔掉一切，专心写一部小说——《加斯东，或一个工人的遭遇》，也就是他自己的遭遇^③。

这部著作不仅是令人揪心的专门工处境的目击证明，而且提示了在绝望生活中的挣扎和对现实的反叛。这正是五月运动的初衷，是与传统的工运中心主义的决裂。

加斯东讲述他在工厂、城市和业余时间里的生活。这是一种每天不停劳作的生活，其特点是内心沮丧。加斯东试着克服它：“简而言之，加斯东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厌烦，没有任何特别的东西对他能产生吸引力，对自己的工作也越来越厌恶。”在工厂劳动的每一个小时在他看来都是自己余生的消蚀，是他未能抓住的时间，是他自身一部分的消失：“工厂毁了他的生命如同癌症侵蚀一个躯体。它夺走他的时间、精力和睡眠。”他的日常生活完全被劳动、交通时间和城区的忧郁生活所吞没。他的情感生活被减少到最低限度，他的性生活只能靠同妓女在肮脏的房间里凑合。

加斯东企图反抗，试图躲进梦境，梦想着在“无限期的罢工”中“大家都能自由呼吸，开怀大笑，欢呼雀跃”，或者到一个阳光灿烂、天色蔚蓝的世界中去。一天，他去看坐在办公桌后面的头头，站在他面前，看着他。他没话可说，也没有

① Tiennot GRUMBACH, 《En cherchant l'unité de la politique et de la vie》, *loc. cit.*

② Michel CHEMIN, 《Dix ans ventre à terre》, *op. cit.*

③ Jean-Marie KONCZYK, 《Gaston, ou l'aventure d'un ouvrier》, *Les Temps modernes*, n°307, février 1972.

信件或请求要交给他。对方闹不懂怎么回事：“难道罢工了？难道想扣押人？”加斯东终于开口了：“我要生活。”于是头头认为他疯了。然后，“一个冬天的早晨他的闹钟没响，加斯东没去上班。从这个早晨起，他就再也没上班”。

“加斯东”是反抗自身处境的工人代表，但与以往的斗争不同，他不是置身于工人阶级集体的“我们”中，恰恰相反，他只是“工人”，而不是人们称之为群众或无产阶级整体的一员。

加斯东用第一人称讲述，表达他自己的感受，不去想像“工人阶级”有什么想法，有人对他说这只是个人态度，不符合革命思想，加斯东则反唇相讥：“个人态度？是的！但这很好，谢谢。我就喜欢是一个个人，还有：我不但喜欢是个个人，还要把它理论化，就是说要把个人变成革命的基本条件！”

工人加斯东的变化把深藏在极左战斗精神身后的个人叛逆思想赤裸裸地暴露了出来。革命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之间的会晤也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加斯东承认自己想生活在工人轨道之外，成为单一的“个人”。他早就抱有这个愿望了。与活动分子的会晤对他来说是一个表达这种愿望并将它公诸于世的机会。五月运动产生了效果，试图争取工人阶级的革命派们没有想到，在他们古旧的主义背后，一种新主义已经诞生。

个人加斯东以他的方式成为先行者的预言家。他生存的不幸和他的彷徨反映，同时宣告一种危机的逼近：这是阶级属性和战斗精神的危机，它不仅使革命小派别、而且也使标榜工人阶级代表的工会组织和左翼政党陷入困境。

历史的欺骗

当革命的大学生拒绝接受他们自己带来的新价值时，这些新价值却打动了叛逆的青年工人。吸引力是双向的，但顺序倒了过来。

在商定的演讲之外流传着一种违背他们初衷的生活和行为方式：这些年轻人追求的是不要到工厂劳动，描绘现有的工人条件，而不是要把工厂改造成活动分子梦寐以求的“工人根据地”。吸引了为此众多毛派大学生的无产阶级文化因此受到沉重打击。

事实上，极左派不知不觉为一种文化的演变做出了贡献，使阶级属性消失，而个人形象得到发展。1968年6月，一名妇女拒绝回到翁德尔厂上班^①，这种形式的造反后来得到发展。这名妇女对工会代表讲的所有道理都不理不睬。

^① *Reprise*, film d'Hervé LE ROUX, avril 1997.

她享受了一段自由自在的生活后再也不愿回到这个如同苦役场的工厂了。相当一部分青年工人都抱这种态度并得到革命大学生的鼓励，以至于从19世纪传承下来的工人文化和传统斗争模式发生了危机。

这些青年工人中有些人后来成了极左派活动分子并最终放弃了工厂的工作。他们成为全职活动分子或记者，经常光顾其他群体。他们成为“知识化的工人”并转而从事五花八门的的活动，但他们的出身并没有为其从事这类活动做好准备。因此，参加战斗便成了他们接受培训的学校，也是提升他们社会地位的途径，而按传统的方法这要走很长的路程。

与此相反的是，那些被解雇而又没福气被“知识化”或到巴黎去的青年工人便可能走上流浪、吸毒和犯罪的道路：“总有一天这些超级硬汉、这些资产阶级分子、这些和我们一起生活过的知识分子都走了。3年后一个人也没有了，成了真正的沙漠了……我真的感到被耍了……我受的打击是可怕的。我被他们甩了，我只有下贱的工作，我是可怜虫。这样，我就用别的方式造反。我服用大量硬毒品，继续留在社会边缘去砸药店，抢一些劣质货。我的20年非常可笑：铁皮房、戒毒治疗、消沉……”^①

对于那些最终还是留在工厂的工人来说，只有苦涩的失望：“有时候，当我看到那些没有任何改善前景的可怜的专业工时，我想这真够惨的。他们要我们相信圣诞老人，这会让我们做一个短暂的好梦，可过后呢？”^②

某些曾追随过他们的工人几年后还在埋怨他们。他们非常清楚他们扎根的症结所在：“有一段时间，甚至是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埋怨他们离去，这自然有因为我独自留厂而产生妒忌的因素。我跟他们走了这段路，尽管还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我从来没有丢弃过他们。每次殴斗我都在场。现在事过境迁了，我把这些扎根者看做小资产阶级，他们需要有他们父母所经历的那种战争、抵抗运动等的阅历，他们为创造阅历，制造一些可供讲述的事情。当时他们也是真心的，但我相信，如果他们也要被判在工厂度过一生，他们的反应不会是这样的。”^③

自发毛主义者的做法不仅表明他们无力建设任何持久的东西，而且还造成破坏性的后果：“反思这段经历，我真对他们有不少怨气。他们曾经是真诚的，但他们损害更多的是法共和工会，而不是老板们……以毛的名言为例：‘与其送

① Guy PAILLOT, cité par Virginie LINHART, *Volontaires pour l'usine*, op. cit., p. 230-231.

② Gérard, *ibid.*, p. 219.

③ *Ibid.*, p. 218.

人鱼,不如教他钓鱼。’(原文如此——译者)他们教会我们钓鱼,而自己却带着鱼竿走了。我认为这有点儿不近人情,不过当我偶尔遇见他们时,我会友好地把这点告诉他们。”^①

^① *Ibid.*, p. 217-218.

十四、战争结束了

1972年2月25日皮埃尔·奥维尔内的死亡标志着毛主义者跨越了一道门槛,将要面对五月运动以来时常提起的造成大量死亡的现实。他们不再做煽风点火的讲演和人民战争的高谈阔论,革命的表演将要转向悲剧。

这次暴力行动(指工厂保安打死奥维尔内事件——译者)与“3·22运动”的挑衅性暴力完全不同,后者表现了一种行动的需要,冲击了僵化的官僚机构,目的是暴露藏在表面合理性背后的荒谬。这次暴力与示威游行时的冲突也不完全一样:游行时要群情激昂并充满团结友爱的气氛。而谋划绑架企业领导和重要人士(哪怕是未遂的)、摆弄枪支(哪怕没有上子弹)就要求采取别的行动方式,而不是在大学生里或市场上进行斗殴,在示威游行中与警察搏斗。无产阶级左派的活动分子走出了理论和词藻的框框,开始面对完全不同的现实,即更理性、更冷静、与充满活力的集体斗争毫无共通之处的暴力。

同一时期在世界其他地方,许多革命组织也引起人们的关注。在乌拉圭,图帕马洛斯(Tupamaros)的游击小组绑架了一些重要人士,把他们关进牢房,对他们进行审判并枪毙了其中几个,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制造了劫持飞机事件。在美国,黑豹党的黑人革命组织建立了自己的武装民兵并开枪还击警察的攻击。在欧洲,巴斯克的“埃塔”组织不断对政府机构、要人和弗朗哥军人采取破坏和暗杀行动;在北爱尔兰,爱尔兰共和军对英军展开武装斗争。极左派的主要报纸都大量报道这些行动。在意大利,红色旅鼓吹武装斗争。在德国,红色武装组织搞了暗杀和绑架……为什么不向他们学习?与意大利和德国不同的是,法国并未出现恐怖主义的浪潮。但也相去不远了。

打擦边球

前无产阶级左派领导人阿兰·热斯马尔是反对恐怖主义的人之一。他在1981年写道：“压迫和剥削不会使其受害者变成有权之人，尤其是没有授予生杀之权。”^①前无产阶级左派最清醒的领导人在对流氓无产者、仇恨和暴力作了充分肯定后决定后退，以免滑向恐怖主义。

他们虽然仍声称游击行动有象征性的价值，但搞游击实践的那些人却不认为只有象征意义。一些活动分子对工厂的“小头目”拳脚相加，例如：比扬古雷诺厂的工头罗伯特因为其镇压行为和种族主义言行而被选中：“罗伯特该狠狠地揍！”^②在这次行动后散发的传单中，毛主义者声称：“工人们要自己讨回公道”，并说：“在自行车链条的抽打下，他就不那么滑头了，他哭着嚷嚷：‘我什么也没干啊。’”^③尽管话说得很无情，活动分子还是难以忘记：“我对这个可怜的罗伯特的可怕记忆总是挥之不去。他站在排水沟里，头上流着鲜血，帮我们向路过的工人发放传单……”^④

在组织内部，他们要对派进来的挑衅者和警察保持警惕。“新人民抵抗运动”有时甚至搞出一些滑稽官司闹剧，在公报中宣布它逮捕、审问了一名“由警方操纵的寻衅者”，把他送到法庭进行审判并处以死刑。但它又立即补充说：“但这一判决中止执行，他被暂时释放并禁止在国内居留，这一威慑措施将使他放弃挑衅和告密计划。”^⑤一个月后，他们又提起此事并澄清说：“这一死刑判决在现阶段具有相对的象征意义。它的作用有限，但预示着未来。”^⑥这是玩的什么把戏？

对巴勒斯坦组织的恐怖行动应持何立场同样成为一个问题。1972年5月30日，在以色列罗特(Lod)机场发生的手榴弹谋杀案造成27人死亡。1972年9月，巴勒斯坦“黑色9月”突击队劫持参加慕尼黑奥运会的以色列田径运动员作

① Alain GEISMAR, *L'Engrenage terroriste*, Fayard, Paris, 1981, p. 110.

② Tract diffusé pendant l'action, «Rapport d'enquête: Renault-Billancourt». *Cahiers prolétariens*, «Élargir la résistance», n°1, janvier 1971.

③ «Robert, tu payes!», *ibid.*

④ Jacques THEUREAU, cité par Virginie LINHART, *Volontaires pour l'usine*, *op. cit.* p. 78.

⑤ «Jugement d'un porvocateur manipulé par la police», communiqué de la NRP, *La Cause du peuple-J'accuse*, n°9, 23 septembre 1971.

⑥ «À propos de Moussa Fofana», *La Cause du peuple-J'accuse*, n°10, 15 octobre 1971.

为人质并打死两名企图自卫的运动员。突击队要求释放囚禁在以色列的200名巴勒斯坦俘虏,并威胁说在最后通牒期过后将每隔一小时杀死两名人质。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警方在巴勒斯坦人带着人质上飞机时发起攻击。巴勒斯坦人进行还击并处死人质,共造成17人死亡:11名以人质,5名巴勒斯坦人,1名德国人。

“新人民抵抗运动”发表声明,谴责这一事件后在法国掀起的“种族主义宣传”,但掩饰不了其尴尬处境,声明中说,巴勒斯坦同志的斗争不应忽视世界舆论,在慕尼黑死去的以色列人并不是“巴勒斯坦人民的直接敌人”。声明并称:“每当他们对居住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加以区分,每当他们明确指出反犹太主义与反犹太复国主义毫无关联时,巴勒斯坦事业就在法国人民舆论中取得巨大进展。”^①声明最后向巴兄弟致敬。在犯下的屠杀罪行面前,这种批评虽然显得扭扭捏捏,但表明无产阶级左派前领导人是不赞成这类行动的。

据“新人民抵抗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安托万·利尼埃说,该组织考虑要处决的惟一一个人是保罗·图维耶。他是纳粹占领时期里昂地区民兵的领袖,后来被蓬皮杜赦免了。这一措施曾在老战士协会和舆论中引起公愤。无产阶级左派的毛主义者抓住这一事件,于1972年12月在《人民事业报》上宣布:“图维耶要上断头台!”^②

“新人民抵抗运动”负责执行并开始寻找图维耶,后者躲了起来,未能找到。利尼埃自问:“我们真的最终会执行吗?今天我仍不知道应该赞成执行还是不赞成,尽管一切都使我们相信我们在最后时刻会后退。事实上,我们朝这个方向采取了一些措施,但不足以让我们找到他的踪迹,不久便放弃了追捕。这不是一次流产的行动?我还是说不准。极其意味深长的是:这个失误是经过深思熟虑并以某种形式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又回到了不搞除恶务尽的过去。”^③

① 《Après l'action de Septembre noir, déclaration à *La Cause du peuple* de la Nouvelle résistance populaire》, *La Cause du peuple-J'accuse*, n°27, 14 septembre 1972.

② Cité par Hervé HAMON, Patrick ROTMAN, *Génération*, t. 2, *Les Années de poudre*, op. cit., p. 468.

③ Antoine LINERS, 《Objections pour prise d'armes》, in François FURET, Antoine LINIERS, Philippe RAYNAUD, *Terrorisme et démocratie*, Flammarion, Paris, 1985, p. 202-203.

误入歧途的抵抗运动

前无产阶级左派的毛主义者不断提起抵抗运动时代。1971年6月18日,《人民事业报》社长在参加过抵抗运动的一些知识分子(让·卡桦、莫里斯·克拉韦尔、雅克·德布吕-布里代尔和弗拉迪·扬吉雷维奇)的陪同下在瓦莱里安山^①抵抗运动阵亡英雄纪念碑前献了花束。在该报的版面上经常出现“法比安上校”的名字。在毛派眼里,法比安上校就是他们梦想的那类英雄。“法比安上校”真名皮埃尔·乔治,又名弗雷多,17岁就在西班牙国际纵队中战斗并在法国被占领时期领导了青年共产党人的第一批武装组织,在巴尔拜斯地铁中打死一名德国军官。毛派以他为榜样,同样也以与法共有联系的移民劳工组织马努西昂小组为榜样。该小组从事破坏活动并杀了一些德国高级负责人。组成该小组的23名青年被逮捕并判死刑,于1944年2月21日被枪决。德国人把他们的照片贴在许多墙上并说明他们是外国人。路易·阿拉贡^②根据马努西昂的最后一封信,把这个“红色招贴”写成一首壮丽的诗歌。

《人民事业报》把抵抗战士生拉硬扯到与反纳粹占领者和反投敌者毫不相干的一场斗争中来了。与革命极左派大部分活动分子一样,毛主义者在为自己编织传奇。这些没有光辉历史和革命经历的孩子在努力用另一种方式重演昔日的斗争,要继承在70年代的法国根本不可能继承的革命传统。对抵抗运动的怀念误入歧途,变成了全盘大清算,青年成了万能的救世主。这革命的一代人决心革命到底,毫不气馁,不受任何形式的腐蚀,要与他们的父辈不一样。他们要证明自己接过火炬,要使清除历史罪恶的事业圆满成功,以弥补历史上的怯懦和失败。

是新型知识分子吗?

从这一观点来看,让-保罗·萨特与毛主义者的会晤是一次奇特的角色易位。“像你们这样的人代表着新型的人。”^③哲学家对他的年轻对话者说。这些

① 瓦莱里安山,位于巴黎西郊,是法抵抗运动纪念地。——译者

② 路易·阿拉贡(1897—1982),法国作家和诗人,超现实主义运动创始人之一,法共党员。——译者

③ Jean-Paul SARTRE, in Philippe GAVI, Jean-Paul SARTRE, Pierre VICTOR, *On a raison de se révolter*, op. cit., p. 304.

话使自认为的确如此的他们感到快慰。

无产阶级左派的毛主义者把萨特看做对新法西斯主义斗争的民主知识分子的保护伞和象征。1970年6月,萨特同意出任《人民事业报》的挂名社长^①。他远不是同意该报的所有文章——毛派也不要求他同意——但他自愿支持他们反镇压的斗争并与其负责人一起参加某些行动。

他和西蒙娜·波伏瓦、米歇尔·福柯一起企图在巴黎街头贩卖遭禁的《人民事业报》,被警方传唤后立即获释。1970年10月,在阿兰·热斯马尔的诉讼案中他被指为证人,但没有去法庭,而是到比扬古雷诺厂门前向工人发表讲话。他站在一只汽油桶上讲话:“应该由你们来说热斯马尔的行动好不好。我愿意在大街上作证,因为我是知识分子。我认为19世纪就存在的——并非总是存在,但效果很好——人民与知识分子的联系今天应该恢复起来。人民和知识分子被分离已经50年了,现在他们应该成为一体。”^②

1970年12月,萨特在朗斯主持“人民法庭”,抗议朗基-富基埃16名矿工死于瓦斯爆炸。他在控词中指控雇主国家、发生事故的6号矿井领导和工程师“蓄意杀人”:“他们宁可选择产量而不是安全,也就是说他们把生产放在人命之上。”^③

1972年2月14日,毛派在他们“控制雷诺公司”的宣传运动中秘密将萨特、米歇尔·维安、女歌手鑫米尼克·格朗热、《新观察家》周刊和《政治周刊》等的记者带进比扬古雷诺厂。过了不久,这批人被强行赶出工厂大门。于是萨特向记者们宣布他“在公司的心脏看到了法西斯”^④。

他对能与无产阶级左派向他介绍的工人会晤并直接交谈的确很高兴:他们是青年工人、造反的移民劳工、老斯大林分子和北部老矿工。萨特是否认为这就算会见了工人阶级呢?当他写道《人民事业报》被禁发的文章“粗暴、野蛮、简单化但却真实”、“是人民的声音”^⑤时,他没有摆脱众多知识分子对工人世界看法上的民粹主义和恐怖主义观点。

萨特高高站在比扬古雷诺厂门前汽油桶上的形象颇为感人。他对着记者

① En septembre 1970, l'opération se renouvelle avec le journal *Tout!*, puis en juin 1971 avec le journal *Révolution!*

② Cité par Simone de BEAUVOIR, *La Cérémonie des adieux*, Gallimard, Paris, 1981, p. 23.

③ Jean-Paul SARTRE, «Premier procès populaire à Lens. Réquisitoire», *Situations, VIII. Autour de 68*, p. 329-330.

④ *La Cause du peuple-J'accuse*, n°18, 17 février 1972.

⑤ Jean-Paul SARTRE, «Préface», Michèle MANCEAUX, *Les Maos en France*, *op. cit.*, p. 10.

的麦克风号召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但有多少工人停下来听他的讲话?多少人真正对他的讲话感兴趣?那是在以滑稽可笑的方式重演历史场面,世纪初知识分子与工人联系的情形变成了滑稽戏。毛主义者和萨特通过不同途径和步骤各自对自己的做法感到欣慰。

萨特在毛派身上使他的“串行性”和“团组融合”理论^①得到验证。他认为毛主义者是要求自由、反对卖身;力求“形成一种团组思想,也就是说许多人在团组中形成个人思想”^②。萨特指出,在现存的体制中,个人被同时原子化,不是作为他们自身而存在,而是相对于别人而存在:“集体人对于他犹如一个群体中的一个成员(报纸读者群体、电视观众群体,等等)。他在本质上与其他成员是一样的,不同于他们只是他的顺序号。”^③依靠抽象的公民概念而实行的全民投票制也不出这个模式:它制造出既分离又一致的生灵:“设在学校或政府大厅里的秘密写票室是个体得以背叛他所属团组的象征”^④。

毛主义者为特定问题而设立的临时斗争委员会在他看来就是“团组融合”,是对抗僵化体制的有效组织形式。一旦斗争结束,这种体制便对一切团组构成威胁。毛派通过自己的行动改变了互不相识也无力左右事态的个人之间的关系。

萨特还认为毛主义者是新型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超越了他自己先前的困难抉择。他认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有组织的代表,而且他本人自“二战”以来也是它的同路人,但他并不满足于此。五月运动恰好为他提供了与“内心痛苦”的知识分子形象决裂的机会。他所会见的毛主义者在他眼里成了可以取代法共的选择。他认为毛派拒绝社会为他们提供的前途,放弃自己的群体而去同工人结合,就是完成了过去知识分子无力完成的决裂,因为以前的知识分子只满足于在体制内部进行批判。

萨特曾于1965年强调指出:知识分子“处处不被接受”,有着“无法解决的内心痛苦”。“永恒的矛盾和困扰就是知识分子这个社会群体的命运……他自己的阶级不要他,他也不要自己的阶级,但又没有任何阶级敞开大门欢迎他。在此情况下,还谈什么知识分子的作用?倒不如说他是多余的人,是中产阶级不合格的产品。他虽然从未进入强势阶级,但在其边缘生活得不完美对他构成了

① Thèmes développés dans le livre de Jean-Paul SARTRE, *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 Gallimard, Paris, 1960.

② Jean-Paul SARTRE, in *On a raison de se révolter*, op. cit., p. 168.

③ Jean-Paul SARTRE, «Élections, piège à cons», *Les Temps modernes*, n°318, janvier 1973.

④ *Ibid.*

压力,不是吗?”^①

1970年10月,他说知识分子从此必须否定自己的这种心态,从内心的不幸和内在的矛盾中解脱出来。“他首先必须否定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通过与群众直接结合找到新的人民地位。到一定时候,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作为独立的范畴将失去任何意义:“我们设想的政治知识分子可以是任何一个工人。他们会更好掌握原则,会根据这些原则判断哪些思想是正确的,哪些行动是有效的;根据这些原则,他就是知识分子……渐渐地便达到这样的境界:大家都是知识分子;行动起来的人就是政治家,懂得为什么要这样行动。于是,他们也就是知识分子。他们的行为方式将不再与他们的存在方式相矛盾。”^②正如毛派所指出的,知识分子应该与工人同劳动、共思考,一起写作和行动。

毛主义者并未因此就解决了他们自身的矛盾。萨特勾画的充满希望的前景掩盖不了在他们身上起作用的因素:企图否定自己的阶级出身和自己的文化背景,不断为自己固有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所困扰。萨特于1965年提出的看法到1968年后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并与毛主义者的清算运动相呼应。萨特写道:“不是口上说‘我已不是小资产阶级,现在宇宙中自由行走’,知识分子就能与劳动者结合了。恰恰相反,应当想:‘我是个小资产阶级;如果我是为了解决自己的矛盾而去和工人农民站在一起,那我不会因此而不再是小资产阶级。只有干脆地作自我批评、不断地使自己变得激进,我才能一步一个脚印地——尽管除了我,别人对此不感兴趣——克服我的小资产阶级局限性。’”^③

萨特和无产阶级左派的毛主义者实际上是在工运中心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想下走到了一起。他们把这两个主义推崇到极致,说明他们难以承受自身的处境。他们会晤的背景是共同拒绝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并在革命斗争中想像自己已经超越了这种身份。

拼死的革命

极左派的革命信条具有双重性。他们的论述分成两极和两个相互矛盾的时间段:一是光明但不确定的未来——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一是现在和不远的

^① Jean-Paul SARTRE, 《Plaidoyer pour les intellectuels》, *Situations VIII*, Gallimard, Paris, 1972, p. 425-426.

^② Jean-Paul SARTRE, in *On a raison de se révolter*, *op. cit.*, p. 304 et 305.

^③ Jean-Paul SARTRE, 《Plaidoyer pour les intellectuels》, *loc. cit.*, p. 421.

将来,其特点是遭受镇压和失败。因此,在号召行动起来搞革命的同时,还要号召做出必要的牺牲,而死亡是其中最主要的危险。

毛主义者反复强调共产党人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并以中国共产党人的长征为榜样。长征中受到国民党军队追击的红军1年内走了12000多公里,损失95%的兵员(开始长征时的12万人中只剩下7000人)。1968年10月,当马列共青联合分裂时,贝尼·莱维在筹组无产阶级左派的人和其他人之间划了一条分界线:“在这个大厅里,分界线的一边是怕死的人,一边是其他人。”^①

共产主义同盟的托派则宁愿以切·格瓦拉为榜样。格瓦拉在号召主动闹革命、反对等待主义的同时,全身心地投入革命事业。格瓦拉这种“对人类的爱”要求有“新人”的出现,是一种纯洁的理想,只有做出崇高的牺牲才能实现:“我们会遇到突如其来的死亡,但这有什么要紧!只要我们的战争呼声被听到,只要有另一只手接过我们的枪,有别的人站起来,在机关枪声和新的战争与胜利的欢呼中高唱葬歌。”^②

美国黑豹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艾里加·科里瓦说:“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把天堂而皇之搬到地上来,也就是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和人类知识与技术可以带来的生活水准。这就是革命的理想,这就是梦想。”^③但在目前,一切革命者都要“准备玩命”。科里瓦信奉虚无主义和俄国无政府主义:“我们大家都相信巴枯宁和涅恰耶夫在《革命者的基本信念》中提出的第一个建议:革命者是该死的人,就是说,如果你无法适应死亡的念头,那你就不能挑战并击败权力机构,甚至不能同它理论。”^④

《人民事业报》发表了入狱黑人战士乔治·杰克逊的文章。杰克逊于1971年8月21日在圣-昆亭监狱被打死。根据警方的说法是因为他企图越狱。他的文章披露了种族主义的事实和在美国监狱中的非人待遇,同时也表达了他那种无法抵制的怒火和仇恨:“他们将永远、永远无法战胜我的复仇行动。我属于正义的人民,人民的怒火不易点燃,但这丝毫无损于它的极度愤慨”;“我不相信宽恕、原谅、节制……他们造就了我这个满腔怒火、满怀仇恨的黑鬼”;“我可能会

^① Cité par Hervé HAMON, Patrick ROTMAN, *Génération*, t. 1, *Les Années de rêve*, op. cit., p. 589.

^② Ernesto CHE GUEVARA, «Le socialisme et l'homme de Cuba», in *Le Socialisme et l'Homme, La Découverte*, Paris, 1987, p. 132-133.

^③ Elridge CLEAVER, *Sur la révolution américaine. Conversation d'exil avec Lee Lockwood*, Seuil, Paris, 1970, p. 77.

^④ *Ibid.*, p. 47.

看到自己的灭亡,但我将会十分超脱和冷漠,就像是看到他们的末日一样。生命的代价就是死亡。”^①

法国的极左派怎么能够自命为这样的革命者呢?他们生活的法国根本没有类似美国黑人的那种造反,也不具备拉美和中东那样的社会特点。

皮埃尔·戈尔德曼就是这类失败革命的化身。他原是“共产主义大学生联盟”的成员,时刻准备在拉丁区对极右派大打出手。他是1968年5月之前巴黎革命大学生的头面人物之一,其父母是移居法国的波兰籍犹太人,MOI的反法西斯战士。

戈尔德曼没有参加任何极左组织,他的斗争也不始于五月运动。他认为这场运动是对革命的讽刺,是“狂喜的集体手淫”^②“极左的假革命把戏”^③使他忍无可忍,他要自己一条路走到黑。雷吉斯·德布雷写道:“他愚蠢地从字面上去理解当时的虔诚祷告。‘革命是可以唱高调的吗?得了吧!武器在哪里?要干什么?’”^④他在五月运动中曾徒劳地提出要为“3·22运动”效力。加入委内瑞拉一个游击小组后,他于1969年10月回到巴黎,再一次向无产阶级左派建议建立一个武装组织,同样遭到拒绝^⑤。

戈尔德曼总是在“他处”出现,永远漂泊无定所。他曾试图“修改出生年月和地点”^⑥,甚至搞起犯罪、抢劫的勾当。德布雷写道:“革命的渴求困扰着英雄的儿子。他在一次持枪抢劫失败后,便把5万发子弹塞给一个伙伴,让他妥善保管。”^⑦1970年4月,他被逮捕并被指控在巴黎里查德-勒努瓦尔大街进行流血抢劫。他于1974年受审,被认定有罪并判终身监禁^⑧。这样的自暴自弃说明他的选择很无奈,同时也是以此惩罚自己:“法律不可能惩办我,因为在犯罪时我已经自己惩罚了自己。我的罪不是手持武器抢别人的钱,我惩罚自己主要因为

① George JACKSON, 《Nous levons une armée populaire》, *La Cause du peuple-J'accuse*, n°9, 23 septembre 1971.

② Pierre GOLDMAN, *Souvenirs obscurs d'un Juif polonais né en France*, *op. cit.*, p. 70.

③ Pierre GOLDMAN, *lettreur à Jacques Rémy*, 25 janvier 1971, cité par Hervé HAMON, Patrick ROTMAN, *Génération*, t. 2. *Les Années de poudre*, *op. cit.*, p. 292.

④ Régis DEBRAY, *Les Rendez-vous manqués. Pour Pierre Goldman*, Seuil, Paris, 1975, p. 127-128.

⑤ Cf. Hervé HAMON, Patrick ROTMAN, *Génération*, t. 2, *Les Années de Poudre*, *op. cit.*, p. 121.

⑥ Régis DEBRAY, *Les Rendez-vous manqués. Pour Pierre Goldman*, *op. cit.*, p. 143.

⑦ *Ibid.*

⑧ 这个判决掀起一场风波,众多活动分子和知识分子动员起来要求重审。戈尔德曼于1976年被宣布无罪,1979年9月20日被枪杀,凶手迄今未找到。

我未能成为我父亲那样的游击队员，未能成为马塞尔·雷曼（Manouchian 组织战士），未能在切·格瓦拉和马利盖瑟（Marighether）身边战斗，未能抓到博尔曼（纳粹党卫军将军）并将他枪毙……我之所以愿意死，愿意活在死亡之中，也是因为我发自肺腑的朦朦胧胧的激情中，希望能经历一个不可能有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我死了，是因为我还没有生；我生了，但还没有完全存在。”^①

在戈尔德曼 1979 年被谋杀时，塞尔日·朱利写道：“戈尔德曼以他狂野而完整的方式成为我们中最纯粹的人，一个自始至终都忠于自己灵魂的人，一个自始至终都忠于自己不明真相的人。”^②这种纯洁性与死亡的诱惑齐头并进。

没有付诸行动

对前无产阶级左派的毛主义者没有滑向恐怖主义有多种解释：法国特殊的历史和政治形势有别于意大利和德国这类国家；标榜与资本主义决裂的左翼和共产党的力量较大；毛派特别注意措词，重视“征求群众意见”和进行“总结”……但这些解释都不足以消除不确定的因素。接近毛派并支持他们反镇压斗争的知识分子所起的节制作用也颇值玩味。不管怎么说，米歇尔·福柯的让-保罗·萨特的某些言论并非朝节制的方向走了。

慕尼黑枪杀案发生后，萨特在《人民事业报—我控诉》上写道：“在这场战斗中，巴勒斯坦人拥有的惟一武器就是恐怖主义。这是一种可怕的武器，但被压迫者没有别的武器。在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把恐怖主义对准法国人的时候，那些对此表示赞同的人也只能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恐怖主义……恐怖主义的原则就是必须杀人。正如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斗争的阿·梅米所说，即使人们不得不接受恐怖主义，但在看到炸得血肉横飞的尸体、身首异处的儿童时，人们仍然不忍目睹。然而，如果人们能够接受恐怖主义，那么就应该承认慕尼黑的枪杀是完全成功的。”^③

米歇尔·福柯在与毛派进行的一场关于“人民司法”的辩论中，对司法机构标榜中立于人民及其“敌人”之间表示怀疑。他认为资产阶级制订的刑法旨在

① *Ibid.*, p. 124 et p. 31.

② Serge JULY, *Libération*, 21 septembre 1979, cité par Hervé HAMON, Patrick ROTMAN, *Génération*, t. 2, *Les Années de Poudre*, op. cit., p. 657.

③ Jean-Paul SARTRE, *La Cause du peuple-J'accuse*, n°29, cité par Nicolas WEILL, 《Il y a vingt ans. La mort de Pierre Overney》, *Le Monde*, 1^{er} 2 mars 1992.

分化无产阶级和平民：“革命者只有彻底铲除法律机器才能取得胜利，一切与刑罚机器有关的、一切与意识形态有关并使这一意识形态悄然渗入人民实践中去的，都在应该铲除之列。”^①

关于法国为什么没有滑向法西斯主义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文化因素无疑起了决定性作用。人们无法抹掉他们由之脱胎并加以传承的人道主义文化。不管表面现象如何，众多高官要人都不能无视他们接受的启蒙教育和文化。而这种情况会有条件反射的作用，使他们拒绝进行血腥的反击。作为这一因素的回应，政权所采取的镇压措施比极左派预计的要克制得多（见第11章）。安托万·利尼埃说得很对：“尽管我们不太愿意承认，但我们毕竟还是法国的大学培养出来的。此外，我们当中不少人并非来自索邦大学，而是来自高等师范预备班。”^②在伦理学上，康德或蒙田^③比毛泽东更有价值。

要受过这类教育的人同意极端的暴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是想像中的事。“革命万岁！”派的绝对自由毛主义分子隐隐约约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些活动分子经常讲“革命”，表现出他们对无产阶级左派的玩命逻辑有所认识。曾于1971年被手榴弹毁了容的里查德·德赛在一篇文章中绝望地谈到一名法国年轻活动分子的死。此人离开法国，参加了巴勒斯坦人的武装斗争：“兄弟们得知你死了，但他们把目光转了过去，因为在你的死亡中也有他们自己的死亡，而他們不愿正面看它，因为如果那样，他们就必须作出选择：要么活着，要么死去，但不要我们现在这个样子。”^④

人们心中的人道主义精神似乎已丧失殆尽，而为其复生而斗争的人又显得那么软弱无力，只有彻底的革命才能改变局面：“我希望来一次光芒四射的革命，像太阳一样给巴勒斯坦人民带来勇气和力量，带来农泰尔的梦想，带来结束肉体和精神贫困的革命。”里查德·德赛说。

对1971年商人打死几个年轻人的事件，《一切！》报也呼吁要报仇：“当我们看到库尔纳夫咖啡馆老板逍遥自在，圣-艾蒂安的老太婆和索肖的面包店老板也都自由自在时，真想要他们的命，饱揍他们一顿，把他们的头塞进铁柜，让他们

① Michel FOUCAULT, 《Sur la justice populaire. Débat avec les maos》, *Les Temps modernes*, n°310 bis, 1972.

② Antoine LINIERS, 《Objections pour une prise d'armes》, in François FURET, Antoine LINIERS, Philippe RAYNAUD, *Terrorisme et démocratie*, *op. cit.*, p. 197.

③ 蒙田(1533—1592), 法国作家、伦理学家, 作品有《散文集》。——译者

④ Richard, 《Sourire à celui qui n'est pas mort》, *Tout!*, n°16, 29 juillet 1971.

被沾满鲜血的钞票憋死。”^①在这篇文章的后面附了两张从戈达尔的电影《精疲力竭》中转载下来的照片：影片中扮演便衣警察的演员举着手枪，而贝尔蒙多倒在铺路石上。人们从梦境内外和虚构中走出来了吗？

“革命万岁！”的领袖罗兰·卡斯特罗在总结五月运动后这几年的经验教训时说：“我们在想像中搞了战争的革命。我们让人信以为真。这是无分娩的阵痛，是没有付诸行动的痛苦。痛苦是内在的，外表完全是装腔作势。而这使我们得以置身于地狱和凶杀之外。”^②

英雄累了

1973年，自发毛主义分子的革命战斗精神开始发生危机。五月运动过后5年，最狂势的积极行动仍未产生预期的革命后果。在经历了革命似乎迫在眉睫的紧张的几年后，毛派遇到现实的考验，这是他们无法再长期否认的。马塞兰实施的镇压，疯狂的积极和他们过的近乎地下的生活，在工人阶级中扎根行动的停滞不前……这些因素使得群众起义和发起内战的希望完全落空。

处在第一线的毛主义者通常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工资少得可怜，住宿条件极差，在工厂里要为扎根的学生服务，要绝对服从组织……私生活被压缩到最低的限度，几乎没有娱乐。夫妻生活变得很困难，经常以破裂和分手告终。年轻的活动分子不但脱离了家庭，也脱离了许多过去的朋友。他们以如此艰苦的生活条件来弥补自己阶级出身的不足，这肯定是个误区：“你可以要求过绝对贫困的生活，可以认为不讲卫生、吃猪食一样的饭是正常的事，但工人的传统是：星期天必须做一份洋葱牛肉或炖肉。”^③

对于那些在离原住地很远的地方扎根而又没能搞出什么名堂来的学生来说，这无异于“流放和服刑，厌倦多于疲劳”^④。向革命工人模范看齐也未能坚持多久：“实际上工人的形象与革命模范并不吻合。为了维持这种形象，我要耗费大量精力。太多的壁虎把大厦搞塌了。”^⑤

狂热般的积极性使许多活动分子精疲力竭，他们背的包袱越来越沉重：“我

① 《S'ils nous tuent, alors... nous tuons》，*Tout!*，n°16，29 juillet 1971.

② Roland CASTRO, cité par Herve HAMON, Patrick ROTMAN, *Génération*, t. 1. *Les Années de rêve*, op. cit., p. 590.

③ Christian JAMBET, cité par Virginie LHNHART, *Volontaires pour l'usine*, op. cit., p. 173.

④ *Ibid.*, p. 172.

⑤ Jean-Pierre THORN cité par Virginie LINHART, *Volontaires pour l'usine*, op. cit., p. 194.

过着工人和活动分子的双重生活：在工厂劳动、散发传单、开会、行动。在无产阶级左派内干了一年后，我已支持不住了。”^①在这种情况下，被捕和坐牢可以算是一种暂停，使他们终于休息一下并喘口气。

还有那些在烟雾腾腾的房间里没完没了的会议。会上他们不仅把时间花在改造世界上，而且还要开展清除自己和他人脑中错误思想的斗争，这是那些自比毛泽东的领导干部要搞的“整风运动”。在这些“战斗的守夜”中，人们一定能揪出自己身上存在的“旧思想”。大家都抱着“思想庇护神”不放，否则就活得不安心^②。集体就是一切，离开集体就不可救药，也无法过另一种生活：“再教育和检查工作作风逐渐成了主要的活动。我们是多么愿意把我们洁白无瑕的生命交给革命事业啊！”^③

其实他们所批判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思想通常都是他们自己的爱好和价值，不过却被较好地克服了：“我看了我们红色图书室列出的坏书……我们几次动了家里的支票，有三个小时脱了蓝色的工作服，在资产阶级味道很浓的餐馆里吃了几顿好饭。可我们没有吱声，都隐瞒了，我们感到羞耻。”^④活动分子的主观意念被切割成互不相容的两个部分，这种对现实和自我本性的否定能持久吗？

众多自发毛主义者的这种生存危机暴露出他们事业的基础更多是浪漫性质的，而不是政治性的。让·皮·多莱原先是法共党员，后来成为毛派，他这样描述自己走过的路：“我把什么都混在一起了：半冒险半革命的汉堡海员、哲学政治学指导员的轻机枪、心地善良的无政府主义妓女、黑格尔锐利的观点和西班牙战争、《人类命运》中的乔·黑嘴和钢铁工人的史诗、多列士和列宁、尼赞^⑤和阿拉贡、抵抗运动和阿尔及利亚战争……简而言之，我之所以成为共产党人，是因为我认为过日子的惟一方式就是活得像一部小说……这一代年轻的共产党人把历史当做小说，讲政治是为了不搞政治，找到一个突破口使响亮的口号能最终响起来：‘改变生活。4年的闯荡，值啦！’”^⑥

① Jacques KÉBADIAN, *ibid.*, p. 151.

② LAURE, citée par Claudie et Jacques BROYELLE, *Le Bonheur des pierres*, *op. cit.*, p. 179.

③ Claudie et Jacques BROYELLE, *Le Bonheur des pierres*, *ibid.*, p. 69.

④ *Ibid.*, p. 83.

⑤ 尼赞(1905—1940)，法国左翼小说家，反法西斯运动战士，代表作为小说《阴谋》。——译者

⑥ Jean-Paul DOLLÉ, 《Les illusions fécondes de Jean-Paul Dollé》, *Le Monde Dimanche*, 2 octobre

共产主义同盟的转折

当毛派对自己的好战言论开始怀疑的时候，共产主义同盟继续以最有组织、最有效的极左组织面目出现。1973年1月，它不顾反尼克松游行的禁令，秘密地组织了在美国使馆的游行，与治安部队发生激烈冲突。在《红色报》中可以看到：“没有别的解决办法了。游行的前锋开始骚动，冲了过去，同治安部队发生了肉搏。很快便显示出特种部队的力量只是个神话，而不是真正顶用，以至于警察的防线不得不让出地盘，退了回去。”^①

在同盟及其秩序服务队内，许多活动分子都热衷于较量，而且希望越来越有效。罗曼·古皮称：“我在军队短暂服过役，对政权对付革命的军事机器有些了解。我们的秩序服务队有点儿可笑。我们应当提高层次。所以我与米歇尔（米歇尔·雷卡纳蒂，同盟秩序服务队负责人）一起策划让我到拉美游击队去实习。我想届时会大大有助于弥补我们的不足。一颗埋得正确的炸弹可以顶许多演说。”^②他的旅行未能实现，他期待的“届时”也从未到来。

1973年共产同盟发动中学生起来反对德勃雷法的实施。该法案对缓期招收大学生的期限作了限制，对高校教学的第一期作了改革。该法立即被指为控制青年。同盟要求延长缓招期限。成千上万的中学生在全国不同城市游行示威。对“资本主义学校”的批评变本加厉，《红色报》写道：“法国曾经需要儒尔·费理^③，但工人阶级永远不需要他……‘公立’学校同样摆脱不了资产阶级的统治。谴责私立学校当然可以，但条件是也要谴责警察和老板的‘公立’学校。”^④

“革命！”组织在中学生运动中也很活跃。它号召教师们要站好队，不仅要支持青年的要求，而且要否定自己：“要承认学生的斗争是因为他们对学校反感，不折不扣地支持这场斗争对于教师来说就是投入反对资产阶级学校的斗争，就是对学校派给他们的角色表示异议，就是反对学校将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分裂开来。”^⑤学校和军队被指责为“驯育”和“选种”的两种手段，反军国主义的宣传搞得热火朝天。

共产主义同盟也同样遭遇镇压和警察的一再攻击。1973年6月21日标志

① *Rouge*, n°189, 27 janvier 1973.

② Romain Goupil dans son film *Mourir à trente ans*.

③ 儒尔·费理(1832—1893)，法国律师、政治家，主张公立学校、义务小学教育。——译者

④ *Rouge*, n°193, 24 février 1973.

⑤ *Révolution!*, n° 28, 21 avril 1973.

着这种较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那天,极左组织“新秩序”在巴黎互助宫大厅举行集会,四周布满了警察。共产同盟在暴力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其成员向警察发起攻击,用大量燃烧瓶迫使警察几度后撤。警方几十人受伤。当队伍退到巴士底广场时,恰好一辆警方救护车经过那里,车被烧了,警察遭到殴打。同盟秩序服务队的负责人已难以控制他们的队伍,几百名活动分子晚上捣了“新秩序”的办公处:“法西斯的办公处受到攻击,一扇门被推倒。办公室里的人发射霰弹还击,然后从屋顶逃之夭夭。”^①《红色报》的这篇文章急忙补充道:“很了不起的是,尽管示威者怒火冲天,守卫者弃屋而逃,但没有任何危险的行为,譬如放火。如若不然,其在这个破旧的街区造成的后果将不堪设想。革命分子还是懂得如何保持冷静的。”^②

这次冲突过后,马塞兰有了取缔共产主义同盟的全部借口。他对“新秩序”也照此办理。说实在的,他梦寐以求的就是这个。在街头与警察及极右派的冲突已经达到极限,政权要显示它已无法再容忍了。

被取缔的共产主义同盟并非与国家机器较量的惟一势力,它也不愿是惟一的。6月21日示威的秩序服务队负责人雷卡纳蒂受到领导的严厉批评。他接受不了这样的批评便转入地下并到比利时躲了起来。

阿兰·克里维纳在受到密特朗和埃德蒙·梅尔的接见后向警方自首了。他的入狱把整个左翼(包括总工会和法共)都发动起来捍卫民主自由,反对马塞兰的镇压政策。

对米歇尔·雷卡纳蒂来说,这年6月21日标志着一个转折点,使他对自己产生了疑问。雷卡纳蒂在1978年3月23日自杀前几个月写给朋友古皮的信凸显了战斗精神的另一面:“出于我仍在追索的原因,我为爱、为笑、为放任自己而感到痛苦。何时能扭转这种局面?我不知道。可能就在发现自己不是任何人的儿子、我的世界突然崩溃的那一天。但我如此强烈地在沉默中受苦、当潜意识忘却了痛苦的原因时,有两种可能的自保方法:死亡或游戏、演戏。我在游戏和表演中一贯是演最强者、最优秀的人,扮演在战斗中冒最大的肉体和精神风险的人。于是有一天外壳破裂了,那就是1973年6月21日以后的日子,在我过了两个月的地下流亡生活、然后进了监狱以后。”^③

在无产阶级左派被解散、皮埃尔·奥维尔内死亡、1973年6月街头冲突后

① 《Après la contre-manif du 21 juin》, *Rouge*, n°211, mardi 27 juin 1973.

② *Ibid.*

③ Lettre de Michel Récanati, citée dans le film de Romain Goupil, *Mourir à trente ans*.

共产主义同盟被取缔后，五月运动过后以极左派暴力行动的发展为标志的极左辉煌时代宣告结束。

最后一期《人民事业报——我控诉》出版于1973年9月，里面已看不到开展阶级斗争和“新游击”战争的呼唤了。利普厂工人的斗争被作为榜样报道出来，但这一次与几年前的好战调门完全不同了。该期报纸还附有一份要求在拉尔扎克举行集会的呼吁书。无产阶级左派于1973年秋被解散。五月运动中诞生的自发毛主义活了下来。

十五、利普和拉尔扎克之路

1973年是一个转折点。大学生公社中最激进和时讲暴力的极左派凸显自身的局限性并开始感到疲倦。然而，五月运动的思想仍在社会上继续传播并影响到大学生以外的阶层。

一些并非革命分子发起的斗争把工人和平民阶层动员了起来，并走出传统的权益要求的框框。1971年，圣-布里厄地区法国茹安工厂工人的罢工在该市和整个地区得到广泛声援。1973年，贝桑松地区的利普表厂工人的斗争和位于阿韦龙省的拉尔扎克农民的斗争成了法国人民斗争的典范。

与五月运动后的学生运动不同，这些斗争得到舆论的广泛支持。利普厂工人占领工厂是为了保住就业，拉尔扎克农民的斗争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土地，反对在那里扩大军营的计划。透过这些斗争，表现出不寻常的行动和动员能力，如果不是五月运动的影响，这是不大可能的。但它更多地不是受到新列宁主义极左派的影响，而是受到五月运动中出现并形成潮流的人道主义和基督精神的启迪。这股潮流部分是由统一社会党和民主工联所带来的，这就是后来所谓的“第二左派”。

极左派仍然固守这些斗争，以证明其革命思想的正确性并从中汲取恢复生机的力量。但期待已久的工人、平民运动并未呈现全面冲突的态势，而是重现了五月运动的容忍和友爱气氛。这促使许多活动分子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想法。

法国斗争的典范

1973年4月,位于贝桑松市帕朗特区的利普表厂工人响应其工会支部的号召,起来维护自己的就业。该厂的董事长兼总经理辞职了,贝桑松法庭任命了两名临时董事,全市和整个地区群情激愤。利普厂及其声誉是该地区传统制造业的光荣,也是地区遗产的一部分。工会在全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宣传运动,以争取地方议员和重要人士的支持。

马克·拉利耶主教对他们表示了支持。在各教堂宣读的信件中,他声明:“使劳动者如此朝不保夕是不应该的,也是不人道的。”^①5月24日,5000人在市长的带领下在市区游行。一个由数百名工人组成的代表团上巴黎向总理府和装备部请愿。

6月12日,利普厂的工人在企业委员会开会时扣押了两位临时董事“直到达成解决办法”。他们在其中一人的公文包中找到一份一直瞒着他的拆除计划。这份文件被传到地区电视台并在电视上直接宣读。工人们又回到工厂并在那里筑起街垒。警察出面解救两名董事,发生了暴力冲突。占领工厂的工人决定将工厂占为己有,将价值500万法郎的库存手表藏到一个保险的地方。

6月15日,由市长、政界人士和主教等人参加的12000人的游行在贝桑松举行。商人们关了自己的店铺,各教堂钟声齐鸣。自从法国解放以来就没见过这样的示威了。

6月18日,利普工人又迈出新的一步:每日召开的代表大会决定重新开动钟表装配线并出售手表,以保证救命的工资能发放。工厂门上挂出一条横幅:“可以制造、出售、领工资。”一些常设委员会建立了起来:生产的、销售的、接待的、宣传和维修的,等等。工厂“向众人开放”。每周发表一份新闻公报,制作了录音带和影片,向全国派出代表团宣传他们的斗争。在全国层面上,民主工联和总工会组织了声援运动。

面对这种局面,政府任命了一名调解员,亨利·吉罗。他是里昂一家公司的经理,曾经参加过企业重组。他同工会支部进行了谈判。然而,8月14日夜治安力量突然介入,把看护工厂的工人赶了出去。工人立即进行反击。下午有近1万人在贝桑松街头游行,晚上一些示威队伍与警方发生冲突。次日,民主

^① Cité par Hervé HAMON, Patrick RTMAN, *Génération*, t. 2, *Les Années de poudre*, op. cit., p. 482.

工联和总工会的领导埃德蒙·梅尔和乔治·塞居伊赶往贝市并在体育馆发表讲话。在巴黎,各工会和左翼政党联合举行的大会聚集了几千人。声援大会在全国展开,狄龙、里昂等地都举行了示威游行。

利普工人安顿在市府出借的一个体操馆内,恢复了手表的装配和出售;每日的代表大会在该市一家电影院举行。

1973年9月29日,在该厂劳动者和民主工联、总工会支部的号召下,组织了一次全国性的游行。很多人担心极左派会导致局势失控。工会组织引导了这次在雨中的游行,使之在平静的气氛中进行。近10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示威者向贝桑松挺进。

利普厂成了斗争中的法国象征。该厂工人表现出的勇气博得左翼阵营和其他人的关注和钦佩。工会代表团、全国和地方工会负责人、各种倾向的积极分子、新闻记者等纷纷前往利普。他们回来时都对工人们的创举和组织能力表示惊讶。购买手表成了声援行动,取得很大成就。

“梦想成真”了吗?

极左派认为利普厂工人的斗争从各方面来说都堪称典范:工人们积极占领工厂,多次无视法制关押董事,特别是主动占有了库存手表。他们的创造性和组织能力,以及代表大会上的讨论和会上作出的决定与工人的传统一脉相承,而在此前大家都认为这种传统已经丢失了。众多活动分子自1968年5月以来一直呼唤的工人自治不是变成现实了吗?利普厂的斗争不是恢复了工人委员会的形式并预示着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人权力吗?创办于1973年的《解放报》(见下一章)打出了这样的标题:“梦想成真了”。

所有极左组织都向利普派出了代表团。前无产阶级左派的领导人几乎每天都在那里露面;《五月手册》的成员在宣传委员会和《团结的利普》简报编辑部中提供服务;《解放报》的记者也每日必到;“妇女解放运动”派出活动分子拍摄关于利普妇女的片子。

活动分子们对斗争的领导人 and 劳动者对他们的宽容感到意外。自1968年5月以来,法共和总工会总是千方百计阻挠极左派与工人阶级联系,但在利普并非如此。活动分子们可以去支援工人,并没有被总工会和法共的打手轰出去。他们可以参观工厂,参加代表大会,直接同劳动者对话,也并没有被怀疑有见不得人的企图。极左派是否能够找到迄今未能找到的革命工人阶级了呢?

只要更仔细些观察,就会发现实际情况复杂得多。实际上,利普工人的斗

争与极左派的意图和行为并不吻合。表现出创造性和自我组织能力的利普工人并非工人阶级中受剥削最深的阶层。该厂一半劳动力是女性,工人的人数勉强超过半数,而且都是专业工人。按列宁的话说,“工人贵族”的比例很大——“在企业 1317 名工薪者中,691 名是工人,其中 300 名专门工。其余的分为:175 名职员、269 名技术员、70 名小组长,66 名工程师和干部、34 名代表和 12 名经理。”^①而且,半数工薪者都参加了工会。民主工联和总工会在工人中的势力几乎是势均力敌。

在普鲁东^②和乌托邦主义者傅立叶出生的这个城市里,斗争的主要领袖和最得民心的领导者是民主工联的工会干部,他们深受基督教人道主义的影响。这些领袖的文化背景和出身也与新列宁主义极左派主张的模式格格不入。这场斗争的领袖夏尔·皮亚热是民主工联的工会代表,“工人天主教行动”的活动分子,从一开始就是统一社会党的党员。42 岁的技术代理人罗兰·维托是企业委员会中的民主工联书记,过去曾是“基督教青年工人”组织成员,在 1973 年的议会选举中他是统一社会党的候选人。

他声称自己是非暴力主义者:“我从来不是个斗殴者,从来没打过架,我喜欢口水战。面对与我观点不同的家伙,我喜欢讨论并取得胜利。在这点上,我从不犹豫与任何人较量,但我一直讨厌暴力,因为暴力不可能解决问题,那样取得的胜利也是假胜利,要进行思想的交锋。我从不用手打架。我越来越信基督教,但越来越少参加宗教活动。”^③发起并主持行动委员会的 35 岁的民主工联活动分子让·拉格内斯是个多米尼加人,1968 年五月运动时他是巴黎法律和经济学院的学生兼辅导神甫,在 6 月份索邦大学的学生将“加丹加分子”拒之门外时,他曾帮助过后者。

在冲突过程中,利普的代表和劳动者虽然也无视法律,但并不想与治安力量进行较量,这与某些极左分子企图劝说他们做的背道而驰。在宣传委员会的一份公报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话:“与共和保安队发生冲突,这是个陷阱,我们能够挫败它。”^④在警察占领工厂后发生的冲突并非人人都能接受的,有些人甚至说:“制服里包着的是一个生灵。”^⑤

^① *Lip dossier d'information*, publié par la commission popularisation des travailleurs de Lip, 1973.

^② 普鲁东(1809—1865),法国社会主义理论家。——译者

^③ Roland Vittot, cité in Charles PIAGET, *Lip*, Stocdk, Paris, 1973, p. 128.

^④ *Lip dossier d'information*, op. cit.

^⑤ Mlle Plantin, 50 ans, assistante sociale, in Charles PIAGET, *Lip*, op. cit., p. 110.

与极左分子不同,利普斗争的领导和劳动者十分关心团结问题并争取得到最大多数的支持:“我们从来没有拒绝极左组织,尽管他们是来强烈批评我们的,”夏尔·皮亚热写道,“我们对自己说:‘他们表达他们的意见,这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劳动者有能力作出判断。’……这并不意味着不必要提防那些以民主的名义来播种混乱、企图把斗争引向失败的人。但是,如果我们听了某些人的话,那我们就会把大家拒之门外,这就等于失去来自厂外的为我们的斗争做出贡献的一切力量。”^①

利普的劳动者意识到他们的斗争成了典范,但他们丝毫没有沾沾自喜、弹冠相庆。宣传委员会发布的新闻资料称:“我们的斗争表明劳动者有自治能力,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但同时他们也说明:“自己生产并出售手表的同时,我们丝毫不抱自主的幻想。我们仅仅是在特定的时刻选择了一种斗争方式,使我们能够保证工资的发放,并通过开展声援运动以保障我们的就业。”^②这与极左派所写的相去甚远。

五月运动的其他教训

夏尔·皮亚热声称:“今天这样的冲突之所以有可能发生,是因为有了五月运动。”^③利普劳动者的创新能力和胆略带有五月运动的印记,同时也吸收了它的容忍精神和言论自由。皮亚热称:“五月运动让我们重新学习了民主,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斗争的领导者们特别关心劳动者最广泛的参与。民主劳联负责人罗兰·维托声称:“至关重要的是要知道往哪里去,在干什么,知道他们所做的事真正是他们自己决定的。”他还说:“归根到底,结果当然是很重要的。大家都知道我们斗争的目的就是使我们所有的要求都得到满足。但也许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我们这么说也许不大好理解,但显然在斗争中最重要的是大家都负起责任,每个人都取得进步,这比结果更重要。这是大多数人都能理解的,是对每个人的开放。”皮亚热不大爱出风头,而且很注意征求每个人的意见。在主持斗争的人当中,让·拉格内似乎是观点最激进的。在他看来,决定性的东西是劳动者直接参与决策和承担起责任,并破除不平等和等级关系;最重要的是达到“另一种

① *Ibid.*, p. 34.

② *Lip dossier d'information*, *op. cit.*

③ Charles PIAGET, *Lip*, *op. cit.*, p. 19.

社会另一种人际关系,另一种考虑工作的方式”。当劳动者靠卖表的钱给自己发工资时,他对薪酬不平等现象未能得到纠正表示失望。

没有参加大会的人无不被会上洋溢着严肃认真、团结友爱和宽容大度的气氛所感动。尽管多数人不同意总工会的意见,但还是让它的意见和大家的一样能被听到:“在一次大会上,总工会发表了一个不好的意见,与劳动者的要求有些距离。大厅里响起了口哨声,但仅仅一声而已。反应是很强烈的,虽然大家不同意总工会的意见,但还是为它鼓了掌。有几个人呵斥了吹口哨的人:‘在这里大家都有发言权嘛’,‘如果你不爱听,出去就是了’,‘可以不同意,但要听大家说’。”

与大学生的大会不同的是,这次的直接民主是有组织的。大会的准备工作由各工会、行动委员会和专门小组负责。活动分子们所关心的是能让大多数劳动者参与决策。行动委员会的人数在20—100之间,有工会会员和非会员。他们的会议独立于工会组织,但他们的考虑和建议会通知工会。这些建议由委员会直接提到每日大会上,大会向所有支持斗争的人开放,但表决时只有利普的工作人员有投票权。

过节和解放的感觉

在这场斗争中,利普的劳动者重新感受到五月运动中的那种自由和友爱的气氛。日常的压力、禁忌和等级仿佛不复存在了,正如罗兰·维托亲眼目睹的那样:“不再有工头和经理在窥视,不再有连篇累牍的内部处罚条例,不再怕宪兵。一切都在轻松、微笑中进行,彬彬有礼,团结友爱。这是一个常设的节日,肯定是的。”

工厂内外的隔离被打破了,人们直接相聚交谈,交流各自的经验:“工人、职员、在流水线的车床上工作的女孩,大家互相认识,进行讨论,不再有阶级,一点也没有了。”^①过去被认为很消极的工会内外的劳动者在斗争中都表现得很积极。女工们表现出的主动性让许多男人和她们的丈夫目瞪口呆:“只要有一个妇女拿起麦克风,男人就傻眼了。他们说:‘简直没法相信。她们要煮什么菜呢?’后来他们就明白了。妇女们很准确地说出大家经历过的事。和男人说的一样好。我嘛,跟男人们开过会,我认为他们做得并不比我好。”^②过去一对夫妇

① Christine, 22 ans, employée de bureau, in Charles PIAGET, *ibid.*, p. 172.

② Odette, 47 ans, OS 3, *ibid.*, p. 116-117.

中,总是男人代妇女说话,“在这里恰恰相反,我看到丈夫们总是等着老婆把话说完,倾听着她们的话,甚至是在欣赏她们。”^①

利普的劳动者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会晤,到各地去参加各种会议,这为他们打开了迄今未知的视野,也使他们对这场被视为典范的斗争感到自豪。对于那些以往觉得被人瞧不起、从未发过言的男女来说,这次经历是难以忘怀的:“在一个半小时内,她解释了在利普厂发生的一切。她说:‘我从来没在600人面前讲过话’;然后,她哭着说:‘从来没人给我鼓过掌。’”^②在这些宣讲大会上,利普的劳动者表现镇定自若。总工会的一名代表说:“我们很惊讶,他们不仅在应邀发言时讲得头头是道,而且发言后还单独回答问题。”^③怎么能对这样的经历不感到心花怒放呢?

很多利普的劳动者在斗争过程中都感到找回了自我,甚至对自己的胆量感到惊讶。从此工会不得不对这些善于争取自己权益的独立劳动者刮目相看了:“过去维托(民主工联代表)对我说:‘您应该参加示威,要行动起来!’而我呢?把自己裹得紧紧的。现在我敢对他说:‘注意,我可不是工会会员,让我自己单独干起来吧。’是的,我实现了自我,这是不少人的共同情况。”^④

1968年5月的“文化革命”产生了效果。但利普厂的斗争也和五月运动一样,紧张的共同斗争、新型的人际关系和由此产生的幸福感把斗争的有限目标给掩盖了:“利普厂的人决心不再像以往那样工作了,”一名女工说,“但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晓得具体该怎么做……由于有了这近5个月的自由自在的感觉,我不相信工人们还会像以前那样饿鬼似的扑向工具。当然喽,这些都只是一时的感觉。自由这个字眼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它是瞬间的、不可捉摸的东西,也可能是一种存在方式,一种设计生活的方式,就是在愿意的时候做自己想做的事。”^⑤

有了这种经历之后,怎么还能接受有一天又看到头头和等级,又要承受天天的压力呢?怎么还能接受妥协?如同五月运动中的大学生公社一样,这样的诱惑是难抵挡的:让这过节般的充满友爱的时刻越长越好,来一次以退为进吧!

亨利·吉罗制定的计划建议维持989个就业岗位,加上提前退休人员,共裁员159人,同时许诺这些人员可享受培训,其再就业将得到特别关注。10月

① Mlle Plantin, *ibid.*, p. 111-112.

② Roland Vittot, *ibid.*, p. 132.

③ Claude Merce, 53 ans, OP 3, délégué CGT, *ibid.*, p. 161.

④ Mlle Plantin, *ibid.*, p. 111-112.

⑤ Ludmilla Kita, 60 ans, OP 3, *ibid.*, p. 122-123.

12日,这一计划在大会上被劳动者拒绝:在800张有效票中,174张同意复工,626张同意继续罢工。

利普人的决心令众人意外。斗争在继续,但要向何处去?总工会一方面继续表示声援,另一方面对这种不现实的做法表示赞同。在罗卡尔的统一社会党和民主工联内,人们力图找到解决办法。最后与决心拯救利普的企业领导人达成重振计划。他们是:出版集团前领导人之一,全国学联前副主席、60年代让·穆兰^①俱乐部成员克洛德·诺伊施万德和安托万·里布(BSN的董事长兼总经理)、雷诺·吉列(罗纳-普朗公司)。这一方案于1974年1月被利普劳动者接受,他们交回了占领的手表库,最后终于达成妥协。所取得的成果比预想的目标和吉罗计划所建议的要低:取消机动的梯形工资制,重新雇佣以前辞退的几百名劳动者(未立即返聘的将送去培训),计划到一定时期实现全部员工上岗。但除了这些颇为失望的成果外,经历过这场斗争的人怎么能忘记这并肩战斗的几个月呢?

“保卫拉尔扎克”

与利普同一时期,拉尔扎克也成了法国人民斗争的象征。“保卫拉尔扎克”成为非暴力主义者、地方主义者、新兴生态主义者、统一社会党和整个极左派的全国性口号。拉尔扎克是阿韦龙省内位于米洛县城和洛德兹县城之间的一个高原,那里有一个军训营地。1971年,国际部长米歇尔·德勒雷正式宣布该营地将从3000公顷扩大到17000公顷,迫使几十户农民离开他们的农场。根据政府的精神,扩建军营是为了国家利益:面对苏联的潜在威胁,军队需要为其装甲部队准备更大的训练场地。军营的放大也可创造就业机会并给这个荒野的地区带来重振经济的生机。政府相信扩建工作会平静、顺利地进行。但时代不一样了。

扩建的消息引起有关农户和该地区众多居民的不满和愤怒。洛德兹的主教表态反对扩建,一封有40名牧师签名的信件在教区所属各教堂里宣读。起初农民求助于传统的工会组织。1971年11月6日,在米洛的全国农业经营者工会联合会(FNSEA)的号召下,举行了第一次5000人的游行,各教堂警钟齐鸣。1972年7月14日在洛德兹,在“保卫拉尔扎克委员会”的号召下,举行了有2万人参加的游行。几个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焚烧了法国国旗,与全国农业经

^① 让·穆兰(1899—1943),法全国抵抗委员会创始人,死于法西斯酷刑。——译者

营者工会联合会的秩序服务队发生了冲突。

在拉尔扎克开展斗争的农民深受天主教文化的教化，拒绝暴力的斗争方式。在天主教联合会内曾就非暴力斗争的方式和反抗武器问题进行过讨论。因此，农民们得到扎兰·戴尔·瓦斯托的支持。此人系基督教徒，甘地的信徒，头扎印度巾，在拉尔扎克创建了诺亚方舟修会。这些农民进行的反军队斗争似乎与他对工业社会的批评和对返回手工和畜牧生活的主张相呼应。戴尔·瓦斯托也是非暴力行动的理论家和实践家，他与拉尔扎克农民一起组织了一次绝食。罗德兹和蒙帕利耶的主教、米洛的牧师都参加了绝食。

对于发起这次行动的农民来说，事情非常清楚：“一个基督教徒不应该成为创造原子弹、制造和试验‘常规’武器并出售给饥寒交迫的不发达国家的同谋者。因此基督教徒必须使用‘一切符合人的尊严的手段’反对扩大拉尔扎克军营。”^①

在一份正式声明中，与扩大军营有关的107户农业者中有103户反对妥协和由军队购买土地。他们通过一系列举动使全国很快认识了他们并得到广泛的同情。1972年10月，他们把60多只绵羊赶到埃菲尔铁塔下面。1973年1月，他们组织了拖拉机队推进巴黎的活动，沿途得到许多支持。到了奥尔良后，车队被禁止前进，他们便步行继续前进：“一支铜管乐队送我们欢天喜地穿过奥尔良市，几乎是在晨曦中跳舞。在人们去上班的时间我们穿过市区。当我们穿过打了霜的田野、走上通往巴黎的道路时，又是一派节日气象。迎面而来的重型卡车司机向我们致意，尽管我们的队伍耽误了他们的时间。从路边绕过的火车长时间鸣笛向我们致意。”^②农民们没有到达巴黎——绵羊的产期使他们不得不返回家乡——但斗争开始产生始料未及的影响。由于号召全国支持他们的斗争，拉尔扎克这103名农民发动的这场运动对全国的持不同政见者产生了影响。

持不同政见者大会合

在全国各地共成立了近100个声援委员会^③。拉尔扎克农民的决心、创造

^① 《Larzac, les paysans décident eux-mêmes de leur sort》，article préparé par une commission de paysans du Larzac et rédigé par Roger Moreau de la ferme des Truels, *Les Temps modernes*, n°371, juin 1977.

^② *Ibid.*

^③ Plus de soixante-dix «comités Larzac» se réuniront en 1975.

意识和团结赢得了赞赏，被极左派看做是一场远远超出反军营扩大问题的斗争。但 103 名农民的眼光还是带有强烈的福音主义色彩。他们的斗争是“为了生活，为了尊严与和平”；他们不愿意“破坏，而要建设，因为建设才是生活”。在志愿者建起的拉·布拉基耶尔羊圈里出生的小羊羔成为福音的象征^①。“拉尔扎克之歌”不像《国际歌》，也不像流行歌曲：

“拉尔扎克将永存，
我们的土地是我们的生命。
要羊群不要大炮，
不管愿意不愿意，
我们将保住这片土地。”^②

统一社会党，更确切地说是它所谓的“工人与农民左派”投入了支援运动，在高原上组织了一些全国性集会。这些集会成为近几年来抗议活动的重要时刻。

1973 年 8 月，由统一社会党成员贝纳尔·朗贝尔领导的、从全国农业经营者工会联合会分裂出来的“农民—劳动者”组织了一次向拉尔扎克的行进，取得超乎意料的成功：5 万多人聚集到高原上，像过政治节日一样，成了各种斗争的交会点。1974 年 8 月，又有 10 万人汇合一处过“收获节”，把政治集会和庆丰收结合在一起。

全法国展开的支援运动，目的不仅是保住 103 名农民的土地，而且“也抗议毁坏农民的劳动工具、破坏大自然……反对储存原子武器的危险……反对军队教人服从，教人使用暴力，教人厌烦，给人派无用的任务，毁灭人的个性。”^③拉尔扎克的斗争也是一场争取世界裁军、反对出售军火的斗争。1973 年的集会要成为“工人与农民相结合”的典范。诺盖尔和利普铝工厂的工人参加斗争使这个想法得到落实。拉尔扎克 103 名农民的斗争注定要与“工人、大学生反对资本主义、反对雇主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走到一起^④，拒绝“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军队。但对有关的农民来说，更多的是和平主义和生态主义，而不是单纯的军队问题。人们还提醒说，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这个军营曾作为了阿尔及利亚俘虏的囚禁地。

^① Allocution de Mme Guiraud à La Blaquière, Larzac 73, disque 33 tours édité par Vent d'Ouest, journal des Paysans-Travailleurs, 1973.

^② D. LOQUET, 《Chanson du Larzac》, *ibid.*

^③ Allocution de A. Richard au nom des Paysans-Travailleurs, *ibid.*

^④ Allocution de Bernard Lambert, *ibid.*

然而拉尔扎克的斗争也是地方主义——阿尔萨斯人、布列塔尼人和奥克西坦^①人的榜样：它成为反对法兰西国家“占领奥克西坦”斗争的象征，因为国家剥夺了它的资源，实行“文化灭绝”。透过拉尔扎克，人们看到的是“一个被压迫民族站起来了”^②。

统一社会党的活动分子和生态主义者都认为拉尔扎克已经成为新型斗争的模式和“另一种战斗”的新方法。高原农民所做的决定，他们的组织性，他们拒绝纳税，拒绝把钱再投入道路和新羊圈的建设，成立“农业地产集团”以抗拒军队赎买土地……这一切举动同利普工人的举动一样反映了社会走向自治的活力。

8月的“向拉尔扎克进军”成为一个伟大的政治节日，持异议运动可以在这个节日中估量自身的力量，同时也可从中看出其成分的复杂性，看出各派之间并不十分融洽。非暴力主义者和统一社会党的秩序服务队有时不得不全力以赴阻止那些企图来高原与军队和警察搏斗的人。人们不止一次与冲突擦肩而过。1974年8月来拉尔扎克访问的密特朗被极左分子吹口哨、嘲骂和推搡。他不得不在统一社会党秩序服务队的保护下匆匆离开。“在那上面”，毛主义者、托派分子、非暴力主义者、自然与环境保卫者、自然崇拜者以及每年夏天都在各种集会上相逢的青年人等等混杂在一起。大家在一片游艺气氛中相处得很愉快。这时，政治已让位给音乐和歌曲。此类围绕一些地区和局部问题使活动分子和地方百姓混在一起的运动还将在政治生态主义和反核斗争中延续。

反核运动

当时蓬勃发展的反核运动聚集了大多数革命派别，同时也标志着斗争主题和方式起了变化。20年后一名反核先锋说：“核问题成了一切仇恨的焦点：恨混凝土、恨技术官僚、恨祖国、恨民族独立。”^③

70年代初期的第一拨反核电站运动只有少数舆论表示关切。1970年底成立了“保卫费森海姆(Fessenheim)和莱茵河平原委员会”。1971年4月12日，它组织了第一次反对在费森海姆建核电站的游行，有1500人参加。1971年新兴的反核运动得到68分子的支持。在安河地区的比盖市于1971年7月发动

① 奥克西坦，法国南部操奥克西坦方言的地区。——译者

② Allocution de Jouglu, paysan occitan, *ibid.*

③ Philippe Lebreton, cité par Roger CANS, 《La France écolo》, *Le Monde*, 10 juin 1992.

了一次游行和节日相结合的示威，聚集了 15000 人。1972 年 5 月在费森海姆将近 1 万人参加了游行。

由于政府决定加速核电计划，反核运动在更大范围内开展了起来，面对“石油危机”，政府以民族独立要求能源独立为由，于 1974 年 3 月制定了第一个核电站计划。1975 年又跨进第二阶段：决定不仅要实施第二个计划，而且要发展核燃料处理并修建一座“增殖反应堆”。当时该项技术还处于试验阶段，其他国家在这方面还很谨慎，法国是世界上唯一走上“增殖反应堆”道路的国家。

核计划引来众多抗议，给日见式微的持异见运动注入新的生机。反核运动又一次聚集了各色人等，形成一个奇特的混合体：各保卫自然和环境联合会、和平主义者、政治生态主义者、统一社会党、极左活动分子又重新走到一起。在反对政府核计划的斗争中，他们得到反核科学家和民主工联的支持。

1975 年 1 月和 2 月，在巴黎和奥尔赛核物理研究所成员的建议下，一些科学家表态反对政府发展核能计划，强调指出政府在这些问题上垄断信息，并指出核计划包含的风险：“我们呼吁：只要（舆论）对风险后果还没有明确的认识，就必须拒绝建设这些核电站。”^①在一个月内有 1000 多位科学家签署了核呼吁书。在阿尔萨斯，一些科学家也致函市长、市政委员和地区议员，发出类似的呼吁。

1975 年 4 月，民主工联全国局也表态反对核电计划。民主工联的原子能工会同年发表一份资料《核能在法国》^②。由于这是反核科学家和生态主义者发表的第一份材料，因此引发了一场公开辩论，而此前这类消息都仅限在极小的专家圈子里。

1976 年 9 月，位于科唐坦（民主工联在该地区占优势）的阿格核燃料再处理厂的劳动者举行反对企业私有化的罢工。他们不仅揭露私有化对就业和劳动条件带来的风险，而且谴责“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核竞赛”以及由此而给居民带来的危险。他们得到在该地区很有影响力的天主教联合会的支持。11 月份他们组织了“核静坐”，在两天内几千人参加了集“节日、宣传、辩论”于一体的集会。圆桌会议和辩论涉及核工业、劳动和安全条件、对老百姓的威胁等问题。参加者有科学家、工会干部、罢工中的马尔库勒厂劳动者以及生态主义者。

反对建设核电站的地方委员会纷纷在不同地区（阿尔代什省、布列塔尼地区、诺曼底地区、北方省……）展开行动。在弗拉基维尔、格拉沃利纳、帕吕埃

^① 《Des scientifiques lancent un appel à propos du programme nucléaire français》，10 février 1975.

^② SYNDICAT CFDT DE L'ÉNERGIE ATOMIQUE, *L'Électronucléaire en France*, Seuil, Paris, 1975.

尔……示威群众占领核电厂所在地，试图阻挠施工，封了工地器械。在活动中，生态主义者在重演五月运动中的那种节日气氛的同时，加上了非暴力和基督文化的色彩。反对在科唐坦地区弗拉基维尔市建设核电厂的鼓动者之一迪迪埃·安热讲述了他的见闻：“占领者—解放者在这一行动（占领核电厂）中留下的最美好记忆就是共同的生活、意识形态的讨论（马克思主义或基督教义、暴力或非暴力……）、篝火边上和外面的吉他伴唱，还有和路易塞特一起做饭；农户送来的咖啡、罐焖菜、山羊腿，甚至还有一次渔民送来了烤大虾……还有，在夏尔和勒·盖里耐的带领下建起一座小型风车，利用风力发电（在迪耶莱特地区和矿区风是很大的）。意识形态的分歧、社会职业的隔阂、各人的自我封闭状态全被超越了！那是一种更具集体性质的生活雏形，替代核社会的雏形。”^①

同意给予5年宽限期的统一社会党于1975年声称：“无论如何，哪里要建核电站，哪里就会出现新的拉尔扎克。”反核运动还在发展，但未能得到像拉尔扎克那样的广泛同情。在全国各地都有零星的示威活动。然后，如果说核电站周边的居民对核危险十分敏感，那么在全国，核能源问题仍然是不和的根源。在现场，赞成核电站的人打出人们拒绝和害怕留长头发长胡子的人和五月运动中打砸抢分子的牌，取得一定成功。反核活动分子面临脱离百姓的危险，特别是在他们不是来自本地区的情况下。

新兴的生态主义运动主张非暴力，这不合某些活动分子的口味。在反核者中，绝对自由主义者并非全是非暴力主义，他们有时也得到极左派的支援。破坏建筑工地、反对封闭式围墙或破坏施工器械等事件时有发生。每当与警察面对面的时候，和平主义和非暴力生态主义者都面临与之发生冲突的危险。

马尔维尔市

1977年7月30日和31日举行的反对在马尔维尔市（伊泽尔省）建设超级凤凰增殖反应堆的全国大集会和向厂址进军是一次非暴力行动，但仍有大批治安部队来到现场。一份排外主义的报纸把德国生态主义者在现场的出现比作上次战争时的德国占领，把他们说成“德国入侵者”。生态主义者希望避免出现任何脱轨行动。在一封“致治安部队成员的公开信”中，马尔维尔协调委员会说

^① Didier ANGER, *Chronique d'une lutte. Le combat antinucléaire à Flamanville et dans La Hague*, Jean-Claude Simoën, Paris, 1977, p. 153.

明这次和平集会“不是针对他们的”，^①要求他们明白，并提出与他们对话。但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的马尔维尔委员会内部意见并不一致，少数人想与警察干一仗。

示威的前几天，生态主义联合会“地球之友”的主持人罗兰·萨米埃尔在《解放报》中指责“绝对自由精神误入歧途”，“使一些人来马尔维尔是为了袭击厂址和保安队”，并说：“暴力冲突将被政府利用来丑化生态主义者，把他们说成是少数‘打砸者’和‘恐怖主义分子’。”^②

参加集会的人数介于2.5万—3万之间。7月31日，一些极端分子与治安部队发生了极其激烈的冲突。生态主义示威者很快失去控制。一名非暴力的活动分子、在维埃纳省任教的教师维塔尔·米沙隆被进攻性手榴弹的气浪击毙。一名警察的一只手被打折，有一百来人受了伤。

自五月运动以来这是第二次出现示威者死亡事件，但此次的情况有所不同。最激烈主张暴力的毛派组织已经解散，与警方的较量已不再是有组织的了。革命极左派已不再是锋头正健了。仍想打斗的少数人看来想公开挑衅，他们是“最后的莫希干人”^③。这次死亡事件不仅是个丑闻，而且荒唐至极。

这次事件暴露了反核运动的不纯和矛盾，它是动机和方法各不相同的斗争者的大杂烩。革共同盟的托派分子混入各委员会使生态主义者不能不心存疑虑。罗兰·萨米埃尔写道：“我们对不公开政治色彩就混进各种运动的做法要进行批评。”无论如何，如果反核运动被某些已经死气沉沉的极左派所认同，那会是很严重的。这些极左派的算盘是乘机使其已暗淡无光的旗帜重放光彩^④。

在70年代下半期，极左派仍然四分五裂，进行着最后的挣扎。在自发毛主义者销声匿迹后，马列派继续试图在工人阶级中扎根，但收效甚微。共产同盟的托派分子继续进行着耐心的宣传和鼓动工作，分裂前仍在吸收新成员。

至于统一社会党，虽然在支持利普劳动者和拉尔扎克农民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但也同样失去了相当一部分成员。1974年，该党领导在米歇尔·罗卡尔的主持下号召在总统选举第一轮就投密特朗的票，拒绝了一部分党员和极左派的建议，即推举夏尔·皮亚热^⑤出来竞选，以凸显法国人民所进行的斗争。统

^① COORDINATION DES COMITÉS MALVILLE, 《Lettre ouverte aux membres des forces de l'ordre》, *Libération*, 27 juillet 1977.

^② Laurent SAMUEL, 《Point de vue》, *ibid.*

^③ 莫希干人，操阿尔冈昆语的印第安部落。——译者

^④ 同^②。

^⑤ 尽管极左派施加了压力，皮亚热还是拒绝了这一建议。

—社会党于是再次分化并破裂。1974年10月,社会党组织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讲座”,统一社会党的罗卡尔派加入了社会党,党内的托派则加入革共同盟;毛派——其本身也不和——也离开了统一社会党。“革命左派”的大多数人加入法马列共,而“工农左派”则创建了自己的组织,并于1976年与“革命!”组织合并成为“劳动者共产主义组织”。1977年,革共同盟也发生了分裂。整个极左派走上了解体之路。

有关生态的课题取代了阶级斗争和革命的主题,引发了重新整合。革命的极左派崩离,政治生态主义以另一种方式接替了极左思潮。

“五月运动之路不仅通向弗兰和樊尚的‘红色’基地,而且也伸向拉尔扎克、马尔维尔和生态主义。”^①这后三者也都自命为五月运动的继承者。但这条路在绝对自由者那是拐了个弯,因为就是在这几年中,绝对自由主义没有停止过破坏革命斗争精神的基础。回过头来看,这个千面的派别比“新列宁主义”更多地承载了产自五月运动的“反文化”。

① Brice LALONDE et Dominique SIMONET, *Quand vous voudrez*, J.-J. Pauvert, Paris 1978, p. 28.

十六、《解放报》的诞生和透明度的空想

到了1973年，人们不能不看到，五月运动以后的各种斗争已经改变了传统的斗争模式。妇女运动、青年造反、利普工人和拉尔扎克农民的斗争等等，都带来了新价值。即使虚拟出一个革命的工人阶级，也无法再掩盖这些新价值了。

由毛派和前无产阶级左派发起的日报《解放报》于1973年春天诞生后很快向产生于五月运动的各派开放。弗·玛·萨米埃尔松在其《有一份解放报》一书中写道，该报成了“各派别的诺亚方舟。所有样品都上了船：天真、刻板、无政府和乌托邦等等的马列主义者，绝对自由主义者，真诚的民主派，动摇不定者……”^①《解放报》的诞生再好不过地反映了从革命左倾到文化左倾的转折。该日报一直与极左的危机相伴而行，提出了“反文化”的主题。

《解放报》的宗旨是：“人民的报纸人民办，人民的报纸为人民。”面对现政权和体制对新闻的垄断和歪曲，该报要反其道而行之，“直击机密并帮助人民说话”^②。为此，必须对付新闻检查，冲击新闻领域的禁忌和保密习惯。反其道而行之的《解放报》希望成为直接来自社会并完全受社会监督、不掩盖任何事实的新闻载体。因此，该报以自己的方式重新找回了五月运动乌托邦的关键课题之一：社会要通过没有第三者介入的直接言论交流来实现自身的透明度。在组建的班子中，人们也看到他们对任何形式的等级和权力极度不信任，主张否定任何能力和才华区别的绝对平均主义。

^① François-Marie SAMUELSON, *Il était une fois Libé...*, Seuil, Paris, 1979, p. 177.

^② 《Manifeste》，cité par François-Marie SAMUELSON, *ibid.*, p. 140.

由于内部矛盾和冲突,《解放报》在成为自治实体和名副其实的日报之前,也曾经历过这种乌托邦的死胡同。

追根溯源

最初先有一个由无产阶级左派的毛主义者克洛德·维尔尼埃创建的“解放通讯社”(APL)。维尔尼埃在若贝尔事件(见第11章)后,与记者克洛德·玛利·瓦德罗和《政治周报》的艾瓦利纳·勃·加列克一起建立了保卫新闻委员会。通讯社成立于1971年6月18日,那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日子:1940年戴高乐将军于这一天发出了抗战号召。莫里斯·克拉维尔同意担任通讯社的社长兼总监。维尔尼埃和瓦德罗撰写的意向计划中声称:“今天,法西斯的阴影在法国不断壮大……我们要为恢复真理、加强新闻自由、打击遵命新闻而战斗。”^①面对新闻检查和镇压,面对虚假新闻,该通讯社要成为“主持正义和真理的工具”,“一个让记者能说出要说的一切,让人们知道要知道的一切的新论坛:给人民发言权”^②。

万事开头难。但通讯社在外省拥有一个通讯员网。与《人民事业报》一样,该军火库也是第一个获悉“新人民抵抗运动”的行动及其公报的。它也发表所有极左派别的公报。活动分子们可以将他们获得的新闻传给通讯社并收到该社邮寄的新闻公报。一些专业记者对这个与众不同的新通讯社颇感兴趣,纷纷加盟,使队伍不断加强,促使社领导班子萌生创办一份新日报的想法。

维尔尼埃把这一想法告诉了前无产阶级左派的领导,后者接受这一想法。但在通讯社班子内部问题并不那么简单:日报的定位是什么?它将是一份为斗争服务的毛派报纸还是一份独立的报纸?在毛派领导层、记者和通讯员之间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许多通讯员抗议由上头决定方案,担心有朝一日通讯社会消失。

毛派求助于菲·加维。他对新生的运动持开放态度,并把与他持同样态度的记者带进通讯社班子。萨特担任《人民事业报》社长后又同意担任《解放报》社长。他们在全国开展募捐活动:“《解放报》的财政要靠10万人每人拿出10

^① Texte paru dans L'Idiot international, n° 19-20, été 1971, cité par François-Marie SAMUELSON, *Il était une fois Libé...*, op. cit., p. 108-109.

^② *Ibid.*

法郎”^①，他们挨个向知名人士和著名艺术家争取经费支持。莫·克拉维尔、米·福柯、萨特等都捐了款，还有两名富有的财产继承者也投了资。

他们呼吁成立“《解放报》委员会”：“到处都成立《解放报》委员会，《解放报》就是你们！”^②这些委员会按毛派所钟爱的群众委员会模式建立，它们既要成为报纸的“支柱”，也要成为人民团结组织的雏形……

在抵抗纳粹占领法国的斗争中也曾出过一份同名的报纸《解放报》。报纸的团队对作这样的比照是不会不高兴的，他们在一份公报中说明：“《解放报》诞生于1941年我国人民要用武器说话的时刻……今天，法国的下层又需要表达自己的意见了，《解放报》就是要满足这一需求的……而这，我们认为继承了抵抗运动的传统。”^③

“人民的报纸为人民”

1973年1月4日，《解放报》第一个班子的代表——塞尔日·朱利、菲力普·加维、让·于勒、让-保尔·萨特和让-克罗德·维尔尼埃在记者招待会上介绍了该报。《解放报》自称要完全独立于金钱势力和现政权，要让人民讲话。朱利批评只给当局发言权的“客观性”：“现行的代表制度是不加监督地代行人民主权，这种制度被原原本本地接受并成为新闻的自然源头。而真正的客观性应该是：在劳资冲突或司法冲突中，给双方同等发言权；老板和罢工者，打官司者和司法机器，双方都具有同等价值。这样的客观性等于维持秩序。发言权实行代议制就是总是同样一批人有发言权。”他强调：“我们为之奋斗的客观性就是在人民公开、直接监督下的新闻。”^④

虽然有分歧，但第一个班子还是在宣言上达成了一致。该报要在言论和新闻解放方面成为五月运动的继承者。宣言声明：“现在是冲破秘密、帮助人民出来说话的时候了。1968年以来，人民开始在城市和工厂的墙壁上说话，每日都有、但都昙花一现的传单，使百姓能直接对百姓说话。”^⑤

毛派钟爱的人民这个字眼在宣言中随处可见：“新闻来自人民并回到人民之中”；“报纸给人民发言权”；报纸的组织和经费“依靠人民而不是靠广告和银

① Cité par François-Marie SAMUELSON, *ibid.*, p. 137.

② Plaquette 《Le quotidien du quotidien》, *ibid.*, p. 166.

③ Communiqué, 25 mai 1973, *ibid.*, p. 128.

④ Serge JULY, cité par François-Marie SAMUELSON, *ibid.*, p. 150-151.

⑤ 《Manifeste》, *ibid.*, p. 140 et suivantes.

行”。宣言还主张“非专制的社会主义”，声称毛主义者从来不隐瞒他们“要用一切办法使人民能用自己的评议写出自由的社会主义”。萨特则断言《解放报》是一份人民的报纸，听取人民的心声，接受人民的监督：“用什么办法让人民得到信息呢？那就是让人民给人民提供信息。事实上存在两种东西：人民和试图压迫人民的体制、政府和制度……至关重要的是人民与人民进行讨论。”他并声称：“也要做到对人民不存在秘密，因为人民必须对自己也是透明的。”^①

《解放报》的记者们生活在城市平民区，直接接触老百姓，以体现与众不同。工作方法也是如此：“当唯唯诺诺的日报编辑为感受时代气息而去同议员或办公厅主任进行讨论的时候，《解放报》的记者们却去和普通人（年老的或年轻的）、工厂斗争委员会成员、居住条件悲惨者、消费者等进行交谈。”

除了毛派的为人民的宗旨外，报纸还开辟了新的领域：“1968年以来，我们一直梦想着真实的新闻，梦想着对日常生活展开经常性的评判，梦想着毫不犹豫地介入百姓中仍有分歧的领域（种族主义、家庭、性问题等等）。”未来的报纸将不掩饰“使百姓产生分歧的成见（种族主义、男人对女人的压迫、清教主义、对等级制度的服从……）”。在这些问题上和在其他问题一样，《解放报》将让人民说话并进行辩论。

花边新闻也不会被忽略：“《解放报》将不让《法兰西晚报》或《解放了的巴黎人报》垄断生活上的事……工伤事故、交通事故、舞厅起火、士兵上吊、妇女因人工流产被起诉、同性恋者被判刑，所有这些都将成为问题提出来。”《解放报》将披露政权和强势者千方百计保密的数字、事实、证明，以“促进生活的改变”。

另一重要的开放性是：该报承认内部存在观点的多样性，各种观点均可直陈不讳：“我们不掩饰日报内部将产生的危机。这种危机比谎言和一言堂更有益。”“我们将不排斥任何观点的表达，即使这个观点只是少数人的或不受欢迎的。公众也有危机，而正是通过危机公众才能争取解放。”

在内部运作上，《解放报》实行工资平等，并以打破编辑和创作的分工。编辑和发行将依靠各地的新闻办事处，甚至考虑成立地区编辑部。

交会点和矛盾冲突

一些记者被这一计划所吸引，但又对毛主义者掌握领导权有不信任感。毛派与一些记者（如强调家庭和性问题重要性的菲利普·加维）的会晤并非没有

^① Jean-Paul SARTRE, *ibid.*, p. 152-153.

矛盾和争论。例如，皮埃尔·维克托就少不了强调妇女解放运动的“阶级局限性”^①，加维则反驳说：“维克托，你总是谈论别人的斗争，好像你是局外人似的。作为政治家，你认为妇女是一股要团结的力量，是不是？你是怎么想的？就拿同性恋来说吧，我经常因受挑衅而谈起这个问题，大家都可以争取妇女运动正成为一场群众运动。可是同性恋目前还是少数，所以谁也不去触及这个问题。因此我想问你到底对这个问题怎么看。”^②

这些问题那时在极左组织内部还是次要的问题，但已经难以回避了。由于创办《解放报》，毛派将要面对他们过去不信任的、产生于五月运动的另一派别：“《解放报》被搞成另类生活的大杂烩使毛主义者感到不快。他们思想上的成见将与年轻伙伴们放荡不羁的行为发生碰撞。这些胸怀大志的清教徒睁大眼睛一看，发现了另类的造反方式：耍无赖、放荡的爱情和同性恋。面对这些对肉体自由的追求，他们感到诧异，目瞪口呆，不知所措。许多人把搂搂抱抱、肌肤之亲当做避难所，就像在一个怪影晃动的剧院里。”^③

在最初的班子里，毛派和绝对自由派对人民、斗争和“生活上的事”有着不同的看法。加维希望自己的工作更贴近日常生活：“我喜欢听人们谈他们的生活，谈得很深刻。谈着谈着大家就感觉彼此更亲近了，界限打破了……我多么希望能到处都安上窃听器啊：在酒吧、在床底下、在车间、办公室、工厂门口、在接吻的人嘴里……雇主、资产阶级拥有一切信息手段。我们就只能像间谍似的在各类警察行列的间隙窜来窜去，以便讨论一些被禁止讨论的问题并把它公诸于众。”^④似乎没有任何东西是必须掩盖的，“真正的传媒是革命的”。^⑤

计划一经推出，便吸引了大批活动分子和“善意者”，而且每个人对如何办报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一些人认为《解放报》应该是反映法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斗争的报纸；另一些人则希望报纸向新社会运动和反文化开放，把它办成左的《法兰西晚报》……在活动分子、旧习未改的前活动分子和有真才实学的职业记者之间，矛盾和冲突是家常便饭，由此引发一连串的分裂，导致许多人退出。

《解放报》委员会活动分子抓住这样的口号：“《解放报》就是你们！”并要不折不扣地加以实施：“报纸的班子不应该脱离对运动的支持，否则它便成为另一

① Philippe GAVI, Jean-Paul SARTRE, Pierre VICTOR, *On a raison de se révolter*, op. cit., p. 115.

② *Ibid.*

③ François-Marie SAMUELSON, *Il était une fois Libé...*, op. cit., p. 164.

④ Philippe GAVI, *Tort!*, n°2, 8 octobre 1970, cité par François-Marie SAMUELSON, *ibid.*, p. 131-132.

⑤ *Ibid.*

份资产阶级的报纸。它必须向直接联系群众的基层委员会汇报工作。”^①各地委员会对巴黎委员会表示怀疑，而且巴黎委员会在办成哪一类报纸的问题上也有分歧。由谁决定？决定什么？为什么这篇稿子登晚了，而不是那篇？实际上是谁在搞新闻检查？谁擅自把通讯员或重要人士写的文章加以删节和修改？

工资问题也是争吵不休的根源：“我们在《解放报》中是要搞乌托邦式的平均主义还是要考虑实际情况？班子里有些同志经验丰富、资历很深……一般来说这些同志比班子里其他同志有更多的需求……难道给他们的工资略高一些也是不公平的吗？”^②反对的意见马上就出来了：“为什么‘专业’的需求就比‘业余’的需求多？难道他们就应该住更高档的房子、吃更多的牛排、喝圣-埃米利翁名酒而不喝发酵葡萄酒（这可是养胃的啊）吗？平均主义并不是乌托邦……工资不平等会产生等级制度。在《解放报》里没有老板。”^③

负责制作报纸的人员依据业已宣布的取消分工的意向，对他们的处境表示不满，要求与编辑部人员实行岗位轮换：“我们是报纸的无产者，《解放报》已经变成工厂了！……我们累垮啦，都无力同我们出身的阶层保持联系了，甚至无力去看看记者们怎么工作了。我们个人的想法都落空了，但又没有集体的想法。我们被困在手工劳动中，成为流水线作业的末端执行者了。……危险的是《解放报》变成一件固定不变的商品了。它越来越是一件由专业人员、记者和专家制造的文化产品了。它越是不关心斗争，发行量就越小。”^④

在这个集体中，提出任何等级关系、任何分工，乃至任何能力的概念都会立即被怀疑隐藏着夺权的动机；在这里，一切决定都要以最大的透明度由集体做出……因此争权夺利的斗争变本加厉。由于经费总是没有保障，因而一片混乱。在这种条件下办日报等于在赌一把。在1973年2月试出了几期“零号”后，《解放报》第一期于1973年5月23日正式出版，每出一期都是一个战绩。

此外，活动分子们的积习也难以改变。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阿图瓦省布吕艾地区发生的事件，引起班子内部激烈的争论。1972年4月5日，一名15岁半的少女、矿工的女儿布丽吉特·德韦尔遭人暗杀。她残缺不全的尸体在工人宿舍区的一个空地上被发现。贝蒂纳市首席预审法官亨利·帕斯卡尔指控并收押了公证员皮·勒鲁瓦，然后又收押其未婚妻、正在办离婚手续的贝甘-马耶尔

① 《Bilan général du “CL” IX^e arrondissement, juin 1973》, *ibid.*, p. 168.

② Jean-René HULEU, 《Note interne: “Sur les salaires à Libération”》, *ibid.*, p. 216.

③ Alain LEIBLANG, 《Note interne: “Encore et toujours sur les salaires”》, *ibid.*

④ 《Texte interne, Jacques VINCENT, octobre 1973》, *ibid.*, p. 218-219.

夫人。毛主义者(其中有居住该地的毛派工人头面人物、前矿工约瑟夫·图尔纳尔)要求进行“人民审判”。他们成立了“真相与法律委员会”，煽起矿工家庭的流言和仇恨，谴责“矿区公证员”，认为他是资产阶级和道德败坏的象征。帕斯卡尔法官向媒体介绍了他对司法透明的想法^①。然而，布吕艾市一名曾是活动分子的名叫让-皮埃尔·弗的青年却来自首。1973年6月2日，《解放报》登出《让-皮埃尔不是杀人犯》的标题，标题下用小号字体注着“他的律师断言……”毛主义者立即起来为他辩护，并再度掀起示威活动。

1973年9月24日，《解放报》在头版登出：“最后一分钟消息：在图鲁兹发生新种族罪行。两名阿拉伯籍工人被打死。”消息是虚假的，该报在次日最后一版发了一条更正：“我们完全意识到这类错误的严重性。”^②

1974年2月25日，该报发表一份日期为1968年5月24日的文件，据说来自国土警戒局，文件上注有“限制发行”字样。该文件直接牵涉公民行动服务队，并有一名单，上面记有“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并得到巴黎命令时”要被集结到体育场去的马赛居民的名字和住址。这样的文件很像5个月前智利皮诺切特将军政变时将几千人集中到体育场去的情况，也很像1942年7月的韦尔第尔大搜捕。实际上，“泄密”的是公民行动服务队的一名成员，是不可信的。一年后他被指控诈骗1亿法郎，判了4年监禁。这个泄密事件也就不了了之了。

乌托邦的末日？

1974年5月，萨特以健康为由辞去《解放报》社长职务。在最初的班子内，不和与敌意在加剧，一切都会引起争论：报道斗争的方式、对1973年立法选举和1974年总统选举(该报支持候选人皮亚热)应持的立场、特别是报纸内的权力问题和日常管理问题。不满和怨恨在滋长，班子严重分裂：“男女之间的亲密关系盘根错节，有友谊，有爱情，也有仇恨和诱惑。政治性的选择不存在了，有时走向了非理性。传唤和质询只不过是掩盖个人的恩怨。”^③许多热心办报的人都辞了职，报纸的生存受到威胁。

塞尔日·朱利邀请新的记者加盟，诸如马克·克拉维茨、让·勒·贝尼努、让·布格罗和弗·菲丽热等。他们都来自《五月手册》，在朱利周围组成一个班

^① Le juge Pascal sera dessaisi de l'affaire en juillet 1973.

^② François-Marie SAMUELSON, *Il était une Fois Libé...*, op. cit., p. 207.

^③ *Ibid.*, p177.

子,但也引起一些人退出和产生新的怨恨。过去低估了记者的技能,现在则要突出技能,把它作为分界线。解放通讯社的创始人维尔尼埃挂冠而去,各《解放报》委员会也纷纷解散,许多活动分子、读者和通讯员认为自己在转折的关口被人抛弃,甚至是被“出卖”了。但破裂终究还是发生了。朱利解释说:“到了1974年,不得不解散了。要么重新组织活动分子,要么组成一个新班子,但二者都不可能了。”^①现在需要的是否定自以为是和宗派主义。朱利1978年声称:“经过这些危机后,我们确信:任何一个委员会、任何一场运动都不掌握真理,需要寻求的是各种观点互相渗透。经过几年专断的极左后,如果《解放报》想要搞出和提供可信的新闻,那就要求它必须完完全全、实实在在是自由的,也就是拥有进行论证和检验的自由。但这样就会产生一个涉及记者职业性质的后果:要一切从零开始,对一切都进行调查,因为人们对任何东西都没有十分的把握。”^②

文化的左倾并没有因此而消失。《解放报》要通过别的冲突和矛盾在报界闯出一条新路,以被承认是一份真正的日报。《解放报》搅乱了新闻界约定俗成的权力关系和体制,把五月运动的思想展示给公众,并挑起矛盾和辩论。该日报成为在社会上已露端倪的文化整合的主要载体。

要理解这一现象就必须回眸过去,回到五月运动后的岁月,这样才能再现绝对自由和“替代”思想形成的历程。这些思想曾伴随了政治的左倾,但却从未与之完全合流。

^① Serge JULY, 《Entretien avec Serge July》, *Esprit*, mai 1978.

^② *Ibid.*

第三部

反文化的产生

十七、另一种活法

从1968年的秋天起,一部分被人们称作极左分子的人不愿等到“革命的前夜”再开始另一种活法:按照他们的看法,改变社会和世界得从此时此地开始,实实在在地从现实、从他们的愿望和理想开始。这一极端自由的思想潮流,即对日常生活的批评和消费社会的批评,都是通过网络和杂志进行,都是极左派集团发起的。这种不协调的潮流对夺取政权不感兴趣,也一点儿不想拯救工人阶级,他们要参照“生活”,要解放思想,以个人的充分发展为名,攻击道德和体制……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工作以外”的问题,极左的革命组织认为这是“第二战线”:休闲,性欲,消费,生活范围……革命首先是谋求文化方面的东西,它应颠覆习惯和日常生活。首先要进行的是“精神状态的改变”,在“体制”以外,实行交替性生活的实验。

“一切都停顿了”

在1969年,68年五月运动的乌托邦总是栩栩如生的。画家热贝在《政治周报》画了一组名为《01年》的画作,画中臆想社会停止运转,人们试图想像另一种生活方式:“一切都停顿了,人们在思索,但并不悲伤。”1972年,《沙尔利周报》转载了这组画,电影艺术家雅克·杜瓦永与编辑部成员一起,在1973年将其拍成电影(整个法国售出35万张票)。有些场景获得让·鲁什和阿兰·雷奈的帮助。

该片直截了当地批评1968年五月运动时的消费社会:“有人对我们说:进

步就是幸福。但是，它从来就不是幸福。于是挪动步伐，人们还会企望别的东西吗？”^①《01年》是个寓言，一个觉醒了的梦想，人们期待在某一天，在下午3时，一切都停顿了。墙上贴着五花八门的小广告：“全面停止活动”。到预定时间，车辆、机器、工厂等都停止运转，全世界各国的所有地方都发布了这个宣言……

人们总是说相互之间要交谈，要思考，要和睦相处，但是要说什么和做什么呢？这就像《01年》读者们给一个报纸的编辑部的信中所写的那样：“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但是我感觉到现在我有时间。我确信这一点，并受到这种思想鼓舞，会想出点子，会痛快地去玩”；“人们能够去做，能去做，总之，能去做……”^②但是，1968年还很近，墙上的壁画也还在：“我还有事要说，但是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种带有社会批评色彩的提问含有深沉的忧郁，它指出：“时间应该膨胀，或者是永无止境，我想这该有窍门……我不愿倒下，不愿意死，别吃太饱，别变老。”^③但是要发明什么才能做到这点呢？

人们主动会见邻居。在街上，人们互相拥抱，相互交谈，交换名片，并以名字相称呼。不再有“部长以及什么主任”，包括法国军队也是如此。不再有老板，也不再污染。此项运动遍及全世界：在纽约，证券交易者从摩天大楼的窗户里跳来自杀；在非洲和世界上别的地方，人们对《01年》运动都兴高采烈。

“打开窗户，把钥匙扔到街上。”法国人拒绝闭门自锁。财产被废除，不再有盗贼，不再有监狱。消费品搁置在商店博物馆里，在那里，人们感到惊奇，并对01年以前的生活感到可笑。白天或黑夜大家都可以拜访任何人，除非是别人为此恼火。“各种场所都是开放为公共场所。法国人到处都可以自由地走来走去，都可以使用。”为了发明一个东西，人们在讨论，在解说。大家高高兴兴，幽默风趣。人们在草地上跳舞。每人畅所欲言，谈论愿望和理想。人们享受人生，无拘无束，互相关爱。人们吃喝玩乐。巴黎的街道开始像菜园子，人们在挤牛奶……

梦幻呓语，愉快的心情，1968年式的幽默，影片中充斥着这类表达。但是，还得去传递带有期望的信息，并使人们能够听到。仅仅让人们掌握一些思想是

^① 《01年》，雅克·杜瓦永、阿兰·雷奈、让·鲁什的电影，热贝的电影剧本和对话。“与沙尔利报纸的读者和编辑部成员和知名和不知名演员合拍。”

^② *Ibid.*

^③ *Ibid.*

不够的：“我要告诉占90%无效生产的奴隶们：停止工作。其余的10%继续干，有人会接替你们。第一个后果：我们将停止毒化地球。第二个后果：人们会有时间，会有时间思考，有时间去求知，有时间去判断，有时间去享受乐趣，去满足愿望，考虑真正的人类的忧患，思考什么是最重要的，然后开始做任何一件事，70亿有思想的人就意味着革命。”^①

反对“自杀性的文明”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哈拉-基利报》(Hara-Kiri)对消费社会神神叨叨说个不停。这份报纸由卡瓦纳和贝尼耶创办于1960年，成员包括热贝、瓦兰斯基、雷塞、德尔费尔·德通、卡比等。1969年，该报成周刊，发行10万份。其风格和形式都兴高采烈地转向讽刺：图画，大标题具有挑衅性风格，第一页上写着：“富人万岁！打倒穷人！”“打倒节约，放开吃喝！”“不要色情！”“爱情是狗屎！”……1970年11月1日，在戴高乐去世时，曾在报道中用这样的标题：《死亡，科隆贝悲惨的舞会》^②，该刊被查禁。

《人们在困境中》^③是1969年9月《哈拉-基利报》的标题，而富尼耶的画作简直是世界末日风格，一堆堆的废墟，汽车外壳，重油板，原子弹爆炸，废墟，保安部队，黑色笼罩大地。文明似乎是自杀性的了。

在报纸栏目上，“傻冒”一词经常重复出现。这种词是“神经错乱”的象征，“表兄弟”或“中个儿法国人”的形象，一种自私和愚蠢的人，完全被这种社会制约和操纵的。其代表性形象是戴着贝雷帽，像个商人(乳品商或杀猪的屠夫)，或是一个带叉的农民，佩戴奖章的、打过一两次仗，特别是参加过殖民战争的军人。这些“傻冒”是不学无术的，难看的，是污染环境者。“这些一字不识的”土老冒“从有毒的土壤中冒出来”^④，“傻冒哪里都有，随处可见，无孔不入。他们开着破旧汽车，在带薪的假日，带着他们的傻冒老婆玩乐，哪儿都沾着傻气”。^⑤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世界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人阅读和重视《哈拉-基利报》，而另外一些人，他们就是“傻冒们”，为数更多。

① 热贝：影片《01年》介绍。影片录像带。

② 在戴高乐将军去世前一周(在科隆贝双教堂)，圣一罗朗-杜邦(伊泽尔省)的迪斯科俱乐部发生大火，146人死于非命。

③ *L'Héβδο Hara-Kiri*, n°34, 22 septembre 1969.

④ FOURNIER, *L'Héβδο Hara-Kiri*, n° 54, 9 février 1970.

⑤ FOURNIER, «S'ils pouvaient tous crever», *L'Héβδο Hara-Kiri*, n° 38, 28 octobre 1969.

面对这些“傻冒”，还有大自然，这是生命本身的象征，是值得人们捍卫的：“我只想种地，除此之外一切都是傻事，我疯狂地爱着土地，那是我的命根子，土地的血脉和庄稼，古老的住宅，树木，小鸟，花朵，风景甜美，即使什么都不干都可以支撑，而那些傻冒们摧毁了它。”^①富尼耶想重建一个旧村落，但他同时揭示义务注射和卡介苗转向温和药物和生物农业。而在《哈拉-基利》编辑部内部，有人觉得他是在“非傻冒化”。

富尼耶反对这种“自杀性文明”，“这是臭名昭著的消费社会的异化结构”，他号召建立一个相似的经济结构，“以便显示生活资源和生物圈的污染在不可逆转的进程中并不是不可避免的”^②。1971年7月，他在报纸上号召最早组织起来的反核组织“组织抗议大进军和群众性大集会”以反对在安省的比热建立核电站。人们看到，这次大进军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来自法国全国各地的1.5万人参加了游行。

富尼耶力图窥视我们的普遍的由于调节和“智力不发达”所带来的灾难，面对包围他的那些“傻冒”们，他预言：“我们不对那些‘傻冒’提出问题，如果他们出于被动或随大流，不管是心满意足或诚惶诚恐，就让他们去干吧，让他们送命好了，我们是为自己向他们提出问题，也是为了我们的孩子，为了我们所爱的男男女女们，为了我们所爱的一切，为了他们之中那些能够、愿意、知道如何在一个完好的社会里承受一切的人。”^③长期以来，人类似乎是分成头脑清醒的和不清醒的两类人。这里面有断层和鄙视。

富尼耶是新一代的对生态主义敏感的先鋒人物之一。精神状态的变化是长期的过程。它要通过交替实践的过程显示生活和生产可以是另外一个样子。这种实践不能一蹴而就，它要慢慢地铺开，最终导致社会变革，这难道不是文明的变革吗？

令人欢迎的集体？

在五月运动以后，第一个青年浪潮就是取得在城市或农村的集体生活经验，勉强维持自身的生存。这种试验源于对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向往，而不是基于大自然和环境的主题的重要性，那是以后几年才考虑到的。很多极端自由主

① FOURNIER, *L'Hebdo Hara-Kiri*, n°21, 23 juin 1969.

② *Ibid.*

③ FOURNIER et PREMILLIEU, *Charlie-Hebdo*, n° 33, 5 juillet 1971.

义分子和“散兵游勇”定居在普罗旺斯、塞文山脉、阿尔代什……他们很快与那些和革命极左派决裂的伙伴会合在一起。他们不必等待革命，便开始实践人们梦寐以求的理想社会，首先是在人际关系方面。对那些最初的集体来说，他们认为幸福是伸手可及的事。

巴黎的1968年五月行动委员会是这方面最有意义的例子。在他们看来，街区的行动没跳出圈子。他们对此的印象是“在巴黎转圈圈”。“大家6人一组出发，其他人接着跟上去。大家在一起生活这种思想，是要用我们自己的主张来改变这个世界。大家要换个方式生活，而不愿意在又窄又小的范围内，谁都为自己而生活。”^①“这也就是说要从城市里溜走，重新回到农村，活少干一点，多一点时间去干其他的事情。”^②

这种游离于现实体制之外的生活首先是活得自由，就像五月运动中解放口号的继续。晚上，“讨论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家喝酒又抽烟，吃喝玩乐。快快乐乐，共度良宵，日后在老朋友聚会时会说：“友谊就是在一起玩，一起出游，一起生活。”^③

在那些最融洽的集体里，最初的田园牧歌式的阶段很快被活生生的现实所接替。完全改变人际关系的愿望碰到的是被现实所否认的更为棘手的难题。在集体内部，关系远谈不上平等，因为每人地位不一样，竞争当然是存在的。私人生活和集体生活分离，即使降至最低限度，“这一切都可以通过集体来讨论。成员的行为只要稍有偏差就可能当做意识形态问题并受到批评。讨论和争论都存在。”

为了维持生活，每个人都得干点儿事，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有的人不干事，或者逃避集体劳动，这种人是否是唯利是图的人？分配家务活也成为讨论和争论的题目：“做饭和洗餐具，谁都得干。大家还得去采购，10分钟以后，人都走得无影无踪。头一个上餐桌的，把什么都吃光了。”^④“干苦力活的总是那些人，一大堆人都要吃饭时，只有一人做饭，做菜。”^⑤

还有一个突出问题：孩子教育问题。教育的问题是个抉择问题，是与传统家庭和教育之外的，那种在被禁锢和束缚人的思想之外的教育。某些集体自身

① Suzanne, citée dans Nicolas DAUM, *Des révolutionnaires dans un village parisien*, op. cit., p. 43.

② Claude, *ibid.*, p. 174.

③ Pierre-André, *ibid.*, p. 242.

④ Alexandre, *ibid.*, p. 110.

⑤ Gabrielle, *ibid.*, p. 125.

承担起教育任务。在抛弃了禁锢的思想和清规戒律以后,对孩子们的态度并不因此产生激烈争议:“这不是给孩子一支棒棒糖吗?不是吗?”^①“有一天,我回想起有人打一个孩子的耳光,这事引起通宵的讨论,一直到上午10点。我觉得这是一种罪恶,觉得这种事有点荒唐。”^②

当一对夫妇决定要一个孩子,这事应不应该征求集体的意见?大家都没有勉强同意:“在集体里已有12个孩子,朱迪特已有11个兄弟姐妹,再给她来一个也没什么意思。而这对夫妻想,我们再有一个孩子就繁衍和为家族传宗接代……我们中间有一位告诉我:‘朱迪特已经有11个小兄弟姐妹。’这是令人羡慕的事情。”^③

尔后,在夫妻之间总是有嫉妒和争吵,时而紧张,时而松弛:“一个集体是可以很好地和睦相处的,一个人来了,并被某人当成情人,这一来把一切都搞乱了。”^④为了搞清这个问题而举行的那些会议就像是扩大的家庭会议。

大家在读一位回到巴黎的68分子的证词时可能会想,为什么当时被称作“嬉皮士”或在南方被称作“赤佬”(Margoules)的这些人能够挑起这样大的激情和叛逆:“我特别想起埋葬一个在摩托车交通事故中丧生的伙伴的事,他是个酒鬼,他们把他埋在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当然,这是一次民间的葬礼。他们用埃维昂的广告牌将其遗体运到香料坟地,上面写着:‘喝埃维昂酒!’因为这家伙是酒鬼,这就是说:‘在基地欢庆,因为他热爱生活!’得挖个坟墓。那里有他的女友和另一位女伴,一位要放一些鲜花,另外一个说他不值得如此对待,向鲜花踢了几脚,她们几乎在墓地打了起来,得把她们劝开!墓地正好在村子里,村子里的人都从窗户里往外看。这么一来,我觉得这真是尴尬!”^⑤

对大多数这些最初的集体来说,破裂往往是突如其来的:“体力衰竭,营养不足,缺乏资金以保证真正的最低生活,全面无组织状况,工作无效率,来自正面的农民阶层的敌对状态,吸毒,小头目的恶行,最初的梦想往往成为一场噩梦。”^⑥

① *Ibid.*

② Alexandre, *ibid.*, p. 110.

③ Suzanne, *ibid.*, p. 44.

④ Gabrielle, *ibid.*, p. 126.

⑤ Claude, *ibid.*, p. 173.

⑥ LUC WILLETTE, *Longo Mai. Vingt ans d'utopie communautaire*, f Syros, Paris, 1993, p. 13.

美国制造？

在青年中间，整个思潮对美国持不同政见的运动感兴趣。1972年，法国放映了宣扬嬉皮士和伍德斯托克节(Festival de Woodstock)的影片，蛊惑了不少人：“巴黎缺少色彩，甚至陷入纯政治的造反中去。造反派没有在眼皮边画一些银色的星星。……瞧瞧，各式各样的人物，各个阶级的人物都参与了。有很多无产者充斥其间，同时要着五花八门的新花样。各式各样文化的大杂烩式的摇滚乐，各种音乐，印度的计算机。相信我吧，当音乐的节奏改变，全城的墙壁都会动摇。这与群众集会相比是另一回事，这来自神圣的力量，我想将它带到巴黎来。”^①

1969年，社会学家埃特加·莫兰访问加利福尼亚。他在那里研究了自由、友谊，在研究上有了突破，这些使他心旷神怡。当时，受这“与生俱来的幸福”的诱惑，对“人世间的自我毁灭的可怖力量”^②是清楚的。对社会的摒弃就是走向世界末日，在这种研究和对全面幸福的研究中，呈现的是死亡：“他们有理由诅咒这个只追求金钱的世界，这个空虚的资产阶级世界，但是在这个回敬以暴力的世界中，对这个世界也不感到作呕吗？尽情纵欲，享受和死亡，涅槃和失望，在这漫漫的大海边，在这个深沉和阴暗的运动中，在这种前所未有的等待中，都是交织在一起的。”^③

服用毒品有利于对这种狂热的研究。在1968年五月运动以后，法国的超脱社会体制者和极左派分子都热衷于这种研究，对于是否采用，这类人士态度不同，并引发了矛盾和分裂。对这种研究来说毒品是禁果分外甜，是到达“彼岸”的通途，多尔家族唱道：Break on through to the other side(打破常规，到达彼岸)。这种方式被认为能去掉面具，人们不再扮演角色，而生活在感觉的方式中，这是社会所排斥和制止的：“接触毒品贩子，感官快乐，嗅觉灵敏，快乐至上。”^④

蒂莫利·利里(Thimary Leary)是美国心理学家，美国的毒品LSD(唛角酸二乙酰胺)的鼓吹者，反文化界重要头面人物，他极力赞扬毒品在解放人性和

① Jean-François BIZOT, *Les Déclassés*, Le Sagittaire, Paris, 1976, p. 178 et 180.

② Edgar MORIN, *Journal de Californie*, Seuil, Paris, 1970, p. 128.

③ *Ibid.*, p. 88.

④ Timothy LEARY, *La Politique de l'extase*, Fayard, Paris, 1973; p. 179.

“扩展良心”的推动作用,这是与“清规戒律”和教育上所宣传的一套是对立的。应该“放任自流”,要“抛弃犹太教、基督教、马克思主义、清教徒、文学性、存在主义”思想,“放任自流”就是“现实处于因循守旧”时“让它走开”。^①

利里(T·Leary)要求人人有“翱翔的权利”,他根据人对毒品的体验状况将其分成等级,毒品是可以“分成等级的”:“抽大麻吧,得到的是感官的感觉”,“抽LSD”^②可能会使人达到极度兴奋,“产生幻觉”,这与细胞以及大脑变化有直接的紧密关系,同时与“神圣计划实验接触”^③有关。LSD是一种神秘的试验,先前是为智者、圣徒以及各种宗教的神秘人士准备的,如今人人都可以享有。

他所宣布的宗教宣扬“灵与肉的一致”,在全球重建“种族和谐”,协调人与大自然,组织部落和氏族……在这种新宗教里,摇滚集团成为“新的游吟诗人”,而披头士成为“四大福音史家”。吸毒会所和令人飘飘欲仙的音乐解救了精神,使灵魂平静下来。

在1968年五月运动以后,开始时,使用毒品只是一种逆反行为,以取得直接和快速的快感。而对那些一条道走到黑的极端分子,吸毒很快成为疯狂赛跑,“吸毒欲望愈来愈难以解除的和贪得无厌的”。^④到了强度点时,时间停顿了,自我解体了,堕落成为“黑洞,此时享受与最难受的刑罚一样难以分辨”,^⑤经常有吸毒者在路上死去。电影《摩尔》(1969年)将这种极度堕落表演得极富悲剧性和卑劣无耻。而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的“神魂颠倒”的音乐也是异曲同工地表现了这点。

“摆脱前程”

在生活的替代实践中,《一切!》(Tout!)似乎是先行者。“革命万岁”集团的极端自由主义的毛主义者和年轻的中学生聚集在此。该报创刊号出版于1970年9月,它打算体现“文化方面的剧变,出现一种上述文化的萌芽,这种文化是腐朽的,可悲的,颓废的”。它想成为“所有愤激的、受损害的和反叛者的表达场所”。^⑥

① *Ibid.*, p. 257.

② *Ibid.*, p. 120.

③ *Ibid.*, p. 51.

④ Giulia Sissa, *Le Plaisir et le Mal. Philosophie de la drogue*, Odile Jacob, Paris, 1997, p. 9.

⑤ *Ibid.*

⑥ *Tout!*, n° 1, 23 septembre 1970.

这家报纸对所有有争议的新形式都有兴趣。战斗精神不应该与快乐和性的解放分开。它给妇女解放运动的女权主义、同性恋者和集体社团发言权。……人们甚至找到题为《马克思的反农村、反手工艺、反农民、反农业的体系》的文章，而当今的农业是从属于市场规律的。人们幻想与这些规律完全决裂的经济：“没有购买，没有销售，只有赠送和交换。”结论是：“应该开始考虑实行乌托邦，尔后实行乌托邦。只有成功是浪漫的。”^①

但是，就像他们自称的那样——“生活疯人派”，他们感兴趣的是组成集体社团的生活，不管怎样，他们还是想当革命者，他们并非不屑于暴力，即使是防卫性的。他们所创立的青年解放阵线(FLJ)的首字母缩略词，在设计中出现了一把电吉他，用拿着花的拳头作为结尾，但是这拳头还握有枪。

矛盾很快地显现在新一代持生态主义观点的人们中，如富尼耶文章中所表现的，他是个极端自由派人物，但也是主张非暴力人物，而青年人围着报纸《一切！》转。1971年7月，这伙年轻人参加了反对比热核电站示威游行。但是青年解放阵线成员丝毫不关心对当地居民会产生的效果或因而产生的事故。富尼耶和卡瓦纳没有估计到：“人们到这里是表示这是一件应该理解的神圣事件，这是应该知晓的事，不是闹着玩的事，不能瞎扯乱说；也不是那些动不动就激动，不管什么时候都反对的人胡作非为之地。”^②青年解放运动的年轻人把卡瓦纳当成“无政府一和平主义者”并咒骂他：“卡瓦纳，按照你的逻辑，不久我们就得额外多干几小时的活，这一切的代价是喝西北风。”^③至于富尼耶，他被当做“笨蛋”；“富尼耶是个疯狂奔跑的人，烧木柴来照明。”^④

对这些“疯人派”来说，问题在于不仅只是谈他们的梦想、愿望和人际关系，而是要实行它，不再等待，“生活的愿望”、“享受的愿望”不能仅局限于夏季的几个星期的休假日，而是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都能做到。生活中的不同计划都有其范例。要找到一个场所，能“创造，互相友爱，自我保护，建立有别于以金钱和武力为基础的关系”。^⑤为了创建一些新的机构，像托儿所，学校，避孕中心，寻欢作乐的场所，等等，占用一些空房子和建筑以供青年集会和寻欢作乐。

这些宏伟计划的根据也不是微不足道的，青年解放阵线的宣言中写道：“资产阶级，你们的文明将慢慢消亡！而我们的文明只是刚刚露出了头！……我们

① 《Cultivez votre jardin》，*Tout!*，n° 16，29 juillet 1971.

② CAVANNA, *Charlie-Hebdo*，n° 35，cité dans *Tout?!*，*ibid.*

③ Un excité du FLJ，《On n'oubliera pas que》，*Tout!*，*ibid.*

④ 《Fournier t'es un con!》，*ibid.*

⑤ 《Créons des lieux de vie dans cette société de mort》，*ibid.*

要自觉解脱受束缚的、受践踏的、受压制的欲望！让我们放声大笑！给我们，给我们大家以实现我们梦想、乌托邦的手段……如果这种正在崩溃的文明本身就包含死亡和烦恼，那就该摧毁它，并引入一种有爱情和欢快的文明。”^①

新生活的萌芽应该能够催生新的人际关系，从现在起也可能消除“所有的责任和义务”，即“这些虚伪的关系”。^② 让受束缚的社会结构滚蛋吧，靠以货易货和交易生活的人、靠削弱别人生活^③的人是为数颇多的。“新的意识应该从这些实践中产生”，“天才的思想对这类体制表示欢迎，并排斥旧世界，以永远地建立温和的权力。”^④

新人可能在一代或两代人中间产生。“野蛮人孕育野蛮人……但人们希望在20年以后，我们的子孙将成为新的男人和女人，他们聪明、不顺从，他们是好胜的，心中怀着全人类的命运。在这种周而复始的过程中，人们将世界改造成一个奉献给前人的宏大的成员间如兄弟姐妹般的共同集体。”^⑤

“自由安排身躯”

聚集在《一切！》报的运动成员是性解放潮流的宣传员，也是革命运动所怀疑的出格运动的宣传员：“鸡奸者、同性恋者、妇女们、在押犯、堕胎者、不适应社会者、疯子……”^⑥《一切！》报反对一切禁条及当时的真正的道德秩序，对具有正统思想的人进行挑衅和骚扰，其中包括不愿意听到性欲二字的“纯而又纯铁杆”革命派。

1971年4月，该报的头条新闻是：“厌烦啦！自由安排我们的身躯”，背景是露屁股的照片。报纸反对作为“思想屈从条件”的“躯体交接”，要求“自由并负责地堕胎和避孕”，要求给予“同性恋和多种性欲权利”，给予“未成年人性自由与被满足的权利”。^⑦

关于同性恋，革命行动阵线的报道有4页，《致自信正常者书》中，该阵线反

① 《Bourgeois, votre civilisation n'en finit pas de crever?! La nôtre ne fait qu'émerger》，*Tout!*, n° 13, 17 mai 1971.

② 《L'impasse aux roses, c'est là que j'habite》，*ibid.*

③ *Ibid.*

④ *Ibid.*

⑤ 《Créons des lieux de vie dans cette société de mort》，*loc. cit.*

⑥ *Tout!*, n° 12, 23 avril 1971.

⑦ *Ibid.*

对对同性恋镇压和歧视,称“你们在歧视我们欲望的同时,得为对我们无耻的残害负责……我们不是反对‘正常派’而是反对‘正常的’社会”,^①革命派和他们的雄壮的工人形象并非不可省略的:“你们知道吗,你们是相信工厂的育人的品德,这就是被他的车间伙伴们当做鸡奸的那种事吗?”^②

同性恋革命行动阵线在揭露他们所承受的压制之外,还阐释了有关正常这个概念的思想:“所谓的正常就等于是压迫我们的东西。一切正常的东西都使我们反感,哪怕是革命的。”^③它把情况颠倒了:异性恋被认为是压抑的标志,不正视自己被掩埋的欲望,同时是体制上占统治地位的关系的组成部分,犯罪感是不必要的:“异性恋在客观上参与了压制同性恋。这指的是它同意残害或搅乱自己的性欲方面。(这并不是本意,但这是使我们成为单性恋的首要社会禁忌。)”^④

同性恋对其本身来说具有颠覆性和革命性的好处。它对生殖崇拜,对体制、家庭、一夫一妻制的家长制提出质疑,也对“带有权威、权力、攻击性的男子行为,以及产生于践踏同性恋的歌斯底里”提出质问。“鸡奸牵涉到资产阶级社会的最坚固的禁忌,即对粪便和肛殖的禁忌。”^⑤

给同性恋以发言权的这期《一切!》被扣,有消息说是因“伤风败俗”。另一期重犯错误,责怪“对家庭的讹诈”,“反对爱情对自由的讹诈”。图尔市众议员兼市长让·鲁瓦耶赞扬捍卫家庭,《一切!》报反驳:“家庭是束缚我们欲望的首要障碍。这种障碍深深地禁锢我们,它利用的是我们最基本的欲望,我们爱的欲望。”^⑥该报肯定地说:家庭是“一种污染”,母亲节是“淫秽的”……

《一切!》继续“伤风败俗”,充当一切新的争议的发言人,直至编辑部决定让这些运动自动发展。《一切!》在1971年7月停刊。

反文化的不稳定效果

《一切!》消失了!它给月刊《当代》留出了自由的地盘,《当代》很快成为地

① 《Adresse à ceux qui se croient normaux》, *ibid.*

② *Ibid.*

③ Guy,《Pour une conception homosexuelle du monde》, in FHAR, *Rapport contre la normalité*, Champ libre, Paris, 1971, p. 74.

④ M.,《Quelques réflexions sur le lesbianisme comme position révolutionnaire》, *ibid.*, p. 84.

⑤ 《Les pédés et la révolution》, *Tout!*, n° 12, 23 avril 1971.

⑥ 《La famille, c'est porno》, *Tout!*, n° 14, juin 1971.

下文化的领军刊物。最初,《当代》是有关自由爵士音乐和现代艺术的刊物。该刊创办于1968年秋,很快因亏损而倒闭。1970年,让-弗朗索瓦·比佐从美国回来,与迈克尔-安托万、比尔尼耶、帕特里克·朗博将它复刊。《当代》普及反文化,鼓吹连环画,性解放,集体生活,对毒品提倡印度道路,还做花样百出的免费小广告。1971年1月,创办了SCUM(Society for cutting up men 男人去势俱乐部),这是美国女权主义者瓦来里·桑纳尔斯(Valerie Sonals)创立的。报纸打着“自由、正义、平等、博爱、幸福、快乐、个人自由合法化的旗帜,Id就是吸食印度大麻无罪不受罚,同时还有一个雄心勃勃的改革纲领,如果可能,普及自主管理,简而言之,对某些人是无政府主义,对另外一些人是社会主义,而对大家来说是最广泛的民主。总之,创造性是受鼓励的,是街头巷尾议论的题目。”^①报纸没有任何支援力量,被很多人认为不入流的刊物,每期报纸销量约6万份。^②

1973年,《当代》接连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它致力于表达对天然产品和乡村生活新的迷恋。这就招致托派报纸《红色》尖刻的反驳:“在32期《当代》中,满篇都是寡廉鲜耻的复古主义。按马克思主义观点……就像是对发源于封建主义的、理想主义的、因循守旧的狭隘观点,以及保守主义的基本‘批评’,这从来不属于19世纪无产阶级社会。这种令人惊叹的‘农民文化’,在农民的社会生活中也不是残酷的剥削关系的反面……转向反面的历史精神弥漫着第32期《当代》,当然,人们可以到阿登或罗泽尔的利昂海岸去度假。得好好地生活……人们可以在那里悠然享受,但是在破坏现存社会秩序方面,这都是无济于事的。”^③这类警告是无效的,无助于阻止极端自由派分子和其他干将去“高兴地”干他们的事。《当代》在1975年停刊,在80年代和90年代还有其他灾难,但是无助于反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政治生态学的发展

在70年代,布里斯·拉隆德成为生态运动的形象代言人,这种经历对1968年五月运动部分成员发展是有典型意义的。布里斯·拉隆德出身于大学生左翼,确切地说是建立大学生行动运动的巴黎大学文科法国学生联合会。大学生行动运动在3月22日运动用它的挑衅性的诙谐摆脱了极左集团。

① ACTUEL, *Guide de la France des luttes*, Stock, Paris, 1974, p. 338.

② Cf. François-Marie SAMUELSON, *Il était une fois Libé...*, *op. cit.*, p. 81.

③ Michel LENOIR, «La roue de l'histoire à l'envers», *Rouge*, n° 211, 27 juin 1973.

布里斯·拉隆德是法国统一社会党成员,用他的话说,是“害怕极左派”的,极左派“利用某种思想和行动方式无休止地推动冲突,实际上是挑衅、暴力和绝望”^①。布里斯·拉隆德将其确立为自己的对立面:如果他要保持1968年五月运动的面貌,他也希望是非暴力的。

他曾在几个企业工作,发现有血有肉的工人并不符合无产阶级的理想形象。事实上,他对反文化、妇女运动和环境问题很感兴趣。在革命极左派中,他扮演的是木偶的角色,他说:“作为个人,我很喜欢自行车,我并不喜欢汽车充斥着城市的景况。当然,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我宁可缄口不言。但我对我的区要发表意见,我要反对左岸快车道。除了统一社会党以外,任何政治组织都不会考虑这类问题:我参加了这个党,但是我相信它做了过多的‘政治秀’,这是我的看法。”^②

1970年,布里斯·拉隆德“由于感到无所作为而心灰意懒”,在一次地球之友协会组织的反对建筑巴黎左岸高速路的示威游行中,他碰到协会的人,修高速路是乔治·蓬皮杜决定的,他希望“适应汽车城市”。就如同他已找到长期以来想找的方法。

生态保护者的战斗精神和风格是与极左组织不同的:他们的成员来自不同方面,生性幽默,比较愉快和轻松……比之极左派的工运中心主义和他们的犯罪感逻辑,生态学对他就像是真正的解放:“我可以抛弃我曾尝试使用过的生硬语言,这种语言从没有真正成功过,这样做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一切,找到更为具体的事,至少对我是如此。因为我有过在物质上不操心的青年时代,这是我心甘情愿认可的。每个人都生活在真实的生活里。”^③这样,布里斯·拉隆德就扮演先驱者的角色。

起初,1968年五月运动以后产生的生态运动是一个集结着非暴力和和平主义极端自由派潮流、生态农业和温和药物的信徒,自然和环境捍卫者、使用者和消费者协会等等的“大杂烩”。……然而,新生的政治生态学将摆脱普通的使用者和消费者协会以及生活环境。很多协会并非出自五月运动,它们进行反对生活环境恶化的认真的行动,提出一些确切的要求和与此针锋相对的计划。它们要求在确定的点上行之有效,并不要求在社会规划上因此纳入他们的行动。

① Brice LALONDE, *Pourquoi les écologistes font-ils de la politique?*, Entretiens de Jean-Paul RIBES avec Brice LALONDE, Serge MOSCOVICI, René DUMONT, Seuil, Paris, 1978, p. 30.

② *Ibid.*, p. 23-24.

③ Brice LALONDE, *Sur la vague verte*, Robert Laffont, Paris, 1981, p. 145.

至于70年代初的最初反对核电站的动员,人们看到,它只牵涉到该运动成员中的少数人。1972年,诸如泰奥多尔·莫诺、让·罗斯坦等科学界名人,他们和巴黎反核能委员会一起揭露癌症和核能的关系。1972年6月,委员会的一些成员聚集在环境部沙龙抗议法国在太平洋进行核试验。1972年末,一些协会发动运动以推迟核试验。保护自然协会和地方组织增加对核能的通报会议。1973年,这些组织与绿色和平运动组织联合,举行了反对法国在太平洋原子弹试验的运动。6月,勒·弗里号船开赴试验地区。船上有几个反对原子弹试验的人在检查,其中有德·拉·巴拉尔迪埃将军和布里斯·拉隆德。

新生的政治生态学内容是多方面的,它分成几个流派,经常有论战和冲突。它摆脱了“环境论者”和压力集团的观点——它的斗争是对社会的全面批评,实际上是属于文化方面的批评。

1971年3月,巴黎组成了地球之友协会,它是由戴维·布劳尔这位有影响的美国保护自然协会会员创立的地球之友(Friends of Earth)的法国分会。这个运动的宗旨:“多样化,建设性,非暴力和公开”,每个组织有自己自由的方针。法国的创建者是阿兰·埃尔韦。在地球之友协会的号召下,几千名群众在巴黎骑自行车游行,反对给予汽车以优先权。地球之友协会在保持自己的特殊性前提下,非常注意在五月运动以后发展起来的其他运动:妇女运动组织,地方主义组织,消费者协会……布里斯·拉隆德是地球之友协会最有名的和有争议的发言人。

1972年6月,《新观察报》出了一期生态方面的专刊。该报在取得了一些成就后,决定出版月刊《野人》(Le Sauvage),这是完全为这个专题奉献的出版物。地球之友的创建者阿兰·埃尔韦是该刊总编辑。

最铁杆的自由派生态主义者聚集在《开口报》(La Gueule ouverte)周围,它“宣布世界末日”:“灾难比你们想像的更为接近,只有通过比过去大百科全书的编辑们更为彻底的思维习惯才得以避免。这就要靠劳动。”^①富尼耶离开《哈拉-基利报》后,于1972年创刊了此报。他认为,生态学是与全面混乱观点密切相关的,并要与各种类别的破坏形式作斗争。

也是在1972年,一个小新闻社修复生态社(APRE)成立:该组织发行的周报发布各种理论与实践的信息,使人了解现存的组织和网络。修复生态社的成员又重提《开口报》发出的号召:“生态一词,当然有更广泛的意义,这并不只是

^① FOURNIER, éditorial, *La Gueule ouverte*, n° 1, cité par Claude-Marie VADROT, *L'Écologie, histoire d'une subversion*, Syros, Paris, 1978, p. 30.

与我们相关的环境问题,这是一些特殊的革命的范围,总之是全面的、根本的、基本的、绝对需要解决的革命的问题。”^①

修复生态社希望满足在阿尔萨斯、罗纳-阿尔卑斯地区、北方省等地方特别发展地方组织和协会的信息需求。40余个协会创立于1974年,在生态运动期间和巴黎地球之友协会一起支持勒内·杜蒙竞选当年协会主席。这个运动捍卫基本生态学,肯定在文明危机中,这是惟一的替代办法。总之与全国性的形式相比,地方团体极希望保持其独立性。

在生态学范围内,对权力、对等级、对组织的带有自由化的猜疑……是特别强烈的,并引起内部的众多冲突。在70年代初,对政治生态学来说,局势并未成熟(见第23章),但是这些题目在极左派中并无影响,这些人已开始怀疑革命……

人们将看到(见第19章),由于女权主义的泛滥,此类运动也并不是无济于事的。为了了解其起源,首先对威海姆·莱茨作品进行审视也并非没有益处,他是奥地利医生和精神分析家(1897—1957),在五月运动以后,他的思想有很大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应赋予其先驱者地位。

^① Cité par Claude-Marie VADROT, *ibid.*, p. 87.

十八、威海姆·莱茨,先驱者

对极端自由派和革命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来说,威海姆·莱茨在五月事件以前就是一个参考样板,在五月运动后几年,在这些潮流之外,也颇有群众。他的作品被众多的群众所熟悉,《信徒》(Partisan)杂志为此发表了一些文章。^①

威海姆·莱茨企图将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结合起来,他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攀升,强调反对压制性欲的重要性。他是弗洛伊德的信徒,但很快地摆脱了这个流派。从维也纳到柏林,他是一位战士,站在共产党一边。他创办了性卫生诊所,为堕胎权和避孕权而斗争,为发展社区住宅而斗争……

新列宁主义派和极端自由派这两个主要潮流都来自1968年五月运动,他们都聚集在莱茨的作品周围,比尊崇美国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 1898—1979)更甚。马尔库塞是在1968年五月运动后开始在法国出名。如果说马尔库塞和莱茨是在社会施压的性压制批评中走在一起的话,他们的前景仍然是不同的。马尔库塞的分析在于揭露发达的工业社会,赋予学生斗争新的历史作用。他首先是不同政见学生的预言家,以美国模式为例,不以阶级斗争为参数来表现事物。

莱茨认为,性解放的斗争是明确地纳入反资本主义的斗争和争取共产主义社会前景斗争中的。莱茨直接面对法西斯主义,强调群众参与的心理因素的重要性。反动势力和法西斯势力要转移被他们践踏的冲动力。德国共产党在反纳粹主义斗争中的失败正是由于在这个领域里变得无能。不幸的是,马克思和

^① 《Sexualité et répression》, *Partisans*, juillet-octobre 1972, n° 66-67.

列宁没有顾及性问题及其在重大社会问题的作用。从总体来说,这是需要讨论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难以界定的伦理问题。

莱茨后来同时被共产党和心理分析圈子里的人所抛弃。他逃离纳粹德国,旅居丹麦,后来到了柏林,并于1939年侨居美国,在那里创办了性高潮能量研究所(Orgone),他认为这种能量是宇宙的优先能量,应予以抽出和衡量,他设计和出售“性能存储器”,这种仪器被认为是可以治疗癌症,也可治疗其他精神疾病。美国政府警告他,要他停止试验,莱茨拒绝了。他几次被判刑,最终于1957年11月在监狱中死去。

莱茨强调性欲在社会中的作用,重新提出专制的家庭问题,他提出性解放的问题,这对青年人是特别敏感的问题……进一步来说,这既是一个难以理解的问题,又是斯大林主义和资本主义双重的受害者。在60年代末,众多的因素使它引人注目,使它比其他事物更早出现,并使它为人所知。

莱茨的理论为法西斯主义的新列宁主义做出解释,提供心理的补充物,并同时留下革命的展望。但是,它尽管包含1968年运动参加者众多关心的事和问题,也不是总是明确地提出。和莱茨一样,家庭和家長也提出问题,号召自然的性欲解放成为革命的主题,而参加运动的成员的形象接近教育家和治疗学家的形象。

革命的性政策

尽管莱茨看起来是个极端自由派,但他仍然是治疗性的和富有战斗精神的。对道德和专制家庭的批评目的是解放人们,特别是那些性压抑的妇女和青年。这种压抑对革命事业极为有害,它不仅是反动思想的土壤,同时,用于抑制性欲的能量占据头脑是有损工作能力和履行战士义务的。莱茨针对青年人撰文写道:“我们只知道惟一的道德原则,它可以这样表达:为了完成重大任务,从资本主义的各种奴役中解放出来,我们需要你的力量,这也是我们惟一的道德原则。因此尽可能好地从资产阶级道德中解放出来,尽可能好地解决性欲问题。”^①卫生工作者的工作范围也包括在革命斗争中——“完全和健康的性欲”,生育“体魄健全和坚定的”战士。这也是群众掌握自己的事情的条件:“一个非政治的人是陷于性冲突之中的人。如果把性撇在一边,想让他承担社会职责,那不仅是徒劳的,而且必然会把他推向反动政治势力一边,反动政治势力正巧

^① Wilhelm REICH, *Le Combat sexuel de la jeunesse*, Éditions Git-le-cœur, Paris, 1972, p. 40-41.

妙地运用性饥渴。稍加盘算就能选择相反的道路,要从社会角度解决性生活问题。”^①

莱茨认为,性压抑是资本主义压迫的不可分部分。社会阻止性欲的自然发挥,尔后引起压抑、忧伤和神经官能症。这种抑制浸透有道德、宗教和教育问题……社会要为性饥渴和心理烦恼负直接责任:《性问题》(Sexpal)的纲领中说:“在劳动群众中,神经官能症和性病是在渴望健康的性生活和资产阶级道德维护的压迫的冲突中产生的。神经官能症的产生原因并不是资产阶级性状况的偶发因素,而是建立在利益攸关的家庭生活和夫妻关系的经济的必然结果。非资产阶级群众对这种生活是不得已而为之的。”^②

家庭是产生性压抑和亲属神经性影响的中心枢纽。家庭使妇女的性欲降低到生殖功能,抑制了女子的自然性欲。这种抑制不仅产生了受践踏的个人,而且还造就一些顺从的人,惟家长是从的人。按照莱茨的说法,压制性欲和反动行径是相辅相成的。压制性冲动产生一些既刻板又顺从的人,这伙人为反动的和法西斯政党提供队伍。服从于家长命令的专制家庭就是其熔炉。学校也是其“制造聪明和听话人物的资产阶级秩序的场所”。^③ 它也是“反动的中央细胞”^④、“保守和反动的人物的摇篮”^⑤、“国家权力最珍贵的工具”^⑥……人们将来会明白,在这种条件下,人们希望将它摧毁。反对专制家庭的斗争完全包括在政治斗争中。

但是,正好与那些诽谤莱茨的人相反,莱茨的性解放并不是享乐的辩护词:“不言而喻,我们拒绝资产阶级的肉欲,没有友情和温柔的性行为,这是不考虑人和地点的只是用于泄欲的行为。这只不过是资产阶级道德,是颠倒了标志。”^⑦

莱茨发挥了后来成为后 68 极左派主要的论点:像孩子般的原初状态自然是好的,他们之所以不幸,那是我们的文明和我们的社会将他们变坏了。爱的幸福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然而社会使它不能充分发挥。人们在卢梭的思想中

① Wilhelm REICH, *La Psychologie de masse du fascisme*, Petite bibliothèque Payot, Paris, 1972, p. 184-185.

② 《Histoire du mouvement Sexpol en Allemagne》, *Partisans*, n° 66-67, juillet-octobre 1972.

③ Wilhelm REICH, *La Psychologie de masse du fascisme*, *op. cit.*, p. 69.

④ *Ibid.*, p. 68.

⑤ *Ibid.*

⑥ *Ibid.*, p. 68.

⑦ Wilhelm REICH, *Le Combat sexuel de la jeunesse*, *op. cit.*, p. 59.

找到“好的野蛮人”的思想,引进到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构建的“原始共产主义”阶段中去。在“土著民族”中,性活动是很健康和井然有序的,“在男女之间,没有性罪恶、性迷误、性暴力。强奸是不可设想的,因为没有必要”。^①与之对应的是,西方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已深深地堕落了,并在全世界散布他们的灾祸:“仅仅是通过大资本家和教会的强盗们的入侵,他们带来了‘文化’,同时还有剥削、酗酒和梅毒,就像在我们国家一样,在他们的国家里也开始了贫困。”^②

人类离开大自然,就再也看不见幸福的道路。今天,人们在莱茨理论中认识到野兽是人类的朋友和很多生态学家非常普通的比较:“与人类相比,野兽是不同的,它们不是机器人,不是性虐待狂,它们的社会(在种族内部)比起人类来说,更为平和。”^③“人类靠着他的文化或文明,想忘掉野兽也是自然界生灵,而这种遗忘带来了极大的混乱。”“远离野兽,远离性欲!这是人类思想意识组织的座右铭。”^④总之,这是不是“按照上帝的模样创造出来的人类的圣经传说”,^⑤它要为性侵犯和性饥渴负责吗?

一个在生殖方面得到满足的人是心态平衡和实在的,他的品质与性满足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一个人只有在没有得到满足时才有“性危险”。从障碍和资产阶级道德中解放出来后,性欲就是一种自然功能,它自身会进行调节。“完善和健康”的性欲是排除性倒错的,它包含温柔和友好的感情。在人类的观念中,侵犯和仇恨只是由于抑制和抑制产生的践踏造成的衍生因素。从心理分析观点看,“超越自我”不过是由外部引起的抑制的标志和载体。这一切好像是不洁的社会外部和冲动的原动力的冲突,这类要求,无论是对个人或对全体人群,都要求能称心如意地得到满足。

如果社会由于道德和教育的关系阻止这种满足,结论当然是明摆着的:去除障碍,达到个人满意,人人称心如意,对大家进行性教育,防止发展病态的性冲动。

政治上的觉醒和性的觉醒属于同一种斗争。解放了的性欲将变成革命政治的基础和决定因素,这样,性解放就是社会的革命改造的条件:“如果人们不在性方面进行调整,任何解放纲领都不可能成功。”^⑥政治也应该有性的内容,如

① *Ibid.*, p. 46.

② *Ibid.*, p. 46.

③ Wilhelm REICH, *La Psychologie de masse du fascisme*, *op. cit.*, p. 285.

④ *Ibid.*, p. 289.

⑤ *Ibid.*, p. 292.

⑥ Wilhelm REICH, *La Psychologie de masse du fascisme*, *op. cit.*, p. 220.

果人们想使事业获得成功,活动分子也应该抓住这个问题。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就应该战胜隐藏在自己队伍里的道德说教。变“群众的性困境”为社会行动是可能的,这就“像动员最迫切的利益是可能的”,^①面对着性欲,革命者要将群众从各种践踏和恐惧中解放出来,革命行动要强调治疗和教育,这是一种不可少的条件,这样,群众就能在政治上得到解放。

法西斯主义和性抑制

莱茨在解释希特勒在德国取得胜利的原因时,抛弃了人们通常提出的说法:他的人格,在资本主义危机时期希特勒意识形态的作用,还有蒙骗群众等。这些解释都是不够的,而马克思主义也不能回答这个问题:群众跟着一个其政策是与其利益背道而驰的政党及其领袖走,这是怎么回事?

法西斯主义动用了心理动力和无意识的机制。这一来人们就明白了,在人类社会组织和全世界各民族中,这种主义都是存在的。此外,“任何一个活人,在这种有特色的结构中,都是有他的感觉和法西斯思想的成分。”^②

这种批评是泾渭分明的:革命分子在估计法西斯主义时的错误在于认为法西斯主义以武力反对社会愿望。当纳粹主义正好出现时,它的法西斯意识是植根于心理结构中,也是植根于特殊的性和谐中。

某人信奉法西斯主义也就是不求助于某种纲领,这个纲领是“抛弃其元首和他的意识形态,这就会使紧张的内心世界得到暂时的放松,因为这一来就可以将冲突转向另一方面并予以解决”。^③ 法西斯主义求助于神秘感情,并利用人类非理性方面使之能公开表达,灌输到群众性的表达中,树立对元首和国家的崇拜……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紧密相连的,都植根于人类非理性部分:“种族仇恨产生了法西斯主义,也是其政治表现形式。”^④两者都是神秘主义的极端形式,以病态方式体现“性无能”。如果德国国家社会党的卐字标记蛊惑了许多群众,是否应该从中找出群众的理智,事实上这种理智对那些无意识的人们是有吸引力的,它不是象征性地代表两种交错的人物吗?

法西斯主义在骨子里设想这种性抑制,其诱惑力随着与“被剥夺性的、性未

① *Ibid.*, p. 182.

② *Ibid.*, p. 11.

③ *Ibid.*, p. 184.

④ *Ibid.*, p. 12.

得到满足的人交往越多就越强烈”。^① 它按照它的利益转移未充分发挥的性欲、未满足的高潮。法西斯主义在性抑郁的男人或反动的女人中是有基础的，并给他们以托词：“要了解一个在性方面绝然被剥夺而从来也没有想到过社会责任的小资产阶级妇女，要了解智力不发达、性方面不开化的女售货员怎么会堕入法西斯主义沸沸扬扬的色情中去，这并不需要心理学家去作分析，法西斯主义给她们某种满足，尽管是歪曲了的。”^②

法西斯主义依仗的是性虐待和性倒错。它通过“同志精神”和其他生殖能力的力量，转移“从儿童时期就具有的自然性欲望，两性之间要求得到满足”，“以扭曲的同性恋和性虐待”^③来取代两性。

“平庸和反动的”小资产阶级是“头脑简单”的，他们为数众多。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全部心理状态，是以依靠已建立的权力当局为特征的。官员等同于国家当局。企业里的雇员是企业雇佣的……小资产阶级“眼睛是经常朝上看的”。^④而在家庭中，小资产阶级将这种对当局的隶属观念传输给孩子们。

法西斯主义的心理学的“受奴役的小资产阶级”的心理学，这种心理学是“好老爹”和“中产阶级法国人”的混合体，这种人是1968年五月运动人物所憎恨的：“这是全世界军队的军士长提供的最明显的例子，这是这种群众心理的产物。”^⑤

面对“群众对自由的无能为力”

莱茨在他的《法西斯主义的群众心理学》(1933年)一书中直接面对每个参加1968年运动成员难免提出的问题，一旦事件落下帷幕：“人民群众是否能够自己管理社会而不诉诸国家元首或政客们提出的口号。”^⑥莱茨认为，面对国家，反动的态度会特别明确，斯大林的苏联也不例外。

莱茨引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特别强调这种思想，处在革命后的过渡阶段的无产阶级国家，就其本意来说，人民的大多数逐步掌握国家职能。它不像其他国家一样，能够自行消亡，过渡时期的职能正是允许社会的自治政府

① *Ibid.*, p. 106.

② *Ibid.*, p. 184.

③ *Ibid.*, p. 176.

④ *Ibid.*, p. 63.

⑤ *Ibid.*, p. 163.

⑥ *Ibid.*, p. 274.

能逐步组成并逐步取消置于社会之上的组织。

在苏联，情况并非如此。苏联社会发展，标志着国家机器的发展，这与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考虑的正好相反，国家机器不是开始衰亡，而是不断地加强，并屹立在压迫群众的社会之上。我们可以拿苏联的历次党代表大会文件与1935年的宣言比较，再对照《国家与革命》中的构思，莱茨指出斯大林讲话中的矛盾：“如果剥削阶级确实被消灭，群众的社会主义教育获得成功，专政的‘不减弱’就完全没有意义。如果所有的条件都具备，专政为什么要实行‘不减弱’的职能呢？”^①

莱茨写道，事实上，这一回专政是在持续，针对的是人民，苏联国家给予群众的是对自由的幻想，这与国家社会党做的是一样的。苏联可以发展福利、卫生、人才培训……但是，“希特勒也干了同样的事”^②。社会自治政府的基本目标并未实现。这种局势不能归因于将“群众的自治管理”作为最终目标的共产党目标，而是由于它的无知。在处理事务上，斯大林过去只有“应对的工具”^③，重要的是去掉幻想，吸取在苏联发生的事情的教训，充分考虑“人群的特殊结构”。

莱茨想当清醒的革命者，因此要考虑解放运动直到当时还拒绝承认的资料，这构成了当时的盲点，“自由的无能为力”——“在群众内部，各种发展中都有一种反动的、致命的、抑制性的力量，这种力量抵制成员争取自由的努力。在人群中，这种反动力量的表现形式是害怕承担责任，害怕自由。”^④资产阶级，各种性质的独裁，法西斯主义都在群众中有市场，因为这些货色符合“群众对社会不负责任的状况”^⑤。

铁一样的事实与陈旧的思想截然相反，其中也包括革命者的思想：问题不仅是改变经济状况以使这种情况消失。苏联的革命者也像其他地方的人一样会碰到这种障碍，而且自己并未意识到，因为他们正好缺少心理科学使之了解这一切。列宁本人也没有看到危险的到来，因为他正好不知道“对自由的无能为力”的深刻本质，或者是莱茨命名为“对自由的生物疗法恐怖症”^⑥。

在苏联，维持和加强专制的国家机器是“劳动群众在从事自己的事务，管理

① *Ibid.*, p. 225.

② *Ibid.*, p. 228.

③ *Ibid.*

④ *Ibid.*, p. 283.

⑤ *Ibid.*, p. 273.

⑥ *Ibid.*, p. 220.

和自行监督方面的无能的直接结果。”^①莱茨甚至写道：“群众本身要对他们的社会厄运负责，他们不能抛弃某些奇怪的精神病患者，他们自己要对自己的命运负责，他们自己要对世界上的一切负责。”^②

然而，局势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令人失望。事情可能更为简单，不像它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子，承认“群众对自由的无能为力”并不牵涉到历史和人类的任何悲观思想。莱茨承认“人类的结构是由自由愿望和害怕自由的对立面为标志的。”^③但是，这种对立只是在“群众麻木不仁”时才有意义，并被认为是“专制和机械的文明”的因素。

这种惧怕自由的心理是由外部因素反复影响人们的结果，也是几千年来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如果这种惧怕自由的心理是深深地镶嵌在群众的“性格结构”中，那就是一件长期造成的事情。事实上，群众从来也没有获得过或行使过自行管理社会的机会。群众世代代由于社会的和教育上的歪曲，已自然而然地麻木不仁，失去了向往自由的本性。^④

换句话说：这种惧怕自由的心理是专制国家组织对个人渗透的标志。这种心理不必到人的“本性”或生活状况中去找，更不必到表示人们结构区分的内心精神状态领域去找。如果这种心理和责任感是历史造成的，那“为了同样的理由，它也完全可以改变。”^⑤“这种心理是因历史上的社会情况而生，这种无能为力完全是可以治愈的。”^⑥

表现特质的结构是与国家的形式相联系的，治疗与政治要同时进行。在改变外部社会渗透的内容时，人们可以对人的性格结构起作用。这样就有可能消除惧怕自由心理并改造人，办法是在“性格结构”中，灌输民主思想。

莱茨解释说，依靠精神治疗，群众的自治政府就可以显得更为容易，一个真正的“可行的民主”应参与心理治疗并作为精神解放的武器促使人们和社会真正地进行自治。经过精神治疗培训的专家将能担任此项任务。反对性抑制的斗争是与为自由而斗争不可分的。在从过去性抑制和剥夺中解放性欲的教育中，革命者可以对此做出贡献。这样做，他们就是法西斯主义和它的影响。

① *Ibid.*, p. 241.

② *Ibid.*, p. 281.

③ *Ibid.*, p. 276.

④ *Ibid.*, p. 273.

⑤ *Ibid.*, p. 283.

⑥ *Ibid.*, p. 278.

在性问题上开明的先驱

先驱者不仅不能够融合于历史科学规律中,还应该认识人类性格结构的规律,并具有必要的方法和手段:“劳动群众能否、或用什么方法使之能够使高踞于社会之上的专制国家消失,自己承担起国家职能?换句话说,不就是有机地发展社会自治政府吗?”^①

迫在眉睫的并不是掌握政治权力,而在于群众掌握了莱茨和他的弟子的新真理而觉醒,莱茨弟子们的革命工作应当集中在紧迫的问题上。这是将群众摆脱非理性主义和摆脱由此而产生的独裁的方式。

对未来社会的看法中,道学家的和专制的社会领袖将被性解放的方法和社会“自治政府”所代替,这两种前景是紧密相连的,人们将子女托付给教育成人的良好教育者,从而“取代那些专制和压迫的国家”。^② 国家与群众的联系不再是压迫性的,而是教育性的,在这种条件下,变革可以不通过暴力进行。为了使变革能够进行,新型国家的代表应该经常有他们的作用是有限的这种思想,国家只能起教育作用,代表们也不需要让群众仍处在不开化状态,他们只是“劳动的人类共同体代表执行机关。”^③

革命者从此会意识到群众的不合理结构,这种任务是很重的,他们也想干到底。他们应该丢掉幻想,对别人和对自己都要有清醒的认识,对老百姓,要做好的教育者。革命者应该以此为己任:“相反,我们确信群众是需要我们的,即使他们达到合理的自我变化的阶段,他们也会召唤我们,对我们委以重任。那时候,我们是他们中间的一部分,而不是他们的领导,不是他们选出来的代表,那些‘高级的’保护者:人民群众会像在奥地利和德国那样,成群结队地到诊疗所或教育之家去听课或进行科学实验(只要我们还恪守本分),在这里他们可以找到这个根本问题的答案。”^④不必对他们发什么指示,而是要帮助他们获得自由。

在过渡到共产主义阶段后,国家的作用被设想为正在消失,但仍然是重要的:“在劳动群众中,不仅要使自由愿望开花,还要将自由的能力与自由愿望相

① *Ibid.*, p. 218.

② *Ibid.*, p. 246.

③ *Ibid.*, p. 246.

④ *Ibid.*, p. 281.

结合”，^①使之产生推动作用。为了做到这一点，国家和教育者应校正“医疗、社会和教育工具，并以有力和包罗万象的方式真正培养运用自由的能力”。^②

从事教育、治疗的成员具有一种合法地位，它将从从事这项工作的成员置于任何批评之外：这种自由是个人的，也是所有人的。它不求助于暴力或强制手段，只是通过说服进行。此外，他只是作为纯系过渡的助手进行干预，在一定期限内消亡，也就是到全面实行的日子。在此期间，改造群众的任务是很困难的：如何战胜以受奴役的群众的结构为标志的几千年历史，使这些群众能达到“人类生活的自治管理”？^③

从这种角度来说，莱茨不排除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一系列战争和灾难的作用，这样群众就可以在没有外力干预的情况下，最终意识到受奴役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群众自己就得对付过去的、存在于结构中的伤痕，这就需要帮助。莱茨和他的弟子应运而生，“如果人们需要你们，他们会召唤你们。”^④

总之，改造精神状态是一项治疗性和教育性的长期工作，在社会内部，应该从基层做起。在这个领域里，应该特别重视对儿童和成人的教育：“如果人们对儿童和成人的兴趣采取群体性行动，人们就可能有效武器来对付神秘的污染，对我们这种行动，政治应该是无能为力的……为了唤醒儿童对社会事务的兴趣，我们应该利用他们渴望知识的欲望，唤起他们对性的好奇心。儿童最终应该有这样的坚定的感情，政治是不可能给予的。这样，在全世界各国，人们将团结起来，并为他们清除反动势力影响，这是最重要的事，人们将他们紧紧地与革命解放运动联接在一起。”^⑤

妇女是要争取的另一个范畴，在给她们自由时要包括性的内容，因其母亲和家庭主妇的地位，她们要对性限制进行斗争。要把她们作为性的个体来保护，而不是作为生育者：“正式和公开承认妇女的性权利，这就会导致专制思想体系大厦的崩溃。”^⑥其中一个论据就是家庭将妇女降低到繁殖的角色。

任务是很广泛的，说服教育或治疗是任重道远的。运动的成员在反对错误思想或改变思想方面的工作永远没有止境。直到有一天，他们中间的很多人看出这类抵制并不是迟钝和放弃的迹象，但是可能是对人类生活条件缺乏明智的

① *Ibid.* , p. 246.

② *Ibid.* , p. 278.

③ *Ibid.* , p. 283.

④ *Ibid.* , p. 282.

⑤ *Ibid.* , p. 180-181.

⑥ *Ibid.* , p. 109.

某种常识的表现。教育学不再能用疯狂言词无限制掩饰培养新人的奢望。

“赶走老古董”

在1972年出版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宣言》中，人们找到了类似莱茨看法的预见：“教育问题是头等重要的问题，既然它是培养人们既要掌握自然，又要掌握自己的历史。”^①

在共产主义同盟所考虑的未来社会中，自治的教育中心将被建立，它将培训为小孩和成人的最大利益的“普及教育网”。儿童将根据“反抑制教育学”进行教育，这就可以“对成年人来说尽可能的独立和自治”。^②托儿所和幼儿园的发展“将使所有儿童受到最先进的社会教育，而不是被父母的偏见和无知所左右”，“要将妇女从几千年的奴役中解放出来”。^③

这样的教育才能“从所有的人们的头脑中赶走老古董”，“甚至日常生活的结构本身”也将改变。要摧毁资产阶级家庭，只要它是思想意识的丛生地和抑制的中心，这构成了重要的因素。“建立在共同生活愿望基础上不甚严峻的共同体将取而代之。”^④

然而，这与莱茨的构想有重大区别，当莱茨继续认为在未来社会中，劳动是协调快乐和理性的重要活动时，共产主义同盟宣称“社会活动的目的，并不是将劳动作为人类的理想，而是要使之消失，成为旧时代恶劣的回忆”。^⑤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新科技的发展已证实了这种思想：人类将最终致力于最高贵的事业，自由自在地献身于文化活动和休闲活动。

在这种田园式的社会中，任何形式的压迫都将消失，人们终于可以操心自己的事，但仍然有许多专家为人们的幸福教育人：“精神分析学家、医生、学者、教育学家，‘劳动者’首先将变成人的专家和该门知识专家。”^⑥劳动和国家的目的伴随着新型教育家和治疗学家的胜利，他没有别的目的，只是帮助每个人尽快能够成为自食其力的人和创造者。相关的自由文化活动可获得有关专家的支持。再等几年，这种前景就将在另一种模式内形成，这种模式是人们向往已

① *Ce que veut la Ligue communiste, op. cit., p. 52.*

② *Ibid., p. 52-53.*

③ *Ibid., p. 52.*

④ *Ibid., p. 53.*

⑤ *Ibid., p. 47.*

⑥ *Ibid., p. 55.*

久的共产主义社会。

运动成员在成为治疗学家和教育家以后，始终认为群众中的“中等人士”应该是自治的和为他们最大的利益负起责任吗？

即使莱茨所参考的资料并不清晰，他的富于反抗精神的纲领很大程度上是受70年代激进运动的影响，首先是产生于极端自由和“渴望”潮流中的女权主义潮流，同时这类倾向出现在革命组织中，其效果人们将会看到。

十九、女权运动的泛滥与极左派的爆裂

从1970年开始,1968年五月运动的整体乌托邦思想已开始分解为多种阵线。五月运动各种组成成分,直到如今联合为革命的象征性形象,这时也开始解体。不仅是政治极左派和文化极左派的矛盾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每个派别的内部,划分与区别也越来越多。从1970年到1973年,种种派别并不是存在于极左派内部,该派有几万年轻人,似乎有些削弱或衰败。而运动成员宁愿看到人数激增,这是运动丰富多彩的标志。极左派的爆裂仍没有开始,但是这种极左派的爆裂很少是来自“客观的”政治分歧,这类政治分歧是反对不同派别的言论,而这类派别与现实关系又很遥远,大大低估了极左派颠覆的意义:发展性解放的潮流和女权主义的泛滥。

妇女解放运动的出现和发展体现了这种发展趋向。最初,该组织的核心是些年轻人,大部分是女大学生,或是一些多少已与战斗精神决裂的人,这个组织既是70年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尖兵,也是摧毁有组织的极左派的因素。

开始,该组织就包含各种倾向,相互诽谤。它由3个组织组成:革命女权主义、精神分析和政治派,以及那些来源于所谓阶级斗争组织倾向的女成员,此外,还有许多非正式的地方组织。

这些内部矛盾作为原动力导致妇女解放组织的分裂,1974年,出现了一些单独的出版物,它或多或少与这几个组织有联系。就像新列宁主义运动,每种倾向都有一个分裂和破坏过程。在运动的组成(1970年)和统一阶段,不定期出版《着火了》(1971年至1973年出版5期),这一阶段发表的声明、文章、讨论和行动特别频繁。这些都组成了思想的共同财富,有助于进行思考和活动,使之

持久地保持着女战士特色并扩大到妇女解放运动组织之外。

在政治极左派发生危机和“性解放”的潮流获得胜利的时期产生的大杂烩组织建立起来了。但是，妇女解放运动不是这个潮流单纯和纯粹的延伸。它加速了政治极左派的分解，同时引进了“性潮流”的异端邪说。它延续了享乐的号召，1968年五月运动那种吃喝玩乐的论调，它发挥了两性不平等的中心思想，没有概括性解放的区别，更不用说革命，这类言论是难以缄默的，从内部颠覆极左派运动，这就是它的新贡献，它不仅加速了组织上的危机，也使1968年运动的搭档们产生危机。

确实，在这次危机中，对战斗精神和压迫妇女的尖刻言辞起了决定性作用，后来，妇女解放运动的一位成员伊丽莎白·萨尔瓦雷兹写道：“我们是有战略的，将已走入歧途的妇女政党清除。从清除极左派组织开始。首先是不怎么‘强硬的’毛主义者，最公开的VIR派。”^①事实上，人们看到这些组织很快解散了，而冲击波并未停止。这个冲击波蔓延到毛派组织以及托洛茨基派中最“强硬”分子，而在70年代后半叶，波及到左翼政党及工会。

“我们女人是历史的奴隶”

1970年5月，让-埃德恩·阿利耶创办的毛派倾向报纸发表了一篇文章：《为妇女解放而斗争》，这是真正反极左运动的煽动文章：“以我们的压迫作挡箭牌，去跟我们的革命同志斗争，这已使我们厌倦了。在我们组织内部，我们不愿浪费我们的精力去反对男性沙文主义。要求男人们允许我们起来反抗，哪怕那些人是革命者。这也该结束了！”^②

这篇文章的执笔者拒绝将妇女的斗争降低到“次要矛盾”，并用毛派的修辞方式写道：“作为受压迫者，我们有自己的主要战线。”妇女们像外来侨工一样有自己的“紧身衣”：像这些侨工一样，妇女们有性贫困和剥削……在几千年的压迫中，妇女不是并没有构成卓越的革命阶层吗？

几个月以后（1970年7—10月），《信徒，零年妇女解放》杂志又迈开了一步：“结束革命派不怀好意的罪恶勾当，不再当马克思和毛泽东的跟班。”^③

① Elisabeth SALVARES, 《Auto-itinéraire》, *Mai en héritage*, Syros, Paris, 1988, p. 135.

② Monique WITTIG, Gille WITTIG, Marcia ROTHENBURG, Margaret STEPHENSON, 《Combat Pour la liberation de la femme》, *L'Idiot international*, n° 6, mai 1970.

③ Quelques militantes, 《Présentations》, *Libération des femmes année zéro, Partisans*, n° 54-55, juillet-octobre 1970.

这一来，泾渭分明：“女人们，不管她们是资产阶级女性，或是工人的妻子或黑人之妻，都承受共同的和特有的压迫，即对妇女的压迫。妇女们为解放而斗争。有人说：‘首先我要知道，妇女解放运动是否在正确的位置上，这个问题到底该赞成还是该反对’，说这样话的人是假革命者。”

在刚诞生的妇女解放运动内部，如果妇女受压迫的特殊性是被共同认可的，那矛盾就显现在人们对这种特性给予的解释上。强调的这类或那类主题：阶级斗争，家务劳动，性或心理的压迫，已预示了区分和痛苦。但是在1970年，所有这一切主题都并列在一个区分不大的整体里，1971年就成为名为《着火了（月刊）》里，它指出这个运动已经与新列宁主义集团分道扬镳。

对男子战斗精神的批评

革命妇女总是被搁置在第二位，并注定要保证毛派和托洛茨基派斗士们的休息权和管理权问题，她们已感到厌倦：“革命者的牛排和资产者的牛排煮的时间是一样长的。”^①良好的战斗意识消失殆尽，革命的道貌岸然的面具剥掉了，复仇的时刻已到来。

女权主义者将革命的原则和成员们日常生活中的矛盾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日后，那些成员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和组织职能中都不断地改变着男人和女人的关系。革命将是彻底的或是不彻底的。那些打着革命旗号的人应该将革命进行到底。不要等政治生活和私人生活分离后再将它提出来讨论。

在革命运动内部，不要害怕有争议，不要害怕发展，“真正的混合心理剧……使每人都意识到相互的异化，不是逃避而是面对”^②：

“在谈到革命时，谁下厨？”

“在参加政治会议时，谁看孩子？”

“在起草或组织未来工作时，谁在打字？”

“在麦克风前时，谁在做记录？”

“谁不在集会的讲坛上？”

“谁在讲话和行动时收回倡议？”

① Cité par Hervé HAMON, Patrick ROTMAN, *Génération*, t. 2, *Les Années de poudre*, op. cit., p. 222.

② Anne et Jacqueline, *D'un groupe à l'autre*, *Partisans*, n 54-55, op. cit.

“是我们，永远是我们。”^①

一方面是神圣的任务，思想言论的任务或行动的任务（可能是暴力的），另一方面是服务性的保证革命的后勤工作。妇女是无法选择的，只能充当“活动分子先生们的听话的秘书或装扮成男人。”^②

对战斗精神的批评也并未停止。极左派并不光彩的行为和实践已有争议并人所尽知。在革命集团中，“个人问题”这个词往往看做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态度”，并由此而受到坚决打击，特别在那种纯而又纯的铁杆“毛派”那里。然而，或多或少利用女战士们的诱惑力也并不是令人尴尬的事，其目的是在工厂门口或在外籍工人家里建立联系。

对于这一点，女权主义者是不会接受的，她们走得更远——“革命女权主义嘲笑说，很难想像一个雷诺厂的工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会公然地听他的老婆支使，在老婆面前像狗一样，那就将被当成反革命或卑鄙小人。在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太太们，你们的问题没什么了不起，与无产阶级的问题没法相比。”^③这类论点再不谈论：“凭什么说受工人的压迫比受资本家的压迫更为正常呢？凭什么说受外籍工人的强暴比受法西斯分子的强暴更少羞辱？”^④

反对驱逐外籍工人斗争委员会的女成员毫不迟疑地讲述她被该委员会一名外籍工人强奸的情况并公开表示她的愤怒：“难道我们应该借口他是一个黑人而沉默吗？我们该为外来侨工的性饥渴而付出代价吗？或为拒绝阿尔及利亚人或黑人的贷款而觉得有犯罪感，立即同意去对付种族主义者吗？强奸就是强奸，我们拒绝与法西斯分子休战，我们也不与革命运动分子休战。”^⑤

性欲与主观意识

在新列宁主义小宗派集团内，个人问题是没有正式地位的。严格说来，排斥主观意识是由于那种将工人阶级和伟大革命者形象等同的态度。面对“工人

① Tract distribué à la faculté de Vincennes, cité dans Hervé HAMON, Patrick ROTMAN, *Génération*, t. 2, *op. cit.*, p. 223.

② J. K., 《Les militantes》, *Partisans*, n 54-55, *op. cit.*

③ Annie C., 《Les révolutionnaires, Thionville et nous》, *Les femmes s'entêtent, Les Temps modernes*, n° 333-334, avril-mai 1974.

④ *Ibid.*

⑤ Annie C., 《Les révolutionnaires, Thionville et nous》, *ibid.*

同志”的状况和斗争,这个派别的负责人会因心怀“小资产阶级”的犯罪感而感到内疚,这些东西都被打扮成(无产阶级)道德说教。

设想的工人阶级的道德观念是无法与性欲这个词和睦相处的。穿超短裙不雅观,因为“当人们干革命时,这种穿戴不严肃,好像干革命就是禁欲主义,冷酷无情和教条主义的同义词。”^①以前那些女成员曾这样证实过:“在某些极左组织中,成员的最好的品质是在某些时候要‘把睾丸长在屁股上’,这就把最英雄的成员的伟大品质表现得淋漓尽致,既雄壮又勇敢,‘既不怕苦又不怕死’。而女人们,这些可怜的家伙从定义上来讲,她们的阴部没有睾丸,只好永远穿长裤,永远将男战士在内的任何人当成‘好同志’,他们没有性欲,这样就不会有害于战斗事业。”^②

对毛派和托洛茨基派刚强和好战的言论,妇女们针锋相对,并使之哑口无言:“我们,我们这些妇女,对你们这一套已厌烦了……与那些横行霸道的人打交道,并不是为你们……你们知道,资产阶级有大鸡巴,很有劲,并且会将您去势……因为人们有一个对手,有一个大鸡巴,一切围着它转,但是人们会告诉您,当没有这个大鸡巴时,这就是另外一码事了。”^③妇女解放运动的妇女痛痛快快地挖苦新列宁主义所牵涉的一切,严肃精神,禁欲主义,骁勇的英雄主义,富于牺牲的道德……那些政治大话使那些脑子里有其他考虑的人心烦,首先是著名的无产阶级的忧虑。

在女权主义的眼中,还有另一种不能等闲视之的现象:一个公然被贬低的“我”字通过非常特殊的革命风格大摇大摆地回来了。“他们为了说明一个细节,可以谈上大半天。有时候人们思忖是否是头脑迟钝,或者他们滔滔不绝是为了阻止别人讲话。人们不得不指出在这种政策中会有很多心理因素。”^④面对这些现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言词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都有“伪装的”、“盲目自信”、“两面三刀”的姿态。有一位曾经的女战士在决定不再参加政治集团战斗后,常这样来回忆:“在他们的言词中,我就像入虚无境界。这是一种伪装。这不是真的,他们在说谎。”^⑤这可怕的批评已涉及到战斗的主观意识、革命欲望、或多或少带有博学的新列宁主义的合理成分。

① J. K., 《Les militantes...》, *Partisans*, n° 54-55, op. cit.

② *Ibid.*

③ Anonyme, 《Y a pas que ça!》, *L'Idiot liberte*, n° 1, décembre 1970.

④ 《Pourquoi je suis dans la lutte des femmes》, *Le Torchon brûle*, supplément à *L'Idiot liberte*, n° 1, décembre 1970.

⑤ *Ibid.*

由于受到这类震动,面对稀奇古怪出格的占统治地位的言辞,与存在主义危机不可分的真正的觉醒就产生了。在这个意义上,妇女解放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构成男女行为变革的必然的和预备性的过程。

出格的运动

妇女解放运动重新找到 1968 年五月大学生公社的调门,它是将享乐、幽默和战斗精神不加区分的。与“丈夫虐待狂”相反,人们不再怕承认:“女人万岁!不必再一本正经!”^①在言辞和行为中,这是十分具有挑衅意味的作风,妇女解放运动想揭示掩盖压迫妇女的心安理得与伪善,还要揭示妇女在各种领域里低下的地位。

激进主义是惟一能破坏千年压迫的手段。要“粉碎传统从属统治关系,还有使妇女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的诱骗和玩弄女性行为”。^②为了做到这一点,传统的办法应该废除。应该求助于“系统的思想意识斗争”、“不断的醒悟”、“骚扰”、“挑衅”……

“充当引信”,“打破压迫妇女的体制,提倡觉醒”^③,这就是前景。为了做到这点,妇女解放运动应充当典型,并扭转风气,揭示社会的难言之隐。

在两年之间(1970—1972年),妇女解放运动由于一系列的耸人听闻的活动在公众中出了名,在 1970 年,该组织十几位成员在凯旋门前献了一束鲜花,展开横幅:“比无名小卒更不为人知的是他的女人”,“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三个月以后,即 1970 年 11 月,妇女解放运动的几个成员涌向由《她》(Elle)杂志组织的妇女“三级会议”并发言,并抛出如下问题:

“当一个男人谈到女人时,他应该谈到的

——她的乳房和大腿,

——她的臀部和乳房,

——抑或仅仅是臀部?”^④

1971 年 4 月,《新观察》发表了 343 位妇女发表的宣言,妇女们自行堕胎引起巨大反响。妇女解放运动组织了示威游行,选择自由和免费堕胎及怀孕。私

① *Ibid.*

② 《Sortir de l'ombre》, brochure du cercle E. Dimitriev, mai 1972.

③ Annie DE PISAN, Anne TRISTAN, *Histoires du MLF*, Calmann-Lévy, Paris, 1977, p. 75.

④ Cité dans *Histoires du MLF*, *ibid.*, p. 61.

下堕胎不再需要暗地里偷偷摸摸进行。单身母亲的情况也是如此：在1971年12月，妇女解放运动成员支持普莱西-宾逊之家的罢工行动，作为声援，她们占领了城堡。

1972年5月，互助会组织了“揭露反妇女罪行日”，母亲节在香榭丽舍大道举行示威游行；10月，反对博比尼法庭对少女私下堕胎进行审判；11月，占领医师公会理事会。

该组织行动接连不断，每次媒体都有反应。在进行挑衅性行动时，女权主义者不忘通知新闻记者，巴黎的各种社交圈和文学、电影界人士将出席，以帮助公众认识该组织，但这样做就引起成员们的强烈反应，她们揭露明星界及其受操纵的危险。

在这些耸人听闻的行动之外，日常生活中也常有挑衅：“想想吧，我们和他们(男人)干一样的事，我们斥责他们，藐视他们，挑剔他们的屁股、肚子、腿肌、头部：‘这玩意，我会好好待的，但头在枕头下面’(我们这群女孩曾这样试过)。他们受到冒犯，他们感到受虐待，被小视，受羞辱，总之，他们很恼火！别人不向这种人(男人)说这种事，这种事完全不讨他们的喜欢，于是他们不再含蓄幽默，他们是对的，因为对我们来说，这也是一回事！”^①

“组织，这就是死亡”

妇女解放组织的妇女们与任何别的组织形式划清界限，那些组织无论从哪方面看都像新列宁主义模式。妇女解放组织希望自己的组织是一个由妇女自己掌握的，超越各阶层和政府权力关系的自发的和多形式的组织。组织要有信心并保持透明度。大家都参与工作并负起一切责任。会议没有固定日程表，具名都是集体和匿名的，严格用姓具名，并用“姐妹”或姓代替“同志”这个词。

人们聚集在一起相互聊聊天，交换经验，准备写文章，发传单，搞行动……或者只是想在一起呆一会儿。小组组合和解散要看具体情况和成员是否意气相投。人们展开思想，但不愿用标语口号，因为“在标语口号中，有命令，而且包含有领导人、等级、领导机构。”^②

^① 《Nous avons quelque chose en moins.》Traduction très libre d'un article paru dans le journal underground de San Francisco *Good Times*, *Le Torchon brûle*, n° 2.

^② Évelyne LE GARREC,《Les camarades et la grève des femmes》, *Les Temps modernes*, n° 333-334, *op. cit.*

新生的运动确实是不懈的和不可捉摸的,内部常有动乱,变化无常。“着火了”这个词是妇女反对压迫的共同表达方式。书写与表达方式都是出格的,文章是不具名的,出版是不定期的,它不注明日期,就像是这种时间的写法意味着毫不留情地表示这个运动会寿终正寝。

这个运动在创始之初就真正地受权力所困扰,还有思想僵化,以及受到操纵等问题。这不仅是已成了问题的列宁主义原则问题,也是组织问题本身。从《着火了》第二期开始,就有一些煽动性的文章警告在这个领域里进行的任何尝试。组织是一种“陷阱”,“权力这个字的虚伪的伪装”,“纯粹是不切实际的”,“这是架空转的机器,是那些组织机器的人摆弄的产物”。^①组织就是“扼制主动积极性”,效率本身就是一种“虚张声势”的概念。

此外,应当小心那些要求代表组织或打算执行此类任务的人:这些人暗怀权力欲望,“从统计角度来讲,那些最热衷于搞组织的人是最值得怀疑的”^②。那些人并非都是狂热的新列宁主义分子,她们要求更多的组织,这让人怀疑“要求该组织起男人那样的作用,这是我们早就弃如敝履的。”^③换句话说,“组织,就意味着死亡”。

妇女解放运动特别想完全摆脱战斗组织的模式,既没有同情者,也没有成员,也不想去“招雇”。人们要实行个人自治原则。

反组织的警觉已经到这样的程度,某些成员这样提出问题:用 MLF 这样的缩略词来代表妇女解放运动是否也构成一种危险,它预示着一种与妇女群众相分离的运动,这种抽象的实体,妇女们能适应吗?即使有“运动”这个字,到时候还得放弃:“那里有讨厌的从属性的转移,de 字属于正在运动(前进)的妇女以求得解放;a 字属于‘妇女解放运动’。词义学上滑向 dans 字,这里运动变成容器,在外面有一个实体,这就是运动。人们可以看到‘运动’这个词现在就意味着一个固定单位。差一点就成为大写字母,注意,运动组织将抓住这个字。这需要时间把它遗忘。MLF 就行了,运动组织将用这个词。”^④

组织这种巫术以及缩写字这种花样引发的是沉重的负担和消极的态度,到时候能采取的唯一的解决办法,那就是解散:“立刻取消使用缩略词 MLF。于

^① 《Sur les mécanismes de dégénérescence. Le MLF contre le mouvement de libération des femmes》, *Le Torchon brûle*, n° 2.

^② *Ibid.*

^③ 《Le mythe de l'organisation》, *ibid.*

^④ 《Sur les mécanismes de dégénérescence》, *ibid.*

是大家都又变成一群女人。这个抽象的怪物不再存在。”^①从妇女解放运动创立开始,其内部就有其解散的必然结果存在。

在艺术学校大厅,该组织每半月召开一次大会,秩序总是很混乱。对那些新列宁主义分子来说,大会是“尽情发泄”的场所,是个“自由的闹市”,他们将该组织变成“选举大厅,温暖的避难所,这里可以尽情发泄歇斯底里情绪,神神叨叨耍一通”。^②而对那些女权主义来说,那是“熙熙攘攘,精神振奋”^③的场所。这种生活是别的地方找不到的,在妇女中间,这是几个世纪以来重逢的景象。

开这些大会时,叫的叫,闹的闹,一片鼓掌声和喧闹声。既没有确定的日程,也没有会议的主持人(可能又扮演“家长的角色”),既没有选举,也没有发言次序,每个人都想她的声音能让别人听见:“人们几乎不知道是什么,只能瞅见一点,人们几乎无法发言,要发言首先要到那里,并且要有‘有名的’大嗓门,然后要保持它,发言,但一会儿就没声了。不管是否有嘘声,也不管人们听见没有。”^④

通过西蒙·波伏娃签字的《343人堕胎宣言》的公示的反应,人们可以一瞥妇女解放运动大会非常特殊的气氛:“母亲的女权主义,没有什么可指责的!第二性已经过时。”人都疯狂得喘不过气来了,更谈不上去发言。这是吼叫。女孩们在角落里揪成一团。马弗拉跳上桌子,她的声音镇住喧闹:“瞎嚷嚷什么!这哪像妇女解放运动?真叫人恶心,一伙资产阶级分子!你们干脆去怀孕,然后去堕胎,你们……”^⑤

这些会议想摆脱一切禁忌和戒条,事实上,却陷入另一个困境:“‘组织’、‘结构’、‘发言’就像吵架一样受到唏嘘。”^⑥这里没有领导,没有负责人,在辩论中,大家都是所谓的平等状态,但是,总有一些人能说会道,那是一些明星级人物及一些有口才的人:“一个不知名的女子表达某种思想,既没有腔调,也没有分量,完全是平淡无奇。一分钟以后,有一位‘头面人物’又谈同一个思想,结果受到热情欢迎。”^⑦

这种会议使人们终于认识这种运行方式,而这里也和其他地方一样,“勾心

① *Ibid.*

② Sylviane MERCIER,《La foire à la libération》, *Partisans*, n° 57, janvier-février 1971.

③ Annie de PISAN, Anne TRISTAN, *Histoires du MLF*, *op. cit.*, p. 59.

④ *Ibid.*

⑤ *Ibid.*, p. 68.

⑥ *Ibid.*, p. 88.

⑦ *Ibid.*

斗角”任意发展。确实,这种富于表现力的运行方式也不比现存的新列宁主义组织更为民主。虽然人们不承认权力和等级,但其压迫程度更甚。领袖们强加于人,扩展权力于已破裂的个性和已困惑的意识,正式抛弃任何权力可以提供的好处,自我陶醉于收获的果实,也不需承担什么责任和费用。

与前卫分子决裂

对于那些纯粹和强硬的女权主义来说,关心别人的斗争,那必然是出于复杂的原因,这对不属于自己那个社会层次甚至另一性别的人都是如此。这是前卫派或神职人员的逻辑,为别人说话,以他们的名义而没有感受到他们的感觉:“我们不想为邻居去打架,也不会为女邻居打架。运动的成员花费时间为别人,为工人,为外来侨工去斗争。我们谈论的是自己,而女工们谈的是她们。”^①

与新列宁主义的模式相反,这个运动的出发点是自己。所有其他的步骤都是不现实的,是欺骗自己和别人的:“假装不为我们自己斗争,而只是为她们(女工们),这也就是当‘天主教徒’。”^②有人说:“这一回,这是一场直接与我们相关的斗争。”^③面对因阶级出身和政治教育不足而产生的犯罪感,这是真正的心理解放。结束战斗的说教和牺牲,“说好话是不成问题的……这次我们也是‘群众’的一部分”。^④比起传统的战斗精神,这是看法的完全改变,妇女的斗争直接与私生活有关并直接针对每一个妇女。如果反抗只是针对个人性质的压迫,那种反抗也没有什么意义,和其他人团结起来斗争的必要性就更小了。

在《着火了》发表的《致各组织姐妹》的倡议书采取的是紧急补救措施:“你们按传统的方式进行斗争,也就是说在别人的压迫下,把私人生活与政治分开……你们从来不说‘我’,而是用你们自己以外的其他事情,你们愿意用‘群众’的名义,就像你们说的那样,‘征服’(就像其他人征服了妇女?)群众对你们来说只是一种使用手段,人们操纵的群众性物件。”^⑤

新列宁主义组织,首先是托洛茨基分子,他们对妇女解放运动感兴趣,其观点首先是选择“阶级立场”,并为其提供“正确路线”。在1970年,该组织的初期

^① Christine DELPHY,《Je ne vois pas pourquoi un mouvement s'arrêterait de grandir》,in《Dossier: 1970-1981 que sont les féministes devenues?》,《Le Temps des femmes》, n° 12, été 1981.

^② J. K.,《Les militantes...》,《Partisans》, n° 54-55, op. cit.

^③ Ibid.

^④ Ibid.

^⑤ 《Aux sœurs des organisations principalement trotskistes et maoïstes》,《Le Torchon brûle》, n° 2.

领导核心中就有托派组织派来的人。对这类组织来说,妇女解放运动就像别的组织一样,是行动阵地:人们在那里发展阵地,哪怕只是轻率地占用发言时间,以师长自居,企图培养一些同情者以招兵买马。革命共产主义阵线的托派分子在这方面赢得巨大名声。

革命女权主义者对这伙企图篡夺其组织核心的新列宁主义派女战士的回答是很尖锐的:“最近以来,你们在一伙人操纵的组织的命令下,来到这里。在宣传你们主导思想的这伙人的命令下……你们的组织只知道取代群众,把各种各样的头头脑脑、流派都塞进来:伟大的克里维纳和他的领带,伟大的热斯马尔和他的荣誉道路,甚至有点像在十字路口,有马克思老爹,托洛茨基老爹,卡斯特罗老爹,等等,鼻祖们的节庆,那是什么,那就是你们的组织!”^①“托洛茨基派和毛派的姐妹们”得从“正统的、僧侣式的、黥武主义的战斗精神”中得到救赎。^②

事实上,被称作“阶级斗争”的女战士的立场是很难受的。它要承受双重批评:成为那些被称作“小伙子”的女权主义者的批评对象,还要恢复运动,在新列宁主义派中,她们被指责为女权主义者。后一种指责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受感染”的女战士从中引入战斗精神和妇女解放运动的主题思想。这伙人成为持不同政见者,离开了组织,由此激化了内部危机,使之走向解体。

感情政治

“个人就是政治,政治就是个人问题”,^③这就是妇女解放运动的女战士们的共同信条,这是她们从行为和行动中得出来的结论。该运动自认为是1968年五月运动的真正继承者,在重新讨论私人事务和政治分离中是惟一的和最彻底的继承者。

确实,首先牵涉到的是妇女们:这种分离既掩盖又证明了日常的压迫,并使妇女们降低到只是干家务劳动的地位。在废除旧秩序方面,妇女们失去的只是压迫。个人生活和政治生活不再是生存的两个分离的序列,同样,政治在内容与实践方面一样都是乱七八糟的。政治领域被带入私人领域,这就像它的基础一样,直到那时,还是被人忽视的。这种私人领域是直接和妇女相关的:家务劳动和“教养孩子”,与男人的关系,身体和女性性欲。

① *Ibid.*

② *Ibid.*

③ 《Cause toujours》, *Le Torchon brûle*, n° 4.

新的政治实践正在早已存在的思想框框中提前注入这类主题。应该给女子“实际经验”以全部地位,发掘其反抗潜力以颠覆既定的秩序。这种实践是很粗野的,它所要解放的是其主观性。这样做的结果是妇女解放运动打开了潘多拉盒子,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抛弃新列宁主义教条将为崇拜女性“实际经验”打开道路,这种崇拜与理论化和重大原理不同,被假设为不能骗人的。在这种前景下,与上述思想相反的是不应该在政治中掺入个人感情,而事实却正好相反,应该从感情出发制定政治目标。

在这方面,美国女权主义者创立的“觉悟团”彰显了她们的道路。妇女们在那里自由地谈论日常受到的压迫,她们的性欲、愿望以及她们的幻想。而通常教育是教我们如何控制她们,与此相反,现在不要怕她们自己会管好自己。这类社团表示了一种最原始状态的反抗,一种比理智更具优势的真理。而在面对社团内部会表现出来的抵制时,人们甚至会提供一个详尽的纲领或方法来消除它。^①

那些直到那时还不能言明和受到抑制的东西今后将公诸于众并在社团内被分析。在妇女解放运动中,政治和私人事务分开不仅重新提出来,亲情也失去存在的理由。这就像人们要消除与自身的和他人的距离以融化在集体里一样。这样做的时候,人们或多或少是有意识地玩火。那些被设想提高觉悟的会议,在个人和集体的心理剧中是随时可以转换的。

在群体面前谈到自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涉及到隐私的个人生活时。此外,要避免谈到结账或领导与下属的现象更是不易。种种压迫的事实会触动心灵的创伤,那些恼人的事例挑起一系列富有挑衅性的事情。紧随生活事例的叙述的是由那些经历产生的冲动和激情。把话说白了,每个妇女的感情和脾性会很快让别人难以忍受。甭想去控制这类激情,这是感情的准则,是对别人细致情感的尊重。妇女解放运动像其他“疯人派”中持不同政见的一代一样,是没法治的痼疾。

感情和历史尽管充满激情,最终还是令人厌倦了:“一旦你有了自己的个人人生历程,你就得重新高声讲述你的历史,有一部分论说是重复不得的。这样就会变得做作。关于经历的语言也能作为政治言词来传递。”^②事实上,大家都不指望勉强地分享别人的“经历”。而由每个人和集体来重新讨论个人生活多

^① Kathie SARACHILD,《Un programme pour l'“éveil d'une conscience” féminine》, *Partisans*, n° 54-55, *op. cit.*

^② Corinne WEGLER,《Je suis une affreuse renégate》, *Le temps des femmes*, *op. cit.*

少是种负担。对那些女权主义来说，她们已迈过了这一步，她们与伙伴们在集体里生活，这类提问已属于日常问题。但是在这类游戏中，谁也没有失去什么，尤其是当人们有了孩子和丈夫时，女人是绝不准备放弃的。

10年以后，那些以前的运动成员仍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况：“关于妇女，人们有时提出戏剧性的问题。我当时是在20区的小组里。那里有家庭妇女、办公室职员……我们讨论的往往是危机问题，这些问题我们是无法控制的：重新提出夫妇生活问题，没有物质的和心理的条件过自主的生活……突然，人们倒退了。”^①

确实，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与妇女解放运动的生活方式一致：“事实上，通过我们的社会文化层次，我们代表了一些模式……我们已经是解放了……我们自己树立了这类模式。”^②

“觉悟社”的实际影响与政治上能承受的破坏能力相距甚远：“这些影响可能任何问题上体现，书写的文章，手工的劳动，音乐，集体生活，没什么意义的事，等等。”^③“感性”的理解取代“理性”理解，别人的利益高于自己的利益。就此而言，在这一范围内颠覆现存社会的政策才是新事物。在从事的推翻活动中，僵化的教条取代“经历”，在妇女的个人和人际关系的问题上，更精确地说，即妇女解放运动的成员的问题中，政治被打倒和瓦解了。

这个集团所启动的生活和爱的机制反对的是传统的政治，这种政治相继成为权力、统治、侵犯的同义词。在整个人类生存和活动的领域里。“集团”旨在建立模范的人际关系。政治也包括在内，有一位妇女解放运动的发起者写道：“我们给政治这个词以真正的意义：人类集团的生活和对所有集团关系的思考。”^④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可以认为这个集团的推动者是杰出的政治斗士，不管这个集团有什么特殊的目标。更精确地说，当集团以自己为中心并谈及基本问题时，它制订的“现实”政策应依据每个人的爱的关系和性关系以及在内部建立的种种关系。

男人是主要的敌人吗？

面对强调阶级区分和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全面斗争的必要性的马克思主

① *Ibid.*

② *Ibid.*

③ 《Groupes de conscience》，*Le Torchon brûle*，n° 5.

④ Annie DE PISAN, Anne TRISTAN, *Histoires du MLF*, *op. cit.*, p. 72-73.

义论点,女权主义回答道:“达索夫人和那位饶舌的妇人并没有和‘体制’打交道……不论在床上,还是在桌上。她们都有一位有血有肉的丈夫,他们差不多以同样方式行事。比如对饶舌妇人,可以这么说:‘你把我的衣服拿去洗了吗?’而对达索夫人则说:‘请问,您是否可以叫诺埃米到洗染店去拿回普通礼服?’”^①

问题是循环不息的,谁是“主要敌人”呢? 1971年3月,女工们进行罢工,并在夜间占领工厂,这个问题又提出来了。妇女解放运动成员给予她们支持,并顺便提出一些实践和事实,这就使曾被大肆鼓吹的阶级斗争再不被提起了。

女工们夜间占领工厂,此事并不被她们的丈夫和法国总工会看重。在占领工厂期间,女工们在食堂里干她们很熟悉的活计。一位极左派的女工被法国总工会当做“淫妇”……有很多事件增强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女权主义者的力量。

这些女权主义者被指责为新列宁主义派,将阶级觉悟引入歧途,她们在《着火了》中辩解道:“我向那些‘墨守成规者’叫道,如果她们在工作的工厂里不再有失败的记录,她们不该再像她们所做的那样,而应当首先谈妇女问题。我告诉她们,她们不屑一谈的‘下流故事’,就像他们信为神圣的其他故事一样,也都是政治性的东西……因此女工总是受到不同待遇、受到下等人待遇,有时受老板、有时受‘伙伴’们的欺压。”^②有“阶级斗争”倾向的女战士们白费心思,事实上,男人成了挨批评的靶子:“啊! 压迫人的可怜的男人,不管你们是属于哪个阶级的,都被侮辱得一无是处。”^③

“一群男人”在《着火了》第3期这本杂志中简略地表明态度。他们的言论很有意义,这些男人的皮肤也不知为什么疼,“他们自己受迷惑,他们喘不过气来。”他们企图“根除生活中的、头脑中的、性关系中的,以及心中的沙文主义的男性”^④,他们有一天能达到目的吗?

自我批评或多或少受到鼓舞,在分配家务任务,特别是在洗餐具方面时常有些争执。支持妇女解放运动的声明丝毫没有改变,这些声明往往有讽刺挖苦的味道,被认为是肯定大男子主义的性倒错的曲笔。如果男人们想重新变成人类,就得学习“非男性化”,这就会“牵涉到勃起方面的障碍,会冒不再是他们所需要的自动性和具有雄风。”^⑤

① Annie DE PISAN, Anne TRISTAN, *Histoires du MLF*, op. cit., p. 52.

② 《Troies》, *Le Torchon brûle*, n° 1.

③ *Ibid.*

④ 《Un groupe d'hommes》, *Le Torchon brûle*, n° 3.

⑤ *Maternité esclave*, ouvrage collectif, Union générale d'édition, Paris, 1975, p. 121.

罗歇的不幸

初期的女权主义者安娜叙述的罗歇的简短故事很好地反映了女权主义者伴侣所遭遇的挫折。

罗歇是左派成员,是由安娜带到“男性化妇女会”(FMA, Féminin masculin avenir, 男性女权会, 妇女解放运动前期的混合组织)来的。他成为该组织的骨干。罗歇被描写为诚实的人,就像一个男人应该诚实那样:“他同时是个‘男性崇拜者’……并乐于当一个男性崇拜者。他对改革有良好的愿望,了解和愿意改革。他以一个男人作出‘反应’,但是欲望使得他克服了这些反应。”^①

罗歇很快离开了老婆孩子与安娜“同居”,尽管安娜是有保留的。于是不可避免地提出了“家务和厨房等尖锐问题”。想“再教育”罗歇是件难事。他用吸尘器,他洗餐具。这还不够,在安娜不停地指责下,最终他干脆提出到食堂吃饭,并找一个干家务的女工。他的伙伴评论说:“换句话说,他想用别的办法解决问题。”^②

床第之事也不怎么痛快:罗歇有性不应期,这使他十分苦恼。安娜说:“他这一闹腾,我心灰意懒了。他无意识的‘阳刚’之气就完了!我干脆不干了……我毫不留情地指责他没能耐!他颤抖着,我却走了。同时,我也可怜他。我知道,换了别人也会像我一样难以摆脱这种窘境。”^③

但是,可怜的罗歇的不幸不止于此。他蜷缩于一角,参加一个决定男人们今后是否该排斥于集团之外的会议,而他是该集团骨干之一。但他的女友指出:“罗歇真倒霉,他受不了被开走。他不相信有好心的压迫者,压迫者都是一路货色。”^④

此后,安娜与她的女伴们消磨光阴,越来越疏远罗歇。不久,罗歇被迫搬家,另居一室。安娜为了圆满地结束这个典型故事,和一个与她相似的姐妹、一个既单纯又坚强的女战士相恋。她开始接受精神分析治疗并最终抛弃了罗歇:“罗歇早就该懂得,对我来说,同性恋并非额外的爱情,男人们谈起这玩意总带着刺激的神气。这是他和他的同类应予排除的基本关系。”^⑤

① Annie DE PISAN, Anne TRISTAN, *Histoires du MLF*, op. cit., p. 44.

② *Ibid.*

③ *Ibid.*, p. 44 et 45.

④ *Ibid.*, p. 49.

⑤ *Ibid.*, p. 78.

罗歇后来怎样就谁也不知道了,他有一副老实人的面孔,左派的战士,一条道走到黑的女权主义者临时的伴侣。

从解放型妇女到面对现实

在考查男女关系根本改变和实际实践的现实方面,妇女解放运动内部也有差距,这和其他地方是一样的,要付诸行动还有差距,私人生活问题还不能完全和公众问题相混同。比起那些革命的女权主义煽动性的文章所设想的东西来说,解放型妇女的模式还是相对可以承受的。

在一个不承认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分离的运动里,个人行为并不言明的阶层化是逐步被肯定的:“因而单身女子自信比结婚的女人更为自由(‘要求离婚’的女人有暂时的光彩:这种人表明我们的蓬勃活力!),不当母亲的女子最终明白她做的是对的,当然,同性恋在妇女解放运动的道德观念层次上是站得住脚的。”^①事实上,同性恋尽管是作为一种政治理想提出来,却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普遍和“易行”。^②运动组织里的妇女之间的关系是模棱两可的。异性恋是“与男人合谋”,“在很多情况下,这是一种诱惑男人的需要,而没有异性关系的妇女,也会服用避孕丸,这也就很容易理解了。”^③

很多女战士“理论上”同意对男子寸步不让的批评,然而在私生活方面并不能与男子一刀两断。于是,对她们不幸的伙伴,妇女们表现了恶意,办法是更富于侵犯性。总之,她们几乎是孤立的:“我是永不悔改的异性恋者,确实,‘我为不能办到的事付出昂贵的代价,有人在我们之间自在地生活,这并不叫人伤心。’我有负疚感,也想为我生活道路上的男人们付出代价,当然,这是我自己的事,总之,这是要搞清楚的事。”^④在另一次会议上,有一位女战士说:“我让我的‘小伙子’倒下了,自从我认识妇女解放运动以后,我只为这个运动活着,我很伤感,因为我们这个团体完了,我也得完蛋,因为我已一无所有了。”^⑤

对那些年岁较大的妇女来说,尽管她们靠的是丈夫,特别是靠孩子,日子过得很艰难。这些妇女对被当做“改良分子或不可救药的疯子”感到厌烦,因为她

① Claude,《Question d'un moi en mouvement à un mouvement sur-moi》, *Les Temps modernes*, n° 333-334, *op. cit.*

② Naty GARCIA GUADILLA, *Libération des femmes. Le MLF*, PUF, Paris, 1981, p. 98.

③ *Ibid.*, p. 97.

④ Claude,《Questions d'un moi en mouvement à un mouvement sur-moi》, *loc. cit.*

⑤ Cité par Naty GARCIA GUADILLA, *Libération des femmes. Le MLF*, *op. cit.*, p. 69.

们与解放妇女的典型模式是不相同的：“如果丈夫不是冷酷无情的暴君，每天晚上都强奸我们，终日变着法儿压制我们，使我们成为张着双臂投向妇女解放运动的典型的受压迫者，我们在经济上和爱情上就不会处在很复杂的地位，此外，还得考虑孩子们的权利，这种地位是不会有完美的解决办法。”^①

这种“反常的残暴”，“对解放的压迫”与新列宁主义的重大原则和阶级来源的理论是符合的。在一个全新的世界的载体并考虑到避免任何男性意识形态的污染的运动中，怀疑总是会有的，并会带来反叛！“我们害怕了！我们受到监视！我们受到围捕！我们陷入困境！……我们要求有失误、讲蠢话的权利，然而不要受审判、受评价、受议论，而是要得到帮助，得到理解，尤其是对我的缺点！”^②很多妇女不再去开会了，被那里的气氛吓坏了。

“这个恶魔也在我们中间”

女战士之间的“角逐场”，至少在运动初期，经常是在皆大欢喜中散场的：“出自市场、商场、集会的放纵的产物；那是谩骂、拥吻、笑声、舞蹈。……出来时惊愕异常，感到厌烦，完全失去兴趣。”^③

然而，这种高兴在“女性社团”只是持续很短时间。当天会上吵吵嚷嚷时，总有某些妇女提醒在压迫环境中，全体妇女都是姐妹。但是，爱的信息传播得很差：“我是一个烦躁的人，我不相信某些人不会来烦扰我……我尽一切努力去参与爱心相融的活动，我也不能说我会得到非凡的享受，事实上，这是件令人烦恼的事！”^④

在这种鼓励充分表达主观愿望的运动中，思想感情中总搀和着矛盾，其结果往往产生仇恨。在肯定“我们妇女们”这种混合群体和现实实践之间差距不该再拉开时，内部会有越来越多的不良事件，有一位以前的运动成员说：“不到两年工夫，那些活蹦乱跳、办事怪诞、意志坚强的妇女都变得疑心重重、郁郁寡欢、心神不宁了。”^⑤

对某些妇女来说，幻想早就破灭，心中的怨恨十分明显：“人们自相残杀，可

① 《Femmes mariées》，*Le Torchon brûle*，n° 3.

② 《Mes petites sœurs du MLF j'en ai marre de me faire chier la peau avec vous !!!》，*Le Torchon brûle*，n° 6.

③ Annie DE PISAN, Anne TRISTAN, *Histoires du MLF*, op. cit., p. 59.

④ 《Sommes-nous des brebis édentées》，*Le Torchon brûle*，n° 2.

⑤ Élisabeth SALVARESI,《Auto-itinéraire》，op. cit., p. 136.

是不敢正视,也不承认这种现象……我们的斗争不再是为团结和加强力量,而是自我毁灭……人们在自己的女朋友、那与自己形象相似的人身边跟敌人斗,身边这个人是我们的镜子,看见这种镜子中的自己对我们是无法容忍的事,这种可怖的现象就在自己面前。当初,人们碰到这种事,因为人们被认出来了——这既是颓衰的自觉承担者,又是一个反叛的近卫兵。现在,人们将它毁了,因为人们无法忍受这看来像魔鬼似的东西。人们害怕了,因为有了它,斗争可能干不下去了,因为魔鬼会永远呆在那里。”^①

1973年,最后一期《着火了》发表了一些意思明白不过的文章:“妇女解放运动的闹剧够烦人的了!”“腻人透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小姐妹们,跟你们打交道可烦死人了!!!”不管怎样还得求助于爱情,在这些姐妹的帮助下去找到“新的革命关系”。但已经太晚了,姐妹之间的爱已转变成仇恨。内在的死亡逻辑已在起破坏作用。排斥一切暴力和统治的妇女世界的女权主义乌托邦只是一个蛊惑人的现实斗争的产物。

女战士亲自经历的运动衰败的状况是值得铭记的。有一次,“心理分析和政治”小组在乡下组织了集会,有人描写了集会的气氛以及可笑和令人失望的结局,而在当时是颇为激动人心的:“这天晚上,像往常一样,我们在诺曼底的库皮尼大厅里席地而坐,为约有200人。讨论题目:多样关系(请听,多样的性关系)。发言一个接一个,大家急得满头是汗。我们之中某些妇女语言尖刻。然而,在这布景漂亮的大厅里,有些幽灵似的人物在转悠,就像是在一个被轰炸的城市,从精神病院出来的病人,满嘴胡话,突然站起来并在寂静中发言:‘我的兄弟们曾跟我干仗,有人说那是我的错误。’后来,大家跳舞了。由于被不速之客所打扰,我看见有些女人搂着别人,动作小心翼翼。突然,在所有的嘴角瞅见一丝淡淡的微笑:‘错了!错了!你们并不相爱!你们不要再相爱了!’我真想这样喊叫。一种受操纵的同性恋,错误的关系,一切都在谎言中沉没。我又在晨曦中站在窗台边,并听见一种哀伤的声音:‘不,不,我不会变成疯子的。’这就是我自己。我回到巴黎,并与战斗精神一刀两断。我不愿意再想了。我的脑子一团糟!”^②

^① Une femme du Mouvement,《Une expérience personnelle dans le Mouvement》, *Le Torchon brûle*, n°5.

^② Élisabeth SALVARESI,《Auto-itinéraire》, *op. cit.*, p. 137.

二十、妇女解放运动——威力无穷的幻影

在70年代,妇女解放运动这个组织代表妇女斗争的激进派,也是极端分子中的少数派。但它不能单独代表妇女解放的斗争。堕胎和避孕自由化运动(MLAC)或选择运动(Le mouvement de choisir)起着重要作用,同时它并不同意妇女解放运动捍卫的极端派观点。但是,妇女解放运动组织的激进观点是推动反叛的催化剂,它表达了自主的新要求。

个体妇女自由的确立是与公认的高级的利益和价值相对立的,而且这种自由也不是自己决策的目标:妇女解放运动,在我们看来,这就是它的基本方案。这种个人自主的要求从此关系到身体和性欲。妇女解放运动又提出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是这也是家庭和配偶的中心问题。这样,在最亲密的男女关系中,也就引入了自主和区别对待的要求。

避孕丸这种新的避孕方法的发展,历史性地提供了新的条件,由此,自主的要求就贯彻始终:性欲和生殖这种关系在此之前是自然的和不可分离的,这样一来就分开了。正好,堕胎和避孕的斗争也不是孤立的,因为这两件事都扎根于自由安排自己的愿望。

但是,妇女解放运动并不就此止步。女性的身份本身又被提了出来,而性欲的差异在人类的生殖和与孩子的关系中确定了其作用与特殊的地位。反抗不仅是反对既定的社会秩序,同时也是反对对个人尊严的践踏。这样,妇女解放运动很清楚地表达了后68极左派的典型思维和高傲。

而这种问题的产生并不仅是社会外部的力量,这是以占统治地位意识形态的形式或道义的形式杂以压制人的权力或经内部转化的权力。性欲对我们而

言只不过是社会歪曲了的、受压制的、曲解了的东西。要消除一切禁令和犯罪感,使性欲成为自然的状态,其标志是纯粹和真正的享受,消除存在于人类两性关系中一切歪曲和障碍。按照1968年运动派卢梭学说的关于女性理论的解释,在妇女的心灵中,力量的对比、暴力和统治都是来自外部的因素。

妇女解放运动的成员主张“重新定义”或再创造一种排除一切威胁人的性冲动(被视为男性性欲)的纯粹的性欲。这些成员标榜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说法,说什么那是构成人际关系网的良好性欲。能够自由地安排自己的意愿就在这种威力无比的幻影中实现。于是,要确定某种个性的形象,它既不是任何人的形象,也不是前代人或未来几代人的形象。它既不欠别人,也不承担责任,而只是确立一种激进的自主,它既没有确实的目标也没有极限。女权主义的乌托邦思想是建立在基本人类学范围,它使人类不是一种个别的存在,它可以不受惩罚地从自然和对别人的依赖以及与大自然的联系中脱离出来。

由于确立了威力强大的女性尊严,某些妇女解放运动成员终于相信她们可以像自己所愿意的那样。就像“5月天气晴朗的星期日集合在草地上的一群妇女”说的那样:“问题在于取消承担责任的世界,用欢愉的世界来取而代之。”^①这种激烈的热情已嵌入解放运动中并使它在虚无主义中沉没。

自由安排自己

妇女解放运动毫不掩饰地攻击传统的偏见:认为妇女的特性就是低男子一等,注定要为男子服务。妇女们从属于丈夫,服从于丈夫,蹲在家里当下级,几个世纪以来,连公民权都被剥夺……妇女们总是被当做另类,不被当人看。就像对印第安人和黑人那样,教会质疑:妇女是人吗?并且怀疑她们是否与魔鬼有特殊关系。

这种歧视还被用生理学来证明:女性性器被认为有欠缺,比之男性是萎缩的性器;它是藏污纳垢的和不清的。妇女的职能首先是生殖,而就性关系而言,如果性关系与生殖脱离,那就是错误的和犯罪的。女人理想化的形象并不是圣母玛利亚的形象,她不是被认为未做爱而生育的吗?这使她的反面妓女的形象加上了这个虔诚的形象。妇女解放运动就是要结束这种禁忌和将妇女贬至下等地位的陈词滥调。

^① Groupe de femmes réunies sur un pré un beau Dimanche de mai, 《Les femmes s'entêtent》, *Les Temps modernes*, n° 333-334, avril-mai 1974.

人类已进入一个新阶段,它为妇女解放提供了新的条件。但是,另一个时期的道德说教和禁忌仍然存在。确实,避孕丸的出现使之能摆脱“生殖的忧虑”和“不可推卸的妊娠的负担”。但是,对丸药的限制和封锁传播还是很厉害的:“对很多人来说,怀孕是那些敢做爱的人应得的惩罚。立法者、男人和女人本身都有点害怕欲望从此得不到控制,如果女子不再害怕怀孕的惩罚的话。”^①

关于堕胎问题,当时的情况是很悲惨和可笑的。立法特别严厉,人们估计在法国非法堕胎者实际有100万。由于野蛮堕胎而死的妇女每年约5000人,1万到1.5万人终身不孕,20万人感染疾病。^②

反对堕胎者以生命神圣可敬、妇女的“自然”天职是生殖为名,他们为数众多。1971年4月,343名妇女发表声明,宣称她们已经堕胎,由此反应越来越强烈。有一个医生,因为“闻到左派343个血淋淋的屁股上有堆尸场的臭味”^③而感到愤怒,他在声明中关于仇恨和对女人的憎恶鄙视谈得很多。一些像“让他们活下去”那样的社团对“胎儿杀手”进行讨伐。

而对妇女解放运动来说,它要的是基本权利,在这一点上是不会妥协的:“要违反妇女自愿,硬要她们生孩子,我们是永远不会接受的。问题不在于搞一个事实上的立法,而是要承认我们的权利。”^④

妇女解放运动表示了自主的愿望,声明“他们再也不能对我们作出决定”,这种愿望使之一条道走到黑,对一切从属于孩子和无自由选择的任何迹象提出质疑。这种自主和自由是不该提出、也毫无意义的,即使给予其这种自由也等于让妇女们因此斗来斗去。这种自由应该争取而不必再等待,从现在起就该去争取:“我们追求这种自由的过程是为解放而斗争的过程。自由不能靠施舍的。它只有通过争取才能实现的。这是自主的表现。而自主是‘从自身出发’。就像自主就是自由,这就是从自身和自身经受的压迫出发,因此人们是致力于解放的。”^⑤

作为母亲和妻子的妇女,作为玩偶的妇女,轻佻的女人,妈妈或妓女……永恒的女性、女性的卑劣行径等等,都是否认妇女能自己决定自身命运的种种思维定式。妇女解放运动拒绝那种将妇女当成不能主宰自己命运、被动的传统的

① Anne KOHEN,《Une lutte de femmes à propos de la maternité: réflexion et mise en pratique》, *Partisans*, n° 54-55, juillet-octobre 1970.

② Quelques militantes,《Matière pour une réflexion politique sur l'avortement》, *ibid.*

③ Cité dans *Maternité esclave*, *op. cit.*

④ 《Appel du MLA pour l'avortement libre et gratuit》, *Le Torchon brûle*, n°1.

⑤ 《J'aime le mouvement des femmes》, *Le Torchon brûle*, n°1.

角色。

在我们看来,这些就是妇女解放运动的主要成就,而在70年代,妇女解放运动组织是先驱者,它在历史上标志着决定性阶段。20年以后,在原教旨主义和最落后思想意识回归之时,捍卫这个成果比任何时候更有现实意义。然而,这也不能阻止人们反思妇女解放运动体系的局限性和它所能导致的走向死胡同。

颠倒的性歧视

开始,妇女解放运动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妇女要为男子服务而不是相反?与社会活动一样,家务劳动中也存在不平等。女人的形象是作为为男子幻觉服务的被动的性对象和生殖机器……这一切都使妇女退化变质并腐蚀了与男子的关系。要为此类不平等斗争,粉碎这类陈词滥调,肯定她们的自主权……而对男子来说,要意识到性歧视的习惯和思想,改变他们的习惯和实践,这就是可能革新的条件。

但是,对妇女解放运动来说,这些言论是太温和了。男子基本上不是好糊弄的伙伴,他是充分或完全实现长期受压制的女性愿望的障碍,男子成了应该打倒的体系的代表和象征。

男子对女性角色的认知基本上是否定的。这是一些“被男子气概绊住腿的机器人”^①,他们将女性降低为他们服务的性别。当他们做爱时,不可能考虑到伙伴及性乐趣。他们的性趣是与权力及统治意志不可分割的。男性“在剥夺和奴役女性”,^②他们的性欲“经常是病态的,是建立在性虐待的幻想基础上的”。^③

此外,男人好像把社会上所有的毛病都集于一身。他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载体”,他向妻子反复灌输要热爱家庭,而对她和孩子们补偿的是剥夺了他们的一切权利。……男子成为压迫等级和权力的象征:“由于他是压迫人的家长,兼容了上帝、国家元首、老板和一切高高在上的角色。”^④还有,他是“大师”,“因为从他身上射出全部价值,就像阴茎里射出精子。”^⑤他是权威的证据和化身,那是操纵其他的最高价值:“权力,责任,坚定,荣誉,劳动,勇气,坚硬,严肃,

① *Maternité esclave*, op. cit., p. 312.

② *Ibid.*, p. 121.

③ *Ibid.*, p. 120.

④ 《Le torchon brûle》, *livre-journal*, *supplément à L'Idiot liberté*, n°1, décembre 1970.

⑤ Annie LECLERC, *Parole des femmes*, Grasset, Paris, 1974, p. 19.

正直,权威。”^①

由于精神受到束缚,无法取得幸福,当家长的只好抱怨,他没有福气当女人:“当男人可不轻松。不得不用男人的眼光去看事物,因为这种目光本身就带有不幸和歹意。”^②

拒绝同男子结婚但承认其父亲身份,这对某些女人来说是一种斗争手段,用以保护妇女同时保护孩子免受男子统治,对于把孩子与父亲分开帮了大忙。这还会避免为她带来很多麻烦的著名的恋母情结:“如果我们想自己的孩子健壮和有责任感,对这些果断的没有恋母情结的事和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我们没有别的出路,只有用原始的母爱。”^③如果人们想把自己的孩子培育成健康和有自主能力的人的话,就得以解放了的妈妈形象为榜样,而不让孩子以父系为榜样。

由于把性关系变成简单的力量和攻击的关系,出于同样原因,妇女解放运动将妇女摆在受害者地位,妇女这种特殊的地位首先将另一方,即男子处于有罪的地位。对男子作这样的控告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妇女的无辜和对诡计和统治的无能为力。

男子就这样受控诉,最后也无法洗刷,他很不平衡,在与妇女的关系中,今后他应该懂得他从来就不是完全“清白”的,任何材料也无法掩盖这一点。由于处于自责状态,对自己身份经常恐慌,日常考验不断,态度也真正改变。任何一个动作、一句话都是有意义的。如果男人想否认这种沉重的怀疑逻辑,在没有办法时,他只有加深这种想法:抗议是否是反抗的标志?是否是某种鄙视女人的迹象?

这种游戏是无休止的,因为它是在复仇和怀疑的逻辑中发展的,什么力量也无法将之减轻。这种逻辑将无数的1968年式的夫妇变成没完没了的意识流剧的主人翁。羞辱、决裂,比之宽恕、妥协更多地在街头上演。几千年以来,对被压迫妇女要付的债务似乎是不可泯灭的,每个人都该扪心自问,是否有意或无意地参预了压迫妇女的事。

① *Ibid.*, p. 142.

② *Ibid.*, p. 143.

③ 《Mère célibataire》, *Le Torchon brûle*, n° 4.

有关区别的问题

妇女解放运动引出了要了解妇女解放运动的任务和受压迫的情况,这需要参考人类的本性,要了解人类沿袭的压迫的社会历史根源,那时的意识形态是将压迫合法化的。但是,这种正确的批评导致情况急剧变化。对革命的女权主义来说,包括在社会和文化调节中性欲和心理现象没有任何自己的稳定性。这类事物只不过是调节的反映和产物。以至于性别的差异的本身也被视为社会和文化规范的结果,它与人类本性无关,但它参与了已普遍存在的压迫。

1973年,意大利女作家埃莱纳·詹尼尼·贝洛蒂所著《在小女孩那边》^①使她获得巨大成功(出售25万册),也对普及这个论点有很大贡献。作者精确地指出,性意识不仅是生理现象,而且是由于社会调节的文化结构。在参照美国文化人类学观点并依据对孩子教育的仔细观察,作者阐明调节是从出生时就开始的。对小女孩的调教是按当男人的佣人模式,或很早就介入家庭的未来的母亲,这点在幼儿园里得到加强。游戏,玩具,幼儿文学,学校活动……什么事都逃不出对性别的培训,其目的是“让小女孩准备当妻子或母亲,让小男孩将来掌握权力。”^②

但人们至少可以将承认无限的生物的定义让位于生殖的功能:“生物学上确定的规范,并不只是限于生殖,还有文化性的,直到有相反的证明。”^③但说实在话,即使这种话也并不是一致同意的。在纯粹和坚定的革命女权主义者看来,这种提法也是温和的,其关键所在是将女性与母性分开了。

思想和行为严密结合的女权主义者拒绝生孩子,因为这样做会有助于社会的再生产,这是她们所不愿意的:“我不想怀孕,因为我觉得地球上孩子已太多了(人类太多了),尽管人类有明显的善良的愿望,他们想摆脱别人,特别是西方资产阶级的白人孩子太多了,这些都是未来的压迫别人和自己的压迫者,因此,我不想向杀人的社会提供刽子手式的受难者,我就是出生在这种社会里的。”^④某些妇女甚至梦想来个罢生孩子。作家克里斯蒂娜·罗什福尔也曾考虑过世界性的罢生,就像是“最恰当的人口灾难”。^⑤

① Elena GIANINI BELOTTI, *Du côté des petites filles*, Des Femmes, Paris, 1973.

② *Ibid.*, p. 135-136.

③ *Ibid.*

④ 《Leur langage nous trahit》, *Le Torchon brûle*, n° 4.

⑤ Christiane ROCHEFORT, 《Le mythe de la frigidité féminine》, *Partisans*, n° 54-55. *op. cit.*

1975年,《奴隶般的母亲》^①这本汇编著作出版,该书认为强制妇女将母性作为惟一的选择将会被果断和坚决地拒绝,“因为当今条件下,母性会迫使我们放弃自主。”^②该书在承认“母性是重要的经验”的同时,搬弄了一些令人厌恶的生搬硬套的词句。

书中列举了生育可能对身体的伤害和偶发症状的情况:尿道断裂、膀胱颈撕裂、瘘管、肛门直肠病变……对产褥期不同阶段的描绘并非耸人听闻。然后,应该指出的是:“现在你们倒是‘解脱’了。这是奇怪的说法,既然当时人们是忧心忡忡。”^③女人就像拉尔扎克地区母羊的“挤奶器”。至于赠送的礼品和鲜花,那就得小心留神,因为这些东西意味着:“你们充当产卵多的母鸡!”“你们为祖国和家庭争光!”^④这样也就不可避免地精神颓衰,体重增加并使身体受损害……

在日常生活中,“母亲的职责就是洗刷、饮酒作乐、做饭、上楼、下楼、洗浴、洗衣、叫喊、监视。”^⑤……养育孩子的欢乐被“沉重的劳动”所压倒,还有“神经障碍”、“经济依赖”……当妈妈就是在若干年内放弃了个人生活的一切。在这种条件下,人们意识到“放弃生育”是很值得的。

女性和男性的概念本身应该重新讨论。革命女权主义者认为,女人首先是和所有人类一样,是“社会存在”,这就足以定位女人。总之,所有有关女性特征的资料都是值得怀疑的,因为都是把女人封闭在生育的职能上,都属于家族性思想范畴。

在两性关系上,也像在劳动、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一样,两性的区别也就是“相异性的感情”应该趋向抹煞。在这种条件下全新的人产生了,在两性关系中,最终可以结束暴力统治,就像美国女权主义者苏珊·斯塔格所指出的那样:“为了使两性关系失去压迫的性质,应该尽可能地消除传统所强加的分野,并通过它,使由相异性引起的紧张状态得以消失。”^⑥这种逻辑究其根底,就是拒绝异性恋性欲至上信条,应重新定义性欲本身(以生育为目的)。”^⑦

① *Maternité esclave, op. cit.*

② *Ibid.*, p. 102.

③ *Ibid.*, p. 153.

④ *Ibid.*, p. 154.

⑤ *Ibid.*, p. 99.

⑥ Susan SONTAG, 《Réflexions sur la libération des femmes》, *Les Temps modernes*, n° 317, décembre 1972.

⑦ *Ibid.*

在未来没有压迫的社会中,性别差异的概念并不是能用简短的话表达的,不再是什么“男人”、“女人”所能下定义的,人类最终能和解。这在我们看来毕竟是革命女权主义的乌托邦。对敌视揭发骗局这类事的妇女来说,她们孜孜以求的是新的时代特色,出现的是男女共主世界的古老神话:“在一个没有压迫的社会中,妇女在主客观各方面都与男子平起平坐,这必然是‘男女共主’的特种社会。”^①

“能掌握自己的身体吗?”

妇女解放运动首先肯定的是这个原则:没有个人自由就无法有对身体的掌握。抛开“必须哺育孩子的大包袱”,性欲就会改变性质,完全变成快感的最佳的寻求。所有与身体和性欲的其他关系都是让人想起束缚和嗜古的道德观念。不管当时有多少受到攻击的偏见和多么无知,这类货色仍然是肯定远离来自本身需求的主张。

妇女应该“回归”自己的身体,将它“重新统一”、“要加以控制”、“掌握”、“安排”、“充分使用”它……革命女权主义者的火辣辣的宣言描绘了一个有强大、全能的步骤的宏伟纲领,这还得加上毫无拘束的、享受的欲求和单纯技术性的乐观主义。要反对禁忌和性压抑,身体的“重新回归”应该在一种简单的欲望工具的逻辑中实行。它的机制和运转应该是遵守简单的原则,并且是从容不迫地进行。它就像与外界隔绝,就像是听从自我安排,等待自我修理、掌握和使之正确运转,为自我的有力的最大的快乐效劳。

关于堕胎和避孕的口号也是含糊其词:“不能安置自己身体和不能决定如何运转者乃奴隶”^②,但是谁能用这种方式指挥身体,谁又能克服其隐蔽性来“决定其运转”呢?医药技术的发展,更精确地说避孕方法的发展使得办法多种多样,但这种种方法又怎么能将此类手段淡忘?身体的试验也就是对极限手段的试验,这种极限正是持不同政见的青年人所否认的,他们想把性欲方面的事像其他方面一样来“改变”。

同样,为自由和免费堕胎的斗争并不是处于困境的许多妇女们必须要应答的:这种斗争是作为自由支配身体的斗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来考虑的,正是在这方面赋予了破坏性的效果。问题的症结在于堕胎不能还自由于妇女们的身

^① *Ibid.*

^② *Le Torchon brûlé*, n° 3.

体,而是不管愿意不愿意,求得一种有别于她们生活的另一种生活。在这方面,对那些堕胎者往往是一种痛苦。

但是当时的气氛在今天难以想像的,妇女的表现还受19世纪保守主义的影响,这个观点受到教会、医生和名流的激烈反对。从逻辑上讲,面对社会上的种种压力,女权主义者首先是解脱妇女的罪责。抛开这类难办的问题的落后和反动的部分。

女权主义提出来支持这种基本原则的论据是:妇女的身体应该是属于自己而不是任何别人。任何人也不能决定她们的地位:无论是丈夫、教士或国家……不管是哪些理由促使妇女去堕胎,“她是属于自己而不是国家”。^①自由和免费堕胎的要求,也像避孕要求一样,将这个原则具体化了。

在女人私下堕胎的描述中,这是一种“好像自我一点一点地逃逸”^②一样的感觉,有安全感的堕胎的展示能取代类似描述,这是一种在自己家里,借助卡尔曼(Karman)方法,不用医生,通过吸取方式进行的方法。如果粗暴的堕胎方式得以减轻,这种行为的精神性暴力是隐蔽的。如果人们了解当时保守势力思想有广泛反应的立场的理由,那就不得不承认这种立场并无邪恶效果。

女人按照良好的愿望来安排自己的身体,这样做似乎应优先于其他考虑:这种做法是走向极端,它是将妇女的自由变成不固定的和不负责任的自由,旨在将堕胎的自由变成极端的办法,肯定这是一种出格的办法。这种否定极端的办法虽然否定了痛苦,但却使妇女沉浸在另一种苦恼之中,由于被解除武装,不得不面对一种受创伤的试验。

女人的身体,新的绝对事物?

与革命女权主义截然不同,安托瓦尼特·富克在《精神分析和政治》中鼓动的倾向在这些年里是“注册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大祭司,按照教条主义并不严重的女权主义者说法,这种倾向是在这种无法简化的特性里提示了妇女身体的身价的。因为这是它的基石,并由于它而提高了认识,也因为它是潜在的力量,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另一种关系。“排卵,母体的职能”被认为“是当前惟一能定位的事情,是作为女人能证实其身份的事。”^③《精神分析和政治》将女人的身体界

① Lucinda CISLER,《De l'avortement et de la loi sur l'avortement》,Partisans, n° 54-55, op. cit.

② Manifeste des 343 femmes déclarant avoir avorté, *Le Nouvel Observateur*, avril 1971.

③ 《Avortement-Contraception-Sexualité-Réformisme》, *Le Torchon brûlé*, n° 5.

定为新的绝对体，一种永远受强奸威胁的禁地。

从妇女性自由的观点来看，避孕的好处是被妇女解放运动成员所承认的。尽管如此，她们认为避孕可能有损妇女身体。确实，她们指出：“避孕药在人体内引起完全是人为作用的周期”，而“某些妇女觉得，避孕用具是外界物体。”^① 医生监督还要加上生物职能的干扰以及对身体外在形象的损害，而医生不管是男是女，其职权总被幻想成为男性的，“不管医生真实性别如何，妇科检查使人感觉是强奸”，^②这就不得不承认矛盾：“我们承认避孕的必要，同时，我们靠它过日子就像是一种损害，是侵入、强奸和败坏身体的事。”^③

更为明显的是，那些妇女解放运动成员在承认自由和免费堕胎的必要时，揭示了堕胎越来越普遍的现状，同时很难选择，常酿成死亡。但是反常的是，她们以自己的方式肯定一种全能的逻辑。与革命女权主义相反，妇女身体的“回归”是在一种相异性的激进逻辑中实行的。1974年，安妮·勒克莱尔在她的《女人的话》^④一书中阐述了当女人的幸福，而这种幸福，正是来自“女人之腹”：例假，怀孕，分娩，哺乳，这就像女性的“节庆”。

这本书与稍后出版的《奴隶般的母亲》像是对称的。在快活与母性中，此书庆贺当母亲的幸福。作者以自身的经验，描绘了怀孕的快乐，视生产为“欢愉”，发现这是“兴高采烈的幸福而不是陷于痛苦的泥潭中”。至于哺乳的幸福，也是无可比拟的，这是“完全和美满的幸福”^⑤。如果受孕是在两口之家，那怀孕完全是女性的体验，并带来纯属女人的享受，这种享受与男性模式的享受确实是不同的。

但是，这种状况会导致更极端的观点：直到如今，女性的性欲只不过是男性享受的功能来考虑的，应该发挥一种与以暴力为标志的男性性欲为对跖点的新型性欲。因而精神分析学家吕斯·伊里加雷认为，女性的形象“不应是单一性”^⑥的，它不能按“男性生殖器”的微缩尺度来下定义，而是要按千姿百态快乐的源泉的多样性来下定义。她认为，女性的性欲和性享受是超越直到如今理论上所叙述的内容，这种性欲具有不容置疑的享受源泉——“身体，乳房，耻骨，阴

① Ibid.

② Ibid.

③ Ibid.

④ Annie LECLERC, *Parole de femme*, op. cit.

⑤ Ibid., p. 102.

⑥ Luce IRIGARAY, *Ce sexe qui n'en est pas un*, Minuit, Paris, 1977.

蒂,阴唇,阴户,阴道,子宫颈,子宫”。^①

妇女是作为无意识的形象存在,这种形象在人们只能够在不确定的事物中所能称颂的形象之外:“妇女既不是开放的,也不是封闭的。而是不确定的,无穷尽的,既不是公共游戏,也不是老古董……不可能给某人、某物,一个物体全部什么东西,只是简单地指明……(一个/某个)女人不确定的事物、不可数的事物、不能表明的事物、不可形式化的事物。”^②在享受方面,女人若得到超乎寻常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就是上帝的恩赐。而作为当母亲的女神,她受到外界所难以听懂的语言的崇拜,这是由女教士和行家们操纵的。

女人跟男人一样,总得要死的,万能的青春难以挽回,妇女解放运动标榜女性的身体是没有缺点的一种自我欣赏的形象,藐视年龄、疾病、死亡和衰老。

难以获取的爱情

在妇女解放运动的言辞中,始终包含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而且成为其主宰。在性欲关系方面,个人的单一的经验 and 历史因素是没有什么地位的,这种关系在她们与异性的关系中多少起了搅乱作用。感情的失败和创伤、挫折等等,立即会导致普遍的社会压迫,或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负面影响。这些东西因而很容易一下子就包含有政治和社会意义,至少就能明显地从个人圈子里跳出来。

复杂的感情关系被否认,或降低为纯粹的统治、操纵和束缚的关系。在男女关系中,调戏、欺骗和诱惑是没有任何地位的。这类玩意被认为是虚伪和欺骗的东西,某种意识形态的表达是用于掩盖力量差距和关系的。

在读《着火了》这本杂志时,人们可以自忖我们的父母是怎样把我们生下来的,这样,在男女关系中,什么感情都成为空白了。那些已出版的,使人如芒刺在背的词句给我们留下了在人际关系方面非常残酷和卑劣的画面:女儿受酗酒的父亲殴打,暴力行为,女人不知如何与丈夫及孩子相处,血淋淋的堕胎,令人心碎的悲惨童年,试图自杀……

男女之间的爱情似乎注定要受家长制的诅咒,还有大男子主义,男子汉的统治欲望。有一位妇女运动成员证实说:“有一段时间,‘他们强奸我们’成为会议重复的主题,并加至最大马力:什么政治强奸、道德强奸、言语强奸……怎么

^① Luce IRIGARAY, *Spéculum de l'autre femme*, Minuit, Paris, 1974, p. 289.

^② *Ibid.*, p. 284-285.

会成精神病、性冷淡,或两者兼而有之的病态的。反强奸这个公开的运动不会有像样的成果,也不会构成真正的规模。”^①

男女关系角色混乱,不仅乱七八糟,而且由强权所统治,以至于很难有爱情联系。

提出对爱情不信任的论点者不乏其人。“在家庭中,爱情经常被用作诈骗的手段。”^②让女人乖乖地单独承担家务劳动和孩子的教育任务,这也是以爱情的名义,这就使“几代的妇女在男人的阴影中在他们的财产(孩子和文化)中生活或死去。”^③

一切都是陈词滥调和形象的相互反射:“男人从女人身上投射出女人的形象,而女人从男人身上投射出男子汉形象,也就是说权力的形象,男人们创造的女人形象是保证自己的权力的。我们创造的他们的某种形象是通过承认他们的权力以保证其生存。”^④这样一来,事情就非常复杂,人们看不清楚是怎么走出这种镜子游戏。此外,人们能确信在另外一方找到某个人吗?

这个运动的成员们在抛弃所有形象后指出,问题在于“建立一些直到如今还存在的完全不同的关系,这些关系我们敢真正称之为爱情”。^⑤意图是最纯洁的,但是愿望是贪得无厌的,“权力的日常分解”是否有个终结?

在这种经常遭到破坏的逻辑中,真正的时刻总是推迟到不断受到挤压的前景。妇女解放运动的成员说:“我们没有摆脱束缚,我们没有解放,我们正在解放的道路上,只有当我们真正了解了爱情之后才能做到。”^⑥这种事情是很靠不住的。

事实上,在那些最明确的女权主义的问题中,爱情只不过是“身外”之事:“我们要有其他的生活经历,我们才敢爱,我们才可能爱。凡是人类都在找真正的爱情。”^⑦另一种爱情的对象只是作为自己的复制品才能存在。爱情只是熔合的产物,吸收差异,在内部并未分化,其他的视觉似乎是不真实的,因为不怎么强烈,本应该占主导的激情变质了。在异化和有限性范围中,这种纯情的明显欲望能承受别人吗?

① Elisabeth SALVARES,《Auto-itinéraire》, *Mai en héritage*, op. cit., p. 135.

② 《Cause toujours》, *Le Torchon brûle*, n° 4.

③ Cathy,《L'autre bout de la chandelle》, *Les Temps modernes*, n° 333-334, op. cit.

④ Des militantes du MLF, *Le Torchon brûle*, n° 2.

⑤ *Ibid.*

⑥ *Ibid.*

⑦ *Maternité esclave*, op. cit., p. 312.

大家知道同性恋作为一种既定模式,它可以自我陶醉,启动那种极为炽热的融合关系,最早的女权运动者安娜说得好:“在两个女人之间,人们并不是以与另一个女人的区分来裁定其特点的,因为在某些地方,在那种以产生母子关系为特色的融合关系中,这样做是危险的,但是人们还是可以在这里看到被称作爱情关系的神经质似的机制的原初的纯情状态。”^①

但是在爱情关系方面,即使是同性恋关系,也都会挑起紧张、嫉妒和冲突……这些关系都会影响相互间的关系。爱情的联系会显露对另一方的依赖关系,并改变崇高的自我形象。用这个观点看问题,将性欲和感情分开是有好处的:它显然是不承担什么,除了再三地寻找快感以外。然而,这种分开体现一种无法言明的忧愁:与另一个人持久和亲密关系的忧愁会使人揭示这是一种不足,并处于一种依赖状态。根据这种看法,抛弃对持久关系的承诺,增加临时的关系以构成前进过程中的逃避做法。总之,真正无拘束的享受并非不使别人受惠,否则就像食品那样实惠,幻影一样虚幻。

在男女关系中,对压迫和奴役的经常揭发是在拒绝任何联系的背景下发展的,这种联系是践踏无比强大的自我。在全部抛弃老生常谈和所有的美好形象后,一种谁也不依靠的扭曲了的思想确立了。

诱惑力被认为是一种欺骗妇女精神的操纵力量并能“扼杀由此而产生的冲突关系”,重要的是要“拒绝诱惑”^②并保持警惕。人们不愿看男人们目光行事,就像这种目光只是社会上的陈词滥调和占有观念而已,交流目光不能带来任何激情。距离和猜疑应排斥在拒绝力量关系之外:它们是与揭发其弱点的交流有关。妇女解放运动的成员的傲气反映了持不同看法的一代人的傲气。

就像《精神分析和政治》一文所说的那样,享乐本身也牵涉到了,文中说:“享乐伴随着或不伴随着性高潮,它不会将我们从暴力的关系中或从感情的依赖中解放出来,特别是我们承认另一位也会给我们这种乐趣时。”^③这种被饰以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的被扭曲了的意志可以掩盖跌入爱的陷阱中的人的内心恐惧,并且让人们同时感到被自我占有或抛弃的恐惧。在与别人关系中如何去爱,这不是要揭示一种人类欲望中的固有的不满足感吗?

^① Interview d' Anne,《Dossier 1970-1981: que sont les féministes devenues?》, *Le Temps des femmes*, n° 12, été 1981.

^② 《Le rôle du prof》, *Le Torchon brûle*, n° 6.

^③ 《Contraception-Avortement-Sexualité-Réformisme》, *op. cit.*

“死亡的母亲”

“妈妈,把自己解放出来吧,你首先是个女人”——这是游行示威中的口号。它肯定了女人的角色优先于母亲的角色,由于这种提法,直到当时都被认可的、女人做出牺牲、教养孩子的提法就终结了。这种口号是有象征意义的,向生育你们的女人提出的,这就不仅指出完全拒绝社会角色,同时也拒绝认同其形象。这也就像妇女解放运动的年轻女性拒绝承继过去、牺牲无根基无桎梏的自由的欲望一样。

这种自由刚获得,它就在母子关系中“丧失”。这种关系确实能唤起对亲生母亲的感情,并揭示母亲的养育之恩。感恩是一种无法偿还的东西:它表明生活中的允诺,它往往与因循守旧和被视作必要的稚气的和难以忍受的依赖相混同。一位女权主义的诗人在诗中写道:“死亡的母亲是我的生命。”^①这就像与无奈的认同决裂一样。

女权主义者说:“我不愿为我的儿女们牺牲我的生命,就像我母亲所做的那样。”这就是她们同时给母亲或想要孩子的女人的信件,她们不仅又指出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境遇,拒绝扮演母亲的形象,表示了彻底的个人的自主的要求,严格地不听从任何人。一位想生活在“完全解放”状态下的妇女写道:“当我不处于当母亲的地位时,我极为痛恨一切限制我的事情:男人应为这些孩子负责,我因为有了小樊尚而掉过眼泪,我也希望搞掉他,至今我也不爱他……”^②

在大部分文章和宣言中,配偶和孩子都是不能作为坚实基础的。孩子已构成支撑点,大大超过应有作用。在革命女权主义看来,孩子是出现以加强奴役为标志的局势的因素。这是使自己生命发扬光大的阻碍和问题。女权主义者不能承受从属地位及孩子引起的不能自主的地位,以至于将这种地位当成新的束缚的同义词。

这就像有人想孩子一生下来就能成才,将孩子奉为至宝。这也是否认他与亲人首先是母亲的感情联系的另一种方式。要给予孩子自主的呼吁是打着教育孩子态度的旗号和号召理性的幌子。这在事实上是经常掩盖着人们想要太平过日子的愿望。

与革命的女权主义者相反,“精神分析与政治”的成员承认母子之间的感情

① 《Mère-ma-mort》, *Les Temps modernes*, n° 333-334, *op. cit.*

② 《Expérience personnelle》, *Le Torchon brûle*, n° 2.

联系,但是这些成员认为这种感情联系完全是由快感原则支配的,与忠诚和义务是相对立的,那是异化的同义词。孩子只存在于妇女身体中,并参与产生快感。这种快感使得妇女在感官上得到全面的享受。这是作为母亲的妇女从身体中得到的双重的自我享受。

这两种既是抛弃又是融合的态度并不是矛盾的,它表现和经常存在于与孩子的关系中。这种困难的共存关系,这种双重的激情,这种联结母亲和孩子的公开危机时刻会替代这种混合的关系,可能,女孩子会有这样的经历。在这两种情况下,人们就像是不愿孩子存在自己的特性。

孩子的到来标志着生活过渡到另一个阶段,这一阶段要求除自己以外,还要对另一个人负责。更有甚者,要以另一个人为中心。比起自己,孩子更重要;对个人快乐的要求不再是主宰一切的事。为什么那些妇女解放运动的成员会倡导那种毫无束缚的妇女至高无上的权利呢?

《着火了》杂志发表了讲述一个有孩子的家庭主妇的个人经历的文章,她要“不失时机地好好活着”,要满足“魔鬼、慕男性狂、憎恶男性狂”等群体的欲望。有时她是在观望:“在我愿意干的和我不得不抛弃一切逼着我干的之间是有裂痕的,要抛开克洛德和孩子们,这个家庭囚牢是我自己建造的。”^①

她说,她也没法解释这种完全的解放,“对我所爱的人会造成痛苦”,对她所生的孩子们也造成痛苦,她面临选择,而这是她不能解决的,她的处境令人难以忍受:“我到哪儿都窒息,透不过气来,神经紧张……现在,我生活在噩梦中,我在囚笼里吼叫和转圈圈。”

否定负疚的感情、对别人拒绝承担责任而忠于自我,这并不是是一件易于承担的事,尤其是对自己的亲生孩子。“我身上总是因为终生地伤害孩子而伤痕累累,自从我意识到那是我的儿子,他也和朱利安一样温柔,一样是我的骨肉,我作出了很多努力,总觉得欠他一笔难以弥补的感情债。”^②

“完美的罪行”

有一些极端的情况,特别悲惨的事实,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如有些妇女自行决定,与伙伴和女友一起,杀死患先天性愚型病的婴儿。《现代》特刊中公布了妇女们这方面的若干证词,西蒙娜·波伏娃在序言中说:“妇女们坚持在1974

^① Ibid.

^② Ibid.

年4—5月公布一些事实,希望这期专刊有益于给妇女问题并在人们的脑子里为妇女解放斗争制造气氛。”

有人写道,有些妇女公布一些证词,警示别人今天不再干过去干的事,“使得有些人能使用司法等力量阻止刚生下的患先天性愚型病的婴儿心安理得地活下去,而不是使一个要被杀死的孩子活下去,这种孩子是要抛在修会里,他们会变成不正常的父母,与不正常的孩子生活下去”。^①面对这种荒唐的突如其来的生育,妇女是首先受冲击的。与企盼已久的孩子分开是难以忍受的事,“我的心肝宝贝孩子,自从你在我肚子里胎动时,我就等待着你。”^②而真正的孩子就是一种有害的绝对存在物。但一想到身上怀着打上残酷的标记的孩子时,这种想法也是难以忍受的。为什么不想永远抹去这类事件呢?为什么不能理解死亡这种无意义的愿望将沉重地压在新生儿身上呢?这不过是个付诸行动的问题而已。

直接受到指控的是医生们。有的医生不愿说通过羊膜对三四个月的胎儿进行愚型病胎儿检测这种事。其他的医生不让父母作选择,“当他用外科手术办法有99%的把握断定孩子出生后是愚痴儿时”,却使孩子存活下来。当人们求他们打掉孩子时,这些医生溜走了。这些妇女认为这样的医生是不负责任和怯懦的。

在公布的证词中,强调的论据都是为证实杀死孩子的决定没错,这样的孩子将来根本不可能自立。先天性愚型病孩子被认为是“一出生时就是虚弱的‘老头’”,“他们永远不可能没有爸爸和妈妈,这是没有选择余地的”,或者是:“到处都有人被杀,而人们生养一些痴愚的孩子,这种孩子永远不可能起来反抗,为更好的生活而斗争,因为他们一生长下来就完全从属于那些把他们当做负担的人,虽然,他们存活下来了。”^③

这种合理化的做法可能会使人惊讶,但是在确实可信和明显肯定的语调的证词前,也很坦然:“杀死他是和所有的朋友一起决定的,要杀死他是因为他不该活下去。大伙是一起干的,这伙人也很不幸,但确信他们干得对。大伙没犯罪,仅仅是做了必要的选择。”^④

从母爱的角度论证这种行为的动力,人们还可以说得更透一些。早产儿在

^① F.,《Mon petit mongolien, je t'ai tué, nous t'avons tue》, *Les Temps modernes*, n° 333-334, *op. cit.*

^② C., *ibid.*

^③ E., *ibid.*

^④ *Ibid.*

怀孕8个月时就出生了,大多孩子在母体内还可呆两个月,人们可以想像,当几天后做出决定要打掉孩子,可以想像是很难受的事。然而,孩子的母亲告诉我们她并不在意:“相反,这是件好事”,“是的,我的孩子,当我在早产中心的玻璃柜后看着你时,我还是记挂你的,而你以前跟我们在一起时,白天晚上都在你身边,我时刻想到的,对你、对我们、对生活的惟一的爱的行为就是你的死亡,我带着这种爱,下这种决心,心情是宁静的,因为这并不是我孤单一人,而是我们一伙,人数众多,大家想的是同一件事。”^①

证词详细地描绘了一位妇女所想和所干的事,她称此为“完美的罪行”,而应当干这种事的医生会拒绝干这种事或掩饰这类勾当,他想不留痕迹。这种被贴切地称作谋杀的故事是很难站得住脚的。在了解这些办法后,就有在夜间扼杀这种该死的孩子的文章问世:“早晨,孩子还是好好地在襁褓中,到了晚上,孩子哭了几声,而这几声就是最后的哭声。于是人们打开了襁褓,在脸面上盖一块塑料布,紧紧地盖住,而一切都完了。孩子马上就窒息了。”^②

痴愚的孩子由于“爱”而被杀了,由于“尊重”,他永远也不能成为“自立”的人。人们能否扯得更远一些,这类感情联系、标榜人性的关键问题能否神圣地决定人能活下去的权利呢?

证词中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一种公开的伤痕,对妇女处境的社会和政治上的考虑也不可能由此得出结论,“为这类事情,我们能做什么?”^③

运动成员的痛苦和合理要求

这种极端的情况幸好并不代表正在为解放而斗争的妇女实践和她们的思想。余下的问题即孩子的问题往往是很难解决的。在夫妻配偶之间,不稳定的感情关系还要加上运动带来的过激主义。事实上,肯定妇女的自主会因孩子的出现而受到限制,这个问题与极左派宣言是背道而驰的,这不是自立的问题而是要求关心和爱护,由于没有父亲,问题就更微妙了。

1977年,《红色报》(革命共产主义同盟机关报)发表了《一个女盟员给10岁女儿的信》,信中表达了当母亲的难处,发挥了当时女盟员对孩子采取的态度中合理的想法,这在持不同政见年代是十分流行的。

① C., *ibid.*

② F., *ibid.*

③ *Ibid.*

这里,当女人和当母亲这两者的矛盾体现在对战斗精神和孩子对母亲的爱之间难以取舍上:“今晚,当我再次向你道晚安时,你抱紧了长毛绒兔子问我:‘妈妈,今晚你还出去吗?’在你的问题中,在你的举动中,我看出每天你需要更多的爱,还有我没法给你更多的安全感。”^①

对这种要求,答复也是很明显的,她会以“妇女对妇女”那种长篇的解释对这个10岁的小女孩进行解释,这种解释还包括母亲的不安与不在家的父亲的争执,还有为了未来社会的正义斗争。

母亲还要向女儿解释,她本人和她的父亲过去如何相爱,很快,她感到受骗:在工作中,生育给她带来麻烦,并将她封闭在家庭的圈子里,对女儿的爱里面还掺杂有怨恨。……作为一个好的成员还得解释她的政治觉醒:“我知道从孩提时起,人们再三地教导我们需要爱情(那时我们是男孩或女孩),而当时的社会也不会让人们得到满足:这个社会的不安全感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人们进行盘剥。”^②女儿得掌握有决定意义的观点:“你应该明白,并不是我要剥夺对你的爱,而是这个社会劫走了我们俩的爱。”这也许是母亲给女儿又是给自己的信件的基本观点。

这天晚上,当母亲单独阅读这封信时,她已经为女儿准备了另一个社会的到来:“‘爱’这个字不再是狭隘的欺骗,将我们卡在小圈子里或为自私自利辩解,而是一个意义广泛的现实。”^③以后,当女儿长大后,她会懂得这个道理。听着:“今天,你看到吗,在办公室和家务之间,我一天的工作日是12小时。而我还得为了战斗,还得出门,我明知道你得孤单地一个人呆着。”^④

战斗的精神向孩子提供了这样一种关系,人们要摆脱对自己生活的侵犯。在这种状况下,孩子是否会感到自己是多余的,出生到这个世界上来是罪孽深重的呢?

① 《Lettre d'une militante à sa fille de dix ans》, *Rouge*, n° 435, août 1977.

② *Ibid.*

③ *Ibid.*

④ *Ibid.*

二十一、反精神病学和对疯癫的颂扬：“超越善与恶”

1968年5月后的若干年内，还有一个领域备受争议——精神病学和疯癫与精神异常的定位问题。在这一领域进行的斗争使人们广泛了解到精神病院里治疗精神病人的丑恶做法，对不符合当时的精神规范的人所采取的镇压和消灭的做法以及囚犯的拘押条件等等。这些斗争有助于人们换一种眼光看待疯癫、“精神失常”和犯罪。面对根深蒂固的伦理和信念，这些斗争要强调指出个人和集体生活中不容低估的“野蛮一面”。因此，受到攻击的恰恰是对常理和社会准则所抱的教条与僵化的观念。

从批判传统精神病学的新潮流来说，一些国家所进行的替代式试验起了先驱的作用，如：英国精神病学家戴维·库珀、罗纳尔德·赖恩、意大利的弗朗西斯科·巴扎格里亚、法国拉博尔德诊所的让·乌里和弗利克斯·加塔里等人所做的试验。这些试验各自以自己的方式主张精神病院要对外开放，建立新型的医患关系，探索精神病机构的新型运作模式，设立医生、护士和患者参加，每个人都可自由发言的大会制度。1968年5月后有关这类试验故事的文章和出版物层出不穷。

两部关键性的著作成为这个领域的旗手：米歇尔·福柯的《古代疯癫史》，吉勒·德勒兹和弗利克斯·加塔里的《反俄狄浦斯》^①。

《古代疯癫史》于1961年出版。书中的独到见解建立在大量研究的基础之

^① 俄狄浦斯，希腊神话中拉伊俄斯与伊俄卡斯忒之子，先被遗弃，后杀父娶母，真相大白时弄瞎自己双眼。俄狄浦斯成为恋母的代名词。——译者

上,加上其文字优美,因此受到普遍赞赏。福柯从事的是史学家和认识论学者的工作,对所谓科学的论述和知识,所谓临床的实践和精神病院的规章制度等一一加以分析。他的著作彻底摆脱了简单化的疯癫病治疗史观,这种观点曾被视为理性与科学的进步。他阐明了对精神病在认识上和治疗上的依赖性,更广泛地说,就是揭示了自古至今在对待精神异常者和疯癫病者方面那些见不得人的、令人难以容忍的种种做法。1968年5月后,该书走出了只供大学研究的狭窄范围,被成千上万大学生带着激进的眼光阅读。他们挥舞着此书,以证明不仅对精神病学,而且对所有学问和现行体制的否定都是正当合理的。

在性的解放派方面,出版于1972年的《反俄狄浦斯》很快变成了一种信条。弗利克斯·加塔里是一名精神病学家,积极参加博尔德(卢瓦-谢尔省)诊所的试验。该诊所是让·乌里创建的,目的是要否定传统的精神病学实践。吉勒·德勒兹是哲学家,当时任教于持异议者的圣地—樊森纳实验大学。两位作者冲击了弗洛伊德派的许多精神分析前提。面对恋母情节和阉割的教条,面对雅克·拉康^①众多信徒的故弄玄虚和卖弄学问,《反俄狄浦斯》对许多人来说是一股真正的新鲜空气。

这几位作者成了持异议运动的支持者和同盟军。他们投入反镇压的斗争,支持被判刑和被监禁的活动分子。福柯、德勒兹同其他一些知识分子^②一起创建了关于监狱的新闻小组,揭露监狱里见不得人的条件。他们支持反对精神病机构的斗争和监狱中囚徒的造反……总的来说,这些知识分子表现出对持不同政见运动的深切关心。

极左运动从这些作者身上为他们的破坏性疯狂行为汲取了营养并把他们的思想加以歪曲,简化为几句口号。但这些作者对极左运动也不仅仅是一种影响。极左派把政权和镇压妖魔化,对所有社会机构展开系统的批判,在各个领域号召无节制的造反,这些都能从作者那里找到理论依据。而且,作者们也与极左运动勾勾搭搭,眉目传情,为它极具破坏性的实践和言论进行辩护。

在1968年5月以后的几年里,对各种反抗行动的赞扬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正常人”和“病态人”之间的界线消失了,疯癫成为社会压制真理的象征。根据这种逻辑,一切“荒诞”的言行和各式各样的违规行为都是正当的了;疯人、精神异常者和无法融入社会的人都被拔高成为真实性和叛逆精神的典型。

^① 雅克·拉康(1901—1981),法国医生,精神分析家。——译者

^② 这些知识分子中有让·玛利·多梅纳克和皮埃尔·维达尔·纳凯。

米歇尔·福柯与“大监禁”

福柯认为,把疯癫定性为精神病、精神病院的实践、精神病学的诞生和发展,这些都是对疯癫患者实行社会排斥,它与对人进行驯化和正常化是同步产生的。这一运动与现代理性的出现是相伴而行的,是把疯癫推入完全的相异性之中。以中立和科学面目出现的精神病学实际上充满着伦理主义,其诞生和发展与精神病院的建立是密不可分的,这种精神病院是具有完善的强制的惩罚制度的全封闭空间:“一切都安排得使疯人能够知道自己处在一个被四面包围的世界中。他会知道自己受到监视、审判并被定罪。犯错误必须像众所周知的罪行那样与惩罚明显地联系在一起。”^①被社会排斥并被关押在精神病院的疯人被视为精神错乱的人,他要忍受精神病医生的权威,这些医生由于其学问高深莫测而变成了“魔法师”。

这种精神病院大墙里的压迫是隐蔽的,是在制约正常人际关系的公法之外实施的:“归功于皮内尔^②的那种实证主义时代的精神病院并不是进行观察、诊断和治疗的自由场所,而是一个司法场所,人们在那里受到指控、审讯和判决,而只有当心灵深处对这种官司有了领悟,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忏悔才能得到解脱。疯癫者在精神病院里受到惩罚,尽管他在院外是完全无辜的。疯癫者将长期——至少直到今天——囚禁在精神世界里。”^③

精神病学既然把疯人视为精神错乱者,也就把这一论点塞进了将疯人置于异己地位的法典。福柯写道:“在精神病的透明世界中,现代人不再与疯子沟通了。”^④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以来,所有欧洲社会的特点都是排斥和禁闭疯人,在现在社会中,似乎一切都要使疯癫成为另类。精神分析虽然可以“解决某些形式的疯癫,但还不是对无理性进行自主治疗。”^⑤

还有一些诗人和作家提供了光芒四射的证明:荷尔德林、奈瓦尔、阿尔托,

① Michel FOUCAULT, *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 Union générale d'édition, Paris, 1970, p. 278.

② 皮内尔(1745—1826),法国医生现代精神病学的奠基人。

③ 同①, p. 281.

④ *Ibid.*, p. 9.

⑤ *Ibid.*, p. 291.

还有哲学家尼采、画家凡·高^①等等。他们都遭遇了疯癫并最终沉没于斯。他们证明了现代世界的无理性，他们要“用自己的力量反抗这个庞大的精神监狱”。^②

福柯对疯癫历史的解读虽然从总体上说来是光芒四射的，但也并不完全顺理成章。不难看出，现代社会对疯癫的看法有所倒退，因为它忽略了临床治疗中的情绪矛盾与效果。在《人的精神实践》^③一书中，马塞尔·戈射和格拉迪·斯旺就指出了福柯解读中的许多缺点和漏洞。福柯把“大临禁”定位于古典时代，这就经不起事实的检验。这两位作者认为，精神病院作为一种机构的确诞生于法国大革命后的1800年。现代社会与疯癫的关系要与民主纲领中人人平等的思想联系起来看。从这个角度看，现代社会与疯癫的关系正与福柯的论断相反，它并非被逻辑混乱所主导，而是与平等思想相联系的一种整合。虽然医治疯癫的实证主义含有对个人实施权力和控制的想法，但这种方案是与整合的意志相关联的，而不是出于对疯癫的排斥。这种方案失败了，但它产生的效果是“使疯癫变得不像原来那样另类了”。^④与福柯的理论相反，戈塞和斯旺指出，在现代社会中疯人会被看做是另一个自我，而不是完全另类。社会不得不承认疯癫是人类命运的组成部分，但同时又与它保持距离。大监禁和排斥的思想是一种太简单化的解释，但却正是这种思想被极左运动大加援引，推至极端并加以通俗化。

反俄狄浦斯或对潜意识的推崇

德勒兹和加塔里在《反俄狄浦斯》中指责精神分析“阉割”潜意识并参与对欲的压制。作者告诉我们，根据精神分析家的观点，性行为应限制在家庭内部，并把性行为贬为“肮脏的小秘密”。臭名昭著的恋母情结压制了性行为并使之产生罪恶感。性行为变成“家庭化的欲”和替代资本主义的宗教。

^① 荷尔德林(1770—1843)，德国浪漫主义诗人；奈瓦尔(1808—1855)，法国作家；阿尔托(1896—1948)，法国作家、戏剧家；尼采(1844—1948)，德国哲学家；凡·高(1853—1890)，荷兰画家，自杀身亡。——译者

^② 同上页^⑤。

^③ Marcel GAUCHET et Gladys SWAIN, *La Pratique de l'esprit humain. L'institution asilaire et la révolution démocratique*, Gallimard, Paris, 1980.

^④ Marcel GAUCHET, «À la recherche d'une autre histoire de la folie», Gladys SWAIN, in *Dialogue avec l'insensé*, Gallimard, Paris, 1994, p. XXXVII.

精神分析家和潜意识“家庭化”，并使自己成为引人瞩目的潜意识代言。他成了各种思想的大师，把患者的言论用自己的筛子加以过滤，把他们言论中所有出格的成分都排除干净。微乎其微的结巴和言语偏差都会被看成是很说明问题的表征。

作者指出，与拉康所言相反，作为相异性的潜意识并不具备语言结构。它是一个混乱的世界，在那里，情感的冲动、嗅觉和视觉的表现在一片混乱中共处。潜意识和性欲不表示任何东西，也不意味着任何东西，它们是标志“人与自然共存性”的一种纯能量。潜意识是“欲的机房”，受冲动能量的调节，因此它既不会死，也不会否定。根据第一本体论的原理，潜意识形成的原因就是它自身，除了它自身没有任何别的含义：“它既不是想像的，也不是表意的，它是自身的实在、‘无奈的实在’和实在的产物。”^①潜意识是纯粹欲的机器，精神分析家不能妄言自己能成为它的主人。

精神分析家没有能力说清疯癫。精神分裂症对任何浅薄的解释和任何治疗都没有反应，它不属于恋母情结的范畴：“任何妄想首先都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种族和种族主义、教育、宗教因素造成的：妄想狂把他自己完全无法控制的妄想施加于他的家庭和儿子。”^②当弗洛伊德隐约见到潜意识的“大洋”时，他最终还是“在这个野蛮生产和充满爆炸性的欲的世界面前退却了”。^③

在潜在的颠覆性面前，精神分析选择了后退，而《反俄狄浦斯》却要将它发挥得淋漓尽致，即从根本上直面疯癫、潜意识和相异性，既然“潜意识”不说明什么，为什么还要为它寻找什么意义呢？面对那些认为潜意识可解读的观点，倒应该提出一个惟一值得提的问题：“怎么个解读法？”

《反俄狄浦斯》推翻了弗洛伊德的名言：“Wo es war, soll ich werden（‘这’在哪里，‘我’就在哪里）”，代之以对“这”进行辩解。弗洛伊德自己也曾指出：“这”就是“我们人格中阴暗的、不可及的部分”，只能把它命名为“混沌”或比做“充满沸水的小锅”^④……对精神分析的批判所涉及的正是它与理性思维和文化有关联的部分。

《反俄狄浦斯》否定了使我们觉得潜意识能说明问题的那些表演和语言。

① Gilles DELEUZE et Félix GUATTARI, *L'Anti-Œdipe*, op. cit., p. 62.

② *Ibid.*, p. 326.

③ *Ibid.*, p. 64.

④ Sigmund FREUD, *Nouvelles conférences d'introduction à la psychanalyse*, Gallimard, coll. «Folio», Paris, 1991, p. 102.

它要以纯粹的冲动能量为武器,推翻一切“欲的语义学”^①。精神分裂的分析注定要取代精神分析。《反俄狄浦斯》声称精神分裂分析能够直达“无表象无表意的潜意识”^②,到达“多产的、分子的、微分子的和微心理的潜意识,这种潜意识不再有任何含义,也不代表任何东西”^③。但事实是,精神分裂分析也在不停地谈着潜意识。

以下观点受到断然否定:除非陷入疯癫,否则就不可能直达潜意识;而潜意识的表现要有一个逻辑推理符号化和表意化的过程。《反俄狄浦斯》的观点是纯功能主义的。但它无意中却使它所质疑的论断变得有效了:它声言要把潜意识和欲从一切表现和含义中解放出来,但恰恰是透过它所做的解释和它要赋予潜意识以社会和政治颠覆性意义这一点,可以看出那是不可能的。作者声称:“我们认为潜意识没有任何含义,也没有语言。”^④但他们却在不停地写和谈潜意识,充当潜意识的代言人,把潜意识视为欲的机器。

《反俄狄浦斯》的存在本身也证明了要逃避有含义的世界是不可能的,即便是要通过破坏它来逃避。潜意识和俗的世界被定位在“善与恶之外”,而且没有任何含义。该书的两位作者引述皮埃尔·克洛索夫斯基所写的关于尼采的一本书:“当有一天人类知道以不带任何意图的方式表现自己时——因为在人类层面上,任何意图都要长期并持续存在的——这一天,一种新的造物将宣告存在的完整性。”^⑤

有欲的新人必须同时摆脱一切负罪感,也不能有微弱的赋予欲以意义的念头。他要直达“最近的、多产的潜意识”,同时不害怕直面自身固有的疯癫,就像尼采笔下的琐罗亚斯德^⑥走向超人一样。以这种眼光来看,并非人人都要面对疯癫和灵魂的混乱,只有精神分裂者、轻罪惯犯、边缘人以及另类的艺术家和革命活动分子有可能涉足于此。有“真正的欲”的新人之外还有大批胆小怕事、一无所有的人,他们对自己抱有幻想,力图使自己不再顾虑重重。这批人是不断再生的法西斯主义后备军。

① Paul RICOEUR, *De l'interprétation. Essai sur Freud*, Seuil, Paris, 1965, p. 16.

② Gilles DELEUZE, Félix GUATTARI, *L'Anti-Œdipe*, op. cit., p. 421.

③ *Ibid.*, p. 216.

④ Félix GUATTARI, 《Sur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entretien Gilles Deleuze-Félix Guattari, *L'Arc*, n°49, 2^e trimestre 1972.

⑤ Pierre KLOSSOWSKI, *Nietzsche et le cercle vicieux*, cité dans *L'Anti-Œdipe*, op. cit., p. 441.

⑥ 琐罗亚斯德(前628—前551),又译查拉图斯特拉,伊朗宗教改革家。——译者

反实用人文主义

1972年,德勒兹和福柯在发表于《弓》杂志上的一次谈话中阐述了他们对政权和知识分子在五月运动后的作用的想法。

知识分子必须反对一切权力,站在斗争者一边。德勒兹认为“理论的本质是反对(专制)权力的”^①。根据当时的斗争情况理论只能是多元的,像一个“工具箱”,可以为这样或那样的斗争服务,但并不因此而自称代表主要当事人或从他们的斗争中分析出这样或那样的意义。德勒兹声称,知识分子不能再认为自己是“立体”或是“别人的代表和良知的代表”。他强调了福柯在这个问题上的贡献:他是第一个指出“不配代表别人讲话”的人。

知识分子不能自称代表一个社会阶级和少数被压迫的人说话。但遭到质疑的不仅有列宁主义式的先锋派观点,而且为培养自主判断能力带来必要知识的启蒙思想也被认为是陈腐的了。由于忍受权力并投身斗争的人对压迫有更直接的认识,所以知识分子没有必要献出他们的知识和分析。福柯声称:“群众不需要靠他们获取知识;群众比他们了解得更全面、更清楚、更好;群众会很好地把这一点告诉他们。”

因此,需要的是与权力进行斗争,以便把群众的言论和自发的认识释放出来。从此,除工运中心主义外,又多了一项颇受推崇的主张,即反对任何准则,推崇所有代表反准则的人。福柯解释说:“当囚徒开始讲话时,他们有自己的一套关于监狱、刑罚和法律的理论。”

革命运动是“多源头”的,它的活力来自对各种权力和定型知识的异议。革命运动的一致性并非来自外部的规划,而是因为每个特定领域所开展的斗争都会遭遇成系统的权力。因此,对每个特定领域的批判都是整体批判的一部分,从而也就具有革命意义。

福柯认为,“妇女、囚犯、部队里的士兵、医院里的患者、同性恋者”各自在特定的领域进行着“反抗他们所承受的权力、压迫和控制的特殊斗争”。然而,由于他们拒绝任何妥协,所以每一项特殊的斗争便成为整体斗争的一部分:“正是权力的系统化和实施方式导致斗争的普遍化。”

在此情况下来谈改革是不可能的。德勒兹认为,那些自称有代表性又替别

^① Gilles DELEUZE, 《Les intellectuels et le pouvoir》, entretien Michel Foucault-Gilles Deleuze, *Loc. cit.*

人说话的人所提出的改革只不过是“一场权力的安排和分配加上变本加厉的镇压”。而当直接的当事人提出这样或那样的改革时，“那就不再是改革，而是革命行动，是通过局部的行动而否定全部的权力和等级制度。”德勒兹就是按这个思路把监狱的造反延伸到幼儿园：“如果孩子们能够在幼儿园里让人们听到他们的抗议或提出的问题，这就足以在整个教育系统引起爆炸。”

在1971年《现代》杂志与中学生的一次谈话中^①，福柯详细说明了他们对当时斗争的看法和他赋予这些斗争的意义：除阶级斗争外，还有对“老的人道主义传统基础的破坏，这个基础是社会组织得以维系的保障”。

“文化进攻”与《反俄狄浦斯》的激进主张相吻合：取消一切性禁忌、性限制和性保留；实行群居生活，取消对毒品的禁止；取消为了塑造和保持标准个性而设的禁令和封锁^②。监狱信息小组不能只满足于揭露法国监狱中剥夺人权的行为。福柯认为，信息小组除了既定的具体目标外，还应“对‘无辜与有罪的区分’提出质疑，要‘消除无辜与有罪之间的严格界限’。对权力关系的批判应进行到底：“我们要向制度发起进攻，直击它区别善与恶、无辜与有罪的简单而基本的意识形态。”

在《古代疯癫史》中，福柯为尼采和阿尔托重新赋予疯癫者言论权和公民权而喝彩，认为他们的事业不会与疯癫混为一谈，因为疯癫划定了外沿界线，越过这个界线就是“绝对的决裂”。然而他们的事业仍不免要与疯癫发生冲突。这些经验到那时为止还只是在艺术和文学中得到反映，但不也体现了新型的斗争实践吗？难道对现代世界的异议不应当恢复到“原始野蛮”^③的状态吗？

不再害怕妄想与欲念

在《反俄狄浦斯》中，作者对颠覆性作了全面的分解式的阐述，使疯癫像炼丹咒语一样具有诱惑力。一个精神分裂者的语言、情感和举止是颠三倒四的，但远非人们所认为的那样脱离现实。“精神分裂是最接近现实脉搏的，其跳动的强度能达到与现实难分上下的程度。”^④

活动分子必须承认革命是出于欲而不是出于义务。精神分裂者虽然不等

① 《Par-delà le bien et le mal》，*Actuel*，n° 14，novembre 1971。

② *Ibid.*

③ Michel FOUCAULT，*Histoire de la folie*，*op. cit.*，p. 296。

④ Gilles DELEUZE，Félix GUATTARI，*L'Anti-Œdipe*，*op. cit.*，p. 104。

于革命者,但精神分裂的过程是颠覆性的:“什么是精神分裂者?他首先是一个不能再忍受‘这一切’——金钱、证券交易所[尼金斯基(nijinsky)说那是死亡的力量]、价值、道德、祖国、宗教和过时的信念——的人。”^①

“社会的深处是妄想”:承认这一点并把它移到经济、社会和政治建设中去,就等于指出社会的空虚并破坏现存社会秩序的基础。精神分裂的过程是“革命的潜在力量”^②,对活动分子、艺术家和分析家来说,重要的是要把自己的线路接到这个机器设备上去,并随着这个过程“分流出来”,因为这个过程会炸毁一切隔断,分解一切统一的外形。

为避免可能的混淆,必须说明一点:作者告诉我们,必须区分“毒品的力量”和吸毒者,区别精神分裂的“过程”和“医院里的精神分裂者”,目的是“截取毒品的力量而不被毒害”^③,抓住精神分裂的过程而不变成疯子。这件事情似乎做起来并不困难,不会有挫折和损失。这不是在与极限调情又不必付出焦虑和痛苦的代价吗?

德勒兹的一个年轻崇拜者责备他只利用而不分担别人的疯癫和边缘化,他回答说:“关于我与鸡奸者、酗酒者和吸毒者的关系问题,我要说的是:如果我能用别的方法给自己带来与他们类似的效果,他们又能怎么样呢?……既然我谈到毒品时会像小鸟一样快乐,为什么要不谈毒品又不受其害呢?为什么每当我对某件事情发表一个论点——即使这个论点是实在的和显而易见的——总要问我是以何名义呢?毒品有时会使人产生妄想,我为什么就不能对毒品产生妄想呢?……有保留地进行试验的论点是反动的坏论点。《反俄狄浦斯》中我最喜爱的一句话是:不,我们从未见过精神分裂者。”^④

然而,有关疯癫、毒品和一切形式的异常的报告不是单纯的审美问题,而是要在革命运动中起作用。作者补充说:“关于负责任或不负责任的问题,我们不懂这些概念,那是警察或法庭的精神分析概念。”^⑤德勒兹和吉塔里要把欲变成颠覆社会秩序的机器。

拉康的解读受到质疑。拉康的解释是将欲与匮乏相联系,是上帝和天道决定的。这样,他就重新引进了欲永无满足、欲会使人有永久罪恶感的思想,这实

① *Ibid.*, p. 408.

② *Ibid.*

③ 《Sur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entretien Gilles Deleuze-Félix Guattari, *loc. cit.*

④ Gilles DELEUZE, 《Lettre à Michel Cressole》, in Michel CRESSOLE, *Deleuze*, Éditions universitaires, Paris, 1973, p. 117-118.

⑤ 《Sur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entretien Gilles Deleuze-Félix Guattari, *loc. cit.*

际上是宗教思想的替代。而《反俄狄浦斯》的作者则持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欲不是匮乏,而是一种充分、完全的实证性^①,它是“孤儿、无政府主义者和无宗教信仰者”,它“无目的地活着”,自己表达自己的力量。欲灌溉着社会,但社会要对它的“势”加以限制,以便于豢养;或者把它的自由泛滥加以疏导,引入沟渠,使它服从于“反动的、法西斯化的妄想极”。因此,要处处与阻挠它的现象作斗争,以便它能实现其颠覆的效果:“欲不是‘想’革命,它本身就是革命的,而且是无意识地要它想要的东西。”^②

欲没有祖国,也不可分公与私,不区别不同的领域。它要冲毁现存的一切权力和限制,要扰乱“妄想的白日梦”:“不,我不是你们一类的,我身在外面,在异国他乡,‘我是所有人种中的下等种,是禽兽、黑鬼’^③。”欲是多形态的,没有任何统一的模样,它是“惟一”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它瓦解社会的躯体,把它撕成碎片,到处开展“分子式的革命”,直到最终摧垮整个制度。虽然社会能够承受利益的表达,但却承受不了欲的表现,因为欲的表现会破坏社会的基础结构,瓦解一切完整的形态。

在《不适与文明》中,弗洛伊德把情欲视为统一的聚合力,并把死的冲动看做它的对立面。《反俄狄浦斯》的作者们认为,冲动的双重性导致“生命被抵消并受折磨”^④。如果推翻了弗洛伊德的观点,那么把社会瓦解和碾成碎片就不是死的冲动的表现,而是欲的完整、全面的表达,是自我满足的欲的积极表现。

超现实主义与反文化:一副双面镜

对欲的颂扬与革命发生矛盾自五月运动前已开始,超现实主义者们认为他们最先发现了情欲的颠覆力。他们期待精神分析学做出“超过传达员的功绩”。^⑤然而,安德烈·勃勒东^⑥在维也纳拜访了弗洛伊德教授后却大失所望:在一间装饰着寓意浅薄的雕塑的候见室等待后,他见到一位“毫无风度的小老头,

① 实证性,是法国哲学家、实证主义创始人孔德(1798—1857)的用语。——译者

② Gilles DELEUZE, Félix GUATTARI, *L'Anti-Œdipe*, op. cit., p. 138.

③ *Ibid.*, p. 125.

④ *Ibid.*, p. 398.

⑤ André BRETON, *Nadja*, Le Livre de poche, Paris, 1969, p. 27.

⑥ 安德烈·勃勒东(1896—1966),法国作家,超现实主义理论家。——译者

在他可怜的社区医生办公室里接待客人”^①。尽管勃勒东做了很大努力，谈话还是平平庸庸。而弗洛伊德不明白为什么超现实主义把他奉为“神圣的祖师爷”，他差点儿没把他们当做一群疯子。

超现实主义继承兰波^②的事业，主张让“各种感觉长期、广泛而合理地放纵”。他们要探索潜意识、疯癫和幻觉的种种状态。于是，他们便同样遭遇可怕的内心矛盾，即分别由勃勒东和阿尔托代表的两极。

虽然勃勒东的内心并非没有失望，但“改变生活”仍然跟幸福与美的想法紧密相联。潜意识固然有着令人担忧的相异性，但它可以通过艺术与美而变得顺从。勃勒东的思想里，世界和他自身可以和解，因为他把自身拉回了童年的美好世界。这种前景的动力来自对生活的渴望和情欲带来的兴奋感。情爱和革命是密不可分的：“就是叛逆。也只有叛逆才能制造光明。而这种光明只有通过三条道路才能达到：诗歌、自由和情爱。这些将会启发同样的热情，并共同把这种热情酿成永葆青春的美酒。”^③

然而，超现实主义也有另一个侧面，那是以阿尔托为代表的、与勃勒东截然相反的一面。阿尔托写道：“我与超现实主义者的分歧在于：他们有多么热爱生活，我就有多么鄙视生活。”^④他认为，超现实主义的革命思想是与“瓦解生活的权力密不可分的”^⑤。阿尔托的生存狂热与他难以解脱的苦恼和痛苦相行不悖。他的苦恼好比“骨髓的凝固、精神之火的匮乏、生命循环的失灵”^⑥；他的痛苦是“冷淡和无形的，没有感情，如同难以名状的分娩阵痛”^⑦。

这个“没有器官的虚无缥缈的东西”被“反俄狄浦斯”利用后，便变成欲的机器的正面、典型形象，再也找不到苦恼的痕迹和“死亡的疲惫”。^⑧虽然在五月运动后超现实主义仍然还会被提及，但这是把我们送回与自我毁灭的狂热相连的那一面。所不同的（而且不是微小的不同）是，这个欲的解放运动是对痛苦和悲

① André BRETON, 《Interview du professeur Freud》, *Les Pas perdus*, Gallimard, coll. 《Idéess》, Paris, 1970, p. 99-100.

② 兰波(1854—1891), 法国诗人, 作品有《醉舟》、《地狱一季》。——译者

③ André BRETON, *Arcane 17*, Union générale d'édition, Paris, 1970, p. 121.

④ Antonin ARTAUD, 《À la grande nuit ou le bluff surréaliste》, *L'Ombilic des Limbes, suivi de Le Pèse-nerfs et autres textes*, Gallimard, Paris, 1968, p. 228.

⑤ Cité dans les *Œuvres complètes* d'André Breton, tome 1, Gallimard, Paris, 1988, p. 1689.

⑥ Antonin ARTAUD, *L'Ombilic des Limbes, suivi de Le Pèse-nerfs et autres textes*, op. cit., p. 74.

⑦ *Ibid.*, p. 75.

⑧ *Ibid.*, p. 62.

剧的否定。

阿尔托被文化左倾思潮视为崇尚妄想和颠覆的先行者，是疯人和精神失常者的榜样。这是廉价的恭维，实际上否定了阿尔托无法解脱的痛苦，仿佛是把它消毒后再投进自称革命的事业。

超现实主义运动声称要结束艺术与生活相脱节的状况，也主张反文学和反艺术，但又没少出作品。这些作品的出现并不证明他的这种论断的失败，而是一种实际的文化创作。这种创作与那些简单化的说法相反，是通过精心劳动而产生的。因此，他们的著作与画作不是简单地把他们的梦想抄录下来，不管这些梦想是不是白日做梦。阿尔托不断地使用一种令人近乎窒息、焦心和惊叫的语言。尽管他说“一切文字都是令人作呕的东西”，但他自己并没有因此而少写富丽堂皇的文字。

德勒兹和加塔里写道：“阿尔托之所以取得文学上的成就，恰恰因为他是精神分裂者，而不是因为他不是精神分裂者。”^①当他们写这句话时，忽略了使阿尔托成为作家和开拓型诗人的创作过程（而且他们似乎忘记了绝大多数精神分裂者并不都是阿尔托们，大多数精神分裂者只有与创作毫无关系的焦虑和痛苦）。他们这样做的结果是使五月运动后的反潮流合理化，尽管他们并不情愿。

另一位可诅咒的文学作者乔治·巴塔耶也是人们常常提起并表赞同的，这同样掩盖了潮流的逆转。因为巴塔耶的观点是：违禁行为丝毫不意味着要取消禁令；禁令决定快乐，同时也谴责快乐，违禁与苦恼密不可分。既然人们声称要取消一切禁令和限制；那么越轨和违禁的概念还有什么意义呢？无休止的违抗导致违抗的动力日益枯竭。情欲和肉欲堕落于寡廉鲜耻和淫荡。巴塔耶写道：“那些长期生活在混乱中的人只能体验到精疲力竭的片刻。”^②激进的文化批判运动瞄准的是一种“不可能的政治”，^③但又不承认办不到，反而要争取全面、完整地实现它。

反精神病学——是一场解放斗争吗？

最激进的反精神病学斗士们认为，疯人是资本主义社会镇压和奴役的受害

① Gilles DELEUZE, Félix GUATTARI, *L'Anti-Œdipe. op. cit.*, p. 160.

② Georges BATAILLE, *L'Érotisme*, Union générale d'édition, Paris, 1970, p. 266.

③ Jean-Michel BESNIER, *La Politique de l'impossible. L'intellectuel entre révolte et engagement*, La Découverte, Paris, 1988.

者。他们组织了一些委员会和小组，在公共场合公开揭露一些见不得人的做法。但大多数人并不满足于这类救星式的批评，而是要彻底改变现状，即要解救疯人，使他们免受社会之害，因为社会既要对他们的病负责，又对他们进行镇压。任何对疯人的禁闭都是武断的，必须“砸烂疯人院的大墙”，重新给疯人以发言权。解放疯人的斗争是解放全体被压迫者的一部分。他们反对把正常人和病态人从本质上对立起来，甚至完全否认二者的区别。有些“反精神病学”的试验颇具解放斗争的风格。加塔里援引英国的试验写道：“在霍尔(Kingsley Hall)，人们忘记了并力图忘记病人、精神病学家、护士等之间的角色分工。谁也没有权力提供或接受指示、开出药方……霍尔将成为一个主流健康的解放区，一个反文化运动的根据地。”^①

极端主义者认为改革是不可能的，因为改革只能再生他们要毁坏的体制。疯人院信息小组称：“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并不存在什么好的、与资产阶级精神病学相对立的左派精神病学，好的机构，好的部门或者什么好的医院，好的精神病学家或反精神病学家，好的或坏的护士，只是在镇压、排斥、愚弄、褫夺和疯癫治疗推广中的程度不同而已。”^②把精神分析治疗法分散到街区被指责为“对百姓实行精神控制”，是“精神真正失常的警察”。^③

更笼统一点说，精神病学是“整个社会正在形成的一种态度和过程的表现形式”。^④一切旨在制订和执行某种准则的行为都被戴上镇压和排斥的帽子，一切机构都被怀疑是为了对人实施压迫的权力，一切知识都被指责是为这种镇压和排斥行为服务的。

在那一片混乱的时期，人们对强制行为和滥用镇静剂也横加指责，把一切都混为一谈。革命和反资本主义的高谈阔论有时近乎妄想症：“镇静剂吗，那是等级社会的化学成果，相当于自由主义所允许的惯性凝固汽油弹和细菌战。镇静剂，那是在临床上资本主义自我毁灭的倾向，因为资本主义已无法容纳它自己创造的生产力了。被镇静剂安了神的人就是中层公民的化身，他们像资产阶级梦寐以求的那样在化学作用下静坐在电视机前。镇静剂就是慢性死亡专家

① Félix GUATTARI, 《Mary Barnes ou l'Œdipe antipsychiatrique》, *La Révolution moléculaire*, Union générale d'édition, Paris, 1977, p. 241.

② Groupe information asiles (GIA), in Alain JAUBERT, Jean-Claude SALOMON, Ian SEGAL, Nathalie WEIL, *Guide de la France des luttes*, Stock, Paris, 1974, p. 371.

③ 《La politique de secteur》, *Liver-journal: contre la psychiatrie*, *L'Idiot international*, n° 10, septembre 1970.

④ 《L'âge de la grande manipulation》, *ibid.*

把意识形态诊断强加于人的现代技术。”^①

他们说要破坏

《反俄狄浦斯》有它自己的逻辑，如同所有著作一样，它也主张各种观点进行理智的交锋和辩论。1968年以后的极左派从该书中汲取一些提法以证明自己行为的正确性。极端的反文化运动将破坏的逻辑发展到极致。它要干脆取消文化，以利于主观意识、情感和“亲身体验”毫无约束地发展。

文化是全面镇压的组成部分，甚至是使欲罪恶化和驯服化的社会机制的中心因素。文化变成镇压和法制的同义词，对人的精神和肉体打上社会的标记。公民和有教养的人成了被镇压、被驯养的因循守旧者。“文化机器”是个性的粉碎机，因而必须予以拆除。

千万不要再上当：貌似公允和宽宏的思想不就是统治欲潜意识的产物吗？五月运动后的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圣徒把一切言论、著作和行动都简单地归结为潜意识的冲动或阶级立场的作用，强调心理和社会的调节功能最终使责任感变得毫无意义。一切有见地的论述都可能被列入谎言的范畴，被说成是为了掩盖个人的权力欲、意识形态和不愿暴露的政治立场。

学术思想的辩论于是很快变成人与人的争吵，变成权术、意识形态或政治立场之争，脱离了他们要研究的观念问题。对别人的意图横加指责和怀疑一切被树为批判的榜样，其结果往往是在真实性的外衣下，无知和蠢话占了上风。

极端主义开辟了一个幻觉的世界，在那里一切都成为可能。它否定现实世界与极乐世界的区别，只讲毫无限制的快乐，把“缺少享受”的责任推给社会和世界；镇压和社会禁忌被认为是取得完全幸福的惟一障碍。社会不满足于从根本上压制欲念而且要把这种压制内在化。这样，对革命的兴趣便可与潜意识的反动态度相行不悖，这就是为什么在欲的战线上工人阶级总是显得那么沉默。

既然欲到处受到压制，那就要求撕掉所有假面具，从内心深处驱走那些极合理、极博学的论点，把欲解放出来。要真实，就要敢于面对欲，不再害怕完全自由地把内心的混乱表达出来。

极端主义要全盘否定人文主义传统，抛弃一切生活的价值观，毋论其所依托的是宗教、哲学、道德、社会还是历史。以各种形式鼓吹违禁和颠覆，就能释放出毫无罪恶感的“破坏性能量”。文化从创造到废除的过程被推向极端，通过

^① Gérard HOF, *Je ne serai plus psychiatre*, Stock, Paris, 1976, p. 162-163.

与欲的结合产生了机遇剧^①和心理剧,产生了对精神异常和边缘化的崇拜。1968年后的反文化要求以妄想和挑衅、混乱和无结局作为创作的可靠标志。

从与极限调情到虚无主义大流行

这个时期所发生的变化是意味深长的。从50年代的摇滚乐到70年代的流行音乐,标志着“眩晕文化”的诞生,其特点是放大容量、使用并赞美毒品、在狂欢节上聚集大量人群,不间断地闹腾数日^②。

60年代自由爵士乐的出现和发展是一种与极限的调情,在大学生持不同政见运动中产生了影响。当时的自由爵士乐与美国出现的“黑人权力”运动密不可分,那时正是一体化的希望让位于冲突的时期。自由爵士乐也是彻底挑战传统表达方式的楷模。

虽然爵士乐在演奏过程中给予即兴发挥以中心位置,但它并非单纯、直观地宣泄情绪,而是对“亲历的时刻进行美的升华”^③。即兴表演要在正式的框架内进行,有一个主题,但可以或多或少地离开主题。早在二次大战末期,萨克斯演奏家查理·派克就开始脱开限制他的框架进行即兴表演。有了自由爵士乐,自发性和情绪便可从一切正式框架中解放出来。情绪激动的表达接近于呼吸声和叫喊。

一些音乐家(如 John Colthiane, Archie Schepp)和一些乐队(如芝加哥艺术团)也在玩擦边球,稍过一点儿,音乐就变成乱哄哄的音响。但只要守住这条线,在有意义的框架内保持一连串音符,生活的激情即可在美妙的乐章中得到表达。但情况并非如此,“自由爵士乐是那些企图掩盖其音乐失误的人的圣餐”^④。反文化可轻松地通过自由爵士乐来证明有一种艺术光靠“体验”是不够的。

1968年后的反文化拒绝创作媒介,推崇深刻的、富有创造性和鲜为人知的“自我”天价。让-弗朗索瓦·比佐的小说《社会边缘人》中的一个人物说得好:“音乐在你身上,但不是你的。……当人们开始回忆音阶时,记忆便开始混乱,

① 机遇剧:原出美国的一种戏剧,要求观众积极参与,演员随着偶然发生的事件随意发挥。——译者

② Paul YONNET,《Rock pop, punk, Masques et vertiges du peuple adolescent》, *Jeux, modes et masses*, 1945-1985, Gallimard, Paris, 1985, p. 161.

③ Michel-Claude JALARD, *Le Jazz est-il encore possible?*, Parenthèses, Marseille, 1986, p. 38.

④ Jean WAGNER, *Le Guide du jazz*, Syros, Paris, 1992, p. 192 (nouvelle édition: 1998).

有失去印象的危险。”^①

在文化意义上,持异议运动重新找回了一种文学和艺术的传统,那就是拒绝社会和文化规定的准则。它以此作为颠覆既定秩序的武器,目的是使艺术不再脱离生活。但如此一来,它使艺术变得面目全非、庸俗化,导致荒谬和混乱。

五月运动结束后的几年里,破坏的念头充满力量和能动性。随着岁月的推移,这种念头蜕变成消沉的虚无主义:对违抗的推崇被庸俗化了,最后以无果告终。漫画式的滑稽可笑的造反艺术的一再重复变成了群众性的商业运作和广告,已沦为做挑衅性鬼脸的反文化不断地出现在公众场合、视听媒体和所有“可及”的场所。

^① Jean-François BIZOT, *Les Déclassés*, Sagittaire, Paris, 1976, p. 349.

二十二、学校：新的思想大师

中小学和大学的制度自然是70年代初持不同政见者的另一个主要攻击目标。有一批批判性的著作成为他们的参考书。皮埃尔·布尔迪厄和让-克洛德·帕斯隆在《继承者》^①(1964)和《复制》^②(1970)中所作的分析经常被引用。同样还有克里斯蒂安·博德洛和罗歇·埃斯塔布莱的《法国的资产阶级学校》^③(1971)。

这些分析完全不同意把学校局限在培养共和理想之中，而不考虑学校制度的运转。他们以各自的方式表示要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这在理论上颇具权威性。极左势力从这些分析中大量吸取养分，把它们模式化，赋予其具有颠覆性的现实意义。这大大超乎作者的初衷。

在绝对自由主义派方面，伊万·伊利什的著作（特别是《无学校的社会》^④，1971）和英国教育家亚历山德尔·斯·内伊的《夏丘的自由孩子们》^⑤（1970）成为关键的参考书。后者取得惊人的成就：它被定期重印，发行量超过40万册。这些著作对学校体制和传统权威的基础提出质疑，倡导教育者、学生、家长和孩子在学校和文化方面建立新型关系。

① Pierre BOURDIEU et Jean-Claude PASSERON, *Les Héritiers. Les étudiants et la culture*, Minituit, Paris, 1964.

② Pierre BOURDEU et Jean-Claude PASSEON, *La Reproduction*, Minituit, Paris, 1970.

③ Christian BAUDELLOT, Roger ESTABLET, *L'Ecole capitaliste en France*, François Maspero, Paris, 1971.

④ Ivan ILLICH, *Une Société sans école*, Seuil, Paris, 1971.

⑤ Alexander S. NEILL, *Libres en fans de Summerhill*, François Maspero, Paris, 1970.

这些问题就是对学校展开批判的思想基础,这些思想在去除其颠覆性的一面后也会在极左圈子之外被接受。在教育与儿童的关系方面,绝对自由主义已成为今天的一项平常遗产,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很少有人对此提出疑问。这些思想将渗透到新生的中间阶层的精神世界中,并可能成为主流思想。

1968年以来,在文化危机的背景下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教学改革,这是值得注意的。除了如何使共和国的学校适应形势的变化外,办学的原则本身也受到质疑。

不平等的学校

在《继承者》一书中,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和帕斯隆强调指出了家庭传承的文化遗产在复制不平等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学校与它所标榜的理想相反,把机会的不平等合法化、长久化,因为教育制度的要求和标准起着不利于弱势群体的作用。

在《复制》一书中,两位作者将整个教育机制一一加以审视:教与学的关系、考试、文凭、语言实践等。他们认为这些都使学校制造不平等的功能合理化并加以掩饰。虽然教育工作是在中立和非暴力的名义下进行,但它在一种无形的力量对比基础上把一些东西合法地强加于人^①。教育工作“作为有形压力的替代物”,所起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教育工作的规矩、方法和具体部署,包括教室的安排等等,都能“使学生保持距离、毕恭毕敬”^②。根据他们的分析,测验和会考都是淘汰和选拔的机制,使文化遗产得以复制和合法化,从而使既定的秩序得以复制并合法化。在这些机制中,与社会出身相关联的语言所掌握和应用起着关键作用。

学校被看做“合法文化的机构”,把这种文化强加于人,不断进行悄悄的灌输,使优越的人“不显出自己的优越”,“使不幸的人相信他们在学校里和社会上的命运是由于自己缺少天赋和长处”^③。这种解释产生了巨大反响。

但两位作者只限于摆事实和对鲜为人知的机制加以分析。他们警告说,别把他们的著作当做教条来阅读,以免产生误解,以至于“将摆事实当成辩解和揭

① Pierre BOURDIEU et Jean-Claude PASSERON, *La Reproduction*, *op. cit.*, p. 51.

② *Ibid.*, p. 135.

③ *Ibid.*, p. 253.

露”^①。但他们的分析中仍有不少模棱两可的地方,让五月运动后的极左派忙于对其进行判断。

共和国学校的基础是中立和独立的原则,但现在这一原则被认为是复制体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为这一原则的作用恰恰是通过复杂的机制把学校的复制功能掩盖起来,从而使学校对现行秩序的运转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因如此,学校中立和独立的原则应当抛弃。

这一严谨的分析把学校为实现其最终目的所规定的一些原则也纳入幻想的范畴。这些原则是:与不平等现象作斗争,给公民以同等的机会,实现不分社会、政治和宗教信仰的民族团结。这些原则是一段历史的成果,但可能有不同的解读和实践。然而,这些原则毕竟可以起调节的作用,使学校免受意识形态、特定信仰和压力集团的控制。把学校的中立和独立原则简单地看成是意识形态的幻想,这等于打开了一个缺口,使激进的持不同政见的派别趋之若鹜。

1968年后的运动还可以从《复制》一书中找支持他们的权力观和镇压观的因素。一切权力和依附权力的关系都具有统治的特点。^②权威的原则必然要求老师与学生的关系是不对称的,并意味着必须默认一方对另一方具有优势。这一原则受到质疑。同样,如果在学问和能力方面有不平等现象也会受到批判。在那个总是把《继承者》和《复制》挂在嘴上的年代,教师们该怎么办呢?

这些著作丝毫不利于提高教学的兴趣,正如社会学家亨利·芒德拉指出:“如果学校只能‘复制’这个社会,那么教育的大部分使命便失去意义。对于一般都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1968年的年轻极左分子来说,学校教育资产阶级的子弟使之再成为资产阶级,那是不会令人精神振奋的。”^③

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蒂塞尔对学校的分析在极左大学群体中具有广泛的影响。他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意识形态机器》^④(1970)一文在其信徒眼中是对丰富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大贡献。

但阿尔蒂塞尔却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提出了疑问。他认为虽然国家的确

① *Ibid.*, p. 10.

② Pierre BOUROIEU et Jean-Claude PASSERON, *La Reproduction*, *op. cit.*, p. 18.

③ Henri MENDRAS, *Comment devenir sociologue. Souvenirs d'un vieux mandarin*, Actes Sud, Arles, 1995, p. 185-186.

④ Louis ALTHUSSER, «Idéologie et appareil idéologique d'État», *La Pensée*, n°151, juin 1970.

是一部镇压机器,但还要加上一个新的“概念”: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是通过特殊的公共和私立机构的形式来体现的。“区别国家意识机器与国家(镇压)机器的是以下带根本性的不同点:国家镇压机器的运转靠的是暴力,而国家意识机器是‘靠意识形态运作’的。”^①他说明:实际上二者也并非截然分开:镇压机器主要是镇压功能,意识形态功能次之,而意识机器则是相反的。

阿尔蒂塞尔描绘的两部国家机器图和相应的机制和机构图助长了极左派把政权妖魔化的倾向。政府、行政机关、军队、警察、法院、监狱都属于国家镇压机器;属于意识形态机器的有各种教堂、学校制度、家庭、司法、政治、工会、新闻媒体(报纸、电视、电台等)以及文化体育机构。与镇压机器不同的是,意识形态机器领域的阶级斗争更加激烈,因为统治阶级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强迫人接受其意识形态。五月运动后开展的几次对学校 and 大学的冲击似乎证实了这一观点。

学校在传播和使人屈从主流意识形态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它简直可以取代教堂而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意识机器。相对于其他机制和机构,学校拥有一个优势:“没有任何一种国家意识机器能在这么多年中拥有强制的听众(而这是最起码的、免费的):7天中有5—6天,每天8小时,而且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全部儿童。然而,学生们学到的一些本领全都裹上了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外衣,从而也就复制出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即被剥削者对剥削者、剥削者对被剥削者的关系。”^②

资本主义学校

社会学家博德洛和埃斯塔布莱认为他们的著作《法国的资本主义学校》是阿尔蒂塞尔分析的延伸。与后者不同的是,他们并不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面。他们对学校的分析是在大量调查和对资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做出的。有关青年人的价值取向、学习历程、教学内容和实践等方面的统计数字显示:由于劳动者社会分工的不同和学校内部的阶级差异,青年人历程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别。

该书的分析反对学校对所有人实行同样的教学和为每个人提供取得最高级职务的同等机会。分析还显示,学校分为两支主要的网状教学系列:一是“初级一职业”系列,其出路是体力劳动;另一个是“高级中学”系列,其前途是指挥、

① *Ibid.*

② *Ibid.*

管理、教学和研究工作。这两个系列都事先安排和决定不同的课程进度和在社会劳动分工中的目标。两个系列在招生、教学内容和培养目标方面各不相同，互不关联。

两位作者认为，社会劳动的分工、职务、能力和资格的区分只有与阶级的区分和“生产中和狭义生产以外对劳动的剥削”^①相联系才能充分说明问题。“归根到底”，人就这样被分成“或在被剥削者一边，或在剥削者一边”^②。一边是剥削或失业，另一边是对“资产阶级权力及其残余进行分配”和充当“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积极代言人”的角色。作者认为，不要再在共和理想与实际情况的落差问题上绕圈子，而应考虑学校运转的“真实”基础，即“社会分成两个对立的阶级和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③。

在作者们描绘的资本主义学校图景中，一切都脱离不了意识形态和统治。资产阶级特有的社会天地和语言处处可见，从而剥夺了被剥削阶级的孩子了解他们自己处境的手段。于是，一切都能说明问题：“当45%的工人家庭去‘度假’时（但很少到海滨去），学校就用图像教导说：‘孩子们在海滨游泳。’注意：这里用的是‘度假’（Vacances），而不是带薪假期（Congé）。”^④就连扫盲也被视为“意识形态的工具”和进行“分化”的手段，是为了制造好学生和坏学生。

文学和艺术作为宗教和道德的特殊载体在意识形态灌输中起着头等主要的作用。拉丁文教学受到特别严厉的批判，因为它把“资产阶级使用”的语法规则和道德训词强加于人，伪造一个脱离生活的天地，要求进行“有监督的教育”，损害儿童的自发性，使学校成为自我封闭的世界……这种批判也同样指向经典著作的教学：“统治阶级需要这样的文学汇编来加强其意识形态的统一，他们从这种文学中认识自我并使自己有别于被统治阶级，以便于他们的统治。资产阶级的灵魂通过拉辛^⑤和马拉梅^⑥来体现。”^⑦广义上的文化本身就不是一个自在的概念，要重新对它负起责任不还是停在“最传统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⑧阶段吗？

① Christian BAUDELLOT, Roger ESTABLET, *L'École capitaliste en France*, op. cit., p. 119-120.

② *Ibid.*, p. 120.

③ *Ibid.*, p. 8.

④ *Ibid.*, p. 212.

⑤ 拉辛(1639—1699)，法国悲剧诗人，古典主义的主要代表。——译者

⑥ 马拉梅(1842—1898)，法国象征派诗人。——译者

⑦ 同④，p. 217.

⑧ *Ibid.*, p. 150-151.

学校里的阶级斗争

《法国的资本主义学校》一书提出了几个替代方案,建议教学内容应向社会问题开放。一位被树为楷模的教师围绕这一问题所做的试验意味深长。

这位马克思主义的教师向学生介绍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他决定从现实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入手教授地理和历史。他提出一个问题,“无产阶级出身”的学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证明他的方针是对的。这个问题是:“你认为学习历史和地理有用吗?”

答案不少,而且都是朝着有利于他的方向回答的:学生们不仅拒绝死记硬背,而且拒绝学习自然地理和古代史。更有甚者,多数人的答案表明,他们对现实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作者评论说:“学生们实际上是在历史和地理课中进行甄别、挑选,区分‘他们不屑一顾’的东西和感兴趣的东西,因为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在今天,历史就是政治,他们明天需要这种历史,这种历史将会成为他们的武器。”^①

面对人们的鄙视,弱势青年的造反可能以不守纪律的粗暴形式出现。博洛和埃斯塔布莱把这看成“阶级本能”的表现,尽管这种本能还很模糊和不足,但不失为反抗资本主义学校的萌芽。从这一角度去看问题,使用淫秽、色情的垃圾语言被诠释为对“书写工整的法文”的逆反^②;毁坏文物和打砸是对蔑视的回击^③;“阶级本能”和缺乏教养,甚至违法犯罪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然而,也有一个切中要害的论点被提了出来:“制造违法分子、培养流氓无产者、向教院输送人员这些还不是学校机器所犯罪行中最小的一部分。”^④

学校机器变成要对违法犯罪现象负责的一方,那么,信奉《法国资本主义学校》的教师们要如何面对呢?学校和社会制度受害者的或然判断有可能被弱势青年接过去,作为他们不遵纪守法及至搞暴力的借口。教师们则可以在一种新形式下通过镜子效应重新看到他们中许多人曾经播下的思想,这使他们陷入尴尬境地而难以胜任自己的角色。如果不来个大转变,他们便只能再使用简单而草率的方法。实际上这两种态度是可以共存的。

① *Ibid.*, p. 189.

② *Ibid.*, p. 180.

③ *Ibid.*, p184.

④ *Ibid.*

阶级斗争和革命总有一天不再成为时髦,但学校中立和独立思想将会永存并传递给持异议一代的后人。别的意识形态将会以学校向社会开放和“有权保持差异”的名义接过接力棒。许多博德洛和埃斯塔布莱的老读者一方面对教学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色彩持强烈的批判态度,另一方面却依然把自己的孩子送进最好的资本主义学校。

伊万·伊利什的无学校社会

绝对自由主义和生态主义派除了援引社会学的著作外,还从其他否定学校体制的观点中得到启发。伊万·伊利什的“无学校社会”乌托邦是他们的信条。除去其极端激进的观点后,这种乌托邦思想甚至能给倡导终身教育的人以启迪。

伊利什曾是纽约一个贫困社区里的牧师,后任波多黎各天主教大学副校长。他于60年代初在墨西哥的库埃尔纳瓦卡创建一所大学,以推行他独特的培养人才方法,并就经常性教育的新路子进行研究。

伊利什从这样一个事实出发:政府用于解决学校不平等问题的资助计划业已失败。美国联邦政府拨出大量经费用于实施对弱势青年的教育计划,但未获得令人信服的成果。拉美和其他贫穷国家仍在推行这一模式。伊利什根据自己的经验认为,如果继续把大量资金投入庞大的计划并把计划交给传统的学校机构实施是不可能解决教育方面的不平等问题的。

这一模式造成的后果与预期的目标背道而驰,根本不适合于青年和弱势成年人:“无论是在北方还是在南方,学校都无法做到平等。相反,学校存在的本身就足以让穷人泄气,使他们无力掌握自己的教育。”^①伊利什从这一观点出发,试图采取一些替代的解决办法。正是这一点使他的方案受到1968年5月后在教育方面寻找替代办法的人的关注。

但伊利什的主张不仅针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困难处境,也不仅关系到富有国家大城市中弱势社区的青年,它一出现就显示出其普遍价值,并对工业社会的“学校意识”提出异议。伊利什要与不平等作斗争,要保证人人都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这一点得到了认可。但他的“社会无学校化”计划仍然不能叫人放心。他关于经常性教育的建议并不是作为学校机构的补充,而是要取消学校机构,并且证明可以不要学校。

^① Ivan ILLICH, *Une Société sans école*, op. op. cit., p. 22.

最激进的持异议者可以从伊利什的著作中找到证明他们排斥学校的理由和他们并不陌生的世界观：“学校已变成现代化了的无产阶级的世界性宗教，它向技术时代的穷人许下空头的救世语言。国家和民族采纳了这一宗教，把全体公民收入其中，强迫他们加入以文凭为标志的渐进教育纲领。这不是要我们恢复入教仪式和昔日的等级制度吗？现代国家有义务通过反‘田野学校’^①加强其教育者的权威，并将毕业文凭作为必不可少的手段。”^②对学校所持的这种看法较之极左派的模式论和极端主义毫不逊色，是对工业社会进行全面批判的一部分。因为工业社会要求其成员要“有纪律、专业化”，并“无条件地忠于经济增长的意识形态”^③。伊利什认为现代社会使个人处于完全依附于机构的状态。由于入学是义务的，并由机构进行负责，升学的念头本身就是与要求解放的初衷背道而驰的。事实上，升学的念头隐藏着一个“秘密的意愿”和“计划”，那就是：“通过实施这一计划，使公民相信科学知识会使官僚机构提高效率的神论。”^④

学校被视为一项工业，知识是商品，由变得越来越没独立性的人生产并消费。学校是一部散发预制的知识和文凭的机器，是一种宗教礼仪，其目的是造就适应现状的人。学校是“操纵者”，是“要让我们相信我们需要现在这种社会的广告代理”^⑤；是“一种生产方式，制造能融入一切都有计划的世界中的人”^⑥。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切学校，不论是大的还是小的，穷国的还是富国的，也不论其政治制度是“法西斯的、民主的还是社会主义的”，统统都是一回事^⑦。

因此，个人从最年轻的时代起便失去了所有自主的意志：学校把我们“困难”，“把我们挟持”，灭掉我们一切自由的希望。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明白要想得到自由，除了“从学校解放出来”没有别的出路。光靠改变老师和家长的态度、采取新的教育方法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所有这些要求都只是为了改善“学校化的社会”，而不是摆脱“升学的传统意识”^⑧。

如果不敢批判根深蒂固的“相信强制就学的必要性”的思想，从而把教育托付给学校机构，那就什么也无法改变。必须跳出社会及其学校为我们设的陷

① 田野学校，指法国16世纪私设在田野里的学校。——译者

② Ivan ILLICH, *Une Société sans école*, op. cit., p. 27.

③ *Ibid.*, p. 115.

④ *Ibid.*, p. 126.

⑤ *Ibid.*, p. 185.

⑥ *Ibid.*, p. 180.

⑦ *Ibid.*, p. 126.

⑧ *Ibid.*, p. 112.

阱,因为学校要我们相信不能没有它。个人的觉醒会导致与社会主流价值的决裂,实现“我们个人责任的非学校化”,我们每个人都应从中汲取必要的力量^①。要敢于使教育和社会“非学校化”,想出新的办法,以便使教育成为关乎社会整体的事业。

错误的论据

伴随这种批判的还有一份我们今天并不陌生的说明书。伊利什认为,学校体制的失败是显而易见的:“难道我们不是被迫承认强制入学和平等升学的理想是无法实现的吗?哪怕是在经济上。”^②学校体制封闭式运行并处于垄断地位,这为教师创造了就业机会但却不要他们报账,它和卫生体制一样是财政上的一个无底洞:“学校的预算无度地膨胀,比学生人数和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得还快。”^③然而,尽管经济方面的论据不容忽视,但还不是最主要的。在伊利什看来,“教育非学校化”首先是要使个人从机构的控制中解放出来,因为这些机构代替我们规定自己的需求,损害我们的自主和直接同他人建立联系的能力。

为了使人相信他的替代方案有根有据,伊利什提出一个在教育界广为人知的论据:学校并非获得知识的惟一场所。他以举证的口吻对我们说,只要稍动脑子想一想,人们就不得不承认自己真正学到的东西与教学大纲关系不大。能真正学到东西的地方通常是在校外,在自己经历事情的过程中,学习语言、阅读、获取知识也可以在家庭里、工作中和在同他人的各种接触中进行。因此,为什么不充分考虑这些不被学校体制承认的教育方式并给予各种支持呢?

最后,为什么要把教育局限于人生的某个阶段?新型的经常性教育同样可以提供给孩子们,而孩子们也就不会被视为“特殊的一类人”:“只要学校体制消失,便可以不再因为照顾一个年龄段而损害其他年龄段。”^④

“知识网”与“教育结构”

因此,需要创造一些办法使学习能够在“有所发现”、“亲手试验”和“高朋满

① Ivan ILLICH, *Une Société sans école*, op. cit., p. 85.

② *Ibid.*, p. 24.

③ *Ibid.*, p. 25.

④ *Ibid.*, p. 55.

座”的情况下进行；要使每个人都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和需要进行学习，在校外直接与他人接触，互教互学。不再有教学计划，也不再需要到教育机构报到，而是自由地接触一切有教育价值的事物：企业里的技术设备和机器，在公共场所举办有教育意义的展览，设立机动灵活的、能够满足个人需要、很快适应人们要求的知识和交流网络。伊利什指出，在教育目标不再由学校制定的社会里，“知识的市场会有更多样化的选择”^①。

伊利什设想多种“知识网”或服务机构，组成“一种经纬线或教育结构”^②，把“教育工具”交给公众支配，同时也为知识交流服务，形成一个人员、参考资料和知识的网络。

这种看似乌托邦的新型教育涉及两个不同的领域：获得专业技能和文化教育。在专业方面，每个人要得到自己选择的培训，可以拥有一本“护照”或“教育信用卡”^③。专业培训必须摆脱教学大纲的要求，满足个人的需要并以实践为主，专业培训中心要“由其顾客根据效果作出评判”^④。企业本身也可成为教育场所，“由雇主及其团队组成管理班子”。伊利什补充说：“决定在哪里使用其教育信用卡的人日后就有可能在哪里得到一份工作。”^⑤

至于“精神教育”，则必须摆脱“强制出席”，并要“发挥创造性”。创造精神主要不是由内容决定，而是由行动决定。创造精神就是“努力将已获得的知识应用于研究和发明”^⑥，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能遇到平等的合作伙伴，具有共同的兴趣和好奇心，研究同样的问题，以便于交流意见，互相学习。每个人都要把他的知识告诉愿意了解的人，在愿意的时候与他愿意的人进行直接沟通。伊利什认为，教育领域与其他领域一样，要时时处处鼓励人与人之间的直接联系。

伊利什沿着这个思路走到底，设想出一些新的教育职业。伴随教育网络的设立而来的是对“全时学生”实施其权力的“学校老师”的消失。代替他们的是“独立教育者”，他们从事的新职业要有助于个人的自治和人与人之间的自由交往。这些职业的功能是创建网络、指导和帮助网络使用者。“教育行政管理员”的任务是将他们安置到岗位上，使他们发挥作用。教育者帮助和劝导每个人设计自己的“教育路线”，制定自己的计划。最后，还有“教育启蒙人”，其任务是

① *Ibid.*, p. 142.

② *Ibid.*, p. 130.

③ *Ibid.*, p. 33.

④ *Ibid.*

⑤ *Ibid.*, p. 34.

⑥ *Ibid.*, p. 38.

“指明智力试验的道路”，教授批判的艺术。最后，在已空无一人、交给社区管理的学校里，志愿者可以提供服务，把他们愿意教的一切传授给大家。这种教学可以自由参加。伊利什说明：“对‘老师’的报酬可以根据愿意听他课的学生数目而定。”^①

对于这样的设想，作者也反躬自问：学校的消失难道不会导致“被授权在校外对全社会采取行动的教育者洋洋得意”吗？非学校化不会有“使世界受规划教育的管理者统治的危险”^②吗？指引这场教育革命的伦理正好可以起到制约的作用。这场革命所瞄准的目标是值得称道的：将所有可利用的资源交给个人支配，从而使个人能实现自治。有谁能对这样的设想起而攻之？

然而，自治的伦理和要求掩盖不了这项事业所含的破坏性：“结束学校体制”^③带来的后果将是知识的消耗，从此只剩下经常性教育，其任务是满足个人的需求，根据无任何强制性的自由交流模式提供服务。按照这种观念，不是从教育内容上考虑问题，而是在教育资源、在交由个人支配的手段和服务上大做文章。这种观念走下坡路是不可避免的。伊利什提出过一个拥有众多信徒的观点：“实际上，错就错在提出这样的问题：‘想学习的那个人应该拥有什么？他应该与谁建立关系？’”^④

这两个问题的对立把经常性教育引向形式主义。“教育资源”概念回避了教育的目的性和内容，把教育降到仅仅是方法问题和个人在知识与能力网中的经历。在人们的聚会中，教员和受教育者的关系变得松散了。需要不对称性的权威关系也因此被绕过了：老师与学生的关系让位给领津贴者与顾客的关系了。

学校体制结束，消失在众多网络之中，导致许多活动领域也随之消失。这个过程是缓慢的，但后果却令人担忧。伊利什解释说：“社会的无学校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教育和政治之间的区别消失，而这些区别是现代世界和各民族稳定的基础。”^⑤如此一来，大门便向所有哗众取宠的人敞开了。

在伊利什眼里，计算机的普遍应用，信息、知识和能力银行的建立，能力交流俱乐部或由新型教育者主持的经常性论坛的设立，这些都将打破孤独，在大城市中通过会晤、交谈和众多的辩论会使大家庭生活得到恢复。他认为这些活

① *Ibid.*, p. 157.

② *Ibid.*, p. 170.

③ *Ibid.*, p. 11.

④ *Ibid.*, p. 132.

⑤ *Ibid.*, p. 169.

动必然会有“丰富多彩的内容”^①。

但这是值得怀疑的。人们的确可以想像出一种“创造精神”，将自己与众多网络联接起来，在交谈、交流和辩论中发表意见，掌握大量信息，但不一定能说出令人感兴趣的东西。由于没有能力梳理这些信息，只能靠自己去想，因此交锋和辩论只能变成凑热闹了。

伊利什用心良苦，设想了许多新法子，开辟了替代的路子……在这个过程中，他取消了教学与教育、学校与培训、文化与信息之间的区别，否定了义务公共教育的思想。他超前地倡导了自由主义和混乱。今天这些都已在反对不平等的名义下变成家常便饭了。他的“非学校化”计划在 70 年代显得像乌托邦，但今天看来还完全是吗？

夏丘儿童的绿色天堂

对学校的另一种批判来自绝对自由派，同样是对传统的权威模式提出异议，但它是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进行批判的。在这方面，亚历山德尔·斯·内伊的《夏丘的自由孩子们》堪称范本。他要指出的是：“在自由中进行教育”对于儿童是最好的道路。

作者是英国精神病医生和精神分析家，致力于儿童心理的研究，更确切地说是任性顽童的心理。他猛然抨击当时在英国占主流地位的训诫式的死板教育，指出这种教育不顾儿童的情感生活、个性和发展特点，助长儿童的恐惧感和说谎，压制任何一点性表现。成年人把自己的恐惧和忧虑投射到儿童身上，用自己的模式去塑造他们，向他们施加令人难以忍受的压力，目的是使他们在学校和被金钱统治的社会取得成功。内伊要求家长和教育者抛弃成见和禁忌，不断反躬自问。要充分顾及孩子的情感，允许他们充分表达自己的天性，自己进行试验，调动自身的想像力和创造性……作者不限于进行批判和提出一般性原则，而且在夏丘付诸实践，并取得惊人的成果。

这个学校位于伦敦地区的一个村庄里，大约有 40 来个 5 岁到 16 岁的男女生。他们出身于宽裕的家庭（学校是收费的），多数是英国人，还有一部分来自欧洲各国和美国。这些孩子在学习上有很大困难，但并非弱智。

内伊实践着与传统教学方法截然不同的教育。上课是自愿参加的：“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愿望上课或不上课，时间由他们自己控制。有一个时间表，但

^① *Ibid.*, p. 160.

只是为老师制订的。”^①在夏丘,学生们很多时间都在露天度过,下午是自由活动的时间,学生们可以按自己的兴趣搞活动:游戏、散步、小制作等等。但给学生的自由也有一些安全方面的限制:孩子们不得在无监护的情况下游泳,不得在公路上骑自行车……他们按年龄分组和住宿,每个小组都有一个监管员,男女宿舍分开。

这种教育给予游戏、启发性活动、体力劳动(制作铁器、木器和机械……)、看戏、跳舞等活动以主要地位,但原则仍然是任何东西都不强加给孩子们。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个性和发展节奏做主参加某项活动。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在通常的学校要求以外开发学生的智力。在夏丘学习结束后,年轻人可以回或不回到学校系统中去,最后正常地融入社会。

但夏丘的试验要有一定的条件,此外,正如内伊自己指出的:“我们取得成功的都是家庭殷实的年轻人”^②,而且还要家长完全同意这种教育理念。学校只收任性的孩子,其目标更多地是进行社会化和融入化的训练,而不是教学。

然而,在1968年5月以后,这一特殊的试验被许多人看做可以替代学校体制。当时有个记者自问道:“在整个教育体制从链条的一端到另一端、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显得很失败的时代时,为什么这样的积极试验如此罕见呢?”^③

内伊的著作实际上展示了两种教育制度的对立:一是传统的教学,它带有社会所有的一切毛病,另一是“在自由中教育”,它会使每个孩子快乐。一方面有传统的学校,“这是不好的,因为它建立在成人要孩子成为什么、学习什么的概念之上”^④;另一方面是尊重个人意愿和人格的自由教育。自由教育的“基本理念是:学校应为孩子们的需要服务,而不是相反”^⑤。

这样一来,在指导和教育、知识和感情、空虚和快乐之间便产生了对立,围绕此问题的争论陷入了选择的误区:“我宁愿看到我们的学校培养出快乐的清道夫而不是神经质的学者”^⑥;“希腊文、算术和世界史都不会使家庭更加温暖,孩子们要的是不受抑制,家长们要的是不那么神经质”^⑦;“自由、有满足感、不理睬繁杂的分数,这些要比考试和满脸粉刺好得多”。还有:“从来没见过一个自

① Alexander S. NELL, *Libres enfants de Summerhill*, *op. cit.*, p. 22.

② *Ibid.*, p. 64.

③ Madeleine CHAPSAL, *L'Express*, citée en 4^e de couverture, *ibid.*

④ Alexander S. NELL, *Libres enfants de Summerhill*, *op. cit.*, p. 22

⑤ *Ibid.*

⑥ *Ibid.*

⑦ *Ibid.*, p. 93.

由少年幸福的脸上有粉刺。”^①

想通过获取知识和多读文化著作而得到指导、培养和变得聪明，那是不可能的，“只有书呆子才会说可以从书本中得到教诲”^②。心里面的和生活中的学校才是最重要的。在这方面，孩子可以自己进行试验，即使需要有人陪伴，也绝不能受人指导。重要的不是有一个有知识的孩子，而是有一个快乐的孩子，正如今天人们常说的：“身体、脑子都自在。”学校要成为服务于孩子们的需要、以孩子们的发展为目标的教育大家庭。教与学的关系要变成心理化的关系，代替学校老师的是主事人和治疗专家，更确切地说，是可亲的主事人和可爱的治疗专家。

内伊认为学校的天地正在起变化。亲历亲为和感情从此在学校中有它们的地位。人们可以边学边玩：“50年前的口号是：‘边学习边工作’，今天则是：‘边玩边学习’。”^③这样的方针意味着教学和学艺必须真正满足孩子们的需求，如同一个答案要完全符合绝对的主观意志。这种方针是与教育的目的背道而驰的，因为教育的目的恰恰是要转移主观意志，使主体融入文化作品的世界中。这种方针在给儿童自由的名义下导致对主观欲望的崇拜，不利于对客观世界的了解和自主判断能力的培养。

内伊是以良知的名义向我们介绍其观念的：“请问：关于法文、古代史和天晓得还有什么东西的讨论能给我们带来什么？这些题目比起生命的自然完善和人性的充分发展来是分文不值的。”^④有谁敢对人性的充分发展提出抗议？感情代替了理智，无形中起到精神权威的作用。这样，人们便很容易受到操纵。

美妙的国度

作者告诉我们：“夏丘可能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学校了。”^⑤孩子们不用逃学，他们边学习边玩耍。很少发生“想家”的情况，也很少听到他们哭。如有冲突，也不会发展，他们靠对话心平气和地解决……内伊指出，就连老师的办公室也是个令人愉快的地方，与传统学校里教师间充满敌意的情形完全不同。

① *Ibid.*, p. 307.

② *Ibid.*, p. 39.

③ *Ibid.*, p. 41.

④ *Ibid.*, p. 39.

⑤ *Ibid.*, p. 39.

夏丘还有一个“民主形式的自治政府”^①，“没有等级、特权和官僚主义”^②，成人和孩子的权利平等，共同遵守大家通过的纪律。内伊校长也把自己看做是与孩子们“平等”的人：“在大会上，一个6岁孩子投的票与我的票有同等分量。”^③

夏丘不就是众多的68分子梦寐以求的那种没有压力、没有权威、没有等级的理想学校吗？它不就是孩子们实行自治和自理的典范吗？从这个学校出来的人将是“健康的，没有恐惧和仇恨心理的人”^④，他们是自由的，可以过自己希望过的生活，不再有不愉快。谁还能指望有比这更好的呢？谁还能对这些无可争辩的事实和良好的愿望说不呢？

内伊说得好：教育不能无视孩子的发展阶段，如果强行实施一些道德原则而不考虑孩子的发展阶段，那是毫无用处的；甚至要付出使人变得神经质的代价。他直截了当地说：“家长应该表现出耐心，要信任孩子的自然发展不受阻碍和干涉，他就会成为诚实的人。我在夏丘的长期经验使我相信，教导孩子应该如何做绝对是无用的。他会适时懂得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条件是不对他施加任何压力。”^⑤对他的需求和欲望的表达惟一应限制的是：这些不应妨碍别人的自由。

孩子们如此热烈而紧张地生活，在开始阶段应该完全是快乐的，不要再像没有快乐童年的家长那样。也许归根结底这是最重要的。但内伊在向我们描绘夏丘经验时，会不会是向我们讲述一个美丽的故事，使成年人能从中找到自己失去的童年？

解释起来很简单：“儿童自治就是一个娃娃在心理和身体活动不受任何外来压力的情况下自由地生活。”^⑥内伊忽视了还有人际关系的存在以及这种关系对儿童的发展具有的至关重要的意义。他把儿童的天地看成一种封闭式的世界，由天生的内在冲动来引导，只求积极充分地发展。

内伊认为攻击性和仇恨心理是一种次冲动，是由于发展受到阻碍而产生的：“仇恨是被障碍挤偏了的爱。”一切外来的干涉都可能引起逆反和神经质。压制儿童天性的教育塑造出来的“道义之我”是与自我塑造的“自然之我”相对立的。

① *Ibid.*, p. 25.

② Maud MANNON, 《Préface》 à *Libres enfants de Summerhill*, *ibid.*, p. 11.

③ Alexander S. NEILL, *Libres enfants de Summerhill*, *op. cit.*, p. 26.

④ *Ibid.*, p. 21.

⑤ *Ibid.*, p. 225.

⑥ Maud MANNON, 《Préface》, *Libres enfants de Summerhill*, *op. cit.*, p. 10.

绝对自由主义的意识很容易接受这样的设想。儿童的解放被认为是反镇压和反奴役斗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内伊以自己的方式精辟地对自治和压制作了归纳：“压在人类身上的不幸就是外部压力，无论它来自教室、国家抑或老师。这就是法西斯主义。”

因此，只要教育行为和道义准则与一切形式的压制决裂，只要教育“自然地”、和风细雨、潜移默化地进行，就万事大吉了——“学习就是从周围环境获取价值的过程。如果家长们自己是正直诚实、道德高尚的，那么他们的孩子到一定时候也会是如此。”这不正是夏丘的试验已经做到的吗？

的确，孩子们要能自己管理自己，现在在夏丘，将来在生活中要能完全自主地决定自己的行为。要把孩子从“父母和社会的影子”中解脱出来，但谁来填补这影子里的位子呢？夏丘孩子们的态度折射出教育者-治疗专家对他们的期待。《夏丘的自由儿童》中所描写的儿童行为与作者的反传统观念出奇地吻合，只有几个不受欢迎的是例外。当内伊对“夏丘学生对民主的忠诚”、他们的“内在正义感”、他们在判断违规行为中所表现的“宽容”以及他们的“组织能力”表现出兴高采烈时，他到底在庆贺什么？“在教育方面实行自决”^①完全是复制他自己的理念。

权威不再有权威，新型教育者的职责仅仅是陪伴孩子向自治-自主发展。但权威仍然在灌输一个模式，但又不承认是个模式：取代家长和学校老师传统权威的是一个团队的权威，这个团队的“民主运作规则”是一个自称在大会上只享有和孩子们同等分量的教育者制订的。

人们以民主的名义赋予儿童一种新的公民权，把自己作为成人应负的责任推卸给一个集体，从而否认教育者与儿童之间存在不平等关系。这对那些极“任性”的孩子是很不利的，因为他们恰恰最需要大人的帮助并提醒他们什么不许干，界限在哪里。

团队的多数对个人施加的压力和强制力尤为强大。处罚的决定要由大多数通过：“由同学们来施行处罚不会使人感到害怕，若由大人来处罚，就必然会害怕，因为成年人个头大，力气大，令人生畏，他是家长权威的象征。”绝对自由的幻想是和操纵并行的。

如果一个孩子在夏丘偷窃，他就会被“由同学组成的审讯团审判”。据作者说，这些同学不会真正惩罚他，只要求他归还所偷的钱，这是因为“孩子们在潜

^① Alexander S. NEILL, *Libres enfants de Summerhill*, op. cit., p. 59.

意识中懂得偷窃是一种病”^①。团队在大会上对“触犯社会者所采取的惩处措施会被当事人心悦诚服地接受”。但事实确实如此吗？

有一个参观者看到团队对一个违反规则的小女孩进行审判时，他感到害怕。他注意到这个孩子脸上露出的痛苦表情，她因得不到温情而痛苦。这位参观者认为，这些批评不但对她没帮助，反而会使她陷得更深。内伊对他的回答使人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在自由中教育”所采取的压力加开除的方法：“我们曾经试图用温情促使她转变，连续几星期对她进行鼓励，给她温情，对她容忍，而她不但没有反应，反而把我们当做蠢蛋和可随意攻击的靶子。我们不能为一个人而牺牲大家庭。”^②

夏丘的家长们自由吗？

内伊向家长们提出一项令人生畏的建议：“怎样才能给人幸福？请扔下权威，让孩子成为自我。不要老盯着他，不要对他说教，不要刻意栽培，不要强迫他做任何事情。”

这些告诫勉强可以适用于那些老用自己的训诫骚扰孩子、把自己的烦恼转嫁给孩子的父母和教育者。但他是对所有父母说的，所以便给父母加了新的责任：“没有任性的孩子，只有任性的父母。或许应说得更准确些：有的只是任性的人类。”作者告诉我们，现在的家庭充满成见、禁忌、褫夺，压制孩子的生活热情，从摇篮开始就用“反动和仇恨的力量”使他们“麻木”。孩子一出生就被“监禁”，“一开始就被强迫融入这个紧张的社会”，他被塑造、受限制、要服从，他感到压抑。

儿童的自由教育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家长不应该沉默，他们也有权表达自己的意见。当孩子有这样或那样的不适当行为时，他们应当明确表示不赞成。但在任何情况下都应避免说教或指责，因为那会使儿童产生恐惧感和罪恶感，而这是失望和怨恨的根源。父母脑子里应有这样一个可怕的问题：当他们责备孩子时，他们内心深处想要的是什？

一个忧心忡忡的母亲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儿子把钉子钉进家具里去，我该怎么办？”内伊回答说不要发火，把锤子从孩子手上拿开，告诉他家具不是他的财产就行了。他补充说：“如果他又钉，那么，亲爱的太太，你就把家具卖

^① *Ibid.*, p. 218.

^② Alexander S. NEILL, *Libres enfants de Summerhill*, *op. cit.*, p. 61.

掉,用所得的钱带孩子去看看心理医生。他会让你明白你把孩子变成了顽童。”父母们要“不断地自问是否出于统治欲和为了满足塑造人的欲望而对孩子指手画脚。”

在此情况下,自由夫妇之间的关系也变得难以处理了。妒忌产生于占有欲,如何才能摆脱占有欲呢?作者认为,如果真爱对方,为什么一定要占有对方呢?相反,如果爱是真实诚恳的,“男人看到他爱的女人拥抱另一个男人时,他应当高兴才是,因为看到她幸福,他才幸福”。信服夏丘的一些68分子曾试过这样做,但免不了发生私下的厮打。

《夏丘的自由孩子们》提出的教育建议中还有对社会和文明的一般性考虑。面对儿童固有的生命冲动,在世界上散播仇恨的死亡力量也在发展。发达社会和西方文明是“反生命”的,因为它们在做镇压、制造神经质的人和因循守旧者。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需要的是死气沉沉的官僚,每天乘郊区火车的店员和顾客——一句话,这个社会是靠胆小如鼠的保守派肩膀上的”。作者告诉我们,由于这个原因,夏丘的斗争关系到全人类,也就是要说服这个社会它“必须舍弃仇恨、虐待癖和神秘主义”。

教育者—治疗专家变成了预言家:“有朝一日我们会有一个新宗教……有朝一日孩子们不会再接受今天过时的宗教和神话。当新宗教诞生时,它会驳斥人在罪恶中产生的思想,它将歌颂上帝使人快乐。新宗教将拒绝肉体和精神的对立论和肉体的罪恶。新宗教会知道星期天早上去洗浴要比去唱圣歌(好像上帝需要从圣歌中得到满足似的)更神圣。新宗教将在草坪上而不是在天上找到上帝。”^①

父母要关注孩子有一个“健康的灵魂”,注意不让他们感到有罪过:“如果你告诉孩子哪些事情是罪过的,他对生命的热爱将转化成仇恨。”父母还要让孩子摆脱不祥的念头:“我要求父母们向孩子传达一种观念,使他不要一出生就带着罪恶的印记。我要求他们消除一切赎罪的需要,要告诉孩子他生来就是好孩子——而不是坏孩子”;所有父母和所有职业都应服从的命令是——“你要站在孩子一边。”

70年代有数以10万计的人都接受了这些告诫。68分子们以拒绝专制和令人神经高度紧张的教育为由,在自己孩子身上实践这些告诫,但他们并不一定意识到他们是在把一个更能造成不稳定、更令人精神紧张的新框架强加给孩子。新派家长和教育者不愿再承担权威的责任,声称要取消自己令行禁止的作

^① Hannah ARENDT,《La crise de l'éducation》,《La Crise de la culture》,Gallimard,Paris,1972,244.

用,从而把孩子们置于一种无法承受的境地。孩子们要自主,但这种自主不应在对立情绪中或在公开违禁的状态下去培养。他们有可能被抛进只能面对自己的境地,永远在游荡中不停地寻找可为自己定位的事物。阿纳·阿伦特关于教育危机的思考成了热门话题:“权威被大人们废除了,而这只能说明一件事:他们把孩子放在这个世界上,但却拒绝承担世界的责任。”^①

想得到解脱的新派父母要求孩子自治,这既反映了他们想按自己理想化的形象(不欠任何人任何东西)去塑造孩子,也表现了他们对情感依赖关系的否定和推卸对孩子的义务。新派父母和教育者以儿童解放的名义把挽救儿童与社会、父母关系的使命加到孩子们身上——“今天的家长要回答的问题是:你想让我们的孩子像我们一样吗?如果是,那么社会是否还会像现在这个样子:有强奸、性犯罪、不幸的婚姻和神经不正常的儿童?”^②孩子应该是自由和自主的,而持异议的家长们却把他们的恐惧和新的失望转移到孩子们的肩上。儿童既成了家长和社会的受害者,也成为他们的拯救者,因为父母和社会无法对上辈的遗产和他们自己的文化负起责任,他们在自己身上再也找不到互爱的力量。内伊自己也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人们不接受自己,还会接受孩子吗?”夏丘的家长们自由吗?

① Alexander S. NEILL, *Libres enfants de Summerhill*, op. cit., p. 190.

② *Ibid.*, p. 114.

二十三、政治生态主义：一个可作为替代方案的乌托邦

70年代后半期发展起来的政治生态也把教育工作和替代性试验放在中心位置加以考虑，它要借此推行自己的主张，以期在众多领域带来精神面貌的变化。生态主义者摒弃一切强制性的做法，代之以耐心的说服教育（一些有限的灾害帮了这项工作的忙）以唤起生态观念的觉醒。

生态主义者与极左派的区别在于他们的非暴力主张和对群众工作的重视。他们对好战和教条的斗争哲学的批判比女权主义者有过之而无不及。众多与极左派决裂的活动分子逐渐加入他们的队伍，他们从生态主义那里找到一种比为工人阶级和革命事业而牺牲的方式更温和的战斗形式。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进行使人人都能看到自己行动成果的替代性实验，将潜移默化地导致精神状态的转变。这种变化也将使我们社会的共同生活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此，政治生态派也是主张要彻底改造社会的，但他们拒绝任何阶级斗争和暴力。

这种主张是符合1968年后的社会主旋律的，但有了新的诠释。政治生态派突破了工人运动的局限性，从而把对消费社会、权力和奴化的批判加以延伸，开启了左倾运动在文化和政治上的重新整合，并在80年代取得了胜利。

亮相大选

70年代初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此前处于边缘地位的生态主义开始被人认识。1972年6月，联合国关于环境的会议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会议最后声明的第一点称：“任何人都有享受高质量环境的权利，也有为后世保护环境的义务。”

大会通过了保护环境、援助不发达国家的原则并通过第一个行动计划。这一事件在法国除了专业圈子外没有引起多大反响。

然而,同年罗马俱乐部^①的第一份报告发表了。其法文译本的题目是《停止增长!》^②法国左翼和右翼对这份警报性的文件都有许多保留。罗马俱乐部指出,如果不大力改变,世界将在一个世纪内迅速走向灾难:面对人口的增长、食品需求的增加、工业生产及其造成的污染,自然资源却不能无限制地增加。在布鲁塞尔委员会内,芒索尔特同意这些论断。在美国,人们开始议论“零增长”。这份报告对媒体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引发激烈论战。该报告标志着与“二战”后经济增长相联系的习惯性思维方式断然决裂。

1973年在法国发表的罗马俱乐部第二份报告——《未来的战略》^③更具前瞻性。它描述了各种社会演进的情况并提出各种可能的选择。它对未来的展望令人不安:如果人口增长不趋缓,富国不做出反应,饥饿将在第三世界国家蔓延。面对核能所包含的风险,报告的作者们表示反对发展核能源,并提出替代方案:同石油生产国合作,实现煤的气化和液化,未来将开发利用太阳能。这个时期,即1973年中东10月战争后,欧佩克成员国决定大幅度提高石油价格,引发了关于能源危机的大辩论。

关于生态派推出候选人参加1974年总统选举的想法是卢堡电台记者让·卡利耶提出来的。此人从1969年起就一直主持保护瓦努瓦兹公园的运动并参加了“读者与作家保护自然联合会”。在与“地球之友联合会”取得一致意见后,他们推举勒内·杜蒙为候选人。杜蒙是农学家、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问题专家,于1973年出版《乌托邦或死亡》^④一书,成为生态主义者首选的参考读物。

支持杜蒙的各联合会代表在作为竞选总部的巴黎一艘客船上开会,表示要把生态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在公众场合向法国人民解释。杜蒙得到1.22%的选票,即337800张,比“工人斗争”的候选人所得的2.31%还低。这个象征性的候选资格虽然所得票数未达预期效果,但标志着政治生态运动在全国层面上亮相了。

这一创举的确使生态主义者钟爱的课题得以在全国范围内广为人知。他们将迄今只限于狭小专业范围的一些题目提到公众场合进行辩论。他们从环

① 罗马俱乐部,由意大利企业家奥雷利奥·佩奇(Aurelo Pecci)于1968年创建,会集了一些希望对人类未来进行反思的学者和经济学家。

② D. H. MEDDAWS et FORRESTER, *Halte à la croissance!*, Fayard, Paris, 1972.

③ Mihaljo MESAVORIC et Eduard PESTEL, *Stratégie pour demain*, Seuil, Paris, 1974.

④ René DUMONT, *L'Utopie ou la Mort!*, Seuil, Paris, 1973.

境问题谈起,以批判的方式对19世纪以来工业发展的模式提出疑问。

在现代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益被官僚机构变成了间接的关系。这些机构包揽了社会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部门,使个人和地方集体的自治性日益缩小。它们以客观需要的名义作决定,根本不征求主要相关人的意见。生态主义者要求获得更广泛的信息并参加选择和制订关乎现在与未来的方针。

随着科学、技术和工业的发展,人类面临空前的挑战,不仅涉及现在和不远的将来,而且关系到子孙万代。对大自然的损害是全球性的。新技术的发展包含着高风险,关系到生命的繁衍;工业园的财富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贫困并存……工业增长的负面影响从其对自然的破坏、资源的浪费和所含的风险来说,已经达到临界点,越过一步,地球上的生命便受到威胁。“我们要将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留给我们的后代?”这就是生态主义者提出的问题,舆论对此也十分敏感。

但在这方面,为了证明他们对世界和社会的看法和判断是正确的,同样不能只停留在看到一些现象和提出存在的问题。

世界末日就在明天

政治生态派最初对人类现状和前途的展望充满灾难性的黑色观点(见第17章),给现代世界描绘了一幅极其阴暗的图画,与极左派的黑色版本不谋而合。除了不可再生资源的枯竭、环境污染、气候恶化、人口爆炸和世界性饥荒的威胁外,还加上核灾难的危险。人类生活在黑暗的日子里,站在深渊的边缘。至福千年说的信奉者的恐惧成了可信的预言。

生态主义乌托邦与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革命不是一码事。革命是朝着解放迈进的历史趋势与战斗的唯意志主义相结合的产物,而生态乌托邦似乎是要历史“开倒车”。生态主义认为人类面临的抉择不再是社会主义或野蛮状态,而是只能在两个极端之间选择:要么彻底改变我们的生产和消费方式,要么就是眼前或长远的灾难;要么在生态问题上觉醒,要么就是地球上生命的完结。彻底摧毁旧世界的幻想不仅新列宁主义革命派有,而且深深地浸入新兴的政治生态派。

伊万·伊利什是生态主义的主要思想家之一,其著作于70年代初开始在法国发表。在《社交》一书中,他描述了危机不断加剧的过程。在这场危机中,经济的增长将由于“协同作用的瘫痪”而自动停止。哪怕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突发事件都将引发工业生产方式的全面崩溃,并使整个体制的荒谬性暴露无遗。

人民将会突如其来地猛然觉醒。人民将很快对统治机构和危机的管理者失去信心。于是，“原本只对某些人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突然间便被绝大多数人看清了：旨在改善福祉的整个经济组织原来是实现福祉的最大障碍。”这样，那些对问题的症结有明确认识并拥有新理论的少数派别就会被推上政权的宝座。

勒内·杜蒙同意这一灾变说观点。他在1974年写道：“走向死亡的赛跑已经开始，我们幸存的希望日益缩小。至福千年的恐怖在这第二个千年之末出现了奇特的反响，而这次不再是不合理性的反响了。”^①杜蒙为此也勾勒出一个过程：最初灾难是有限的，但也是令人警醒的。这时，原本只是极少数人的反思将变成绝大多数人的反思。

生态主义运动的政治方案为这一悲惨可怕的观点推波助澜，使之达到高峰：“从各种角度看，庞大的工业体系都像是一项死亡的事业。”^②工业的增长被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延续，而且可能酝酿着第三次大战。工业和民用核能的发展接替了具有大规模破坏力的战争武器：“推土机是冲锋坦克的兄弟；战略轰炸机摇身一变成了协和式客机；太空飞船产生于V₁和V₂速度，如同费森汉(Fessenheim)或拉·阿格角^③出自广岛一样。”^④“全面发展”取代了“全面战争”，而技术的发展“比分开的战争更能准确地杀伤”^⑤。

“地球之友”提出的观点还比较温和：地球被比作一个充满无用的、受污染和危险物品的垃圾桶，而且已经开始发展。而“当第三世界死于饥饿时，其他国家却依靠生产把自己养肥。但这种生产使地球上的生命受到威胁：核、有害气体，更不用说那些‘时髦的灾害’了。有些界限是不能超越的。”^⑥

“伟大的组织”

政治生态派也以自己的方式找到了极左派独有的政权和法西斯主义的魔影，但它不针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而是把它纳入批判工业和现代社会的范畴。

① René DUMONT, *L'Utopie ou la Mort!*, *op. cit.*, p. 178.

② *Vers une société écologique aujourd'hui, projet politique du Mouvement écologique*, Le Sycomore, Paris, 1978, p. 43.

③ 法放射性核燃料基地。——译者

④ 同②, p. 43-44.

⑤ *Ibid.*, p. 44.

⑥ Dépliant de présentation des Amis de la Terre, 1978.

伊利什认为,工业纪元使人类走进一个自己掌握不了自己的阶段,其标志是人与人的关系全面非个性化。人越来越依赖于工具,工具则导致非人性化。人类发明工具原本是为自己的最终目的服务的,但现在工具变得难以控制了:“器械从工具变成了主人,然后变成人类的刽子手。角色的换位比预期的要快:犁铧最初使人成为园子的老爷,而不久便使人变成撒哈拉沙漠中的流浪者。能自动选择其攻击目标的疫苗将培育出只能在特定环境里生存的人种。我们的孩子在无人道的世界里一生长下来就变小了。”^①

对工业社会的这种看法与 68 分子对消费社会及其奴化机制的批判相吻合。伊利什的工具观是全面的:它既指犁铧、自行车、电站等,也指工厂、学校和卫生体制。现代工具逃脱了人的控制,使人越来越依赖人为的需求,把人类拖入一场疯狂的赛跑中。现代社会的大机器和各种机构操纵着每一个人,使之受到制约,不得求助于它们的服务,这样才能使人的需求得到满足。社会使人总是永不知足,为追逐无止境的更多而进行无止境的赛跑。

由于人不再有能力确定自己的需求和主张自己的权利,因此成了“庞大机器的猎获物”,因为机器会代替人确定他们应当过什么样的生活。由于被变成无力为社会做贡献的人,因此“公民便静坐在荧屏前默默无语”。工业社会对社会生活实行大规模的调节和全面的规划。

伊利什所进行的批判也是面面俱到的:劳动分工、专家的重要地位、权力机构对教育和卫生事业的掌控、娱乐、住房……这一切都是要使人失去所有的自主权。人受到“生产率意识的支配”,“沦为纯粹的消费者——用户”。人生活在一个人为限制的空间,失去了自主和真正的人际关系——“人与工业的关系是一种条件反射,是一个人对另一个用户发来的信息作出的千篇一律的答复,他永远不会认识这个人,即便通过一个人人为的环境认识了,但永远不会相互理解。”

回顾一下战后出现的人格主义潮流便不难看出人们对工业社会看法的变化。那时候马纽埃尔·穆尼那对他称之为“20 世纪的小恐慌”进行了批判,提出了一些至今尚未完全失去现实意义的问题:“人类变成了少年。直到最近的时代才生活在家庭组成的世界里,它几乎还像刚来到世上一样接受这个世界,只有当遇到忍无可忍的侵犯时才起来自卫。今天,人被要求成为世界和自己命运的主宰,而机器使这一突如其来的责任得到落实:机器要人成熟起来,人对这种成熟感到焦虑,于是把焦虑转嫁给机器……当机器开始一项冒险行动时,人力

① Ivan ILLICH, *La Convivialité*, op. cit., p. 123-124.

图使它驯服,要它许诺给人幸福。机器未能给人幸福,于是天真、失望的人便责备它,仿佛这就是他或其他任何人在这世上应扮演的角色。”^①

伊利什认为,“官僚法西斯”形成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人类面临的威胁使其感到恐慌,它可能不得不将自己的命运交到“一个伟大的兄弟及其佚名伙伴”手中,“有可能将由技术官僚把羊群带到悬崖上,也就是说由他们来确定走增长规模的限度,把增长限制在自我毁灭的边缘。”^②科学与技术致力于“使人的心理工具化”,使“人类从出生到死亡都被幽禁在世界规模的常设学校中,在地球大医院中接受终身治疗,夜以继日地拴在无情感的通信链条上。伟大组织的世界就是这样运转的”^③。被程序化操纵的人、这个“从理智的噩梦中降生的庞大突变体”^④,在他行将就木之前都一直被维持在苟延残喘的状态下。

会走向“电气化的法西斯”吗?

法国核能的迅速发展为上述论点提供了依据。生态主义者认为,核能不但是危险的,决定发展核能也不单是技术官僚们在国家机器内部压力集团的压力下造成的“既成事实”,它还会导致对员工和百姓实行与民主自由不相容的监视。

记者米歇尔·博斯盖(化名安德烈·戈尔兹)在《野蛮人》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从核电到电气化法西斯》^⑤的文章,抨击核能的发展带来的新暴政。用当时著名的一句话来说,核社会不仅仅是个“警察社会”,而且它还是由一个“军事化的技术人员集团”,也即无法无天的“军事骑士团”来领导的。这个集团有几万名成员,控制和管理着几十万名非军事人员。它是一部“军事机器”,“以庞大的核机器的技术需要为名实施它的统治”^⑥。“地球之友”主持人布里斯·拉隆德和多米尼克·西蒙内认为核能发展到一定阶段就有导致“技术官僚专制”^⑦的

① Emmanuel MOUNIER,《La petite peur du xx^e siècle》, *Œuvres*, tome II, Seuil, Paris, 1962, p. 380 et 381.

② Ivan ILLICH, *La Convivialité*, *op. cit.*, p. 123-124.

③ *Ibid.*, p. 145.

④ *Ibid.*

⑤ Michel BOSQUER,《De l'électro-nucléaire à l'électro-fascisme》, *Le Sauvage*, n°20, avril 1975.

⑥ *Ibid.*

⑦ Brice LALONDE et Dominique SIMONNET, *Quand vous voudrez*, J.-J. Pauvert, Paris, 1978, p. 108.

危险。

科学、技术和工业的发展必然带来全面的繁荣和众人的福祉，而反过来又会造成地球上和社会中生命的衰退。历史不再带来希望而带来忧虑，其终点不是承诺的福祉而是灾难。在一个饱含绝望的世界上，我们怎么生活？又能做些什么？该醒悟了，要“敲响警钟、寻找一条出路了”^①。生态主义者就是以此为己任的。

安德烈·戈尔兹在“告别无产阶级”后加入了政治生态派。他认为问题不再只是简单地否定资本主义，而是要对经济增长本身提出疑问：“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工人阶级本来有可能打碎自己身上的枷锁并实现普遍的自由，但生产力的发展却剥夺了分工彻底化，破坏了生产者权利存在的物质基础。”^②经济增长使得需求的增加超过增长所能提供的满足度，从而引起混乱，使地球遭到洗劫，把世界引向自我毁灭——“增长的资本主义之所以处于危机之中，不仅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的，更因为它是增长的。”^③

救世的幻想

与对人类的现在和未来持悲观态度的生态主义观点针锋相对的是一种能把我们从自我毁灭中拯救出来的乌托邦。伊万·伊利什认为，出路在于把现代体制中实行的逻辑完全颠倒过来，用能使人保持主人地位并能继续与他人建立直接联系的“社交手段”取代工业手段。这种转变要求在伦理上做出选择，以便每个人都能在社会上生活得有意义。

这样的计划也会导致“对人的形象进行重新审视，因为据说人的普罗米修斯精神是在普遍入学的意愿中得到体现的”。而伊利什则宣布了“艾比米修斯^④的复活”，他“相信希望”，“爱他周围的人胜过爱财产”，爱“我们可以聚会的地球”，“帮助他的弟兄”^⑤……艾比米修斯们的到来颇有救世主的风范。伊利什宣

① *Vers une société écologique aujourd'hui, projet politique du Mouvement écologique, op. cit., p. 44.*

② André GORZ/Michel BOSQUET, *Écologie et Politique*, Seuil, 1978, p. 17.

③ *Ibid.*

④ 艾比米修斯(Epiméthée)，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的兄弟，他娶了潘多拉并不慎打开了魔盒。——译者

⑤ Ivan ILLICH, *La Convivialité, op. cit., p. 187-188.*

布的这个复活“既不取决于我们的计划，也不取决于我们的主观愿望”。^① 伊利什会不会是人类新纪元的预言家呢？在这个新纪元里，为我们的福祉而奋斗的生态主义导师和教育家们就是艾比米修斯的化身。

法国政治生态派最初做出的选择是：“乌托邦或死亡”。在勒内·杜蒙看来，1974年的任务是要发扬“新道义”，提倡“恢复信心”^②，“重建一个真正的新世界”……这个新世界要在全新的思想基础上、依靠由全新的教育方法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结构框架内培养的、强过千锤百炼的人来建设。新人要通过斗争和经常性的教育得到锻炼，世界需要这样的新人来避免灾难。

杜蒙当时也颇受中国经验的吸引。中国的发展模式和以反对个人主义、反对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脱离以及发扬革命精神为宗旨的“文化大革命”使他不能不为之动心。生态主义乌托邦希望通过这些方式倡导集体精神、促进合作化，实行一种“大家轮流做打扫卫生、倒垃圾一类低贱工作”的分工合作，同时也要发展与基层集体密切联系、建立在经常性教育和互教互学基础上的新型学校，这是伊利什情有独钟的事业。为此，新型教育者“必须既是教育者也是鼓动家和政治家，成为真正的导师”，这些人类的保护者要以身作则。杜蒙给自己提出下列问题：“由新型的经常性教育培养出来的、投身于斗争事业的新人能不能恢复传统的信念、促使领导人更全心全意地为人类、首先是为最贫穷者的利益而奋斗呢？这个信念能不能激起如同中世纪的修士、现在越南和中国共产党的某些干部那样的献身精神？”

尽管杜蒙说他丝毫不是要搞劳改营，而是一项说服教育工作，不存在什么社会的模式，但他所描绘的乌托邦社会却把无比慷慨的许诺与令人咋舌的对未来社会的描述绣制得天衣无缝。他还指出，难道还要通过试点、付出失误的代价来做试验吗？那要付出多大代价啊！

生态乌托邦向我们许诺的人与自然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解包含着可怕的强制性。由于生态派自认为这种只作用于精神的强制性是柔性的，因而变得更为可怕：“这个无歧视的社会将把有组织的公众舆论压力（中国已向我们表明，当舆论有了新的信念时，它就是万能的）指向一切形式的浪费和污染。多子女家庭不久将被人瞧不起，然后予以惩罚，最后加以禁止。然而，如果认为这样一个社会会变得像天使一样不要规划、纪律、权力和机构，那是痴心妄想。”由新型教育者、导师和生态主义道家主宰的公众舆论压力足以做到令行禁止吗？这些

① *Ibid.*

② René DUMONT, *L'Utopie ou la Mort*, *op. cit.*, p. 7.

满怀生态信念的人开展的教育和说服工作足够了吗？或者，“这些干部，尽管免不了犯错误，是否有能力让群众接受必要的纪律？”问题就在于此。

罪恶感和新伦理主义

政治生态派既是空想主义的也是现实主义的：面对威胁人类的巨大危险，除了它所主张的道路外没有别的路可去，除了求生没有别的选择。这要求每个人都不断觉醒，并对自己负起责任来。

因此，每个人都要充分考虑自己的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光唤起人们尊重身边环境的公民意识还不够，无用而昂贵的购买和消费所造成的后果比人们想像的还要严重。杜蒙称，在旧车报废之前又购买新车就“意味着热带农民造型的钢又减少了”。本来可以乘公交车却要开小轿车，“你们应当想到你这是在使地球变得令人难以呼吸，是在扩大第三世界的贫困，是在糟蹋宝贵的黑金子并将导致你的后代可利用的资源匮乏……”

新兴的政治生态派将对手的理论翻了个个儿，但仍然摆脱不了对手的推理方式。我们必须通过生活和思维方式的转变才能适应不可避免的演变。演变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无需争辩，这是个思想和道德诚实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从公认的事实出发做出合理的伦理的政治选择。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于是人们产生了利用道义使对手产生罪恶感并把他们的口封住的强烈愿望。富有国家被指责，它们应为地球的危害和世界性的饥饿负责。作为这些国家的居民，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不也是同谋吗？我们“富有者的自私”不总是占上风吗？

1974年，政治生态派开始以无可辩驳的有力论据宣扬其道义：“但每个人都应尽快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所有死死抱住消费社会的特权，拒绝在世界范围内对社会正义和社会生活进行必要改革的人，可以被视为穷人的公敌。改革后的教育将会提高孩子们的觉悟，难道你愿意被你的孩子当成敌人吗？”^①

1977年，安德烈·戈尔兹以接近“地球之友”的较温和的生态主义观点，提出一系列以事实为依据的论点：“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这样的生活是没有前途的”，“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方式将要结束”，^②因此，要合理利用现有的资源，而不是继续追求负面影响很明显的增长。他还指出，社会正义本身也必须在无增

① *Ibid.*, p. 179.

② Michel BOSQUET(André GORZ), *Écologie et Liberté*, Galilée, Paris, 1977, p. 18.

长的条件下实现,而“所有左派所主张的社会主义都拒绝考虑零增长下的公正,这实际上只不过是利用另一种手段延续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和文明,延续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①

限制经济增长也可以使社交、经常性教育、休闲和公民权的价值得到提升,使“存在”重于“拥有”。生态主义乌托邦之所以必要,不仅是从败落的现在和充满灾难的未来角度来看,而且也是“为了满足自由、变化和与体制决裂的愿望,也就是追求另一种东西的愿望。历史的奇妙现象是欲望常常与必然性不谋而合。”^②谁要拒绝接受生态主义者所提出的措施,谁就会被说成是自私自利者、财主,甚至是穷人的公敌。

1978年,让-保罗·里布在经过20多年的战斗生活、参加过阿尔及利亚战争后,许下了不再把世界看做战场的愿。在妇女运动出现第一次分裂后,他用这样的话向生态主义表示敬意:“生态主义意味着我们的新生,意味着我们回到了地球。……我们不怕原子,因为那只是原子;我们怕的是为未来几世纪安排的原子人。我们还没有充分认识现有的大自然,因此不想创造第二个大自然。尤其是,我们不想牺牲我们的享受、想像力、歌曲和信仰。大海、阳光、森林、田野、鱼儿、鸟儿,五彩缤纷、芳香四溢、万籁俱寂、夏日炎炎、细雨绵绵、晨雾濛濛,这就叫做生机,已历经数千年了,还将天长地久、延绵不断。”^③

经过几年的疯狂斗争,自然界恢复了它的妩媚并成为复兴的源泉,实现了根本转变。然而,救世的乌托邦思想是否因此就告寿终正寝了呢?是否不再把性质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了呢?以五月运动的继承者自居的政治生态派提供了一个五月运动的温和的版本,自认为找到了用另一种方式搞政治的路子。《野人报》总编阿兰·埃尔韦声称:“生态主义不由自主地取代了社会主义”^④。但从人生观和社会共同生活的角度看,这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① *Ibid.*, p. 20.

② *Vers une société écologique aujourd'hui*, *op. cit.*, p. 15.

③ Jean-Paul RIBES,《Avant-propos》, in *Pourquoi les écologistes font-ils de la politique?*, entretiens de Jean-Paul Ribes avec Brice Lalonde, Serge Moscovici, René Dumont, Seuil, Paris, 1978, p. 12 et 13.

④ Alain HERVÉ,《Qu'est-ce que l'écologie politique?》, *Le Sauvage*, n°43, 1^{er} juillet 1977. Dans ce numéro, Alain Hervé, Michel Bosquet, Michel Izard, Brice Lalonde, Serge Moscovici et Alain Touraine analysent la surprise de la percée des écologistes aux dernières élections municipales.

地球——大家的母亲

生态主义者不断重复着一句印度名言：地球不属于人类，人类属于地球。政治生态派从诞生之日起就以恢复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处为己任。人在试图控制自然并使之为自己服务时忘了他是这个大自然的一部分。人不仅要学会更好地认识和评价所有其他生灵和自然景观，而且要丢掉他的“统治者的傲气”，把自己看做大自然整体的一分子，要学会与植物、高山、大川和大洋和谐相处。

生态运动在1978年提出的政治方案中列举出人类生活与其他物种的共性：“只有生命世界的多样性才能使人富有，这个世界构成一个整体，其中每个物种都具有同等价值，即无限价值。”^①生态的价值与女人的价值一样，是温柔和善良：“近30多个世纪以来，西方是男性一统天下，它要求男性树立权威、实施统治——‘你要统治整个地球’，而这种统治却越来越像是破坏。通过竞争一暴力一统治一破坏来寻找出路的疯狂行动该是结束的时候了。生活的正道从根本上讲，应该是女性一温柔一繁衍。”^②今天，人正在为自己的统治野心、为自己对大地的侵犯付出代价，他必须放弃“对地球的统治”^③。

“地球之友”主持者们的言论则不那么极端：“人应该与自然界和其他物种共同生活。凡是不同的，都是不可缺少的。对多样性的关切被上升到金科玉律的地位。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创造都被认为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④按照这一观点，以人为本便不一定对了：“一簇草也和工厂里的几秒钟休息一样重要，要加以维护。”^⑤对海豚和鲸的赞颂也是值得一提的。有一篇很快成为热门话题的讲演里这么说的：“温柔的鲸和美丽的海豚是阿波罗的伙伴。你们互相交谈，请把你们的想法告诉我们吧！听说你们的头脑比我们更发达，我们不知道利用我们的头脑……我们不是不能理解在同一星球上还生活着另一种智慧动物吗？而它们却懂得同所有别的种类共同分享。鲸啊，如果我们能够懂得你们，我们就得救了。我们懂得智慧不仅仅通过物质生产来表现。鲸啊，你们没有双手，让我们跟你们一样思考吧！……我们已经懂得，维护你们是人类的首要任

① *Vers une société écologique aujourd'hui, op. cit.*, p. 23.

② *Ibid.*, p. 24.

③ *Ibid.*, p. 23.

④ Brice LALONDE et Dominique SIMONNET, *Quand vous voudrez op. cit.*, p. 192.

⑤ *Ibid.*

务。”^①

人应该不要再认为他是大自然的“主人和老爷”，不再保持普罗米修斯式的骄傲。然而，在遵守一定的界限和以大自然为坐标之间，生态主义的的确确出了些偏差：技术原本是利人的，但却被认为是危害人性的新因素^②。

新兴的政治生态派把大自然奉为楷模，认为它能使我们夺回失去的幸福；我们的社会忘却了和大自然的这种关系。而且，自然界的自动调节机制不也可以成为人类集体运转的楷模吗？“我们的社会有活的机体，它要服从这个活体的逻辑：演变—多样性。”^③根据这种观点，自治的思想不也可以把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机制作为模式吗？

什么是生态学

人们为生态学下的定义并无助于使辩论变得清晰明白。透过各式各样的论述，可以看到生态学通常被概括为文化与文明转型的象征。但如此广泛的转型令人很难明白生态学怎么会变成一个政治运动。

生态学首先是一门“生态系统”的科学，是“所有生命物种之间以及它们与其所居住的世界之间的相互联系的相对单一和有限的总概括”^④；或者说它是“对我们所属的生命系统的总体认识”。^⑤但生态学也是对工业社会众多死胡同的清醒认识，它体现了“感到自身受威胁的物种所具有的深邃的生物智慧”^⑥，与此同时，它也大谈“欲望、想像力和乌托邦”^⑦。

阿兰·埃尔韦认为，生态主义运动是一个“近乎本体论的现象，更像一个宗教或一种新的宗教感，而不是一种政治现象”^⑧；塞尔日·莫斯科维奇则认为生态主义是“存在主义运动”或一门“人类学”^⑨。“地球之友”的宣传小册子是这样概括的：“生态主义不是一门科学、一种道义、一个政治理论、一种经济制度，它

① *Ibid.*, p. 192-193.

② Dominique BOURG, *L'Homme artificie*, Gallimard, Paris, 1966.

③ *Vers une société écologique aujourd'hui*, *op. cit.*, p. 19.

④ Brice LALONDE et Dominique SIMONNET, *Quand vous voudrez*, *op. cit.*, p. 44.

⑤ Alain HERVÉ, *«Avant propos»*, *ibid.*, p. 17.

⑥ Louis PUISEUX, entretien dans *Le Nouvel Observateur*, 21 novembre 1977, cité dans *Vers une société écologique aujourd'hui*, *op. cit.*, p. 12.

⑦ *Vers une société écologique aujourd'hui*, *ibid.*, p. 12.

⑧ Alain HERVÉ, *«Qu'est-ce que l'écologie politique?»*, *loc. cit.*

⑨ Serge MOSCOVICI, *ibid.*

是所有这一切甚至更多。它是对人类所依赖并作为其一部分的自然机制的新理解。它宣告了人类以为可以强加给自然界的技术统治的末日。它发明了个人和集体适应人类生存条件的新的行为方式。”^①根据这样的定义,便不难理解生态主义很难使自己跻身于政治舞台。

《大张口报》的生态主义者无疑是把前瞻性表达得最彻底的一派,而且带有五月运动后绝对自由派的明星印记:“生态主义者感兴趣的是人在地球上的生命延续,但并非苟延残喘,而是要使民族的国家、病入膏肓的军队和人类自以为天下第一的自负从地球上消失。面对这一切,左翼的退路何在?生态主义是一门科学,它的雄心是综合分散的各门科学,使人类的活动产生协同效果。这是一门明确提出替代办法的科学:在必然性的作用下对世界实行理性的总体管理,或者说,社会在小范围内爆发绝对自由,使任何个人都不会把自己的权力交付给他人。这是一门要铲除卑躬屈膝的人的统治(不是把官僚集团强加于人)的科学,它要以功能等级制度取代价值等级制度,也就是取消等级制度。我们离共同纲领和每周40小时工作制还很远!”^②

1977年2月布里斯·拉隆德声称:“政客的游戏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如同过去它对无政府工会主义者和五月运动中的绝对自由派感到陌生一样。”^③但当人们企图要搞政治时,这份遗产便难以承接。纯洁癖、拒绝组织和权力,或更简单地说就是崇尚空谈,这使组织政治运动变得很困难。各种不同倾向在所有实质性问题上都进行交锋:生态运动的定义、它在社会中的作用、它的结构、是否参加选举、在右翼和左翼政治力量间的定位,等等。

某些政治生态主义者宣称其“使命在于争取多数、实现自治,而不是站在边缘和作消极反应”^④。但这样的方针未能在生态运动内部得到顺利推行。一部分人(如“地球之友”)希望生态主义进入政治领域并向其他派别开放;另一部分人则坚持要与社会划清界线,他们参照五月运动的口号,认为选举是“可笑的陷阱”。这两派之间开展对话是不可能的。正如生态与女权主义协会创始人弗朗索瓦·德·奥博纳所说:“即使直接民主眼下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我也宁愿为准

① Dépliant de présentation des Amis de la Terre, 1978.

② ARTHUR,《Fumiers de verts!》, *La Gueule ouverte*, 8 mars 1977, cité par Claude-Marie VADROT, *L'Écologie, histoire d'une subversion*, op. cit., p. 108.

③ Brice LALONDE,《Brice Lalonde répond à Dubedout》, *Le Nouvel Observateur*, 27 février 1977.

④ Laurent SAMUEL,《Point de vue》, *Libération*, 27 juillet 1977.

备直接民主而遭失败,不愿愚蠢地为了站稳脚跟而为假民主作嫁衣裳。”^①她以不妥协的口吻不失风度地补充道:“我认为在不公正、寡廉鲜耻和丑恶之间,亦即在大写的生活(父系的最后阶段)中,没有程度的区别。”^②她的对立面,“地球之友”的多米尼克·西英内反唇相讥:“生态主义首先是要让生活变得快乐、高兴,而肯定不是在意识形态‘纯洁性’的名义下睚眦必报、疑神疑鬼、好斗成性。”^③

各不同派别之间的较量日趋激化。于是,对直接民主、平等和透明度的颂扬常常转变成你争我夺的闹剧。

“现实主义的乌托邦”?

90年代末,“地球之友”是主要的全国性生态主义组织,号称有70个地方分会。该联合会力图使生态主义更具“现实性”,就有关环境、运输、能源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一些相反建议。面对权力不断扩大的国家及其机器,他们要开展新能源、新的生产和交换模式、教育、互助和集体生活等方面的试验。这种试验是在国家机构以外进行的。新型工具必须适合于人,要让每个人都能发挥其创造力并直接与他人建立联系。个人和基层集体要能对其力所能及的事负起责任。这样的生动局面将成为典范,迅速传播开来,目的就是使个人和集体实现自治并负起责任。

“地球之友”和众多协会于1977年签署了《圣-奥梅尔宪章》,把生态主义的目标指向对市镇日常生活问题的关切:信息的发展和市镇生活的民主化;优先关心公共交通、垃圾处理、保护和扩大手工业、规定房租价位等。生态主义者首次选举舞台亮相后的第三年,便在1977年的市镇选举中取得成功:其候选人参加了百余个选区的竞选,在每个选区所得票数几乎都比1974年总统选举中的得票翻了一番,超过极左派的得票数。

通过对贴近日常生活问题的关心,实现了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大转变。他们在这些问题上提出替代性建议时,是用谦逊的口吻表述的。“巴黎一生态系”的候选人声称:“我们不敢妄言能开出幸福和繁荣的灵丹妙药;我们也不是

^① Françoise D'EAUBONNE, citée par Claude-Marie VADROT, *L'Écologie, histoire d'une subversion*, op. cit., p. 91.

^② *Ibid.*

^③ Dominique SIMONNET, «La tentation du marginalisme», Amis de la Terre de Paris, mars 1977, *ibid.*, p. 99.

政治专家。生态主义者只是普通的公民,认为他们的生命和前途属于公民。政治首先是公民的事。”^①这样的提法宣告了极左的末日,反映了时代的新气象。有谁能表示反对?

凡是地方和地区能够在基层机构中加以解决的问题都应就地解决,只有属于中央层面的国家事务例外。国家应成为“鼓动者”、“仲裁员”,要超越民族的国家,建设联邦制的欧洲,将所有权力交给地区。“地球之友”在80年代初所提出的主张与社会党内以米歇尔·罗卡尔为代表的第二左翼的主张如出一辙。

某些知识分子鼓动生态主义者进入左翼内部以便改选左翼。社会学家阿兰·图雷纳认为生态主义者的斗争与妇女、大学生、地方主义者的斗争一起,表明自1968年五月运动以来一种新的“社会运动”正在形成。五月运动促使一些新的抗争和冲突形式崭露头角,这些斗争不是定位在劳动范畴,而是反对“由技术官僚规划和管理的社会”^②。而生态主义运动不正是一种社会“反模式”的载体吗?

阿兰·图雷纳认为,社会党应成为“这些新的不同政见的操作者”,“把相对独立的基层运动与政治运动结合起来,使之具有体制性的表现形式,并与一个有能力管理经济的政府相结合。”^③阿兰·图雷纳自告奋勇愿意充当生态主义者和左翼的“中间人”和“掮客”：“我已经告诉社会党人：如果你们没有生态主义者作为基层力量，你们便什么都不是，你们就只能是密特朗班底加地方豪绅加老的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加觊觎内阁办公室的高级官员而已。”^④他鼓励生态主义者捐弃出身成见，使自己转变成“社会运动”并持之以恒，目的是向社会党左翼施加压力，这也是把社会党左翼从唯生产力论和技术官僚主义中解救出来的最好办法：“如果你们把转变成社会运动作为既定目标，你们就能给社会党政治左翼施加压力，同时也就解救了它。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左翼走上了错误的道路。”^⑤80年代初生态主义者的新思想会使他看得更清楚吗？

无论如何，这些新思想不论是在“正式的”左翼内部还是在整个社会中，都和五月运动后的反文化思想一样取得了进展。人们看到，后者曾加速了政治极左派的危机，为70年代后半期的大转折扫清了道路。人们将会看到这个大转折是翻天覆地的。

① Tarct de Paris-Écologie 78,《Épanouir la vie. Préserver l'avenir. Changer la politiqu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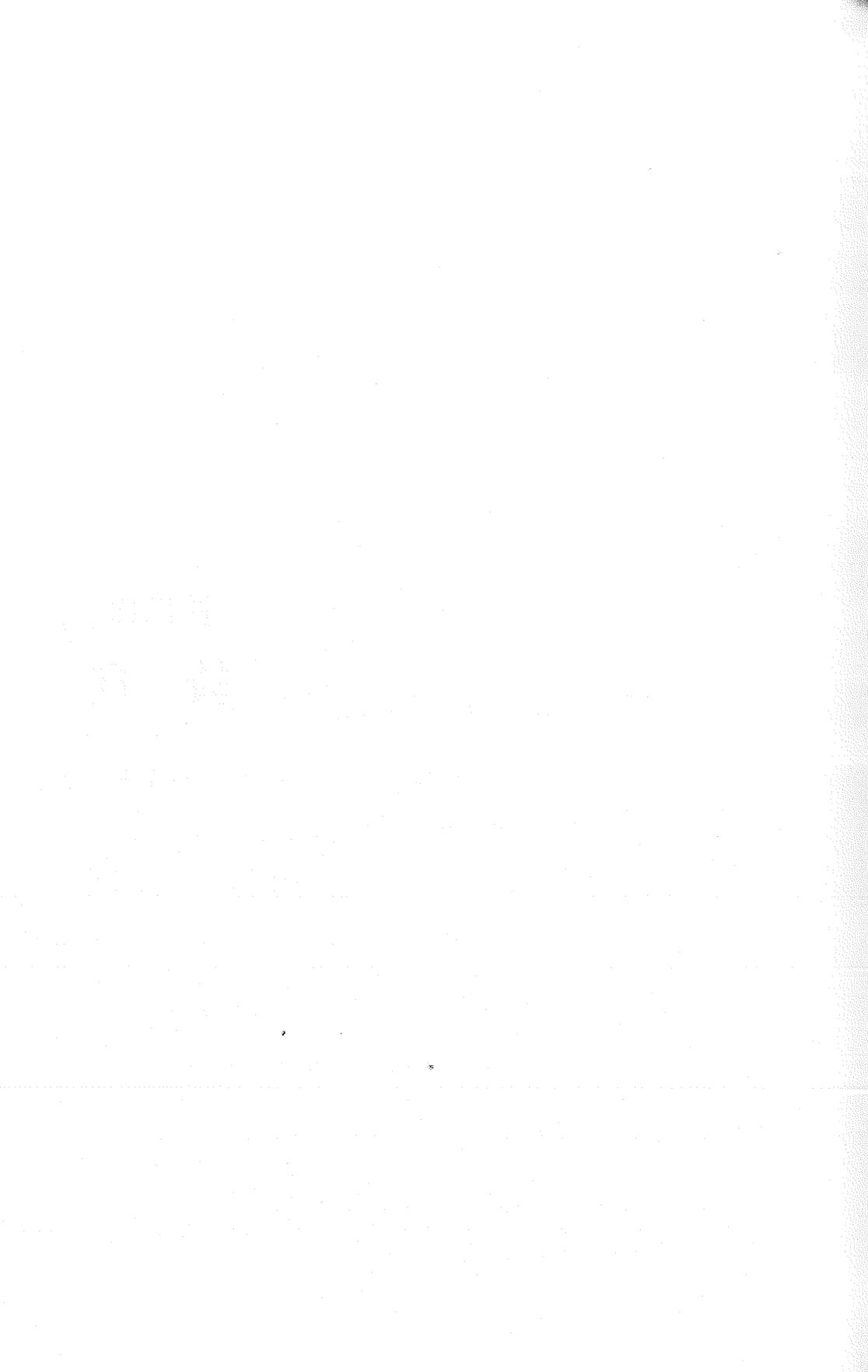
② Alain TOURAINE, *Le Communisme utopique*, Seuil, Paris, 1968 et 1972, p. 11.

③ Alain TOURAINE, *Un Désir d'histoire*, Stock, Paris, 1977, p. 262.

④ Alain TOURAINE, 《Qu'est-ce que l'écologie politique?》, *Le Sauvage*, n°43, *op. cit.*

⑤ *Ibid.*

第四部
转 向



二十四、理想的破灭

70年代后半期,极左派怀有的革命理想宣告破灭。而从60年代末起,随着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斗争的发展,革命这一理念似乎再次变得可信。历史总是曲折发展,这一次它好像是转了个身。

法国工人阶级的持续斗争曾被认为可以发展到革命,他们也没有完全抛弃“改良主义幻想”。但他们似乎对左派联盟政府的共同纲领更感兴趣,这一纲领是法国共产党和社会党于1972年通过的。后68极左派分化了,难以提出一个可靠的选择。

1974年,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①法文版面世。此书以描写斯大林独裁统治、共产主义集中营及其恐怖生活的详细与有力震惊了舆论界。

与此同时,国际舞台上一系列的事件也让共产主义的美妙前景和东南亚的解放斗争受到了彻底的质疑。1976年,毛泽东逝世;“四人帮”^②被捕,曾被很多人视为超越斯大林主义的“文化大革命”引发争论。揭露当时恐慌的资料纷纷问世。1978年,人们得知1975年柬埔寨红色高棉胜利后制造了惨绝人寰的种族大屠杀,而1975年越南士兵的胜利也导致了上千船民的逃亡与流放。

这些因素加上后68极端自由主义分子战斗性的削弱,加剧了主观战斗精神的危机。首当其冲的是最过激者,尤其是毛主义者。现实主义在被否认后重

^① Alexandre SOLJÉNITSYNE, *L'Archipel du Goulag*, Seuil, Paris, 1974.

^② 中国共产党的用语,以此指代四个高层领导:王洪文、张春桥、江青(毛泽东的妻子)、姚文元。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毛泽东逝世后均被逮捕、免职。

新占据了上风。托洛茨基分子,如共产主义联盟,虽然没有提出现存社会主义的模式,宗派色彩也最弱,仍没有逃脱此类命运。1973年诞生的《解放报》(见第16章)的发展历程也同样是极左派解体的历程,虽然它最初带有强烈的毛主义色彩。

1968年五月运动中产生的革命斗争精神、尤其是最激烈最具牺牲精神的毛自发主义,受到了一系列公开的质疑。这种质疑不断扩大。这不是几个前毛主义激进分子对精神状态的简单剖析。他们实际上揭穿了共产主义者对苏联发生的事情的辩解和谎言,也揭穿了左派知识分子的种种借口。革命及共产主义的观点——从提出这些观点的政权的实际情况来看——受到了彻底的怀疑。至于社会主义模式问题,无论是苏维埃式、古巴式还是中国式,都已经过时。更确切地说,是左派的指导思想、对历史的乐观设计遭到了怀疑。我们处于“孤儿时代”^①。

革命的教义坍塌了,取代它的是曾经被革命者狠狠践踏的伦理学与生存美学。它们已经成为等同于意识形态、幻想、谎言的政治的反义词。这些日后逐渐显现的新价值伴随着非政治化的进程。但自发左派及文化左派宣传的反抗难道没有动摇政治行为和社会共存的理论基础吗?

“索尔仁尼琴效应”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以“纪念被处决和被谋杀的人”为题跋,综合了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有关苏维埃集中营制度和当时鲜为人知的反抗斗争的信息、回忆及见证。古拉格并不是这一制度下的偶然事件,而是它运行过程中自带的痼疾。从布尔什维克革命发生之日起,集中营就开始普及。索尔仁尼琴从现实出发剖析它的运行:腐朽、身体和精神的折磨、非人的劳动、对反抗的镇压……叙述的事实沉重压抑,令人恐惧。

左派对这个似乎倾向右派的制度反对者持保留态度。《古拉格群岛》引发的思考一分为二:它不仅针对苏维埃政权的性质,也针对左派的盲目乐观或对政权野蛮性的轻率承认。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关于它的社会主义或进步的性质中所剩东西的争论几乎没有意义。法国共产党尽管付出很多努力,但这一次不能再阻止事态的发展,甚至自己的成员也最终加入了质疑的行列。

法共在法国左派中的文化霸权阻止了揭露苏维埃镇压行径的声音在30年

^① Jean-Claude GUILLEBAUD, *Les Années orphelines*, Seuil, Paris, 1978.

代(维克托·塞尔日或者鲍里斯·苏瓦林)和“二战”后(大卫·鲁塞或者维克多·克拉夫琴科)的广泛传播。但到了70年代中期,环境变了:正统共产主义的知识统治被左倾主义彻底推翻,而对苏联的批判恰恰为左倾主义提供了土壤。

读完《古拉格群岛》后,安德烈·格鲁克斯曼在自己的著作《厨师和吃人的家伙》(1975)中提出了一系列共产主义者和左派不能回避的问题:“索尔仁尼琴和持不同政见者自己面对、也使我们面对俄罗斯数以千万计的犯人。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宣称比他们更左派,因为没有人正面看到这些。”^①在一个无法遮掩的现实面前,无论多严密的理论都会变得微不足道。那些永无休止的争论——关于苏联的正确性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失败演绎、关于这一政权犯下的错误、关于它“总体上的肯定”(语出法共总书记乔治·马歇)或否定……——似乎都可以视为对正视事实的拒绝。安德烈·格鲁克斯曼戏谑地模仿共产党的言论:“同志们,不要采取说教的、主观的、脱离历史的观点。一棵大树不会遮盖住整片树林。不能把婴儿连同带血的洗澡水一起倒掉……当然,我们要面对的是成千上万的尸体,但是……”^②

共产主义者和部分左派知识分子以索尔仁尼琴观点偏右为借口对作品进行的批评和抵制,这被视为盲目愚蠢的做法。左派揭露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罪行时如此迅速,对苏联为什么就做不到这一点?与审判美国人在越南所犯罪行的拉塞尔法庭相似的审判苏联的机构又在哪里?

安德烈·格鲁克斯曼此后把苏联和东欧国家不同政见者的抵抗运动作为模本。《古拉格群岛》成为重要参考文献:它不是对苏维埃集权制的简单揭露,而是阐述了“进行反抗的人是穷人,是地位低下的人,不是知识分子,不是共产党的领袖”的观点^③对古拉格、对世界上各种集权制的反抗成为动员工作中的新话题。

永别了,中国

有关毛式中国的神话也即将破灭。曾经盲从偏信的人都对它转为批评。克洛迪·布鲁瓦耶勒,雅克·布鲁瓦耶勒和埃弗利娜·奇尔赫特这三个前毛主

① André GLUCKSMANN, *La Cuisinière et le Mangeur d'hommes*, Seuil, Paris, 1975, p. 59.

② *Ibid.*, p. 77.

③ André GLUCKSMANN, émission «Questionnaire», TF 1, le 18 septembre 1977, cité par Claudie et Jacques BROUELLE, *Le Bonheur des pierres*, op. cit., p. 158.

激进分子，在他们的作品《重返中国》中以所见、所闻及亲身经历的事为例，叙述了自己理想的幻灭。他们于1972年、1973年连续两次前往北京，其中，埃弗利娜·奇尔赫特在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法语；克洛迪·布鲁瓦耶勒和雅克·布鲁瓦耶勒在《北京周报》担任外语校订者。他们1975年返回法国。《重返中国》写的是他们在中国的第二次逗留的经过。他们写道：“过去数十年里，不想知道和不想听见的念头让我们感受不到古拉格垂死之人的呼喊。中国长久以来享有的就是静默的赞同或是西方对其政体的赞扬。我们最起码能做到打破沉默。”^①

这本书受到了出版界和视听媒体的欢迎，为它们所称道的是它信息的翔实和批评的切中肯綮。因为对中国政体具体实践的揭露，使它成为描述苏联专制的书籍的同类。一年后，也就是1978年，克洛迪和雅克·布鲁瓦耶勒在第二本书《石头的幸福》^②里进行了更为深刻的思考。他们反思自己投身毛主义的根源，质疑共产主义信条：为什么这么多知识分子被蛊惑？为什么他们拒绝正视现实？

他们对中国、对毛主义的失望程度与先前信仰时的狂热程度成正比。“毛泽东思想”似乎可以“移山”；借助“红宝书”，人类遇到的所有问题，实践的、理论的、哲学的……都能够解决——“我们开玩笑说（也不是总这样），‘红宝书’是一剂神药，可以让失明的人重见光明，可以让耳聋的人恢复听觉。”^③毛主席对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离的质疑让知识分子“下马”，开始倾听人民群众的声音；人民群众拥有他们接触不到的知识。

现实没有《北京周报》宣传的那样美好。快速培训后就投身农村的“赤脚医生”极度缺乏医学知识，虽然热忱但提供的服务根本达不到要求。只考虑政治需要和意识形态而不注重能力的做法损害了本应接受良好服务的人民。

在法国人眼里，毛主席的口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点1968年五月运动的气度。对毛主义激进分子而言，“文化大革命”代表了对斯大林主义实践上的超越。它被视为一种新的巴黎公社、一种改变党和国家官僚僵化作风的大众民主。需要注意的是，党和军队的干部在革命委员会内占据多数，即使人们有权反抗，那也必须在“权力允许的范围内”。^④

^① Claudie et Jacques BROYELLE, Évelyne TSCHIRHART, *Deuxième retour de Chine*, Seuil, Paris, 1977, p. 285.

^② Claudie et Jacques BROYELLE, *Le Bonheur des pierres*, op. cit., 1978.

^③ *Ibid.*, p. 138.

^④ *Ibid.*, p. 89.

理想破灭得很突然：“当西红柿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下成熟起来的时候，人们可以确信新一批的农学家要向边疆或内陆沙漠挺进了。和所有错误行动一样，对正确方向和批判精神的消灭不容许证人的存在。”^①当这几个激进分子重返法国后，他们向信奉毛主义的朋友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许多人告诫他们不要把这公诸于众。否则他们不是会再次引发类似“比扬古事件”，让右派称心如意吗？

左派对中国的论证与中国共产党对斯大林的论证类似：斯大林虽然犯了不少错误，但他一直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即用社会主义的良好出发点为野蛮行径辩护：“我们很放心，也很警醒。当我们把百姓放逐到集中营时，重要的是要区分这种放逐是恶毒的表现，还是本着促进人类解放事业发展的真诚目标进行的。前一种情况，我们等同于希特勒，等同于法西斯；而第二种情况，我们就是糊涂了的革命者、共产主义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②这种论证已被抛弃。此后的问题很明确就是：“到底是什么让我们对其他人听得很清楚的事情充耳不闻？”^③

一个孤芳自赏的伤口

这一问题不仅仅针对前毛主义者这一小部分人，也揭露了左派现行机制、尤其是蛊惑了众多知识分子的共产党的内部机制问题。无论如何，毛主义者不是惟一拒绝正视隐藏在宣传社会主义的夸张言论下的事实的人。社会主义体制的运行和思考方式不是一再重复法国共产党的实践，甚至将它推向极端吗？克洛迪和雅克·布鲁瓦耶勒对左派说：“当然，我们是一些丑人，可笑、怪诞、滑稽。笑吧。但请你们在我们的鬼脸下努力分辨出事实吧。”^④

那些借口都已不合时宜。我们不应该用背景、用已经过去的条件解释“错误”，共产党人在这方面是能手。在这种考虑下，由于条件和背景不断变化，个人总能逃避责任。我们不能再接受“已经发生的就是必然的”^⑤这一观点。认为主观因素淡化的自我批评是粗劣的托辞。这不是为世界上初衷最好的理论和实践的错误吹嘘，而是自己的盲目行为。这个伤口是自恋性的，不是那么容易

① Claudie et Jacques BROYELLE, *Le Bonheur des pierres*, op. cit., p. 134.

② Claudie et Jacques BROYELLE, Évelyne TSCHIRHART, *Deuxième retour de Chine*, op. cit., p. 29.

③ Claudie et Jacques BROYELLE, *Le Bonheur des pierres*, op. cit., p. 17.

④ *Ibid.*, p. 84.

⑤ *Ibid.*, p. 189.

就痊愈的。

为了更好地论证,我们可以从各个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那些认为自己被欺骗、被摆弄的人忽略了一个事实:欺骗是需要双方合作才会发生的。对前无产阶级左派内部做法的讨论超出了这个组织的范围。实际上,这是一个借助历史试图逃避责任的“肮脏的诡计”。客观条件和“必要的步骤”、强调批评性询问已然的萌芽……这些词都是在为无法辩解的事情辩解。对克洛迪和雅克·布鲁瓦耶勒来说,“重要的是一上来就说:我们在自欺欺人。而不是:我们受骗了。”^①

新的浪漫主义?

对许多活动分子而言,目前的失望和先前的激情一样强烈。很多人要痛苦地经历这一危机。我们可以理解他们承受的慌乱与焦虑。一些前毛主义者在长时间地压抑主观精神后,打算用整个版面把它倾诉出来。从希望到失望,多么痛苦的路程:“我们以为已经走到绝望的尽头;那段时间,一切都让人失望,我们整夜为无法弥补的过去哭泣抽噎。你们能知道吗?”^②经历了1968年五月运动后激情澎湃的岁月后,整个世界显得空荡而微不足道。在一个变得陌生的世界里游荡,怀有自杀的念头,却又不肯付诸实施。真要放弃年轻时的疯狂岁月,转而把它当成沉重的负担吗?

这是一个悲剧。一些激进的工人押上所有赌注追随毛主义者,他们不像毕业的学生还可以比较容易地融入社会。一个曾经加入毛主义者阵营的年轻工人经历了前无产阶级左派解散后的惶恐不安:“我没有重返工厂,我会在那里自杀的。为了开始新的生活,我花了7年时间。7年里,我不想融入社会。我也不知道我在哪里,我努力生存下去,身边不断有朋友死去。我南下,又重新北上,四处游荡。关于过去、关于将来、关于现在的讨论永无休止,这使我们处于一种极度消沉的状态,终于我们精疲力竭了。这持续了很长时间。我和两三个活动分子保持联系,他们的友谊使我不至于完全消沉。”^③

米歇尔·勒·布里斯,前《人民事业报》主编,1977年出版了《踏风前行的

① *Ibid.*, p. 13.

② Guy LARDREAU, Christian JAMBET, *L'Ange*, Grasset et Fasquelle, Paris, 1976, p. 10.

③ Claude LUCAS, cité par Virginie LINHART, *Volontaires pour l'usine*, *op. cit.*, p. 236.

人》^①，重续与文学的前缘。他的作品充满诗意和梦幻，这是人们以为他在极左派斗争中早已失去的。这本书也体现了当时发生的文化转向。反抗者在革命狂潮中游荡了几年后，找到了原来的东西：“沙滩、光秃秃的荒野、像最后的审判中的岩石——我诞生于这段未结束的、雕凿的奇怪的历史，从远古而来，介于大地和海洋之间。布列塔尼，不完全是陆地，但又远离大海。这是我重获生命源泉的机会，是我的歌。”^②

此后，米歇尔·勒·布里斯从兰波、安托南·阿尔托以及一些浪漫派作家处汲取灵感。这些艺术家是“信仰狂热者”、“理想主义者”，他们“坚持作品和生活的紧密结合，用自己的呼声反对这个世界。”^③他们代表了理想中的不可能的反抗——意图改变生活，却只能通向死亡，“不是死亡压迫我们、围困我们、侵蚀我们、奴役我们，而是真正的生活、绝对的生活、‘玩命的生活’。”^④这种“玩命的生活”可以自我满足，它以纯粹的反抗询问着思考者：“你们用生命做了什么？”^⑤被谩骂和不被理解的艺术家的形象取代了革命激进分子的形象，但两者统一在一场有价值的反抗中，“历险只是过程，不是目的”。^⑥

米歇尔·勒·布里斯庆祝“这个消费的、疯狂的、大笑的、无理性的、浪费的社会”^⑦，他以此来反对国家的那种抽象和冷漠的逻辑。美学的观点代替了牺牲和严肃：“‘改变生活’或者把美学视为伦理的一部分。”^⑧此观点对世界进行革命性改造，使它的假想力量让位于生存的其他方面：“除了‘节日’理论、‘愉悦意识’，用形式创造内容的艺术和留长发的事实就比无数本马克思主义著作更能动摇社会。但像1973年8月数十万人在拉扎克高原集会的场景也很稀有了。惟一的花费是心灵的花费，聚在一起是平静的幸福。”^⑨

浪漫主义重新具有了参考价值，因为它体现自然和宇宙原始亲近的同时，也包含了失望和对革命的抛弃：“当他们（浪漫主义时代的医生和物理学家）注意到宇宙中的人和宇宙本身是密切相连的整体，其中任何元素都参与对整体的

① Michel LE LRIS, *L'Homme aux semelles de vent*, Grasset, Paris, 1977.

② *Ibid.*, p. 10.

③ *Ibid.*, p. 93.

④ *Ibid.*, p. 91.

⑤ *Ibid.*, p. 93.

⑥ *Ibid.*, p. 264.

⑦ *Ibid.*, p. 216.

⑧ *Ibid.*, p. 265.

⑨ *Ibid.*, p. 271-272.

构建,也同时对整体产生影响的时候,他们就以如今被称为生态学的先驱者的形象出现了。”^①

浪漫主义作家反对法国大革命后诞生的国家,宣扬女权主义和生态学的新价值,也提出了和失望的激进分子类似的问题:“如何让一个不再适合居住的世界回复原样呢?如何把理智从疯狂中解脱出来?如何让西方重新具有女性化内质?如何再次找到世界的‘东方’?(这里的‘东方’不是地理意义而是精神意义的名词:让迷路的人重新找回方向的星星。)”^②现存的反抗摆脱了革命这一意识形态的束缚,而意在找回最初的纯粹,就像浪漫主义作家一样,倾向于“探求内心的圣地”^③。

人类再也不能在改变世界的斗争中找到幸福,而只能借助对神秘精神力量的思考和赞扬,这是一种使人类和世界活跃的力量。梦想和想像应该重新得到重视,但要以抛弃创建美好社会的念头为前提:“如果我们不想头脑僵化,至死不悟,我们应该让‘踏风前行的人’(兰波)在我们中间发言。”^④我们从等同于政治的革命幻想走向同样变得激进的美学观点。勒·布里斯写道:“在这个介于大地和海洋的地方,我打算写写政治家的结局。”^⑤

政治被彻底等同于它自身包含的谎言和残忍,从而再无地位可言。但是,在五月运动后诞生的毛主义自发者内部,它难道有过地位吗?

承担自己的责任

前毛主义者走错了路,他们过去的举止让他们背负起责任感,甚至是很难摆脱的犯罪感的重负。当然,这些活动分子没有杀人,但他们不是选择了一种会导致这一后果的逻辑吗?回顾过去自己在懵懂无知中经历的事情,不免感到后怕:“法国的毛主义者没有时间、没有力量、没有愿望用鲜血去彰显活力。这很好!但共犯暴行的条约,我们不是一样签了吗?”^⑥

中国发生的事情被认为是“与其自身歪曲影子的较量,这是很可笑的,虽然

① *Ibid.*, p. 243.

② Michel LE BRIS,《Le romantisme ici et maintenant》, *Le Nouvel Observateur*, 19 mars 1979.

③ *Ibid.*

④ Michel LE BRIS, *L'Homme aux semelles de vent*, *op. cit.*, p. 65.

⑤ *Ibid.*, p. 10.

⑥ Claudie et Jacques BROUELLE, *Le Bonheur des pierres*, *op. cit.*, p. 127.

我们不愿意承认这种影子,但我们早就知道它存在于内部”^①。尽管我们强调中国和法国的社会历史条件并不相同,尽管法国的毛主义者最终没有沦为恐怖主义,但是,这无关大局。

在这些条件下,我们明白扪心自问是特别沉重的事情。伦理和道德从前被认为是属于资产阶级性质,因而人们宣称要摆脱它的说法又占据了上风,这就像内疚一样。当加缪写下这些话时,它们难道不是比萨特的论述更有道理吗:“我惧怕不痛不痒的暴力。我惧怕说得多而做得少的人。这正是我和其他大思想家不一样的地方。只有当他们自己举起枪时,我才会停止对他们号召献身的蔑视。”^②

虽然我们承认“毛主义领导者不会用笔杆子杀人”^③,但对前活动分子来说,这个问题必然会反复出现、不断纠缠:为什么我们没有尽早与之决裂?当我们认为或多或少参与了这个世界最后几项集权制度的建设后,我们怎样才能忍受、接受过去的自己?悲哀在于历史“不会有重来的机会”。道德在被当做“小资性质”遭到粗暴丢弃后,很有可能像包袱一样压在大家心中——我们的良心是否永远也不能平静?

我们对一个否认现实、类似教派的组织的奇怪的运行机制进行思考。我们可以回头看到很多现象:“组织看法的内心化”、“精心编织的谎言”、“逃避责任的想法”。必须承认软弱的存在,一些人不敢在集体面前说“我”,离开集体似乎就没有得到拯救的可能性。我们不是借助团体和能动性才摆脱生存苦难、学会接受自我和人类生存条件的固有限制吗?活动分子难道没有“摆脱生存重压、忧愁和责任的欲望吗”^④?在这种情况下,错误不应该归于掌握学识的最高领导、意识形态或是组织,而应归于自身的懦弱。思考是有益的,可以让人更谦虚。

在组织内部,谎言、懦弱、可疑的行径比比皆是,导致友谊破裂、勾心斗角。活动分子信奉的意识形式忽略了那些被称为是“次要”的问题。但我们确定可以“接受这些卑鄙的事情,如果人民群众的解放需要以此为代价”^⑤?空想的集权逻辑广泛存在,但真正试验者甚少,它后来发展到如此可笑的地步以至于都

① *Ibid.*, p. 74.

② Albert CAMUS, *Essais*, Gallimard, coll. «La Pléiade», Paris, 1965, p. 356, cité par Claudie et Jacques BROYELLE, *Le Bonheur des pierres*, *op. cit.*, p. 118.

③ Claudie et Jacques BROYELLE, *Le Bonheur des pierres*, *op. cit.*, p. 42.

④ Jean CONILH, «L'homme animal politique», *Esprit*, juillet-août, 1957.

⑤ Claudie et Jacques BROYELLE, *Le Bonheur des pierres*, *op. cit.*, p. 93.

付诸东流。这并不意味着它在现实中没有影响,也不意味着个人责任不存在。

但为了有效地质询个人责任问题,还是应该保留些自我欣赏。对很多极左派活动分子来说,这种欣赏却很难做到。在对自己的评价中,耻辱和仇恨从什么时候开始产生的呢?把先前针对社会的攻击转向针对自己,这种愿望应该也很强烈。在这一致命的逻辑下,一些人走上了绝路:吸毒、自杀或是流浪。另一些人知道它将会把自己引向危险的境地。但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这些人重新振作呢?又有谁来审判他们?

从一种盲目到另一种盲目

毛主义者的经历还算短暂,它承受的悲剧性不足与经历了斯大林主义和集中营的那一代人相提并论。但是,与50年代共产主义及毛的红卫兵的比较在代表性及作为其基础的假想逻辑方面还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些代表性在现实中有影响。但革命计划的失败不仅仅因为法国这样一个民主发达国家的具体现实,还因为“索尔仁尼琴效应”,因为世界各地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

如果说68极端分子没有彻底实践他们宣称的观念,那也是因为他们的主观愿望与宣称的革命模式有矛盾。这一模式号召为集体而牺牲个人。活动分子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理想要求奉献,甚至视死如归。1968年五月运动和反抗的一代都拒绝付此代价:他们很现实地实践战斗主义精神,从而导致了模式的崩溃。

最不具有列宁主义精神的毛主义者的危机很能说明这一新的主观精神,回溯过去时,这种危机也使当初积极活动的根基显现出来。从马尔罗到萨特,其间有超现实主义者和兰波,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从反抗文学中汲取养分,走上了与传统共产主义运动绝然相反的道路。这一来,艺术家与马克思主义者^①的误会消除了,他们本以为可以共同斗争,而这些反叛的继承人也可以与光荣的前辈一样,创造同样光辉的历史。至于那些积极参加极左派组织的年轻人,他们从来没有真正放弃极端自由主义。

法国毛主义者的经历和过去集权制度的比较虽然可以揭示假想机制的相似性,呈现出的却远不止欺骗。它让人意识到,在两个不同时代,发生着相同的运动、与集体和社会有着相同的关系。1968年五月运动让一种新的个体形象隆

^① Raymond ARON,《Le mythe de la révolution》, *L'Opium des intellectuels*, Calmann-Lévy, Paris, 1955, p. 56.

重登场，它渗入到革命模式内部，最终从里面颠覆了它。

后来被称为“新哲学家”的那些人还要把牌局搅乱：他们对所犯错误的忏悔出现在各种媒体上，他们似乎不惜代价以求得公众对他们疯狂青春的原谅，却不一定明白这段青春在主观精神之外还意味着什么。对他们来说，历史的相似将终结，伦理将成为挥之不去的诅咒。它超越了个人的范畴，走向社会和历史，成为法官，并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了犯罪的推理。与过去的相似使得不可捉摸的现在和将来串在一起，直到否定反专制主义的特点。就好像法国这样一个发达社会里六七十年代的年轻人的激进运动可以和斯大林时代及毛的红卫兵的共产主义行为相混淆。“新哲学家”借助媒体让闹剧取代了悲剧。

二十五、“新哲学家”还是左派救赎的新外衣

70年代后半期,以贝尔纳-亨利·莱维和安德烈·格鲁克斯曼为代表的“新哲学家”在媒体中频频露面,表现活跃。被称为出版界“女教皇”的格拉塞出版社编辑弗朗索瓦丝·韦尔尼发现了“新哲学家”的模式。这一模式于1976年6月经贝尔纳-亨利·莱维在《文学新闻》中提出后确实获得了成功。

这种“新哲学”倾向于“不经思考、不要领导、没有原则”,“打个比喻:这是一种新的浪潮,但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在被抛弃的传统的沙滩上汹涌澎湃”^①。它援引的学术多种多样:弗洛伊德、拉康、福柯、巴特……一如它招至麾下的作家各门各派。这一概念正式登场是在1977年5月27日,当时的电视节目《书艺谈》^②讨论以下话题:“新哲学家是左派吗?”节目中,贝尔纳-亨利·莱维和安德烈·格鲁克斯曼对格扎维埃·德尔库和弗朗索瓦·奥布拉里(《反对新哲学》^③一书的作者)提出的批评进行激烈辩论。

新哲学家针对知识分子和激进派无视共产主义现实的盲目表现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打乱了左派心中本已牢固树立的信条……但所提问题更像是为算账而来,使得纯粹的严肃思考很难进行。论战不断升级,数百篇与此相关的文章出现在国内外报刊上。安德烈·格鲁克斯曼^④和贝尔纳-亨利·莱维^⑤的书销

① *Les Nouvelles littéraires*, n°2536, 10 juin 1976.

② 《书艺谈》,原文是 *Apostrophes*, 曾是法国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读书节目。——译者

③ François AUBRAL, Xavier DELCOURT, *Contre la nouvelle philosophie*, Gallimard, Paris, 1977.

④ André GLUCKSMANN, *Les Maîtres penseurs*, Grasset, Paris, 1977.

⑤ Bernard-Henri LÉVY, *La Barbarie à visage humain*, Grasset, Paris, 1977.

量均接近 10 万册。

很多 68 分子对这些新哲学家的憎恶并不仅仅因为他们借助媒体大肆宣传。新哲学家们自视为五月运动真正继承者而表现出来的趾高气扬激怒了那些在他们尖刻的发言中找不到共鸣的人。很多参加或曾经参加过运动的人看出了他们插手控制并改变五月后运动的企图,这种企图让运动变得可笑。

后 68 左派思想不能与乌尔姆大街出来的个别人的经历混为一谈,后者从共产主义学生联合会走到以《人民事业》为代表的毛主义。正如我们所见,后 68 左派思想包含的流派多种多样,包括从极端自由主义思潮到新列宁主义的各个版本。即使在毛主义流派内部,没有跟随新哲学家的不在少数。而新哲学家们也不是拥有完全相同的行为和革命经验,进过监狱或是近距离感受过中国的人和常与万塞讷及乌尔姆社团来往的人之间,就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就算所有人都追随这一思潮,作用也肯定不尽相同。

但是,与当时反对者所说相反的是,新哲学家并没有否认或背叛他们的观点,而是更倾向于去充分地实践它们。新哲学的“形式”体现的不是毛主义内部救赎的左派思想的消亡,而是左派思想向一种提倡伦理、反对极权的媒体化形式的转变。

新哲学家穿上毛主义外衣后,变成了人权的捍卫者。此外,他们继续与被控含有人类所有罪恶的社会与文化算账。国家、理性、启蒙哲学……迅速受到质疑,但倒没必要把它们定性为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不过,老实说,这种定性之前就通过一种在马克思主义和毛主义中找到理论依据的好战修辞传达了出来。

古拉格和集权制的披露证实并强化了有关历史、有关镇压、有关法西斯的黑暗而恐怖的观点。而人民,在不断反抗的工人阶级不再为其代表后,就以被社会抛弃的毫无地位者的形象出现,无所归属、持续流浪,成了所有政权的牺牲品。至于其余人群,他们倾向于被视为会受到教训的因循守旧之徒。但对那些曾经参加过运动的人来说,1968 年五月运动后,一切曾有可能向不同的方向发展吗?

在新哲学家身上,“新”体现得更多的是一种长久的存在方式和对异类人的叱责。对黑暗历史的回顾和沉重的负罪感扩散到更大范围;与此同时,新的诅咒者在知识分子和新闻工作者的圈子里出现。后 68 分子的秋后算账仍在继续,并吸引了大众驻足观看。

一切都裹足不前

这个世界变得糟糕，越来越糟糕，新哲学家一再重复左派思想率先提出的普遍不幸论的老调。他们继续把自己当做这个世纪反对疯狂和不幸的布道者。希特勒和斯大林阴魂不散，仍在人们的头脑中盘桓不去。新哲学家非但没有让人们明白过去发生的事，反而把这种纠缠搬上舞台，并以纯洁的英雄自居。他们抛弃了好战与革命的修辞，转而视它为攻击目标。但他们也没有与过去及现在的历史和解。

安德烈·格鲁克斯曼这样写道：“这个世纪的孩子啊，你们是布痕瓦尔德^①和科雷马^②的孩子，虽然我们还扭转不了这种状况。”^③这是一个野蛮的世纪，充斥着酷刑、坟墓和屠杀。它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多种法西斯主义、疯狂的殖民屠杀、集中营式的社会主义以及热核竞赛”^④。因为有确实存在的大屠杀和残忍之事做依据，这番言论具有了病态的蛊惑力和犯罪感，略带疑虑但仍靠拢来的信徒增加了。

我们将在自己的时代寻找所有被认为可以预示古拉格事件的东西。借鉴米歇尔·福柯是自然不过的事。17世纪关押精神病人的普济院可以视为集中营的前身，1971年12月对图勒囚犯暴动的镇压与俄罗斯监狱发生的事类似，移民劳工是我们现代的奴隶……从殖民战争、1914—1918年一战期间对外国工人大量征用，一直到纳粹及苏维埃集中营……指向似乎很明确：“如果说西欧任由集中营扩张而不强烈反对，那是因为它是它自己眼都不眨地创造了它。”^⑤新哲学家发展了一种彻底产生犯罪感的逻辑，它拒绝接受历史的双重性，阻止与传统中积极因素的和解。

贝尔纳-亨利·莱维多次使用了决然的表达方式：“世界是一场灾难，人类受难深重”；“政治是假象，至善是不可能达到的”；“人类再反抗也不过是失败的上帝、糟糕的种群”^⑥……后来发展成为“引发灾祸的反动机器”，成为“恐怖和残

① 位于德国东部城市魏玛附近，纳粹曾在那里建造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译者

② 位于苏联远东，雅库梯亚境内，也曾建有集中营。——译者

③ André GLUCKSMANN, *La Cuisinière et le Mangeur d'hommes*, *op. cit.*, p. 15.

④ André GLUCKSMANN, *Les Maîtres penseurs*, *op. cit.*, p. 75.

⑤ André GLUCKSMANN, *La Cuisinière et le Mangeur d'hommes*, *op. cit.*, p. 74.

⑥ Bernard-Henri LÉVY, *La Barbarie à visage humain*, *op. cit.*, p. 85.

酷的代名词”^①。他看透了这个世界：“世界会变好，我们是这么说的吧？这一点倒是可以确定，因为它不会转向^②。但死亡的念头从来没有如此直接、如此强烈地爆发过。神第一次离开了我们，也许是厌恶在我们居住的那片焦地上迷失自我。而我，在这个已被残忍改变了人类生存条件的时代里写作。”^③

他用一种历史悲观主义代替对“美好明天”的设想，这种悲观主义只承认带有浪漫主义的伦理抗议，摒弃现在的真实的智慧：“这可能是受到惊吓的那代人的口号：扼杀乐观主义和高兴的理由，默默承受悲观主义，在失望中麻醉自己。”^④西方历史将被概括为古拉格和反古拉格运动的历史。我们应该承担我们的过失。而新哲学家将以调转矛头攻击历史的方式来扛起这副重担。

上帝的新使者

他们的姿态不是主张性解放的反对秩序的魔鬼的姿态，而是西方忏悔思想，甚至是使命永不终结的救赎天使的姿态。他们把谦虚抛至一旁，希望成为抨击这个世纪所有懦弱和罪行的勇士。

他们的语调力图表现得谦和，却又当仁不让地包含了伦理和说教的色彩。它散布好与恶的观点，根据一些表面看来很简单的区别重写历史：法西斯面对反法西斯，极权者面对反极权者，并且始终站在正义的一方。与左派占据上风的时代相比，参考标准已然改变，但涉及其中的始终是相同的精神机制：历史缩影、模式论、种类混淆以及专断的评价。新哲学家在这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盛气凌人不亚于先前抨击无产阶级假想敌人时的态度。在他们眼里，只有对人权的维护（维护所有政权及暴行下的牺牲者）和个体或集体的反抗（反抗国家及各种政权形式）是好的。言论的内容变了，但结构依然一样。

新哲学家在宣称要弘扬“人民事业”后，又证实再也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毛派的圣徒传记被否定后，恶行东山再起，遍地开花。此后的历史不再是为争取光明未来而进行阶级斗争的历史。它倒退了，“以匀速线形的步调向恶迈进”^⑤。但

① *Ibid.*, p. 154.

② 原文中“转向”用的是“tourne”，但这个词还有“运转良好”的意思，所以贝尔纳-亨利·莱维用这个双关实际上还是表达了悲观的看法。——译者

③ 同①，， p. 9.

④ *Ibid.*, p. 85.

⑤ *Ibid.*, p. 154.

口号看起来似乎合乎伦理：“是有难忍之事，但必须毫不松懈地抵制它。”^①“临时的道德”归结为这句“简单的口号：无论残酷来自何方，抵制住它的威胁”^②。有谁会反对呢？

在缺乏对现象的分析和理解时，推崇伦理具有传达对屠杀和苦难愤怒的象征优势。它可以让人一开始就在辩论中占据有利地位，而把对方推到墨守成规或残忍事件同谋者的行列。民粹主义和毛式惨象隐没了，古拉格及暴行下的牺牲品成为谈论的主题，但这两种情况都是拿内疚心理做文章，以证明某个简短言论的合法性。新哲学家开创了伦理学的社会及政治用途，收获了众多信徒。

政权和国家，恶的新形象

历史成为恶和纯粹的反恶斗争进行奥妙无穷的较量的地方。这种反抗再也不会听从于发言要求或是屈服于某项指令，它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反抗它的对立面：主人、政权、国家。有了新哲学家后，后68分子对获取政权的幻想达到了巅峰。它渗入生活各个层面的暴力再没有必要被定性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或是资产阶级。政权丝毫不带双重性，它就是恶的新形象。

在安德烈·格鲁克斯曼眼中，现代国家是“惩戒机器”、“敌视监狱”（参见米歇尔·福柯），它也拥有知识分子专家，“惩戒社会的专家”^③。1968年五月运动之后，这种言论并不具有新意，它只是简单地褪去了革命的华丽外衣。

现代国家成了恶的化身，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关于历史上国家是理性化身的观点受到了指责。新哲学家援引了黑格尔哲学中国家与理性同一这一最极端的论述。补充一句，从黑格尔和法国大革命起，国家实施的镇压和屠杀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发展。认为国家可以成为代表自由的理性机构的观点被轻易地抛在一边了。

人们通过马克思的作品直至黑格尔、费希特、尼采的作品莫名其妙地把他们当成“大思想家”，并认为他们是对恶负有责任的，欧洲过去及现在都在遭受其痛苦。安德烈·格鲁克斯曼写道：“由国家组成的欧洲极力排挤边缘人群。大思想家传位于大清洗者，他们把犹太人和同性恋扔进纳粹集中营，把所有背离自己意识的扔进俄罗斯集中营。自由的欧洲希望更平和地实现同化和正常

① *Ibid.*, p. 11.

② *Ibid.*, p. 221.

③ André GLUCKSMANN, *Les Maîtres penseurs*, *op. cit.*, p. 117.

化,文化灭绝取代了肉体灭绝。”^①在这些条件下,与欧洲文化达成和解是非常困难的。

在贝尔纳-亨利·莱维眼中,趋向独裁的政权到处都是,它是一种“不真实的形象,因为它根本找不到地位;它是一个不能回避的整体,因为它用一纸政令囊括了世界上的分歧与统一”^②;它是“全部与虚无”;它是“含有无限能量的不真实”^③。莱维参考拉康解释道:“简单来说,这个词、这个概念,也许就是他们(弗洛伊德学说的信奉者)称之为‘幻觉’的东西。”如前所述,它似乎很难理解。

他继续告诉我们,政权的真面目实际上是被极权主义揭露的:“没有一个政权不渴望专制;为了避免这样发展,必须制定完备的规则、标准、禁忌与限制,一个自由的国家是自我审查的国家,但沉沦于集权后,它除了摧毁法规、破坏这些存在数百年的限制外,什么也不做,它因此而成为真实的自己。”^④

国家拥有控制思想的有效工具——灌输驯服理念的教育。1789年革命者把教育摆到中心位置不就证明了这一点吗?米歇尔·勒·布里斯写道:“学习,可以让人接受(国家的)理性,理解国家这一机器,就像在头脑中放置了一个警察。管理方法——换句话说,置人于死地的方法——中最讲究、最文明的形式是:把作为国家产品的教育植入头脑。”^⑤

仅用法语一种语言扫盲、教学,可以消除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代表的其他文化的痕迹。这一举措被解释为“清空头脑以方便接受知识”^⑥,而那些受到质疑的“知识”已等同于主要用于镇压的国家实质。这种过于简单的看法完全忽略了启蒙运动和公共教育的初衷:它们并不是想让公民成为国家的驯服工具,而是成为能够自我判断、自我决定的独立的人。

与宣称的同过去决裂相反的是,新哲学家恰恰归属于1968年后期理论左倾主义之列,这一思想把国家看做是独裁,甚至是“法西斯”的化身(见第12章,安德烈·格鲁克斯曼仍是毛主义者时号召对“新法西斯主义”进行分析)。新哲学家简单回顾了“从康德到毛,中间包括费希特、黑格尔、马克思及其同伴”^⑦的那段历史,粗略地比较之后断言理性与自由毫不相干,而是奴役的同义词,是压

① *Ibid.*, p. 119.

② Bernard-Henri LÉVY, *La Barbarie à visage humain*, *op. cit.*, p. 31.

③ *Ibid.*, p. 32.

④ *Ibid.*, p. 156-157.

⑤ Michel LE BRIS, *L'Homme aux semelles de vent*, *op. cit.*, p. 122.

⑥ *Ibid.*, p. 126.

⑦ *Ibid.*, p. 101.

迫者的“理性”。“极权疗法”经历了乱七八糟的过程：教育、强制束缚和电休克疗法。

新哲学家不是拿着锤子狠狠地进行破坏性的思考，而是轻描淡写地在好与恶之间敲敲打打。这些年轻的文人读过佩吉的作品：“我们知道理性不能代表生活，甚至不能代表生活中美好的那部分。……但我们要求人们不要忘记理性对人类而言绝对是不可或缺的条件。……理性有自己的方法。……这些方法完全可以充当我们研究社会现象时的工具。并不是在研究方式特别复杂、多变、棘手时，我们才能放弃一种重要的工具或是应该改变这种工具。”^①

在国家面前，惟一的选择就是斗争，单纯地反对国家的斗争。米歇尔·福柯最赞赏的平民阶层取代了工人阶级这一历史前进的动力。平民阶层只通过反对所有政权形式的暴动表现自己。他们即使动摇了历史，也不会强迫历史接受任何指令。这股潮流中汇集了流浪的犹太人、疯子、无家可归之人、生活不稳定的工人、失业者、贫民、罪犯，当然也包括农民这一“对国家没有任何概念的群体”^②，以及艺术家、儿童……除区别之外，这些斗争中新的无辜者有一个共性：他们不想被国家控制，所以宁可不要人管。与所有政治规划相比，这一阶层似乎没有记忆，没有将来。它也是不统一的：它的言论和行动粉碎了所有追求统一的意愿，而这统一也往往包含着极权的隐患。

新的媒体英雄

新哲学家转换了角色，从革命者变成“讽刺皇帝的小丑”，在媒体上代表受害者质问显贵近臣。他们既想承担又想救赎这一沉重的历史包袱，因而随心所欲地揭露那个世纪真实存在的恐怖与罪恶。他们急于表现自己是古拉格的见证人和历史的受害者，也不知分辨高低轻重，甚至接受《花花公子》的采访。^③

贝尔纳-亨利·莱维在世纪悲剧前以这样一种方式说“我”，引起了大家的反思：到底什么最重要？他在不幸上做文章只是为了更好地体现自我剖析的姿态，而看透世事的口吻也实在令人难以忍受：“我是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这对魔鬼夫妇的私生子。在奇怪的黄昏，我听见武器在碰撞，受刑人在呻吟，云层

① Charles PEGUY,《De la raison》, Œuvres en prose complètes, tome 1, Gallimard, coll.《La Pléiade》, Paris, 1987, p. 853.

② Michel LE BRIS, *L'Homme aux semelles de vent*, op. cit., p. 196.

③ Numéro de *Playboy* sur les nouveaux philosophes paru en 1977.

在崩塌。除了纳粹主义和红色的法西斯主义,我并不知道这个世纪还有什么革命能彪炳千秋。……如果我是诗人,我会为明天等待着我们的生存的恐惧和(古拉格的)新岛屿而歌唱。……而我是哲学家,只有玩弄词藻,苦思冥想,干那些蠢人已干过的事。我只能用我的语言讲述墓穴、集中营、死亡的同行者等我见过或仍能记起的东西。”^①索尔仁尼琴和肉体上经受过压迫与残害的人是与这样一种夸张的笔调毫不相干的。

在暴行面前,贝尔纳-亨利·莱维的媒体形象树立了起来。当有人问他是否曝光率太高时,他马上抬出“阿根廷的受刑之人”和“苏联古拉格的囚徒”,对他们来说,公开他们的处境等于重新给他们希望。媒体可以让民众通过了解屠杀和受害者的痛苦而变得不再冷漠。他还补充道:“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媒体万岁!舆论万岁!因为在言论大战即意识形态斗争中,它掩盖了谋杀的喧嚣声。同样,表演万岁!因为通过表演,我们对坟墓和屠杀感同身受。”^②

重现恐怖和无休止地重提屠杀足以挑起一场新的运动吗?让公共空间充斥着本世纪真实存在的恐惧和罪恶很可能在人们头脑中形成挥之不去的顽念,而不是帮助他们理解过去发生的事情。新哲学家在媒体面前反对罪恶的号召什么都不能改变。有谁能否认他们这种揭露中包含着自我表现的欲望呢?他们自以为在五月革命后的废墟上取代了马尔罗和萨特,可以代表知识分子运动者的新形象。新哲学家终结了后68左派发动的破坏事业,开启了80年代的“空虚时代”。

与马克思主义决裂

人们常常把新哲学家描述为数典忘祖的人,即抛弃马克思主义、毛主义以及这两者衍生出来的革命理念。但如果有决裂,也应该知道是与什么决裂。他们进行的秋后算账表明了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及现实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必定得不到众多参加过运动的人的赞同。“新哲学”的领军人物——贝尔纳-亨利·莱维、安德烈·格鲁克斯曼、克里斯蒂安·让贝、居伊·拉赫多、让-保罗·多莱……都曾经是乌尔姆大街上高等师范学院的学生,而哲学家路易·阿图塞正在此任教(见以下章节)。

^① Bernard-Henri Lévy, *La Barbarie à visage humain*, op. cit., p. 9 et 10.

^② Bernard-Henri Lévy, entretien avec Christian Delacampagne, *Le Monde Dimanche*, 20 janvier

贝尔纳-亨利·莱维谈及路易·阿图塞的作品时说“这些生涩的书籍像重复口号一样攻击着他们的观念”，这种笔法“如同一个神奇的机器，可以调动起学习的愿望和战斗的激情”^①。他补充说：“对我而言，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感觉欠他很多。”^②居伊·拉赫多写道：“和阿图塞在一起，我们总有种‘摆脱’的欲望。简单说，在他‘严格的’管教下，我们加速行事。我们看很多的书，我们把很多东西概念化，我们被科学吸引；我们忙于一项使命：学习和让别人学习。”^③

很多学生摒弃路易·阿图塞的理论主义后，在毛主义中找到了他们缺乏的对实践的狂热；1968年五月运动的出现也像一种启示：“没有马克思、没有列宁，群众照样有了思想，不仅产生不计其数的新观点，而且开始把这些观点系统化。”^④一项重大的转变由此发生：真理不是从马克思纲领性的文件中寻找出来的，而是存在于人民群众的斗争中。因此，教条主义像宣传真理一样吹捧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可以概括为毛泽东著作中提炼出来的一条简单原则：“造反有理。”人民群众的思想成为历史的真理，被注入纯洁的新内涵：“他们自己的想法、压迫的想法只受到外部禁令的限制，受到阻止它们流传的举措的限制。不是奴役的念头，而是纯粹的反抗的念头、纯粹的历史的念头。因为这样，它才是真理。”^⑤

居伊·拉赫多建议把列宁和斯大林的所有著作替换为“写满趣闻轶事、画满革命空想的书册”^⑥。革命不再是科学的问题，而是渴望和信仰的问题。这样一种突变可能会招人取笑，但老实说，被抛弃的不仅仅是列宁和斯大林，甚至还有理性的观点：“理性总是站在压迫者的一边，因为它是为压迫者自我辩解准备的言论。”^⑦马克思主义在相继被奉为科学和革命的号角后，又将像先前轻易地受到崇拜一样轻易地遭到抛弃。这种转变是令人震惊的。

安德烈·格鲁克斯曼抨击自己及众多毛主义者以前保持的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而从此以后，他就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视而不见的本领”、“闭上眼睛的

① Bernard-Henri LÉVY, *ibid.*, p. 213.

② *Ibid.*

③ Guy LARDREAU, *Le Singe d'or*, Mercure de France, Paris, 1973, p. 21.

④ *Ibid.*, p. 25.

⑤ *Ibid.*, p. 52.

⑥ *Ibid.*, p. 162.

⑦ *Ibid.*, p. 89.

艺术”^①、“说教者的言论”^②……他似乎发现“一段柏拉图的对话要比一万本套话连篇的马克思主义作品精妙得多得多”^③。当他写下“对‘掌权者和受管者，哪个看得正确’这一问题，马克思主义每次都回答‘掌权者’^④之时，他不得不承认对照马克思的论著，这样一种句子绝对有违常规。而且，与一些屡遭质疑仍持续发展的科学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不仅生产科学悖论，还生产集中营”^⑤。安德烈·格鲁克斯曼又补充道：如果说它是一种科学，“那它也应该是权力的科学，是20世纪夺取、维持、巩固政权的所有方式、观点和行为的科学”^⑥。马克思的论著、被视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有组织的共产主义运动、相配套的实践和政权……一切都已规划好。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古拉格……我们因此可以很容易地从一个阶段滑到另一个阶段。当怨恨的情绪占据上风时，那些鲜明的观点再也无足轻重。人们不惜添油加醋以求挽回自己的声誉。

至于贝尔纳-亨利·莱维，他宣称马克思主义是“维持秩序的思想”、“人民的鸦片”、“夸张的形象”，并且“暂时性地取代基督教”，“以确保自身使命在任何情况下的完整性”^⑦。他也谈及了马克思主义和古拉格的直接联系：“这座苏联集中营马克思主义的程度不亚于奥斯威辛集中营法西斯主义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不是一门科学，而和其他主义一样是一种意识形态，也和它们一样运转，目的是掩盖真相的同时重塑真相。恐怖不是无产阶级国家偶尔滋生的偏差、疣或脓肿，而是资本论规律的必然结果之一。”^⑧

新哲学家更轻易地焚烧马克思主义是因为他们曾经把它视作一种可以或多或少解决人类主要问题的理论。这种平庸的虚假的转变不过是他们与这一理论宗教关系的延续，却在今天遭到了甚至是提出新哲学家模式的弗朗索瓦丝·韦尔尼公然的、无耻的批判。1998年，一个记者问她：这一知识分子模式还剩下什么？她回答说：“什么也没有。”然后进一步阐述：“我明白这几个作家——安德烈·格鲁克斯曼、贝尔纳-亨利·莱维、居伊·拉赫多和克里斯蒂安·让贝——都害怕马克思主义和法国的大学，这些大学崇拜了康德两个世纪之

① André GLUCKSMANN, *La Cuisinière et le Mangeur d'hommes*, op. cit., p. 41.

② *Ibid.*, p. 190.

③ *Ibid.*, p. 191.

④ *Ibid.*, p. 64.

⑤ *Ibid.*, p. 63.

⑥ *Ibid.*

⑦ Bernard-Henri LÉVY, *La Barbarie à visage humain*, op. cit., p. 197.

⑧ *Ibid.*, p. 182.

后,只崇拜卡尔·马克思。我们应该还记得,直到1980年萨特去世之前,知识分子气的法国还多少信奉马克思主义。1977年的插曲标志了与传统的正式决裂。而说到底,这是一项保健事业。所有的经院哲学都是不好的,而马克思主义成为了一种经院哲学,这使得人们得以摆脱思想束缚;继而开始卖书——这才是行动的最终目的。但是,在这种骚动下,并不存在产生新思想的冲动,新哲学也就注定了经受不起时间的考验。”^①

一切都以某种方式表达了出来。无论如何,必须承认,“清洗”“经院哲学”的唯利是图行为是一种胜利。但我们不应该以新哲学家颇具说服力的无稽之谈来解释这种转变,他们的言论更多地属于辱骂和否定,而非批判。为了解释这种转变,我们必须追溯到根源、回到路易·阿图塞的作品上去,并仔细体会它们所引发的失望情绪。

^① Françoise VERNY,《Chéri, j'ai un truc à te dire》, entretien avec Daniel Garcia, Livres Hebdo, n° 278, 30 janvier 1998, p. 278.

二十六、阿图塞的马克思主义：被误会的历史

60年代末，乌尔姆大街上的高等师范学院成为培养众多年轻毛主义学生的第一个摇篮。学习马克思主义不可避免地会受教于哲学老师路易·阿图塞。他是法国共产党员，负责编纂弗朗索瓦·马斯佩罗出版社1965年创办的内部文集《理论》。他的作品和研究成果在1968年五月运动前后都广泛传播，并享有极高的学术声誉，这种声誉超出了马克思主义团体，也超出了法国国界。

1968年五月运动前，阿图塞被认为是结构主义流派的创始人之一（和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雅克·拉康、米歇尔·福柯一起）。但他更被许多人奉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能够在共产主义团体内部出现混乱时进行理论革新。路易·阿图塞接受毛主义，但绝不脱离共产党。直到生命尽头，他都一直在和法共内部他认为偏离了理论的东西和破坏民主的做法作斗争。他是批评激烈却鲜有行动的反对者的典型形象。

阿图塞从事的事业学术氛围很浓，他号召大家重新阅读马克思的作品。在法共内部理论混乱之际，他的作品因强调严谨、概念清晰、敢讲真话而受到了很多共产主义学生的欢迎。这位哲学家希望走出理论偏差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困境，弥补共产主义运动理论不足的缺陷。对还不了解马克思的年轻新成员来说，他的作品《保卫马克思》振聋发聩。1965年，这本由弗朗索瓦·马斯佩罗出版社出版的书籍已被革命的那代人奉为“经典”；五月运动之后它的发行依然一路看涨。从1965年到1980年这15年间，它的销量达到近5万册。

在《保卫马克思》的序言里，路易·阿图塞强调了这本书涉及的文化背景。苏共二十大（1956年2月）标志着一个新的阶段：赫鲁晓夫开始揭露斯大林的所

作所为,批判“个人崇拜”。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人们见证了某种教条主义的消亡,整体氛围似乎有利于研究。但这种新形势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混乱。阿图塞写道:“一些人有点迫不及待地宣布哲学就是对他们向往解放和爱好自由的思想的评论。”^①

与同时代法共内部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同的是,路易·阿图塞认为人们狂热信奉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右倾版本,它只建立在年轻马克思的论著基础上。阿图塞打算修正的正是这一偏差,依靠通常用于“精确”学科的认识论的思考方法来研究马克思的作品。

不知晓那个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战的人可能不会明白这项工作的意义。阿图塞的举措实际是在一项正统观念内做批注,它与1968年五月运动后的言论自由并无多大关系。但即使这样,它还是深深影响了众多相信马克思主义的重建事业会圆满完成的年轻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了更好地理解1968年之后的时代和阿图塞作品的效果,我们必须仔细研究影响了六七十年代的这样一种意图和它导致的知识僵局及主观僵局。

以马克思和科学的名义

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路易·阿图塞着手重读马克思,这种批判性的阅读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建设工作”、“可以看清马克思,分辨出意识形态中的科学成分”^②。他在马克思论著中引入了后来引发诸多评论的“认识论的断裂”。从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或然判断到科学的或然判断,马克思应该已经完成了“彻底的理论革命”。这一“断裂”可能发生在1845年左右,标志着“历史科学”的开始。

阿图塞重读马克思时,把矛头直接对准了马克思作品关于人文主义的阐述。他这样写道:“马克思以激进地批判人类哲学为代价,完成了历史的科学理论。……在这一理论的严谨表述下,我们可以、也应该发现并公开马克思的理论上的反人文主义,并且透过这种理论上的反人文主义看出它对人类世界持积极认识的绝对不可能性。”^③由此,马克思著作的某些方面被降到了意识形态的范畴。

① Louis ALTHUSSER, *Pour Marx*, François Maspero, Paris, 1965, p. 21.

② *Ibid.*, p. 31.

③ *Ibid.*, p. 229 et 237.

如果我们遵循阿图塞的论述,那从认识的角度来看,人文主义再也没有存在的必要,它成为“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定论已下,他的追随者自会应用:“只有在人类的哲学(理论)神话被粉碎的绝对条件下,我们才能了解到人的一些东西。所有试图倚仗马克思主义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复兴理论上的人类学或人文主义的想法,从理论角度看,都只不过是一堆灰烬。”^①

重读马克思使得那个时代的众多学生再次捧起书本,分辨马克思的各个文章处于他思想变化过程中的哪个阶段^②。但这一事实不应使人忘记把马克思著作中科学与意识形态区别开来的大胆追求。但实际上,“意识断裂”使得诸多信奉者因正确阅读了马克思作品而沾沾自喜。他们授予自己援引“科学”的权利,从而绝妙地把对手推进了“意识形态”的阵营。

在《保卫马克思》中,路易·阿图塞又发展了“多元决定”的概念,它对许多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来说是另一项重大的理论创新、一条丰富的研究途径。这一概念不仅针对黑格尔辩证法和马克思辩证法的理论界限问题,也旨在回答一般的共产党在分析某一事件或某一特定形势时不可避免会遇到的难题:国家、政治力量的关系、信仰……它们很明显在奠定局势时或历史事件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但被正统的共产主义学说当做是次要现实;它们一上来就被纳入把生产看做决定性因素的简单阐述中,认为经济基础自发地决定司法、政治、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更粗略地说,共产党已经把劳资对立视为最终的解释形式。

作者指出,历史上工人运动的失败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劳资矛盾从来就不是简单的事,它通过所处的具体的历史环境和外在形式表现出来。”^③国家、意识形态、宗教、国家历史、特定的历史形势、世界背景……构成了多样的决定因素。路易·阿图塞的方法是使辩证法的基本纲领复杂化,但也不对它提出质疑。他引入“多元决定”概念的方式看起来并不一定能阐述清楚这个问题:“‘矛盾’与它所处的社会躯体结构密不可分,与它生存的外在条件密不可分,与它管理却也因此深受影响的机构密不可分。它在同一种运动中决定与被决定;它也被自身推动的不同级别的社会教育所决定;从根源上我们可以说它被多元决定。”^④

对加入他阵营的人来说,对复杂决定的抽象解释似乎是修辞学。由此得出

① *Ibid.*, p. 236.

② 在这一方面,人们有权喜欢奥古斯特·科尔尼的不可替代的作品,它成为理解马克思知识起源时首要的参考资料:《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出版社 1955—1970 年出版的四卷本。

③ *Ibid.*, p. 104.

④ *Ibid.*, p. 99-100.

的结论是：不同的因素在带有“因果循环”色彩的作用与反作用的图解内相互决定。正如作家自己所说：“在没有更佳选择的情况下”，“多元决定”的理念被当成“标志”、“问题”或用于体现黑格尔辩证法和马克思辩证法的区别。

事实上，这一理念也以阿图塞试图诠释的真实的马克思主义的名义，把保存思想精华作为职能。采取的措施重在针对复杂问题，但同时也与理论保持着教条主义关系。指出理论不足或失败的言论每次都会被转化成思辨问题，以必要的深化为名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因此，即使事情没有马克思经典教义宣传得那么简单，它的纯粹的理论也没有受到冲击。

这样一种举措不是没有让人联想到神学，正如雷蒙·阿龙所指：“阿图塞应该像之前数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运用精心挑选的引语，把自己的想法假借马克思之口说出来。神学家的方法是挑选有用的文章，断章取义，然后胆大妄为地宣布马克思没有充分理解自己的真实想法和自己创建的科学革命的意义。”^①

文化及精神的孤立

阿图塞的计划如此抽象，以至于它与可感知的现实的联系不是那么理所当然。无产阶级、资产阶级、阶级斗争……似乎是除了同属一个范畴之外并无一致之处的概念，而在这个范畴中，他只认为自己提出的问题才是合情合理的。

对路易·阿图塞的众多信徒来说，导师所作解释的抽象性、僵化性和理论排他性将使它处于文化及精神的孤立状态，从而觉察不到现实的考验。我们可以反思，与共产党60年代面临的问题相比，这样一种切分到底有何意义。科尔内留斯·卡斯托里亚迪是《社会主义还是野蛮行径》节目（见以上章节，第一章及随后那章）的主持人，他写道：“你们想讨论俄罗斯、讨论斯大林的政党、讨论资本主义卓有成效的发展吗？请你们读一下《资本论》吧。你们关心肮脏粗俗的现实吗？请你们遵守‘理论’秩序。”^②

言论似乎在绝对信奉理论的人划定的封闭场地内绕圈。追随者们因为不确信自己可以正确阐述创始人的理论，选择了对其言论的无比信服，所以一切事情都围绕着对根本理论的重读和深化来开展。因此形成的团体对内对外都

^① Raymond ARON, *Marxismes imaginaires*, Gallimard, Paris, 1970, p. 204.

^② Cornélius CASTORIADIS, *Les crises d'Althusser. De la langue de bois à la langue de caoutchouc*, *Libre*, n°4, 1978, Petite bibliothèque Payot, Paris, 1978, p. 240.

保持着警惕,而反对背离和修正的斗争也似乎永远不会停止。

路易·阿图塞的作品以高度抽象的论述证实了有关科学和意识形态的原始论断,它们与斯大林和毛的经典理论相对应:一方面是正确的观点,另一方面是错误的观点。1968年4月,共产主义杂志《思想》发表了一篇文章《作为革命武器的哲学》^①,作者在文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正统的观点之一,它包括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和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直到科学知识的两大“陆地”——希腊人开创的数学和伽利略开创的物理学^②出现后,历史的新“科学”才诞生。马克思主义科学和哲学构成了“无产阶级斗争不可或缺的两大理论武器”^③。

阿图塞采纳把哲学概念和政治行为紧密连在一起的列宁主义思想,引入“理论中的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允许“哲学的新实践”,它意味着在科学和意识形态中做出选择。理论中的阶级斗争建立在划定了敌对双方范围的、简单的二元模式之上:“哲学斗争的最后赌注,就是世界两大思想潮流(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争霸斗争。主要争论点在于:赞成还是反对科学知识。因此,第一大哲学斗争就在科学和意识形态的分界线上展开,利用科学的唯心主义哲学和为科学服务的唯物主义哲学针锋相对。”^④

理论中的阶级斗争为了回应政治领域的阶级斗争,引入了同种类型的划分:“正确观点和错误观点之间的理论分界线;人民(无产阶级及其同盟军)和人民的敌人之间的政治分界线。”^⑤路易·阿图塞解释道:最终,“成为了哲学上的共产主义者,也就成为了马列主义哲学的拥护者——辩证唯物主义”^⑥。哲学成为信奉阿图塞的年轻毛分子后来用以反对法共内部意识形态者和“修正主义者”的“革命武器”;在他们看来,这些人已经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

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的毛主义学生在阿图塞的作品中找到理论依据,坚定了工人阶级最优秀、小资意识不可取的立场:“无产者有一种‘阶级本能’,可以很容易地站到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上;而知识分子有天生的小资意

① Louis ALTHUSSER, 《La philosophie comme arme de la révolution》, *La Pensée*, n°138, avril 1968, repris dans *Positions*, Editions sociales, Paris, 1976.

② *Ibid.*, p. 39-40.

③ *Ibid.*, p. 37.

④ *Ibid.*, p. 43.

⑤ *Ibid.*, p. 46.

⑥ *Ibid.*, p. 36.

识,会粗暴地抵制这种转变。”^①他们的再教育过程必定“漫长、痛苦而艰难”,这是一个“没有终点的内外俱有的斗争”^②。知识分子不应该忘记他们本身充满了思想,也不应该忘记阶级出身的烙印还压在他们肩上。不管是生活在乌尔姆大街的封闭社团还是生活在工厂里,这些小资产阶级性质的知识分子会一直不停地为他们与生俱来的错误赎罪吗?

对没有与乌尔姆大街那个社团交往过的革命学生来说,证实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上的反人文主义同样产生了超出意识范围的影响。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从批判人创造历史这一观点(科学马克思主义则被认为是在宣扬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转到肯定马克思主义是实践上的反人文主义的观点。因此,不仅要在知识领域,还要在伦理及实践领域驳斥人文主义观点的理论价值。虽然这显得非常荒谬,但援引阿图塞的理论上的反人文主义有利于后68左派证明自己毫无理论内涵的狂躁批评是合理的。

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阿图塞和拉康

阿图塞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层次上思考马克思主义,这对精神分析学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影响。作者有过几次抑郁症的经历,接受了精神分析疗法。他阅读弗洛伊德和拉康的书。在开过几个有关“青年马克思”和结构主义的研究班后,他于1963—1964学年开了一个关于精神分析学和拉康的研究班。1965年1月,他在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官方杂志《新批评》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弗洛伊德和拉康》^③的文章。1976年,这篇文章和他的其他一些作品一起被转载在《立场》^④上,也成为了权威性的参考资料。

路易·阿图塞认为,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引发了人文科学领域的两大发现:历史“大陆”和潜意识。此外,这两种科学在质疑人文意识这一点上汇合。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是没有主体的进程。而精神分析学则质疑感觉自我、控制自我的主体,因此也反对某种“传统的、法律的、伦理的、哲学的形象;最终说

① *Ibid.*, p. 37.

② *Ibid.*

③ Louis ALTHUSSER, 《Freud et Lacan》, *La Nouvelle Critique*, n°161-162, décembre 1964- janvier 1965.

④ Louis ALTHUSSER, *Positions*, *op. cit.*

来,也就是意识的、‘人’的、人‘主体’的形象”^①。

路易·阿图塞思考着潜意识和意识的联系:潜意识发挥作用时,需要借助于意识吗?如果根据拉康所说,它的“构造和语言一样”,那这门语言的内容难道不是意识吗?^②这两种“新科学”成为各种修改和曲解的对象,很明显是为了否认它们的“革命性发现”。

事实上,阿图塞的思考是顺着两条平行线进行的,其中,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形象、阿图塞和拉康的形象像在镜中一样相互映衬。马克思的历史学与潜意识的精神分析学对等;阿图塞重读马克思与拉康重读弗洛伊德相似。路易·阿图塞认为拉康和他一样,在自己的领域重新研读缔造者的论著,以得出根本原则,反对理论上的曲解和修改。

当他描述拉康的理论工作时,我们可以发现一些与讲述他自己的工作相类似的表述,有时甚至只需要改一下词语:“在法国,如果没有拉康开创的意识的批评和认识论的阐述,弗洛伊德的发现还将带着它的特异性停留在我们接受范围之外。……拉康的第一句话是:就其本质来说,弗洛伊德创建了一门科学。一门有关新物体的新科学:潜意识。……为了了解弗洛伊德理论的成熟性,我们必须回到弗洛伊德身上。”^③阿图塞谈及拉康时,给理论家下了定义,这个定义也同样适用于他自己:“理论家不是根据某种感知的、临床的、实践的事实创造一种或几种对应的理论概念,而是建立起能考虑到全部事实及分析实践的相互间紧密联系的多种理论概念的普遍体系。”^④果然是雄心壮志啊。

路易·阿图塞计划制订一项《言论概论》,为此,他于1966年成立了一个理论工作小组。概论预计涵盖每个特殊领域的规律,包括不同学科(科学、美学、意识形态学、精神分析学)的特定规律和所有言论的普遍规律。但这一“概论”始终没有问世,只停留在做笔记和列提纲的阶段。^⑤这样一种计划不是没有令人联想到克洛德·勒福尔对“明确的极权性的寻找”^⑥,这是极权言论的特征之一;但两者仍然存有区别,而且区别还不小:阿图塞的言论与政权无关,不寻求实际的影响,只停留在纯粹的概念的范畴。这种言论似乎具有本质的脆弱性,

① Louis ALTHUSSER,《Freud et Lacan》, *La Nouvelle Critique*, n°161-162, loc. cit., repris dans Louis ALTHUSSER, *Ecrits sur la psychanalyse*, Stock/IMEC, Paris, 1993, p. 47.

② Louis ALTHUSSER,《Lettre à D... (n°2)》 *Ecrits sur la psychanalyse*, *ibid.*, p. 108 à 110.

③ Louis ALTHUSSER,《Freud et Lacan》, *ibid.*, p. 25, 29 et 31.

④ Louis ALTHUSSER,《Lettre à D...》, *ibid.*, p. 75.

⑤ Louis ALTHUSSER,《Trois notes sur la théorie des discours》, *ibid.*, p. 162 à 170.

⑥ Claude LEFORT, *Les Formes de l'histoire*, Gallimard, Paris, 1978, p. 310.

在一直进行的内部对话中只依靠自己。

无休止的自我批评

70年代带有“自我批评”的印记。路易·阿图塞在自我批评中委婉地表达他对马克思作品的初步评价，又试图在另一番言论中保留其根本思想，结果使得这一言论缺乏协调性。

阿图塞在1970年和1972年写的《自我批评要素》^①中，解释说自己弄错了：他在马克思的作品中以“科学和意识纯理论对立”的表象阐述认识论的断裂；而“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冲突只是一个特例”^②。此后，最重要的事不再处于这一位置。阿图塞在60年代的文章中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本身应该成为认识论询问的对象，现在又写道：“马克思主义科学和意识史前学之间的断裂不同于科学和意识的区别论，也不同于认识论。”^③

如果著名的“认识论的断裂”一直存在，而它的基础发生根本性变化：“马克思是在转到一个全新的立场，即无产阶级立场的情况下，引发了理论局势的效能，由此产生了历史学。”^④这一表述在他几年前所写作品面前又该置身何地呢？

阿图塞用毛主义辩证法及它关于主要和次要的划分掩盖自己先前言论的明确指向。他最终说明自己早期写作的“主要趋势”处于一个特定形势的内部，因此这些作品对阶级理论和阶级斗争很有帮助，而另一些“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立场和斗争有害引申”的理论只居于次要地位。

对不了解辩证法技巧的人来说，弄清楚状况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辩证法似乎是有利于使用者摆脱困境的工具。在这个形式理论的把戏中，我们看不到有什么可以阻止词语的颠倒。

在《答复约翰·路易斯》^⑤(1972)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类似的花招。约翰·路易斯是英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他一再指出那些被阿图塞归为意识形态的内容又自相矛盾地出现在被奉为科学经典的马克思著作中。阿图塞解释道，这些内容的出现意味着残存旧势力对即将胜利的新势力的反对。最有说服力

① Louis ALTHUSSER, *Eléments d'autocritique*, Librairie Hachette, Paris, 1974.

② *Ibid.*, p. 14-15.

③ *Ibid.*, p. 115.

④ *Ibid.*, p. 118.

⑤ Louis ALTHUSSER, *Réponse à John Lewis*, François Maspero, Paris, 1973.

的是“趋势”问题：“从趋势上看，马克思的科学工作使他摆脱受到质疑的意识范畴。”^①他又针对先前引入的科学和意识之间的混乱以及他的“理论曲解”进行了自我批评。

在《亚眠的答辩》^②这篇文章中(1975)，路易·阿图塞继续了这种风格的自我批评。他的作品十年前就被公认为对马克思的深刻解读，这种解读让争论超越了所有意识形态，衍生出一种试图区别于经验主义的“理论实践”。后来，他一再强调自己作品的笔战风格，用他的话来说，这种风格有时甚至接近“理论挑衅”。需要把这些作品放在当时的背景下研究，把它们看做激烈的论述，并考虑到它们在划界上的影响。他最初的文章还追求科学，现在却远不是这样，以至于人们寻思是不是一开始就只是个误解。

然而，路易·阿图塞还在继续证明马克思写就的历史学论文依然正确，并且指出根据“断裂”在文章中找出的异化概念可能会占据“尚未形成的一个或数个概念的位置，因为客观历史条件还没有生产出它们的客体”^③。这足以让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人目瞪口呆了。怎样在一种迂回曲折的思想中摸清头绪呢？它包含了所主张的，却也囊括了相背离的；虽然常常不经意地自揭其短，却又勉勉强强——其实是越来越站不住脚地——肯定自身的主要部分仍然正确。

70年代后半期，事情发展到顶峰。路易·阿图塞1977年宣布：“最终将是马克思主义危机！”^④他似乎那时就注意到了这一危机，在1978年一篇未完成的文章《局限的马克思》^⑤中，建议大家“不要再对现实视而不见”。他这样写道：“如今，我们还能从马克思的思想中得到什么根本性的却可能（也确实）从未被充分理解的东西呢？”^⑥这个问题针对马克思，也同样针对他自己。在这篇文章中，他把自己的作品完全推翻，最后一次试图挽救越来越形式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纯洁性。

他一再强调马克思作品的矛盾与软弱，还把别人在他之前作的一系列批评

① *Ibid.*, p. 54.

② Louis ALTHUSSER, 《Soutenance d'Amiens》, *Positions, op. cit.*

③ *Ibid.*, p. 171.

④ 《Enfin la crise du marxisme!》, intervention de Louis Althusser au colloque de Venise (11-13 novembre 1977), in *II MANIFESTO, Pouvoir et opposition dans les sociétés post-révolutionnaires*, Seuil, Paris, 1978.

⑤ Louis ALTHUSSER, 《Marx dans ses limites》, *Écrits philosophiques et politiques*, tome 1, Stock/IMEC, Paris, 1994.

⑥ Louis ALTHUSSER, 《Enfin la crise du marxisme a éclaté》, *Écrits philosophiques et politiques, ibid.*, p. 366.

归于自己名下^①。路易·阿图塞证实马克思的著作中存有一种“历史的哲学”和“共产主义下社会关系完全透明的潜在观点”^②。他还指出：无论在历史学还是经济学中，马克思都表现出了唯心主义，甚至包括《资本论》。这种新的解读也同样适用于意识形态、国家理论、葛兰西^③……所有阿图塞先前已长篇累牍分析过的主题。他以证实“马克思思想的另一‘绝对限制’——在思考‘政治’上的无能为力”^④作为结束。

评论毫不留情，但付诸实施的却总是同一个不切实际的工程——路易·阿图塞打算思考马克思没能思考明白的东西。“危机最终还是爆发了！它最终还是清清楚楚呈现在众人面前了！”他惊呼，但又马上补充，“一项纠正和修改的工作终于必不可少！”^⑤

在瓦解了一切之后，路易·阿图塞从哪里可以找到进行这项工作所需的资源呢？他是不是应该像科尔内留斯·卡斯托里亚迪1978年在《自由》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咄咄逼人的文章所说，经历“从木头语言到橡胶语言”^⑥的转变呢？或者像他最主要的合作者之一、哲学家艾蒂安·巴利巴尔^⑦1988年在《现代》^⑧的一篇文章中所写，这是“一种自我否定的写作轨迹的”^⑨病态标志？

失败和自我毁灭

艾蒂安·巴利巴尔在《献给阿图塞》^⑩一书中，提及了这个“无法回避的自我毁灭”、“具有主客观价值的零点”^⑪。他“察觉到阿图塞像被某种冷酷力量胁迫

① 尤其是科尔内留斯·卡斯托里亚迪和克洛德·勒福尔所作的批评（见以下章节）。

② *Ibid.*, p. 390.

③ 葛兰西(Gramsci), 意大利共产党创建人。——译者

④ 同②, p. 512.

⑤ *Ibid.*, p. 362.

⑥ Cornélius CASTORIADIS, 《Les crises d'Althusser. De la langue de bois à la langue de caoutchouc》, *Libre*, n°4, *loc. cit.*

⑦ 艾蒂安·巴利巴尔和路易·阿图塞、雅克·朗西埃、皮埃尔·马舍雷、罗歇·埃斯塔布莱一起写作了《读〈资本论〉》, François Maspero 出版社于1965年出版(新版本: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Paris, 1996)。

⑧ *Les Temps modernes*, n°20, octobre 1988, repris dans *Écrits pour Althusser*, *op. cit.*

⑨ Étienne BALIBAR, *Écrits pour Althusser, La Découverte*, Paris, 1991, p. 67.

⑩ Étienne BALIBAR, *Écrits pour Althusser*, *op. cit.*

⑪ *Ibid.*, p. 67.

着,去‘推倒’、‘分解’或是‘摧毁’自己以前所做的事”^①;他把察觉此事的过程描写了出来。

1976年6月,艾蒂安·巴利巴尔阅读路易·阿图塞发给他的一篇文章《弗洛伊德博士的发现》时,有一种似曾相识的奇怪感觉。后来他在阿图塞1964年的文章《弗洛伊德和拉康》中找到了相同的表达方式和同一类型的论据。但根本区别在于作者这次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他没有更改或颠倒原先的论据,但以相同的词语、有时是相同的句子,他又把之前黑的说成了白的,就像某个人试图悄无声息地迈步走到自己的对立面。”^②阿图塞对拉康的评价也同样适用于他自己。

文化及精神的孤立只会使理论陷入绝境。主体将退缩成言论范畴内的幻影,却还得带着破碎和悲剧继续生存下去。路易·阿图塞在系统地推翻自己过去创建的理论之后,还一如既往、徒劳无功地号召马克思主义的重建,但没多久,他突然陷入神经错乱——1981年11月,在极度谵妄中,他掐死了自己的妻子埃莱娜。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这位奇怪的大师能享有什么样的特权呢?他的重新解读就像在马克思的作品中寻找一颗永恒纯洁的内核,而他,一直都想充当这颗内核的守护者和诠释者。享有理论声誉和科学声誉的马克思主义对年轻的知识分子有着巨大的诱惑力。但路易·阿图塞不也是、甚至更多地是一个试图修补出现问题的理论和身份的人吗?正如雷蒙·阿龙在《想像中的马克思主义》(1970)一书中所写:“阿图塞的尝试处于马克思主义进程的这个阶段:在非斯大林化和新资本主义的相对胜利下,怎样重现非妥协保守主义?”^③

在这个“深信马克思主义、甘当传教士”^④的人身上有一种理性的狡黠,他绕过极其抽象的理论思考,来维护始终处于危机状态的主观共产主义身份,但其协调性最终还是消失殆尽。“认识论的断裂”和他自己都走入了绝境。他试图打上科学烙印的马克思主义以“拼凑”^⑤的形象告终。路易·阿图塞重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计划的失败是毋庸置疑的。再也没有一个人打算反对他曾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加以控制却徒劳无功的马克思主义危机了。

① *Ibid.*, p. 61.

② *Ibid.*, p. 64.

③ Raymond ARON, *Marxismes imaginaires*, *op. cit.*, p. 204.

④ Étienne BALIBAR, *Écrits pour Althusser*, *op. cit.*, p. 69.

⑤ Cornélius CASTORIADIS, *Les crises d'Althusser. De la langue de bois à la langue de caoutchouc*, *Libre*, n°4, *loc. cit.*

二十七、反极权主义的意义和局限

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质疑和对极权主义的批判中,《社会主义或野蛮》^①(见第一章)编辑部的两位前负责人——科尔内留斯·卡斯托里亚迪和克洛德·勒福尔的作品占据了70年代后半期的主导地位。

这两人以参加革命运动的经历、对官僚及工人阶级的批判性分析、对1968年五月风暴及反抗新形式的关注等一下子就赢得了众多68分子的好感。达尼埃尔·科恩-本迪特就是积极拥护者之一,他甚至在五月事件前就从他们的文章中汲取了灵感^②。

《1968年五月运动:突破口——关于这一事件的初步思考》^③在五月运动后立即出版。埃德加·莫兰、克洛德·勒福尔和科尔内留斯·卡斯托里亚迪(以让-马克·库德雷的笔名)在此书中以各自的方式强调了这一事件的新特点,这种特点用阶级斗争的传统观点是解释不了的。他们号召大家注意“‘忿激派’行动的重大影响,这是人们出于嘲讽给这伙人取的绰号,但他们似乎很高兴拥有这个称谓”^④。

勒福尔和卡斯托里亚迪的作品的传播及思想的影响力在左派观点大放异

① 《社会主义或野蛮》小组创立于1948年。与托洛茨基主义不同的是,它把苏联官吏剖析成新的剥削阶级。这一阶层的发展非但没有被认为是退化,反而被理解为发达社会的根本历史趋势。

② 这是他自己所说。他在1968年五月运动之后出版的《左倾主义:共产主义衰老症的良药》(见上述引文)中,引用了《社会主义或野蛮》文章中的一些段落。

③ Edgar MORIN, Claude LEFORT, Jean-Marc COUDRAY, *Mai 1968: la Brèche. Premières réflexions sur les événements*, op. cit.

④ 《Avertissement》, *ibid.*, p. 9.

彩的年代受到了限制；直到 70 年代后半期极左派危机和索尔仁尼琴效应出现的时候，他们的作品才深入人心。

卡斯托里亚迪发表在《社会主义或野蛮》杂志上的文章于 1973 年和 1979 年以袖珍书的形式再版^①。其中有几本很引人注目：在 1975 年出版的《想像中的社会构建》^②中，他以创新性的想像力和批判性分析马克思主义，重新阐释社会和历史，从而构建了一个富有意义的宇宙。

克洛德·勒福尔于 1976 年出版了《多余的人——对〈古拉格群岛〉的思考》^③。1977 年，卡斯托里亚迪、勒福尔和其他一些知识分子创办了《自由》^④杂志。1979 年，勒福尔 50 年代到 70 年代初的作品结集为《批判官僚主义的要素》^⑤一书出版。这些文章重现了勒福尔的思想进程，一种使他置身于马克思主义之外的进程。这两位作家那时都以批判极权主义的左倾理论家和先驱者的形象出现。《精神》杂志、法国民主工联以及主张自治的流派都对他们投以极大的关注，并在客观上促进了他们思想的传播。

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批判与“新哲学”进行的批判是完全不同的。他们不是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不是把它视为所有恶的根源，但从此以后，马克思主义也不再会被当做不可逾越的标准。他们对极权主义的批判也不是以否定政治为目的。这两位作家以各自的方式重新质疑民主和极权的尝试，并对五月运动后涌现的斗争新形式表达出极大的兴趣。

五月运动：革命的新形象？

克洛德·勒福尔在《突破口》一书中，强调了学生反抗的新特点：它的主动性与勇敢性在一段时间内打破了“现存制度合理、掌权者合法的神话”^⑥。他还

① Sept tomes de 1973 à 1979, Union générale d'édition, collection, 10/18.

② Cornélius CASTORIADIS, *L'Institution imaginaire de la société*, Seuil, Paris, 1975.

③ Claude LEFORT, *Un homme en trop. Réflexions sur «L'Archipel du Goulag»*, Seuil, Paris, 1976.

④ 这份杂志由 Petite bibliothèque Payot 出版，于 1980 年 5 月停刊。它的编委会成员包括：米格尔·阿邦苏尔，科尔内留斯·卡斯托里亚迪，皮埃尔·克拉斯特，马塞尔·戈谢，克洛德·勒福尔和莫里斯·吕西亚尼。

⑤ Claude LEFORT, *Éléments d'une critique de la bureaucratie*, Gallimard, Paris, 1979. Les essais rassemblés dans cet ouvrage ont été publiés en 1971 par la Librairie Droz (Genève).

⑥ Claude LEFORT, «Le désordre nouveau», in Edgar MORIN, Claude LEFORT, Jean-Marc COUDRAY, *Mai 1968: la Brèche. Premières réflexions sur les événements*. op. cit., p. 41.

指出：始于农泰尔的反抗运动形成于党派、工会、激进的小团体之外，它“没有领导、没有等级、没有纪律”，它“反对专门反对社会的人，破坏主宰对立生活的游戏规则”^①。这一行动以“此时此地的具体形势”为出发点，“大大激发了集体的想像力，鼓动了每个人的模仿并远远地超越这种欲望”^②。它的影响力不局限于大学，它成功动摇的政权模式事实上占据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大学难道不是“占统治地位的心理结构生产、再生产的特定场所吗”^③？在他看来，学生的行为因为“体现出资本主义社会特定社会关系的尖锐对抗”^④而具有革命的意义。

克洛德·勒福尔思考着：“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么能在一个把革命定为制度的社会、一个假设无权者有权的神话中想像革命的发生？”^⑤在他看来，运动的第一阶段中，一些忿激派的言论、尤其是达尼埃尔·科恩-本迪特的言论并不符合这一方向，而是把“极端大胆”和“现实主义”结合起来。作者写道：“如果我没弄错的话，这种语言并不根源于对摆脱诸多矛盾的美好社会的幻想。如果它是从此后几年的新型行动中汲取的灵感，如果数目大增的团体们喜欢创造的同时又不失去对现实的考虑，那我们应该承认：革命已经成熟了。”^⑥正如人们所见，这一愿望并没有实现。起源于学生公社的左派运动确切说来与“喜欢创造”和“考虑现实”背道而驰。

科尔内留斯·卡斯托里亚迪也在《突破口》一书中极力称道学生们表现出来的积极性和“自主行为”。但1968年五月运动本应该揭露“官僚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衍生出其他所有冲突的主要冲突”，即“领导者和执行者之间的冲突”^⑦。一段新的历史在他面前打开，他号召开创新的革命运动。他的建议与学生公社的诸多想法不谋而合。不仅要废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还要“取消领导者与执行者作为社会阶层的划分”。取而代之的应该是一种“自治，即依靠活动执行团体对活动的自主的、民主的管理”。这意味着“尽可能广泛的直接民主”、“负有特殊责任的代表可以被选、可以被撤”、“随时被选被撤的代表委员会

① *Ibid.*, p. 47.

② *Ibid.*, p. 50.

③ *Ibid.*, p. 54.

④ *Ibid.*, p. 53.

⑤ *Ibid.*, p. 61.

⑥ *Ibid.*, p. 62.

⑦ Jean-Marc COUDRAY, 《La révolution anticipée》, in Edgar MORIN, Claude LEFORT, Jean-Marc COUDRAY, *Mai 1968: la Brèche. Premières réflexions sur les événements. op. cit.*, p. 95.

实施活动的协调性”^①……

科尔内留斯·卡斯托里亚迪认为,革命计划不应该企图建立一种已设计好的、被认为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新社会。个人及社会的自治才是这项计划的目标:“我们称之为革命政治的东西是以实现所有人的自治为目的来组织和引导社会的实践,并且承认这一计划必须以社会的根本变革为前提,而这种变革也只有在重新开展人类自主活动的条件下才可能实现。”^②

1968年五月运动及随后发生的一些新运动的意义正是以此观点阐述的。新运动紧随工人运动之后;工人运动在重大的历史时期质疑社会的整体构架,引发了工会和党派之外新的自主组织形式的出现。青年、妇女、少数团体等的新斗争似乎把这种自治的要求具体化了,并且以卡斯托里亚迪的看法,它们针对资本主义主要的想像意义,寻找并感受新的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③

卡斯托里亚迪的阐述建立在模棱两可的基础上。历史上发生的工人议会运动和应该继承其衣钵的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的新运动之间的对应关系并不是那么理所当然。正如人们所见,五月运动后的抗议体现了对自治的特殊要求,但这一要求不是顺着卡斯托里亚迪设想的方向发展,最终令集体的观点都变得可疑。在以找寻个人、集体自治及民主新形式的角度阐述这些运动时,人们低估了它们具有的新主观性和破坏性后果。卡斯托里亚迪在《突破口》一书中以自己的方式指出了这一点:“我们不能以拒绝所有组织形式来超越官僚主义的组织形式,不能以拒绝所有界定目标和方式来超越纲领和规划的贫瘠僵化,不能以谴责真正的理论思考来超越没有生命力的僵硬教条。”^④这种已出现在学生公社内部的拒绝在随后几年确实得到了发展。

把人民群众和工人议会自主管理的革命希望转向1968年五月运动及那些“新社会运动”后,这样一种前景虽然表现得很有活力,却只会走入同样的死胡同。直接民主自治的要求并不考虑国家和中介机关这一必不可少的角色,它把历史的迟钝也只当成我们生存条件的一个元素来关注。那困难历史时期以外的自治和直接民主又该怎么办?能重新打开历史缺口的创造性事件什么时候

① *Ibid.*, p. 108.

② Cornélius CASTORIADIS, *L'Institution imaginaire de la société*, *op. cit.*, p. 106.

③ 其中,生态运动尤其受到卡斯托里亚迪的关注;他直接质疑没有限制、理性掌握的观点,它是资本主义“想像核心”。参考资料: Cornélius CASTORIADIS, Daniel COHN-BENDIT et le public de Louvain-La-Neuve. *De l'écologie à l'autonomie*, Paris, Seuil, 1981.

④ Jean-Marc COUDRAY, *«La révolution anticipée»*, in Edgar MORIN, Claude LEFORT, Jean-Marc COUDRAY, *Mai 1968; la Brèche. Premières réflexions sur les événements*. *op. cit.*, p. 105.

会再次出现呢？人民群众因循守旧的沉闷时刻不是显得越来越长了吗？

马克思主义：“无法超越的范畴”的终结

随着70年代后半期涌现出的一系列质疑，卡斯托里亚迪和勒福尔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获得了以前不曾拥有的听众。他们的批判针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和它对社会及历史的设想。这些批判揭示了马克思思想的不明确性，尖锐质疑19世纪实证主义包含的诸多先决条件。这两位作者以各自的方式指责那时有利于左派的辩解制度和思想体系。

卡斯托里亚迪从这样一个事实出发：不管人们愿不愿意，马克思主义总被最具压迫性的政治制度或自以为多多少少充当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各种小团体用作遮掩的面具或宣告合法的理由。它已经成为一种僵化的理论，一种马克思明确定义过的意识形态——“一整套与某种现实相关的观点，但不是为了阐述、改变现实，而是为了在想像中将它隐瞒、为它辩护，这使得人们言行不一，表里不一。”^①

对卡斯托里亚迪而言，这样一种退化不是阐述和执行马克思理论中的简单事故或错误。它与工人运动的官僚主义化有关。但是，也应该对使得这一形势成为可能的理论因素进行思索。马克思主义的确包含着革命的成分：要求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要求思考者和在社会中活动以求改变社会的行动者的联系，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最深刻、最持久”的贡献。但这些成分仅仅停留在预言和提纲的阶段。事实上，它们很快就被后来占据主导地位的另一经济及历史研究方法遏制了下去。作家们的批判针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揭示了它是如何深受黑格尔历史哲学和19世纪实证主义的影响。

卡斯托里亚迪解释说：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传达了这样一个观点——“所有事物都有内在规律，它将使一个理想的社会奇迹般地出现”^②。现实和历史是完全合理的：黑格尔哲学的影响显而易见。马克思主义的“客观理性主义”是一种哲学暴力：“它（马克思主义）从事实中提炼出来的合理性实际上是它强加给事实的”^③，它“提前为自己建设了一个合理的世界”^④。从这一马克思主义固有的

① Cornélius CASTORIADIS, *L'Institution imaginaire de la société*, op. cit., p. 15.

② *Ibid.*, p. 58.

③ *Ibid.*, p. 72-73.

④ *Ibid.*, p. 73.

哲学概念出发,共产党可以宣称拥有绝对的权力。对此,作者写道:“如果真有一种历史理论,真有在事物内部运行的规律,那么,很清楚,发展的领导权应该交给这一理论的专家,交给这一规律的技术师。”^①

对卡斯托里亚迪而言,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再也站不住脚了。它带有决定论的印记,而这一决定论在其因果关系的说明中是以自然科学为模型的,仍然受到经济主义的束缚。卡斯托里亚迪只愿意在另一个概念范畴考虑社会和历史。对社会现象的阐述离不开历史社会赋予它的意义,即哲学思考引发出来的意义。“目前为止所有社会都试图解答以下几个根本问题:对集体而言,我们是谁?一些人对另一些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在哪里,是何处境?我们想要什么,渴望什么,缺少什么?社会应该明确自己的‘身份’、布局、世界、自己与世界及世界所含客体的关系、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愿望。没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没有这些‘定义’,就没有人类世界,没有社会,没有文化——因为一切都处于未分化的混沌状态。想像意义扮演了为这些问题提供答案的角色,很明显,这一答案是‘现实’与‘合理性’都不能给予的。”^②

60年代,克洛德·勒福尔同样指出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衰退”^③,并把它与社会发展相联系。认为生产资料所有者和工人阶级的矛盾仍然是发达社会主要矛盾的想法已经不太现实。矛盾变得多样化,不仅反对剥削,还反对各种机构拥有权力的合法性。勒福尔1958年离开《社会主义或野蛮》后^④,又与被他称为幻想的东西断绝了关系:“我承认把历史压缩进阶级界限内、把它变成实现共产主义的因素并没有意义。此外,我对自己曾经这么执著于这项不可能的事业而深感惊讶。”^⑤对他而言,马克思主义不仅带有可以代表全人类的阶级色彩,也深受“社会均一、透明”^⑥观点的影响。如果马克思承认阶级分裂和阶级冲突,却拒不接受社会一开始就统一观点,那么同时,他也在设想能消除所有这些痕迹的新社会的到来。

① *Ibid.*, p. 81.

② *Ibid.*, p. 205-206.

③ Claude LEFORT, 《La dégradation idéologique du marxisme》, *Cahiers du centre d'études socialistes*, n°34-35, nov. -déc. 1963. Repris dans *Éléments d'une critique de la bureaucratie*, *op. cit.*, p. 308.

④ 关于这一点,可以参看文章《组织和党派》,它见证了作者与《社会主义或野蛮》的分裂。这篇文章刊登在《批判官僚主义的要素》一书中,见上述引文,第98页。

⑤ Claude LEFORT, *Éléments d'une critique de la bureaucratie*, *op. cit.*, p. 10.

⑥ *Ibid.*, p. 11.

因此,马克思用阶级观点对民主的阐述是不被人们接受的。作者强调:如果说在历史上,民主的到来与资产阶级的的发展恰巧一致,那事实上资产阶级在适应民主原则之前就已经打败了它。它“因为无法消化的原则,在历史舞台上承受了无产阶级的入侵”^①。民主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提供了“各自解放的可能性条件,并决定了它们对立的规律”^②。同样,权力、法律、知识等也不能被理解为统治阶级或掌握政权的政治力量手中握有的镇压工具和思想工具。民主社会把每项因素分开,承认不同活动领域无法遏抑的自治。

勒福尔在他的批判中极力揭示马克思主义设想的局限性。马克思虽然在一些文章中承认这一思想体系的重要性和有效性,却把它的作用限定在为统治阶级利益掩饰、辩护上。因此,这一思想体系更接近资产阶级的言论,而无产阶级似乎可以摆脱这种思想,“客观地”阅读历史和社会。无产阶级只是发现了以某种方式标记在生产中的意义:“马克思试图把社会活动简化为生产活动,把社会关系简化为生产活动中缔结的关系,但这不是以阻止他考虑个人和集体、私有和公共之间的区别而告终吗?他试图缩小经济和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征的政治、法律(及其他所有部门,尤其是教育和美学)的分化,但这也不剥夺了他思考社会构建、家庭增多等交换条件(或者如他所说,人被人承认的条件)建立的基础的能力吗?”^③因此,勒福尔被引导着重新思考民主和集权的试验,并把社会象征性的一面放在了中心位置。

反集权主义批判的更新

在《对〈古拉格群岛〉的思考》一书中,作者借助对索尔仁尼琴的批判,努力揭露镇压和恐怖的表象下、最反常的行为中隐藏的极权逻辑。具体说来,理解极权主义意味着充分考虑极权这一思想体系。它不能被当做“镇压”这一现实的面具或烟幕,事实上,它与这一现实有着直接的关系。它构建了一整套的观点,阐述极权与现实的关系,这些东西即使再不真实,也还是造成了不计其数的破坏。

勒福尔强调:极权主义带有融合公民社会和国家的意图,“国家侵入公民社

① Claude LEFORT, *Éléments d'une critique de la bureaucratie*, op. cit., p. 11.

② *Ibid.*, p. 12.

③ Claude LEFORT, *Un homme en trop. Réflexions sur «L'Archipel du Goulag»*, op. cit., p. 186-187.

会,把它所有的部门置于自己永久的控制之下,在所有事物间采取同样的标准,这是因为它借助党派可以渗入到社会领域的方方面面。”^①个人及不同社会团体的特殊性在全体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的景象中消失殆尽。各种活动方式的特异性、生活方式、信仰、观点的多样性……也同样趋向淡化。权力被认为代表了人民和这个统一的社会,它也自我表现出“浑然一体”的姿态。

通过这些不同的方面,一种对摆脱了相异性、内部分裂及冲突的统一社会的虚幻追寻浮现了出来。这个“浑然一体”的虚幻逻辑主导着构成极权制骨架的所有机构:公民社会、国家、党派根据一种身份链相互混淆,这种身份链直达“独裁者”这一单独代表社会躯体统一的最高领袖。

勒福尔指出了这一逻辑的另一面:在极权制度体现出社会、人民、国家、党派相统一的同时,驱逐、清除了以前被定性为剥削阶级或外国特务的人。否认内部分裂导致了另一群只能生活在社会之外的人的出现。因此,有关无分裂社会、人民、统一权力的观点与有关敌人、寄生虫的观点不可分割,而后者却是需要不惜代价消灭的:“极权主义的构建意味着对无区分社会的幻想。它只能成形于无休止地生产并消灭多余的人、寄生虫、垃圾、破坏者之中。”^②苏维埃政权把它的敌人驱逐、孤立、关押在天涯海角、在远离社会之外的集中营里。集中营重新产生微缩版的极权社会;官吏们可以在此毫无阻碍地实践他们关于统一社会的幻想。

另一种极权主义的现象在勒福尔的阐述中清晰起来:众多共产党员和参加过五月运动的激进者表现出“甘愿受罪”的态度。用历史环境或政治体制做出的传统解释与表现得离经叛道的那些事物相冲突。作者继索尔仁尼琴之后反思:如何理解斯大林集中营那些共产党员的态度呢?他们认为自己的囚禁是一个错误或一件意外,斯大林永远是无可争辩的领袖。

当他们受到可怕的镇压时,他们并没有被怀疑所控制,而是继续重复典型言论。他们甚至尊重集中营的管理者,而后者事实上握有他们的生杀大权。勒福尔写道:“在深渊尽头,他们复制了微型的共产主义世界,并把它缩小成图样。……他们在顶峰上生活,却突然措手不及地被推进了深沟。这是一个颠倒的世界,无法抓住现实,一大堆的问题冒出。但是,回答马上就安排好了,以避免落入什么都不知道的境地。……是法律践踏、处死了他们。但这法律仍然是

① *Ibid.*, p. 71.

② *Ibid.*, p. 88.

苏维埃的法律。”^①这是对现实的否定,但如何理解呢?

斯大林时期,共产党员接受审判时态度也一样。他们最终屈服于法官,承认那些令人发指的指控。他们受到的压迫和恐怖不足以解释这一现象。大家思考着:“为什么一些坚定不移的布尔什维克、一些1936年前刀枪不入的人在受到控告后,马上像木偶一样崩溃了?”^②1936年布哈林接受审判时的言论准确体现了一个握有革命真理、除此之外一无是处的共产主义政党一直施加在他身上的思想影响。勒福尔写道:布哈林不能“摆脱他一直以来都接受的观点,这种观点过去赐给了他力量,而现在却要把他毁灭。”^③作者还对“很明显背离了唯物主义法则的”^④这一现象进行思考。

“花岗岩思想”

克洛德·勒福尔认为,共产党员表现出盲目是因为他们深受一种似乎可以抵挡所有拒绝、所有现实教训的特殊思想的控制。极权言论深植“坚信”之中,这份“坚信”“受益于所有论据,可以点燃所有木材,否认矛盾……”^⑤

极权观点以宣称囊括了所有历史和社会的自我封闭的“重大知识”的形象出现。它采取已完成的协调制度的形式,包含并预先设想所有可能的问题或经历,抹去所有矛盾和相异性的痕迹。最出乎意料的事件被归于不可触犯的范围,“仍然在思考的步骤”不可避免地被略为“已经思考过了”:“表面上,人们尊崇历史;但事实上,恰恰相反:人们渴望一个没有历史的社会,一个所有不确定性都会遭到摒弃的社会,一个可以预先平息事件的社会,一个原则的未知数不会超过未知数的极限。”^⑥

这种观点坚信自己置身于所有思想体系之外,坚信自己只是表达了一个铭刻在现实中的真理。克洛德·勒福尔写道:“对他们(思想正统的共产党员)来说,现实在法律上是透明的,事情的意义一览无遗;他们倚仗的理论也同样是透明的,任何人只要愿意学,都可以明白它的含义。无论是从现实到理论,还是

① *Ibid.*, p. 167 et 169.

② *Ibid.*, p. 142.

③ *Ibid.*, p. 142.

④ *Ibid.*, p. 167.

⑤ *Ibid.*, p. 170.

⑥ *Ibid.*, p. 172.

从理论到现实，途径总是显而易见的。”^①马克思的作品自认为反映了这种现实，因此也变得透明，而且一下子明白易懂。勒福尔写道：“因为这是一个奇迹，创建者的观点受到了和社会现实一样的阅读。但在被认为是不确定的人的身上，它什么都不是。”^②与此同时，言论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消失不见，所有阐述工作都变得可能。现实一眼就能看出来，大家再也不用受混沌和神秘的困扰。

因此，共产党与对手或对话者相比拥有一种无法消除的优势：它不是处于思想幻想的范畴，而是能够“从现实出发阅读现实”，它的言论只不过是现实的反映，因此，它可以置身于任何可能的反驳之外。这种拒不考虑哪怕是最微小的事、最微弱的异议的态度就像苏维埃党吏身上的典型言论，但这种言论不仅仅存在于他们身上，根据勒福尔的说法，“它一刻不停地被激进的共产党员挂在嘴边，不过，除了这些人，进步左派的杰出代表也如此表现。”^③

纯系盲目吗？

这一批判切中肯綮。它公开使人盲目的机制，以正当理由揭露旨在使不可接受之事合理化的辩解体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有益的。它重新质疑共产党的骄傲自满和施加给左派的思想压力，以及法国众多知识分子在宣称支持法共和苏联中表现出来的随波逐流。批判的重点是言论和观点，从而揭示出共产主义政党和或多或少按照这一模式运行的小团体的信仰及工作机制。更广泛地说，这是一种积极参与和理解现实的模式，包含着后来被揭发出来的奴役和对现实的否认。如果说共产党和革命者是首先受到质疑的一批，那左派激进分子也不能逃脱反思的命运。

但是，为了表现得有益，这一批判并没有考虑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斗争的规模，法国知识分子与左派激进分子的行为没有简单成对某种思想的拥戴、为某种言论着迷或是具有教派性质的机制。在共产党面前，战后的法国知识分子不仅仅要和充满观点的言论或秘密运行的官僚机器打交道。参加过五月运动的激进分子也不仅仅是观点的支持者或官僚体系中可相互替换的成员。法共重新聚集起众多出身于工人阶级及群众阶层的党员。作为政党，它融入法国政治圈，同样依靠当时社会、政治形势中的真实因素。这些因素被纳入已意

① *Ibid.*, p. 174.

② *Ibid.*, p. 175.

③ *Ibid.*, p. 171.

识到它们存在的共产主义思想的事实,并没有让它们消失不见。

运动的动机在于追求“离理论远些,离日常心态和信仰近些”。1946年,埃马纽埃尔·穆尼耶写道:“共产党员不再依靠马克思主义生存,不再为马克思主义牺牲;就好像一般的教徒不再为神学痴狂,不再因加农的一篇文章殉教。虽然这两者在行为和生活范围中充满了有关教条的美好前景,并自愿把一生奉献给自己其实并不理解的东西。”^①

把共产主义思想和经历过它的人以及它帮助群众实现的愿望分离开来,我们就可以把赋予行动初始意义的因素搁在角落里了。时代背景和良好的意图并不能证明盲目、松懈、愚蠢的合理。可是,共产主义运动受到的拥护或同情并不能简化为想像中的纯粹的否认性言论。它们发挥其他主要方面的作用以有益于积极参加政治行动的人,这是极权思想方面的分析解释不了的。

重新被发现的民主

勒福尔回溯自己离开《社会主义或野蛮》后的历程时,这样写道:“我再也不呼吸马克思主义的空气,等待一场真正的革命对我来说显得那么徒然,对或纯真或虚伪的美好社会的信仰总是令人生畏。……目前,对我而言,忠诚于绝对自由主义的民主观点比继续共产主义梦想、认为它能摆脱极权噩梦更有气势、更大胆、更忠于我最初的行为,或者用一个老套的、扭曲的、却无法替代的词语,更革命。”^②正是在社会内部和东西方国家发展壮大的斗争中,民主的要求越来越明显:“运用武器或运用言语,这是一部分人和另一部分人寻求民主的方式。”^③历史似乎彻底受到了这种持续进行的寻求的影响。虽然遇到很多阻碍,民主的要求还是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出来。历史会迈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观点和历史带有不连续特点的观点相抵触。对多种形式的反抗和对五月风暴后的新社会运动的关注取代了对工人阶级这一历史中心主题的关注。

勒福尔深入思考后于70年代末宣布:“的确,从某种意义说,没有人掌握民主的形式,作为一种野蛮民主,它体现得更多的是它本身。也许正是这组成了它的精髓:一旦没有社会秩序赖以规划和确立的参考标准,这种社会秩序就会一直不停地寻找它的基础、它的合法性。正是在享受不到民主的人的抗议或要

① Emmanuel MOUNIER,《Débat à haute voix》, *Œuvre*, tome 4, Seuil, Paris, 1963, p. 121-122.

② Claude LEFORT, *Eléments d'une critique de la bureaucratie*, op. cit., p. 12 et 15.

③ *Ibid.*, p. 28.

求中,民主找到了自己最充足的动力。”^①但是,在勒福尔看来,这些斗争不能无视国家和法律的存在。

从1968年后运动导致当局象征性标记的解体来看,这样一种趋势绝对不是理所当然的。这种变化没有逃脱作者的眼睛,他指出了70年代末新形势的根本特征:“随着权力机关的衰退,曾经清晰异常的划分的模糊,很多区别——不管是正常与病态的区别、成人与儿童的区别、不同性别的区别还是开化与未开化的区别——都为与当局冲突提供了标志。”^②

勒福尔深入思考后,努力说明民主在历史上出现的重要性。它的到来不能被简单理解为某种制度的变更或某个阶级权力的获取。民主在历史上的出现意味着对社会、社会基础、受到质疑的象征性社会结构的整体描写。

他的阐述揭示了一个主要的方面。之前,社会建立在宗教或神话的基础上,而民主对废除社会对超验性范畴的依恋有着深刻的影响。社会范畴的合法性不再依附这一基础,它失去了确定的标准,成为争论中的公开问题。勒福尔指出:这种民主的实验使得社会承认相异性和变化,使得人们可以想像一个有着多种发展可能的历史。它是社会实践、全球发展、文化及风俗多样性的主要条件。^③ 权力、知识和法律的合法性是一个公开的问题,依赖于争论来回答。因此,某种形式的“再下赌注”一直进行着,它是民主的特性。

勒福尔的阐述为了解民主和民主的起源做出了根本性贡献。它揭示了民主的象征性框架的意义:使社会划分明显化、公开化,维持国家和公民社会的区别,承认冲突的重要性,禁止政府把权力纳为己有……这许多决定性因素彻底改变了左派所有的阶级意义上的民主观念,使得人们可以从“断绝关系”之外的另一个角度来理解社会变革。

但这一阐述把一系列与政治行为关联更为直接的问题搁置一旁。民主象征性基础的重要性一旦得到承认,在特定历史中形成的民主社会又该怎么办呢? 权力、知识和法律这些象征性的极点在不同的民主社会又有什么特殊的内涵呢?

社会因素自己融入这个象征性基础,并借助不同的观点、价值、实践来依靠它。工作类型、环境和生活背景,诸如学校、教堂、工会、联合会之类的机构……

^① Claude LEFORT,《La communication démocratique》, entretien avec Claude Lefort, *Esprit*, septembre-octobre 1979.

^② *Ibid.*

^③ 面对有关民主到来的公开提问时,社会很容易陷入“极权幻觉”,因为后者打算取消不确定性。

都在决定延续了数代的、已分化的政治行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政治行为本身进入了一个充满限制和特定力量对比的范畴。还有那么多与“元社会学”阐述不相矛盾的元素都没有进入。正是基于这一点,为担心政治行为的人准备的阐述出现了局限之处。

也许这一局限性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政治左倾主义崩塌的年代,勒福尔和卡斯托里亚迪的精妙分析没有获得和“新哲学家”一样多的听众。“新哲学家”简化了的主张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使“参加运动”这一概念最简约的版本合理化;而“第二类左派”的创新努力,正如我们将在最后一个章节看到的那样,是非常徒劳无功的。

二十八、承诺的危机

70年代后期,是决定性的转折时期,它是众多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及共产主义关系和政治表现来界定的。共产主义实现的最后幻想一个接着一个破灭。事实上,一个时代的政治文明似乎也将完结:这是一种战争和解放的政治文明,马克思主义就是为了这种文明而创立的,让-保罗·萨特有一个著名的论述:“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境界。”

这种政治文化被1968年五月运动所推翻,但是由于受到政治极左派的肯定,它又维系了几年。然而,社会的发展毁灭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危机以及工人阶级历史作用的预言。工人阶级也在发展,尽管极左派在使劲鼓动,但它仍不参与推动革命的活动。特别是1968年五月运动战斗精神的危机,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最后“模式”的危机,索尔仁尼琴作品的冲击,这一切都构成了对上述推论提出质疑以至完全推翻的有利的条件。在法国,对专制主义的批评空前地得到响应,它动摇了左派,这种批评当时是属于右翼的,甚至是极右的范畴。在这方面,一个新的反专制主义潮流在发展,不再让右派占有主动权。

实际上,随着《古拉格群岛》的出版,对左派来说,问题又提出来了:“如果对专制主义不进行思考,对我们时代的政治生活就无法认识,……如果有人认为要致力建立民主的社会主义而避开这个问题,那肯定是在说谎或干蠢事。”^①对反专制主义的批评不仅牵涉到共产党体制和革命极左派。在指出为什么专制

^① Claude LEFORT, *L'Invention démocratique*, Fayard, Paris, 1976, p. 12.

主义与某种意识形态不可分时,这类批评依据资料和“社会变革的思想”诘问传统的左派,认为这种变革思想是反映了当今的社会状况,以及负有这种历史使命的社会范畴,这是就国家概念和它的作用而言的……

作为战后几代知识分子参考依据的承诺,这种概念本身同样是作为平庸的证据,只是用来掩盖谎言而已:“在两次大战期间,至少25年以来,那已经不是无知,而是肆无忌惮的错乱,当现实已隐约可见,人们为什么还闭着眼睛,急忙地返回呢!”^①回想过去,《社会主义或野蛮》的推销员们不断地批评斯大林主义,一直站在批评的前列,这些人被视作早就找到真理的人,老早就反对萨特和左翼基督徒。

反专制主义左派产生了么?

在基督教流派内部,1932年由埃马努埃尔·穆尼埃创办了《思想》杂志,该杂志于1977年确定的新方针是富有代表性的。它针对马克思主义对众多左翼基督徒的蛊惑以及政治家的宗教关系重新提出讨论。杂志的社长保罗·蒂博写道,宣传革命的思想,就等于向全球灌入拯救思想,并到达“世俗至福千年说,那是保存了传统宗教信仰的总体形式,并将它变成政治。”^②马克思主义使众多的基督徒摆脱教士的权威,向他们提供安全感。信徒们受这种理论蛊惑。尽管他们也承认其缺点。此后,《思想》杂志打算充分考虑历史教训:“现代意识形态,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不同,也与共和派自由主义不同,这类形态并没有播种大众文化。这是统治的思想,政府的思想。应该记录其危机,从极权的、形式多样的思想束缚中脱离出来。但人们不要因此回到等级分明的文化界,基督徒就是其范例。”^③

杂志这样做的结果,就会导致考虑大战以来与共产党的关系,以及揭发苏联的不足与胆怯。在自我为中心的记录文字中表现得更为尖锐。保罗·蒂博在诸如索尔仁尼琴和克洛德·勒福尔等作家的帮助下,写文章评论道:“我们不得不承认,关心社会的方案已经过时,得放在第二位,最基本的是对本体论的肯定,这是第一位的,超越人类的,并通过这种超越,到人类的富有想像的无边的领域。这种结论使我们与大部分文化和政治环境相分离,特别是那些左翼基督

① Claude LEFORT, *Un Homme en trop*, op. cit., p. 10.

② Paul THIBAUD,《Aujourd'hui》, *Esprit*, decembre 1976.

③ *Ibid.*

徒,他们是将共同纲领置于《古拉格群岛》之上更高的位置,纲领号召‘为了人类的解放’去投密特朗的票(丝毫不差!)。这种结论甚至也使我们去批评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并因此遗忘政治哲学。人们想提出社会生活的目的会改变基本的观点:一个集团组织的方式和思索这个集团给予的规则的关系,特别是和它的能力的关系。”^①

于是情况有了转折。从30年代起,由这个杂志所发挥的“承诺”这个概念所设想的是一种选择,在历史性上,这必然是不完善的事业中的决定性的行为。人格主义哲学家保罗-路易·兰斯贝格在30年代谈到选择时写道:这并不是“在原则和抽象的意识形态之间,而是从过去到现在,都是在力量和真正的运动之间,将导向未来的能力的领域。”^②在70年代的新情况下,承诺的概念又有什么意义?什么是能够取代工人运动所能承担的希望的力量和运动呢?

1977年1月,该杂志在一篇文章中宣称:“无耻的极权制终于爆裂了。这就像世界早就失去了它的未来:资本主义社会的解体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个真理引起不安。对我们来说,这是个缺口,是制造别的机遇的机会。”^③问题是在于“转向”,“改变文化和政治”,在左派营垒中,文化和政治是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存在不可能没有矛盾,没有国家。社会应该多样化,迎接各种冲突,使共同生活具有“分析、管理、批评的功能,而社会的组织者和教士各司其职。”^④知识分子自己也在其中:不要认为自己掌握了知识,或者是“掌握良好权力的先锋”。提高觉悟,认识极权现象,这就可以使思考的重心转移。提高觉悟既是对政治哲学问题,也是针对新的实验。在这个意义上,有人宣称,“民主就是前景”。

自治管理:最后找到的现实抉择

《思想》杂志内部进行的思考与在法国民主工联工作的知识分子的思考是接近的,有两本书特别值得注意:皮埃尔·罗桑瓦隆的《自治管理的时代》(1976)^⑤以及皮埃尔·罗桑瓦隆和帕特里克·维韦雷合著的《为了新的政治文

① *Ibid.*

② Paul-Louis LANDSBERG, «Réflexions sur l'engagement personnel», *Esprit*, novembre 1937, repris dans *Problèmes du personnalisme*, Seuil, Paris, 1952, p. 30.

③ *Esprit*, janvier 1977.

④ *Ibid.*

⑤ Pierre ROSANVALLON, *L'Âge de l'autogestion*, Seuil, Paris, 1976.

化》(1977)。^①

在《自治管理的时代》一书中,罗桑瓦隆将自治管理作为“有决定意义的集体操作,每人对有关问题干预的可能办法”。^②人们在认识体制和普选的同时,制订的方针应该是“纠正”授权原则的不足。应该考虑罗桑瓦隆称作“民主嫡”的原则,滥用代表权和公民参与权的剥夺,在历史上强有力的时刻外,这些情况是不可避免的。国家应该从“社会保护者和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捍卫者”过渡到“社会调节中心”的作用。赋予国家的这种新作用应该同时配合“纯政治性的、作为集体选择的表达和讨论场所的社会的自治化。”^③

作者还指出下列具有前景性的要求:“权力公开化”,“在决策上有更多的民主”,“技术信息的流通和重视实践知识”、“领导人的更多的流动性”,“将权力下放到最底层”。^④……

“自治管理”的政治条件应该是现实主义的,但是,罗桑瓦隆按 I·伊里奇和 W·雷谢的思想来下定义,很多提法还包含着 1968 年五月运动的幻想:“这里牵涉到的问题是,权力机构的人格化,服从外部权力机构,权力机构的安全感。在一个自治管理的社会里,权力机构应该是由社会自己承认的标准的产物,社会成为自己的权力机构。社会应该实现《国际歌》中的名句:‘不靠神仙和皇帝,全靠我们自己!’”^⑤“在管辖的权限之外,这是等级体制的基础,这种体制是发展自治管理的障碍。”^⑥

在谈到政治生态学的某些论点时,罗桑瓦隆所描绘的自治管理前景是“重新考虑劳动和就业的前景”,发展非商业部门,重新定义“社会时代”……人们在抉择的关头受到怀疑的困扰:“今天,要在不平等结构的互助性生产社会和平等结构的社会活动普遍参与的后工业社会之间做出选择。”^⑦如果自治管理的潮流能与后 68 左翼的破坏因素划清界线,其前景不是更为可信吗?

在《为了新的政治文化》一书中,皮埃尔·罗桑瓦隆和帕特里克·维韦雷将渗透于法国工人运动的左翼文化提出来讨论,这种文化对国家有决定性的作

① Pierre ROSANVALLON et Patrick VIVERET, *Peur une nouvelle culture politique*, Seuil, Paris, 1977.

② Pierre ROSANVALLON, *L'Âge de l'autogestion*, op. cit., p. 51.

③ *Ibid.*, p. 46-47.

④ *Ibid.*, p. 70 à 79.

⑤ *Ibid.*, p. 72.

⑥ *Ibid.*, p. 75.

⑦ *Ibid.*, p. 179.

用,“文化正是在3种大‘信条’中组成:统一的社会方案,生产力发展的进步性质,承认国家在变革的特殊作用。”^①在1968年5月,受法国民主工联启示的新政治文化是反对这个观点的,但这一观点在生态范围和社团范围内是有市场的。这类范围代替实验和超越传统的对第三者提出要求的交涉,而是发展了交替进行的交涉。

社会变革的新战略正是要依靠这类实验,并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推行,“政治社会”的涌现,就会推动新的政治运动产生,用结社的方式在政治上估量其分量,但从传统的意义上来说,并不是去参加政治生活。罗桑瓦隆和维韦雷同样想重新确定政党的作用。政党不应该简单地作为执政的党。政党应该与“新的社会运动”联系,同时尊重它们的自治,完成“政治社会和政府之间的沟通”的使命,以及促成“政治社会”^②功能。前景是接近阿兰·图雷纳写的那样(见第23章):“社会党也许是最能起双重作用的传统政党功能的政党,也是新的社会运动的分析性政党;自治管理的主题构成连接这两种作用的纽带。”^③作者以米歇尔·罗卡尔在1977年社会党南特大会上的讲话作为该书结束语:“总之,难题已经开始了。”第二个左翼能克服这些困难吗?

这种“工人自治”文化将会是“社会变革战略和问题的载体,面对专制事实,它能积极建立民主,创造平民社会的生产条件,至今,此类条件为国家负责,在本世纪最后25年中,它是符合工业社会危机的重大问题的。”^④这类例子很多:非正规学校、卫生中心、街区商店、工人合作社……这类实践充分体现了社会和文化发展趋向,但是,他们得到的远不是同情,那意义又何在呢?人们能等到的又是哪类社会改革?“社会实践”能够确定公民权利的联系吗?在工人自治与部分的、地方的、日常的民主之间……社会整体的政治方针和选择中,这类联系不是自然的和自发的。

关于工人自治的观点的论述是很折衷的,包括“‘新哲学家’,利普的工人,米歇尔·福柯或米歇尔·塞尔的研究观点,生态运动派和妇女运动,《思想》杂志承认的观点,它也面对着勒福尔、戈谢、克拉斯特、《解放报》和后68文化派,法国民主工联、法国社会党等政治新思想派,经济界线派的质问,埃德加·莫兰就生物学和社会学边缘问题的探讨”。^⑤这些运动派别的观点五花八门,矛盾百

① Pierre ROSANVALLON et Patrick VIVERET, *Pour une nouvelle culture politique*, op. cit., p. 6.

② *Ibid.*, p. 139.

③ *Ibid.*, p. 136.

④ *Ibid.*, p. 7.

⑤ *Ibid.*, p. 83.

出,但都有共同观点。他们想“前进,跳出老路,找出另外一种想法和活法”。尤其是“不管怎样,敌人是共同的,即使没有明确的证实或感觉,这就是老式的国家—社会文化”。^①说实话,这就是批评的主要靶子。

“第二左派”的工人自治观点也暴露了共和派模式的缺点。这种观点强调组成国家与个人之间新的中间机构的必要性,这就能丰富政治辩论。在这个意义上,它打开了思索与实验的新道路。但是,把共和体制的国家职能当做民族统一的保障者和代表,对其社会不平等的作用沉默不语时,号召社会自治有助于打乱被后68左派所践踏的政治方位,以纲领性的方式反对“提出要求的战斗精神”和“实验的战斗精神”,还有社会的自治和“国家的要求”。工人自治观点的加强源自1968年五月运动的反国家潮流和由此而产生的非政治化倾向。

救护政策

同时,70年代后期,反专制主义在法国出现,而且在文化界占有一席之地,搅乱了人们的思维。那些“新哲学家”们以伦理学反对政治,并以这作为权威的论据,他们搅浑水,甚至对已有变化的政治行动散布怀疑情绪和进行贬低。算账和揭发替代了谅解和对专制主义的分析,这些东西是新哲学家们在绝对病患(Mal absolu)搞出来的。在巴黎的晚会和宴会上讨论的都是古拉格群岛和野蛮行径。洛齐埃和布勒泰谢的素描幽默地描绘了“新哲学家们”从事的蛊惑人心的事儿:“夫人们,别傻笑,他说了这么蛊惑人心的事!”^②

这些由于反专制主义批评引起的问题刚提出,立即融合到新的时髦的意识形态中,在权力的魔影中,抛弃国家和理性。由于同样原因,专制形容词的使用也普遍化和扩大了,任何专制体制,任何有些强制性的原则,甚至是带权力性和严密性的原则都被认为是带有专制性的,而相反,那些夹杂着良好感情的伦理学放纵的主观精神却得到肯定。

“不再让通过”,“总是站在压迫者一边”以及以人权作为参考……还有这么多的原则只能促进团结。面对人类大屠杀,这是一件最紧迫的事,愤怒与人道行为不能忍受长期的争论。面对着酷刑、死亡和苦难,人们无法选择生存地。1979年,“帮助越南之船”的动议是转向的象征。几年以前,左派曾派遣一只装满药物的船只支援越南游击战。新的一只船还有打捞南中国海难民的任务,这

^① *Ibid.*, p. 83.

^② Claire BRÉTÉCHER,《Les Frustrés》, *Le Nouvel Observateur*, 26 septembre 1977.

些难民是从新的共产主义政权下逃出来的。1979年6月,出于这种动议,一个知识分子代表团应运而生,成员包括安德烈·格卢克曼,米歇尔·福科,让-保罗·萨特和雷蒙·阿隆(这些人此时又聚在一起),这个代表团在爱丽舍宫受到瓦莱里·德斯坦总统的接见。

在那觉醒的年代里,这类人道行动已成为一种典范的行动:“这些人在国际水域被淹没了,得把他们打捞上来。这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实际行动和急需解决的事。对人类灾害,这并不是世界范围的惟一解决办法,但对一些生命来说是确实的行动。”^①为什么不欢迎这类倡议呢?将种族大屠杀、第三世界的灾祸、法国的问題并列起来,这就将我们自己的灾祸相对地减轻了。面对群众所持的冷漠态度,人道战士气宇轩昂,贝尔纳·库什内在1980年说:“历届政府都在统治,罗多彩票游戏会超过赛马前三名的获奖者,在法国总工会和法国民主工联的争吵中谁能获胜?那不是柬埔寨人,我的女朋友奥黛特的7个兄弟姐妹都是被红色高棉杀死了,而第八位兄弟参加反越南人的斗争,越南人不是刚杀死了他的妻子吗?这不是留下了二三百万的尸体吗?很少有人欢迎这类事,但它给人以勇气,并报以嘲笑。”^②

人们组织了一些营救“船民”的行动,“无疆界医生”协会(1971年创立)和大赦国际委员会发展得很快。人道行动比1968年战斗精神来说是另一种面貌,大赦国际委员会的一位成员说:“活动分子应该是只为这个事业生活的人,想的只是自己的事业。事业应该是美好的,我不愿它搞成这个样子。”^③后68思想反对派似乎快完结了,一位参加过游行和工会的妇女说:“对政治这玩意,大家是厌倦了,大赦国际是公正的,不从属于某种意识形态,我不是说不应该有些看法,即使是对社会的选择,但最优先的是捍卫个人,反对那些机构。”^④

大赦国际的参加者是在“协同工作”的思想基础聚集起来的。为了认识世界各地政治犯的状况,他们辛劳地工作并支援政治犯。很多人道行动引起公众舆论的注意并救人一命,在紧急情况下干力所能及的事。在软弱的意识形态和人道行动之间并不需要进行长期的讨论。但是人们难道因此就停滞不前吗?

① André GLUCKSMANN,《La philosophie et la guerre》,entretien avec Christian DESCAMPS, *Le Monde Dimanche*, 30 mars 1980.

② Bernard KOUCHNER,《La preuve par le Cambodge》, *Le Nouvel Observateur*, 26 novembre 1979.

③ Cité par Denis BRUNETTI,《Amnesty mode d'emploi》, *Libération*, 18 juin 1979.

④ *Ibid.*

政策的结束？

反专制主义的批评目的是“改变社会”，在指出前景的两重性和危险时，用它来掌握现实主义和保持清醒的头脑。这些批评有力地指出了政治家的本质、地位和作用，以及和其他人类活动的关系，特别是改变现状愿望有多大。出于同样原因，权力和民主机制的重要性也被重新发现并受到强调。对政治人物的独霸天下的奢望，人权标志着它的临界点。人权肯定的是，任何想控制的尝试，对人类都是不可制服和超越的，而这种思想有决定性意义：不能把人当做简单的工具和物件来对待。反对极权制和捍卫人权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的专有物，它是起码的民主共识。很多参加过运动的成员觉悟到他们生活在民主气氛中，而这是宝贵财富。但是一旦承认了极权专制现象，民主成果又被发现，在法国这样一个发达国家里，公民的政治行动又会是怎样的呢？

从1980年起，在新杂志《辩论》^①的头几期中，马塞尔·戈谢著文强调人权专门资料的局限性和风险性。他指出，人权问题只不过是避免工人运动一个半世纪以来所造成的、由社会规划崩溃所引起的种种问题，或者“这好像是一种方式，更精确地说，这是一种促使人们接受政治上的厌恶事物的方式，而且必须是最低限度的：你们不是看见过古拉格群岛吗？可别要求太多了。”^②他还说，尤其人权能够为无能为力的人“提供一个令人羡慕的名字。因为如果人们想通过政治使一种行动寻找承担提出要求的方法，而人们不知道怎么依靠人权，那人权也不是政治”。^③

事实上，反极权主义将民主作为毛病最少的概念，因此很大程度上掩盖其内部的缺点。1981年，《解放报》向法国民主工联和某些知识分子组成的联盟致意，支持波兰团结工会反对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的镇压。在这里，“反极权左派”的诞生标志着“政治代表制的新转折”。^④在左派和很多知识分子中，事实上，思想并非很明确，波兰的局势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在《现代》杂志委员会中就表现出种种矛盾。1982年1月，两篇社论就唱对台戏。有一篇社论称：“确实，从中得出的教训，这不是社会主义能带来或保障自由，相反，如果人们想这样做的

① Marcel GAUCHET, «Les droits de l'homme ne sont pas une politique», *Le Débat*, n° 3, juillet-août 1980.

② *Ibid.*

③ *Ibid.*

④ Serge JULY, «Les rendez-vous polonais», *Libération*, 23 décembre 1981.

话,首先是无条件地建立社会主义才能够这样做。总之,要重新树立这种前程。”^①

总之,在法国,极权主义成为左派思想的盲点后,已变成了起阻碍作用的支点,他阻碍任何探讨性的思考,旨在捍卫民主成果,防止改变现状的潜在危险。反极权主义问题的内部局限性以及它在公众场合促成方式使这种新的批评潮流首先成为战斗精神的危机催化剂和它的依据的。以“决裂”思想为标志的反极权主义结束,但并不因此重新思考改变行动的范围。这种主义伴随着的是失去联系和非政治化运动,尽管源于1968年五月运动的第二次左翼运动推迟了最后的希望。反极权主义始于抛弃政治人物,重新回归个人圈子,人道的承诺取代政治思考和政治承诺。政治已被思想意识形态和宗派主义所吸收,被怀疑含有专制极权因素而被贬低,并被用于伦理学的含糊不清的参数。

在这些年代,如果说革命神话和共产主义都被毁坏的话,这些主义过去并不是这样的,首先是政治人物编造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从他们自己的仿古主义出发和这种破坏誓约思想的后68文化出发,政治并不考虑它的自主权和特性,但是在社会变化能力方面是残缺不全的。这正好是在这种对现状不满的年代里,否则基本上不会产生这些效果,而此时1968年五月所开始的文化危机已开始80年代的“空洞时代”,法国的左派此时掌权了。

^① Simone de BEAUVOIR, Jacques-Laurent BOST, Claire ETCHERELLI, Élisabeth de FONTENAY, André GORZ, Claude LANZMANN, Jean POULLON,《La normalisation en sous-traitance》,《Les Temps modernes》, n° 426, janvier 1982.

结 论

关于遗产的论述

随着 80 年代的到来,醒悟的时代也来临了。人权是占主要地位的新词,在谈到当时法国社会时,用历史的观点看,它不是最好的,至少在失败和令人失望的事情上,也不是什么坏的。在经历了斗争、暴力和斥骂等持不同政见的年代之后,到了“赞同”的调和年代。反对权力机关,捍卫个人,享乐主义和关心身体,保护大自然和环境……这些都构成了发展的新题目。今后,占主流的是实用主义,“看到行为结果”的战斗精神……而容忍和各种权利是其主旋律。

G·利普维茨基在他的《空虚的时代》一书中正好描写了这个时代的新气氛,其标志是不喜欢政治问题、自我中心的陶醉性的崇拜、外表至上和诱惑力。该书强调 1968 年五月运动的享乐主义和自由等方面,这是与革命的理论相矛盾的,促使腐蚀集体责任的现代个人主义的发展。这种阐述强调了五月运动的悖论和由此浮现出来的个人的新角色。但是,这种阐述低估了反叛的野蛮以及它具有的结构破坏的效果,它与时代的新气氛接近,并以民主品德来做装饰。

后现代派的哲学家在吃饱喝足后不断地重复如下观点:我们是在荒凉的沙漠中,吃后悔药是不管事的。什么综合论述、理性、寻找团结,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见鬼去吧!让那些断断续续的、五花八门的东西,抄近道、堵死胡同,情感和未完成的事统统活龙活现,都呈现出来,当做创造的表现。过去,那些抽象的实体以及为之效劳的权力统治欲望的走卒,不是让我们吃够了苦头吗?今后,我们是否应该放弃对世界和历史的阐述,放弃对它进行判断和掌握?80 年代的那些新诡辩家们就是这么讲的,尽管在大庭广众面前道貌岸然,说得头头是道,但都不管事。这些家伙可真正是这个持不同政见年代的“遗老遗少”,他

们生活在空虚年代，却十分惬意地以此充饥。他们在密特朗主义的沟壑中找到受欢迎的沃土，恬不知耻，装得“无所不知”的样子。

对变革可能使增长减缓的效果，再加上过去的承诺，这些都要重新讨论。自从大战结束以来，标志着法国社会经济膨胀的年代已接近结束。左派执政时期，1983年经济政策的转变，自由的浪潮将结束失望的进程。左派在“变”，并朝“多样化”迈进，但是，说实在话，左派也不怎么知道该奔向哪里，要重新提出政治规划有巨大困难。当今的状况“摇摆不定”，不可捉摸，它与不能承担任务的过去割断联系，也可能与任何人难以描绘其特点的将来联系不上。

视听媒体成为这些翻天覆地的事件的镜子，并耸人听闻地进行报道。媒体播送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杂乱无章的景象以及文化上的相对主义，这就在民众中挑起慌乱不安的感情。1968年那种反文化的题目，这类称做“柔软”的东西将被开发，在一个被称作老大的形象媒体中，这也就成为合法。这种开发更进一步隔断与人民群众阶层的联系，而文化界左翼中早就被认为包含了“左亲右邻”和一些落后的东西。这种开发相反也助长排外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思想意识形态。空虚的时代和反动势力的退却将相互助长他们代表人物的对立，而在电视上会有根本性争论的画面出现。

重新组合

80年代的转折并不标志着左派运动思想的消失，而是其中一部分的转向或普及，其方式是旧瓶装新酒，还有我们今天能充分承受其影响的社会实践。

虚构和不负责任的事虽然已有消失，少年时期过去了，年轻人的失业问题并未得到解决。自由放任的主观精神、情感、情爱都被视同真情和真理，这类感情是不能承受现实的考验和理智的反证的。

新的因循守旧的中心题目是不折不扣的自治，这是新的绝对事物和用其推理建立的：对任何权力机构都要抛弃或不予信任，应视之为恶或压迫。这些东西伴随的是由自治的个人与才能平等的生灵所组成的社会的幻影，这个社会纯粹是水平的，以最透明的网络组成，没有边界，在纯粹的功能范围内吸收各种权力机构和等级。新的信息技术和交通的发展将助长这种幻影。

各个机构之间关系复杂，且矛盾重重。各个机构面对的是个人，这种人一上来就会被怀疑有统治意图和干预意图，同时这种人也要满足眼下的需求。在这种条件下，不管是在什么级别上，占据某一个权力的位置也变得困难。决议合法化的新方式是借助各种方法，“促进”、“管理”、“调节”或工程式地对掌权权

力机构重新塑造形象,这些都是这种进程中具有的特点。

在企业管理中,领导人自身也干预这种新的局势。自治和全面责任制这个词已成为机构内部的用词中富有特色的词。领导机构绕过中间环节,直接与有关人员打交道,通过双重关系或契约关系抹煞了角色的区别。

这类言词和实践不仅是在行政机构和企业中不能发展,在这里也不能产生不稳定的和破坏性的效果。^① 在形成过程中,这类因素大量呈现,并通过渗透冲淡了1968年有关孩子的自治的教育思想,这在教育体系中体现出来(见第22章)。在小学里,包括基础教育,甚至是作为自治、权利、义务等不平等关系也是很明确的,并发展成为孩子们的词,总之是责任心、自律和自我进化等诸如此类的词……人们将责任心加诸于儿童,这是机构本身和许多教育人员很难承受的。人们以平稳的言辞,将学生置于教育体制的中心,并满足其需求,以探求的方式,在教学内容方面如其所愿。

如果自由表达没有权威和权力的支持,那号召自由表达也是哗众取宠的事,这种状况是能使人们安身立命的。我们已进入一个众说纷纭的社会,言辞越来越尖锐,而凝聚力越来越少。这种失控既不是左也不是右,而是一种与周围环境协调的现代主义。如果不同时讨论这些问题,那就会在现代主义和专制主义、快速的压制方法之间动摇不定,此外,这两种东西是存在于机构内部的个体之间的。

随着失业的大量产生,这类失业被皮埃尔·罗桑瓦隆称作“福利国家^②的危机”,自治、批评权力和机构的主题也被纳入自由观点中。号召自治和号召全面责任制成为一种牺牲品,而国家本身成为不可超越的经济困难的纯粹的负责者,每个人都得动员起来,都得参加到并不是作为方针和选择的事物中去,而只是作为变革的效果来对待,对这些谁也无能为力。面对市场规律,国家是以无能为力的面貌出现的。国家借口各人自负其责,将人人置于难以忍受的境地:自行决定参加难以驾驭的不可抗拒的活动。这类活动处于不同的范围,权力当局将人们遣送到具有犯罪感的推理方式中去,这种方式使人感到压力,引起个人的不平衡感。这远不是使人们起决定作用的角色,权力当局成为制造苦恼的场所。

在80年代,“自由—绝对自由”这个公式是受欢迎的,它将被经济自由化卷走。“顾客是上帝”这个模式被用到个人的新的要求上,并渗透到很多其他活动

^① Cf. Jean-Pierre LE GOFF, *Le Mythe de l'entreprise et Les Illusions du management*, op. cit.

^② Pierre ROSANVALLON, *La Crise de l'Etat-providence*, Seuil, Paris, 1981.

中去。国家、法律、文化等上层建筑被市场规律视作难以忍受的压力，市场轻视一切禁令和限制。一个完全独立的思想 and 极端自由化的思想找到契合点，而这种极端自由化，市场是其真实身份的最后基础。^① 乌托邦的奇怪命运终于穿过自由主义的道路。

事件和双重效应

1968年5月运动所构成的历史性事件，它和以后的持不同政见的年代是不能等同的，在80年代，这种重新组合并不构成真实的时机。1968年5月保持着“神圣的令人惊奇”的性质，而被解放的言论是在节庆和友谊的气氛中表达出来的。这种言论表现了思想潮流的多重性：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境遇主义，超现实主义……若非如此，任何一种也能澄清其事实。尽管众说纷纭，但主流是尖锐的批评，追求另一个社会，那里人们是万物的主人，并参与决策。这种要求停止在仁慈的和普通的号召，拒绝仲裁和制度化。

1968年5月的大学生公社很想“让死者埋葬自己的尸首”并打算推倒过去。他们把革命的想像据为己有，当历史的舞台和演员已改变后，他们仍然旧调重弹。这种公社为革命的想像赋予新的存在的内容，最后将它分解。马克思的话当时被援引很多，他早就觉察到一个社会在危机时期，需要对历史进行回忆以掩盖它要面对的局势中的新事物，不能认识和预见的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理论可能有一天只能起这个作用。

持不同政见的年代已消逝了，并凝结成危险的和革命的遗产，直至引起尴尬，导致爆裂。这类新闻使得出自五月的反文化正好成为其起因。极左派又捡起革命的主题，而战斗精神又成为牺牲和尽忠的逻辑。但是那些新的成员和布尔什维克的以及毛派红军并没什么显著的相同之处。按他们的看法，性解放和妇女解放运动将担负使人们了解这个问题的任务，并揭露掩盖在革命外衣下的不合理部分，它认为应是全能的主观精神。自治的要求被推至极点，直至否认对老一代和未来一代的感情债和责任感，这就使亲子联系的思想、共同的记忆和前途都受到质疑。在万不得已情况下，对别人的一切依赖都值得怀疑，把自己也拿来讨论一下，就带来感情的伤害，使爱情的关系变得更为困难。^②

^① Dany-Robert DUFOUR, 《Sur le devenir fou des démocraties 》, *Le Débat*, n°89, mars-avril 1996.

^② Sur l'héritage de cette idée dans les années quatre-vingt, voir: Irène PENNACCHIONI, *De la guerre conjugale*, Éditions Mazarine, Paris, 1986.

这种主观主义的形象也介入了个人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这是被亚历克西·托克维尔作为民主社会基本特点来阐述的。这种形象使人们抱有希望,其颠覆性的效果不仅牵涉到传统的隶属关系和先前的行动方式,同时也使权力机构、权力、法律、集体标准等思想本身也受到质疑。如果说从法国大革命以来,“在欧洲,幸福是新思想”,1968年5月起来造反的青年则为实现幸福刻不容缓:幸福不能放到以后,应在现在激活,并应与当今正在衰竭的快乐结合起来。

持不同政见的运动仍然赞同必要的变动,而其效果是双重性的。这个运动认清掌权的权力机构,揭露其不合理和独断专行的部分,并在那些存在压迫、官僚主义、区别、僵化习惯的地方挑起争论,这种思想使19世纪那套伪善和不健康使人有罪恶感的道德主义化为乌有。旧的关系对自己、对别人和对世界来说,都是思想上的教条主义、固步自封和自说自话,都是在走向毁灭。对一切严峻的定位制度采取怀疑态度,对生活中节日的、游戏的、美学的范畴采取开放态度,对主观性观点要加以考虑……这些都构成新的倾向。确实,个体的人群面对群众的群体尝试可采取明智的态度。在这个意义上,运动中的过分举动和矛盾被视为有益的,但还需说明的是,它之所以能这样,那是由于容忍、参与和发展的能力,这是法国社会已证实的。

法国在造反和挑衅的年代,似乎已成功地压制了颠覆,在与一个共和国清算的年代,官方的历史掩盖了一些阴暗面;对工人的镇压、殖民战争和投敌行径。已见诸行动的批评揭露了各种机构的伪装,但是由于激烈的激进主义而走投无路,终于自我毁灭。持不同政见的年代包含有毁灭性的野蛮成分,其中一部分是与虚无主义相联系的,人们竭力用反专制和享乐主义文化的可爱词藻来撮合这两种成分。

人们还得指出持不同政见的运动遥远的和当代的根源:从浪漫派到兰波直至超现实主义,还有尼采和60年代结构主义浪潮的反人道主义。^①但是,在左派分子手中,这些众多的资料只是封闭在提出批评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圈子里。这里面有出自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毛等人的有关革命性的批评,还有对战争和这个世纪的野蛮行径的肯定的论断。

宣称要造反的青年大学生要把这种文化和生活完全叠合,并在全社会整体范围内赋予确实的颠覆性意义。持不同政见的运动并不是像先前那样坚持理论上的破坏工作,也不是在有意义的工作形式下表达造反。它是“一条道走到

^① Luc FERRY, Alain RENAUT, *La Pensée* 68. *Essai sur l'anti-humanisme contemporain*, Gallimard, Paris, 1985.

黑”，从理论到实践，从艺术到生活，将价值和机构进行根本和实际的重新讨论，并使之实际可行，并且要以“另一种方式生活”。左派的历史是以无可奈何的研究为标识的，是通过存在和社会的死胡同，由它来指导的历史。左派是要将大学生公社的乌托邦具体化，一直干到底，最终表明它成为无可奈何的实践。这种不可避免的失败也就是革命思想的失败，其奢望本是要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建设一个全新的人和全新的世界。

我们要从持不同政见年代的无可奈何的遗产中走出来，但是，人们难道会就此送别那使人激情四射的遗产吗？在60年代和70年代，政治斗争尖锐、有多种形式的要求，接着是一个令人失望和退却的时期。于是新的问题提出来了，其答案决定要重新行事。

没有乌托邦的激情有可能吗？能在民主中找到着陆点吗？^①如何才能重新找到组织性和集体观念，忍耐的、坚持不懈的战斗精神？这种精神是通过前卫、妥协、失败来长期培养，而激情正好是与之相反的。如何考虑五月激情的遗产而不因此变得不耐烦并且不负责任？“民主激情”不正是在这种矛盾的中心吗？

在公共事务中，在私人事务范围内，历史都是由这些事务承诺的句子组成的，这就像阿尔贝·伊尔什曼在《个人幸福，公众行动》^②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在这个领域里，正像其他领域一样，积极性也会自动产生的。五月是一种特殊的幸福，它表明现在和共同的未来许多重大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和共同采取行动的，可能这种幸福是“欧洲新思想”，我们现在还在探索的路上。

^① Olivier MONGIN, *La Peur du vide. Essai sur les passions démocratiques*, Seuil, Paris, 1991.

^② Albert HIRSCHMAN, *Bonheur privé, action publique*, Fayard, Paris, 1983.

2002 年版后记

1968 年五月运动不属于任何人

那些在 1968 年五月运动中过来的人,把它当成“革命”时刻看待,那些比较年轻、把这个运动看成神话的人,在经过一段历史进程之后,认为这个运动已达到反公式主义的新公式主义,能接受这种看法似乎是很困难。然而……

今天,最大的冒险是“没完没了的冀求”,还要求青年起来对权力机构和审查机构“造反”,反对脱离生活的学校,反对上升的法西斯主义或“压迫人的正规制度”。在左派领域里,这种姿态是颇为得体的,但也并不起什么作用,除非是在媒体和社会上的争辩中出现。人们继续行事,就像是国家和机构同样坚强有力和确信,就像是那些专制和封闭的家庭完全受制于家长的意志,总是处于统治模式,就像是学校只是在捉弄和羞辱的情况下运转,这简直是盲目行事,拒绝看到受干扰的现实。

年轻人可以会要他们的持不同政见的父母做出解释,他们也不知道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1968 年运动的参与者满脑子都是反叛青年的形象,还难以承担与他们年龄相当的事物,以及与权威地位相当的位置,并谴责年轻一代的造反只不过是 1968 年五月运动的替代物。对于那些并未直接参与事件,在 70 年代只不过是造反少年的人来说,1968 年五月事件只能是普通的神话。同时,这些人与过去扮演主角的那些人是有代沟的。

在当年唱主角的人成为人道主义文化的反叛继承者时,新的几代人来到类似废墟似的地方,那是由于激烈的持不同政见造成后果,而且也没有能力重建,

遇见那些难以承担遗产的过渡的角色的教学人员和教育者，他们又碰到一起了，而对那种遗产，他们本身就是不搭界的。很多参加1968年运动的人对过去发生的事没有任何反思，在80年代明显地转向。他们不断地动摇在怀旧和否定之间，他们的立场使新的几代人迷失方向。这新的几代人面对的是嫡传下来的无可奈何的要求，注定要和父辈一样重演造反的勾当，成为永远长不大的少年。

米歇尔·乌尔贝格曾天才地描绘了后68新一代的不安：性饥渴和爱的饥渴以及对现实的幻灭心情。他小说^①中的人物生活在一个幻灭和无耻的世界里。他们的感情是牺牲了的一代的一部分，在沉沦的逻辑中受性的困扰，寻找办法，好歹将已碾成粉末的特性重新粘合。^②

从80年代起，曾想处于现代主义“分支”尖端的左派讲的是美好的故事，而作为当局标记的带有象征性危机的效果和群众失业相结合，这就带来使结构破坏性的效果，从此以后，只好承认现实，这就使人们了解为什么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些熟视无睹。

从简化的模式中走出来

1968年5月，如果说那是个激情昂扬的运动的话，可能会挑起争论。它可以作为当时存在的社会不满的替罪羊，而相反的是，它是被当做习俗和今天已获得胜利的文化的解放来赞赏的。大部分就这个论题进行的翻来覆去的争论都没有跳出这类模式。

1968年五月运动已过去30多年了，这个事件和以前的事件相比是个大逆不道破坏圣像的事件，社会对其评价总是摇摆不定，反动的和报复心切的右派从来不懂得为什么会发生这个运动，而左派则更愿当文化现代化的促进派，而人们认为这个运动的效果不好，是破坏结构性质的。但1968年总是众多争论的焦点，谁都想在媒体中抢占自己的阵地。

确实，现在对1968年五月运动的定位不能机械地像30多年以来的那样以左和右来划分。当前，选择可能会更明确和全面：在左派看来，在习俗和文化方面，总体来说，人们参照了对工人运动评估，是反传统旧习的。右派观点认为，

① 特别是小说《微粒子》(*les Particules élémentaires*, Flammarion, paris, 1998)。

② 关于这方面，请阅 Jean-Marie LACLAVETINE,《Où est passée la littérature?》,et Marie-Jeanne DUMONT,《Littérature perdue ou génération perdue?》,《Le Débat》,n°112。

这是民族主义,传统的和符合时宜的道德主义。现实是更为复杂的,不是一个简单模式说明得了的。在习俗的文化领域,反陈规也不能与政治割离开来。在法国,戴高乐主义想把传统与现代性结合起来,而左翼也是法国的某种思想和世俗道德主义的继承者。但是,对造反的年轻人来说,对 1968 年五月的评价就是包括所有文化和政治一体的具有分水岭性质的象征。

今天,在左翼,这种区分还像先前那样继续起作用。人们要求 1968 年五月作为造反和反习俗的符号的保障,这在 30 年来是一以贯之的,还要把它作为两个阵营的政治分水岭。确实,外来的、种族主义的极右翼的发展,“道德标准”、花样繁多的原教旨主义的反作用显然都有助于维护这些思想。但是,揭露权力机构,控制媒体,陈规旧习几乎是 30 年来沿用同样词汇,而且为数众多。这毫不奇怪,就像是对国家和众多机构,媒体的词汇和行为没有丝毫改变一样。此外,此类现象并不只限于前 68 运动成员,还有新的几代人,他们对那些祖师爷十分尖刻,而且对过去那套机构继续进行清算。

在希望倒退的保守派和冲向新的时代的新风尚两者之间,在这种我们生活的转折年代,这要作反思,而且看来是很困难的。^①

从纪念到回到批评^②

关于 1968 年五月运动的言论过去是被运动内部一小撮政治化人物所操纵,他们在 1968 年五月前就开始战斗,这帮人自认为是全面的受馈赠人。为 1968 年这代人平反是在 20 周年纪念之际,是法国社会反常的现代化时刻,当时密特朗主义得势。1988 年,有人叙述了年轻、大度和理想主义的运动成员的故事,这些成员将来会了解困难、失败和悲惨事件,在失望之余,他们会在平民社会和社会党内部推行“革新”,否则只会停留在思想上。这类思想事实上被认为是临时的外衣,里面裹的是这代人的造反运动和文化的现代化,这是在 80 年代已完成的。总结是完美无缺的,一小部分 68 分子进行自我庆祝,把运动归功于自己,以这样的方式宣布历史的结论。

给运动平反的同时,还重新发现了民主,它在历史范围内是对失败、幻灭以

^① 这种变化,请阅 Jean-Pierre LE GOFF, *La Démocratie post-totalitaire, La Découverte*, Paris, 2002.

^② 请阅:《Mai 68: de la commémoration au retour critique. Entretien avec François Gèze et Jean-Pierre Le Goff》, *Le Débat*, n°100, mai-août 1998. Voir aussi: Jean-Pierre LE GOFF,《Mai 68, trente ans après: anniversaires et autocélebrations》, *Le Débat*, n° 11, septembre-octobre 2000.

最少的祸害,对人权造成最小的倒退。解释定位这样的思想,五月的文化面貌是创新型,使80年代新时尚合法化,政治上的戴高乐主义要正确对待,它或多或少是过去极权主义的代用品,^①文化戴高乐主义就要被认为是新东西,否则人们要分析它所承担的思想内容。在政治计划受挫的情况下,这类思想已经成为掌权的左派的主题思想。

到五月运动30周年时,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自我庆祝重新启动,并往前迈了一步。1998年春天,在几个星期以内,法国都处在对1968年五月热烈的庆祝活动中。手写文件、当时的视听资料、证词和回忆录被大量复制。几个月以内,80余种关于1968年五月有关材料投放市场。^②我自己在写本书时,作过批评性分析,参加过无数次讨论,我可以证实10年前的阐述是占主流的。

在我参加的大部分公开辩论中,都是重复同一种态度,而一直避免考察发展了的思想内容,似乎一切都是复述当时的条件,以及当事者所保持的主观印象。运动参加者和宗派分子陈旧的印象又浮到表面。众多的证据盖住了质疑,给对手也贴上了30年前的标签。批评五月运动的某些思想,这不是“沾了光”……客观上成了“反动势力的帮凶”吗?1968年五月运动在一系列回忆和匆匆的评价中被冲淡了,对任何人都是以“激动人心”来赞颂的:“人们可以因为我们的怀旧而把我们送走,但人们不能触动神话,那是一种新的欢愉、紧张生活的时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五月。而我自己在五月是细致的珍宝……”^③某些前68分子最头疼的是摆脱他们的精神状态以及过去的思维结构。这些人把自己关在文化和精神的隔离区里,生活在一个与新的几代人断层时代。由于受30周年媒体仪式的影响,有一些事实表明:关于1968年五月的书籍销售情况不佳,只是那些“老战士”感兴趣。

对五月运动的这种估计不可能长期站住脚。对那些长期受抑制的人来说,“过去并未消逝”,他们不时地怀旧。一位前总理认为,他很懂得在一个最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集团里,或是68运动成员,在面对人们的攻击时,他们是使用或滥用当时的背景资料,这种典型的论据是在斯大林分子那里找到的,他们是为了为过去的承诺辩解,这种观点认为1968年五月和持不同政见的年代仍

① 只有托洛茨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因为分别受到斯大林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反对,所以还受到一些人的欢迎。然而,别忘了托洛茨基是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顽强的捍卫者。读他的《伦理学》和我们的论述就知其梗概。至于无政府主义,可参阅巴枯宁和斯蒂纳(Stirner)的著作,以及有待整理的俄国和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实践的批评性分析。

② *Livres-Hébdô*, 29 mai 1998.

③ M. V-L, Corse, *Télérama*, n° hors série, Mai 68.

然是一个富有特色的问题。

前68运动分子不断地指出过分行动是有益的,但是他们忘了指出,这些过分行动是发生在一个能够收拾他们的民主社会里。1968年五月和70年代将国家和政治人物的神圣化,将现存的官僚机构和社会的区分,来自19世纪的道德主义和对妇女的压迫等都破坏了。这些运动成员不得不很好地考虑个人和社会的自我表现形式,在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退却中,打开一个缺口。这些范围内向后退的愿望在现存的社会不满中会暂时地找到一些反应,但我们认为是不会有前途的。倒退即使可能,对我们来说只会导致危机。历史是不会重复的。

然而,遗产中总有一部分使我们感到无可奈何且需要面对,如果人们要想了解这个令人失望的现在,就不得不认识到这个我们生存的世界,充满着民主的政治和文化危机。这个运动所包含的思想也不是时代背景的单纯产物,对其苦涩的回忆阻挡了人们对其进行透彻的分析。这些思想也不是简单的个人责任或某个组织所能打倒的。事实上,这些思想对社会和历史变迁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它构成了值得关注的新现象。

事 件

本书旨在对1968年五月运动和70年代有一个总体看法,然而也不将两者混同。在社会达到发展的新阶段时,1968年5月可以认作是停顿和发泄民主的时刻。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不属于任何人的。不应将这个事件与以后相继的岁月相混同,但要掌握其相继而行的进程,社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新时代的。1968年五月事件本身就具有使它走向失败的思想,并且持不同政见的年代和带有破坏性的野蛮性能够部分存在。同时,70年代有新的主题,如妇女解放,生态环境问题,这些问题不久就平息,最终融入社会。

就历史来说,正是“大学生公社”具有这类愿望和新思想,并暗地里烦扰于社会。当时的青年攻击当局,揭发生气勃勃的伦理主义和社会不公正,推动工会和政党,情绪都是友好和热烈的。法国的特点是大学生的造反和总罢工相结合,几个星期内,全国陷于瘫痪。这种独特的现象让人想到这是工人运动的继续,当时它是遍及全国各地的。

1968年五月运动象征性地出现街垒,政治左派以极富想像力的方式导演了

这个革命的遗产,这个“1789年社会青年版”^①是新演员的作品,这些演员是还未参与社会的大学生,还是一伙乳臭未干的小伙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各个领域里都有重大变化,而国家传统的形象依然意味深长。造反的大学生都是反叛的继承者。这伙学生以他们的方式使矛盾爆发,在一个完全致力于消费和福利的社会里,他们提出了共同生活的最终目的。

这个事件在自己身上凝结了形式多样的、放纵的、野蛮的语言,在一种友好和热烈的气氛中扫清障碍、摒弃社会隔阂:在战后这个致力于经济、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新社会里,个人和集体的生活究竟是怎么回事?“瞧,我们幸福吗?”^②自治要求,参与社会,个人有承担共同前途的重大选择,这都有力地表达了一个神圣化的、家长式的和高傲的社会。

但是,就像我们在本书中所强调的那样,这个运动具有的激进思想和要求不可能为这些问题带来建设性意见,相反,它很快封存起这些问题。大学生公社以它自己的方式重新找到由法国大革命开始发展的绝对主题,它由工人运动重新搭起,而大学生公社将它推向所有其他领域。在一个“消费社会”中,它既具有欲求也有革命,它是有超现实主义色彩的,消费社会让人渴望休息,在几个星期内,梦想与现实同时存在。对大学生公社的主要成员来说,1968年五月既是水平很高、但是又是高不可攀的时代,同时什么事也可能办到。言语方面万能的富有诗意的幻想和政府机构表现出来的几个星期内所做的相对容忍,这就让人相信旧世界已处于崩溃境地。^③那些信口说出的话认为任何形式的压制和束缚人的仲裁和机构都是值得怀疑的,也是可以自我满足的了。

大学生公社把在大革命中产生的卢梭关于人性的思想推到可笑的程度,卢梭认为人性是好的,是由于社会侵蚀而变坏的。圣鞠斯特评价旧制度的话“一切都是压制和镇压”^④十分恰当地概括了社会上的左倾观点。在这个问题中,孩子和“善良的野蛮人”代表着无辜的形象,只是我们这个社会将他们腐蚀了。这种超凡入圣的思想也可用在性欲上,从禁止和禁忌中解放出来以后,性欲也不

① Edgar MORIN,《La commune étudiante》,Mai 68: la brèche, Premières réflexions sur les événements, Fayard, Paris, 1968, p. 26-27.

② Anonyme, Quelle université? Quelle société?, Textes réunis par le centre de regroupement des informations universitaires, Seuil, Paris, 1968, p. 45.

③ 根据这个观点,在一个达到发展新阶段的工业社会里,大学生公社又找到了“现代欧洲造反的基本概念”的至福千年的无政府工会主义的腔调,这是埃里克·J·霍布斯邦(Eric J. HOBBSBAWM)阐述的,《现代欧洲基本概念》,Fayard, Paris, 1966.

④ SAINT-JUST, On ne peut régner innocemment, Mille et une nuit, Paris, 1996, p. 15.

会致恶。只要打倒这种压制和压迫以后，坏事就会消失，人人最终能发挥创造性的潜能。反对禁令、反对各种形式的权威和权力的斗争是为全体人的福利而斗争，其前景是为社会 and 为人类，最终是使人类和社会及斗争和解。

无参照对象、无固定目标、要求绝对的自由，这是与打倒一切的思想联系在一起，这是“受宠的孩子”一代造反者提出来的（相对来说是属于以前的几代人的），这类孩子是在消费发展的背景下、在福利国家的保护下培育出来的。因此这种情况一点也不希罕：他们有极端行为，与现实脱离，而持不同政见运动有发达社会的标志，其光荣的30年的扩展动力可以毫无限制地出现，并使年轻的大学生生活在一种相对来说是无忧无虑的生活中。

以绝对的方法建立起来的自治要求，将各种形式的权威和权力糅合在统治中，这就构成了1968年五月运动的无可奈何的遗产。这种遗产在以后的年代与友谊决裂、与事件相联系的喜庆事例决裂，并且加以清算，它就是在这气氛中发展起来的。

极左派的两副面孔

在本书中，我们曾经认为，极左派是由于事态发展造成的“吹大了的玻璃”，起一种与美学先锋派相接近的作用，其极端主义正是基本倾向的明显表现。极左派显示了这类倾向的本质，但这并不是说它在社会上的冲击也同样激烈。当时持不同政见运动两个主要潮流的动力和矛盾的表现，政治上的极左派和文化上的极左派都很明显地显示了文化上的解体和重新组合更全面的过程。

极左派的年轻成员以革命臆想的方式度过了持不同政见的年代，那种臆想在战后发达社会中是找不到真正的根基的。这帮年轻人想当名垂青史的造反和斗争的继承人（巴黎公社，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1936年的人民阵线，西班牙战争，抵抗运动……），在“消费社会”，这是正统思想无法达到的要求。在这种新的社会中，他们是史诗和革命的孤儿，他们本身就有冒险的愿望，同时也有纯洁的心和牺牲精神，努力重振过去的斗争的活力。他们想重举长辈的火把，“勇往直前”，补偿父辈因怯懦和失败造成的损失。

革命的这种可笑的导演将是没有出路的，并将从内部搞垮政治左派。同时，文化极左派不关心政治和牺牲，但想“换个活法”，它引进了一些新价值观念，新的行为，诸如性欲、孩子教育、机制关系、劳动关系和自然关系……这些暗地里针对另一个极左派，并导致内部爆裂。70年代后半期的反极权浪潮将结束这种分解。

政治左派的遭遇和失败以一种精神发泄的方式反映了一个历史时期的结束,而文化极左派宣布的另一种结束,重大意识形态的关系和政治保证的关系也处于危机中。一种新的个人面目出现了,而这对集体和保证的关系也成了问题。

文化极左派以最极端形式对1968年五月开始的反习俗潮流重新承担责任,并且正像本书指出的那样,它是来自共有的欲望的象征性资料,并对破坏他的东西重新提出根本质疑。文化极左派具有极端的形式,并且也摇摆不定。批评和违抗经常碰到强烈的禁令和镇压,他们付出的代价有时是焦虑,有时是疯狂。性解放的潮流有助于清除犯罪和悲剧性最后的障碍,对欲望指向的对象来说,那就再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了。而艺术的前卫者是处于美学目的的水平上,文化极左派在作品中具体表现的同时,还将艺术和生活融合。这是对创造劳动和作品概念的否定,其目的是为放纵的主观意念和实际经验效力。这就是寻找瞬间即逝的快感、享受不安、性高潮、幻觉,这就是种种原型。通过音乐、性和毒品都能以最快速度获得这类经验。这些就是文化作品创作思想,它要求这些东西是一种劳动,并且铭刻在时间中,这些东西受到破坏是直接为表达情绪和当时的“实际经验”服务的。

所有持不同政见运动成员所奉行的革命信条后面,进行的是对一代人的大清算。那就要在政治与文化遗产的传输中进行彻底的决裂。这是一个与哺育过他们的文化彻底决裂的年轻人的高傲的挑战,同时也是作为个体进行清算,在传统世系中,这种个体是人类集体中沾阴暗的色彩的文化与过去的继承者。

这种极端激进的做法必定全面地走入死胡同,但是这类主题并不会因此消失,它们会在70年代后期平息下来,那是反极权主义和“光荣的30年”的结束造成的效果,这有助于社会的非政治化,培养了一种新的个人主义,它与集体主义的关系是无法共容的。在这方面,我还得阐明本书中未触及的一个观点,那也就是“第二左派”所起的作用。正是它,通过法国民主工联把五月运动的思想推向民众。在这种观点中,这股将大学生公社思想主题与整个社会相结合的潮流就成为特殊的历史。如果这股潮流想体现为五月运动要实现的目标,如对国家的批评、自治管理的观点,还有“新社会运动的看法”、“社会实验”等等目标,这在持不同政见的运动中也不乏幻想成分。后68的新文化引进了一些新的价值观念,一些新的行为准则,诸如性欲、儿童教育、机制关系、劳动关系和大自然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第二左派想考虑的问题,但都未能与五月无可奈何的遗产明确划清界线。

继承的姿态

不管人们愿意与否,这种遗产已传到新的几代人了。这不仅体现在有关学校、精神病学、生态学等思想上,同时也表现在特殊的态势上:如对待自己,以及与其他人或世界交流的方式上,还有生活方式,社会行为准则等等。

确实,这种态势1968年5月已呈现。但当时淹没在欢天喜地、一片混乱之中,受乌托邦思想的影响不明显。但质疑和争执却是毋庸置疑的。远近左右立刻就当做事实传播开来,颇有点权威性。一切都可以争论,可以随时进行重新讨论。那种人是存在的,他们满足于揭发问题,这往往掩盖着缺乏思考,满嘴是尖刻和怨恨。像“警察”、“军队”、“主人”、“权威”、“权力”、“镇压”等等都是一些象征性词汇,都立即会引起反响,没有任何微小的不同。在《夏丘自由自在的孩子们》一书中,A·S·内伊描绘出绝妙的权力幻景:“人类的恶云,来自外力,来自教皇、国家或教师爷,来自法西斯主义。”^①

1968年的无可奈何遗产的继承者自己充当诅咒者,首先把自己当做被统治者的自然代表,以道家方式训斥别人,加罪于别人以尽快选择阵地。这种姿态经常是站在左派立场的,在人际关系中是有害的,不会起什么积极作用。这种观点对过去、现在和刚露出端倪的将来都是悲观的,拒绝一切,面对可能发生的事,不能做出抉择。作为文化和历史的继承者不能正确估计自己,最后产生犯罪感,歪曲批评精神,走向另一反面,践行成为“世界公民”的痴心妄想,到处游荡。在具体事实上,“不同意”并不是受原初的“同意”的支持,并不是不言明的正面的肯定或明确的肯定,只是一种自我满足而已。能取得外界信任的首要联系也被切断,思想上行动上都处于半死不活的瘫痪状态。这是一种自我摧毁的做法。

这种在理智和逻辑之外的表达方式是被肯定的,但对沟通第三者是没有参考价值的。它近于发泄,表达的方式掺杂着痛苦和侵犯、牢骚和揭露。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对无可奈何的遗产的过激表现形式。

90年代的新极左派应从这个角度进行分析:人们在这里可以找到后68持不同政见者的特色,它有一些基本的不同之处,这个运动几乎不再是乌托邦思想的承载者,而其在形式上的激进使人想起过去的激进主义,它常含有个人主义的新态势,是“常有理”,它认为政权和机构都是一些统治的工具,同时又提出

^① Alexander S. NELL, *Libres Enfants de summerhill*, François Maspero, Paris, 1970, p. 112.

一些援助的要求。

对无可奈何的遗产还有一种较温和的解释,认为它有文化极左派的标志。人们拒绝明确承认带有权威的立场,对年轻人,从他们小时候起,就灌输一种自治模式,公民意识,让他们承担无法承担的重责。这类青年人要求有“违反”的“权利”,却拒绝为此付出任何代价。寻找快乐和低价毒品就是证明,就是《多极世界的佼佼者》中的兴奋剂,谁都可以服用而没有任何副作用:“只要你们想,你们就可以胡天胡地地休假,回来时既不头疼,也不神神叨叨!”^①

在大视听传媒中也有这类无可奈何遗产的痕迹。一些记者以诅咒者的姿态,充当反机制和它的代表,自称是被统治者的代言人,面对那些机构代表扣上恶名。另外一些人讲一些放纵言论、挖苦讽刺、嘲笑愚弄,将公私的区分抛到九霄云外,号召人人要在各种领域里标新立异。总之,造反姿态被视为家常便饭,而打擦边球的方法是一种可靠办法和创造的真实标志。

30年来,继承下来的这种姿态以讽刺的形式没完没了地上演并浮出水面。只有跳出这种境界,革新政治和文化才有可能。相反,在1968年5月其他领域里还有恢复和重建工作,在“现代化”、“改革”和“变动”的时刻,事件中还有些问题是很尖锐的:“经济发展,技术和科学的发展……怎么办?”要走向什么社会?个人和社会能否对支配现在和将来共同前程的方向和选择起作用?1968年五月运动对这些问题并未提供可靠的回答,而极左派运动随后对这些问题闭口不谈。但是这些问题不仅是五月遗产的民主思想的一部分,而且是“过去未完成的潜力”。^②我们又提出这些问题时,能与民主妥协吗,能承认或抛弃遗产的无可奈何部分吗?直至今天,我们的社会不是在其中搏斗吗?

① Aldous HUXLEY, *Le Meilleur des mondes*, Pocket, Paris, 1999, p. 74.

② Expression empruntée à Paul Ricœur.

图片来源

本书的图片主要来自下列出版物,我们对相关作者或权利人表示真诚的感谢。

1. *Mai 68: les mouvement étudiants en France et dans le mond*, Paris, Editions La Découverte/SODIS, 1988

2. *Mai 68*, Paris, 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1988

3. Roger Martelli, *Mai 68*, Paris, 1988

4. Tariq Ali, Susan Watkins, *1968: Marching in the Streets*, Free Press, 1998

5. *The 20th century in Pictures*, vol. 2, London, HELLO! Ltd.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68年5月,无奈的遗产/(法)戈夫著;胡尧步,韦东,高璐译.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4

ISBN 978-7-5006-7357-6

I. 1... II. ①戈... ②胡... ③韦... ④高... III.“五月风暴”
(1968 法国) — 研究 IV. D43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36944 号

Mai 68, l'héritage impossible
copyright © 2002 by Jean-Pierre Le Goff

Édition La Découvert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7 by China Youth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0-2005-2167 号

策 划: 杨天成

责任编辑: 王钦仁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64010053

营销中心电话: (010) 84027892 (010) 64010813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00×1000 1/16 27.5 印张 9 插页 431 千字

2007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4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定价: 42.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84047104